

目 录

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及其历史演变	1
一、秘密社会的定义和系统	1
二、秘密会党兴起的社会根源	4
三、秘密会党的性质	8
四、近代中国会党的类型与功能	16
五、会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	22
六、会党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关于会党史的分期	26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34
一、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各家之说	34
二、天地会起源新证	37
三、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	44
四、驳天地会明遗老创立说	49
天地会与台湾林爽文起义	50
一、林爽文起义的社会原因	50
二、天地会在台湾广泛传播与林爽文起义的酝酿爆发	55
三、战争的主要过程与特点	61
四、林爽文起义的失败原因、作用和影响	86
嘉道年间中国会党发展的特点	94
一、从地域上看，天地会的势力已从福建一带广泛传播 到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贵州、云南等 地区，并且传到了南洋	95
二、这一时期，南方的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目进行活动， 先后出现了数十种不同的名目	101
三、这一时期天地会举事的次数虽不少，但规模多不大，	



一般多为数百人的规模，大的也只有万人左右	106
四、这一时期加入会党的主要成员，大多是农村的破产 劳动者、游民	108
五、这一时期的天地会，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传会制度、 结盟仪式、组织机构和一系列的隐语、暗号	114
太平天国起义前夕雷再浩和李沅发起义的几个问题	118
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	129
一、起义酝酿时期	129
二、胜利进军时期	134
三、定都南京时期	137
四、太平天国衰败时期	142
关于洪大全的身份	148
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	153
一、史实的辩证	153
二、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	158
三、太平天国对斋教的政策	164
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	166
一、关于哥老会起源的几种说法	166
二、哥老会与咽噜的异同	167
三、咽噜产生的时间与社会原因	169
四、从咽噜到哥老会的历史演变	171
五、哥老会出现的年代和背景	176
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	180
一、长江教案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180
二、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的主要活动	188
三、长江哥老会的特点与社会根源	192
四、对长江教案的评价	200
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	203
一、余栋臣起义时的身份问题	203
二、余栋臣起义的特点与哥老会的作用	206
三、余栋臣起义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211
青帮的源流、组织结构与帮规密约	214
一、青帮的源流	214
二、组织结构和开香堂仪式	219



三、帮规与密约	225
青红帮的合流及其罪恶活动	231
一、青帮与红帮的合流过程	231
二、青红帮的主要罪恶活动	235
论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	241
一、自立军起义与保皇运动的区别	241
二、唐才常等联合会党的原因	244
三、唐才常等联合会党的经验	247
四、自立军起义及其失败原因	255
五、自立军起义在会党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259
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	262
一、革命派为何重视联络会党	262
二、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特殊联盟	265
三、资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基础	267
四、革命派联络发动会党的过程	269
五、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276
论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的破裂	279
一、革命党对会党态度的急剧转变	279
二、取缔镇压会党的几种方式	283
三、民国初年会党的表现和作用	287
四、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的破裂说明了什么	29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问题概述	292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293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302
三、抗日战争时期	311
四、解放战争和三年恢复时期	320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	
——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324
一、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	324
二、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可行性	327
三、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评价	329
论十九世纪的南洋华人秘密会党	332
一、华人迁移南洋与华人社会	332
二、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出现	336



三、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帮派斗争	340
四、华人秘密会党与南洋土著居民的关系	343
五、秘密会党反抗殖民者的斗争	344
六、殖民者挑动南洋土人与华人的纷争	346
七、殖民者对会党的放任、登记、镇压政策	350
八、华人秘密会党的性质和作用	353
论美洲的华人秘密会党	358
一、遍布北美洲的华人社区	358
二、活跃在华人社区的地下王国	360
三、美洲洪门的堂斗与暴乱	363
四、美洲洪门与辛亥革命	365
五、美洲华人秘密会党现状	369
论澳洲的华人秘密社会	372
一、本迪戈洪门会簿发现的意义	372
二、洪门天地会在澳洲的传布	374
三、澳洲洪门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378
附录一 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	383
附录二 扫黑必先反腐	
——2000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访谈录	404
附录三 天地会盟书誓词	408
附录四 天地会首领卢盛海等结拜盟誓单	409
附录五 颜亚贵所藏《桃园歌》	410
附录六 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所藏会簿	411
附录七 新刻江湖切要	436
附录八 作者论著目录	460
后 记	466
增订版后记	468

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及其历史演变^{*}

一、秘密社会的定义和系统

提起秘密社会，人们就会想到旧中国的青红帮和欧美的黑手党（Mafia）等组织。但是，秘密社会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组织才称得上秘密社会？对此，国内外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展开过讨论，意见并不一致。^①有人认为，秘密社会是一种进行隐蔽活动的小团体，凡被迫从事秘密活动的社会团体，就是秘密社会。这种说法，未必确切。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从事秘密活动的社会团体都是秘密社会，如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处于地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属秘密社会。有的秘密从事偷盗犯罪活动的集团，也不属秘密社会。有人认为，秘密社会不仅是从事秘密活动的非法团体，而且必须是具有秘密的宗旨、誓词、礼仪和组织章程的反社会集团等等。我以为，要对秘密社会的含义做出比较确切的规定，不能凭主观的假设推想，而应该依据秘密社会的客观特征，加以科学概括。

如果按照中国众多的秘密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组织的非公开性。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组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存在的，它们的活动也是在暗中进行的。但这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它们也可能由秘密转为公开，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哥老会、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的红枪会就是如此。（二）具有秘密的宗旨（包括口号和誓词）、奇异的入

^{*} 本文主要探讨秘密会党，但在阐述秘密社会的系统时，亦涉及秘密教门。

^① 国内学者的不同意见，散见于各报刊。国外学者的意见，代表性的著作有：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Manchester, 1959; Jean Chesneaux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Stanford, 1972; Mak Lau Fang, *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Oxford, 1981。

会礼仪（包括宗教仪式）和互相联络的隐语暗号等。（三）进行“非法”的活动。它们一般都进行特殊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活动，这种活动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政府所建立的“正常社会秩序”是相违背的。（四）在一定条件下，对统治者和政府当局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根据以上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概括地说：秘密社会就是一种从事特殊的宗教、社会或政治活动，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抗衡于政府的秘密团体。在旧中国，就是一些异端教派和会党组织，也就是统治者所说的“教匪”和“会匪”。

秘密社会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差不多世界各地都存在。在亚洲，中国的秘密社会最为突出，它是有清以来特别是中国近代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中国的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史料记载，就有 215 种。如果加上地方志和其他文书的记载，估计有三四百种。

中国秘密社会的名目虽多，但从它的类型来分析，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系统，即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教门系统，和以天地会、哥老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① 这样的分类，已被多数学者所采用。如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说：“中国有反政府之三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所谓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等，以及种种之诸教，要皆为白莲之分系。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非天地会之支派。”^② 我认为这种分类，基本上概括了中国秘密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当然，这并不排斥在动态方面教门与会党之间的互相渗透融合，即某些教门演化成会党（如青帮即由罗教分化演变而来），某些会党演化为教门（如湖南、江西一些地区的三点会演化为斋教、洪莲教），以及某些组织介于亦教亦会、非教非会的错综复杂的状况。

这两个系统的秘密社会，在组织状态、思想信仰、基本成员和分布地区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① 学术界也有人主张分为三大系统的，即白莲教系、天地会系、安清帮系（参见许地山：《〈天地会研究〉序》，见 [荷] 施列格：《天地会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也有人主张不必“强立系统”（参见陈守实：《关于秘密会社的一些问题》，载《学术月刊》，1979（3））。

^②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见《辛亥革命》（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本，99～1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一) 在组织上,教门采取传教的方式吸收徒众。一般由教主、师傅直接传教于门徒弟子,并以烧香施符为招募徒众之不二法门。收徒的仪式有受戒、传诀、唱誓愿文、上表挂号等内容。入教以后,俱要吃斋诵经,定期集会,并交纳会费。教内实行教主的家长制统治,从大主教到主教,到主香司策,到教徒,逐级相承,界限分明,“教徒不得与闻司策之事,司策不得与闻主教之事,主教不得与闻大主教之事”^①。传教职业不仅师徒相承,而且常常子承父业,世代相传。会党则采取开山立堂、结盟拜会的方式招募群众。凡持会簿、票布,即可纠集伙众,十百为群,不序年齿,结拜兄弟。拜会仪式有穿过刀门、传授隐语暗号、滴血饮酒、宣读誓言等内容。入会后须信守誓言,实行“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身亡”。其内部也是家长制的统治,首领对会众有无上的权威。但它标榜“忠义堂前无大小”,彼此哥弟相称,一般会众,“多得与闻秘密之事”,比教门更具平等色彩,反映了会党的游民组织特性。

(二) 在思想信仰方面,教门的宗教色彩很浓,他们宣扬弥勒下凡和劫变观念,崇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他们以入教可以“免劫保家”动员群众,抗议现实的苦难,向往美好的未来。会党的宗教色彩比较淡薄,虽然也崇拜关公,但主要作为他们忠义的典范。他们宣扬“桃园结义”、“梁山根本”、“瓦岗威风”,比较注重现实的利益,很少幻想虚无缥缈的未来世界。

(三) 组织成员。教门和会党的领导骨干虽多来自游民阶层,但教门的领导,大多是低级的衙役书吏、流浪艺人、和尚道士等;而会党的领导,大多是散兵游勇、江湖侠客。教门的广大徒众,主要是农民群众;而会党的广大成员,大多来自破产劳动者、游民。

(四) 在地区分布方面,教门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华北地区黄河流域特别盛行。会党主要活跃于中国南方,天地会在福建、两广、湘赣等省特别活跃,哥老会在长江流域各省尤其盛行。因此,有“北教南会”之说。但这种说法也是相对的。实际上,近代中国的教门势力并没有在南方绝迹,尤其是斋教势力,在南方还相当强大。道光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36—1849),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和新宁县连续爆发的四次农民起义,都是由青莲教(在湖南通称“斋

^①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教”）发动的。太平天国时期，南方各省的斋教多很活跃，起来响应太平军。在云贵地区的号军起义和苗民起义中，斋教也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60年代以后，斋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分成红、黄、白各支，继续存在发展。直到1895年，福建古田人民的反侵略起义，还是斋教发动的。但从总的趋势看，教门的势力在南方是日渐削弱。这与天地会、哥老会系统的会党势力在南方崛起有很大的关系。而会党势力在南方的飞速发展，又与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特别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陶成章将近代中国教门盛行于北方、会党盛行于南方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南北“民情风俗之不同”，显然是片面的。

二、秘密会党兴起的社会根源

在秘密社会史上，争议最多的是会党的起源问题。表面上是对天地会、哥老会等组织创立的时间、地点和创会人的看法不同，实质性的分歧却在于：这些组织是清代民族矛盾的产物，还是清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明朝遗民“反清复明”的组织，还是破产劳动者实行互助的团体？

我认为，要深入探讨和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将清代秘密会党兴起的社会根源搞清楚。

据清代的档案史料记载，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大量出现，不是在清初，而是在清朝中期以后。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至今还保存着清初至清末的215种不同名目的秘密社会档案。如果按它们出现时间的先后来划分，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出现的只有16种，其余199种都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出现的。如果再将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出现的16种秘密社会名目细加区分，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与天地会、哥老会相类似的一些秘密社会，如父母会、小刀会、咽噜等，多是雍正年间或乾隆初年才问世的。这个迹象表明，天地会、哥老会这类组织的出现，与清初的满汉民族矛盾，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因为，满汉民族矛盾，到清康熙年间已经趋向缓和，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都已被镇压下去，南明的几个小朝廷也相继覆亡。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和全国统一大业的完成，特别是经过康熙皇帝的一



系列政治改革和推行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清王朝进入了强盛时期。这时，明朝遗老们恢复明王朝统治的希望已成泡影。他们在政治上发生了分化，许多人放弃了以前的反清立场，走上与清政权合作的道路。即使像坚持反清立场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也多趋于消沉，隐居山林，闭门不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到下层人民群众中去，组织秘密团体，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至于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则在康熙朝以前，他在康熙元年（1662年）收复台湾之后即病逝，至今没有任何确凿的史料能证明他为光复明室在台湾或福建创立了天地会，更没有材料能证明他派人到四川开山立堂创立了哥老会。

那么，天地会、哥老会这类组织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清代秘密会党兴起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

我认为，清代秘密会党兴起的主要社会根源有两个：一是人口爆炸性增长，一是土地兼并严重。前者造成耕地开发与人口增长的比率不相适应，人多地少的矛盾在一些地区非常突出；而后者则促使封建土地所有关系畸形发展，更加剧了人多地少矛盾的严重性。

据学者的研究推算，中国人口的实际数量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已达1.5亿左右。^①经过明末的农民战争和社会动乱，人口大减，至清初只有6000多万。^②但清代的统治自平定三藩和台湾以后，即进入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的“盛世”阶段。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政局比较稳定，人民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生产发展，人口也随之大幅度地增长。乾隆初年，全国在册人数已接近1.5亿，到乾隆末年，突破了3亿的纪录，成为人口历史的高峰。再过40余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就达到4.128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数量最高的历史纪录。上述情况表明，从清顺治元年（1644年）到乾隆末年（1795年）这150多年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5倍多。

^① 国内学者一般多认为，中国人口在清朝以前没有突破1亿。何炳棣教授认为明万历年间，中国人口数已达1.5亿左右。参见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1959.

^② 清顺治初年的人口数没有确切的统计，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人丁数为10 633 326，顺治十二年（1655年）人丁数为14 033 900，由于当时的户籍以一户一丁计算，每丁户若有5人，加以逃避丁赋而隐瞒的人口，合6000余万。参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见《清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如果延伸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即近200年内，人口增加了近7倍。这个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但是，在同一时期内，作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耕地，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据统计，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耕地面积有700余万顷；而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册载最高土地数，全国耕地面积有780余万顷。这就是说，在近200年内，耕地面积只增长了一成多。如果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耕地面积数，与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耕地面积540余万顷这个低数字相比较，也只增长了40%多。如果将耕地以人口平均计，清初每人平均约有10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就下降为2亩多。在这期间，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①清代人口增长这样迅速，而耕地开发和生产发展却如此缓慢，就造成了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和生活资料来源的日益短缺。这种情况，乾隆年间即已相当严重，当时的许多地方志和文集常有“生齿日繁，地不加广”，人民“生计常苦不足”，“渐多游手”这类记载。这种情况，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就是社会生态的失衡。

应该进一步看到，这种人口膨胀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人多地少的矛盾，是发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地主阶级与农民处于对抗的阶级关系中展开的。因此，人口的增加，不仅促使地主阶级土地兼并活动加剧，而且也使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榨取更加残酷。这是因为，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地主阶级的人数也相应地增多。地主阶级的人口增多，意味着兼并之家日多，这必然造成土地的日益集中。如果将地主阶级的人数按全国人口总数5%的比例推算，那么清初地主阶级的人数应有300多万，乾隆末年便有1500多万，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时可达2000多万。由于清代康、雍、

^① 参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日本学者梨本祐平将1741年至1851年中国人口增加率与1724年至1881年中国耕地面积增加率做了如下统计对比：

(A) 人口增加率		(B) 耕地面积增加率	
1741年	100 (14 341 万人)	1724年	100
1781年	195	1766年	108
1821年	248 (35 554 万人)	1812年	116
1851年	301 (43 216 万人)	1881年	133

梨本先生的统计，与上述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增加的比率是大致相似的（参见梨本祐平：《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51页，东京，同成社，1972）。



乾三朝的统治比较稳定，社会相对承平，地主阶级贪图享受和兼并土地之风就恶性发展起来。他们在土地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展开激烈的争夺，到乾隆年间，已形成“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①的局面。与此同时，他们对农民的压榨也更加紧和扩大。这样，就造成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当时，有人对占有土地和丧失土地的人口比例做过估计：“今天下……占田者十之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②如此众多的人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土地，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怎样来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清朝统治者都感到束手无策，连皇帝也说：“宵旰筹思，终乏良策。”广大劳苦群众为衣食所迫，不得不想方设法自谋生路。他们或到外地出卖劳力，佣趁度日；或肩挑负贩，小本营生；或漂流江湖，行乞糊口；或上山开采；或入海为盗。其中解决人多地少、衣食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移民。也就是人口密集地区的失业人群，大批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我们看到，清康熙中叶以后，一些人口密集、土地贫瘠地区的群众，已开始大批自发地向外流迁。人口外流最突出的，南方是福建、广东，北方是山东。

这几个省，都是依山傍海，山海交错，素属地瘠民稠。闽粤两省沿海地区，自康熙、雍正以来，就有大量的无地农民外流。他们除一部分出洋谋生外，大部分则成群结伙，携老挈幼，向地广人稀的台湾、广西、四川等地迁移。山东省民人则大批流往关外东北地区。据记载，台湾的人口，在康熙以前不满10万，经过闽粤内地民人的大批迁渡，康熙初年增至20万，乾隆中期即达100万，嘉庆二十年（1815年）已增加到200万。^③广西、四川和奉天地区的人丁数，同时期内也十倍、百倍地增加。如果以顺治十八年（1661年）人丁数的升降比为100，那么，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时，广西就上升为4066.79，四川上升为18378.92，奉天上升为12839.39。^④这些地区人丁增长比例如此之高，当然有本地人口增殖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外地人口的大量流入。此外，其他地区的

①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39。

② 旷敏本：《复范抚军论城工》，见《峒嵎删余文草》。

③ 参见连横：《台湾通史》，106~110页。

④ 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260页。四川省人丁增加比例上升如此之快，不单是闽粤民人大量迁入，而且还有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大批流入的民户。奉天的人丁除山东民人流入者外，还有直隶、河南等省迁来的民户。



人口，也有不同程度的流动和迁移。

大量的破产农民，离乡背井，流落到外省以后，生活孤立无援，极不稳定，常常遇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和封建统治者的欺压。出于互助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结成团体。于是，像天地会、哥老会这类异姓拜兄弟，实行“一人有难，大家帮助”的秘密会党，就应运而生。我们看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以后，台湾开始盛行结拜之风，雍正末年乾隆初年，就出现了父母会、小刀会等组织。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天地会在福建漳州地区创立后，很快就随移民传入台湾。与此同时，天地会随闽粤民人的迁流，传入广西等省。在四川，随着外省流民的大批入川，以及本地破产劳动者的涌现，乾隆初年就出现了嘬噜，后来演变成哥老会。在东北，出现了在理会、红胡子等组织。其他省区，凡有破产劳动者、游民聚集的地区，几乎都有这类秘密社会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秘密社会的发展趋势，与入多地少矛盾的加剧、破产农民队伍增长的步伐是一致的。清代中叶秘密社会名目陡然增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史料证明，秘密社会大量出现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后），正是中国人口增长走向历史的高峰，清王朝由盛转衰，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上述社会矛盾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结论：清代秘密会党的兴起，不是由于民族矛盾，而是由于社会矛盾。人口急剧膨胀和土地兼并剧烈，造成了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这就是清中叶秘密会党兴起的主要社会根源。至于到了晚清时期即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更庞大的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这是近代中国秘密会党得以飞速发展的主要社会根源。

三、秘密会党的性质

搞清了秘密会党兴起的社会根源以后，对它的性质的判别也就比较容易了。如上文所述，既然清代秘密会党的兴起，不是由于满汉民族矛盾，而是由于社会矛盾；既然秘密会党的出现，主要是为适应破产劳动者实行互助的需要；那么，我们就不难判明，它的基本性质就是破产劳动者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



当然，我们的探讨决不能停留在这一步。因为，秘密会党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以往由于人们对它的基本成员、组织结构、思想倾向等方面的现象认识不一，因而对它的性质也就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为了将这个问题的探讨向前推进一步，下面我想就秘密会党的社会成分、组织结构、思想倾向等容易导致对性质问题产生分歧意见的几个方面，再做一些分析。

（一）从秘密会党的社会成分看。以往，学者多很重视从秘密会党基本成员的社会成分来分析它的性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提法似乎值得商榷。例如，有的同志从鸦片战争前有关天地会的档案中，看到闽粤一带最初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以广东沿三江以上水陆交通运输线上的肩挑负贩者和运输线上的小城镇中的一些小商贩、小本营生者等，从而就得出结论，天地会组织最初乃是闽粤一带世代以肩挑负贩为主的苦力劳动者的自卫反暴的秘密结社。有的同志看到天地会成员中有不少客家人，就断言天地会是客家人的组织。还有的同志看到某些地区的会党农民成分较多，就认为它是农民的组织，等等。

以上这些提法之所以不甚恰当，首先因为他们都是以局部片面的现象来概括全面的情况。就拿鸦片战争以前闽粤一带的天地会来说，它的成员决不限于交通运输线上的肩挑负贩者。我们看到，在这同时，闽粤两省还有大量流落在邻省边界山区“结屋而居”的“棚民”，其中有不少是天地会分子。我们还看到，台湾的天地会中，有大量的“罗汉脚”，他们都是从闽粤内地迁渡来的游民。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将天地会说成是“棚民”或“罗汉脚”的组织。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就不能把天地会说成是“肩挑负贩者”的组织。

其次，对这些人的阶级属性应做具体的分析。就以闽粤地区的肩挑负贩者来说，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刚从农村破产游离出来的贫苦农民。为了谋求生存，他们流落到交通运输线上充当苦力，或挑货郎担搞小买卖等。他们的职业是没有保障的，生活是极不稳定的。实际上，他们仍属破产劳动者的范畴。因此，我以为，以他们临时性的职业身份来概括天地会的性质，是不太合适的。

关于天地会中的“客家人”，我们也应该具体分析。首先，应当承认，在有些地区的天地会中，客家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将天地会说成是客家人的组织。就拿嘉道年间广西的天地会来说，虽然最初确是由闽粤迁来的移民组织起来的，并且



在这些闽粤来的移民中，亦有相当数量的人属客家，但也有很多不是客家人。特别是他们在广西各地结拜和传播天地会，不仅大量招募广西当地的广大贫苦农民参加，而且还吸收壮、瑶等少数民族的群众加入。因此，我们就不能笼统地说，广西天地会是客家人的组织。其次，所谓客家人，只是指这部分人所操的语言系统而言（操客家语），并不反映他们的阶级属性，用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天地会的属性，显然是不恰当的。

至于农民在一些地区的会党中占主要成分，这大多是在农民起义、会党运动的高潮时期出现的情况，它并不能改变会党的游民性质。因为，这些农民在会党中不起支配作用。因此，我们也不能把会党说成是农民的组织。

我认为，从会党发展的总趋势看，破产劳动者、游民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以破产劳动者、游民的阶级属性，来概括会党的阶级属性，是比较恰当的。

为便于从会党基本成员的阶级属性来判别会党的性质，我们搜集了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起义时天地会骨干 85 人所供身份的统计，嘉道年间天地会 128 起案件中 226 人所供身份的统计，咸丰年间广东天地会“红兵”起义成员 39 人所供身份的统计，和辛亥革命时期湖北襄阳、光化江湖会成员 57 人的身份统计，分别列表于下：

表 1 乾隆年间台湾天地会成员身份统计表

身份 人数	游民	佣工	小手工 艺匠人	耕种者	迷信职 业者	小商贩	差役 文书	监生 秀才	富商
85	32	9	7	4	6	12	12	2	1

材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林爽文起义被俘人员供词。

表 2 嘉道年间天地会成员身份统计表

身份 人数	雇工 贸趁者	雇工	商贩	种田兼 商贩	耕种 手艺	手工 业者	耕田 者	僧侣	穷苦知 识分子	差役	殷实 者	不明 身份
226	36	9	32	58	4	4	9	4	18	6	2	44

材料来源：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载《历史档案》，1981（1），116 页。

表 3 咸丰年间两广总督衙门档案“贼供”所载被杀“贼”身份统计表

身份 人数	佣工	小贩	耕种者	渔夫水手	匠人	乞食者	私贩	差役	绅士
39	10	8	6	5	5	2	1	1	1

材料来源：英国学者柯文南（C. A. Curwen）提供；亦见 Fei-Ling Davis, *Primitive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 p. 93.



表 4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江湖会成员身份统计表

身份 人数	士兵	交通运输工人	其他帮工	小商贩	农民	商人	衙役	地主
57	22	10	3	12	4	3	1	2

材料来源：《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21页。

以上四份统计材料，虽然统计的详略程度不一，但基本的统计内容是一致的。从这四个不同时期会党成员的身份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在鸦片战争以前，会党的主要成员，大多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劳动者，各表所列的游民、佣工、雇工贸趁者、小贩、乞食者等，都是从农村破产游离出来的贫苦农民，这些人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由于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手工业和旧式交通运输业遭到严重破坏，加之战争频繁，大量兵勇被裁撤，因此，这一时期的会党成员，除了破产农民外，还有大量的破产运输工人、船民、水手，以及散兵游勇等。辛亥革命时期湖北江湖会成员的情况（参见表4），就反映了这个变化趋势。总之，无论鸦片战争以前，还是鸦片战争之后，会党都是以破产劳动者、游民为主体的团体。

（二）从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来看。过去有的学者过分强调了它的“民主、平等色彩”，因而将它的进步性也提到了不适当的程度。其实，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基本上还是模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家族制度，并没有摆脱封建落后的状态。

众所周知，古老的中国农业社会，素以家族、宗族和村寨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这种以血缘为纽带，并具有浓厚封建地域性的社会组织，是适应闭塞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基础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到其他的社会生活，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个人的经济独立自主、法律保障、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等因素，是微不足道的。当大量的游民群从这个传统社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户籍，没有职业，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迫切要求生活互助。同时，由于这些人离乡背井漂流异地之后，就丧失了传统的亲族连带关系，在精神上产生了极度不安，因此他们渴望归属于世俗的共同体。这种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基本欲求，是他们加入秘密会党的潜在动机。在这样的动机支配下，他们就模拟传统的家族制度，创造出天地会、哥老会、青红帮这类具有虚构血缘关系特征的家族制的帮会团体。

秘密会党内“血缘关系”的创造过程，首先是通过歃血拜盟，

使成员形成血缘的共同意识。歃血结拜、血盟誓约的风俗在中国很早即已流行，其中结拜兄弟是血盟最重要的一种。结拜时，一般都要刺人血或牲血（鸡、犬、马之血），和酒而饮，并需对神宣誓。通过这种仪式，一方面表示结盟朋友之间，从此就成为血盟兄弟，即所谓“刺血之友，如分同气”^①；另一方面又表示，结盟者互相信守誓约，违反盟约“明神殛之”^②。古代这种结拜血盟兄弟的风习，通过《水浒传》中梁山水泊聚义和《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故事，在下层人民中流传开来。到清代，就被天地会、哥老会等各种秘密结社所采用。他们在实行异姓结拜兄弟时，“饮血酒”是最重要的一项仪式。天地会举行这项仪式的时候，新入会的成员都要用银针刺破自己的中指（有时以割鸡取血代之），滴血入酒，共饮一杯血酒。饮血酒时，要吟唱“此夕会盟天下合，四海招徕尽姓洪，金针取血同立誓，兄弟齐心要和同”^③等诗句。同时要在神明的照览下，宣读誓约。关于天地会盟书誓词，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政府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在一位牺牲的起义军将领林水身上搜获的一份《天地会盟书誓词》。其主要内容有：“今夜插（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今将同盟姓名开列于左。本原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汝□□□□□□□□视同一家。今夜传教汝手路密约，上不传父母，□□□□□□，如有漏泄根机，含血喷天，同（全）家灭亡。自今既盟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泻于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枫（相）济，犯（患）[难]相扶。我等兄弟须当循规守法，不可借势冒为，恃强欺弱，横凶作歹，故违誓约。”^④我们在嘉庆年间的《天地会首领卢盛海等结拜盟誓单》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内容。^⑤道光、咸丰年间以后，一般多朗读《洪门三十六誓》。^⑥经过这样的结拜仪式之后，

① 《辽史》卷90，列传第20。

② 《春秋左传注疏》卷16，僖公二十八年。

③ [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197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第2660卷。

⑤ 卢盛海的结拜盟誓单内有“自盟之后，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吉凶则彼此相应，贵贱则甘苦同情，是非则神灵默佑”等语。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⑥ 参见[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秘密会党的成员都一律改姓洪，互称“洪家兄弟”，从而酿成会党成员的血族意识，创造了相互之间的血缘机能，最后就凝聚成一种命运共同体——血缘家族制的帮会团体。

其次，在秘密会党的组织机构方面，他们也模拟家族制的构造原理，虚构起会党成员间纵横的血缘关系。由于世俗血缘家族关系基本上是纵向的父子从属关系和横向的兄弟和睦关系，因此，秘密会党也按照各自的需要，模拟这种家族制，在它们的内部建立起纵横两种关系，并使之保持均衡状态。

纵向关系方面，以青帮严格的字辈制和师徒传承制最为突出。青帮早期是运河线上运输漕粮的水手帮会，它的成员大多来自运河沿线的农村失业者和游民。由于这些人来自不同地点，风俗、习惯、语言也不相同。而漕运工作是一种集体性的艰苦劳动，他们在数千里的运输途中，经常要遭到土匪的袭击和异帮人抢夺职业等威胁。因此，要把这批苦力劳动者组织起来，并霸持漕帮，非有强力的精神统治和严格的帮规家法不可。青帮内崇拜罗祖和实行严格的字辈制的家长统治，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运河沿线漕运劳动者在各处所设的碇泊安息所，同时也是他们守护罗祖神的共同祭祀和信仰的集会所。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的建立，可以在生活不安定的水手们慌乱的心中，唤起一种连带感和道德感，产生一种团结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青帮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字辈制和家长统治。其辈分按“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觉”^①二十四字排列，凡拜师入门，各按字辈，入门弟子与师父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一般。这样，前后世代相传，就使全体成员都置于一个等级森严的犹如封建家族的序列之中。在青帮内部，实行上下绝对服从的家长统治，宣扬“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②，其核心是建立师父的绝对权威。他可以“替祖代法”，对违反帮规的成员，施以各种酷刑处罚，使所有成员束缚在这种封建家长式的控制之下，而不能自拔。

横向关系方面，以天地会、哥老会的组织结构为代表。由于天地会、哥老会的活动并不限于一个地区或某个职业部门，也没有统一的奋斗目标，因此，它们的组织机构重点不在发展强力的统治和

^① 道光六年四月十一日两江总督琦善在一个奏折中所提到的二十四字，与此处略有不同，参见马西沙、程款：《从罗教到青帮》，载《南开史学》，1984（1）。

^② 《漕运汇选》，51页。

统合手段，而是发展横向的同辈同僚的关系。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往往只因主持入会仪式、掌握钱谷、侦察情况和通风报信等需要，而设置一些职位，各执掌官之间都是兄弟相称。如天地会的首领（总理）为大哥，香主为二哥，白扇为三哥，以下还有先锋、红棍、草鞋等。哥老会的山主为龙头老大，圣贤为老二，新副为老三，以下直至老幺。为适应江湖游民结社的流动性的需要，天地会和哥老会的成员，只要持会簿和票布，即可随处传会，开立山堂。天地会随处开台、广泛发展之后，就分设长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最早设房是在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时，曾设立了三房。^①后来，在天地会的会簿中，就出现分省设房的记载。^②哥老会则在各地分设山堂香水。这种横向关系发展的结果，就出现了山堂林立、各自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的局面。

总之，无论从纵向关系还是从横向关系看，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都是家族血缘制的模拟。按生物学的道理来说，血缘是永远切不断的。秘密会党虚拟这套血缘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帮会大家庭。因此，秘密会党的成员要随意从帮会家庭中脱离出来，也是不许可的。它的帮规就明确规定：“拜把之后，不许擅散”^③；“进帮不准出帮”^④。入帮以后，必须视帮为家，“患难相共，与帮同休”。

由上述可见，从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看，无论青帮、红帮，或是其他团体，在形式上，都是模拟了传统的血缘家族制；在事实上，都采取了封建家长制的统治。陶成章说，会党“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这只是与教门相比而言的，它并不具有新的阶级内容。如果离开了这个具体条件，来强调它的“民主、平等色彩”，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三）从秘密会党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看。这主要应从它们的结会宗旨、会内的条规则例、联络的暗号隐语等方面来考察。

① 林爽文为长房，蔡福为次房，叶省为三房。参见嘉庆《台湾县志》卷5。

② 据目前所见最早的会簿记载，长房吴天成，在浙江；二房洪大岁，在福建；三房李色地，在广东；四房桃必达，在云南、四川；五房林永招，在湖广。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一），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后来，有前五房、后五房之说，各本所记省份、人名有异，参见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重庆，正中书局，1943；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③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④ 《红帮十大帮规》第十条，参见钱生可编：《青红帮之黑幕》（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我考查了有清以来各地主要会党的结会情况，发现它们的基本宗旨，大多是为实行患难相助。有的学者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嘉道年间的天地会案件材料做了统计，其头目供明结会基本宗旨的有 96 起，其中为“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者 26 起；因贫苦难度而纠人结会以便“敛钱分用”者 15 起；为纠众抢劫富户以“得财分用”者 39 起；为攻抢城镇“竖旗起事”者 11 起；为拒捕或防备械斗者 5 起。^① 这个统计，虽不能说完全准确，但它基本上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地天地会组织的结拜目的和斗争方向，也反映出天地会的主要思想倾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应该否认天地会中存在着“反清复明”的思想、口号，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天地会誓词、会簿中“明主传宗”^②、“恢复明祚”^③、“共扶明主”^④ 等词句，以及天地会起义中假托朱明后裔，打起小主朱洪竹、朱洪英的旗号和“反清复明”的口号？我们能否根据以上这些词句、旗帜、口号，就将天地会说成“反清复明”的组织呢？我认为，像天地会这样打起前代王朝旗号，冒名前代皇帝或其后裔，以及幻想前代王朝复位的做法，在中外农民起义史上，是常见的现象。在中国，从秦末农民战争时陈胜“诈称公子扶苏”，到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天地会卢茂起义假称宋朝后裔赵良明^⑤；在世界史上，如 17 世纪初俄国农民梦想伪皇季米特里，18 世纪 70 年代普加乔夫冒称皇帝彼得三世，以及越南农民梦想黎氏王朝，苏格兰农民梦想亲爱的查理王子，都是这种表现。这是农民起义的皇权主义、保守思想的反映。清代的天地会起义，打起朱明后裔旗号，梦想“恢复明祚”，也是属于这种举动，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含义。至于“反清复明”的口号，最早是否出自天地会，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是天地会独有的，因为这种思想和口号在白莲教里也存在。人们并没有因为白莲教具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和口号，就将它定为“反清复明”的组织。而且，“反清复明”也不是天地会的一贯口号，在实际斗争中，它常常提出一些更反映群众切身利益的战斗口号。因此，我们也就很难根据这个流行口号和假托朱明后裔的做法，将天

① 参见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载《历史档案》，1981（1）。

② 《天地会盟书誓词》，载《清史研究通讯》，1985（1）。

③ 《录副奏折》，嘉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福建巡抚汪志伊奏。

④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 3。

⑤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闽浙总督崔应阶奏。

地会说成“反清复明”的组织。

天地会的互助性质，不仅可以从上述大量天地会头目供明的结会宗旨得到证明，而且还可以从天地会的条规则例中找到证据。例如，《洪门三十六誓》就规定，自入洪门之后“倘有父母兄弟，百年归寿，无钱埋葬，有白绫飞到求兄弟相帮，必要通知各兄弟，有钱帮钱，无钱出力，以定其事”；“各省外洋洪家弟兄，不论士农工商，江湖之客到来，必要支留一宿两餐”；“兄弟患难之时，无银走路，必要相帮，钱银水脚，无论多少”；“或有抢劫取错兄弟财物者，即速送回兄弟”；“有兄弟被人打骂，必要向前，有理相帮，无理相助”；“或赌博场中，不得使假吞骗兄弟钱财”；“有弟兄劫抢偷拐，或骗执之财，不得眼红”^①等等。而洪门的《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就是对洪门成员违反上述原则的种种处罚之具体条例。

此外，秘密会党还颁发腰凭、票布，持票即可“随所至皆得衣食”。彼此联络有切口隐语，和“三指诀”、“茶碗阵”、“挂招牌”等暗号。开码头时，有盘问对答的诗句。这些都反映出会党的流氓无产阶级性质和江湖习气。

四、近代中国会党的类型与功能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在瓦解；另一方面，近代化的城市在成长。但是，由于这种变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下进行的，不仅农村生产力极度低下，经济凋敝，而且城市的工商业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加之自然灾害连年发生，战乱持续不断，失业人群和饥民队伍被层累地制造出来。这些失业和饥饿的人群为了求生，就大批投奔会党，加入匪帮，从事非法的“盗匪”活动。所以有人说，近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会匪遍地、盗贼横行的“土匪之国”^②。近代中国的会党，不仅活跃于农村，而且密布于城市和交通码头。根据他们在城乡不同地区的活动特点，我们可以将近代会党分为农村型和城市型两种不同的类型。

农村型的会党，是以农村中的破产农民和其他游民为主体而组

^① [日]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② [日] 铃木中正：《中国史上的革命与宗教》，249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3。



成的。在旧中国的农村，他们究竟有多少山堂，已无法确知。但是，我们从一定时期某些地区性的文献记载中，还可以窥见其大概。例如，据《平桂纪略》所记，自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八年（1850—1869），广西就有会匪团体1000个以上。据同时期的《堂匪总录》和《股匪总录》记载，广西十二府“堂匪”的堂号数（包括土匪的）即有213个，“股匪”有230股。如果加上当地的棒棒会、孝义会、金钱会、北帝会、父母会、青莲会等种种名目，以及水上的“艇匪”组织等，总数也不下1000个。由此可见一斑。

农村会党的社会功能，对内主要是谋求其成员的生活自保，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行动步伐。由于农村破产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加入会党的最基本要求是谋求饭食，因此，农村会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会众的吃饭问题。我们看到，农村会党解决会众吃饭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数百为群，实行集居的共食制。这种共食制，以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天地会的“米饭主”最有代表性。凡米饭主，都开堂设馆，招待饭食。但会众抢夺的财物，要一律交公，同时必须遵守会内纪律，服从指挥。当时，在天灾人祸压迫下，广大无家无食的破产农民，有人管饭，生活受到照顾，无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最大的慰藉，所以投奔“米饭主”的群众很多。广西最大的“米饭主”杨西安，在平乐沙子街开设“连义堂”，拥有数万会众。^①同一时期，湖南的会党，也实行“供给银钱饭食”^②的制度；淮北的捻子，则实行集体掠夺、坐地分赃制。这种谋求生活自保的管饭制度，在许多农村的会党中，一直延续下来。如光绪初年，江苏东海县盛春山主持的“春保山红帮”，不仅实行平均共食，而且对因帮务而致残的人——“老公”，还给予终身奉养。^③辛亥革命时期，河南的“在园会”和青帮也为饥饿民众解决饭食问题，所以在民间流行着“要想吃饱饭，赶快去在园”，“在帮的都是一家人，不在帮的没有你的馍吃”^④的歌谣。浙江龙华会在其宗旨中还明确规定：“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⑤

农村会党的对外功能，主要是进行非法的不择手段的经济掠夺

① 参见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

② 《录副奏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③ 参见〔日〕末光高义：《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36~40页。

④ 《辛亥革命回忆录》（五），376、3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⑤ 《龙华会章程》，见〔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活动。有时也进行抗击官府、反对贪官污吏的政治斗争。但又常被统治者收买，充当世仇械斗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由于会党的基本成员脱离生产，所以他们的经济活动就偏重于寄生的、非法的部门。通常是进行走私贩运，开设赌场、烟馆、妓院，和从事偷盗抢劫等各类土匪活动。

走私贩运，主要指私盐贩运和鸦片贩卖，这是会党取得生活资料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私盐贩运活动古已有之，但在近代尤为突出。在中国近代的各条私盐路线和运销地区，几乎都有秘密会党的活动。如川私地区，就有哥老会的贩私活动。潞私地区，有哥老会、刀客、红胡及教匪勾结私活动。芦私地区，青帮、红帮、捻党处处充斥。浙私、闽私、粤私各线，则有私贩党、添弟会、三点会、千刀会等的活动。在以上各地区中，以两淮地区的私贩最为猖獗。据清朝地方官报告，此处游民多以贩私为衣食之源，苟图温饱者，蚊附蝇营，结队横行，“大夥以数千计，小者二三百为群……凡安徽之颍、亳、庐、凤，江苏之徐、邳，河南之南、光，山东之曹州，湖北之襄阳，江西之南、赣、吉，红胡、教匪、捻匪、会匪以及粮船水手，皆其党类，处处充斥，阻坏盐法，扰害地方”^①。

在近代的鸦片毒品走私包运活动中，会党也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嘉道以后，在黄埔、澳门各海口，珠江口外之伶仃洋上，以及广东内河西江、北江的鸦片走私，以三合会的势力为最大。民国时期，青红帮的贩毒活动，遍及长江流域，以至两淮的偏僻农村。四川、云南的烟帮，多与当地的哥老会相勾结。

但是，会党在农村中最大量的活动，还是从事各类土匪活动。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土匪活动与会匪活动是密切相连而不可分的。所以胡林翼、曾国藩等在镇压会匪的过程中，曾总结出一条经验：只究其为匪，不问其为会。

按照中国近代土匪（会匪）的组合方式、活动规模、持久能力及活动的地理区域等因素，可以将它分成三种类型：暂时性的匪帮，半永久性的匪帮和土匪军队^②。

^① 王赠芳：《请更定盐法疏》，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0。

^② 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研究淮北农村的民众运动时，将淮北地区的土匪分成以上三种类型。实际上，这三种类型的土匪，在旧中国的各地区几乎都存在。因此，这里也采用她的分类法（参见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pp. 66-74）。



暂时性的匪帮，是最简单的土匪集团。它是一种小规模、季节性、地方性的游民的纠结。这种集团的成员，大多因经济上遇挫折，生活难度，即三五成群拜把，数十人结帮，在地方上搞小规模偷盗活动。“忽散忽聚”^①，是他们活动的最大特点。

半永久性的土匪，即组织相对稳定的大股土匪。这种土匪集团，大多出现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严重的地区。因为在那里，还有数目巨大的农民投奔“绿林”，所以他们往往是千百为群，拜台结会后，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带，或山寨，或湖泊，或平原的“三不管”地区，作为基地，从那里出发，奔向远方掠夺。例如，金田起义前夕，广西连续遭受天灾，饥荒严重，“通省群盗如毛”，“土匪纷起”，拜台结会，各编堂名，“每堂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合数堂便已逾万……专以淫掠勒索为事，通省无虑数十起”^②，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在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淮北地区成百上千的土匪结帮，是一种普遍现象。据报道，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一带就聚集了二三十万土匪，他们丛簇结集在鲁、豫、苏、皖四省的边界线上。1925年，河南一省就有5万人的土匪队伍，而到了1930年，山东一省就有100万土匪。^③其中拥有数百或数千人的大股土匪，山东省有47股，河南有52股。^④这种大股土匪，内部组织比较严密，一般都拥有“侠盗”式的首领，首领与匪众之间，建立在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之上，匪首向大众提供安全和物质的保证，匪众则报以从事掠夺和对于头领的忠诚。关于其内部的组织状况，何西亚曾做了如下具体记述：“土匪之组织，各地不同。通常大股土匪之组织，系由各小股组合而成，而头目以下均为弟兄，集合数个小股组成一大股，推一势力较大最有胆识者为领袖，是为大头领，亦曰当家。大头领对内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之权，对外有代表全山（匪中称己之窟曰山，亦曰寨，又曰堂）接洽一切之权，匪众称头领曰大爷，以下之头目各序其次曰二爷、三爷、四爷……亦视其势力与职分而定。山寨自头领为寨主外，并置有参谋数人，号曰军师，亦曰师爷；书记数人，号曰白扇，亦曰牛一；会计数人，掌管全山银

① 《刘中丞奏稿》卷2。

②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参见[日]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64~66页，东京，1931；《支那兵、土匪、红枪会》，197~199页，东京，1938。

④ 参见[日]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72~75页；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89~94页，上海，泰东书局，1925。



钱出纳事项，号曰账架，亦曰水箱；指挥数人，指挥匪众进退战守事宜，号曰炮头，亦曰门神；壮匪数百人，遇有不测时，武装拒敌者，号曰拒捕，亦曰坝手；匪探数十人，分布近寨各处专以守岗备警为事者，号曰巡风，亦曰巡冷子；专往外埠各地调查军队动作探刺重要消息者，号曰踏线，亦曰走线；与走线同样在外奔走，刺探消息，惟其任务仅在调查富翁财产住宅面貌以及家中人口等事者，号曰插签；……专以谈说票价为事者，号曰压水；山寨离市井较远者，中途特约窝家数处（此项窝家，或系贫民，藉通匪以图分润赃物者；或系富家，实由匪等迫出之），号曰槽兜；此外在外尚有派往各地联络各方认识交情之交际匪，在各通商口岸结识洋人购运军火之匪；在内有执行匪法之匪，掌管械弹之匪，以及看守肉票之匪（号曰秧子房）；种种职司，无不兼备，故其组织之严密，实堪令人口噤舌咋不置也。”^①从这种组织机构，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会党的内部机构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大股土匪，除了进行有组织的抢劫掠夺活动以外，有时也干出一些与梁山泊绿林豪杰相类似的劫富济贫、为农民伸张正义的事迹。例如，19世纪40年代，广西天地会张嘉祥部，曾以“杀官留民，劫富济贫”为号召，并提出了“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得觉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②的口号。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山东临清的土匪中间，也流行着一支与此相似的民谣。^③江苏盐城的一个土匪集团，还发布过大意为如下的宣言：“我等发出告谕，要求绿林大众为了一个目的群集起来清算我们社会中的腐败因素。普通乡里是我们关切的对象，集团财产是我们的目的。首先，我等必须处死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之辈，摧毁中国灾害的根源，并把它改造成为完全的新世界。”^④这些向往公平与正义社会的民谣告示，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正由于这个原因，农村会党、土匪集团，常常有众多的农民参加，如张嘉祥的“怡义堂”，最盛时期拥有万余群众。民国时期一些地方的绿林部队，情况也大体如此。而在会党起义高潮时期，就有更多的农民群众加入起

① 何西亚：《盗匪之组织与规律》，见《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

② 《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③ 山东临清土匪中流行的民谣是：“上等人们该我钱，中等人们莫管闲，下等人们快来吧，跟我上山来过年。”（[日]长野朗：《中国农民运动观》，270页，东京，1933）

④ [日]长野朗：《中国农民运动观》。



义行列。所以会党起义的真正力量，还是来自农民群众。

从相对稳定（半永久性）的大股土匪向前推进一步，就成为土匪军队。土匪军队一般多在几股土匪联合的基础上，采取军队式的编制，诸如分成军、师、旅、团、营之类，有的还采用正规的纪律条令和戒严令。^①他们除了进行常规的土匪掠夺活动以外，还不时向城市集镇和地方政府发动袭击。如淮北地区的各支捻军，民国时期活跃在华北的白朗部队、河南的“老洋人”部队，以及江西井冈山地区被共产党改造前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都属于这种性质。

总之，以上各类土匪活动，都是农村会党对外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他们求生的主要方式。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大批农村的失业者、土匪、游民涌进城市寻找职业和生活机会，秘密会党行帮的势力也在城市中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就形成了近代城市型的会党。

由于中国近代城市的半殖民地性质，以及城市行业多样，竞争激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的力量较强等因素，就决定了城市会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会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

（一）范围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汉等城市的青红帮，上至官府，下到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到澡堂妓院，无处不有他们的势力。

（二）分帮分行，各分地段。以上海为例，除了本地帮之外，还有苏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福建帮等等。在同一个行业里，如铁路、码头上，还分广东帮、山东帮、江南帮、湖北帮、福建帮等帮派。各帮在同一城市里，又按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如上海，老城区是上海帮的基地，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界归浙江帮，十六铺一带属安徽帮。

（三）组织严密，帮规复杂。由于帮会势力已渗透到城市的各行各业，为适应行业、地区之间的纵横联系和控制，它们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网络组织和详细的帮规暗号。如青红帮在长江各城镇码头都设立了山堂组织，还有进行联络的“海底问答”、“江湖切口”，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四）具有更强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帮会进入城市以后，就逐步演化为黑社会组织，其头目不仅包赌包烟包娼包盗，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而且还与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相勾结，充当他们的

^① 参见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34~38页。



爪牙鹰犬，与人民为敌。如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武汉的刘贵堂、杨庆山等，都充当着这样的角色。

至于城市会党的社会功能，除了一些基本点与农村会党相同外，它在为城乡破产劳动者介绍职业，以及在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也还有某些特殊的作用。

综观近代中国城乡会党的社会功能，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的道德标准是互相矛盾和对立的，它对内要求互助、对外实行掠夺的求生战略，与它政治上的两面性一样，都深刻地反映了游民阶层的阶级特性。

五、会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的侵略，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一百多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革命的主力始终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而会党，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在联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会党是一种落后团体，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考察会党的历史作用时，就应该既看到它积极作用的一面，又看到它消极作用的一面。

会党在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究竟起了哪些积极作用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党本身一直充当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有生力量。在近代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可以说每个时期，每一场重大的斗争，都与会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除了在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群众斗争高潮时期会党斗争特别活跃外，在其他各个时期各地区的群众反抗运动中，会党的斗争也是史不绝书的。在鸦片战争时期，我们看到，首先是广东的天地会积极投入了群众性反侵略斗争。他们不仅参加了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而且还参加了广州城内和沿海地区的群众打击侵略者的活动。在反侵略斗争的行列里，不仅广州附近的农民、沿海的枭徒和渔船的棚户是天地会成员，连清朝的营勇团丁、衙门差役也多属三合会。当英国侵略军来到浙



江沿海地区以后，当地的黑水党、勾刀党就立即起来打击侵略者。这些斗争，首次显示了会党反侵略斗争的积极性。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正是两广一带天地会空前规模的斗争，为金田起义创造了条件；天地会分子的大批加入，又壮大了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从广西向南京进军过程中，各地会党起而响应和支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两广天地会，上海小刀会，闽浙小刀会、红钱会、金钱会、莲蓬党的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支援了太平天国巩固政权扩大战果的斗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自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间，农民起义转入了低潮时期，但秘密会党的反抗斗争仍连绵不断。这一时期会党的斗争，大量表现为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哥老会在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他们惊恐万状。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国务院报告说，“恐惧笼罩着整个中国”，“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①。此外，如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时，三合会在香港船坞的大罢工，天地会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斗争，1895年至1900年红胡子在东北地区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也都显示了秘密会党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的推动和激励，才出现1900年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在斗争中更显示了它的巨大力量。它一方面在各地不断带领广大群众起来进行抗捐抗税、抗租抗粮和抗暴斗争（辛亥革命前十年内，这种斗争达千次以上），另一方面还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通过这些斗争，造成了全国性革命高潮形势。最后，它在武昌起义、各省独立，以及最后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也起了巨大作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会党的消极作用愈益明显，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会党采取了正确方针政策，使许多地区的会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仍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会党在近代史上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它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组织动员和不断发动他们起来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人民群众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广大农民更是散居四方，犹如一盘散沙。在这样的境况下，农民要起来反抗，就得靠秘密结社来动员和集结力量。秘密会党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首先，因为它的基本成员大多是刚从农村流散出来的破产劳动者、游

^① 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600~601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民。他们一方面与广大农民群众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农民还有相同的利益和要求，特别是他们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的主张，深受农民群众欢迎；另一方面，他们已失去了土地和家族的束缚，并从一般农民对权力者无条件服从、卑屈阿谀等道德规范的桎梏下摆脱出来，比农民更自由地参加运动。所以，一旦阶级矛盾激化，社会上出现风吹草动时，他们就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充当联络人和谣言的传布者。由于他们奔走江湖，川流四方，因此，联系的群众，传布的口号，散发的传单，就远远超出一村一乡的范围。他们常常在短时间内就能动员起成千上万的群众。其次，农民走向公开的起义，不仅需要组织媒介，还需要斗争的经验，指挥的才干，以及武器装备等。秘密会党平时无视政府权威，从事走私、掠夺和各类匪盗活动，积累了组织动员、武装进攻和逃脱搜捕等多方面的经验，这就成为他们组织农民进行公开起义的重要条件。因此，我们在近代的历次农民起义中，经常会看到秘密会党充当组织发动者，就不足为怪了。

（三）会党分子在群众性的反抗运动中，斗争勇敢，经常起冲锋带头作用。这不但在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中是如此，即使在一时一地的抗租抗税、攻击教堂的斗争中，也经常有会党成员起带头作用。这种敢于斗争的表现，是会党成员本身的阶级意识决定的。会党骨干大多是无家产妻室的流浪汉，他们铤而走险无后顾之忧，特别是那些久历戎行的散兵游勇，更是“骁捷善斗，凶悍异常”，在斗争中能起冲锋陷阵的作用。

（四）会党还能起掩蔽和延续农民起义力量的作用。每当农民起义特别是大规模农民起义遭受失败之后，农民常常用秘密结社的方式，来巧妙地掩蔽起义力量，使其免于灭顶之灾。如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拜上帝会组织已不能存在，太平军的许多战士就转入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里，隐蔽起来，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就有许多成员转入哥老会等组织，积极投入辛亥革命时期的群众反抗斗争。

总之，会党在整个近代史上，是作为一股巨大的“反社会势力”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反叛力量而存在着。它在各个时期都参加了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会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团体，它存在许多严重的弱点，在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也起过严重的消极破坏



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盲目的破坏主义。由于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这部分人群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他们脱离生产，没有正当的谋生职业，只得靠从事土匪、流氓等活动为生。这种放荡的生活，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格，即既勇于斗争，但又有严重的盲目破坏性。这种盲目的破坏主义，在平时，主要是不分良莠，“到处打家劫舍”^①，嗜利忘义，“图奸淫掳掠”^②；在战时，则“焚烧村庄，杀戮男女”，“肆行无忌，残害人民”，“图逞一日之豪强”^③。有时，甚至发展到同类相残，互为仇敌，“大摆战场，杀得尸横遍野”^④。这种破坏性，到民国以后，就更为明显，像上海等城市里的青红帮，完全成了残害人民的黑帮。

（二）严重的分散主义。由于会党的组织分散，山堂林立，不相节制，因此，在历次斗争中，都不能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就很容易被统治阶级各个击破，被镇压下去。如太平天国时期，南方会党的斗争虽然如火如荼，声势极大，参加起义的大小部队有数百支，但始终未能联合起来成为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义和团运动中，也是派系林立，没有统一指挥。南方的会党，各自为政，没有起来支援。辛亥革命期间，各地会党起义也是在分散状态下进行的，所以都被反动势力很轻易地镇压下去。

（三）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易被反动势力收买利用。由于会党本身是落后的组织，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所以他们的行动有很大的投机性，常常被地主豪绅、外国势力、军阀势力所愚弄和利用。最常见的是，会党在农村被地主豪绅用以充当地域、宗族之间进行世仇械斗的工具。在农民起义斗争形势不利时，他们很容易接受统治者的招安，转而镇压农民。如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天地会头目张嘉祥被清廷招安以后，就成为太平军的一个劲敌。又如辛亥革命时期的红帮头目徐宝山，他先后接受了刘坤一和袁世凯的招抚，充当镇压革命的帮凶。到了大革命时期，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就成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鹰犬。

会党在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反映了游民阶层的社

① 《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84页。

② 陈天华：《警世钟》，见《辛亥革命》（二），141页。

③ 杨秀清：《天情道理书》。

④ 《江湖汉留宗旨》。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会特性。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1925 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①。1939 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性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②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仅精辟分析了近代游民阶层及其秘密会党的组织性质和历史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利用和改造会党确定了正确的方针。

六、会党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关于会党史的分期

讨论会党史的分期，首先应该明确秘密会党在中国大量出现，是有清以来中国社会形态急剧变化的反映，因此，划分会党史的分期，就应该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的状况联系起来。其次，还必须看到会党自身发展的具体规律和特点。按照天地会、哥老会这个系统的秘密会党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以为可以划分为七个时期。

（一）第一时期（1761—1795）

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 年），这是天地

^① 《毛泽东选集》，2 版，第 1 卷，8～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毛泽东选集》，2 版，第 2 卷，645～64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会的初创时期。根据清代的档案资料记载，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县的洪二和尚万提喜（俗名郑开）首创。天地会成立以后，即在闽粤、闽浙的边界地区迅速传播。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天地会在漳浦县首次发动了数百人规模的卢茂举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福建平和县人严烟将天地会传入台湾。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就爆发了天地会组织发动的林爽文起义。这次起义，标志着天地会的反抗斗争走向第一个高峰。

在这一时期内，应该特别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天地会在福建漳州创立，并得到迅速传播，这绝不是偶然的。从社会背景方面来看，是康熙、雍正以来封建剥削加重，土地兼并加剧，人口恶性增长，造成大量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的结果。适应这些破产劳动者人群的生活互助需要，才出现天地会组织。把天地会说成是明朝遗民的抗清组织，缺乏有力的证据。从组织形式方面来看，天地会也是在这一带原有的一些秘密结社（如父母会、小刀会、铁尺会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地会只是汇集了这些组织的特点，以新的号召充实了新的内容而建立起来的。最明显的是它采纳了以往秘密会党的基本结拜方式，但又独创了“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烟吃茶，俱用三指，以及木立斗世等暗号”。这种“三指诀”，是由洪二和尚首创，后来就成为会内世代相传的特有暗号；“五点二十一”、“三八廿一”，则暗喻洪门，也是天地会特有的象征。第二，林爽文起义，在天地会的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是天地会成立以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它动员了数十万群众，斗争历时一年有余，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正是经过这次起义，清政府才真正认识到天地会的力量和“危害”，严密查拿，期以根绝，并在《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了惩办天地会案的律例。这就给后来天地会的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第二时期（1796—1840）

从嘉庆元年（1796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这是天地会广泛传播的时期。这时，中国封建社会已完全进入衰败阶段，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秘密结社在民间飞速发展。天地会在这一时期已从福建、台湾一带传至两广、浙赣、两湖、云贵等广大地区，并且传到了南洋。由于林爽文起义之后清政府对天地会实行严厉镇压，“天

地会名目犯禁”，他们就改变名目进行活动。这一时期出现了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百子会、边钱会等数十种名目。从这些组织的结拜方式和活动内容看，它们都是从天地会演变而来的。这一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可以证实，许多天地会分子纠伙结会，都因天地会受清廷明禁，不敢犯禁，才不得不改变名目进行活动。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天地会的广泛传播，社会的动荡不安，天地会发动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约有数百起举事。但这些斗争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只有数百人或数千人的规模，大的也不过万余人。而且，每次举事爆发，即被迅速镇压下去。因此，这一时期的天地会起义，没以发展成像川、楚、豫、陕、甘五省白莲教起义那样大的规模。

（三）第三时期（1840—1874）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同治末年（1874年）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相继失败，这是会党起义的高涨时期。这一时期，会党发展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会党在中国南方各省广泛蔓延，山堂林立，无处不有，起义不断发生。这时，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大批破产劳动者流离失所，投奔秘密会党。广东“无时无匪拜会”（曾望彦奏）；广西亦“无时无之，无地无之”（严正基奏）；湖南会匪则“结党成群，啸聚山谷”（曾国藩奏）。据统计，这一时期的会党起义有千余次。

第二，这一时期的会党起义，主要围绕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酝酿发展而起伏变化。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南方会党的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为太平天国起义做了掩护，准备了条件，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经验。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各地会党多起而响应配合。有的地区会党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如上海、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起义，广东的天地会“红巾”起义。有的地区的会党在人力物力方面给太平天国以很大的支援，如太平军在广西，以及进军湖南、湖北的过程中，大批会党群众加入太平军，迅速壮大了太平军的队伍。这一阶段的会党起义，规模最大的是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红巾”起义（或称“洪兵”起义）。这次起义于1854年首先在广东爆发，然后发展到广西大部地区，以及湖南、江西南部 and 贵州东部。起义军建立了大成国和其他一些农民政权。



大成国从 1855 年秋建立，到 1861 年失败，达七年之久。其余的起义队伍到 1864 年才失败，坚持十一年之久，参加的群众在百万之上。这是天地会史上动员群众最多、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起义。他们的斗争矛头，不仅指向清朝统治者，同时也指向外国侵略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义高潮中，有许多地方的会党，虽然没有直接与太平军取得联系，但在太平军胜利进军的影响下，也纷纷起来响应。例如，浙江宁波南乡姜毛山地方的会党，他们得知太平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以后，便聚众“抢聚粮食”，以待太平军的到来。^①类似的情况，各地还有不少。这反映出，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高涨，会党运动也出现了高潮。太平天国失败后，拜上帝会虽已销声匿迹，但各地会党仍在坚持斗争。因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广大贫苦农民仍然没有摆脱苦难和贫困，因此，各地的会党继续在集结力量，进行斗争。例如，广西许多地区的农民，原先追随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们就大批“转红”，加入天地会，继续坚持斗争，以致出现“三十里内转洪蓄发者至九十六村”，“五十余村皆长发转红”^②的局面。甚至太平军的余部也大批转入天地会。

第三，这一时期，会党与教门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融合与渗透。一方面，天地会在闽粤一带，与原有的白莲教、斋教互相渗透，出现了教、会相合的阳盘教、阴盘教等组织；另一方面，由于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白莲教势力会合，就发生教门与会党大规模的互相渗透和融合。这种现象，以湖南最为突出。据清政府方面的报告，太平天国起义高潮时期，湖南“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③；“会匪名目不一，有添弟、串子、红教、黄教、白教、道教、佛教及青龙、白虎等会”^④；此外，还有“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结党成群，啸聚山谷”^⑤。这些教门和会党，多参与、响应和支援太平天国的斗争，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高潮中，教门与会党之间便广泛发生融合，出现了许多教门具备会党特点和会党带有教门色彩的组织。有的会党组织设众多头目，“半自粤余土匪出身，半由白莲教匪出身”^⑥。

① 参见段光清：《镜湖自编年谱》，83~85页。

② 光绪《玉林州志》卷18。

③ 《大清文宗圣训》卷90。

④ 《刘中丞奏稿》卷2。

⑤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⑥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30。



这是近代会党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四）第四时期（1875—1894）

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哥老会势力在长江流域崛起，会党投入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斗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已从东南沿海地区深入到中国内地，尤其是长江流域，侵略者在长江沿线先后开辟了7个通商口岸，6个寄航港，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它们的轮船航行于长江流域内河，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到长江上下游的每个角落，并从农村掠走大量原料。这就造成广大农村经济破产，旧式运输工人、手工工人破产失业。加之同治以来，军营大批被裁撤，不下百万散兵游勇流落各地。于是，以散兵游勇、江湖游民为骨干的哥老会势力就在这一带迅速崛起，天地会势力则相应居于较次地位。这时，由于外国传教士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获得内地传教、置产的特权，教会侵略势力就大批进入中国内地。教会的侵略，不断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这一时期，各地会党多投入了群众性的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他们和广大群众一道，把反侵略的仇恨集中到教会身上。从1890年长江上游四川大足县余栋臣连续发动的哥老会反教会的起义，到1891年长江中下游六省数十个城镇连成一气的反教会斗争，汇成了一片反侵略斗争的火海，标志着这一时期会党反侵略斗争走向一个高潮。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哥老会“为打日本起见”，还到关外去发展组织。甲午战争后，长江南北秘密结社的反侵略反教会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如鲁西南的大刀会发展至数十万人，声言“非毁尽教堂不散”^①，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浙江的伏虎会也屡闹教案。其他如贵州、四川、山西、河南的哥老会、红灯教、在理教、大刀会等，都“借仇教煽乱”，最后汇成以义和团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一时期，哥老会已由川黔山区偏僻农村，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各大城镇和交通码头，散兵游勇、江湖游民充当了哥老会的主要头目，这是会党发展史上又一个显著的变化。

（五）第五时期（1894—1911）

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

^① 《刘坤一遗集》，14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会起，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这是会党与资产阶级各派势力发生关系，会党运动发生新转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会党势力特别是哥老会的势力已遍布全国各地，所谓“伏莽遍地，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①，就是实际情况的写照。这时，资产阶级各派力量都想利用会党，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以后，就开始从事联合会党的工作。从此，会党即从单纯的自发斗争状态，转向与先进阶级力量发生联系。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转化为保皇派，他们在海外想通过利用和争夺会党力量，进行保皇运动，但没有成功。以唐才常为首的一批维新派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很快转向革命，1900年他们利用长江哥老会的力量，建立起“自立军”，发动了反清的自立军起义，也很快失败。真正与会党发生密切关系，比较深入进行会党工作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重视联合会党，是想寻找依靠力量，企图通过会党实行与农民的联盟。会党这时也感到已不能“独守故态”，渴望接受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改变自发斗争的局面。革命派在联合会党方面做得比较有成绩的是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陶成章及秋瑾的浙江光复会。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联合会党成为它的一项重要政策，从此，会党工作便全面展开。由于革命派的努力，由于会党自身力量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各地会党的起义，以及革命党人利用会党搞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就为辛亥革命造成了极有利的形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地会党起而响应，在各省独立、建立革命政权过程中，会党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它不能有效地联合会党和改造会党，同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夺取政权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满足会党和农民的基本要求。所以辛亥革命后，会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很快就走向破裂。

（六）第六时期（1912—1921）

从清王朝被推翻、民国建立，到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会党与资产阶级关系破裂的时期。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说，武昌起义以后，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天下大定，不再需要依靠会党和广大工农群众了，于是就把

^① 《辛亥革命》（六），155页。

他们一脚踢开，这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对待会党的总态度。虽然各地的革命党人对待会党的具体措施有所不同，但从总的趋势看，多是从利用、安抚到镇压的过程。

从会党方面来说，他们在武昌起义胜利、民国成立后，也错误地认为，起义成功，万事大吉，可以随心所欲了。于是飞扬跋扈、破坏秩序的事时有发生，这对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来说，是极不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以此为借口，纷纷进行镇压。这一方面反映出会党本身的落后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无能，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没有也不可能改造会党的这些弱点。

这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弃了会党和工农群众，在根本利益上完全没有满足会党和工农群众的要求，因此，在后来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时，就得不到会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充当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了。

这一时期，会党的斗争又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但由于会党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尽管有些地区的会党组织遭受镇压破坏，但总的趋势是，会党势力还在发展。这一时期，会党在维护劳动群众的经济利益、开展某些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中，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消极作用愈来愈大，特别是会党进入大城市以后，被帝国主义者、军阀势力所利用，逐渐转化为黑社会组织。在农村，地主豪绅和地方军阀也纷纷对其进行拉拢利用。

（七）第七时期（1921—1949）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期是会党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生关系的时期，也是会党史上又一个重大转折时期。

在这一时期，会党的势力仍大量存在。它们的组织，不仅拥有大量的劳苦群众，而且还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在有些地区，会党控制了整个政治经济局面。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会党，采取什么政策，就成为一个关乎能否顺利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争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达到革命胜利的重大策略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四个革命时期，每个时期的斗争特点不同，同时，由于地区的不同（如苏区与白区），城市和农村的不同，采取的策略也各异。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1927），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着大力开展工农运动这个中心进行会党工作。在城市，主要排除帮会的障碍，将中国工人从旧式的行会、帮会，组织到现代的工会中来，并开展工会运动，发动罢工斗争等。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时，也十分注意各地的秘密社会工作。如南方广东农民运动中的三点会工作，两湖农民运动中的哥老会工作，和北方山东、河南一带的红枪会、长枪会的工作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中国共产党对秘密会党的工作，是分苏区和白区两方面进行的。在苏区的帮会工作中，摸索和创造了不少经验，确立了“孤立其首领，夺取其群众，瓦解其组织”的方针，并有效地争取改造了一些“绿林”部队，使其变为革命的武装。在白区，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帮会工作成绩甚少。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发布了《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农村以及各杂牌军和国民党的军队里，广泛开展对帮会工作，对各地的红枪会、大刀会、哥老会以至上海的青红帮都进行争取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开展斗争，推翻蒋家王朝。这一时期，主要是进行紧张的武装斗争。围绕着这个中心，中国共产党通过帮会的关系，对国统区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争取瓦解工作。

在整个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会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一切革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能暂时利用它，但不能有效地团结教育改造它。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能对它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区别对待，争取和改造其大多数，使之转化为革命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农群众生活问题的基本解决，随着破产劳动者失业队伍的解决，会党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会党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一、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各家之说

最早写出关于天地会的研究专著的，要算荷兰人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他曾任荷属东印度政府的汉文翻译官。1863年春，在苏门答腊（Sumatra）的巴东（Padang）地方，荷兰殖民政府从一个华侨家中搜出一批天地会的书籍。这些书籍包括天地会的会章、誓词、入会须知、旗帜说明、秘密符号等等。施列格根据这些资料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写了《天地会研究》（*Thian Ti Hwui: 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一书，1866年出版。^①作者对于天地会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他从殖民者的立场出发，依据人种一元论、文化西来说，将天地会和西洋的共济会（Free Mason，或译规矩会）做了种种比附，把天地会看做共济会向东方发展的结果。说什么共济会“到东方去，找到中国容易生长的地方”^②。又说：“雍正谕旨所称‘闻香教’、‘白莲教’，等于一般人所指的天地会或洪门会。”^③英国殖民政府为控制南洋华侨中的天地会，甚至派人加入会党，调查内幕。他们所写专书中，材料比较丰富的要算活特（J. S. M. Ward）和斯特林（W. S. Stirling）合著的《洪门》（*The Hung Society*），1926年出版。这本书根据天地会的秘密文书，说天地会创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二十五

① 天地会很早即由闽粤传入南洋，南洋一带的华侨，大多数入天地会，在今马来西亚的沙撈越（Sarawak）及霹雳，新加坡，时常发生会党械斗和反抗政府的活动。据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记载，清嘉庆四年（1799年），英属槟榔屿政府，已有天地会举事的报告。英、荷殖民政府，为了统治华侨，遂注意研究天地会。施列格研究天地会是直接为这种目的服务的。该书中文译本，由薛澄清翻译，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天地会研究》。

② [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导言”。

③ [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第一编，《天地会的历史》。



日。到了清末，日本人平山周通过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关系，几度到中国调查会党情况，特别是调查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哥老会的情况，写成《中国秘密社会史》，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该书对天地会的起源，只是采用了天地会内流传的说法，没有加以考订。

中国人较早系统地研究天地会的当推陶成章。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利用会党力量发动革命，他在联系会党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著有《教会源流考》一文。陶成章认为天地会起源于明亡以后。他说：“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① 这种说法，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例如，章炳麟曾说：“迄明之亡，子遗黄发，谋所以光复者。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应，熊开源、汝应元皆以明室遗臣，祝发入道，故天地会自福建来。”^② 孙中山先生也曾多次谈到会党的问题，他说：“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③ 这种说法对史学界影响很大，在史学界中凡是谈到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著作，大多采用此说。^④ 1929年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一书出版，作者用专章叙述了天地会的起源及其在南洋的活动。他一面批判了那些只是根据天地会传说故事说明天地会起源的研究的错误，一面却穿凿附会，把天地会传说中的少林寺僧，比附

①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② 章炳麟：《〈中国秘密社会史〉序》，见〔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170~1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中也有相同说法，见《孙中山选集》下卷，616~617页。

④ 参见罗尔纲：《明亡后汉族的自觉和秘密结社》，载天津《益世报》，1935-04-30，史学版；李子峰编著：《海底》，1940；徐珂：《清稗类钞》，会党类；戴魏光编著：《洪门史》，1947；朱琳编：《洪门志》，1947；刘师亮：《汉留全史》，1938；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1940；卫大法师：《帮》，1946；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有些著作，多采用此说，提法大同小异，故此处引文从略。

为郑芝龙一系及其部曲。他认为火焚少林寺，是指郑芝龙一家大小在北京被杀之惨史，万云龙即郑成功，陈近南即陈永华，等等。他断言天地会起源，“其地点在台湾，时代则康熙十三年，人物主持者则陈永华与郑成功之旧部也”^①。1933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天地会文件抄本一册，1936年发现守先阁天地会文件一册。经罗尔纲同志研究，认为天地会相传故事中既有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之说，康熙朝《大清律例》中又有处罚“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条文，可以证明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年间。^②此外，萧一山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抄录了一批天地会文件的抄本^③，编成《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一书，1935年出版。编者认为这批材料是较早的抄本，其中有天地会创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之说^④，罗尔纲、温雄飞等主张天地会创于康熙甲寅年之说，是根据洪门传说中较晚的记载，康熙甲寅年是传抄上的错误，因此萧一山认为天地会创于雍正甲寅年之说可信。^⑤1948年王重民在《子曰丛刊》第五辑发表《天地会始于明季说》一文，作者的唯一根据，是潘季驯在兵部奏疏内提到，万历十年（1582年）在江苏捕获散发符票的“妖党”，据拿获的汪元洪和尚供称，伊兄弟十人，北方五人，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名曰北票；南方有五人，以金木水火土为号，名曰南票，约期各于南京、北京举兵被获。王重民认为：“‘洪门’之义，或即纪念元洪，入清而演为朱洪竹、朱洪英。……元洪兄弟十人，编为南北两票，均有作五祖之资格，而异姓兄弟，以票为号，尤与洪门组织相合。”

1949年以后，史学界发表了不少研究天地会的文章，但是对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也没有提出充实的论据。

①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第14章，《天地会之来南洋及其骚扰》第一节《天地会之起源》，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

② 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守先阁天地会文件及罗尔纲的有关论文，均见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

③ 这批文件是清末粤人手抄本，由英国波尔夫人（Mrs. Ball）在香港、广州购得，光绪七年（1881年）大英博物馆收存。

④ 编者所抄文件没有标明年代，只是1881年收存于大英博物馆，据此并不能断言这批文件比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年代更早。据我们所知，嘉庆十六年（1816年）五月七日，广西巡抚成林咨送的东兰州天地会首领姚大羔的会簿内亦有康熙甲寅年之说，就目前所见，此件要算天地会传说故事抄本中年代最早的一本（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可见萧一山的说法未必可靠。

⑤ 参见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见《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100 多年中，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有不少所谓著作是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进行别有用心调查。至于比较认真进行研究的一些学者的著作，或是完全没有摆脱天地会的神话传说的影响，或是根据片断的材料做出一些推测。因此，要解决问题，就需要从努力发掘可靠的资料入手，并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

二、天地会起源新证

在清朝的官书里，有关天地会活动的明确记载，是从林爽文起义开始的。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起义。这次起义的风暴席卷台湾全岛，历时 17 个月（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之久，动员群众达数十万人。清政府先后调动了福建、广东、广西、浙江、贵州、四川、湖南 7 省兵力 10 余万人，花军费达 1 000 万两白银之多，才把起义镇压下去。清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对天地会的组织密切注意，极力追根究源，期以根绝。林爽文起义以后，在《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了禁止结拜天地会的条文。过去许地山曾认为，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的第一次活动”^①，但他也主张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 年），并断言天地会为明朝遗民所组织。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就文献的确切记载而论，天地会的活动从林爽文起义开始之说，似乎是可信的；但是如果说天地会果真是康熙十三年（1674 年）创立的话，那么从其创立到林爽文起义，相距 100 多年的时间，而此间没有活动，这是很难想象的。反之，如果林爽文起义之前天地会已有活动，那么，天地会的名目长期不被清朝统治者发觉，似乎也不大可能。看来天地会的创始年代，距林爽文的起义不会太远；但是作为由天地会发动的林爽文起义，规模如此之大，绝非出于偶然，作为天地会组织本身，也必然有个酝酿、创立和发展的过程。根据以上的假设和判断，我着手从林爽文起义研究天地会的问题，我也正是从记载林爽文起义的文献材料中，找到了天地会起源的线索。

^① 许地山：《〈天地会研究〉序》。

为了便于研究和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将清政府在镇压林爽文起义期间，追查天地会根源的过程，简要地叙述一下，着重举出说明天地会起源的材料。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林爽文在台湾彰化县大里杙村聚众起义，十一月二十七日攻陷彰化县城，转而攻打诸罗（今嘉义县）、淡水。同年十二月，清军实行反扑，围攻彰化，十二月十二日，俘获起义军首领杨咏^①、杨轩、陈高等数人。据杨咏供：“天地会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人起的。洪二房和尚住后溪凤花亭，不知是何府何县地方。”^② 清朝政府从这里第一次获得了追查天地会根由的线索。尽管在杨咏的供词里，并不能清楚地说明天地会的创始人物、时间、地点，但无论如何，对清政府来说，这是个重要根据。清廷得报，便立即传谕两广总督追查，据广东方面奏报，在嘉应州海阳县，“访有洪和尚及朱姓等”^③，经研讯，此洪、朱两姓，既非天地会内之人，亦“无不法字迹”。查凤花亭也无实在下落。但“宁可错捕（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人”，是一切统治阶级镇压人民反抗的逻辑，清朝统治者虽明知此洪、朱两姓并非天地会内之人，结果还是把他们发遣伊犁为奴。^④ 事情到此并未了结。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一月二十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广东饶平县拿获天地会会犯许阿协、赖阿恩、林阿俊、涂阿番四人，供出天地会内有“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行道合和同”诗句等情节。据供“木立斗世”为隐语，“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因天地会系起源于乾隆三十二年，故以世字暗藏”^⑤。同年二月，孙士毅续报，继获天地会会犯林功裕，供出赖阿德、洪李桃、朱洪德等七名，“俱系闽省天地会内人犯”^⑥。这时，清政府根据种种情节判断，认为闽省为天地会“之渊藪无疑”，“朱洪德、洪李桃等，与闽省从前究出、谕

① 杨咏（杨振国）原籍漳浦县，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充当漳化县快役，与林爽文相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林爽文起义军攻陷彰化，二十九日杨咏加入起义军，封为副元帅。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上谕。

③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九日上谕。洪姓即洪朗、洪科两僧，朱姓即僧人朱立贵。

④ 参见《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谕。

⑤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亦见《许阿协供词》。

⑥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11，5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晒蓝本。



全粤省查拿之后溪凤花亭洪二和尚及朱姓形迹相同，或即系洪、朱两犯，亦未可定”^①。三月十五日上谕闽省严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漳浦县有天地会起事，焚抢盐场、衙署、税馆，戕杀兵民。先后拿获张妈求等144名。据张妈求供：“天地会流传已久，漳州各县均有结会之事，小的张妈求父亲叔子在日，原是会内之人。”^②

林爽文起义已历时一年有余，清政府无论从台湾岛或者从闽省内地，或者从粤省境内，拿获天地会成员已不计其数，但还是没有查清天地会的根源。这时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的军队在不断增加，对起义军已进入步步围攻的阶段，对天地会的查拿追究也更加紧。正在此时，福康安奏报，在台湾拿获首先入台传布天地会的严烟^③。据严烟供：

天地会起于川省，年已久远，后来有十三人潜赴各处起会，其在广东起会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实在何处不能知道；

.....

有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从广东惠州府至漳州府云霄地方传会，住在张姓绰号破脸狗家里。其取烟吃茶，俱用三指，及木立斗世等暗号。^④

据严烟说，他自己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由陈彪在庄上行医，劝入天地会的，有关天地会的根由、暗号等，都是陈彪告诉他的。据陈彪告诉严烟，天地会年代久远，是“从前有个朱姓同起的”。

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话：“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是天地会的根由。至李姓、朱姓起会，传闻说在四川，万和尚传说在广东……他亦不能记清年分，指定地方。

又供：

①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上谕。

②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③ 严烟（严若海），福建平和县人，卖布为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由陈彪劝入天地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渡台传布天地会，林爽文等系由严烟“纠集”入会，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被捕送解北京处死。

④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亦见《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四日上谕及《严烟供词》。



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总称。至于二房上加增红字及用洪字作暗号，陈彪说都是朱、李两家传下的，实未告我别的缘故，及作何讲解。^①

严烟供出的情况，尽管有不实之处，但是作为天地会的一个要犯的供词，清朝政府是十分重视的。在严烟的供词里，至少提供了两条追查的线索：其一，天地会起于四川，而且由朱、李二姓所创；其二，严烟由陈彪劝入天地会，并被告知天地会的根由、暗号等，陈彪必实有其人，此外陈彪并有同伙陈丕、张破脸狗等人，都是重要线索。尽管福康安等说，从前在四川“并未闻该处有天地会名目”，但严烟既有此供，且指出天地会系李姓、朱姓所传，当然他们认为“未可因年分久远，且无实在下落，遂置之不闻”^②。所以乾隆一面传谕闽粤方面继续追究，一面传谕川省“一体严密查办，以绝根株”。此后，在川省方面，经多方查访，四川总督李世杰多次奏报，既无天地会名目，亦无李姓、朱姓传会之人；而在闽粤方面终于查清了天地会的根由。

首先，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获天地会匪犯张狗即张破脸狗，讯据供称，四十六年夏间，有广东人赵明德、陈丕、陈栋三人，到该犯家内赌博，熟识赵明德等，劝令入天地会，该犯听从”^③等情。

接着广东巡抚图萨布奏报，拿获陈丕，“籍隶福建漳浦县，三十三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从提喜和尚为师”^④。陈丕并供出：“提喜籍隶漳浦县，住在高溪乡观音亭。又，同会之陈彪，住在平和县云寮乡，赵明德住在漳浦县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⑤

继而，福康安、魁伦等报，拿获陈彪及首先传会僧人提喜之子行义。据行义供称：“伊师父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为洪二和尚，已于四十四年身故。”^⑥“伊父在日，曾教过三指诀，原为诓骗银钱，并无别故。”^⑦陈彪则坚供，“实不知洪二和尚传自何人”^⑧。

从杨咏供出天地会是洪二和尚所创起，直至拿获洪二和尚（万

①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严烟供词》。

②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上谕。

③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上谕。

④⑤ 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日。

⑥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

⑦⑧ 《上谕档》，乾隆五十四年一月。



提喜)之子行义止,其间曾有许多人供认天地会为洪二和尚(万提喜)所创,只有到这时,清朝统治者才确认:“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洪二和尚,提喜为此案传教正犯已无疑义。……从前严烟所供,起自川省,显系狡展。”^①但是清政府对于万提喜是否确已死去,还存怀疑,在乾隆的上谕里指出:“即或实系病故,亦须得有实据,不可因行义有业已病故之供,遂不行深究,以致要犯得以漏网。”^②所以,最后经严刑究讯行义,指出其父葬地,“刨验骨殖属实”^③,事情才算了结。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朝政府对于天地会追根究源的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几经辗转,才查出了天地会的一些根由。这一方面是因为,天地会从创始距林爽文起义,年代较久。天地会本身是下层社会的秘密组织,在其内部规定,如“漏泄根机,含血喷天,全(全)家灭亡”^④,“死作刀下之鬼”^⑤,等等,这些规定,对于保守组织的秘密,不能不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因而也不能不给清朝统治者追查天地会根源,带来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天地会许多会首,在纠伙入会时,一般是不愿一下真实地说出天地会的根由的,我们从有关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往往讹传姓名、地点,以致造成以讹传讹。所以要从天地会一般成员中了解天地会的根由,是十分困难的。

从上述,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灭绝天地会根株”的目的,确是煞费苦心,追根到底。但他们所追究到的这些材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天地会的起源,倒也提供了重要的根据。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出比过去研究进一步的结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漳浦县;天地会由洪二和尚,名万提喜,俗名郑开首创。“洪门”之名,以及洪门流传诗歌中“洪水漂流(或曰泛滥,或曰横流)于天下”,“洪水结拜皆一同”^⑥,“滴血盟心本姓洪”,“洪亭脚下人众多,纷纷饮水认姓洪”,“洪家子弟”^⑦,等等,可能皆由此来。万提喜取洪二和尚之名,是否有所借托,尚无可靠材料说明。我们从有关档案材料里看到,在后来,特别是在嘉庆年间,

①② 《上谕档》，乾隆五十四年一月。

③ 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嘉庆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片。

④ 《天地会结盟誓词》。林爽文起义时期，清政府从某天地会会犯身上搜出，原件藏于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⑤ 《赖阿恩、林阿俊供词》，乾隆五十二年。

⑥ 《林功裕供词》，乾隆五十二年。

⑦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天地会在举行结拜仪式时，都要“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①。这一事实也可以说明，万提喜既是天地会的创始者，也是天地会内的最早权威。天地会内相传的万大哥是实有其人的。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还不能确定天地会创立的具体年代。张妈求供词中曾说到，他父亲叔子辈都是天地会内之人，漳州各县均有结会之事，这只能说明天地会来历已久。陈丕说他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已与陈彪等拜万提喜为师入天地会，这也不能说明天地会创于何年的问题。许阿协对“木立斗世”的解释比较可靠，但他把“世”字解释为代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隐喻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天地会诗歌中“木立斗世”之类的隐语，类似古代“推背图”^②内的隐语。如果根据“推背图”的办法，那么“木立斗世”的世字解释为隐喻乾隆三十二年清朝灭亡更为恰当。^③为什么许阿协却说“世”字隐喻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呢？看来这大概是因为他在清朝统治者面前，不敢直言乾隆三十二年清朝灭亡，或者地方官吏上奏时故意删改供词内容的缘故吧！

天地会究竟创于何年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嘉庆初年汪志伊^④的

^① 《朱批奏折》，嘉庆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陈预奏。关于天地会结拜时供万提喜牌位的记载，在有关档案材料中是屡见不鲜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引用了其中的一件。

^② “推背图”相传为唐贞观中，李淳风与袁天纲共为图讖，每图附七言诗一首，预言历代兴亡变乱之事，至六十图，袁推李背止之，故名“推背图”，书中诗句有隐语，大都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后人常用来预言朝代的兴亡，在许多农民起义中，也常常采用。

^③ “木立斗世”隐语，常见于天地会之腰凭票布，在许多著作里对它有不同的解释，[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56页，“木为十八，即顺治在位年数。立为六一，即康熙在位年数。斗为二十，即雍正年数。世为二卅，即乾隆在位年数，言清至乾隆末年必灭亡也”。按：平山周对斗、世二字的解释误，疑为天地会内错传所致。[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第72页，对“木立斗世天下知”原注如下：“刘伯温有讖语曰，‘一甲士，一短衣，二人死在苍埔上，木立斗世天下知’。按甲士指清兵，短衣指英兵，至‘木立斗世天下知’一句，解释如下：‘木’字由‘十’与‘八’组成，适合顺治在位年数；‘立’字由‘六’与‘一’组成，合康熙在位年数；‘斗’字由‘十’与‘二’组成，适合雍正年数；‘世’字由‘三’与‘川’，以三十加三十等于六十，适合乾隆在位年数；天之数，依《易经》说，为二十又五，适为嘉庆在位年数；下即地，地之为数，据《易经》说，凡三十，适合道光在位年数；‘知’字意义尚不甚可解，或指咸丰在位年数也，清祚至此本应告绝，但幸运转佳，因太平天国之乱似已不能灭清，今后清室之崩溃，即可以事实明了‘知’字意义。”按：这种解释显然是后人的附会。其他著作中，尚有别种解释，此处不再列举。

^④ 汪志伊，号稼门，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举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江苏按察使，乾隆六十年（1795年）浙江布政使；嘉庆二年（1797年）福建巡抚，嘉庆十五年（1810年）升为闽浙总督，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故。（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列传）



《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里，找到了具体的答案。汪志伊在这个陈疏里明确指出：“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暗中主使，谋为不轨。”^①很清楚，汪氏在这里所说的天地会创立的地点、创始者等，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天地会创立的地点、人物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汪志伊还明确地指出了天地会创立的具体年代。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它的根据的。（一）汪志伊，嘉庆初年为福建巡抚，后任闽浙总督，他在福建十余年，历年剿捕天地会，经办会党案件计有数百起，对于天地会的情况是很了解的。而清朝政府对于天地会起源的追究，到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才彻底查清。汪志伊应该知道这个追查过程，并具体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因此他的陈疏中的说法，应该说是根据的。（二）据《清实录》等官书记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福建漳浦县已有天地会会首卢茂聚众数百人的起事。^②同年，台湾有黄教聚众起事。^③福建的汀州、闽县、古田地区，以及广东、浙江都发现有天地会的活动。^④天地会已传布于

^①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33。又，汪志伊在陈疏中关于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之说，罗尔纲同志在《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中曾提到过，但其未知汪氏有何根据，故未采用此说。见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89页。

^②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08，9~10页，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四月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漳浦县杜浔地方，有奸匪卢茂，编造诡名悖逆诗词，并分散花蓝号布，煽诱各村庄愚民，聚匪百余人，欲抢劫县城。”亦见《漳州府志》卷47，42页。此次起事很快被清政府发觉，立即遭到镇压，先后被捕200余人，主要成员均被捕获。但是天地会的名目并未被清政府发现。在清朝官书中也没有记载卢茂起事为天地会所发动，因而这次起事未引起史学界应有的重视。以往史学界由于对天地会起源的说法不一致，因而对天地会何时开始起事活动也就众说纷纭：或曰天地会很早开始活动，或曰由林爽文起义开始等等。我们根据《陈丕供词》、《张妈求供词》等材料，以及卢茂起事的特点，可以判明卢茂是天地会会首，此次起事为天地会所发动。据此，我们可以确知，天地会的起事活动，至晚始于乾隆三十三年。

^③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提督福建水师总兵吴必达等奏，黄教于乾隆三十二年“贫无聊赖，复纠夥沿山潜行偷窃。三十三年五月，经道府查访，饬县拘拿……未获。嗣访及黄教潜住大穆山，九月二十七日台湾道……带兵役入山缉捕，黄教闻风先遁……起意竖旗，招人图抢府城仓库。遂与伊弟黄芳招朱一德……于十月初一日同上凤山县之冈山聚集，黄教为大哥，朱一德为军师，余皆兄弟称呼，石意、石灶……十人自称大头目。”（见《史料旬刊》第14期）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鄂宁奏：“……其中夥犯内，有号为头目，同恶相济者，及在各地实系杀伤官兵者。”（见《史料旬刊》第15期）按：我们尚未见黄教起事有天地会名目的记载，但据内部情节判断，应该属于天地会的活动。

^④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18，永德奏，在浙江拿获福建民人李浩，背卖漳浦县逆犯卢茂结盟、安良二图。卷824，崔应阶奏：“盘获汀州民人傅元禧，搜出旗面印记，并妄诞逆词，并单内开有广东奸匪孙志贤等。……该犯等逆词，内多隐语。”卷832，据鄂宁奏，“古田县奸民萧日安，制卖布旗，聚匪惑众”。

闽、浙、粤等省广大地区，以及发生数百人规模的起事的事实，说明了天地会势力发展的程度。“漳州各县均有结会之事”^①，反映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天地会传布的地区已如此之广，势力已如此之大，这必定经历了一个相当时期的酝酿发展过程。由于清朝统治者严厉禁止人民结社，天地会就不得不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分散纠伙，辗转相传，必然是困难重重。由此不难判明，如果按照许阿协的说法，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仅仅过了一年，天地会就发展到那样的规模，是很难理解的；相反，如果按照汪志伊的说法，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经过六七年的时间，才发展到那样的规模，倒是不难理解的。

总之，根据目前得到的材料看，比较可靠的结论是：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倡。至于在此以前是否已存在天地会的名目，尚待证实，目前没有确据。

三、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

弄清了天地会的创立时间、地点和创始者的问题，这仅仅告诉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但是，作为清代的一个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它为什么首先产生于彼时彼地？它一经产生，为什么能得到那样广泛的发展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为了阐明这些问题，我们的探讨必须向前推进一步。

天地会为什么首先出现在福建漳州地区呢？众所周知，福建历来是以山多地少著称的，而漳州更是“山海环匝，四履交错”，“傍山多硗瘠，近海半沙卤”的地区。《漳州府志》载：“闽土田素称下下，而漳以海隅介居闽粤，依山陟阜，林麓荒焉，杂以海埂斥卤，溪流潦，决塞靡常，称平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②这样贫瘠的自然环境，在封建社会里是无法加以改造的，因此，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明末清初，经过激烈的抗清斗争，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人民逃亡和死亡的很多。据记载，顺治九年（1652年）“漳壬辰之乱，城中人民饿死七十余万，乡居者亦以疾疫耗隔，都里户丁额悬缺”^③。70余万这个数字可能有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②③} 《漳州府志》卷14，光绪刻本。



所夸大，但至少反映了当地人民死亡之多。康熙以后，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人丁有所增加。但是“生齿日多，而地不加广；户口日增，而财不加半”^①。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兼并在急剧地进行，封建政权对于农民的苛赋杂税也仍然在加重，统治者巧设名目，对人民实行种种榨取，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和破产。民间“典妻鬻子……辗转沟壑者，又不可数也。海波沸腾，军需孔棘，杂派纷多。甚有一两银额派五十余两者，一时田产始犹每亩田卖银四五钱，后乃白送与人，无敢承者，民于是弃业逃粮”^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清朝政府曾实行垦田措施，但是地方官“捏报如数垦，复限满征催，惨将无田无丁之屯米丁银，差押现在屯丁，照数摊赔，以致现丁势蹙潜逃，拘属监比。于是民间有‘屯丁苦逃，屯妇满牢’之谣。乃屯丁难以摊赔，辄复株累里民，如赵甲钱乙之屯户，无田可查，无丁可拘，则择里中赵姓、钱姓之乡愚，明知是民非军，不相干涉而滥拘严比。于是民间又有‘与屯同姓，官打绝命’之谣。蠹胥借此而操权受贿，虎差因之而执票噬人，鱼肉残黎，弊难言罄”^③。“土豪猾吏，相与为奸”，封建统治者将一切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于是人民“辄倾家不得已逃去”^④。

除了耕植为业的农民破产外，漳州沿海地区，还有大批靠晒盐为生的盐民，亦受到封建统治者、土豪奸商的种种剥削压迫，纷纷贫困破产。漳浦县知县陈汝咸曾详文叙述了盐民的境遇：

晒丁以海为田，穷日之力，唯盐丘是事，方丈之丘，而有旧额三分之课，新增又近三分加之。……丘埤如故，丘课日加，而又包改为引，盐归于商。穷日之力，晒其方丈之盐，拱手而授之商，不许存留颗粒。……乃商又无本现买，收丁之盐，以每石五分、七分计价卖完，而后给晒丁，候价无期，值丘课紧急，饥饿不起。……闽商凭藉势豪，素手而来，其所为本，不过挂旗号、纳盐引二项。至于盐本，百无二三。引一到手，即多方招无赖二三百人，人给工食，每月一两四钱、一两二钱不等，四路巡拦。凡晒盐之家，皆此辈坐守，颗粒不许留存，悉归商馆。乃盐到商馆，但出空收贱（钱），则每石五分、四分，贵亦只每石六七分至一钱不等。其卖之本县行盐地方，少则四五钱，多则八九钱。民苦贵盐，哑口吞声，不敢与较。而又于

①②③④ 《漳州府志》卷14。

引盐之外，尽收场盐，私卖外县商人，则又不止数倍，以故奸商之射利者，钻入于场；土棍之游手者，丛聚于商，彼此吮膏吸髓，尽浦之编民与晒丁，并其家口老幼之血肉而归之，岁不下二三万计。……今则力尽血枯，食者苦贵，晒者苦饥。春间沿海晒丁，情极无聊，构麻布于通衢，皆将毁丘废漏，尽弃其业。^①

陈汝咸只是站在封建政府的角度，揭露了奸商压榨盐民的某些情况。如果加上封建政府、土豪劣绅的压榨，晒民的贫困、破产的严重情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如上所述，可以肯定，从康熙到乾隆，漳州地区已存在着大量的以破产农民和破产盐民为主的破产劳动者。很明显，这部分人，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②。“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③这批人无家可归，无田可耕，无业可从。他们的出路究竟何在呢？他们究竟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对这个地区的破产者来说，他们当时主要的出路有三条：第一，迁渡台湾、南洋谋生；第二，铤而走险，入海为盗；第三，流浪异乡，江湖为业。

这些破产劳动者的生活无依无靠，他们生活的不安定性，迫使他们感到，单靠个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迫使他们感到，必须团聚在一起，互相扶持，甘苦与共。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天地会这样一种组织，就很自然地应运而生了。

我们在上面说明了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社会根源只是在漳州地区存在，或者只是这时才出现这种社会条件；也不能认为天地会出现以前，民间长期没有类似秘密结社的存在。事实上，在清代，顺治年间，民间已有结社拜盟的组织。民间结社的出现，当然与当时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有关，但从其根本来说，它是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的产物。这种民间结社，对统治者是个严重威胁，所以顺治初年刑律中就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改定：“凡歃血为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④有的同志企图以康熙朝刑律中已订立了禁止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条文，来和天地会的传统故事对证，借以证明天地会创于康熙年间的说法。实际上，禁

① 《漳州府志》卷15。

②③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8、9页。

④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209。



止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条文，在顺治朝的刑律中已经有了。到了康熙年间，据文献明确记载，在许多农民起义中，就有歃血结盟的组织。如康熙四十年（1701年），台湾的刘却起事。据记载，刘却“以拳自负，日与无赖恶少往来，插（歃）血为盟。久之，其党有谋不轨者，以为非却众莫从”。众推刘却为大哥，“冶铁为刀枪各械，约日举事，腊月七日，扬旗击鼓”^①，攻打兵营。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义，自称朱明后裔，众“奉一贵为主，焚表结盟……树红旗，书大元帅朱”^②。乾隆初年四川省有啮嚙，其内部亦实行结盟仪式。^③江西建昌府地区有关帝会，结盟歃血，焚表结拜。^④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有铁尺会，“横行乡曲，复造伪札散卖”^⑤。乾隆十九年（1754年），福建布政使德舒在《收缉技勇疏》中提到，闽省民间，“好学拳棒，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势……刊伪印，散伪札，妄悖猖狂，蛊惑人心，蹈叛逆之罪而弗悟”^⑥。此外，明末清初，在海盗中也有秘密结拜组织。^⑦这些组织的成员，一般以破产劳动者、游民为主。他们结拜这些团体，平时主要是在生活上互助，而当阶级矛盾尖锐时，就成了组织动员群众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遇着荒年风吹草动，就有帮助了”^⑧。从上述可知，天地会出现以前，在中国南方，民间已出现了许多类似天地会的秘密组织。天地会在许多方面接受了这些团体的影响，并且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把许多旧团体的特点加以汇集和改革，以新的号召而成立起来的组织。

应该看到，天地会在许多方面，比旧有的民间秘密团体前进了一步。首先，天地会作为一种互助团体，在其内部的互助互济方面，比以往的团体更加广泛，更加严密了。关于这一点，在当时的天地会成员的供词里，在它的“海底书”中所规定的条例里，反映得很清楚。这就比较符合破产劳动者的切身要求。而且，天地会并不停

① 《福建通志》卷14，《通纪》，民国年间刻本。

② 连横：《台湾通史》卷30，27~28页。

③ 参见《论啮嚙党状》，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75；《录副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协理浙江道山西道监察御史柴潮生奏，乾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

④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开泰奏。

⑤ 《史料旬刊》，第14期，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

⑥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71。

⑦ 参见卫大法师：《帮》，19页，重庆，说文社，1946。

⑧ 《史料旬刊》，第14期，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

留在单纯的经济生活的互助上，当阶级斗争尖锐时，它起着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作用。由于天地会的基本成员是破产劳动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勇于斗争，并成为斗争中的骨干力量；同时他们又与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斗争也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所以阶级斗争本身也推动了天地会的发展，使它从群众中吸取到一定力量。所以天地会是具有较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其次，在结盟的方式上，天地会采取歃血为盟、桃园结义的形式。“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①这种结义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在人民群众中，是团结互助的一种朴素的组织形式，容易受到群众的欢迎。再其次，在斗争口号方面，天地会常常打着“顺天行道”、“反清复明”的旗帜，这种口号并不是天地会新提出来的，而是以往农民战争中的战斗口号。天地会只能向旧时代、旧英雄“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②，用来赞美自己的斗争。但是在实际斗争中，根据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也能提出一些更切实地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战斗口号。由此可见，天地会是比以往的民间秘密组织进了一步的组织，因而它出现之后，就能较迅速地发展，较广泛地传布，而且长时间存在着。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天地会本身的落后性和由此而产生的许多弱点。由于它是破产劳动者的组织，它本身并未具有新的阶级内容，它不能赋予其成员以明确的阶级意识，在封建社会里，它不能不受到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影响。所以在其组织内部存在着封建的门户之见，分散主义，内部的不团结，甚至械斗残杀，以及保有家长制的管理方式，等等。这些严重的弱点，就必然使它在联系广大群众方面，在实际的斗争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这些弱点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广大劳动群众是不可能从这种组织中找到真正出路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天地会是以往的民间秘密团体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天地会仍然没有摆脱所有破产劳动者的组织所共有的落后性。由此可见，像陶成章把天地会说成“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③，把它看做一种完全新颖的组织，显

^① 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天地会结盟誓词》。作者利用档案过程中，承该馆的同志热情帮助，谨此表示感谢。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③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然是错误的；同样有的同志把天地会看做反映当时新兴市民要求的组织，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测；有的同志把天地会视为古已有之，只是古代民间秘密组织的一种简单的重复，也是不恰当的。

四、驳天地会明遗老创立说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的初步结论比较可靠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过去一些研究和所谓研究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不都是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根据，而最主要的是属于立场观点上的问题。有两种观点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一）在国内学者中，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陶成章为代表，他们把天地会看做明朝遗老、上层士大夫为了“反清复明”保留汉族根苗而创立的。这种观点，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当时拿来作为反满宣传的武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则是错误的。这种说法，贯穿着一种美化上层社会士大夫、蔑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他们看来，离开了明朝遗老、士大夫，人民群众似乎是不可能组成反抗性的组织的，离开了明朝遗老、士大夫，人民群众似乎是不可能进行抗清斗争的，如此等等。但是，事实上，明朝遗老、士大夫果真深入民间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了吗？天地会果真是明朝遗老、士大夫所组成的吗？人民群众果真不能独立地进行抗清斗争吗？很清楚，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这种观点在一些学者中影响较大，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的一方面。

（二）另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如施列格等人，把天地会与共济会比附，把天地会看做共济会向东方发展的结果，把天地会解释成似乎是不革命的、不反抗的“忠贞”、“行善”信仰上帝的组织等等。他们寻找一切机会来宣扬什么人种一元论、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国文化西来说等等西方殖民者的滥调。这不但说明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无知，而且暴露了他们别有用心目的。对这些谬论，我们必须加以彻底地批判。



天地会与台湾林爽文起义

清乾隆五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6—1788），在我国的台湾，爆发了一次由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组织发动的农民大起义。清政府先后调遣了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南、四川、贵州 7 省 10 余万兵力，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促使清王朝由“盛世”转向衰落。这次起义是天地会发动的首次大规模起义，斗争颇具特色，在中国会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具体考察研究林爽文起义，对了解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变化，了解天地会的发展变化及其斗争特点，是有重要意义的。下面对林爽文起义的社会原因，天地会与起义爆发的关系，起义的主要过程和特点，起义的失败原因、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林爽文起义的社会原因

18 世纪后半期，清王朝还处在乾隆“盛世”阶段，为什么在台湾会爆发林爽文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有人说，林爽文起义的爆发，是由于台湾的“分类械斗”；有的说，是由于天地会“反清复明”。^① 这些说法，似乎都没有弄清它的主要社会根源。我以为，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台湾地区的社会矛盾，就不难看出：林爽文起义的发生，主要不是由于地区性的“分类械斗”，也不是由于天地会空洞的“反清复明”，而是由于当时严重的社会阶级矛盾。

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社会，到 17 世纪时，已走上了缓慢解体

^① 参见日本学者佐野氏与千叶氏关于林爽文起义社会原因的争论，载《唯物论研究》，第 28 号，1935 年 2 月。



的过程。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经过明末的农民战争，已暴露无遗。但是，取代明王朝统治的不是李自成的农民政权，而是一个其内部封建制还处于上升阶段的满族贵族统治集团。他们入关建立起全国性的清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加强统治，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建成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统一强大的封建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康乾盛世”。但是，伴随着这种封建王朝“盛世”的出现，广大人民遭受的剥削压迫也相应地加重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又激化起来。到18世纪末，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国，清王朝也就由“盛世”转向衰落。从当时全国范围的情况看，造成农民起义的原因，各地虽有差别，但主要根源是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腐败。

原来，经过明末农民起义的打击，清初封建的土地关系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土地配置状况一度趋于分散。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土地兼并之风又兴盛起来。首先是清贵族统治集团，通过“圈占”等手段，吞并了大量土地。据不完全的统计，他们控制的官田、皇庄有8000余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皇帝本人就占有393万亩^①，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

其次是文武官吏仗仗政治权势掠占土地。他们掠占田亩的数字也大得惊人。如高士奇在浙江“平湖县置田产千顷”^②，徐乾学“买慕天颜无锡田一万顷”^③，和珅霸占土地8000余顷^④。一般的地主富商，多争先恐后地购置田产，兼并土地。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就不断向地主官僚手中集中，到乾隆年间，已形成“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⑤，“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见其贫”^⑥的局面。土地兼并的结果，就使大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和佣工，遭受地主阶级的苛重地租和种种超经济剥削；一部分农民则流散各地，成为游民。

乾隆年间，清朝统治集团已日趋腐化，吏治衰败，贪污成风，

① 参见嘉庆朝《大清会典》卷76。

②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壬子。

③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九月癸未。

④ 参见薛福成：《庸盦笔记》卷3。

⑤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⑥ 王先谦：《东华录》，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辛未。

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乾隆帝就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典型。他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修筑了无数离宫别苑、寺院庙宇。每次南巡，都大肆铺张，女乐、珍宝、宴席，无所不爱；所到之处，绅商供奉，斗奇争巧，耗财劳民，岁无虚日。一般的王公大臣和各地的富商豪绅，莫不挥金似土，过着奢侈的生活。

在统治集团奢侈腐化普遍成风的情况下，官吏的贪污就特别严重。上自皇帝的亲贵大臣，下至知府州吏，狼狈为奸，互相效尤。最突出的是军机大臣和坤，当政 20 余年，贪污了 8 亿多两银子，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的 8 倍。在他的纵容下，文官贪赃，武官克饷，被揭发的案件层出不穷。仅督抚、布政使国泰、王亶望、福崧、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贪污案，被抄没资产都在数十万两之上。督抚以下的地方官，也多贪赃纳贿，鱼肉百姓。当时流行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民谣，具体反映了知府官贪污成风的情景。在这样腐败的政局下，地主对农民的压榨也就特别苛重，因而，农民的反抗斗争就相继而起。

台湾与内地虽有海峡相隔，但当地的阶级状况与内地是基本一致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为了整饬田赋，充裕税收，废除了郑成功时代的官田、私田和营盘田，土地归民间私有。此后，由于政府奖励垦殖，允许内地民人渡台开垦，数十年内，“人民趋之若鹜”^①。地主豪强便乘机勾结官府，大量领垦、包垦荒地。他们不仅通过招募内地移民垦占了大量土地，而且还抢了周围许多自耕农开垦的田园。^②这一时期，台湾出现了许多独霸一方的大地主。如新竹的王世杰，占“田数千甲，岁入谷万石”^③。彰化的施世榜，占“彰邑十三堡半之田……家蓄佃农数千人”^④。诸罗（今嘉义县）的张振万，“拥资巨万”，田“凡千余甲，岁入谷数万石，家愈富，子孙优食其利”；吴洛，“岁可入谷万石”^⑤。淡水的林成祖，“岁入谷十数万石”；胡焯猷，“田数千甲，岁入租谷数万石，翹然为一方之豪”^⑥。

这一时期，在台的大小文武官员，也纷纷抢占土地，“置立庄

① 蓝鼎元：《平定台湾纪略·总论》。

② 参见瞿明宙：《台湾的租佃制度》，9 页，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刊，1931。

③ 连横：《台湾通史》，542 页。台湾田亩以甲计，一甲约十一亩有奇。

④ 同上书，546 页。

⑤ 同上书，547 页。

⑥ 同上书，548~549 页。



田，垦种取利”。如江南提督蓝元枚，就在台湾置有大量庄田，并派表弟何从龙“替他管理”^①。总之，台湾土地大量开发的结果，大半被地主官绅霸占，农民很少占有土地。广大劳苦农民不得不成为雇农和佃农，忍受苛重的地租赋税剥削。

有关记载表明，台湾的租赋重于内地。农民（即“现耕佃人”）除了要向包揽开垦的“垦首”交纳“大租”外，还要向直接经营土地开垦的“垦户”交纳“小租”。^② 政府在台湾征收的田赋，比内地加重一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巡台御史黄叔璥奏称：“台湾田赋较重内地，台之一甲，得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有奇，内地上田，各县征法不一，约折色自五六分以至一钱一二分而止，是一甲不过征至一两三钱为最多矣。今台征谷八石八斗，使谷虽贱，石为三钱，已至二两六钱四分余。”^③ 由于地主豪绅与官府勾结，大量隐瞒田亩，结果重赋大多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形成“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更有近溪田园，水冲沙压，小民无力报豁，田去粮存”^④ 的现象。

租赋之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如乾隆元年清政府规定，男子成丁年龄为十六者，“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再加火耗，则至五钱有零矣。查内地每丁征银，一钱至二钱、三钱不等，而台湾加倍有余”^⑤。此外还有“陆饷”、“水饷”等名目。陆饷包括厝饷（即房产税）、牛磨、蔗车、棧宅、槟榔宅、菜园、瓦窑、当铺之类，无不按数征税。水饷有渔船、渡船、港潭、鱼塭、大小网、箔、沪、罾、罟、零、缙、蚝、纛、乌鱼旗等税。^⑥ 苛税之外，还要征收“耗羨”，“旧制正供粟一石，征耗粟一斗，折银五分。杂饷每银一两，征耗银一钱，封平余银二分，共一钱二分。若番丁赋银一两，征耗

① 《何从龙供词》，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四），347页。

② 清政府在台湾实行奖励私垦以后，一般先由“垦首”（实际都是豪强官绅）看定地方，向政府递呈禀帖，承揽包垦，政府发给执照，然后“垦首”将包揽的地段交给“垦户”，由“垦户”招雇群众开垦成熟地后，租给农民耕种，这样，“垦首”一钱不费，待地垦熟后，每年即向耕种农民抽取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二，名曰“大租”；而“垦户”还向农民收取十分之四五的“小租”。参见连横：《台湾通史》，122页；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徐嗣曾、奎林奏，见《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65；瞿明宙：《台湾的租佃制度》，9页。

③ 连横：《台湾通史》，120页。

④ 同上书，125页。

⑤ 道光《彰化县志·田赋志》。

⑥ 乾隆《台湾府志·饷税》。

中国近代史研究

银七分，封平余银二分，共九分”^①。凡此种种负担，都加在台湾农民的身上，使他们终岁辛劳而不得温饱。

台湾地方吏治腐败，文武官员的贪黷特别严重。清初以来，朝廷对宦台文武官员，采取了任期短，任满必升，文员不经部选，不许携眷，崇其体制，吝其俸给的政策。武官参将、游击以上，文职道员以上，一般两三年任满，即转升内地。但到了乾隆年间，由于清朝整个吏治日趋腐败，宦台官员的贪黷就特别严重。他们已不再“以冒险渡海为虑，反俱视为利藪”^②。得缺之员，唯利是图，“以宦为贾，舞弄文墨，剥民肌膏，三年报罢，满载而归”^③。如台湾知府孙景燧，自乾隆四十九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4—1786）在台湾府任内，“于地方事既无整顿，而将库贮银两侵占至十余万两之多”^④。他开造户口册籍，每户俱要几块“番钱”，进入私囊^⑤。署彰化县知县刘亨基，处理赌博、打架等民事，“俱要勒索银钱”^⑥，“丈量地亩，也要几块番钱”^⑦。诸罗县知县唐镒，“本属穷苦”，在任时因肆意贪婪而被查抄家产^⑧。武官中贪污最严重的是台湾镇总兵柴大纪，他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到任起，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三年内即“婪索银五六万之多”^⑨。他采用种种手段进行敲诈勒索。如外出巡查，要收受金银。他先后巡查四次，“每次番银三千元，共得受过一万二千元”。所过厅县，要送盘费。各地所送“银两二三百元不等，共得过番银七千三百余元”。每逢生日，要收节礼。共收受各营员生日节礼番银3700余元。拔补各营外委，要得受谢银。鹿耳门海口陋规，每年春季番银1570余元，夏季1270余元，秋季970余元，冬季670余元。鹿仔港每年缴送番银1200元，北淡水海港每年缴送1000元，柴大纪任内共收受番银16720元。^⑩此外，他还“纵令兵丁等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令其按月缴钱”，因此，“成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⑪。总之，由于柴大纪在台遇事婪索，遂致各营将

① 道光《彰化县志·田赋志》。

②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上谕。

③ 《上谕档》，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④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上谕。

⑤ 参见《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林领供词》。

⑥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刘怀清供词》。

⑦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林领供词》。

⑧ 参见《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上谕。

⑨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九日上谕。

⑩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福康安奏；《柴大纪供词》。

⑪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上谕。



弁相率效尤，弊端丛生。

在台湾，除了汉族人民外，还有高山族人民^①。他们少数从事耕种，大多居于深山，主要以游猎为生。清朝统治者和汉族地主豪商，一直对他们进行歧视压榨。例如，汉族地主以开垦为名，侵削其鹿场、耕地，造成他们生活无依，哭诉无门。《凤山县志》载：“业主管事辈（指汉族地主——引者）利在开垦，不论生番熟番，越界侵占，不夺不履。复勾引夥入山搭寮，见番弋取鹿麂，往往窃为己有。”^②“汉人之侵耕番地者，所在皆有，番无可吁诉”^③。租赋方面，也名目繁多。有“番大租”、“山租”、“水租”、“山面杂租”等，打猎者要交纳鹿皮。^④商人则通过不等价的交换方式剥削他们。“番之互市，社商主之，每市朘削，朋比为奸。”^⑤更有甚者，清朝统治者还对高山族人民进行诱骗残杀，经常“以酒肉诱番出，醉而掩杀之”^⑥。因此，高山族人民对清朝统治者“亦衔刺骨”^⑦。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清朝政府的文武官员在台湾“任意侵渔肥囊，以致敛怨殃民，扰累地方”^⑧，加之地主豪绅的压榨，必然引起台湾各族人民的愤恨和反抗。林爽文领导的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二、天地会在台湾广泛传播与林爽文起义的酝酿爆发

众所周知，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天地会于何时以及怎样传入台湾的？它与林爽文起义酝酿爆发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以往的著作很少具体论述。

根据目前所见到的清代档案资料，已经初步查明，天地会名目

① 历史上高山族名称不一，三国时称“山夷”，隋唐时称“流求”、“留仇”，宋元时称“琉球”、“瑠求”、“土人”，明代称“东番夷”、“土番”、“土民”，清代称“番族”或“番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称高山族。参见《高山族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② 乾隆《凤山县志》卷2。

③ 连横：《台湾通史》，292页。

④ 参见上书，129~130、333页。

⑤ 同上书，292页。

⑥⑦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4。

⑧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上谕。

中国近代史研究

最早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是由福建漳浦县的洪二和尚——万提喜首创。它是破产劳动者实行生活互助的一种团体，乾隆后期，已广泛流传于闽粤等省。^①天地会之所以首先在闽粤一带广为流传，其社会根源就在于这个地区存在着大量的破产劳动者、游民。而造成大量游民的主要原因，又在于这一带土地问题严重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福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广东则山海交错，非山即海。尤其是闽省的漳、泉各府和粤省的潮、惠等州，素属地瘠民稠。清初以来，经过长期休养生息，户口增殖，食指愈多。由于地少人多，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严重失调。所以从康熙、雍正以来，就有大量无地农民从这一带成群结伙地往地广人稀的台湾、广西、四川等地迁移。特别是台湾，邻近闽粤内地，素称膏腴之地，“一岁三熟，闽粤沿海之氓，相率而至”^②。据施琅的估计，在郑氏统治时期，台湾汉人还不满10万。^③经过康、雍、乾三朝大批贫民从闽粤流移，台湾的人口就猛然倍增。据统计，康熙初年约有20万，乾隆中叶已增至100万，嘉庆二十年（1815年）即达200万。^④如果按渡台闽粤民人的比例计，“漳、泉之民居十之六七，广民在三四之间”^⑤。这些人来到台湾之后，出于生活互助的需要，便结盟拜会，实行“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以后，结拜之风开始在台湾流行，诸罗知县季骥光在《严禁结拜示》中指出，近年以来，“二三少年无赖，好事争奇，动则焚香酌酒，称哥呼弟，求其贵贱相忘，贫富相恤，忧乐相共，存亡相顾，绝不概见”^⑥。到康熙末年，“异姓结拜兄弟”已成为台湾乡村的风习。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刊刻的《台湾县志》明确记载说：“台鲜聚族，集异姓之人，结拜为兄弟，推一人为大哥，不论年齿也。余各以行次相呼，胜于同胞，妻女不相避，以伯叔称之。狎习既久，不无瓜李。此亦乡村间之习俗，邑中未闻有是也。”^⑦雍正年间以及乾隆初年，台湾已出现了类似天

① 参见拙文《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4（1）。

② 连横：《台湾通史》，333页。

③ 参见施琅：《尽陈所见疏》，见《靖海纪事》卷上。

④ 参见连横：《台湾通史》，106~110页。

⑤ 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4。

⑥ 康熙《台湾县志》卷10，《艺文志》。季骥光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任诸罗知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离任。

⑦ 康熙《台湾县志》卷1，《风俗》。



地会的父母会、小刀会等组织名目，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天地会创立以后，就随内地移民迅速传播到台湾全岛。

据档案文献记载，最早将天地会传入台湾的，是福建漳州平和县人严烟，即严若海。他向来以卖布为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天地会会首陈彪，借行医为名，来到平和县传布天地会，严烟即在平和县老家由陈彪介绍入天地会，并授得传会秘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严烟到台湾，先在彰化地方，以卖布为业，广传天地会。^①他“随处聚众，少者数十，多则数百，设香案，歃血沥酒，誓为党援”^②。凡入会之人，均授予暗号，“相约见人伸三指，并有洪字暗号，口称五点二十一，便是同教之人”。入会后，遇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③由于参加天地会可以带来这么多好处，并具有神秘色彩，所以入会之人甚多。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严烟在溪底阿密里庄遇林爽文，彼此往来熟识。不久，林爽文向严烟要求加入天地会，严烟随即将林爽文吸收入会，并授予传会秘诀、仪式等。^④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平和县。父林劝，因贫不聊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挈妻子渡台，雇工于彰化，居彰化大里杙庄。林劝生有四子，长子林爽文，以下为林勇、林跃兴、林垒。林爽文成年后，在台湾当过彰化县役，但主要以赶车度日。他为人慷慨，不吝钱文，“结少年无赖，凡系于狱者，爽文皆脱囊资之，以是倾动其乡人”^⑤。由于林爽文平日在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信，所以加入天地会后，很快就成为会中的头目。《平台记》载：“乾隆五十年十二月除日，庄中群无赖于庄西厂地釀酒为乐，酒酣，共谋曰：‘我庄中当推一人为主，以一号令。插剑于地，攃土为香，共拜之，剑仆者，即天所与也！’时共五十余人，以齿序拜。至林爽文，而剑适仆。由

^① 据严烟供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平和县入会时，听陈彪说，曾与陈丕、赵明德等在福建各地传会，还听说陈丕到台湾传过天地会。据《清实录》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福建漳浦有天地会卢茂举事。档案材料证明，陈丕与卢茂同乡，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从提喜和尚为师，后因卢茂等破案治罪，即害怕，在家耕种……未到过台湾”（《上谕档》，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据此，可以推断，陈丕并未至台传会。

^② 嘉庆《台湾县志》卷5，56页。

^{③④} 参见《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严烟供词》。

^⑤ 佚名：《平台记》，2页。此书系道光十二年（1832年）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原书未编页码，本文所引页码是引者据抄本页序编排。

是庄中群无赖益推戴之矣。”^①

天地会通过严烟、林爽文等在台湾的辗转传播，“于是气类通四邑”^②，彰化之刘升、陈泮、王芬等，诸罗之杨光勋、黄钟、张烈等，淡水之王作、林小文等，以及凤山之庄大田、庄大韭等都相继入会，并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心。北路中心以林爽文为首，下分三房，“爽文为长房，蔡福为次房，叶省为三房”^③。南路中心以凤山的庄大田为首。庄大田，原籍福建平和县，乾隆七年（1742年）随其父庄二渡台，居诸罗县，父死，迁居凤山笃加港地方。他勤于耕种，家道小康，“乡里有急，辄周恤之，以是义侠闻南路”^④。加入天地会以后，“与爽文通书讯，称莫逆”^⑤，南北两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从台湾天地会的骨干成员看，主要是游民，在台湾称“罗汉脚”^⑥，其他还有挑夫、佣工、耕种度日者、小手工艺匠人、小商贩、测字算命者、差役文书等。笔者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林爽文起义期间清方俘获台湾天地会骨干85人所供身份职业，大体分类列表如下：

表5 乾隆年间台湾天地会成员身份构成表

身份	游民	佣工	小手工 艺匠人	耕种 者	迷信职 业者	小商 贩	差役 文书	监生 秀才	富商	合计
人数	32	9	7	4	6	12	12	2	1	85
百分比	37.6	10.6	8.2	4.7	7.1	14.1	14.1	2.4	1.2	100

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林爽文起义被俘人员供词。

这些人，大多来自闽粤内地，如果按照以上85人所供籍贯，可以列表如下：

表6 乾隆年间台湾天地会成员籍贯表

籍贯	漳州	泉州	汀州	福州	潮州	台湾
人数	53	15	2	2	9	4

① 佚名：《平台记》，2~3页。

②③ 嘉庆《台湾县志》卷5，56页。

④⑤ 连横：《台湾通史》，554页。

⑥ 据福康安奏称：“台湾无籍游民并无家室者，名为罗汉脚，多以赌博为事，每人各带钱数百文，即于街市环坐聚赌，骰牌跌钱之外，更有仅用席片上画十字，即可群聚压宝，虽素未识面之人，皆可共赌，朝东暮西，并无定所。”（《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61，29页）又据徐嗣曾奏：“拿获股头匪犯申明……逆犯大半系罗汉脚。”（《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十日）据此可见，在林爽文起义队伍中，“罗汉脚”为数不少的。



这些人迁渡到台湾以后，除一部分垦田耕种外，许多人没有固定职业，“朝东暮西，并无定所”，生活极不安定。为了谋求生存，他们就投奔天地会，“立誓结盟，患难相救”^①。其中以罗汉脚投奔天地会最为踊跃。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福康安、鄂辉在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的过程中就奏称：“天地会名目，起自内地，辗转私传，又有一种游手匪徒，生事扰民，名为罗汉脚，以天地会人众势强，利于纠抢，无不听从入会。”^②这些人，原是闽粤内地的贫苦破产农民，他们身上，基本上还保存着一些农民习性；渡台以后，他们仍按封建的地域观念分布各地，与本籍移民集团有密切的联系，一旦社会上风吹草动掀起抗暴斗争时，他们就能把大量农民卷入斗争的行列，因而林爽文起义爆发时，动员群众“猝然数万”^③。

天地会在台湾的广泛传播，逐渐为清政府所察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七月，台湾道永福、知府孙景燧遣有司会营缉治。这时，诸罗县的杨光勋与杨妈世兄弟间因争夺财产，各自纠集添弟会、雷公会的伙众械斗，官府查拿会党，扰害民众，就成为林爽文起义的导火线。

原来，在诸罗县的九芎林地方，有捐职州同杨文麟，其螟蛉长子杨光勋，与其亲生子杨妈世争产不和，杨文麟偏爱杨妈世，将杨光勋析居相隔数里的石榴班地方，每年给以银谷。杨光勋因“好事游荡”，不敷所用，常与杨妈世争吵。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六月，杨光勋欲纠添弟会党，秋成抢割杨妈世稻谷，以备斗殴。自七月初一日起，陆续纠集何庆、张泮等75人，每人给予番银2元。杨妈世闻知，亦起意结会，抵御杨光勋抢斗，“以光勋凶恶，必被雷击，名曰雷公会”。先后纠集何稽等24人入会，每人给钱500文。经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访闻结会图斗情事，即飭令兼摄诸罗县事、台防同知董启埏，守备郝辉龙于闰七月初四日，带领兵役，前往拿获杨妈世及添弟会、雷公会会众张泮、黄冷等14名，并将杨文麟拿获，押解回县审办。初七日，石榴班汛把总陈和带领兵丁续获添弟会要犯张烈一名，押解赴县，行至斗六门地方，在倪姓饭店休息。杨光勋等侦知张烈被捕，即纠集何夜、卢桓等数十人，各执刀棍，前往放火劫囚，夺走张烈，并杀死陈和及其兵丁。后经柴大纪、永福等带领兵役驰往诸罗，会同督飭文武员弁分路查拿，在诸罗及彰

①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林爽文供词》。

②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58，16页。

③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柴大纪奏。

中国近代史研究

化县境内陆续拿获添弟会劫囚首从要犯杨光勋等、雷公会伙犯潘吉等，计89名，分别处死或充军。^①张烈、赖荣、叶省、蔡福、张圆等天地会头目及其他会众则纷纷逃匿彰化县大里杙，“会党悉入大里杙，愈啸聚抗法不可制”^②。

大里杙在彰化县东二十里，“前凭重溪，后即岸里社番，门户深阻。其中腴地百里，秋成后，谷米狼戾，食不外求”^③。其内可容万余人，有林姓聚族而居，计有三千余丁。庄内以大毛竹为墙垣，四周大树丛密，溪流纵横，形势险要。^④天地会会众大量逃聚到这里以后，即邀林爽文以大里杙为根据地，竖旗起事。为此，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紧进行准备：第一，以天地会组织为基础，建立了起义的领导机构。推举林爽文为大哥，充当总头目，以林泮、陈奉先、王芬、刘升、刘礼生、严烟、董喜等为谋主，以陈泮、李乞（即李七）、张圆、阮和、蔡福、叶省、赖达、何有志等为羽翼。又以林琴、林水返、林领、林绕等，或经理粮储，或制造器械。此外还有杨轩、高文麟、杨振国等数十人充当各种头目。在短时间内，大里杙就聚集起数千会众。^⑤第二，筹集粮草，储备银钱。林爽文首先“将所有积聚，供给众人吃用，并将会内殷实人家，也都攒凑出来，大家公用”^⑥。林爽文还派人向殷实富户征收租石，“每十石他要抽取二石”^⑦，以做储备。此外，北路的牛稠山、庵古坑、大埔林、中林、南投、斗六门、鹿仔溪、乌日庄、田中央、猪高庄等处，也都有屯聚。第三，联络发动高山族人民。距大里杙约四十里的水沙连地方，聚居着为数不少的高山族人。林爽文派通事杜美与他们联系。杜美，漳州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月加入天地会。“他素常在内山水沙连交界地方，拿盐、布与生番贸易鹿皮、鹿筋等物，所以与生番相熟。”经过杜美的联络，水沙连的高山族有一千余人准备参加起义。并约定，“林爽文若逃往内山时，就可在那里躲避”^⑧。

与此同时，南路的庄大田也以凤山水底寮为根据地，加紧准备

① 参见嘉庆《台湾县志》卷5；道光《彰化县志》卷11；《明清史料》，戊编第三本。

② 嘉庆《台湾县志》卷5，56页；道光《彰化县志》卷11，56页。

③ 佚名：《平台记》，2页。

④ 参见《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及《林小文供词》。

⑤ 参见佚名：《平台记》，3页；《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林小文供词》。

⑥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林小文供词》。

⑦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林茂供词》。

⑧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大学士和珅奏及《高文麟、杨振国供词》。



举事。当他们听到林爽文在北路竖旗时，即杀牛豕歃血以盟，众推庄大田为主，以庄大韭、庄大麦、庄锡舍、王坑郎、简天德、许光来、李惠等为左右。庄大田出家资制器械，以彩帛为旗帜，聚集数千人，与北路遥相呼应。^①

清朝统治者闻大里杙天地会恃险抗官，欲乘岁暮举事，大为惊恐。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月，新任彰化知县俞峻，力主急治，“获者即毙杖下”^②。十一月初七日，总兵柴大纪因巡查营伍至彰化，闻林爽文揭竿而起，以调兵为名，仓皇逃回府城。俞峻见兵单势孤，飞檄告变曰：“林爽文旦夕为乱，而彰驻防兵多缺额，且不习战，非发大兵捕之，恐彰化非吾有也。”^③十一月十六日柴大纪遣台湾镇中营游击耿世文领镇标兵三百人驰赴彰化，会同北路协副将赫生额往捕，知府孙景燧随往，会合彰化兵丁壮役六七百人，于十一月二十日至距大里杙七里的大墩（今台中市）扎营。俞峻带县役往各庄搜捕，饬令庄民献出“首恶”，声称：“如敢违抗，即烧庄剿洗。”衙役在各庄“不论好歹，纷纷乱拿”^④，并烧毁庄民房屋，“无辜妇孺，号泣于道”^⑤。林爽文“因民之怨”^⑥，“不得不趁势造反”^⑦，起义就此爆发。

三、战争的主要过程与特点

林爽文起义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难，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十日林爽文在北京英勇就义，起义宣告失败，历时十七个月。如果按照战争发展变化，以及双方力量对比消长的情况来分析，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一）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起义军进军神速，全面攻城夺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起彰化、淡水，南至凤山，除府城和艋舺外，整个台湾多被起义军势力占领。起义

① 参见佚名：《平台记》，13页。

② 嘉庆《台湾县志》卷5，56页。

③ 佚名：《平台记》，4页。

④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林爽文供词》。

⑤ 连横：《台湾通史》，554页。

⑥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林爽文供词》。

⑦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林爽文供词》。

中国近代史研究

军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起义队伍由数千人发展到数十万。而清军则土崩瓦解，节节败退。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起义军的进攻阶段。（二）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一月至十一月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起义军和清军双方都进行了力量的补充和调整。清军一面从内地调兵渡台增援，一面在台湾扶植各地的地主武装集团与起义军对抗；起义军则一面派人至内地探听消息，一面在各守防驻地整顿士气，加强物资准备，乘清军大批渡台前进攻府城。双方力量互有消长。起义军基本上处于分兵把口、保守占领地的状态。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双方的相持阶段。（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清政府调福康安率10余万大军渡台，拨运米100余万石充军饷，兵器火药也大批运到，在清军大批压境和猛烈的反攻下，起义军节节失利，并以失败而告终。这是起义军的退却失败阶段。下面，我们就对这三个阶段的战争形势、战略战术的特点分别进行考察。

（一）起义军的进攻阶段

林爽文起义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彰化正式爆发，起义军数千人，各执器械，一举攻克了距彰化县城三十里的大墩营盘。原来，柴大纪为了围剿汇集在大里杙的天地会众，旬日以前即派游击耿世文、知府孙景燧会同副将赫生额等带精兵六七百人驻扎大墩。二十七日傍晚，林爽文乘清军不备，密遣人潜入清军营盘，掩入火药所，约定以投烧火药所为进攻信号。起义军埋伏于大墩外围，顷刻见火光烛天，即四面围攻，“呼噪之声动地，官军莫知所为”^①。副将赫生额、彰化县令俞峻、中营游击耿世文、千总陈士杰、外委方日高等猝不及防，都被杀死，驻军全部被歼灭。起义军一攻下大墩营盘，当晚即进逼大墩以北的大肚溪，焚毁船筏，控制水路，阻截清军援师，并使其文报信息不通。^②

二十八日晨，清兵杨胜官因在大墩营溃散，投大肚溪未死，浮水至彰化县城告变，城中清兵惊恐失色。同知长庚急请堵御，都司王宗武分兵四门防守，因驻军大部赴大墩，存城者仅有200余人，俱无斗志。^③二十九日，日晡雷雨，起义军乘势攻陷彰化城，知府孙景燧、

① 佚名：《平台记》，6页。

②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福建巡抚徐嗣曾奏。

③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原任彰化县典史李尔和供词》。



理番同知长庚、摄县事刘亨基、都司王宗武、署典史冯启宗、把总陈国印、外委王光明及陈捷魁等数十人被杀。起义军占领仓库，散发粮食，“又打开监狱，放出监犯”^①，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起义军占领彰化县城后，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建号“顺天”，推林爽文为顺天大盟主、盟主大元帅。以下由林爽文设官分职，封杨咏（即杨振国）为副元帅，高文麟为总爷，以王芬为大将军，陈泮、何有志为左右都督，董喜、陈奉先为军师，侯老为谋士，刘贤士为海防同知，林光为理番同知，刘四（即刘怀清）为彰化知县，林与为先锋，刘升为北路协，林仓管理支放军粮，杨轩委办军务。其余林瓦、林泮、简乾、张火、林约、林韭、郭汉、卢菊、张隆生、林长义、林鹤然、林理生、赖子玉、吴领、藤老、黄音等各授职有差。^②林爽文还出榜安民，榜文曰：“顺天元年，大盟主林为出榜安民示：本盟主为众兄弟所推，今统雄兵猛士，诛杀贪官，以安百姓。贪官已死，其百姓各自安业。惟藏留官府者死不赦！”^③农民起义政权的建立，进一步鼓舞了林爽文起义军的斗志，同时也更广泛地吸引着被压迫群众投奔到起义队伍中来，清方的记载说“群不逞之徒皆附之”^④，即此而言。

林爽文在彰化一建立政权，就立即分兵南北进击。北路进攻的目标是淡水，因为它是彰化和大里杙的北面屏障，对巩固起义军的政权和根据地有重要意义。南路进攻的目标是诸罗，因为它是台湾府城的屏障，克诸罗即可南攻府城；反之，诸罗不克就会威胁彰化，影响起义的全局。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二月初一日，林爽文派扫北将军王作和林小文率部北上攻淡水（淡水厅治在竹塹城，即今新竹县）；林爽文自己则率大部南下攻诸罗。起义军向诸罗进发，经彰化以南的九芎林、斗六门、庵古坑等地，当地农民多纷起响应，清军不战而逃。署诸罗知县董启埏、守备郝辉龙急向府城呼救，总兵柴大纪派游击李中扬、千总苏明耀及魏大鹏等领兵600名赴援，诸罗计有清兵800名，李中扬、郝辉龙以500人守北门，其余分守东、西、南三门。十二月初四日，起义军进抵诸罗城西门外台斗坑边，先派间谍入城，约城中居民内应，因知县董启埏为民所切齿，“民皆通贼”^⑤。十二月初六日，诸罗城中火起，起义军乘势攻北门，清军溃散。起义军入城，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日闽浙总督常青奏及《高文麟等供词》。

②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初六日闽浙总督常青奏及《高文麟等供词》。

③ 佚名：《平台记》，7页。

④⑤ 同上书，9页。

杀知县董启埏，残其尸。试用知县唐镒、典史钟燕超、守备郝辉龙等都被杀。

十二月初七日，扫北将军王作率部进攻竹塹，月眉庄李同一，猫里社黄阿宁、林同光、何天等聚众响应，淡水大震。署淡水同知程峻、守备董得魁领兵赶至距竹塹四十里的中港地方堵御，起义军翻山越岭，向竹塹进逼。程峻等闻起义军已逼近竹塹，乃由中港退守竹塹，行至山腰，遇起义军伏兵，清军溃逃，程峻自杀，竹塹城破。至此，台湾北路地区多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军攻占诸罗和淡水以后，林爽文又连续发布安民告示，进一步阐明起义军因民而起，为民除害；宣布义军所过之处，秋毫不犯；号召人民安心农耕。十二月初八日，林爽文在淡水发布的一道安民告示说：“顺天盟主林，为祝天沥示，以安民心，以保农业事。照得居官爱民如子，才称为民父母也。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以救吾民。特兴义兵，当天盟示，不仁不义，亡于万刃之下。致蒙上天保持，立将彰化顷刻成灰。兹顺天扫北，所过之处，香案叠叠，唧唧相迎。本帅严谕军伍，不许丝毫妄取。……如吾军不是，失一赔二，焚茅赔瓦，仍究明强暴；若吾民不该，亦照法究处。本帅至公无私，尔等不必怀疑，致伤和睦。……吾心坚铁石，更虑吾民不信，是以祝天沥明，以显天良，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闽粤民人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宜安分耕农。”^①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初四日林爽文在诸罗发布的告示则宣布，起义军“上荷苍天，下恤庶民，义士群起，剿除贪官，以保民生。……嗣后如有不法棍徒，胆敢在庄肆横，藉抢粟物等项，许该庄民会众，捆解赴本守府，按法究治，决不姑宽”^②。这些告示，对进一步动员广大农民参加起义，以及约束军纪、安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

诸罗既克，起义军的进攻目标就立即指向台湾府城。为了尽早拿下府城，林爽文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二月初即派人与南路天地会庄大田联系，准备合攻府城。与此同时，又将北路起义军分水陆两路向府城进发。陆路军自诸罗山下茄冬直逼府城北郊，水路自笨港渔船浮海南下攻府城西郊。总兵柴大纪闻林爽文率大部南下，一面急请福建水陆提督发大兵渡海救援，一面带领水陆军1400

① 《录副奏折》第2660卷第4号，《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

② 《录副奏折》第2660卷第3号，《林爽文起义军守城官告示》。



余人至盐埕桥堵御。十二月初七日黎明，起义军水师船数百只衔尾而至，柴大纪命发子母炮，击沉数十只。这时，陆路起义军万余人赶至，“黑衣黑布包头，手执长刀，亦有枪炮，蜂拥而至”，为抵御清军的炮火，他们“以棉被透湿，遮牛车上”^①，冲向敌营。但因清军炮火猛烈，起义军伤亡甚大，乃退屯大目降。

林爽文在彰化起兵，顺利攻下淡水、诸罗等地后，南路天地会首领庄大田、庄大韭、庄大麦等也在凤山树起了“顺天”大旗，广招部众，起兵响应，“数日之间，众至数千”^②，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举攻克了凤山县城。^③庄大田即自称“南路辅国大元帅”，其下设有“南路辅国副元帅”、“定南将军”、“开南先锋”、“辅国将军”等官职。庄大田除了留下一部分将士守护凤山县城外，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转战台湾南路，连续攻克了南潭、中洲、大目降、埤头、莒松、仑仔顶等地，南路广大地区，也迅速被起义军势力占领。从此，南北两路起义军相会，联合进攻府城。

从上述可见，自林爽文在彰化起兵发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起义的风暴就席卷台湾全岛，除艋舺、府城等地外，其余各地都被起义军势力所控制。起义军由数千人发展到数万之众，参加起义的群众不下数十万人。在起义风暴的袭击下，驻台清军一触即溃，土崩瓦解。为什么起义的烽火蔓延得如此迅速？为什么起义军在旬日之间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呢？这当然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由于台湾尖锐的阶级矛盾。如前所述，清朝统治者和台湾的地主豪绅对台湾贫苦汉人、高山族人民的剥削压迫，已使他们无法照常生活下去，特别是贪官污吏的扰害，人民怨声载道。林爽文正是“因民之怨”起来造反的，因此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起义军攻营盘，毁官府，戕贪官，杀污吏，开狱放囚，广散钱粮等一系列措施，反映了台湾人民的迫切要求，所以起义军所到之处，群众“香案叠叠，唧唧相迎”，各地“大小村庄，相率附众”，加入起义队伍的人“动至数万”^④。例如，起义军在进攻彰化、淡水的过程中，月眉庄李同，猫里社黄阿宁，何天等，八芝兰的赖水、郭稳等，新庄的刘长芳、林三哥，下庄仔、中港厝的黄祖成、叶山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柴大纪奏。

② 佚名：《平台记》，14页。

③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初二日闽浙总督常青奏。

④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奏。

林、陈轩、李壬，摆接庄的赖树、赖国，户尾、八里岔、长道坑的何马、何记、吴三哥、庄仅等，都各自招募群众，响应起义，有的人一下召集起千余人响应。许多地方的高山族人民，不仅参加战斗，而且还为起义军提供硫磺配制火药。^①关于这一点，闽浙总督常青在一个奏折中说得很清楚：“逆首林爽文等，狡猾异常，所掠钱米，广为散给，要结人心，以致无食游民尽皆从贼。”^②这就是起义军能在短时期内取得巨大胜利的主要原因。

其次，林爽文起义是通过天地会组织发动的。虽然天地会在平时主要是群众生活互助的团体，但在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激化时，它就能起联系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作用。在当时还不存在比天地会更先进的组织的情况下，天地会就承担着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的广大农民组织到斗争行列来的历史责任。事实上，林爽文起义爆发前，天地会在台湾的广泛传播，就为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而起义的爆发就促使天地会飞速发展，北路旬日之内，众至数万；南路“有二百杆旗子，共有数万人”^③。在起义的过程中，天地会还采取了非常手段，即“非会内之人，即行抢夺，是以稍有身家及负贩营生者，亦多畏其抢夺，不得不从，以致南北两路日聚日多”^④，终于在短期内汇成席卷台湾全岛的巨大洪流。

再次，从双方力量对比情况看，这一阶段起义军的力量处于优势地位。虽然清军在装备和作战经验方面胜过起义军，但由于军队的性质和作战目的不同，战斗精神也就不一。起义军多为苦难群众，为反抗封建剥削压迫而战，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因此作战勇敢，能吃苦耐劳。他们敢于用刀矛木棍以至石块与清军拼搏，他们能扬长避短，利用夜间、雨天搞突然袭击，他们善于跋山涉水和奔驰于羊肠小道。他们攻城夺地时，军队的数量也多压倒敌军。而清军则是雇佣性质，内部矛盾重重。尤其是柴大纪接任台湾总兵以来，遇事婪索，营伍废弛，士气低落，在起义军的进攻下，即如摧枯拉朽，一触即溃。

最后，起义军在战略战术上，也比较主动有利。他们事先就选择了进攻和退却的据点，建立了根据地。在作战过程中，各部之间

① 参见《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②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闽浙总督常青奏。

③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八月《金娘供词》。

④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福康安奏。



能密切配合，特别是南北路之间配合得比较好。他们经常趁敌不备发起进攻，并派人潜入清军内部，里应外合，歼灭敌人。

（二）双方的相持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林爽文起义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攻占了大量城池，队伍迅速扩大，处于进攻状态。但是，这种有利形势很快就向相反方向转化。促使形势转化的主要因素是：台湾地主武装的迅速兴起，和清军的大批渡台增援。同时，起义军内部的情况也发生变化。因此起义军就由进攻转为与清军相持的局面。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里，起义军夺彰化，取淡水，克诸罗，占凤山，逼府城，势如破竹。驻台清军及援师数万，基本被摧垮，府城孤悬，破城在即。就在这个关口，台湾各地出现了大批地主武装与起义军相对抗。首先是台湾北部，当起义军进攻艋舺时，监生陈鹏生、业户董再兴等，招募乡勇 7 000 余人，其器械口粮由各铺户捐备，与起义军相抗，致使起义军攻城而不得入。^① 在淡水，起义军攻入竹塹后，以李同、黄阿宁、林日光等率 1 000 余人守后垄，以作后援。粤人谢尚纪、钟瑞生等，自嘉志阁召集“义民”数千人反扑，杀黄阿宁、林日光等，断绝了起义军赴彰化的通道。^② 与此同时，淡水厅同知程峻之幕客寿同春，纠集“义民” 1.3 万余人攻占竹塹，起义军首领王作、许律、陈觉、郑加等被杀害。^③ 在鹿仔港，有泉州晋江监生林文俊、林湊，以及广东庄邱丕万、曾桃等，分别招募万余乡勇，伙同署守备陈帮光、千总帅挺等反攻彰化城，驻彰化起义军首领杨咏、杨轩、高文麟、陈高等被俘。^④

在台湾南部，当起义军首次进攻府城时，台湾道永福即派同知杨廷理与晋江监生郭友和等，往凤山招募乡勇。他们“步行于市，手执大书招募义民旗，三日中得八千人，复至海口招得水手一千人。鸠工匠，制帐房，整枪炮，铸锉子，造器械，分给民番，以备战守”^⑤。与此同时，总兵柴大纪亦带兵于距府城三十里之三坎店，招募乡勇，守护府城。^⑥ 由于大批地主武装乡团在台湾各地出现，起

① 参见佚名：《平台记》，18 页；《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 1，18 页。

② 参见佚名：《平台记》，19 页。

③ 参见同治《淡水厅志》卷 14，14 页。

④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初六日闽浙总督常青奏及《高文麟等供词》。

⑤ 嘉庆《台湾县志》卷 5，56~57 页。

⑥ 参见《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 1，15~22 页。

义军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这样，就使清廷在台湾的统治得以苟延残喘，并争得从内地大批增调渡台援军的时间。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能迅速地在台湾各地招募到这样大批的乡勇、“义民”来对抗起义军呢？很重要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利用了台湾分类械斗的恶习，把阶级矛盾引向封建地域种姓之间的斗争。台湾分类械斗的恶习来源于内地。这种械斗风气，在福建、广东、湖南、江西诸省早已存在，大量表现为宗族之间、乡村之间以及土客之间的械斗。清康熙以来，随着内地民人大批移殖台湾，这种风习也被带到了台湾。据《台湾省通志稿》年表所列，自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这154年间，台湾先后发生了30次大规模械斗^①，小规模械斗则无从统计。如前所述，台湾的移民主要来自闽粤两省，闽人大多来自闽南，操闽南语；粤人主要来自粤东，操客家语。他们移居台湾之后，由于语言不通，风俗相异，彼此并不融洽，常常因为田土分界、水道灌溉等事的冲突，引起纠众械斗。这种械斗，不仅发生于闽粤人之间，而且也发生于漳泉人之间。械斗发生时，省与省、府与府，互相对阵，壁垒分明，所以有“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之说。但由于潮州方言与漳州方言基本相同，在械斗时潮州人常常站在漳州人一边，所以又有“潮虽粤而亦党漳”之说。^②每当械斗火种燃起，地主豪绅便从中操纵，趁火打劫，以致“哭声遍野，火光烛天，互相斗杀，肝脑涂地”^③。这种大规模的械斗，往往要持续数月以至数年之久。械斗双方由此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林爽文起义正是爆发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彰化县漳人与泉人的大规模械斗之后，由于起义军的首领林爽文、庄大田等都是漳州人，他们所率领的起义部众也多属漳籍，于是清朝统治者就利用这一点，大肆制造舆论，挑起台湾各处泉人、粤人对起义军的仇恨，把阶级斗争转向封建乡党主义地域之间的斗争。这样，他们就在短时期内招募到大量的泉人和粤人充当乡勇、“义民”，来与起义军对抗。常青在一个奏折中说得很清楚：“查漳匪作孽，泉、粤之人素与为仇，到处俱有义民共相抵御，不独现在足资保护，即将来收拿匪犯，亦可得力。”^④

① 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1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② 参见姚莹：《东瀛纪事》。

③ 陈盛韶：《问俗录》。

④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常青奏。



当然，清朝统治者利用泉人、粤人与漳州人之间的矛盾，招募乡勇对抗起义军，只是权宜之计。要想把起义镇压下去，从根本上说，还得从内地调大军压境，一举蕨事。所以常青一再奏请：宜厚集兵力，协同进剿。在常青等人的奏请下，清高宗乾隆帝一面斥责常青等的张皇畏惧，一面则迅速调遣水陆军 1 万余人分路东渡。由水师提督黄仕简带领金门、铜山驻军 2 000 人，从厦门出口渡鹿耳门；由陆路提督任承恩率领提标长福、兴化驻军 2 000 人，从蚶江出口渡鹿仔港；由海坛镇总兵郝壮猷、水师协副将丁朝雄及署福州城守参将那穆索里等带闽安兵 1 700 人，从闽安出口渡八里岔，至鹿耳门；加调延平、建宁驻军 1 600 人，由汀州镇总兵普吉保带领，福宁、铜山驻军 1 000 人，以福宁游击延山带领，赶赴厦门，以备接应；又调闽安副将徐鼎士，统领抚标游击吴秀等兵丁 1 800 人，亦随后渡海至八里岔。旬日之间，“将士云集，舳舻千里”^①。

为加强前方指挥和后方的增援，乾隆皇帝将两广总督李侍尧调补闽浙总督，常青则驰赴泉州，居中策应。增发币金 15 万作军费，发仓谷充军粮。又调福州府同知杨绍裘往署台湾府事，降调同知王隽往署水路理番同知，调黄嘉训、宋学灏、张升吉往署诸罗、彰化、凤山县知县。

与此同时，起义军方面也加紧调度部署。林爽文一面派人往内地打听消息，一面委蔡福、叶省镇守诸罗，王芬守彰化麻园庄一带根据地，王作等守竹塹，鹿仔港、笨港沿海各处亦派兵攻扰占据，“凡稍可踞占之民庄，尽为贼人所有”^②。战略物资方面：粮食主要靠战争中缴获，同时还派人到各庄摊派。军费主要“派富户出银”^③。烧炭每日专人供给^④。武器弹药大部靠缴获和捡取，一部分自己制作。两广总督孙士毅奏称：“贼人缺少火药，其炮子、枪子铸造不能如法，势难及远。每于我兵（指清军——引者）施放枪炮之后，满地拾捡铁子，用以抗拒我兵。”^⑤火药的制作，大多“从碱地上挖土煎熬成硝，以配备火药”，或“将墙上年久石灰煎成硝，以配成”^⑥，此外还“派人到深山里与高山族人换取硫磺，配作火药”^⑦。

① 佚名：《平台记》，22 页。

②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

③ 《录副奏折》第 2636 卷第 6 号，《林水供词》。

④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奎林奏。

⑤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九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

⑥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何从龙供词》。

⑦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 61，3 页。



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度部署，林爽文即乘清军大批援师渡台之前，率主力部队与南路庄大田部联合进攻府城。庄大田应林爽文之约，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二月底率部北上，与林爽文会合，首次联合进攻府城的战斗就此展开。

十二月二十九日，起义军南北路约定先会攻府城东门。“郡城并无墙围，惟以木栅刺竹环绕”^①，起义军以蔗叶枯藤，灌以硫磺等引火之物，密置城下，准备于傍晚点火焚烧城栅，趁势进攻。但因此夜大雨，计划未能实现。十二月三十日除夕，林爽文设台杀牛豕祭旗，告众曰：“今日岁除，城中必无备，众兄弟努力攻城，不克誓不归矣。”^②次日黎明，林爽文率众攻大东门，纵火焚烧城栅，台湾道永福率兵丁及乡勇万余，加砖土防堵，起义军终不能入。^③顷刻，永福令守城军反扑，一路出小东门，一路出小南门斜冲，一路从背面夹攻。起义军无备，急退，“藏伏蔗林中，被火死以千计”^④。这时，林爽文得悉清军水师提督黄仕简已率援军渡台，又闻北路彰化、竹塹失守，乃率部北上，再度攻克彰化，夺回了起义军的根据地；庄大田则率部退屯大冈山。首次围攻府城的战斗失利。

为了对付大批渡台清军，林爽文当机立断，“舍城而争险要之地”^⑤，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平台记》有一段记载说：“壬午（即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引者），林爽文自府城回大里杙。林爽文闻大兵四集，先与其众谋固巢穴。沿大里杙东南掘壕二千余丈，壕内垒土垣，以所劫枪炮列垣内。又于斗六门、庵古坑、集集埔、水沙连各要隘竖立木栅，以石筑墙，分众守之。勒派农民，每山田一亩，贼收其一而民得其九；水田一亩，民得其八而贼得其二。大里杙左右，猫雾束一带，皆膏腴地；以是贼粮充牣。又绝山坡，遏山水不能下，沿海民田不能插种，斗米数百。招民赴贼巢就食。于是彰化之北大肚溪、乌日庄、九张犁、犁头店、沟仔墘、西大庄、新庄仔、草官田，彰化之南虎仔坑、林纪埔、万丹庄、嵌顶庄、浊水庄、南北投、田中央、竹仔寮，又自大

①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4，20页。

② 佚名：《平台记》，15页。

③ 参见《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5，18页。

④ 嘉庆《台湾县志》卷5，57页。

⑤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



里杙往诸罗之水沙连、他里雾、九芎林、庵古坑各处，皆贼巢也；纳贼粮，服贼役。其民皆于顶发外又留发一圈，以为识别。”^①很明显，林爽文的这些措施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为起义军日后的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外，林爽文对起义军的士气也进行了整顿。按照天地会的会规，林爽文召集各部首领，再次号令：“自今以后，各兄弟生同乐，死同归，有异心，天罚殛之。”^②总之，为了迎击清军渡台援师的反扑，起义军在战略布局上迅速进行了调整，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也都做了必要的准备。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一月，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领兵1万余，先后渡台。

黄仕简抵台后，即遣海坛镇总兵郝壮猷，率副将丁朝雄、参将那穆索里、游击蔡攀龙、都司罗光焰等带领兵丁2300余人前往南路，以期收复凤山；命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率参将潘韬，游击李隆、杨起麟、林光玉，守备邱能成等带兵2200余人前往北路，以期收复诸罗、彰化等地。

一月十九日，郝壮猷率部至府城东南之大湖，与冈山相望。起义军庄大田部闻清军至，伏冈山后。郝壮猷见“密箐中旗帜飘飏”，不敢前进。夜半，起义军数千围攻郝壮猷兵营，清军大惊，枪炮齐发，双方激战至达旦，起义军乃退。庄大田屯兵冈山，不时向郝壮猷挑战，“对其面埋锅造饭，肆无忌惮”，并扬言“欲日夜酣战，以决雌雄”^③。郝壮猷困于大湖二十又四日，不能前进一步。黄仕简见南路无进展，又调福宁镇游击延山领兵1000人，安平游击郑嵩领乡勇及水师协济，由海道至打鼓山登岸，绕至凤山南围袭庄大田，庄大田乃率部退至桥头仔、水底寮。二月二十一日，郝壮猷进入凤山，但所得仅一座空城。

三月六日，庄大田又率大队猛攻凤山县城，清军发炮抵御，起义军佯退，清军乘机出城，起义军从四处合围，俘获清兵不计其数。八日，起义军以所获清军衣帽着之，混入县城，约定以放火为号，发起进攻。傍晚，南门火起，起义军蜂拥入城，郝壮猷乘马从西门逃遁，清军溃奔打鼓港。起义军乘胜追击，“官兵挤于海，死者大半”；总兵郝壮猷、参将那穆索里等“皆夺渔船逃回郡城”；千总以

① 佚名：《平台记》，30~31页。

② 同上书，31页。

③ 同上书，28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

下溃散无着者 23 员；兵丁 3 000 人，溃回者仅 600 人。^①至此，庄大田再克凤山，南路起义军之势“益猖獗不可制矣！”^②

北路方面，柴大纪率部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一月二十一日攻入外三部竹地方，起义军抗击失利，护驾大将军廖东等被俘。二十二日，柴大纪进抵田洋，与林爽文部展开激战。自酉至午，起义军奋勇抗击，高山族兄弟也英勇参战，由于清军炮火猛烈，起义军伤亡甚多，首领侯辰、陈模、黄启、吴章、林老等及战士 80 余人被俘。田洋战斗失利，起义军退守诸罗，孤立无援，处境困危。柴大纪乃乘势进军，以鹿仔草武举陈宗器统同安乡勇为前导，以双溪口武举黄奠邦统领乡勇接应，于一月二十三日攻陷诸罗城。为加固诸罗城的守防，柴大纪即在诸罗环营开沟，堆筑围墙，并安设了 28 尊大炮。

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抵台后，以鹿仔港为据点，分遣各部进攻彰化。一月十一日，派游击穆腾额、守备潘国材带兵 500 人，由员林进攻中路南投各庄，游击海亮带兵 300 人并乡勇等进攻南路嵌顶各庄，守备常万雄带兵 300 人进攻北路北投各庄，又派都司马元勋带兵 300 人驻扎大加冬，以防堵浊水溪后路。在各地起义军的顽强抗击下，他们多先后退回鹿仔港。起义军首领陈泮、吴领等，还在彰化南山虎仔坑、万丹城一带联合高山族人民，不时向鹿仔港发起进攻，驻守大里杙的起义军也对鹿仔港多次发动进攻^③，迫使任承恩急向府城呼救。黄仕简即命普吉保领兵 1 700 人，副将徐鼎士领兵 1 000 人，赶赴鹿仔港。二月初一日，普吉保自府城出发，绕道由海边北上，起义军袭其尾，普吉保及其部众仓皇窜逃，丢失大批军装并车辆 11 辆。^④普吉保至鹿仔港，即与任承恩“深沟高垒，以屯守为计”^⑤。徐鼎士则在艋舺以北，“兵分力弱，被贼牵制”^⑥。

由上述情况可见，自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一月至三月，清政府虽然调福建水陆提督率援师 1.3 万余人渡台，但并没有解脱他们在台湾的困境。在起义军的奋力抗击下，“威名赫赫”

^① 参见佚名：《平台记》，38 页。据常青奏称：“郝壮猷带兵丁二千余名，被贼冲散。该总兵及副将以下等员先后奔回，止存残兵四百余名。”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

^② 佚名：《平台记》，38 页。

^③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

^④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佚名：《平台记》，29 页。

^⑤ 嘉庆《台湾县志》卷 5，58 页。

^⑥ 佚名：《平台记》，34 页。



的黄仕简只得坐守府城^①，任承恩困于鹿仔港，其他各镇将“亦皆观望迁延，不思争先贾勇”^②。当时，台湾有揭之通衢的民谣曰：“黄公大臣，提督军门，一策莫展，寸步难行。”^③这是对清朝统治者所处困境的形象概括。

在这样的困境下，清高宗乾隆帝发出谕旨：以黄仕简、任承恩“调度失宜”、“贻误军机”，解刑部治罪；将郝壮猷于军前正法。^④又诏两广总督李侍尧调任闽浙，常青以湖广总督渡海督师。

三月初九日，常青抵台。他察看了台湾的军情，在一个奏折中说：“今臣亲至台湾，得诸目击，始知彰化、诸罗、凤山等县，被贼攻陷，焚劫已空。而又以裁竹为墙，无险足据。故贼闻官兵将至，即舍城而争险要之地。官兵既已入城，因即以克复城池咨报。如柴大纪一到诸罗，贼仍占据斗六门，使我兵南北两路至今不通。并闻普吉保带兵前赴彰化，中途被劫车辆，则道路梗塞，较前更甚。任承恩带兵由鹿港登岸后，既不驻扎彰化县城，以逼贼巢，又不与柴大纪夹攻斗六门，惟知退守鹿港。……臣于三月初九日到台湾之时，已闻初八日郝壮猷所带兵丁二千余名，被贼冲散。……副将徐鼎士前到淡水，未见寸功。……台湾贼匪，从前止有首逆林爽文、王芬等数人，从贼者亦止附近贼巢数千人。今则南路险要各处，有贼首庄大田、庄锡舍、王坑郎、蓝九荣、陈灵光、陈建平等；北路险要各处，贼首林爽文之外，又有陈泮、吴领、蔡福、叶省等。……凡稍可踞占之民庄，尽为贼人所有。惟府城、鹿仔港、笨港沿海三五处，亦屡有贼来攻扰。……臣查台湾额驻兵丁，经三县被陷，伤亡已多，尚未据该镇查报实数。然约略存剩之兵，似不堪用。其内地调到兵万余，各路打仗又多损失，当此贼势蔓延，必须添调重兵，方能痛加剿洗。”^⑤常青的这个奏折，基本上概括了黄仕简、任承恩率援师渡台以来的作战形势，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清军在各地节节败退、伤亡惨重的情况，指出了起义军势力得以继续蔓延的重要原因

^① 黄仕简，福建漳州平和县人，袭其祖黄梧爵为一等海澄公，累官水师提督。据记载：“自乾隆四十七年以来，台湾有事，仕简无不躬自请行，事旋定，以是名望日起。”见佚名：《平台记》，24页。

^②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

^③ 佚名：《平台记》，38页。

^④ 参见《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上谕；《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钦差湖广总督常青奏。

^⑤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

就在于：他们在清军援师大批渡台之际，迅速争得险要之地，控制了南北各路重要据点和根据地。常青认为，欲图拯命，挽救危局，“必须添调重兵”。

然而，正当常青请调重兵援台之际，起义军又出其不意，南北两路再度合攻府城。这时，南路庄大田部由于再克凤山，夺得清军大批枪炮器械，实力大增。于是首邀北路大武陵、南仔仙许尚等部合攻府城，同时又捷告林爽文率部南进，实行三路合围。三月二十三日，庄大田率部攻府城小南门桶盘栈。二十四日，陈灵光、谢桧率众焚府城东路新化里，直逼草店尾。二十七日，大武陵许尚、陈聘率众攻小北门、柴头港，庄大田又派庄锡舍攻小南门，林爽文遣其弟林勇率1000余人至大目降攻大北门，并约庄大田克期攻城。当是时，南北各部会合，“号称十万”^①。常青急令浚沟壕，修城栅，派游击蔡攀龙领兵900人固守桶盘栈，游击曾绍龙、守备李步云领兵600人守东门外草店尾，游击邱维扬、守备林象新领兵700人守北门外柴头港，副将丁朝雄领兵300人防护海口，参将潘韬领兵500人守城中，守备王天植等守小东门和小南门，常青则在大东门督战，并召集乡勇数万人出城助战。起义军环攻清军，旗帜分列，枪炮如雨，并有高山族妇女金娘充女军帅，持剑在山头念咒打鼓，“假说郑王（即郑成功——引者）显神助战”，“神人保佑，不受枪炮”^②，以鼓舞士气。双方交战竟日，清军饥疲无人色，纷纷败退入城。城中大乱，盛传“贼已破城”，众皆逃往海口。^③ 常青“战栗不能举鞭，大呼曰：‘贼砍老子头矣！’策马而遁”^④。

府城将陷之际，在起义军内部，出现了庄锡舍率部倒戈降敌的严重事件。庄锡舍，泉州晋江县人，渡海后籍居台湾凤山县埤头庄。林爽文起义爆发，庄大田在凤山纠漳州人响应，庄锡舍则纠泉州人，其势与庄大田不相上下。由于众推庄大田为南路主，号令皆出于庄大田，庄锡舍即心怀不满。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间，南路起义军再克凤山时，庄锡舍出力居多，更负功不相下。时庄锡舍有

① 佚名：《平台记》，40页。

② 金娘，高山族妇女，居凤山县上淡水庄，能画符治病，加入庄大田部后，因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一月攻克凤山有功，被封为“女军帅”。三月攻府城，持剑督战有功，封为“一品柱国夫人”。四月与王坑郎守南潭，被庄锡舍俘解北京，英勇就义。参见《录副奏折》第2636卷第1号；《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六月《金娘供词》。

③ 参见佚名：《平台记》，41页。

④ 《福康安、柴大纪平台传》，见徐珂：《清稗类钞》，第6册。



亲属庄子才充任台湾道吏，与庄锡舍通信来往不绝，庄大田疑之，庄锡舍更愤愤不平。台湾道永福知其有隙，嘱庄子才以书招降，庄锡舍允诺，乘攻府城战酣，即倒戈请降。^①庄锡舍率部叛降，反映了双方斗争之激烈。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危局，不仅以武力增援，而且还在起义军中收买不纯分子率部叛变，以瓦解其内部。同时，此事也反映出起义军本身的严重弱点。

庄锡舍的率部降敌，削弱了起义军合攻府城的有生力量，特别是扰乱了军心，使起义军攻城的锐气受到严重挫折。庄大田见庄锡舍降敌，恐生巨变，即收兵回南潭。林永、谢桧、许尚等见庄大田收兵，也各自从阵地撤退。于是，起义军就丧失了一个有利时机，使府城将克而未克。

起义军再度合攻府城失利，使清朝统治者又得到一次喘息机会，重新调度力量。五月，常青请调援师 8 000 人（其中广东兵 4 000 人，浙江兵 3 000 人，满洲兵 1 000 人），由参将恒瑞、蓝元枚率领，对起义军南北路分别发起进攻。

五月十五日，以总兵梁朝贵、魏大斌为前锋，副将谢廷选、蔡攀龙为左右翼，以庄锡舍为向导，先后发满、汉兵 5 500 人，围攻南潭庄大田。庄大田闻清军至，联络大武陇许尚、陈聘，本县庄布袋尾谢桧、陈灵光等，率众数千人在南潭掘壕树栅，顽强抵抗，梁朝贵进攻受挫，乃退屯关帝厅。十七日，常青以全力攻南潭，起义军分三路迎击，击毙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及兵丁数十人。为此，常青受到乾隆帝的严厉斥责，南路起义军则趾高气扬，“往来大武陇、南潭，不复有所忌惮”^②。

常青在南路受挫以后，复请调援师 1 万余人，北上进援诸罗，双方为争夺诸罗又展开激战。

诸罗位于台湾中部，为南北要冲，诸山罗列，形势险要，诸罗之名由此而得。^③它是起义军与清军双方必争之地。对起义军来说，它既是彰化根据地的屏障，又是截断清军南北交通的关卡。林爽文举事之初，军师董喜就指出：“我往攻郡城，柴大纪必蹙我之后，且或乘虚捣我巢穴。巢穴一失，大事去矣。今用兵当自诸罗始。”^④所

① 参见嘉庆《台湾县志》卷 5，58~59 页；佚名：《平台记》，42 页。

② 佚名：《平台记》，51 页。

③ 参见康熙《诸罗县志》卷 1；《台湾全志》下册，627 页。

④ 佚名：《平台记》，52~53 页。

以，林爽文一克彰化，即攻诸罗，并派要员留守。后来，诸罗虽被清军夺回，但诸罗城外各险要之地，始终由起义军占领。如诸罗东南之斗六门，东走水沙连，北通大里杙，历来称为“邑右之外障”^①，一直被起义军控制。此外，如草店尾、三坎店、大埔林，以及围绕诸罗城大小数十村庄，也多被起义军占领。对清军来说，他们也认识到诸罗之重要。柴大纪说：“诸罗，府城北障，诸罗失则府城危。”^②因此，他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一月起，就困守诸罗。

诸罗争夺战，实际在当年四月即已开始，林爽文曾三次向诸罗发起进攻，因冲锋的“枋车”被清军炮火击毁而退兵。六月中旬，经过厚集兵力，起义军再次向诸罗发起猛烈进攻。林爽文亲自率部众1万余人袭击诸罗四门，“必欲陷之，昼夜围攻”^③。常青见诸罗危在旦夕，先派总兵魏大斌领兵1500人，由海口往诸罗；后调游击田蓝玉领兵1000人增援。起义军在诸罗城西南之埔心、大仑庄堵截，清军发炮轰击，林爽文的重要部将、天地会首领蔡福、叶省中炮阵亡。起义军冒死猛攻，清军魏大斌等部败退鹿仔草营盘。七月初三日，总兵魏大斌自鹿仔草请调援师，常青以侍卫二人及参将特克什布、张万魁领兵前往。十三日，魏大斌率众4000人自鹿仔草向诸罗进发，起义军“放水满田，又将田埂削窄，以致官兵不能结队前进”^④。魏大斌命部众鱼贯而行，因起义军于道上遍插竹签，兵行益惶恐，临近诸罗之倒店，起义军呐喊齐至，前后夹击，清军溃不能挡，多弃械而逃。这次战斗，起义军缴获大批粮饷弹药，击毙清军千总5人，把总6人，外委6人，武举兵丁1100余人，乡勇100余人。参将张万魁弃马逃奔三苞竹，足蹶卧田间，得乡勇救而免死。

争夺诸罗的激战发生在夏季，台湾各地淫雨连旬，水平四野，道路泥泞。这样天时地利，对起义军十分有利。他们熟悉地形，习惯于当地的气候，不时乘雨向清军发动袭击。在战斗中，他们经常“赤足泥泞中，往来如飞”^⑤；而清军则“徒涉或蹶踣”，“军装尽湿，枪炮莫施”^⑥。又因入夏以来，清军久困于营，疫病大起，“自内地来者，十病五六”^⑦。副将林天洛，参将廖光宇，游击双德、易连，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福康安奏。

② 连横：《台湾通史》，560页。

③ 魏源：《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

④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⑤ 佚名：《平台记》，52页。

⑥⑦ 道光《彰化县志》卷11，19页。



守备王雄铁、金彪、方淇，先后病死。兵丁死者日数十人。诸罗城内自七月以来，“粮饷药铅皆尽，贼围之数重，情形几不可终日”^①。为此，乾隆帝于七月十八、二十一日连续降旨，严厉斥责常青，并令其领兵直趋北路。

八月十六日，常青“遵旨”北上，起义军乃乘虚攻府城。常青见府城受敌，复退兵困守府城，改派副将贵林、蔡攀龙，参将孙全谋，游击杨起麟、邱能成援诸罗。贵林等领兵 2 100 余人，分三队进至半天厝，起义军分三路迎击，围贵林等于大仑庄。杨起麟又率兵往援，时大雨如注，溪水陡涨，道路泥泞且被起义军铲窄，清军行至倒店、竹仔脚，遭袭击，首尾不相救。贵林、杨起麟等皆战死，阵亡千总以下 18 人，兵丁 700 余人，乡勇 100 余人。蔡攀龙、孙全谋等虽至诸罗，但所带官兵 1 266 名，溃散过半，器械、粮饷尽为起义军所有。^②

八月二十五日，常青又派福州将军恒瑞统兵 3 000 人，由海道往诸罗，行至盐水港，因迁延观望，遭起义军袭击，损失过半。九月以后，常青还派总兵普吉保、梁朝贵等领兵数千援诸罗，但“诸罗之围，终莫能解”^③。

自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六月以来，常青先后四次调兵增援诸罗，总数达五六万人，多被起义军击溃，致使诸罗孤城坐困，十月以后，粮草俱尽。柴大纪在一个奏折中说：“九月间米谷已尽，官兵、义民以花生、地瓜为食；十月内又以油糝、蕉根充饥；……至本月（即十一月——引者）初二日，油糝、蕉根亦将无有。兵丁饿病相兼，正在危机，时刻望救。”^④ 很可惜，起义军却未能抓住这个时机，及时攻下诸罗。就在这年十月，乾隆帝解除了常青、恒瑞之职，以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嘉勇侯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拣派曾经战阵之巴图鲁、侍卫 100 余人，征调 10 万大兵，米粮 100 余万石援台。从此，台湾的战争形势，就发生根本变化。

这一阶段的战争，历时十二个月（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底至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起义军在这一阶段击溃清军援师数万，杀

① 佚名：《平台记》，63 页。

②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柴大纪奏，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柴大纪奏，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福康安奏。

③ 道光《彰化县志》卷 11，20 页。

④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柴大纪奏。



死杀伤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营官 100 余人，打退了清军数十次反扑，坚守了上阶段所夺取的大部地区。起义军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战果，在战略战术方面，主要发挥了以下几点优势：

1. 战略上，在清军援师大批渡台前，首先争夺了险要之地，实行分兵把守，各方配合，及时截击和牵制了敌军的主要力量。南路方面，庄大田屯兵凤山，分派各部围绕台湾府城扎营，给府城造成“肘腋之患”^①。北路方面，林爽文屯兵彰化，分派各部驻守淡水、鹿仔港、诸罗，使府城以北大小村庄，都在起义军势力控制之下。清军援师渡台向南北路反扑时，起义军即各据要地，群起阻击，使清军到处陷于挨打困境。正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七月十五日的谕旨所说：“林爽文牵缀北路，庄大田牵缀南路，使我兵奔走不暇，而贼势转得联络。常青等为其所愚，击东应东，击西应西。譬之弈棋，贼人著著占先，而官兵止办接应。”^②虽然清军援师数万，但由于起义军的多方牵制，声东击西，就造成其“分之则寡”^③，“散之则力薄”^④的被动局面。其次，起义军控制了台湾的交通要道，“凡大路紧要地方，防拒甚密”^⑤。特别是长期切断了府城与诸罗之间的交通，使其“文报不通，连差密探，总无音信”^⑥。诸罗被围数月，“粮饷两缺，铅药不足”^⑦，“民食草根、豆秸”^⑧。此外，起义军还有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他们在大里杙等处占据了大片耕地，储备着粮草，并以此招引周围群众。台湾同知杨廷理禀称：“诸（罗）、彰（化）灌溉，向藉内山之水，架木筑坝，用为汲引。而贼匪诡计多端，尽行拆毁，以病民食。北路本系产米之区，被贼焚抢后，刻下鹿港米价腾贵，每石三千。而贼巢大里杙、水沙连等处，窝积甚多，每石仅需八百。各贼匪藉以收拾人心，故贫穷而贪生者，俱为纠入。”^⑨

2. 战术上，善于扬长避短，机动灵活。他们经常声东击西，倏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八日湖广总督常青奏。

② 佚名：《平台记》，63~64 页。

③ 《录副奏折》第 2625 卷第 11 号，台湾同知杨廷理禀。

④ 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 84。

⑤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蒋挺供词》。

⑥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柴大纪奏。

⑦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柴大纪奏。

⑧ 道光《彰化县志》卷 11，20 页。

⑨ 《录副奏折》第 2625 卷第 11 号，台湾同知杨廷理禀。



分彙合，昼伏夜起，冒雨进攻。当然，这样机动灵活的战术，首先是以周密的谍报为前提的。起义军通过各种渠道探知清军动静，及时采取对策，使清军感到神秘莫测。正如福康安的谋士郑光策所说：“闻前此我兵之举动贼皆周知，而贼兵之虚实我反不测。又如凤山陷时，闻贼有决流灌军、借甲赚城之事；及东城之战，又为坑陷以诱我师。此贼用间用奇，而我谋之不周之失也。”^① 其次，灵活的战术，还必须以严密的军纪和迅速的调遣为条件。关于林爽文起义军内部调度的情况，过去我们知道得很少。很幸运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还保存着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至八月这一时期林爽文起义军将领所发布的10余件军令原件。这些军令具体反映了起义军的军纪和调遣状况。这里，我们按时间的先后，摘选出起义军副元帅兼左都督林水返和靖海侯许尚发布的五项军令的主要内容：

（1）顺天丁未年（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林水返令：“本月十四日，奉大盟主钧札指示，现诸属一带义民庄社，被我军剿洗甚多。兹叛匪逃聚在鹿港，纠集残凶，早晚欲以（与）我军决战。飞飭各旗将军兄弟，时刻防固，以备无患等因。奉此。合行传知番社口赖将军权兄知悉：尔辖下旗脚^②若有逃往别庄，速即单吊到营点齐，修整器械，早晚巡哨，以防不测。倘有敌匪来侵吾境，速行奔报，以备迎敌，不可疏忽怠误。火速！火速！”^③

（2）五月十五日林水返令：“单付南头、快官、牛埔仔、番社口各旗将军知悉：现大雨淋漓，溪水涨满，诚恐港恶敌匪蜂拥猝至，尔等将军守驻隘口，宜加严谨守御，亦可传齐尔辖下各兄弟，于明日乘早饱饭点齐，各执军器，俟候防守，毋得一人躲避，须同心协力谨守，以奏厥功。”^④

（3）五月二十二日林水返令：“单传番社口庄将军赖权兄知悉：兹现天晴之际，近日必有敌人来侵，尔须点齐辖下兄弟，定于今夜四更饱饭，五更赶到柴坑仔屯扎，以防敌人突侵。务必照时赶到，以免疏虞。……明日行军须肃静，不许放铙。俟本帅旗处响大炮三声，方许回军。”^⑤

① 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4。

② 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军的头目称旗头，兵士称旗脚。

③ 《录副奏折》第2600卷第14号，《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④ 《录副奏折》第2600卷第9号，《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⑤ 《录副奏折》第2600卷第11号《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4) 五月二十三日林水返令：“单付番社口庄赖权兄知悉：本月二十三日奉大盟主军令札到，命尔点齐辖下众兄弟，于此月二十四、五、六、七一连四日，俱应于每夜四更饱饭，各带饭包，赶至柴坑仔隘口守把，以防敌人犯界。尔为将军，必须亲身督阵，人马均应出，各宜尽心竭力。如果敌人来侵，须率兄弟向前冲杀，使他片甲不回。”^①

(5) 八月，南路庄大田部约北路军合攻府城，八月二十三日北路诸罗地区起义军首领靖海侯许尚发给子龙庙命令：“书致子龙庙该耆老知悉：今、昨日之阵，已经被狡匪耻笑，非无人可抵敌也，特无如我子龙庙之兄弟，人强马壮。故今日之事，特修息前来，伏冀劝谕沈尤三大哥，并我庄中列位兄弟，立刻传齐，各执利锐军器搥刀、藤牌、火銃，速到海埔大营，以应今日南路众兄弟破郡之约议也。”^②

根据这些军令的内容，结合当时的战争实况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林爽文起义军内部的调度和军纪，确实是比较严密的。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起义军作战机动灵活，与他们英勇顽强、吃苦耐劳的作战精神也是分不开的。台湾的地形复杂，“山林丛杂，溪谷险隘”，很不利于军队的调度。台湾的气温高，湿度大，更不利于战争。尤其是夏季，经常雷电交加，大雨倾盆，造成溪水溢涨，道路泥泞。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起义军“不畏艰险，登涉攀缘，皆属历练”^③。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老天的雷雨出击，在泥泞道上冲锋，“便捷如飞”^④。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3. 策略上，起义军比较注意争取清军统治区域内的群众和瓦解清军、乡勇的工作。他们经常在前沿阵地对清军宣传喊话，“日日喧嚷，以乱军心”^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七月，在围攻诸罗城的战斗中，为号召群众消灭贪官、擒拿柴大纪和天地会叛徒地主武装头目黄奠邦，林爽文专门发布了一道文告，文告说：“照得本盟主因文武贪污，剥民膏脂，爰举义旗，共灭剿除，以快人心。詎叛匪黄奠邦等串同残官柴大纪，鼓谋煽惑尔等军民，猖狂抗拒，累害百姓涂炭。兹本盟主现在亲统雄兵亿万，勇将数千员，会同南路统帅匝围攻困，诸城虽未破陷，不过釜底游鱼，苟延一息，指日便可歼除。第念尔等

① 《录副奏折》第2600卷第5号，《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② 《录副奏折》第2600卷第6号，《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③④ 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4。

⑤ 《福康安、柴大纪平台传》，见徐珂：《清稗类钞》，第6册。



官兵、义民，悉系被柴大纪、黄奠邦等煽惑威迫，误坠术中，非出本心。业经体量俯怜示谕，招安归庄……仰诸城内外官兵、义民，各省诸邑人等知悉：尔等务须见机而作，相时而行，亟速猛省回头，勿执器械，空手撤逃出城，归庄安耕，勿得惊惶。如能将残官柴大纪生擒献功者，不论官兵、义民，各省人等，俱皆赏银二万元，官封公侯之列。如能斩其首级献者，赏银一万元。”^① 这个文告具体反映了起义军在战争中所采取的舆论攻势和斗争策略。这种宣传攻势和斗争策略，在争取群众、分化瓦解清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连乾隆帝也不得不承认起义军“散布流言，懈我军心”的威力。^②

但是，这一阶段起义军的战略和斗争措施，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战略上，由于实行分兵把口，兵力分散，在围攻诸罗、府城等重大战役中，力量单薄，致使诸罗、府城长期攻而不克。由于兵力过于分散，在调度上也造成一定的困难。

在斗争措施上，林爽文虽然注重了对清军展开政治攻势，以分化瓦解其内部，但有时又不能妥善运用这个策略。最明显的是，起义军围攻诸罗日久，城内粮食困难，民众不断出城偷粮，起义军对这些群众不但不招抚争取，反而一律加以处死。这样，就增加了他们攻城的阻力。《彰化县志》有记载说：“贼营米粟堆积，民出偷米者获见，爽文必杀，又赏贼之能获偷米者，于是民甘守城终不破。”^③ 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却转而策反起义军，恒瑞就派人招降起义军首领李七，李七“虽围诸罗县城，而私卖粮米接济城内”^④，使清军困而不死。

值得注意的是，起义军的这些严重弱点，没有及时加以克服；而清朝统治者却从这一阶段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福康安抵台后，纠正了清军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加之大量兵力和物资的增援，战争形势就发生根本变化，双方即由相持阶段迅速转向起义军的退却和失败。

（三）起义军的退却失败阶段

福康安渡台以前，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平台事宜”展开了一场讨论。在众多的意见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他详细分析了台湾的战争形势，总结了第一阶段清军作

① 《录副奏折》第2600卷第2号，《林爽文告示》。

② 参见《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谕。

③ 道光《彰化县志》卷11，20页。

④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二十九日上谕及《李七供词》。

战失利的原因和教训，从而向福康安提出渡台用兵的五点建议：第一，出奇兵以覆贼巢，第二，招义勇以厚兵威，第三，通广庄以分敌势，第四，专逆魁以速蒞事，第五，明约束以收人心。这五点建议的中心意思就是：在战略上，要厚集兵力，进攻起义军的根据地；在策略上，进一步利用封建地域观念，挑起闽粤民人的矛盾，从而广招乡勇，分化起义军内部。福康安果然采纳了郑光策的这些建议，在平台战略部署上迅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首先，请准厚调兵力。除原驻台湾的兵丁外，他考虑到台湾山深箐密，路径崎岖，特别加调了四川屯练番兵，以及曾调赴金川军营善于驰涉山险的湖广、贵州兵丁，“合计征调各兵不下十余万”^①，陆续启程渡台。其次，大量拨运军饷弹药。先后从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等省拨运米 100 余万石，以充军粮。火药器械等亦源源运送。再其次，确定了先平台湾北路后平台湾南路的作战方针。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十月底，福康安、海兰察、鄂辉、舒亮、普尔普等统领巴图鲁、侍卫及湖广、贵州、广西、四川兵，自崇放洋，“楼船千艘，旌旗蔽海”。十一月初一日，福康安在鹿仔港登岸。

福康安抵台后，第一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诸罗，解诸罗之围。在向诸罗发起进攻之前，他将原驻台兵力做了一番调整。先调守番仔沟之兵移马鸣山；后调马鸣山之兵驻鹿仔港；再挑选精壮数千由舒亮率领，分两路佯攻大里杙，以牵制起义军主力。又派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 20 余人至八卦山侦察。因八卦山地势较高，距大里杙仅 30 余里，为前往大里杙必经之地，林爽文在此竖关设卡，支架大炮。福康安则亲自带领广西兵及四川屯练番兵 5 000 余名，又从普吉保营内挑选得力兵丁 6 000 余名，另带乡勇 1 000 余名，分五路进攻诸罗。十一月七日，清军至元长庄。八日至仑仔顶，连续攻下仑仔顶、柴林脚、西势、潭仔、三块厝、海丰庄等处，并将各庄民房尽行烧毁。起义军仓促退往牛稠山。牛稠山距诸罗县城仅 7 里，起义军 2 万人驻守山梁，负山隔溪，山后围以竹栅。海兰察先率马队越过大溪，冲入起义军阵地，枪箭齐发，抢占山梁，然后攻破竹栅。柴大纪在诸罗闻援兵至，率众出城接应。海兰察即于当晚酉刻率部进入诸罗城。接着，福康安也率大部由新埤进入诸罗，被起义军围困五月之久的诸罗城，至此才得以解围。

^① 佚名：《平台记》，76 页。



诸罗解围之后，林爽文即率部退守中林、大埔林、大埔尾、庵古坑、斗六门等处。福康安乃乘势分兵进逼。命恒瑞、普吉保等进攻大埔林，鄂辉、袁国璞等进攻大埔尾，左右并进。海兰察带领额尔登保、穆克登阿、张朝龙等专攻中林。福康安则带领张芝元等前后策应。大埔林、中林等地很快失守。清军追赶 20 余里至庵古坑，此处原为起义军首领蔡福的根据地，周围挖壕立栅，内筑土墙，外钉木板，防守坚固。福康安等带兵冲破栅墙，攻占了庵古坑。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军进至斗六门，起义军在此决水以阻，并于山道隘口开挖坑陷，密布竹签。福康安乃绕道由稻田行走，四面合围，斩竹破卡，攻破了斗六门。接着又攻克水沙连、虎仔溪、万丹庄、南投、北投等地。斗六门被破后，林爽文即退守大里杙。

大里杙原是北路林爽文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它东倚高山，西面大海，南北有溪河阻隔，林爽文举事以来，一直有重兵在此恃险把守。早在这年四月，常青率清军援师渡台前，林爽文即命部众在大里杙“掘壕放水，复筑土墙，安设炮位”^①，以防不测。从斗六门败退至此以后，他更是“高垒土城，列巨炮，内设木栅两层，外溪砧重叠”^②，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场激战在大里杙展开。福康安先派海兰察为前锋，傍晚进攻大里杙。林爽文率数万部众迎击，满山列炬如白昼。起义军自山梁俯冲而下，与海兰察部厮杀，互有死伤。福康安领大队兵马至，起义军复登山梁，排列枪炮，更番施放，“呼声震山谷”^③。福康安分兵两队，从西南、西北夹攻。起义军抵抗不住，即纵火烧山，乘势由火焰山退入内山集集埔。这场激战自二十四日暮至二十五日黎明结束，大里杙失陷。在这场战斗中，起义军张火、林素、林成、林快等 200 余将士牺牲，刘怀清、蒋挺、林茂、何从龙等被俘，损失大小炮 160 尊，鸟枪 230 余杆，稻谷 6 000 余石，牛 800 余头，其余器械物资均被清军所获。^④

集集埔为内山隘口，前有大溪，四周大山重叠，林深竹茂，路径丛杂，形势险要。林爽文预为退守地步，早派人在此临溪设卡，据险把守。大里杙战斗失败，林爽文退守于此。他们就在陡崖上垒砌石墙，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三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② 道光《彰化县志》卷 11，25 页。

③ 佚名：《平台记》，83 页。

④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福康安奏。

中国近代史研究

断木横塞道路，并于北山草岭安设哨卡，防守极为严密。十二月初七日，福康安遣普尔普等绕山来攻，派海兰察率巴图鲁等乘马涉溪配合。起义军在营盘墙内连放枪炮阻击，清军排枪前进，并用大炮轰击，双方相持不下。福康安、鄂辉乃督湖广、贵州兵及四川屯练番兵增援。屯练番兵泅水而过，攀援而上，推倒石垒，拥入墙内，枪炮齐放。起义军作殊死战，“堕崖赴壑，淹毙无数”。^①集集埔失陷，林爽文率众退奔小半天山。这场战斗，起义军牺牲2000余名，被俘100余名，损失大小炮26尊，鸟枪197杆，刀矛945件，铅子4.8万颗。

集集埔战役是双方决定胜负的关键一仗，经过这次拼搏，北路起义军已大伤元气，林爽文除带领数千余众退走外，其余都溃奔四散。这时，福康安便决定派人入山招降百姓和溃散起义军，“其自首者许令免罪”。为防止起义军余众从内山各山道隘口外逃，福康安命普尔普驻守科仔坑，普吉保守林圯埔，叶有光守藤湖口，谢廷选守流藤坪，舒亮守龟仔头，格绷守清水沟。另派副将张芝元带领兵丁1000人入山援应。在四面包围、步步进逼的情势下，内山百姓和溃散起义军投出者达5000余人。起义军首领陈泮、欧旅、阮和、陈沟、黄宽、黄瀚、杜敷也相次出降。^②其中杜敷的出降，对林爽文是个致命打击。因为杜敷系高山族“番社”壮丁，担任通事，与乡勇头子知府衔杨振文有密切关系。杜敷加入天地会起义军后，一直被林爽文重用。林爽文退入内山时，即将其父母妻弟等托杜敷送往水里社隐藏。清朝统治者探知杜敷与杨振文的关系，便通过杨诱降杜敷。杜敷投降清军后，不仅带领副将张芝元往水里社逮捕了林爽文的父亲林劝、母亲林曾氏、弟弟林垒、妻子林黄氏，而且还协同清军威逼尾鳌十八社“生番”（即内山高山族）堵截了起义军入山之路。

林爽文退据小半天山后，便在山巅搭盖草寮，垒石为墙，外加木栅，并断树塞路，以为久据死守计。这时，乾隆帝连降谕旨，命福康安带兵亲入内山，擒拿林爽文。十二月十八日，福康安分三路进兵。福康安与鄂辉带领特勒登彻、穆光登阿、袁国璜及巴图鲁、侍卫为一路；海兰察、恒瑞带领普吉保、许世亨、春宁及巴图鲁、侍卫为一路，俱由山路进攻。普尔普带副将张芝元、参将吴宗茂、骑都尉陈大恩、都司刘怀仁率领广东兵丁等为另一路，绕过大山，

^① 参见道光《彰化县志》卷11，26页；《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50，乾隆五十三年一月十一日福康安等奏。

^② 参见佚名：《平台记》，86页。



夹攻于后。三路清兵进至半山时，起义军一齐压下，投石放枪，但屯练番兵蚁附而上，砍栅而入，杀死起义军 100 余人，俘获头目林追、林二、林添、孙东海、王若敬五名，木栅草寮全被焚毁。林爽文带领 6 000 人又退至埔里社、埔尾等处。据杜敷报称，埔里社至埔尾，因东南一带奎奎等社“生番”堵截严密，林爽文只能向北逃走。福康安乃带兵堵住隘口，沿山搜查，并令各番社“生番”一体截拿。至十二月底，共捕杀起义军 6 000 余人。据福康安等奏报，狮子头社一带山沟内，“贼尸纵横遍地，数里不绝，而河内淹毙之贼亦多”^①。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一月初四日，起义军大元帅林爽文、副元帅林水返、军师陈梅、大都督林领、都督何有志等 40 余人在老衢崎被俘，福康安派舒亮带领弁兵，将林爽文等装入木笼押解赴京。至此，台湾北路起义被瓦解平定。

北路既平，福康安乃分兵 4 000 余名在以下地方留守：普吉保驻东埔蚶，游击夏承熙驻斗六门，都司田智驻南投，副将徐鼎士驻大里杙，都司陈士份驻彰化，都司朱龙章驻淡水。其余兵力全部调赴南路，围剿庄大田的起义军。庄大田部原来主要在凤山县、水底寮、大目降一带活动。北路起义军失败后，庄大田即率部退聚大武陵山内，以为负险坚守之计。大武陵地方，四周大山围绕，溪深岭峻，内有 40 余村庄，为南路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福康安为围歼庄大田部，先命山猪毛乡勇严守旂尾庄等要隘，堵截庄大田部往凤山之通道；命永庆等由府城往攻水底寮，以为牵制；蔡攀龙驻扎湾里溪，乌什哈达驻扎哆啰咽，梁朝桂驻扎白水溪一带。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一月十四日，福康安分兵三路进攻大武陵：普尔普等由大排竹进山，直趋大武陵北面；鄂辉等由西面哆啰咽、洗布埤一带进剿；参将特克特什布、游击叶有光沿山搜捕；游击吴秀在后接应。庄大田与林爽文之弟林勇，因知清军将至，一面留部驻守大武陵，一面分兵在郡城一带出没，不时攻扰湾里溪村庄，以图断截郡城要路。十五日，福康安、海兰察等进驻湾里溪。十六日，与庄大田部在牛庄交战，起义军伤亡 500 余名，被俘 70 余名，定南将军苏魁被射死。十九日，福康安等直抵南潭，常青等亦领兵自沙冈前来会合。普尔普自大武陵北进内山，鄂辉自大武陵南入内山，在大林庄会合。知府杨廷理领兵入山招抚枋寮乡民，留宿庄中，夜半遭起义军陈昆、

^①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 53，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福康安等奏擒获林爽文折。

叶娥部袭击，百总严廷选、乡勇头目郑其仁及兵丁 100 余人被杀，严廷理星夜乘马而逃。海兰察率大部来冲杀，起义军死伤数千。庄大田遭此败绩，乃退往琅峤（今屏东县恒春镇）。琅峤面海背山，山高林密，道路险恶，山内十八社皆系“生番”。福康安欲歼南路起义军于琅峤，一面调重兵四面合围，一面诱逼各社“生番”沿山隘堵截。二月五日，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虽往返冲杀，但因寡不敌众，阵亡将士 2 000 余名，相率投于海者不计其数。南路起义军首领庄大田、庄大韭、许尚、许光来、简天德等，及其家属部众共 800 余人被俘。除庄大田至府城病死外，其余都被解送京师，斩于市。^①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三月初十日，林爽文于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②，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农民大起义，就此宣告失败。

四、林爽文起义的失败原因、作用和影响

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农民大起义，坚持了一年多时间，以失败而告终。导致这场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从台湾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战争双方的主客观因素来具体考察分析，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这就是说，从总的发展趋势和实际力量来看，清朝统治者的兵力、物力大大超过了林爽文起义军的力量。虽然起义爆发之初，由于起义军攻城夺地以及群众大批投奔起义，起义军的力量一度居于优势；但是随着清政府从内地大批调遣援军和物资接济，随着台湾和闽粤沿海封建势力地主武装的迅速集结，相对地，起义军力量就迅速从优势转化为劣势。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这一年之内，单朝廷调遣援台兵力就达 10 万之众，米粮 100 余万石。外加台湾的地主武装数万，以及地主豪商的巨额捐款^③，力量在起义军数倍之上。而起义军方面，由于清军封锁了海面，难以跟内地人民取得联系，得不到内地人力和物力的接济，更没有广阔的周旋余地。最后，在清军大兵压境、数路围攻、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失败。

① 参见道光《彰化县志》卷 11，27 页；《天地会》（四），384~386 页。

② 参见《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大学士阿桂片。

③ 当时闽粤沿海的地主豪商也有不少人捐资镇压林爽文起义，如粤省洋商潘文严捐银 30 万两充军饷，盐商李同德捐银 20 万两充饷。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



第二，起义军本身存在一些严重弱点。因为林爽文起义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次农民起义，它仍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同时，林爽文起义又发生在台湾地区，是由天地会组织发动的，因此它暴露出来的弱点也有特殊性。

首先，台湾长期存在的分类械斗的恶习，给林爽文起义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和影响，不仅阻碍了起义军队伍的发展壮大，而且严重影响了其内部的团结。林爽文起义爆发在漳、泉人大规模械斗之后，起义军的领导成员和起义部众以漳州人居多。虽然由于阶级利益的驱使和天地会的联络，也有不少在台的贫苦泉、粤人民参加了起义军，但总的来说，大量的泉州人和广东人由于封建地域观念、械斗的结仇，没有加入起义队伍。更具悲剧性的是，在林爽文起义进军过程中，还发生起义军与广东籍庄民斗杀之事。这一点，在林爽文天运丙午年（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二月初八日发布的文告里反映得很清楚，文告说：“听得本帅留存守公馆些少兄弟与广东百姓如何闹事，实属不该。现逢出军紧迫劳苦，理已不及出示宽限，俟军回师，查实究办。如吾军不是，失一赔二，焚茅赔瓦，仍究明强暴；若吾民不该，亦照法究处。吾心坚铁石，更虑吾民不信，是以祝天沥明，以显天良，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闽粤民人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宜安分耕农，当俟回军究赔，勿因小忿辄生斗杀，酿成杀身之祸。”^① 文告的内容虽然反映出起义军领导者对于这种矛盾的危害有所认识，并力图加以制止；但实际上却无能为力。这样，就给清朝统治者以可乘之机，他们大量招募泉人和粤人充当乡勇，反抗起义军，并在起义军内部制造分裂，招降纳叛。庄锡舍率数千起义军降敌，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其次，这次起义是由天地会组织发动的。虽然它能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暴斗争，但它并不是先进的组织，没有新的阶级意识。它不但不能克服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而且还带有游民阶层的破坏性。它的落后性和破坏性常常被地主豪强所利用。在台湾，天地会常充当械斗的工具。在林爽文起义之初，起义军曾靠天地会的盟约、条规约束，内部比较团结，纪律也较严明。但到后期，它的分散性和破坏性等弱点，就日益明显表露出来。天地会头目率众背盟降敌、残害民众之事，屡有发生。林爽文在

^① 《录副奏折》第2660卷第4号，《林爽文告示》。

文告中所谴责的“彰化、鹿港林湊，诸罗之黄奠邦等，背盟结众，抗拒我师，焚毁庄社，杀戮男女”^①，就是明显的例证。此外，起义军各派力量之间，“各为雄长，自相戕害”^②的现象，也不断出现。到后来，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林爽文与庄大田之间，起义军南北路之间，也“各自号召不相下”^③。这就加速了起义走向失败的进程。

最后，起义军在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上，也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例如，起义军比较注重攻城夺地，但对于已攻占的城池经常得而复失，造成民心不定，兵源粮饷的供应发生困难。特别是对通向内地的一些重要港口，如鹿仔港、鹿耳门，始终未用重兵把守，以切断台湾与内地的主要航线，就使清王朝大批援军得以渡台，转而打败了起义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台湾高山族人民也踊跃参加了这次起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起义的领导者与天地会组织，并没有深入到高山族人民中去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消除清朝统治者对他们歧视所造成的隔阂。又由于清朝统治者在林爽文起义期间，加紧对高山族进行欺骗利诱（特别是他们的头人），许多人成为清军镇压起义，擒拿林爽文、庄大田等的工具。

林爽文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清朝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这次起义是清朝统治台湾10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战争，它动员了数十万群众，斗争历时十七个月之久。起义军攻城夺地，摧毁各地的清政权，戕杀各级贪官污吏，建立起维护农民利益的起义政权。清王朝为镇压这次起义，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先后调用了10万兵力，耗费白银1000万两。乾隆帝亲自调兵遣将，并发出“朕心深为烦闷”的哀叹。可见其对清王朝震动之大。后来，乾隆帝将镇压这次起义与平定“回疆”、金川和镇压王伦起义相提并论，绝不是偶然的。

其次，经过这次起义的打击，清王朝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阶级矛盾，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措施。最明显的是：（一）连续三年减免

① 《录副奏折》第2660卷第1号，《林爽文告示》。

② 《东华续录》（乾隆朝）卷106。

③ 《福康安、柴大纪传》，见徐珂：《清稗类钞》，第6册；连横：《台湾通史·林爽文传》。



台湾和漳州、泉州地区的地丁钱粮。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二月十四日乾隆帝即降旨，“著所有台湾府全属五十二年应征地丁钱粮，悉行蠲免”^①。同年，乾隆帝又降旨，“将五十三年台湾府属应征钱粮，亦概行豁免”^②。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所有泉州府之晋江、南安、惠安、同安，漳州府之龙溪、漳浦、海澄、诏安等八县，本年应征钱粮，着加恩蠲免十分之三。其浦城、崇安、建阳、建安、甌宁、南平、古田、闽县、侯官、福清、莆田、仙游等十二县应征钱粮，着蠲免十分之二。至福鼎、霞浦、福安、宁德、罗源、连江、光泽等七县，所有应征钱粮，著缓至五十四年麦熟后征收。”^③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帝再次降旨，“所有台湾各属，本年应征谷十九万九百余石，及耗羨、庄租、杂税银六万九千余两，粟一千八百余石，俱著加恩全行宽免”^④。（二）惩办了台湾一批贪官污吏。首先惩办了总兵柴大纪，籍没其家，并正法于京师。^⑤其他贪官也分别受到查抄家产、革职拿问的处分。

但是，统治者对待人民总是牧师的职能与刽子手的职能同时兼施的。清朝统治者蠲免台湾地区的钱粮，惩办一些贪官污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他们施展牧师职能的一面。应该看到，林爽文起义之后，清朝统治者在台湾的刽子手的职能更加强了，突出地表现在对天地会的残酷镇压和对台湾人民的严厉控制。经过林爽文起义，清朝统治者对天地会十分惧怕，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清政府特别注意追查天地会；镇压起义后，他们就集中力量大肆捕杀天地会分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说：“现在逆匪荡平，兵威丕振，正应趁此时竭力查拿，务净根株。亦不虑人心惊疑，庶可使奸徒敛迹，地方永臻宁谧。此等会匪，倡自闽省，该处自居十分之八；而粤东境址接近，其听从纠约者，亦必有十分之二。著李侍尧、孙士毅督饬所属，迅速实力严拿，勿留余孽。”^⑥在他的旨令下，各级地方官便在台湾及闽粤不遗余力地搜捕林爽文的余党和天地会分子，数年之内，被杀者无以计数。有不少天地会成员，起义失败后潜入台湾内

①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

② 《东华续录》（乾隆朝）卷106。

③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一月初四日上谕。

④ 连横：《台湾通史》。

⑤ 参见佚名：《平台记》，96页。以往有的历史学家将柴大纪被处死说成是“冤死”，是由于他在福康安前“礼节不谨，致为所憎”，显然是不恰当的。

⑥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初三日上谕。

山多年，偶出求生谋食，也不能免于一死。^①

为了加强对台湾人民的统治和控制，清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做出了种种规定，举其要者：第一，在台湾实行按户编甲制。规定台湾居户，必须由地方官“责成族长管事，按户编甲。其无家产游民，若遇犯事到官，即在笞、杖以下者，亦押令回籍”^②。内地民人挈眷来台湾者，“由地方官查实给照，准其渡海，移咨台湾，地方官将眷口编入民籍。倘有内地逸犯逃窜至台湾者，地方官若能盘获，准予从优奖议”^③。第二，对台湾的“罗汉脚”进行专门处置。清朝统治者将他们视为“不安本分，武断一方”的威胁力量，为了加强对这部分人的控制，将他们“酌挑入伍，责成该将弁朝夕训练”，使其受军律钤束，以免“复萌故智”，纠众反抗。^④第三，没收民间的刀矛武器，禁止私藏寸铁、采买硫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经大学士阿桂奏准，台湾民间“弓箭、腰刀、拈刀、半截刀、标枪、长矛之类，一概禁止。倘敢私藏寸铁，即行从重治罪”；并“将所有旗帜收缴，嗣后如再有私造旗帜者，俱照军器一体治罪”^⑤。“私换硫磺，及偷采之弊，尤应严切查禁”^⑥。第四，整修道路。台湾各处通衢要道，“勘以一丈五尺为度，一律修整”，“以壮观瞻，而通行旅”^⑦，其目的就是便于调动军队，弹压人民。第五，调换驻台兵丁。向来台湾换班戍兵，与起义军同乡居多，“互相徇隐”，镇压不力。所以乾隆帝认为，若再将驻扎漳、泉兵丁调台驻防，“恐将来日久，仍未免勾结党蔽”^⑧。因此，就改换他籍兵丁驻防台湾。

然而，不管清朝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得多么残酷，不管他们控制得多么严密，只要这个地区的封建剥削压迫还存在，人民的反抗斗争就不会止息。我们看到，在林爽文起义的末期，以及起义被镇压后的数年内，台湾和漳、泉地区仍不断发生规模不一的反抗斗争。据文献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漳州

①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初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署两广总督印务、广东巡抚郭世勋奏，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初五日福建水师提督奎林奏。

②③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大学士阿桂奏。

④ 参见《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⑤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大学士阿桂奏。

⑥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上谕。

⑦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大学士阿桂奏。

⑧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上谕。



府就爆发了天地会会首张妈求纠伙 144 人的举事。他们打起“顺天将军”的旗号，在漳浦县连续焚抢盐场、衙署、税馆，戕杀官兵。据张妈求供称：“闻得林爽文自称‘顺天将军’，随制造红绸方令旗一面，尖角小令旗六面……刊刻‘顺天将军’四字木印盖用，假称林爽文发来，分投纠夥”，并合计，若举事失败，“不能踞城，即抢夺商船，逃往台湾，去投林爽文”^①。但是，举事不几天，还未与林爽文取得联系，即被清军镇压。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林爽文余部谢志、张标等，在彰化复兴天地会，纠伙数十人，准备兴事，不幸被捕。^②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泉州晋江县天地会会首陈老苏等纠众 130 余人，抢掠绅商，戕杀官兵。据陈老苏、苏叶等供称，原为天地会会内之人，参加过林爽文起义，因清军镇压严紧，潜入台湾内山，帮高山族耕种度日。乾隆五十七年四月间，陈老苏、苏叶因事隔年久，潜赴海边，诈称遭风难民，渡海回晋江，复兴天地会，纠众起事，七月被捕。^③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吴光彩、陈潭等，因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张标复兴林爽文天地会被正法，欲为报仇，在台湾琅峤地方纠众入会，正欲起事，即被破获。^④

乾隆六十年（1795 年）三月，林爽文的部属陈周全、陈光爰、陈容、黄朝等，聚众数千人，在台湾起义。以陈周全为天地会会首，以洪栋为军师，提出了“争天夺国”的口号。起义军首袭鹿仔港，杀署北路理番同知、水师游击等；继而攻陷漳化县城，杀千总、典史等，并占领县署，发布文告。斗六门王快亦纠众举事响应，进攻嘉义。台湾道杨廷理发水陆师，并招募地主武装配合，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⑤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林爽文起义被镇压以后，从表面看来，台湾人民似乎蛰伏不动；实际上，却无时不在准备反抗。复兴天地会，以及局部的、小规模举事不断发生。这些举事的规模虽不大，但从本质上反映出台湾人民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同时也反映出一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②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一月十日提督衔台湾镇总兵奎林奏，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七日奎林奏。

③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九月十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

④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二日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

⑤ 参见道光《彰化县志》卷 11，29~34 页；连横：《台湾通史》，565 页；《陈周全告示》。

场大规模起义被镇压之后，群众反抗力量聚集的艰难历程。

应该看到，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农民大起义，只是人民群众反清斗争的一个侧面，但它反映出清王朝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已趋于没落，预示着全国范围更大规模的反抗风暴即将来临。其重要标志，就是天地会、白莲教等民间秘密结社在各地广为传播。大量档案资料证明，从乾隆到嘉庆，天地会在中国南方已流传于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省。白莲教在中国北方也十分活跃，与林爽文起义的同时，白莲教头目段文经在华北一带传教，历经河南、河北、山东等省。教、会广泛传播的结果，就导致嘉道年间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和数百次的天地会举事。如果说嘉道年间白莲教、天地会起义是促使清王朝走向没落的动力之一，那么，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就是它们的前驱。如果说农民战争是冲击中国封建社会的大海怒涛，那么，林爽文起义则是其中的一股巨浪。过去，有的史学家将清王朝镇压林爽文起义列为乾隆的“十全武功”加以颂扬，显然是颠倒是非，抹杀了林爽文起义的历史作用。

如果从会党史的角度来考察，林爽文起义就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是因为，它是天地会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起义。虽然天地会的组织早已存在，但清政府真正发觉天地会的名目，是从林爽文起义开始的。从此，清朝统治者就将天地会视若洪水猛兽。乾隆帝在镇压林爽文起义的过程中，曾三令五申，严密查拿天地会，期以根绝。在林爽文起义被镇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许多地方官惩办天地会案件，还与林爽文的天地会联系起来，并以处罚林爽文天地会案犯的标准来定罪。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政府在重修《大清律》时，就明文规定了一条惩处天地会的律例：“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俟数年后此风渐息，仍照旧例办理。”^①虽然这个条文是针对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台湾彰化县张标、谢志等人复兴天地会的活动而订的^②，但它从此就成为统治者镇压天地会的法律依据。清政府对天地会的镇压如此严厉，就给天地会的活动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也造成了嘉道年间天地会活动规

^① 《大清律例根源》卷54，《谋叛》。

^② 参见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见《清史论丛》，第5辑。



模小和改换名目的明显特征。从大量的案件材料可以看到，林爽文起义之后，天地会虽然传播于南方各省，但大多是十百为群，且结会不久，即被破获。为了避开清朝统治者的耳目，免遭杀身之祸，许多天地会分子就将天地会的名目加以改变，进行活动。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台湾凤山县天地会郑光彩、陈旺等，“因天地会名目易于招摇，必须改易会名，掩人耳目。四人议定，分路纠夥，择日歃血饮酒，拜天立誓，各人置备小刀一把，随身携带，变名小刀会”^①。乾隆末年以后，许多天地会分子在南方各地活动，因“天地会名目犯禁”，就纷纷改为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双刀会、千刀会、百子会等数十种名目。察其活动的内容、结拜仪式，与天地会无异。这是清政府高压政策的产物。

林爽文起义失败后，随之而来的是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倍增，但农民起义军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将永远鼓舞着后来者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直至清王朝的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爽文起义在中国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史上，乃是十分壮丽的一个篇章！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

嘉道年间中国会党发展的特点

从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和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广大农村出现了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同时，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吏治大坏，贪污横行，加之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人民群众遭受的剥削压迫特别深重。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的浪潮也就日益高涨。美籍学者杨庆堃根据《清实录》的记载统计，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事件，嘉庆元年至嘉庆十年（1796—1805）有107次，嘉庆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年（1806—1815）有131次，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五年（1816—1825）有117次，道光六年至道光十五年（1826—1835）有206次，道光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五年（1836—1845）有258次，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五年（1846—1855）则达959次。^①从这个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反抗的次数，一年比一年频繁。嘉庆初年，群众的反抗斗争每年平均发生10次多，但到道光末年时，每年平均近100次，差不多是嘉庆初年的10倍。统计者还指出，这些群众反抗斗争，大多是由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发动的。可见，这一时期民间秘密结社发展迅速和活动频繁的程度。

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群众一直实行极端的专制主义高压政策，特别是乾隆末年，清政府在《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了惩办天地会的条例，这就给天地会系统的会党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以上两种社会情况，是决定嘉道年间中国会党发展特点的最基本因素。那么，这一时期中国会党的发展，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特点

^① 参见 C. K. Yang, "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Wakeman and Grant,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1975.



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地域上看，天地会的势力已从福建一带广泛传播到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区，并且传到了南洋

天地会最早起于福建，乾隆年间主要活跃于今福建和台湾，到嘉庆年间，就迅速向外扩散。天地会由福建向外传播扩散的路线，大体有四条：第一条是由福建传入广东，再由广东传入广西、贵州、云南；第二条是由福建传入江西和湖南；第三条是由福建传入浙江；第四条是由福建传入南洋。^①下面，我们以第一条路线为例，来具体考察天地会传播扩散的情况。

据清代的档案材料记载，嘉庆五年（1800年）十二月，有福建同安县陈姓人来到广东省雷州府海康县地方看相，林添申邀其至家看相。陈姓谈及从前在籍曾拜过天地会，林添申询问如何拜会？陈姓声称，结拜之后，各人以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遇事互相帮助。其暗号，开口即说本字，以三指取物，如系会中之人，彼此即可认识。并将身带天地会旧表一纸，交林添申收存，嘱咐纠人，俟伊往别处转回，再行结拜。林添申因贫苦难度，起意自行纠伙结拜。嘉庆六年（1801年）六月，有方庭相、陈魁进、蔡有湖、游绍贤、符吉洪、陈吉洪六人，至林添申家，共谈贫苦。林添申即将福建陈姓传给之暗号、表文告知，起意商同纠伙结拜，遇事相帮，并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用。方庭相等应允，一共七人，议定每人出钱三百文，交林添申买酒肉，于七月初七日在林添申村外僻静处结拜。林添申取出表文，给方庭相等阅看，文内有：“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同掌山河，共享社稷，一朝鸨集，万古名扬。”表后写“天运辛酉年”字样。林添申遂持刀，令方庭相等从刀下钻过。林添申还说，日后俱要听从指挥，如有负盟不义者，死于刀下。并将暗号传给，不序年齿，共推林添申为大哥，拜毕歃血，焚表饮酒各散。此后，林添申、方庭相等又分头邀人入会，先后邀得百余人，分为七起，不论年齿，各以林添申、方庭相、陈魁进、蔡有湖、游绍贤、符吉洪、陈吉洪为大哥，于七月十二、

^① 据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和 L. Comber 的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英属槟榔屿政府即有天地会举事的报告。

十四、十五等日，在东坡村、白水塘、东角埔等处结拜，共以林添申为总会首，约于八月十五日同赴高山坡地方结拜，乘机往各处村庄市镇抢劫。尚未起事，即被拿获。^①

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两广总督罗吉庆奏报，广东省新宁县拿获天地会会犯叶世豪等100余名。叶世豪籍隶新宁，佣工度活，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内，有福建同安县陈姓人到该处看相，叶世豪请伊至家。陈姓说起前在原籍拜过天地会，叶世豪询其结拜天地会有何好处，并如何结拜。陈姓说，以洪字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遇事互相帮助，可以乘机抢劫村庄。其暗号系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如系会中之人，彼此即可认识。并将会簿一本，交叶世豪收存，嘱令在本处地方纠人，俟伊往别处转回，再行结拜。叶世豪询其名字，陈姓说俟结拜时告知，随即辞去。叶世豪因无人雇请，贫苦难度，起意自行纠伙结拜。是年八月，有余笼壮、陈文南、林运昌、关仁恩到叶世豪家闲坐，讲起穷苦。叶世豪即将福建陈姓传授结拜天地会缘由告知，起意商同纠伙结拜，遇事相帮，余笼壮等应允。一共五人，议定每人科钱二百文，交叶世豪买备猪肉，于九月初十日，往土名石笋滩地方结拜。叶世豪见拜会人少，不能抢劫，复与余笼壮等分头纠得何穆昭等百余人，分为五起，不论年齿，各以叶世豪、余笼壮、陈文南、林运昌、关仁恩为大哥，于九月十五、十八等日，先后在石笋滩河边西坑、勒涌、北坑、和宁等处结拜。并各向叶世豪告之，约定十月初十日内，同往石笋滩地方结拜总会，乘机往各村庄抢劫。尚未起事，即被拿获。^②

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报，广东省潮州府大埔县和惠来县拿获结拜天地会会犯方振思等60余名。方振思籍隶惠来，平日充当更夫。嘉庆六年（1801年）一月内，有福建同安县陈姓人到惠来地方看相，方振思邀其至家观看，谈及结拜天地会之事。方振思后因患病，被辞退更夫，贫苦难度，起意纠伙结拜天地会。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纠邀陈宗元等69人入伙，于八月十五日夜，在赤山地方结拜，共推方振思为总大哥。尚未举事，即被拿获。^③

从以上三起天地会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福建同安人陈某，

①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六年十月十日两广总督罗吉庆、署广东巡抚瑚图礼奏。

②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罗吉庆、署广东巡抚瑚图礼奏。

③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



以看相为名，来到广东传播天地会，在一两年时间里，他奔走潮州、惠州、广州、雷州等府，辗转相传，仅此三个点上，就纠众数百人。由此不难想象，这一时期天地会传播的速度和规模。

当然，天地会由福建传入广东，绝不只是通过同安县一个地方，也不只是通过陈姓等一两个人。我们看到，就在福建同安陈姓人于广东潮州、惠州地区传会的同时，广州府东莞县也禀报，“有福建同安县民，来粤诱惑乡民，聚集多人，结盟拜会”^①。嘉庆六年（1801年）五月，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报，在东莞县中堂墟地方，拿获天地会会犯陈礼南多人。陈礼南籍隶福建同安县，在籍时曾从陈飘学结拜天地会，陈飘学传给陈礼南盟书一本。陈礼南因贫苦来粤佣工，是年一月，到广州府属东莞县中堂墟地方，与李道著、张三弟等相识。陈礼南因无工可做，度日艰难，起意拜会获利，遂商同李道著等结拜天地会，纠结多人，希图抢劫村庄，得赃分用。尚未举事，即被拿获。^②

我们又看到，嘉庆七年（1802年）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称，在广东惠州府的归善县，有福建漳浦县人蔡步云传播天地会，纠众滋事，“陆续投首者共一千余名，缴获器械六百余件”，布旗内有“讨江山”等语。蔡步云原籍福建漳浦县，寄居归善，嘉庆七年（1802年）四月十一日，有归善县民人陈亚本，到伊家内闲谈，起意结拜天地会，纠众抢夺。蔡步云即与陈亚本分别邀得谢天生等16人，于四月十五日在陈亚本家结拜，写五色旗，上书“顺天行道”等字，每人分给一块，收藏身边，作为暗号。陈亚本自称大王，蔡步云自称大元帅，许荣珠为军师，谢天生为东路元帅，曹东保为东路先锋，陈永保为西路先锋，戴亚锤为南路先锋，陈辛姑为北路先锋。众人议定后，分往稔山、白芒花等处村庄纠人入会，并派出头人，制造器械，入会者俱给红布条为号，七月间尚未起事，陈亚本、蔡步云等即被拿获。据蔡步云供称，布旗内“讨江山”等语，系照天地会旧本抄写，并非自作。^③另据觉罗吉庆密奏，嘉庆六年（1801年）惠州府的归善、博罗两县，民人加入天地会者，已达一两万人。嘉庆七、八年（1802—1803）间，在归善、博罗、永安三县境内，就爆发了陈烂屐领导的天地会起义。

① 《朱批奏折》，嘉庆六年四月十五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

②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六年五月十三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奏。

③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

中国近代史研究

由于天地会在广东各地迅速广泛地传播，到道光年间，它的势力已“蔓延通省，及于广西”，并“祸连吴楚”^①。而实际上，天地会在嘉庆年间已由广东传入广西。

天地会进入广西境内，主要通过广东人的传播。据清代档案文献记载，早在嘉庆九年（1804年），广西巡抚百龄就奏称，有籍隶广东钦州之冯老四，与广东灵山县民林定帮、林青上、葛大权等，勾诱广西博白县王政清、永淳县民符奇高等结拜天地会，欲往钦州一带劫掠。冯老四为人强悍，曾出洋为盗，与广东灵山县人林定帮、林青上、葛大权，并合浦县人蒋如成，广西博白县人王政清素识相好。嘉庆八年（1803年）十二月，冯老四起意纠人结拜天地会，劫抢财物，商之林定帮等，俱各允从。冯老四即于是年十二月及嘉庆九年（1804年）一月、二月内，陆续收买刀枪10余件，用竹做枪40余杆，又制造旗面、木印、符布。并与林定帮等先后纠约符奇高等120余人，于嘉庆九年（1804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等日，陆续齐集宾温氏家，饮血结盟。不序年齿，共拜冯老四为大哥、总头目，林定帮、林青上、葛大权、蒋如成、王政清均为头目。冯老四口传“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十字暗记。因符奇高向系卖卜，令其代为择日。原定三月初六日起事，冯老四等因闻合浦县访拿，恐被掩捕，即于初一日黎明分给各人刀枪，红布包头，欲往钦州一带劫掠。途经合浦之龙门圩，因抢取猪鸡等物，先后被地方兵勇、村民捕获。^②

嘉庆十二年（1807年）广西巡抚恩长奏报：“平乐县沙子街地方，广东匪徒李元澹、张世聪，湖南匪徒杨开来三人为首，复兴天地会，辗转纠引九十五人，歃血结盟。”张世聪、杨开来均在平乐县沙子街佣趁度日，与广东东莞县人李元澹素识。嘉庆十一年（1806年）四月初四日，彼此会遇，各道异乡势孤，商允邀人结拜天地会，遇有争殴，得有帮助，并可乘便行劫。先后分头纠邀95人，于五月十七日夜间，在古庙内结拜。李元澹、张世聪、杨开来传授“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十字，并令出门各将颈下纽扣解开，衣向内折斜肩，雨伞将柄向上，以为会中暗号。^③嘉庆十三年（1808年），广西来宾县破获颜亚贵与颜超结拜天地会案。颜亚贵籍隶广东南海县，寄居广西贵县，

^① 曾望彦：《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524页，北京，开明书店，1950。

^②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二十七日广西巡抚百龄奏。

^③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八日广西巡抚恩长奏。



贩马生理。嘉庆十三年（1808年）二月初二日到来宾县，遇挑卖杂货之广东南海县人颜超，同店住宿。因系同姓同乡，交谈投契，各道贫苦，颜超即邀其入天地会。除传授天地会暗号外，又将会内《桃园歌》抄给颜亚贵。颜超并“密告以广东石城县丁山脚下，有洪启胜、蔡德忠、方大洪、吴天成、吴德帝、李色开已纠人，欲行谋反，令伊来西省邀人入伙”。随囑令颜亚贵替伊到各处纠人，以拜天地会。^①

从以上材料以及有关档案可以看到，嘉道年间广西的天地会，大多是由广东人传入的。同时，我们从清代的档案材料还看到，这一时期云贵地区的天地会，也多由广东人传播过来。例如，贵州省荔波县的天地会，就是由广东程乡县做卖鱼生理的凌国珍和广东和平县行医度日的罗载扬，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初传入的。^② 贵州省兴义府的天地会，就是由广东人麦青从广西百色地方辗转传入的。^③ 云南省师宗县、宝宁县以及开化府的添弟会，是由广东人林闰才、张效元、杨憨头等于嘉庆十七、十八年（1812—1813）传来的。^④ 天地会的这个传播发展趋势，与乾嘉以来中国社会危机严重，闽粤一带破产农民大量往广西、云、贵地区流动，是密切相关的。其中以广东人大量流入广西最为突出。时人指出，“粤省人烟稠密”^⑤，人多地少的矛盾，自乾隆朝以来就日益严重。到道光年间，此处“地不能增而人加众至二三十倍”^⑥。尤其是广东东部，“人民繁庶，地方斥卤”，“家鲜恒产，游手坐食之民素无依赖，遂致作奸犯科，肆行无忌”^⑦。加之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天灾频仍，就造成数十万、数百万的游民。这些人，除一部分出洋谋生外，大部分则由狭乡往宽乡迁移。当时，广西就属“宽乡”——地多人少的地区。据统计，顺治十八年（1661年）广西人口只有58万，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已达763万人，前后增加了12倍多。^⑧ 广西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广东客籍人的大量迁入。有关地方志记载说，嘉庆初年“广西之境，大约壮人半之，瑶人三之，居民二

①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广西巡抚恩长奏。

②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初八日贵州巡抚颜检奏。

③ 参见《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贵州巡抚文宁奏。

④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伯麟奏。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3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⑥ 汪士铎：《乙丙日记》，北京，文芸阁，1936。

⑦ 《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两广总督李鸿宾奏。

⑧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之”^①，绝大部分是土籍。但到道光年间，广西的客籍户比重就迅速上升。严正基在《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中说，粤西“通计土著十之三四。……梧、浔、南、镇、玉等府州，半与东境毗连，垦荒贸易占籍者多系东人，闽人间亦有之”^②。由于广东客民大批在广西落籍，就使广西不少地区出现“佃众田稀”，土客民人争田抢耕的局面，造成了土民与客民、外来民人与本地民人之间的斗争。随着广东客民大批流入广西，天地会也就随之而入。特别是“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匪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簿腰凭，称为大哥、师傅，传授口号，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情形不同，其名则一”^③。到道光年间，广西通省的天地会“堂股”数，已不下数百个之多。有的地方，“几无村不有大哥”^④。

天地会向广西等地的迅速蔓延，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极度不安。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在一个奏折中，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和天地会蔓延的形势，曾做了这样的概括：“现在粤省米贵，乡间倍多抢劫，商旅为之戒行。……其尤可虑者，闻匪徒纠结多年，勾连凡五六省，名曰三合会，人数不可计其极。其党分为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为五房。每房各有头目，以五色分为旗帜，入其会者授以口号，各执图一张，虽素不谋面，一闻口号相符，即呼为弟兄。钱财可通，患难与共，假托义气，故愚民多堕其局中。吏役民丁，半皆羽翼。一二良善之家，倘不入会，则无以自全，故胁从者亦复不少。似此潜滋暗长，无巢穴之区，而都邑市廛皆其布散之所；无啸聚之众，而兵民役胥皆其心腹之人。万一蠢动，一呼百和，六省声气相连，其患不浅。”^⑤ 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就在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广泛蔓延发展之后，到咸丰初年，便爆发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全国农民大起义。

① 《临桂县志》卷12。

②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③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2，16~17页。

④ 光绪《玉林州志》卷18。

⑤ 《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



二、这一时期，南方的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目进行活动，先后出现了数十种不同的名目

天地会创立以后，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起义爆发，这是天地会的反抗斗争首次走向高峰。但是，也正是经过林爽文起义，清政府便开始严厉镇压天地会，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禁止结拜天地会的活动。于是，许多天地会组织，就在各地改头换面，变更名称，进行活动。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可以确知，最早起来将天地会改为“骛黠宆”进行活动的，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建同安人陈老苏和苏叶。陈老苏、苏叶系福建同安县洪塘乡人，曾在台湾参加过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林爽文起义失败，陈老苏与苏叶即逃入台湾内山高山族地区耕种度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渡海回同安原籍，因贫苦难度，“忆及从前天地会内之人，到处纠约，无人敢欺”，乃商定邀人结会。陈老苏“以三指手诀众所共知，恐难分辨，并因天地会匪查拿严紧，改造骛黠名色，以暗合天地”^①。苏叶又编造“天一成水水成仙，地二成火共水连，此卦合成天地格，到时变化万万千”口诀四句，令入会之人诵习，以便互相关照。并将林爽文起义时的“顺天”年号改为“顺国”，纠党抢掠，截夺文报，戕害驿夫，旋即被闽浙总督伍拉纳等破获。^②也正是在同一年，清政府重修《大清律》时，即增加了禁止和惩办天地会的律例。因此，到了嘉庆年间，各地天地会改变名目就特别频繁。

过去陶成章说：“福建之洪门，乃改其方向，流入于粤，隐其天地会之名称，以避满人之忌。取洪字边旁彡字之义，号曰三点。或又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端，乃又取其义而连称之，又改号曰三合。”^③这种说法，基本上符合天地会名称演化的历史实际。但陶氏断言三点会、三合会等名目出现在康熙年间，是缺乏史实根据的。同样，近年来有的学者说“三点会名目起于道光年间”，“至道光年

^① 《淮南子·天文训》云：“清阳者，薄霁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据此，“骛”同“天”，“黠”同“地”，“宆”系古“会”字，可知“骛黠宆”即天地会。

^②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

^③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间，始见诸记载”^①，也值得商榷。其实，三点会的名目，根据档案文献记载，在嘉庆年间已出现。例如，嘉庆十一年（1806年），江西赣州府会昌县地方，就有周达滨“改立天地会为三点会”。据周达滨供：“以天地会名目犯禁，因此会本系洪二和尚起义，洪字偏旁三点，即改名三点会。”^②至于将天地会改成其他名目的则更多。正如闽浙总督汪志伊在一个奏折中所说：“历将著名会匪拿获究办，愚民稍知警惕，该匪等复改立双刀、百子等项会名，多方诱引。”^③

根据档案材料记载，这一时期由天地会改立和衍化出来的名称，约有三四十种。如果将这些名称的来由加以分类，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因天地会系洪二和尚创立，取洪字偏旁，定名三点会和三合会。这种情况，嘉庆十一年（1806年）江西会昌县周达滨改天地会为三点会，反映得最清楚。周达滨的供词，直接说出了他们改立三点会的缘由。同年，福建永定县廖善罄等，与武平县的钟碧珍结拜三点会；嘉庆十九年（1814年）广东和平县僧宏达与吴亚妹等在江西定南厅结拜三点会；同年江西龙南人钟锦泷与广东连平人邱利等结拜三点会，都是属这一类型。^④他们的结拜仪式，都要设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的牌位，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口诀，暗藏洪字笔画。钻刀穿桥时，需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刀下亡”的口号。并分给每人红布一块，内书“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见团圆时”^⑤等语。

至于三合会名目出现的时间，据档案材料记载，大致与三点会相近。我们看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两广总督蒋攸钰奏报，在广东省顺德县地方，就有严贵邱等132人“私立三合会”^⑥。嘉庆十九年（1814年），广州、肇庆等府属，也有“匪徒复兴三合会名目”^⑦。

（二）仿效刘、关、张“桃园结义”，崇尚江湖义气，取名忠义

① 戴玄之：《天地会名称的演变》，载《南洋大学学报》，第4期，157页。

② 《朱批奏折》，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护理江西布政使先福奏。

③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④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八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先福奏，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江西巡抚先福奏；庄吉发：《清代嘉庆年间的天地会》，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

⑤ 这首诗，后来被海内外洪门的票布凭证普遍采用。参见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J. S. M. Ward, *The Hung Society*。

⑥ 《朱批奏折》，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蒋攸钰奏。

⑦ 《大清十朝圣训》卷101，《靖奸究》。



会、仁义会、仁义双刀会、公议会、情义会、江湖串子会等。例如，嘉庆二十年（1815年）广西恭城县李泳怀等，在恭城柘木寨空庙“结拜兄弟，取名忠义会”。结拜时，摆设案桌，用红纸书写“忠义堂”三字，粘贴桌边，并供设“关帝神位”。^①嘉庆十九年（1814年），福建长汀县人黄开基“纠邀钟老二等十三人，在顺昌县小坑仔山厂内结会，将添弟会改名为仁义会”；后又在建阳县“结拜仁义会”。^②嘉庆十七年（1812年）福建武平县朱德辉等，因添弟会奉禁甚严，将添弟会改为“江湖串子会”，“其情事仍与添弟会相同”。^③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西南丰县封老三等“结拜兄弟，取名仁义双刀会”^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陈添然在湖南保靖县纠人结拜，取名“公议会”，都是属于这一类。

（三）因结会时所拜神物及会员所持器械证件而定名为三仙会、明灯会、双刀会、千刀会、担子会、边钱会、半边钱会等。例如，天地会结拜时，入会者多要从双刀架下穿过，因而有不少天地会组织就改称“双刀会”。嘉庆十八年（1813年），福建光泽县人陈上元等，在邵武县天台山空庙结会，“因庙中供有三仙，故称仁义三仙会”^⑤。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福建沙县人邓方布倡立“明灯会”，因“此会结盟时除用小铁碗、砂子、小刀外，另起明灯一盏，故名明灯会”^⑥。又如，道光初年，江西赣南一带，“有匪徒烧香结盟，名为添刀会，又名千刀会”，亦有添弟会“带刀防身者，民间因即目为千刀会”^⑦。南安、赣州两府，乞丐结拜，“结队同行，肩挑锅担”，名为“担子会”^⑧。有的地方兴立的“边钱会”和“半边钱会”，因歃血拜盟后，发给“半边钱，作为传徒凭据”^⑨；或将半边钱用红绿线捆扎，分给各人收执，“暗为传人记号”^⑩，由此得名。

（四）有的是旧名新用，即采用旧的名称，充实新的内容。如父母会、小刀会等，最为明显。

① 参见《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湖南巡抚巴哈布奏。

② 参见《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董敬增奏。

③ 参见《朱批奏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十四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④ 《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三月初十日江西巡抚先福奏。

⑤ 《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八月十九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⑥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106~107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

⑦ 《朱批奏折》，道光六年九月初三日江西巡抚韩文绮奏。

⑧ 《录副奏折》，道光三年四月十一日阿霖片。

⑨ 《朱批奏折》，嘉庆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陈预奏。

⑩ 《录副奏折》，道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嵩溥奏。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早在雍正年间，父母会的名目已经存在。闽浙总督高其倬奏称，雍正六年（1728年）就有民人汤完等在台湾结拜“父母会”。但这时的父母会，只实行“刺血滴酒，设誓拜把”^①，没有“三指暗号”等。到了嘉庆年间，福建一带的父母会，就传授“三指暗号”了。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欧狼在福建霞浦县结拜父母会，就“传授三八二十一洪字口号”，“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欧狼即欧品重，原籍漳浦，迁居霞浦县地方。嘉庆十九年（1814年）六月间，欧狼因贫苦难度，稔知添弟会名目可以敛钱使用，遂起意结会。先后纠邀谢奶桂等26人，约定是月十五日在霞浦天岐山空庙内会齐。“至期各人同拜欧狼为师，欧狼取名父母会，传授三八二十一洪字口号。又问：从哪里来？那里去？答：从东边来，西边去。问：从哪里过？答称：桥下过。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以便会内人彼此关照。宰鸡取血，滴酒共饮，各人送给欧狼钱二百文而散。”^②从欧狼结拜父母会的情节，可以看出，他是采用了这一带原来流传的父母会名称，充实了天地会结拜的新内容。

小刀会的情况与父母会相似。在清代文书档案中，据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小刀会的名目，是乾隆七年（1742年）闽浙总督那苏图、福建陆路提督苏明良、福建漳州镇总兵官龙有印等人的几份奏折。闽浙总督那苏图在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中说：“漳浦县云霄地方有小刀会，因本年三四月间雨泽愆期，传播讹言，惊扰愚民。经该县朱以诚查有云霄张姓一人，并平和县张姓一人，小刀亦经查出，两面有锋。”^③从这些奏报材料看，那时的小刀会，除“歃血结拜”和“身备匕首”外，并无“三指暗号”。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台湾凤山县的郑光彩等人创立小刀会，系将天地会“变名小刀会”，才具备天地会的特色。据哈当阿奏报：“郑光彩原籍龙溪，生长凤山，素与陈旺、魏东、杨骨交好”，因平时“强勒附近各庄发给工资，代为保守田园……会仇甚多，恐被告发查拿，乏人帮助。因思从前天地会有人帮助，众皆畏惧，遂起意结会。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初间，郑光彩即与陈旺、魏东、杨骨等相商，陈旺等因天地会名目易于招摇，必须改易会名，掩人耳目，四人议定分路纠伙……

① 《雍正朱批谕旨》，87页。

②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王绍兰奏。

③ 《朱批奏折》，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闽浙总督那苏图奏。



变名小刀会。……五月二十三日在盐浦庄杨骨家会齐，备齐牲礼、香烛，至庄外僻静空埔排设，众人俱让郑光彩为大哥，陈旺为二，魏东为三，杨骨为四，一共五十四人，拜天立誓，口称会内之人均要齐心如一人，有事众人协力相帮，背盟之人立死刀下等语。又各人将左手食指用刀割破，滴血酒中分饮，并约定各人置备小刀一把，用牛角作柄，携带在身，以为暗号。”^①继郑光彩之后，嘉庆二、三年（1797—1798），台湾淡水的杨肇、嘉义的徐章等人，又分别将天地会变名小刀会，进行活动。^②此后，内地的小刀会，大多采用天地会的结拜方式，并传授“三指暗号”，显然属旧名新用。

（五）由天地会和白莲教两个系统相互交融结合所采取的名称，如洪莲会、阴盘教、阳盘教、青莲教、棒棒会等。

白莲教、斋教原来在南方就有较大的势力，自天地会兴起以后，教与会两种势力在民间同时存在，相互交融，于是在不少地方就出现既有会党特征又有教门特色的组织名称。例如，福建建宁县民人李凌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拜从江西贵溪县人吴子祥为师，获授《恩本经》一卷，吃斋念诵。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间，另拜天地会会首福建邵武县人吴韬为师，传授“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暗号，吃烟取物俱用三指向前，遂又起意另立会名。因天地会查拿严紧，忆及吴子祥经内有阴阳语句，即捏造阴、阳盘等教名目。^③“阳盘、阴盘名目，暗藏天、地二字。愿入阳盘教者，传授手诀口号；愿入阴盘教者，传抄经本，吃斋念诵。”^④嘉庆十二年（1807年）朱石崇在江西安远县地方，将三点会改为“洪莲会”。^⑤道光末年湖南新宁雷再浩倡立的棒棒会，“分青、红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葷”^⑥。这些都是教与会两种势力的混合产物。

（六）还有一些为标榜自己的组织而定的名称。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福建江哑奴结会，“因会内众人俱系平等称呼，取名平头会”^⑦。道光十五年（1835年）李魁、李江泗等在福建邵武结会，以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哈当阿等奏。

②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三年六月十八日哈当阿奏。

③ 参见《朱批奏折》，嘉庆八年八月二十日江西巡抚承恩奏。

④ 《录副奏折》，嘉庆十一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阿林保奏。

⑤ 参见《朱批奏折》，嘉庆十七年二月十三日江西巡抚先福奏。

⑥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湖南巡抚陆费瑛奏。

⑦ 《朱批奏折》，道光二年七月十四日闽浙总督庆保奏。

“入会之人彼此帮护，可以保家防身为词”，取名“保家会”^①。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月，广西南宁府吴中、吴举创立“良民会”，凡出钱入会者为良民，不出钱为“匪类”，以敛钱渔利。^②

三、这一时期天地会举事的次数虽不少，但规模多不大，一般多为数百人的规模，大的也只有万人左右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天地会的严厉镇压；其次是由于天地会的组织分散，不易形成规模巨大的统一反抗力量。这种情况，在嘉庆年间尤为突出。当时，清王朝一面在法律上订立了严惩天地会的规定；一面屡饬地方文武员弁，严密访拿，务使有犯必获，期无纵漏。因此，各地文武官员，一旦访闻天地会活动，便立即取缔，严加惩办。如闽浙总督汪志伊在福建就亲手惩办了数十起天地会案件。他在一个奏折中也声称，“臣汪志伊自莅督任以来……破获匪犯二百九十余名”^③。此外，各地方官还通过发布《化导士民告示》，订立《乡约条规》，刻立《严禁拜会碑》等方式，禁止天地会的活动。例如，广西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于道光元年（1821年）颁行的《乡约条规》，就明文规定：“结拜添弟会，是第一件大犯法的事。”在条文之下，还用通俗的文字，来解释入了添弟会将会受到官刑如何处罚，以威胁群众。其中有一段文字说：“好好的百姓，进了添弟会，便是朝廷罪人，如今处处访查会匪，断断不能遮瞒。兵差奉票来拿，用链子铐起就走，可怜你的爹娘、妻子、兄弟，号啕痛哭也救不得你了。一进衙门，官府见你是个会匪，先打嘴巴，打得两脸红肿，满口流血；又用小板子重打两腿，照例拧耳跪链，将铁链盘作一团，押你跪在链上，扯起两耳，那时两个膝头痛入骨髓，不怕不从实招供。一画了供，就用手镣脚铐捆作一团，如同猪狗一般，丢在牢里，要吃不得吃，要睡不得睡，受尽牢狱之苦。装入囚笼，解府、解省，历过多少衙门，受尽许许多多苦楚，然后分别定罪，做大哥、师傅的，先受极刑处死；拜会纠人的，

① 《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七日闽浙总督程祖洛奏。

② 参见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106页。

③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斩罪处死；拜会而兼为匪的，绞罪处死。绑赴法场，刀斧手吆喝一声，先吓得魂飞魄散，然后用刀砍死，用桩绞死。这样的人不必说了。那次等问遣罪的，解往新疆万里之外。那地方滴水成冰，寒冷异常，受冻受饿，又要受他鞭扑责打，广西人如何禁受得起！到那里折磨一年半载，也是一条死命。那问徒的，解往他州外县，爹娘妻子不得见面，受苦无穷。就是问枷杖释回的，也是侥幸万一的事，虽然放回本乡本村，人人笑骂你是解省的会匪，受了官刑的人，终身做人不起。至投首免罪的事，更是非常侥幸。”在另一段条文里，还以嘉庆年间广西灌阳、阳朔、恭城、思恩、宜山、贺县、玉林、荔浦、上林等州县办理会匪蒋五益等 100 多人的事例告诫百姓，并规定“从今以后，若有人邀你拜会，你便悄悄告知头人，星速禀官，立刻重赏。约长、头人、墟长等仍不时稽查，禀官究办”^①。甚至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统治者也立碑严禁结拜天地会。例如《融县知县严禁苗区拜会碑》中就规定，“不许拜会结盟、窝留棍匪”，“自示之后，如有前项不法棍徒，勾引外来游匪，吓索滋事，许该苗头协同苗民擒拿，解赴本县，以凭尽法惩究”^②。由于清朝政府层层严厉镇压，天地会很难聚集成巨大的反抗力量，往往举事尚未发动，即被破获。所以嘉庆年间天地会起义，规模较大的像广东归善、永安、博罗的陈烂屐起义，也只有 1 万多人^③，没有一次天地会起义能发展成像嘉庆初年五省白莲教起义那样的规模。

但是，随着清乾嘉以来社会危机的日益严重，随着天地会势力的广泛蔓延和聚集，到了道光年间，天地会斗争的面貌，就迅速发生变化。特别是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两广、湖南等地受战争的影响较大，天地会的势力在这一带发展更为迅速。清统治者说，这一带“盗贼如毛”，“游匪如林，聚散靡定，水陆要津，皆为贼踞”^④。尤其是粤桂、湘桂交界地区，统治力量薄弱，天地会势力容易在这些地区聚集起来。所以，道光末年发生在湘桂交界的雷再浩、李沅发起义，粤桂交界的何名科、张嘉祥起义，广西境内的陈亚贵起义，规模都比较大，

^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20～2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②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43～44 页。

^③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七年十二月初一日那彦成奏。

^④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 12；朱用孚：《摩盾馀谈》。

即使在广州附近的东莞、香山一带，1842年至1847年，先后也有2万多天地会分子参加起义。这些起义，就是太平天国大起义的前奏。

四、这一时期加入会党的主要成员，大多是农村的破产劳动者、游民

他们从农村破产游离出来以后，就外出充当雇工、佣工，佣趁度日；有的肩挑负贩，小本营生；有的测字算命，训蒙度日；有的终年飘荡江湖，偷窃行丐。由于这些人生活贫苦难度，或是由于流浪异乡，孤立无援，他们便起意结会，纠伙拜盟。这样，一面可以免人欺侮，一面可以骗钱使用。有的在结会之后，就立即抢劫财物，分赃使用。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特点，我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将所抄录的嘉道年间福建、广东、广西三省81起天地会案件，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会名、查获地点、会首姓名、会首籍贯、起会原因、犯案情节，分别列表如下（表7）。

表7 嘉道年间闽粤桂三省81起天地会案件简表

福建							
时间	会名	查获地点	会首姓名	会首籍贯	会首职业	起会原因	犯案情节
嘉庆四年	天地会	龙溪	林中玉	龙溪	革监	起意 纠抢	抢人勒 赎分赃
嘉庆五年	天地会	浦城	罗名扬 僧德贤	浦城	不详 僧	各道 贫苦	骗钱使用
嘉庆五年	天地会	建阳	游效标	建阳	不详	因贫 难度	骗钱使用
嘉庆五年	天地会	南安	潘琅	南安	不详	穷苦 难度	敛钱使用
嘉庆五年	天地会	莆田	僧弗性 许炳	莆田	僧 不详	各道 贫苦	骗钱使用
嘉庆八年	天地会	龙溪	周田	龙溪	行劫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南靖	余朗 黄昆	南靖	县粮书 县役		骗钱抢劫
嘉庆八年	添弟会	永定	张配昌	仙游	开首饰店	恐人 欺侮	
嘉庆十年	天地会	建安	郑细观	永春	肩挑度日	穷苦 难度	骗钱使用



续前表

福建							
嘉庆十一年	阳盘教 阴盘教	邵武	杜世明	邵武	佣工	因贫 难度	骗钱使用
嘉庆十二年	阳盘教 阴盘教	南平	林应伟	南平	游荡	因贫 难度	敛钱使用
嘉庆十五年	阳盘教 阴盘教	长汀	钟家旭	长汀	不详	因贫 难度	传徒骗钱
嘉庆十六年	阳盘教 阴盘教	长汀	谢佩成	长汀	在江西生理	因贫 难度	骗钱使用
嘉庆十七年	阳盘教 阴盘教	武平	朱士达	武平	赌博		骗钱
嘉庆十七年	江湖串 子会	武平	朱德辉	武平	务农	免人 欺凌	
嘉庆十八年	仁义双 刀会	光泽	封老三	江西 南丰	不详		
嘉庆十九年	仁义会	宁化	张显鲁	宁化	不详	免人 欺侮	骗钱
嘉庆十九年	仁义会	建阳	江婢仔	建阳	不详	因贫 难度	骗钱
嘉庆十九年	洪钱会	建宁	江文兴	江西 南丰	不详		
嘉庆十九年	仁义会	宁化	熊毛	江西 石城	打造首饰	因贫 难度	骗钱
嘉庆二十年	仁义会	建安	李发广	武平	天地会 案逃犯		骗钱
嘉庆二十年	天地会	武平	朱风光	武平	测字算命	免人 欺侮	
嘉庆二十年	父母会	霞浦	欧狼	漳浦	不详	因贫 难度	敛钱使用
嘉庆二十一年	双刀会	古田	侯二八雄	仙游	佣趁度日	因贫 难度	敛钱使用
嘉庆二十二年	仁义会	长汀	黄开基	长汀	缝纫度日	因贫 难度	骗钱使用
道光二年	平头会	建阳	黄孙奴	建阳	不详	因贫 难度	骗钱使用
道光十五年	三点会	邵武	李魁	广东 龙川	种茶	免人 欺侮	
道光十五年	三点会	邵武	黄日贵	邵武	种山度日		抢占山场



续前表

福建							
道光十六年	三点会	邵武	邹四桥板	广东龙川	采茶佣工	免人欺侮	
道光十六年	三点会	邵武	邹闰生	广东龙川	采茶佣工	免人欺侮	
道光二十八年	红钱会	建阳	李先迓	江西南丰	种山度日		传徒敛钱
广东							
时间	会名	查获地点	会首姓名	会首籍贯	职业	起会原因	犯案情节
嘉庆五年	天地会	阳江	仇大钦	阳江	不详	复仇泄恨	抢劫
嘉庆五年	天地会	阳江	何其昌	福建漳州	不详	复仇泄恨	抢劫
嘉庆六年	天地会	东莞	陈礼南	福建同安	佣工	度日艰难	抢劫
嘉庆六年	天地会	海康	林添申	海康	教读度活	贫苦难度	抢劫
嘉庆六年	天地会	新宁	叶世豪	新宁	佣工度活	无人雇请	抢劫
嘉庆七年	天地会	新会	郑嗣韬	新会	不详	贫苦难度	抢劫
嘉庆七年	天地会	归善	蔡步云	福建漳浦	不详	纠众抢夺	抢劫
嘉庆七年	天地会	新宁	黄名灿	香山	卖柴度活	贫苦难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新会	林道经	新会	佣工	贫苦难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新宁	陈积引	新宁	不详	谈及贫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大埔	方振思	惠来	更夫	贫苦难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潮阳	郑阿羊	潮阳	海盜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长乐	赖六青	福建长乐	游荡	贫苦难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琼山	叶有升	新宁	佣工	贫苦难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东莞	蔡廷仕	东莞	不详		抢劫



续前表

广东							
嘉庆九年	天地会	增城	关念棕	增城	游荡	谈及贫苦	抢劫
嘉庆九年	天地会	增城	郑大眼	增城	不详		行窃行劫
嘉庆九年	天地会	新会	陈芳洽	新会	不详	贫苦难度	抢劫
嘉庆九年	天地会	鹤山	梁修平	新会	不详		抢劫
嘉庆九年	天地会	琼山	曾博罗	博罗	训蒙度日	贫苦难度	抢劫
嘉庆十年	天地会	龙门	关亚猗	龙门	不详	谈及贫苦	抢劫
嘉庆十年	天地会	永安	黄庭华	永安	不详	谈及贫苦	抢劫
嘉庆十年	天地会	钦州	叶凤轩	归善	游荡无业	谈及贫苦	抢劫分赃
嘉庆十年	添弟会	海丰	蔡亚堂	海丰	不详	共谈贫苦	抢劫
嘉庆十一年	添弟会	曲江	黄贤通	曲江	不详	共谈贫苦	抢劫
嘉庆十七年	三合会	顺德	严亚邱	顺德	挑担度日	孤单无援	
嘉庆二十年	天地会	永安	赖元旺	永安	游荡算命	共谈贫苦	抢劫
嘉庆二十一年	天地会	乐昌	何满昌	南海	佣工度日	贫苦难度	抢劫
广西							
时间	会名	查获地点	会首姓名	会首籍贯	会首职业	起会原因	犯案情节
嘉庆九年	添弟会	博白	冯老四	广东钦州	海盗		抢劫
嘉庆九年	添弟会	博白	蒋正孺	广东合浦	行医度日	贫苦难度	抢掠财物
嘉庆九年	添弟会	博白	王政清	博白	不务正业	谈及贫苦	抢掠财物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平乐	邓弗成	阳朔	盗首	贫苦难度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平乐	张世聪	广东钦州	佣趁度日	异乡势孤	行劫打降



续前表

广西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平乐	何老三	广东南海	裁缝	异乡势孤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宣化	梁大有	广东南海	游勇	异乡势孤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宣化	班国邦 何有信	广东钦州	鹰捕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上林	潘老草	广东	卖药佣趁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上林	李老三		雇令挑担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上林	李桂	四川定远	雇工		行劫打降
嘉庆十三年	添弟会	来宾	颜亚贵	广东南海	贩马生理	各道贫苦	
嘉庆十三年	添弟会	平南	张亚胜	广东南海	不详	各道贫苦	敛钱使用
嘉庆十四年	添弟会	宾州	杨社新	宾州	不详	穷苦难度	抢劫银钱
嘉庆十四年	添弟会	来宾	韦特成	来宾	盗贼		抢劫银钱
嘉庆十四年	添弟会	桂平	陈进邦 马胜忠	广东高要	训蒙度日 耕种	贫苦难度	抢劫银钱
嘉庆十四年	添弟会	容县	黎树	容县	不详	穷苦难度	抢劫银钱
嘉庆十五年	添弟会	平南	粟金朝	平南	耕种度日	穷苦难度	抢劫银钱
嘉庆十六年	龙华会	宾州	李添保	广东南海	不详		抢劫银钱
嘉庆十七年	添弟会	容县	梁奇文	容县	耕佣度日	贫苦难度	抢劫银钱
嘉庆二十年	添弟会	容县	张日华	容县	不详	遇事相帮	抢劫银钱
嘉庆二十四年	添弟会	平南	赵兴奇	平南	雇工度日	道及贫苦	敛钱抢劫

从三省天地会案件的简表，我们可以看到，这 81 起案件分别发生在 45 个不同的州县，其中福建 31 起案件，发生在 17 个州县；广





东 28 起案件，发生在 19 个州县；广西 22 起案件，发生在 9 个州县。这反映出天地会在这一带传播的广泛性。从会首的籍贯和犯案的地点，我们可以看到，三省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 31 起案件中，首犯（天地会会首）属外省的有 7 人（主要来自广东、江西与福建毗界的地区）；属本省外县的有 5 人，属本县的有 19 人。广东省 28 起案件中，会首属外省的有 4 人（全部从福建省流入）；属本省邻县的有 7 人，属本县的有 17 人。广西 22 起案件中，会首属外省来的有 12 人（其中广东 11 人，四川 1 人）；属本省邻县的有 1 人，属本县的有 8 人，籍贯不明的 1 人。福建、广东的情况大体相似，天地会大多是由本省本地区的破产劳动者纠集结拜。其中福建有 7 人属外省，主要是道光年间天地会广泛蔓延之后，从广东龙川、江西南丰流入福建邵武、光泽、建宁、长汀一带开山、种茶的棚民。而广西的情况就大不相同，该地天地会案件的首犯，大部分是从广东来的，这反映出，广西的天地会主要是由广东人传入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天地会在广西的传播蔓延，与乾嘉以来广东大批向广西迁徙流动的步伐是一致的。由于大批破产农民和游民流入广西，并与广西各地的土匪相结合，结盟拜会，剽掠为生，到道光末年，一些地区就出现“游匪外滋，土匪内迫，连村标厂，横路刀枪”^①的局面。

从这 81 起会案 86 名首犯（会首）所供的职业情况看，属于佣工、苦力、贫苦农民的有 25 人，属于游民（包括盗贼、逃犯）的有 16 人，属于手艺人、小贩一类的有 7 人，县役文书和差捕有 4 人，贫苦僧侣 2 人，训蒙教读者 3 人，身份不明者 29 人。这个情况表明，嘉道年间天地会的骨干成员，主要还是农村的破产劳动者。这种情况，与乾隆年间天地会的成分基本相同的，而与后来同光年间会党成员中有大量破产的水陆运输工人和散兵游勇，是有显著差别的。如果将以上会首的职业和他们起会的原因（其中因穷苦难度的有 46 件，免人欺侮的有 12 件，报仇抢掠的有 4 件，不明原因的 19 件），犯案的主要情节（其中抢劫案有 50 件，骗钱使用者 22 件，情节不明者 10 件）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天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①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259 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

中国近代史研究



五、这一时期的天地会，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传会制度、结盟仪式、组织机构和一系列的隐语、暗号

根据清代档案材料记载，这一时期天地会的传播者，在各地民众结会，一般多持有拜会的歌本（如颜亚贵所藏的《桃园歌》^①）、会簿（如姚大羔所藏会簿^②）、拜盟誓单（如卢盛海等的结拜盟誓单^③）以及腰凭等。凡天地会成员，只要抄得歌本、会簿，即可辗转传会。这种情况，在乾隆年间即天地会的初创时期比较少见。虽然嘉庆年间有的天地会会犯供称，他们的会簿是天地会旧本传抄。如嘉庆十二年（1807年）福建南平县林应伟供称，同伙郑瑞观“有会簿一本，系天地会相传旧本，伊于丙辰年（即嘉庆元年——引者）抄得”^④。嘉庆二十年（1815年）福建武平县天地会会犯朱凤光供称，其所藏秘书一本，也是“相沿抄录”^⑤。可惜，这些会簿，有的已经烧毁（如朱凤光的会簿），有的已无法找到，因此，它们的详细内容也已不得而知。但是，据朱凤光供称，他的会簿是嘉庆十七年（1812年）谢国勋传播天地会时交给刘奎养，刘奎养于次年邀朱凤光入会，由刘奎养“转给朱凤光照抄”，会簿所言，“系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事”^⑥。对照嘉庆十六年（1811年）广西查获的姚大羔的会簿，我们可以得知，这些会簿讲的“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事”，就是万提喜万大哥创立天地会的故事，也就是后来天地会的各种传抄会簿中所载的《西鲁序》传说故事。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就可以推断，这种会簿的出现，应在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这是因为，万提喜创立天地会的时间是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身故^⑦，记载

① 颜亚贵所藏的《桃园歌》，系嘉庆十三年从广西来宾县天地会会首颜亚贵身上搜出，见《录副奏折》，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广西巡抚恩长奏。

② 姚大羔所藏会簿，系嘉庆十六年从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家中搜出，见《录副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广西巡抚成林奏。

③ 卢盛海等结拜盟誓单，系嘉庆十一年获得，地点、时间不明，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727~728页。

④ 《录副奏折》，嘉庆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阿林保奏。

⑤⑥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大学士董诰奏。

⑦ 参见《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



和神化他创立天地会的故事，必定是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之后。至于后来一些会簿中将万提喜创会的时间说成“康熙年间”，这可能是故事神话化，或是传抄错误的缘故。

关于传会的歌本和拜盟的誓单，我们从颜亚贵的《桃园歌》和卢盛海的结拜盟誓单的具体内容看，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天地会拜盟时宣读的誓词。这种誓词，与乾隆年间的《天地会盟书誓词》，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嘉庆年间的歌本、誓单中都罗列着关帝圣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鬼谷先生等众神祇，以及天地会虚构的五祖神。这些神祇只是作为天地会成员歃血拜盟时的盟证，以约束拜盟人信守誓约。

天地会的拜盟仪式，在乾隆年间一般比较简单，“凡传会时，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①。但到了嘉道年间，这种结拜仪式就变得愈来愈复杂。嘉庆年间各地天地会拜会时，多在供桌上供奉“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②，有的还写明“传会之洪祖师即洪二和尚牌位”^③，有的还供出天地会虚构的蔡德忠、方大洪、吴天成、吴德帝、李色开等“五祖”的牌位。^④桌上安放一米斗，斗内插有五色旗，还放剑两把，以及剪刀、尺、铜镜等物。这些物品，在天地会内有特定的含义。如米斗（木斗）即代表“木杨城”；剑是七星剑，以示覆满兴明之意；尺是用以比较会员之行为，和计算天地合一之方寸；铜镜，用以照破一切善良邪恶；剪刀，可剪开蔽空之乌云。^⑤结拜仪式开始后，主盟人即手持刀剑，先令众人从刀下钻过（有的则令众人从桌下钻过），然后立誓，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洪字暗号，并宰鸡取血，共饮血酒。道光年间的结拜仪式，除安设木斗、供奉牌位外，有的还在供桌后烧火一盆，并用竹竿编制“三关”。主盟人手持长刀，站在第三关门旁，将刀架于关门之上，令新入会者从下面钻过，然后至牌位前焚香、盟誓歃血，再从火盆上跳过，最后饮清水一口，以示“同赴水火不畏避之意”^⑥。这一时期，天地会的势力已逐渐进入广州等城市，和香

①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58。

② 《朱批奏折》，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先福奏。

③ 《录副奏折》，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④ 五祖的姓名，各地所供，稍有不同，后来还发展成“前五祖”、“后五祖”。

⑤ 参见 [日]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40页。

⑥ 《朱批奏折》，道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贵州巡抚嵩溥奏。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港、南洋各地。在这些地方，天地会的结拜仪式就更为复杂。^①

由于天地会是民间秘密结社，为了会内之人互相识别和联络的方便，它有一套特定的联络暗号和隐语。这种暗号隐语，在乾隆年间的天地会内，只是传授洪二和尚所创的“三指诀”和“洪字暗号”，即“相约见人伸手指，并有洪字暗号，口称五点二十一，便是同教之人”^②。但是，到了嘉道年间，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天地会的严厉镇压，同时又由于天地会势力的广泛蔓延，天地会的隐语暗号，也就随之变得更加严密复杂。除了原有的“三指诀”外，在出门的衣着、纽扣、发辫的盘法、路上的盘问，以及取茶点烟饮酒等方面，都有一套严密的隐语暗号。^③

随着天地会的广泛传播，它的组织机构方面，也有相应的发展变化。在乾隆年间，天地会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会首称为大哥，在台湾林爽文起义期间，天地会也只发展到三房，在起义斗争中，设置过元帅、军师、先锋等职。但到了嘉道年间，已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机构和职位。根据档案材料的记载，这时天地会的会首，如果到一个地方去传会，一般先发展数人为骨干，由他们辗转纠众结会，建立起几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分别充当各个分支机构的大哥，并公推最初来该地传会的人为总大哥，即各分会的总头目。这种按照传统家族制纵向发展的结果，就出现天地会虚拟的五房制。同时，在各个组织机构的内部，各级头目的名称职责，也已基本确定。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中记述三合会的内部机构说：“公所之首领称大总理，或称为元帅，普通称大哥，是万云龙所拟。以下之头目称香主，普通称为二哥，为陈近南所拟。再次之头目称白扇或先生，或称三哥。再次为先锋，是为天祐洪所拟。次则为红棍，以执行会员之刑罚。以下总称草鞋，为最下级，服役使令随行等事。”^④由此可见，在天地会的组织机构内部，其头领一般分为总理（即元帅）、香主、白扇、先锋、红棍几个等级，即按大哥、二哥、三哥……次序排列。这些头目的设置，以及他们的职责分工，在嘉道时期各地的天地会组织中已经形成，不过，具体的称谓确有不同。

① 参见 [荷] 施列格：《天地会研究》；J. S. M. Ward, W. S. Stirling, *The Hung Society*; Morgan, *Triad Societi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60。

②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严烟供词》。

③ 参见《姚大羔会簿》，见《天地会》（一），3~30页。

④ [日]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39页。



例如，天地会的首领，一般都称大哥，但在广东海丰等地则称大排、老母，在新会等地称阿妈或亚妈。关于天地会组织内部各头领的职责分工，以及他们结拜的具体情景，《香山县志》有一段比较简明完整的记载：“道光二十二年三合会再起，始事者石门甘秀，踞老巢啸聚。至于劫掠拒捕者，则隆都高明远、周配据也。初起时，撰妖书，造隐语。传教者曰亚妈；引入会者曰舅父，又曰先生，曰升上；主文字者曰白扇；奔走曰草鞋；各头目曰红棍。拜会曰登台，演戏入会曰出世。每拜会，亚妈裹红帻，服白衣，设五色旗，上书彪、寿、合、和、同字，分布五方，从某方来者隶某旗。设三重门，每门二人持刀作八字形。拜会者匍匐入，自称曰仔，赤身披发，跪伏拜斗，念三十六咒，割指血盟，受隐语、三角符，符内写‘参天宏化’四字。发辫系两线，辫结一圈。头目曰天牌，圈正额；司事曰地牌，圈脑后；先入会者曰人牌，圈左耳；后入会者曰和牌，圈右耳。俱身披短袄彩带，蓝锐履露刃。彼此相遇问姓，各以洪对，或称三八二十一，便知是会中人。不肯入会者曰皇仔，冒其教者曰野仔、曰疯仔。每入会科洋银一，铜钱三百六十，曰祝寿钱。不识其隐语暗号者即被掠。”^①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嘉道年间的天地会，无论在组织机构方面，还是结盟仪式方面，以及隐语暗号会规方面，都已发展得比较系统完整。

总之，嘉道年间，在中国会党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以天地会为主体的会党势力在南方广泛蔓延发展，其组织，若星星之火，遍布各地；其成员，若恒河之沙，不可胜计；其斗争，层出不穷，连绵不断。虽然由于清朝统治者的严厉镇压，斗争比较分散，规模多不大，但涓涓之水可以汇成大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天地会的广泛传播和不断进行斗争，才有可能出现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会党运动的高潮。

^① 《香山县志》卷22，49页。

太平天国起义前夕雷再浩和李沅发起义的几个问题



从道光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36—1849），在湖南宝庆府的武冈州和新宁县，相继发生了4次农民起义。这就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新宁蓝正樽起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武冈曾如炷起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新宁雷再浩起义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新宁李沅发起义。其中，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发生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夜，规模较大，聚众达数千人，转战于湘桂黔三省边界的二十几个州县，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清朝政府调集了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队，并与当地的地主团练联合堵剿，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前夕，中国南方发生了许多农民起义。由于各地的社会情况不同，农民起义的内容和反抗斗争的形式也就各异。有的地区主要表现为抗粮抗租，有的地区主要表现为饥民起义、抢米，有的地区还有复杂的土客斗争和民族斗争。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组织也不一样。有天地会系统的会党组织，有白莲教系统的教门组织，还有教、会相混的各种名目。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湖南宝庆地区的阶级关系怎样？农民的反抗斗争有些什么特点？这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宝庆府位于湖南的西南部，以五岭山脉与广西相隔，地多崇山峻岭，交通十分不便。所属武冈州、新宁县，更是僻在山陬，“山多田少，山地硗确，平壤肥沃”^①。境内汉、瑶民族杂居，人民“以种

^① 《新宁县志》卷20，《物产志》。



稻为宗，山畜乃种麦苞谷，终岁劳苦，无暇他营”^①。鸦片战争以后，这个地区也成了由两广输入商品和鸦片走私的通道，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这样的社会环境，就使当地的阶级关系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呈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耕地，特别是平壤良田，大部被汉、瑶地主豪绅占有，广大瑶、汉农民则无地或很少有土地。例如，在武冈州，高沙镇的地主邓拾禄一家，就占田 9 000 多亩。^② 据统计，当时湖南的耕地，每人平均不过 1.69 亩，广西每人平均不及 1.30 亩，而宝庆府每人平均还不到 1.10 亩。^③ 这样，地主和农民占地数量的悬殊，在这一带就非常突出。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往往是“独富之家，处众贫之地”^④。因此，广大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之地，“秋成之后，即纳租于主家”^⑤，终年辛劳，而不得温饱。

农民除了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地方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李汝昭在《镜山野史》中记述说楚南“最贪者惟府县两官……每年征收粮饷，例外私设甲书，沿乡苛索，官役分肥。每逢听讼，未看词纸，先查粮册，量你家资取得几何，有钱曲可为直，无钱是反为非。……县曲不已，控府、控司、控院、控督，均批仰府，府仍转批于县，笙簧一板，纵有天翼，乌能出网罗？”^⑥ 又说：“县官刁诈，时而催征粮饷，时而取派军需，时而压捐功名，不捐者签票拿究，时而统带多兵，沿乡点名造册，时而示勒百姓，各备枪刀，不顾农时，限定一月三操，苛索不已，如水益深，而火益热，致累我金尽钱空。”^⑦

特别是瑶族聚居的地区，瑶族农民更是身受着地痞（主要指瑶族的地主恶棍）、汉奸（指地方政府的官差）、客民（指外来的汉族地主）“三害”。也就是说，瑶民不仅要受封建官府、汉族地主的剥削压迫，还要受瑶族地主恶棍的欺压。道光年间，新宁县的瑶族八峒里，就有“巨恶蓝年余、蓝年顺、李进发、蓝再康、蓝昌秋、雷

① 《新宁县志》卷 19，《风俗志》。

② 参见《湖南历史资料》，1958 年第 1 期，51 页。

③ 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400、406 页。这个数字是根据耕地数和户口数推算出来的。

④ 《左文襄公全书·书牒》卷 1，《上贺蔗农先生》。

⑤ 《新宁县志》卷 19，《风俗志》。

⑥ 《太平天国》（三），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本，1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⑦ 同上书，8 页。

再实、陈孔彰等十余雄”^①。他们交结县役，出入衙门，时而“串通花户（地主豪绅），加收瑶粮”；时而“勾结汉奸，入峒扰害”。他们强夺人妻，霸占民田；勒索苛派，抄殴生家；捆捉拷打，活埋人命。“强奸、强占、强抄、强牵、强砍、强夺，无恶不作”，致使“老幼有流离失所之苦，男妇有倒悬性命之惨”^②。瑶民蓝正樽（即蓝元旷）为了替八峒瑶民除害，从道光十四年（1834年）初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先后多次向县、府、省和总督衙门控告蓝年余一伙残害瑶民的罪行，但结果是“际遭乖蹇，有生莫救”^③。在“富贵者经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④的情况下，蓝正樽不得不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在新宁举起了起义大旗，八峒里的瑶民首先响应，反抗的烽火迅速燃遍新宁、武冈、城步各地。瑶族人民多次踊跃参加农民起义，与汉族农民并肩战斗，是这个地区农民反抗斗争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武冈、新宁盛产稻米，除供本地民食外，还运销外地。本地的地主豪商，多以市米为利，武冈的高沙市（今属洞口县）就是一个重要“米镇”。道光年间，每年“经常有百数船停着，在这里装米卸货”，但是，这一带的自然灾害又特别频繁，一遇水旱虫灾，地主米商便囤积居奇，抬高米价，“贫民求升斗而不可得”^⑤，常常酿成饥民起义。据《宝庆府志》记载，自乾嘉以降，郡内发生了数十次水旱虫灾。大灾之后，米价飞涨，“斗米钱五百文”，“斗米值钱八百”，以至“斗米镪一两”。大饥大疫，接踵而起，“乡城男妇死者无算”；饥民聚众鬻余，放火抢谷之案不一而足。有的地方，“饥民聚众劫仓困，一日数十处”^⑥。道光十六年（1836年）蓝正樽起义，最初是由饥民向富户索食开始的。^⑦ 鸦片战争以后六七年间，武冈、新宁相继爆发的曾如炷、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多起于灾荒米贵，“借此为号召滋事之端”^⑧。可见，饥民起义、阻米抢米连绵不断，是这个地区农民反抗斗争的另一个鲜明特点。

①②③ 据蓝正樽控告蓝年余的《词讼稿》，见《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1期。

④ 《万大洪告示》。

⑤ 《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1期，50、51页。

⑥ 《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

⑦ 参见《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1，《答周汝光》。

⑧ 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裕泰奏遵旨酌筹新宁善后事宜折，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2辑，1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以往有不少论著把雷再浩、李沅发的起义说成是天地会起义。^①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实际上，无论是雷再浩起义时的棒棒会组织，还是李沅发起义时的把子会组织，虽然与天地会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们都不属天地会，而是由青莲教演化而来的。

青莲教，在湖南通常称为“斋教”，是白莲教系统的一种教门组织。武冈、新宁一带的青莲教，是王又名从四川传来的。“王又名者，四川成都人。道光十年，以青莲邪教诱愚民；言习其术，可以成仙佛。武冈民程孔固拜以为师。又名令食长斋，事无生老母神，又授以《龙华经》、《忏悔经》及坎卦图章。遇佛诞日，聚其党徒，谓之作龙华会。愚民翕然信之，其党遍武冈、新宁境。”^②又据程孔固的儿子程恒忠供认：“道光十五年正月，有四川成都人王又名来至伊村，向伊父程孔固言及青莲教是金丹大道，如能学习，可以成仙成佛。程孔固随拜王又名为师，誓食长斋，传授《龙华会经》及《忏悔经》文，并坎卦图章。即于家内设立无生老母牌位，早晚焚香念经，每逢佛诞日，做龙华会供佛。”^③另外，湖南巡抚裕泰也奏称：“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有四川成都府人王又名，来至武冈州算命，与程孔固会遇。王又名称有青莲教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如能学习，可以却病获福，成佛成仙，程孔固随拜王又名为师。”^④可见，青莲教传入武冈、新宁，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前后。

青莲教与白莲教一样，本是一种民间宗教结社，但它在阶级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困苦而动荡不安时，也能成为联系和发动群众进行反抗的组织。如前所述，武冈、新宁一带，嘉道以来，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所以青莲教传入以后，很快就与当地的农民起义结合起来。道光十六年（1836年）二月，蓝正樽在新宁发动起义，就是在

①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见《太平天国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1955；罗尔纲：《朱九涛考》，见《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北京，三联书店，1955；马少侨：《太平天国前夜李沅发的起义》，载《历史教学》，1953（2）；以及其他一些中国近代史著作。

② 《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亦见《武冈州志》卷1，《大政纪》。

③ 《录副奏折》，道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讷尔经额奏。

④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湖南巡抚裕泰奏。

他与陈仲潮、张永祿等拜程孔固的门徒雷倡和为师，习得青莲教以后，用青莲教组织发动起来的。^①

应该看到，嘉道以来，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迅速发展，从两广一带向北移动，与两湖地区白莲教系统的教门势力相会，教、会之间便互相渗透，逐步趋向融合，湖南出现了许许多多教、会相混的组织名目。不少教门的组织，带有会党的色彩；有些会党的活动，也具有教门的特点。^②咸丰元年（1851年），黄兆麟在一个奏折中说：“现闻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所属地方，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到处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各教中皆分温、良、恭、俭、让五字号，让字总领数百人，至温字则总领数千人。又有斋匪，名曰青教。名目虽分，其教实合，皆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其传徒皆有度牒，以布为之，上书‘关口度牌牒’五字，盖印‘保和堂’图记。湖南距四川数千里，而教匪声气联络，彼此号令，随时可通，各州各县各村各乡皆有党羽散处。其匪徒持度牒往来，随处皆给银钱饭食。每月则于各乡旷野按三、六、九期赴会。头目乘轿骑马，动辄数百人，俱席地坐醉，饱即扬去。……宝庆府之邵阳、新化及武冈等处，教匪皆以阻米出境为名，肆行抢夺。凡遇载米之船出县境界，立即聚党成群，各持械劫掠一空。……道光二十三年，武冈州曾如炷等阻米出境，酿成巨案。”^③黄兆麟这个奏折，说明了三个重要事实：（1）教门组织在湖南蔓延情况严重，“到处教匪充斥”；且不断组织群众进行反抗，宝庆一带的斋教，主要是闹阻米抢米风潮，酿成曾如炷阻米巨案。（2）湖南教门名目繁多，“名目虽分，其教实合”，实际上多是青莲教即斋教的变名。（3）这些教门，“皆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这正反映了青莲教与天地会发生融合，天地会向青莲教渗透的真实情况。

过去，罗尔纲同志对上述奏折的内容也做过分析。^④可能他没

① 参见《录副奏折》，道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讷尔经额奏；亦见《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

② 参见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82（1）。

③ 《录副奏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④ 罗尔纲同志所引用的，是咸丰帝谕军机处大臣时转述黄兆麟奏折中的一段话（见《大清文宗圣训》卷90，亦见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10），与黄兆麟原折内容一致，但文字稍有节略。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73页。



有考虑到教门与会党在湖南互相渗透，三斩趋融合的复杂情况，因而对斋教何以奉万云龙为总头目，并有忠义堂名号，未能作出切合实际的说明。他只是根据奏折中所说的“斋匪”以万云龙为总头目，并有忠义堂名号这两个现象，便做出推断说，这种“被满清统治者称为‘斋匪’的会门，实在乃是天地会，跟那个吃斋念佛的斋教绝不相同”。由此，还进一步推论，“咸丰初年在湖南起事的会门，乃是天地会而不是斋教”^①。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罗尔纲同志也就把雷再浩、李沅发起义，说成是天地会的起义。^②

但是，事实与罗尔纲同志的推断似有出入。据有关档案资料和地方志书记载，湖南那些被清统治者称为“斋匪”的会门，实际上多是吃斋诵经的斋教；咸丰初年在湖南起事的会门，其中有不少确属斋教，而不是天地会。至于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能否称之为天地会起义，就需要对棒棒会和把子会的组织状况，做一番具体分析，看它们内部究竟是斋教的因素起主导作用，还是天地会的因素起主导作用？然后才能做出结论。

首先，我们来看雷再浩起义时的棒棒会。这个组织，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秋由新宁瑶民雷再浩与广西全州人李世德共同倡立的。雷再浩与李世德本来就是“茹素邀福”^③者，所以，他们倡会之初，即“以白莲教吃斋诵经为名多集党羽”^④。后来，他们考虑到“本地荤食之人不肯允从”，特别考虑到便于吸收邻近州县天地会势力（如加入棒棒会的李魔湾的一大帮，原来都是道州的天地会分子），就在棒棒会内“分青、红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荤”^⑤。招人入会时，一面“先搭高台，以一头目为首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斋钱一百八十文，焚香歃血为誓”^⑥；一面则进行消灾避劫的说教，“捏称近有刀兵之劫，如肯入会，即可过此关”^⑦。入会后，“每人分给小白布一方，上写‘关口度牌牒’五字，盖用‘保和堂’戳记，作为暗号”^⑧。起义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76页。

②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40页。

③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璟奏。有的材料说，他们本来就是青莲教徒，系程孔固之门徒，蓝正樽起义失败后，“孔固死党多归此二人”。参见《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

④ 《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

⑤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璟奏。

⑥ 《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

⑦⑧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璟奏。

时，会众按五营五旗编制。起义失败后，在雷再浩的住处以及许多部众身边还搜出《大乘经》、木剑等物。^① 以上情况表明，雷再浩起义时的棒棒会，在不少方面已不同于蓝正樽起义时的青莲教。也就是说，它在拜会的仪式、接纳的会众以及会首称呼等方面，因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开始发生变异，掺杂了天地会的一些因素。但是，从它倡立的基础、所持的教义以及组织的结构等方面看，基本上还保持了青莲教的面目。因此，就棒棒会的总体来说，就其质的规定性来判别，我以为它是青莲教即斋教，而不是天地会。

我们再来看李沅发起义时的把子会。李沅发是新宁县水头村人，家无田业，系雷再浩同党。许多材料说明，他曾充当过雷再浩的“总铁板”。^② 雷再浩起义失败，“余党溃散，复归李沅发”^③，据说有一千余人。^④ 由于新宁县连续发生了蓝正樽、雷正浩的斋教起义，统治阶级惧于斋教的威胁，便“立团长保甲严禁斋匪”^⑤。李沅发等只得转入秘密活动。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由于新宁暴雨成灾，“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发卖”，有些地主则趁机出借“义谷”，勒索重利，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李沅发即以“劫富济贫”为号召，倡立把子会，结拜弟兄，准备起义。他与谢有兴、刘复侣等分路纠邀，“放台聚会，无所忌惮”。十月十三日，李沅发即率众起事，攻城劫狱。起义军按“五营十行”编制，各营头目“俱称大哥”，李沅发为“总大哥”，并有“三军司令”大旗。^⑥ 如果从把子会的放台结拜，会内兄弟相称，以及树有“三军司令”大旗等情况看，它比雷再浩的棒棒会，就具有更鲜明的天地会色彩。但从它的“五营十行”基本建制^⑦，会内吃斋诵经，以及李沅发在起义过程中，还随身“藏有小铜佛像，早晚礼拜”^⑧等情况看，我认为把子会的性质仍属青莲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雷再浩起义时的棒棒会和李沅发起义时

① 参见《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湖南巡抚陆费瑑奏。

② 参见《朱批奏折》，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湖广总督裕泰奏，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2辑，137页。

③ 苏凤文：《平桂纪略》卷1。

④ 参见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见《江忠烈公遗集》。

⑤ 《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

⑥ 参见《李沅发供单》、《裕泰奏委员将李沅发解京讯办折》、《裕泰申明李沅发起义经过及审拟拿获义军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2辑；《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

⑦ 这种“五营十行”建制，来自青莲教的五行十地。青莲教亦称“五行十地佛教”。

⑧ 《李沅发供单》，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2辑，139页。



的把子会，都来源于青莲教，与蓝正樽起义时的青莲教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吸收或混杂了不少天地会的因素，但在基本教义和组织结构方面，仍保持了青莲教的一套，它们在本质上都属青莲教。因此，不能把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说成是天地会起义。

三

弄清了雷再浩、李沅发起义的性质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和发展，不仅与两广、湖南一带的天地会起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这一带的青莲教（斋教）起义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过去史家比较重视太平天国起义与天地会的关系，没有或很少论及太平天国起义与青莲教（还有其他教门）的关系，而且把两湖地区的教门起义，一概说成是天地会的起义，这是不全面、欠妥当的。

那么，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和发展与青莲教的起义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具体地说，青莲教雷再浩、李沅发的起义，对太平天国起义究竟有哪些贡献？太平天国起义对青莲教持什么态度、采取什么政策？

关于青莲教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贡献，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他们与广西的许多天地会起义相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为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都发生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前夜，当时天地会的起义正处于高潮时期。在广西，就有二三十支较大的天地会势力相继起义。如果以拜上帝会活动的基地金田紫荆山地区作为中心，那么，在它的东部，就有陈亚贵、罗大纲、苏三娘、张钊、田芳等著名的天地会势力和“艇匪”（亦属天地会系统）罗亚丙、任文炳等相继起义；在它的西部，则有著名的陶八、黄晚、颜品瑶、颜八、李四、潘源、覃上养以及张嘉祥等起义；在它的南部，有何明科等的起义；在它的北部，有罗三凤、何崧等的起义。而雷再浩、李沅发起义正处于它的北部湘桂边界地区。这些起义，对紫荆山地区的起义力量，形成了一个大的掩护圈。如果说，1851年前广西天地会的起义，对太平天国起义



的酝酿、发动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那么，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是很显著的。因为，无论是雷再浩起义还是李沅发起义，都与广西的天地会势力“声息相通”。1847年雷再浩起义爆发，广西平乐、桂林一带的罗三凤、何崧部，就首先起来响应；接着其他各府厅州县的天地会，也多“乘机窃发”^①。李沅发起义发生后，楚粤交界，更是“所在响应”^②。清政府调集了湘、桂、黔、鄂四省军队，由湖广总督裕泰、湖南提督向荣指挥，经过半年多疲于奔命的堵击，才将起义平定下去。他们的斗争，大大削弱了清朝统治者的力量，使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暇顾及拜上帝会的活动，更无法集中兵力将太平天国起义绞杀在摇篮之中。

（二）为太平军进军湖南开辟了道路，增援了有生力量。

1852年6月，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他们刚踏进湖南永州，湘南各地的天地会和斋教的群众就纷纷赶赴太平军营，“为之导引”。在这些群众的帮助下，太平军深入湖南内地，“毫无疑问歧途，僻径恍若熟游”^③。当时，还有大批的“斋匪游民”加入了太平军。^④据江忠源说，当时“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⑤。由于这一带天地会和斋教群众的踊跃参加，不到两三个月，太平军的人数“已逾十万”^⑥。十月，太平军攻长沙时，宝庆府的邵阳、新化、武冈等州县，以及湘南其他地方的群众，“结党横行，劫掠乡里”^⑦，起来响应和支援太平军。

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究竟有多少雷再浩、李沅发起义的余众加入了太平军，目前已无法确知。但是，太平军接纳雷、李起义的余众，特别是参加过雷、李起义的湘桂边界的群众大量加入太平军，却是无可置疑的。太平军石达开的部将赖裕新（即赖剥皮），原来就是李沅发起义军的成员^⑧，后来成了太平天国的著名战将。由

① 参见《湖南通志·兵事志》。

②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

③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查办各属土匪片》。

④ 参见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⑤ 江忠源：《答刘仙霞书》，见《江忠烈公遗集》，第2册，6页。

⑥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

⑦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查办各属土匪片》。

⑧ 这是1957年5月24日新宁县金峰乡76岁老农王恒权根据他前人所述故事内容的追忆，见《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1期，64页。



此可以想见，太平军里必定还有不少人来自雷、李起义军。

值得指出的是，咸丰九年（1859年）石达开率部进入湖南时，湖南人民加入太平军仍“以十余万计”；石达开入宝庆府，武冈、新宁等处的“无业山民，裹附尤众”^①。虽然石达开攻宝庆是为打开入川通道，以另谋出路，但当地群众却大批投奔太平军。

（三）他们在起义时提出的要求，为太平天国制订政策，提供了借鉴。

在太平天国起义酝酿发动时期，广西、湖南一带连续发生严重灾荒，广大贫苦农民、饥民迫于生活，不断起来起义。宝庆地区农民的阻米抢米斗争更是不断，雷再浩、李沅发的起义是一个高峰。要粮食、要生存，是广大农民最普遍最强烈的呼声。这对当时太平天国的领导制订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金田起义爆发以后，太平军“所过粤西州邑，搜刮资粮”^②；太平军入湖南，把富室巨家的粮食衣物散给贫者，湘南各地会门群众还自动起来“沿途张贴伪示，称受伪东王札谕，劫掠富户”^③。因此，“穷者、强有力者，遂甘心从贼，自去投营，以图温饱”^④。我们还看到，太平军过长沙以后，又宣布“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⑤，显然是接受了抗租抗粮地区农民的要求。由于在进军过程中，能因地制宜地制订政策，反映各地农民的切身要求，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当然，斋教群众支援太平天国起义，绝不只是雷再浩、李沅发的起义及其余众，也绝不限于湖南宝庆或湘南一带。可以说，太平军在湖广地区，每到一地，那里的教门教众和天地会众一样，多“闻风附和，从乱如归”^⑥。我们看到，太平军进湖北，抵武昌时，崇阳、通山、蒲圻、大冶等地教门群众，成千上万地投奔太平军。留在本地的群众，也“多已蓄发，乐为贼用”，以致清军来到这些地方时，竟“无土人为响导，无米盐可办”^⑦。

关于太平天国对斋教的政策，据现有的材料看，与对天地会的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都采取了联合的政策。教门成员加入

① 《朱批奏折》，咸丰九年五月十三日湖广总督官文奏。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

③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湖南土匪滋扰剿办情形片》。

④⑤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

⑥ 《张大司寇奏稿·两湖稿》，《通崇土匪略定委员接办折》。

⑦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报崇通剿匪胜仗折》。



太平军，也一概受到欢迎。不过，太平军对初加入的会门会众，都要进行教育训练，还要实行宗教洗礼。“其训土匪以七日一次，教以用兵之法，谓听讲。土匪之初入也，以铜盆水沃面抹胸，授红巾号衣，念咒廿四句，谓之拜相。拜过相者，其发辫后必有火焰印，以此蛊民，故附者多闻不畏死”^①。这个记载，与李进富供词的有关内容是基本一致的。李进富系广西桂平县鹏隘山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他在鹏隘山加入了拜上帝会，入会时“头子当天用水一盆，拜毕将水浇心胸膺，蓄长头发，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②。可见，太平天国对会门会众进行联合的同时，还按照拜上帝会的教义、组织纪律等对他们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教育改造工作。看来，这种工作对于分散加入的会门会众比较容易进行，而对那些有组织的成千成万地加入太平军的会门会众，究竟怎样进行工作，至今还没有材料具体说明，这是需要进一步发掘材料，加以探讨的问题。

①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

② 《李进富供单》，F. O. 682/253/A3，原件存英国档案馆，引文据英国学者柯文南博士赠送给我的复印件。

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

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它一直被人们所重视，也有过不少争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不少进展，但许多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有些事实也需要考订清楚。下面就太平天国在各个不同时期与天地会的关系做些分析。

一、起义酝酿时期

自 18 世纪下半期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已日益尖锐，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延绵不绝，联系和发动人民斗争的秘密结社，像燎原星火，遍布各地。天地会就是活跃在南方的一大秘密结社系统。它在清乾隆年间首先出现于福建漳州地区，到嘉道时（即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中叶），已遍及福建、台湾、两广、湖南、江西、云贵等广大地区，还传到南洋。有人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初步统计，从 1789 年到 1835 年这 40 余年内，具有相当规模的人民起义达 561 起。^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人民群众除了受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外，还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鸦片战争战后 10 年内，人民的负担比战前增加了 1 倍以上，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无数散兵游勇无以谋生。他们加入秘密结社，如水赴壑，随处可见。南方天地会势力飞速发展：在广东，“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不特外府州县勾结拜会者不可胜数，即省城白云山，近在咫尺，亦无时无匪拜会”^②；在

^① 参见 C. K. Yang, “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② 曾望彦：《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

广西，“拜台结党，旗帜各编堂名……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①，谢兴尧根据《堂匪总录》等书统计，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广西天地会堂股名称有120多个^②；在湖南，“结党成群，啸聚山谷”^③。从1836年到1855年这20年内，以秘密结社为中心的人民反抗斗争达1217次。^④斗争的锋芒不仅指向封建统治者，也指向了外国侵略者。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夕，两广、湖南的天地会不断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使清朝统治者发出这样的哀鸣：“近日情势，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即将溃烂……终必有溃败不可收拾之一日。”^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1月写的《国际述评》中，对鸦片战争后10年内中国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反抗斗争，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贫穷和另一部分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⑥。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民的反抗、造反，主要指天地会起义；他们所言的“暴力革命”，就是后来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如果说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那么，天地会的斗争就是它的前驱。天地会为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天地会的广泛起

①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② 参见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三联书店，1950。按：《堂匪总录》等书记载错综凌乱，谢先生的统计为读者了解堂股名称提供了方便，但应指出，这个统计似乎还有差错之处，例如，1852年同胜堂一栏（见该书第42页）原分为复汉、山义、结义、忠义、公义、连义、园明、广寿、同胜9堂，至1855年9堂才合并（参见苏凤文：《堂匪总录》卷6，1~4页），谢先生只统计了同胜堂，虽在山义堂栏备考内注明9堂联合，但总的统计中9堂名目未统计入内。

③ 《曾国藩全集·奏稿》卷1，《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④ 参见C. K. Yang, “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⑤ 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6，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使他们力量分散，疲于奔命，无暇顾及拜上帝会的初期活动，因而太平天国起义才有可能在思想上、组织上做较充分的准备。洪秀全、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以后，就深入群众进行组织发动，通过六七年的艰苦工作，为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1851年，清廷对拜上帝会的活动和它的领导者，仍茫然无所知，这说明天地会的斗争，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发动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其次，太平天国起义在准备时期吸收了大批天地会的力量。由于高涨的起义形势，由于拜上帝会的主动争取，许多天地会分子加入了拜上帝会，如秦日纲带到金田去的千余龙山矿工，大多是“拜会结盟”的天地会成员^①，罗大纲、苏三娘等更是率整部天地会起义军参加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更重要的是，天地会长期以来的斗争，为太平天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说太平天国在思想上、组织上曾以农民革命空前的高水平和新面貌出现的话，那么，首先应该看到它是从天地会那里得到了宝贵的借鉴。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就记载了洪秀全评论天地会的一段重要谈话：“我虽未曾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如果我们讲真道理，而倚靠上帝强有力之助佑，我们几个人便可比他们多数。甚至孙臬、吴起、孔明等及其他古代历史中之嫫于韬略战术者亦不值得我之一赞，三合会更卑不足道矣。”洪秀全对天地会重大弱点的批评是中肯的。在这里，他首先总结了天地会在斗争纲领、口号方面的缺陷，指出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反清是对的，复明就不合时宜了，起义的目标应当是“开创新朝”。鉴于天地会的这个根本弱点，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发动太平天国革命时，首先就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纲领、口号，在他的一系列理论宣传作品中，一面无情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现实社会“陵夺斗杀”、“尔吞我并”的黑暗；一面则明确提出要通过起义，推翻

^① 参见梁崇鼎：《贵县志》卷11。



清王朝，建立一个“强不犯弱，众不暴寡”，“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其次，洪秀全指出了天地会的一些恶习，如拜魔鬼邪神、入会要钱、烦琐的仪式和誓词等。^①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就打破了天地会崇拜多神的传统，确立只拜上帝，并采用简便的仪式，规定了十款天条，严格禁止拜邪神、赌博、吸鸦片、奸淫等恶习。洪秀全还规定“凡三合会人们，如不舍邪弃旧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②。这应该说是太平天国早期对待天地会的一项政策。按照这个政策，太平天国对天地会既实行联合，吸收天地会的力量，又严格要求，坚持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原则。这个政策是出于起义斗争的需要，是比较符合群众要求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囿于宗教成见”。事实上，它对太平天国统一思想、加强队伍的组织纪律起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一点，从广西的调查资料，也得到了具体的证明。金田起义之前，当地人民“有拜上帝的，同时也有拜三点（即三点会——引者）的”。由于“拜三点的人，到处打家劫舍；拜上帝的人不抢人，不打劫，买卖公平，群众拥护他”；而且“拜上帝不用钱，拜三点要钱；拜上帝的人宣传拜上帝的有饭吃，将来入了朝大家有福享”。所以，“大家都愿意参加拜上帝会，原来的三点会分子也多被拜上帝会吸收去了。尤其桂平的江北岸，从大湟江口至新圩、三江一带，一时不见了三点会活动的踪迹”^③。

天地会的另一根本弱点，就是组织分散，山堂林立，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严明的纪律，在斗争中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个弱点也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所重视。洪仁玕曾指出，天地会“聚散无常，漂流靡定”，所以“官兵奉令剿捕”，“亦常奏功”^④。杨秀清在《天情道理书》中还特别提到广东天地会陈烂屐和广西天地会陈亚贵的起义，指出他们“肆行无忌，残害人民”，“图逞一日之豪强”等纪

① 据我所见的资料，天地会在乾隆年间结拜方式很简单，嘉庆年间天地会流传的会簿内还没有三十六誓，传布到南洋一带以后，天地会结拜仪式就愈来愈复杂，有三十六誓、七十二律等，而且三十六誓的条文也各有异同，无产者的恶习也愈来愈严重，参见有关档案资料；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英]司托丹（Stanton）：《三合会史》（*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League*）；[英]活特、斯特林编著：《洪门》（*The Hung Society*）；[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②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六）。

③ 《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84~85页。

④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律败坏的情况。这是太平天国吸取天地会的历史教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太平军“聚而不散”^①，指挥统一，“军律极严”^②，“队伍之制，条目井井”^③，与天地会起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太平天国不单吸取了天地会的教训，同时也采纳了它的某些长处，特别是在思想制度方面，继承发展了天地会某些有益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外许多学者做过探讨。这里只提一下太平天国在土地纲领和圣库制度方面受到天地会的启发和影响。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之前，无论是天地会还是太平军，都已提出了分配土地和改革私有财产制度的要求，而天地会所提出的要求则更早。再拿圣库制度来说，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广西的一些天地会组织已实行一种“米饭主”制度。凡是米饭主，都开堂设馆，无衣无食的贫苦农民破产劳动者投奔米饭主后，就由米饭主管饭食。而在组织内部，所得财物则完全归公，还必须严守纪律，服从指挥。杨西安就是广西天地会势力中最大的一个“米饭主”，他“有众数万，曾先后攻陷平乐、富川、恭城等处”^④。另外像凌二妹、邱二嫂还是势力很强大的女米饭主，邱二嫂后来率领数千加入了太平天国的队伍。而太平天国方面，在金田起义前夕，也已实行了“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⑤的公库制度（即圣库制度）。有的同志认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就是继承并发展了天地会的‘米饭主’制度”^⑥，我以为是符合实际的。也有一些同志从圣库制度与米饭主制度之间的差别，以及他们出现的时间、地点方面表示过异议。我以为，说圣库制度是继承发展了米饭主制度，并不排斥两者的区别。从出现的时间、地点来看，据清朝官书记载，最早的米饭主似乎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冬河池州的韦世尧、韦世贵。^⑦但不能认为在此之前就不存在米饭主制度，也不能认为当时只存在于河池州地区。实际上，1850年以前广西连续发生灾荒，社会极度动荡，广大贫苦农民、饥民迫切要求解决生存问题。作为破产劳动者平时生活上互助的天地会，大量出现米饭主是很自然的，不过留存下来的文献记载太少罢了。

①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② 陈徽言：《武昌纪事》。

③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

④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

⑤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⑥ 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⑦ 参见苏凤文：《堂匪总录》卷3。

中国近代史研究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能及时体察人民的要求，将前人及现实斗争中提出的光辉思想、战斗口号，不断加以总结提高，终于形成《天朝田亩制度》这样一个包括土地、财产分配等各方面内容的，动员千百万农民起来斗争的伟大的纲领。

太平天国以天地会斗争为借鉴，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天地会不能比拟的新水平出现，就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和战斗力。这是太平天国革命与天地会斗争最本质的历史联系，是我们考察太平天国在革命准备时期与天地会关系时首先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对天地会实行争取联合的政策，吸收了天地会的大批力量，使革命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拜上帝会与天地会有教义方面的不同，但他们的阶级基础、起义要求是一致的。过多的强调他们教义的不同，忽视他们联合的根本基础，是不妥当的。太平天国在争取联合天地会的过程中，坚持拜上帝会的教义和严明的纪律，无疑是正确的，不是“囿于宗教的成见”。这是我们考察这一时期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胜利进军时期

从1851年1月金田起义，到1853年3月定都南京，这是太平天国胜利进军、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与天地会有何关系？

过去，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即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时曾一度与天地会联合，到1852年4月太平军永安突围，天地会领袖洪大全被捕牺牲后，太平天国就拒绝天地会的加入^①，把洪大全视为决定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分合的关键人物，将洪大全的被捕牺牲作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分合的临界点。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同志根据大量资料，证明这种看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②因

^① 持这种看法的，新中国成立前以萧一山为代表，见萧一山：《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告示跋》。另外，美国人海尔（Hail）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Tseng Kuo Fan and Tai-Ping Rebellion*），法国人卡勒与伊凡（Callery and Ivan）合著的《中国叛党起源志》（*L'insurrection en Chin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la prise de Nankin*）也持此见。新中国成立后以荣孟源为代表，见荣孟源：《天地会领袖洪大全》，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50。

^②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此，把洪大全看做决定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关键人物，将洪大全被捕牺牲说成是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分合的临界点，是没有根据的。（有关洪大全问题的考证，见本书《关于洪大全的身份》一章。）

实际情况是，无论洪大全被捕以前还是以后，太平天国与天地会都是合作的，洪大全被捕牺牲并没有影响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合作关系。在太平军永安突围以后的胜利进军过程中，天地会对太平天国作了更大的支援。且看事实：1852年4月太平军永安突围后，由广西进入湖南，在蓑衣渡遇伏，遭受重大的损失。当时，由于湘南大批天地会会众的加入，队伍迅速得到补充扩大。据李秀成说，“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两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茶陵州亦得数千”^①；清朝将领江忠源也说，太平军“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②。据罗尔纲同志估计，太平军在湘南吸收天地会会众5万多人，相当于太平军进入湖南前的10倍^③。其中有道州、郴州一带许多挖煤工人，太平军将他们组成土营，成了后来攻城攻坚的有生力量。太平军过醴陵攻长沙时，浏阳天地会周国虞组织了征义堂，率会众2万余响应，并与太平军潜通消息，积极联络。西王萧朝贵进攻长沙，由于得到周国虞的密信，详知清军虚实，乘其不备，一举全歼伊培杰2000余人。^④太平军克益阳，取岳州，又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天地会的力量，其中有数千船民、水手、纤夫，太平军将他们组成水营，在东下江南的水路进军中起了重要作用。太平军至武昌，“湖北之奸民皆从之”，“旧钟人杰之余党十余万人来投降”^⑤，队伍扩大到50万，抵南京，就扩大到100万。

值得注意的是，永安突围前后，天地会在支持响应太平天国的态度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永安突围以前，太平天国对天地会是积极争取的，天地会对太平天国总的来说是支持的。但有不少率部加入太平军的天地会会首，到后来除“罗大纲留在洪军不去，因彼正爱其军律之严，及其治军之教理”外，有的“藐视”太平军的力量，有的不

① 《李秀成自述》。

② 《答刘仙霞书》，见《江忠源遗集》卷1。

③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60页。

④ 参见《湖南省志》卷1，34页。

⑤ 汪士铎：《梅翁笔记》。



愿受太平军的纪律约束就脱离太平军，有的还投向清军。像“大头羊、大鲤鱼及其他五匪首率众离开，后来投降官军，转而攻洪军了”^①。但是，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几乎看不到类似情况的发生。天地会不仅踊跃投向太平军，“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②，而且还纷纷假借太平军的名义来号召，有的贴出告示，号召人民与太平军“同心协办，共襄义举”^③；有的打出“太平天王”^④的旗号。正如曾国藩所说，他们“甘心从逆，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⑤，太平军还在湖南时，武昌城内即出现天地会《总理军机镇守湖北大司寇郭》的布告，号召人民起来响应太平军，杀敌立功。^⑥太平军水陆东下江南时，江南一带天地会也都纷纷响应，皖南宁国府天地会以“特授开国军师平满统兵大元帅杨秀清”的名义发出安民告示^⑦，南京贴出《天地会诏书》，表达了他们对太平军“箪食壶浆迎至者喜其先至，翘首引领望之者恨不速来”的心情。^⑧

为什么永安突围前后天地会的态度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呢？为什么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天地会如此热烈响应和支援太平天国呢？我以为，一方面是由于太平军在斗争中迅速壮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太平天国对天地会有效地实行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对天地会会众进行宣传教育，特别是对天地会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促进了这种转化。

前面已经提到，太平天国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对天地会已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一面有效地争取和团结了大批天地会的力量共同起义；一面对张嘉祥等部叛变投敌，对陈亚贵等部“奸邪淫乱”、败坏纪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起义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太平军进驻永安时，仍有许多天地会分子倒向清营，充当壮勇，来围攻起义军，给太平军造成了许多困难。太平天国领导者们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公开揭露和积极解决问题。太平军在永安就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明确告谕“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也”，公开批评了广西某些天地会公然违背起义宗旨，认敌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② 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③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19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

④ 《文物》，1959（5）。

⑤ 《曾国藩全集·奏稿》卷1，《移驻衡州折》。

⑥ ⑦ ⑧ 参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252页。



为友，充当壮勇的严重错误。到湖南以后，太平军又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三篇檄文，对天地会转变态度，积极投向起义，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太平军实行了以“均产制度”为中心内容的起义纲领。洪仁玕早就指出，太平军“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①。清朝官员的报告也屡称：太平军“到处遍张伪示，首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②。“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③。所以，广大贫苦农民、天地会群众盼太平军如大旱之望云霓，太平军至，“争迎之”^④。太平军进占南京以后，上海的一家英国报纸刊载有这样一段报道：“太平军首领自豪地宣称：我们经过每个地区，人民欢迎我们就像欢迎及时雨一样，我们的旗帜打到那里，人民就像从巨大的灾难中获得重生。”^⑤生动地反映出太平军在胜利进军过程中深受人民群众包括天地会欢迎的盛况。

三、定都南京时期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农民起义的积极性。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天地会的斗争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首先表现在斗争的规模、坚持的时间多超过了从前。比较著名的起义有：1853年黄德美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刘丽川等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年广西天地会胡有录、朱洪英起义，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红巾军”起义。其中林俊起义，胡有录、朱洪英起义都坚持了5年之久。“红巾军”起义会众数十万，风暴席卷广东全省，蔓延广西，波及湘赣，坚持达7年之久。这些起义在较大的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廷，对太平天国政权是个有力的支持。

其次，斗争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 ② 《吉尔杭阿禀稿》，摘抄自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陈列室。
 - ③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
 - ⑤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3-06-18。



(一) 比较普遍地封王建政。太平天国之前的天地会起义，常常表现为流寇主义，旋起旋灭，飘忽无常，很少建立起政权，更没有称王封王的情况。有的起义虽然占领相当大的地区，但他们的首领一般只称“元帅”、“都督”之类，即使像规模较大的台湾林爽文起义，建立政权以后，也只称“总统开国大元帅”、“顺天大盟主”^①。但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特别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许多天地会起义开始称王建政，封王建国。如广东陈开、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1855年进入广西以后就建立了“大成国”，改潯州为秀京，以“洪德”纪年。陈开称“镇南王”，后改称“平潯王”，李文茂称“平靖王”，梁培友称“平东王”，区润称“平西王”，并广设官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② 胡有录、朱洪英起义，1854年攻占灌阳以后就建立“升平天国”，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录称“定南王”。^③ 有些起义虽然没有建国，但一般也多称王，如广西的罗德全称“定国王”，湖南何贱苟称“普南王”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不认为是天地会斗争史上的一个进步，而这种进步正是太平天国革命直接影响的结果，也是天地会学习太平天国的一个具体表现。

(二) 比较普遍地打起太平天国旗帜或改用“太平”称号。前面已经提到，太平军在向南京进军过程中，许多地方的天地会已开始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号，借用太平军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这种现象就更为普遍。有的以“太平天国殿前都督大元帅”名义号召，如1854年湖北崇阳的陈北斗起义。^④ 有的“蓄发变服，遍张伪示，用太平天国年号”，如1857年广西上林李锦贵起义。^⑤ 有的干脆号“太平天国”，如广西的黄金亮。^⑥ 奉号改号改元“太平”的更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在1853年9月7日起义建立政权的当晚，刘丽川就正式宣布，起义政权“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⑦。15日，刘丽川

① 《林爽文起义布告》。

② 参见苏凤文：《平桂纪略》卷2。

③ 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344页。

④ 参见上书，241~242页。

⑤ 参见苏凤文：《平桂纪略》卷2；苏凤文：《股匪总录》卷1。

⑥ 参见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

⑦ 原载《北华捷报》，1853-09-10，转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还向各国领事公布：起义政权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①。接着又将“大明国”正式改号“太平天国”，刘丽川自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②。他向天王上奏，自称“未受职臣刘丽川”，呼洪秀全为“我皇上陛下”。他在《致各国领事函》中，称洪秀全为“吾太平王”，又称“本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③。以上反映了各地天地会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太平天国的领导地位，反映出他们效法和敬仰太平天国。他们知道，只有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号，或投奔太平天国，斗争才更有力量，才能找到出路。

（三）斗争纲领、目标有了明显的进步。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集中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具体勾画出他们所要建立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蓝图，对广大贫苦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天地会的斗争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面提到，早在太平天国之前，天地会已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均贫富和分土地的要求，但往往是不具体不很明确的。《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以后，有些天地会起义就提出了同太平天国类似的要求。在《陈开自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起义是为了“同打江山，有饭大家食，有钱大家使，有衣大家穿”。起义爆发后，他们“所到之处，出示安民，商人乐业，无田者各给其田”^④。后来，广西天地会《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告谕》更明确提出“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畚水田，均为我农所辟，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自此之后，仍照旧制，田主不得借故收租”^⑤。陈金刚发布的告示提出了“天下之田地钱粮皆我之田地钱粮”^⑥的口号。1856年，湖南澧州陈正卯、陈庭杰的“穷团”起义，提出了“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⑦等口号。同年李文学在云南哀牢山起义，提出了“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薄赋二畹（成），荒不纳”^⑧的土地政策。发生在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在他们的文告中也宣布“赋税钱粮全行蠲免”^⑨。

① 原载《北华捷报》，1853-09-10，转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62页。

② 同上书，609页。

③ 同上书，17页。

④ 转见《光明日报》，1962-03-28，史学版。

⑤ 转见《光明日报》，1955-09-29。

⑥ 原载1960年编《岑溪县志（初稿）》上册，转引自钟文典：《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在思想制度上的关系》，载《广西日报》，1961-05-03。

⑦ 《湖南省志》，第1卷，65页。

⑧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

⑨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28页。



(四) 担负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任务。天地会同太平天国并肩战斗，共同打击侵略者，表现得也很明显。他们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当外国侵略者对起义进行破坏和武装干涉时，他们挺身而出，进行反击。1854年“红巾军”起义围攻广州时，英、美、法等国的侵略者，将大炮、火药、粮食运进广州城，接济清军，起义军首领陈显良即照会三国公使抗议：各国“每以舢舨等船用米盖住火药，载运进省……卖与奸官，殊乖正理。愿各大国自今以后，禁止舢舨装载火炮、火药、粮食等物卖与奸官所用，及以火船载渡奸兵进省”^①。1855年2月，陈显良在致英国公使包令（Bowring）的信中，还愤怒地谴责了偷运军火入城的外国人，并勒令他们立即离开广州。^② 1855年1月，法国侵略者进攻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坚决还击，杀死法军13人，杀伤30余人，击毙清军2000余人。^③ 后来，天地会布兴有部、小刀会潘起亮部在浙江宁波、余姚一带，同太平军并肩痛击侵略者，打死了“常胜军”头子美国人华尔。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天地会这些显著的进步，是在太平天国的直接推动和影响下取得的。

过去史学界曾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太平军进军江南定都天京以后，就不再同天地会合作，天地会也“和它分道扬镳”，似乎太平军对天地会的政策根本改变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对天地会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在起义的高潮时期，对天地会曾做了许多联络策动工作，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援助。从上海小刀会起义，可以看得很清楚。起义之前，太平天国就派李闻凤前往联络。起义发动后，刘丽川即上奏天王洪秀全，表示愿归附太平天国，并要求“早命差官莅任，暨颁赐眷黄，以顺天心，以慰民望”^④。这个奏章并没有送到天京，所以东王杨秀清又下檄李闻凤通知刘丽川等，希望他们“率众来归”^⑤。1854年6月，杨秀清在《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再次表示欢迎上

① 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140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② 参见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California, 1974, p. 147.

③ 参见 [英] 斯嘉兹 (Scarth): 《在华十二年》，译文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④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2页。

⑤ 知非子：《金陵杂记》，见《太平天国》（四），626页。



海小刀会归附太平天国。^① 据当时在上海亲历过这次起义的英国人斯嘉兹说：“他们（指上海小刀会）希望参加南京的太平军，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见过两封南京写给他们的信。”^② 在此期间，罗大纲还在“仪征各码头置造皮蓬小船六百只”^③，准备冲过清军水营，直下上海，以接应上海小刀会。但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军事斗争形势比较困难，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这却说明，太平天国并没有“拒绝刘丽川的加入”，而是主动地争取和准备赴援的。

同样，太平天国对其他地区的天地会起义，也是积极支援的。1853年小刀会在厦门起义，太平军给他们送去了金钱与火器。^④ 1854年，杨秀清又派徐向荣入闽联络正在起义的天地会。^⑤ 红钱会首领林俊在福建中部起义，不仅与太平天国有联系，而且受封为太平天国的“烈王”^⑥。1854年广东“红巾军”大起义，太平天国曾遣密使前往联系，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十七日上谕说：“江南逆匪，潜遣伙党回粤，勾结丑类，同谋滋事。”^⑦ 据说，在起义前，李文茂曾会晤过“天主”的密使。^⑧ 与此同时，罗大纲还派了卓杰生去广东与何六、陈金刚联系，上海小刀会刘丽川也派了刘杜川去佛山与陈开、李文茂约期起义。^⑨ 1854年夏，裨治文（Bridgman）访问镇江、南京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告诉他：“在广东省及广州城内，他们的真朋友、真兄弟数以千以万计。”^⑩ 以上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同这些起义的亲密关系。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对天地会除了联络争取和支援工作以外，还在一些地区实行组织上的联合，协同作战。例如，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罗大纲曾写信给在湘桂地区战斗的天地会首领胡有录，要他率部“前往会合”，即到天京会合。胡有录便“下令蓄发，自称定南王”，联合朱洪英部，决意北上^⑪，虽然胡有录因遇

① 参见《文史》，第1辑，72页。

② [英]斯嘉兹：《在华十二年》，第20章，译文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546页。

③ 《忆昭楼洪杨奏稿》，第4册，《丹徒县稟》。

④ 参见[英]柯文南：《太平天国与秘密社会及其他造反者》。

⑤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⑥ 有的记载说“秀全遣使封俊为顺义侯”，见《逸经》，第35期。

⑦ 《东华续录》卷39。

⑧ 参见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见《广东文物》卷8；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

⑨ 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962页。

⑩ 《大风》，第92期。

⑪ 参见《骆秉章奏议》卷4，《东安窜贼分扑祁新官军大捷生擒首逆折》。



害未能到达天京，但却反映了双方决意联合的趋势。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初二日骆秉章在《两广贼匪同时犯界各路均获胜仗折》中说，在湘南一带，“夺获镶黄大旗一面，太平后营龙凤旗一面，伪太平天国将军刘大黄旗一面，公义堂旗、太平后营旗、朱洪英大黄旗共数十面”^①。罗尔纲同志认为“太平天国将军刘的大黄旗、太平后营旗乃是太平天国的旗帜”，是正确的。但他说：“这一件事实，说明了在公义堂、朱洪英等天地会党起义军里面，太平天国是派有干部进去联络他们，策动他们的。”^② 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不如说是太平天国同天地会联合或协同作战的反映。因为我们看到，在同一个时间里其他地区也有这种情况，例如，1855年后，广东天地会周培春、葛耀明等部入江西，就加入了太平天国队伍，他们同时与太平军协同作战，却打出了不同的旗帜。同样，在广西也有类似的情况。据《堂匪总录》记载，黄福东“咸丰三年三月附发匪黄满，踞奉议州，又踞啼露村，与土匪黄麟合股，十月与陈兴富同勾广匪窜扰百色”^③。又，“咸丰四年闰七月，客匪刘桂纠长发数千人，由贺县入苍梧公会墟，与平安、福胜、洪兴各堂土匪合为大股”^④。以上，有的是出于太平天国政策的指导，有的应是下层群众自发的联合。

四、太平天国衰败时期

1856年秋韦昌辉在天京作乱，1857年石达开裹胁太平军精兵10余万公开分裂，它们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此，形势急转直下，虽然洪秀全、洪仁玕及广大将士为挽救危局做了极大的努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衰败的趋势。太平天国后期与天地会的关系，也是受这个总趋势制约的。

过去，罗尔纲同志曾提出，太平天国乙卯五年（1855年）石达开在江西接受广东天地会加入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他没有对这批

① 《骆秉章奏议》卷2。

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62页。

③ 苏凤文：《堂匪总录》卷4。

④ 苏凤文：《堂匪总录》卷6。



天地会部队进行改编、教育、改造，后来便造成破坏纪律、不听指挥、发生叛变三大恶果。^① 罗尔纲同志指出的这个现象是很重要的，但人们还会问，为什么石达开没有整编改造这批天地会部队？三大恶果又是怎样造成的呢？这些问题很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清楚，因为太平天国后期，南方很多地区的天地会与石达开及其部众发生过关系，弄清这些问题，可从一个侧面认识这一时期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变化规律。

石达开在江西接受天地会部队是在 1855 年冬天。当时，广东“红巾军”因围攻广州不下，一部分转入湖南，“合计不下数万，声言由湖北、江西与金陵逆贼会合”^②。1855 年底，葛耀明、陈寿、周培春、王崇开等部就在江西新昌与石达开会师，加入了石达开的部队。石达开当初接受这批天地会时，确实没有整编改造他们。主要原因是由于这批天地会部队数量很大，“犷悍不可制”，所以“乃阳示羁縻，令其自树一帜于江皖间”，“借以牵制官兵”^③。

由于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斗争形势有利，所以这部分天地会花旗军^④与太平军合作得比较好。1856 年初，江西太平军与天地会“花旗军”在石达开的指挥下，连续攻克袁州、瑞州、临江、新喻、万载、吉安、永丰、抚州，占领了江西广大地区。清朝统治者惊呼：“江西全局岌岌”，“大势已去也”^⑤。曾国藩困守南昌，成了瓮中之鳖，惊慌失措到“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⑥的地步。接着，石达开奉调东进，配合天京方面打垮了江南大营，形势大好。

不幸，就在这年秋天，发生了天京变乱。形势剧变，江西战场也陷入了困境。曾国藩乘机调集湘军 10 多万人分数路反攻。因为大部分太平军老战士已被石达开带走，留在江西的大多是当地新加入太平军的群众和天地会“花旗军”。这些人缺乏锻炼，战斗力不强，面临困境时，经不住考验。当时，江西的许多重镇都由这部分太平军和天地会“花旗军”联合防守，在湘军全面进攻面前，“花旗军”

①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② 《骆秉章奏议》卷 4，《永兴茶陵失守分路剿办情形折》。

③ 夏燮：《粤氛纪事》。

④ 这批天地会部队保存了原来的组织和旗帜。因所用旗帜多花色，故称之为“花旗军”。

⑤ 《左宗棠全集·书牍》卷 2，《与王璞山》。

⑥ 《曾国藩全集·书牍》卷 4，《与彭九峰》。

与太平军因指挥、供给等问题而发生间隙，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曾国藩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广东新附之贼与真长发不合，看此岂可以长久者，吾辈若更坚忍数月，似当有豁然贯通之一日。”^①因此，湘军在攻袁州时，就采取了“断接济，觅内应”的策略，即一面截断太平天国对袁州的一切接济通道，一面对城内守军日夜环攻，并“射示城中，长发贼能杀广贼投诚者免死，广贼能杀长发贼投诚者亦如之”。在离间下，守御袁州的太平军首领黄毓生与天地会“花旗军”首领李能通就“各怀疑惧，互相猜贰”^②。1856年11月就发生李能通献城投降的事情。湘军进攻瑞州、临江、九江、湖口、吉安、饶州、抚州、建昌等城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到1858年9月，在守卫江西最后一个据点吉安时，太平军与“花旗军”还在“互相哄斗”^③，湘军便乘机迅速攻陷吉安。

正当太平军在江西战场节节失利的时候，石达开裹胁了10余万精兵，离开天京，独树一帜，1857年底从安庆进入江西。这时，由于他自立门户，尽管手握重兵，却没有挽救江西危局，更谈不上整编改造天地会部队。他退出江西之后，太平军在江西的根据地很快就全部失守。

以上就是石达开没有整编改造天地会部队的原因，以及三大恶果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

天京变乱以后，就石达开对待天地会的态度及与天地会的关系来说，变化是很明显的，他退出江西以后表现得就更为明显。1858年石达开从江西退走，辗转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地。他盘旋浙、闽一年余，处处失利，军心涣散，士气低沉，以至自相杀戮。从1859年春到1861年底，石达开在广西辗转了三年多时间。当时，广西天地会的斗争如火如荼，很多队伍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陈开建立的大成国，地辖浔州、梧州、柳州、南宁、思恩、庆远、平乐等府县，朱洪英也建立了“升平天国”，还有张高友、陈金刚、罗华观、吴凌云等部，都在广大范围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石达开进入广西时，天地会各部是欢迎的，他们配合石达开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如石达开的部将陶金汤在张高友的配合下，攻克了阳朔、永安。石镇吉部在李锦贵、谢秉坤等配合下，占领了宾州、上林；又在李

① 《曾国藩全集·书牍》卷4，《与李次青》。

② 《骆秉章奏议》卷8，《援江官军克复袁州分宜郡县两城折》。

③ 《骆秉章奏议》卷13，《援江官军会克吉安府城折》。



文彩的配合下，攻百色厅。黄鼎凤在贵县、吴凌云在陇罗，都尊奉石达开为领导。但石达开并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他到处活动，争夺地盘，同天地会发生冲突，以至火并。例如，1959年11月，就发生了天地会张高友杀陶金汤的事。据《平桂纪略》载：“金汤既攻破阳朔、永安，结莲塘张高友为助，高友利其所有，诱杀之。”^①封建统治者将这件事歪曲为谋财害命，《永安州志》也载“嗣因张逆探悉陶逆资财，起意吞并，遂于黑夜率匪将陶逆杀戮”^②，其实反映了两支起义军的关系。就在这同一记载中，我们看到，张高友杀陶金汤之后，“逼其众归张统辖”^③。至少说明天地会张高友部与石达开部在统属关系上存在着矛盾。又如，石镇吉进占宾州时，“带党十万有奇”^④，“逐去黄三（即黄鼎凤），入踞州城”^⑤。由于他逼迫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部离开，强宾夺主，双方就对立起来。石镇吉占上林城时，大成国澄江（上林之改名）知县李锦贵即脱离大成国而投石镇吉，石镇吉又立即“封李锦贵为澄江县大令”^⑥，与大成国又发生矛盾。在此期间，石达开还派人劝说陈开投奔于他，说什么“尔大成洪德，不能成事，如果敬拜上帝，我与尔合”，结果遭到陈开的拒绝。黄鼎凤等人“也仍要大成洪德，不愿拜上”^⑦。这些都反映出石达开因抢占地盘而与大成国之间的矛盾。

随着石达开力量的日益衰落，太平军将士纷纷起而反对他，吉庆元等率部“万里回朝”^⑧，是个突出的例证。另外，石达开部将张志公、余成义、李青靛等接连叛降清军，在众叛亲离之下，石达开想靠广西天地会来支撑已不可能，最后率残部入川，全军覆没。

从石达开在江西接受天地会部队，到他出走天京辗转南方各省与天地会关系变化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京变乱之前，石达到江西是为太平天国开辟根据地，在起义高潮中，石达开接收了大批天地会“花旗军”，虽然一时未加整编改造，但在共同目标下，总的来说合作是好的，天地会部队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天京变乱之后，由于各种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太平天国走向

①② 苏凤文：《平桂纪略》卷3。

③ 《永安州志》。

④ 《宾州志》卷13。

⑤⑥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1。

⑦ 《陈开自述》。

⑧ 《吉庆元、朱衣点等上天王奏》。

衰败。特别是石达开走上了分裂道路，根本方向是错误的，因此，太平天国的各项政策已不可能由他来贯彻，太平天国积极争取联合天地会的政策首先就被他破坏，他排斥闽浙赣地区天地会、千刀会的归附，还抢占广西天地会的地盘，就是明证。所以，尽管石达开带了10多万太平军辗转南方各省，但各地的天地会没有也不可能从石达开那里找到真正的援助和出路。

太平天国后期分散主义等倾向愈来愈严重，这是农民、小手工业者阶级弱点的表现，是起义走向衰败的重要标志。就拿江南来说，李秀成在苏杭地区搞独立王国，公然“逆主之命”^①，是很突出的。同时在他周围的一些太平军将领，如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黄文金、古隆贤等，也各占山头，各自为政，各有自己的军队和号令，形成了天京与地方之间互相隔阂，各地山头之间“彼此猜疑，势不相下”^②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天朝也就失去了权威，指挥失灵，政令不一，在处理与天地会的关系方面，也就没有统一的政策。因此，同在江南地区，各部太平军与天地会关系也各不相同。例如，在浙江，浙东太平军黄呈忠、范汝增部与当地天地会的莲蓬党就合作得比较好。1861年莲蓬党起义，积极配合黄呈忠、范汝增部进占宁波、绍兴，起义军首领何文庆后来还率领莲蓬党加入了太平军，在诸暨、余姚、镇海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何文庆还得到太平军“志天义”的封号。^③与此同时，余姚一带的天地会起义军接应太平军，攻克慈溪，打败“常胜军”，击毙了华尔。^④但是，1861年浙江南部爆发的金钱会起义，却没有得到太平军的支援。金钱会起义之后，起义军派10人前往太平军李世贤部求援攻打温州，太平军回答他们说：“汝等已将那城自行掠空，因官兵厉害，求救于我，令我取已空之城；我欲取城池，何待汝等请！汝等先抢，又来招我，大属可恨！”并且“立斩八人”^⑤。又如，在浙西战场上，1862年太平军李世贤、洪春元部与天地会“花旗军”谭星、谭体元、陈荣等部发生冲突，特别是太平军李仁寿部与天地会陈荣部火并，给左宗棠以可乘之机，至1863年，太平军在浙西的防御体系即迅速

① 《李秀成自述》。

②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3，《攻剿龙游、汤兰、兰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及各要隘折》。

③ 参见许瑶光：《谈浙》。

④ 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

⑤ 聂崇岐编：《金钱会资料》，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瓦解。^①

总之，太平天国后期与天地会的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从总体上来看，已没有一个统一的积极联合政策，各个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合作的好坏取决于各地太平军将领和当地天地会的态度。从斗争的趋势来看，已不再像前期那样生气勃勃。尽管在局部地区的联合斗争颇有生气，但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衰落，在中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这些斗争很快就失败了。

太平天国虽然走向衰落和失败，但尖锐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斗争是不会止息的。因此，到太平天国末期，一些地区的天地会势力却仍有扩大，贫苦农民大批“转红”（即入天地会），以寻找斗争的出路。有些地区出现“三十里内转洪（红）蓄发者至九十六村”、“五十余村皆长发转红”^②的情况。甚至不少太平军的余部也成批转而投向天地会的组织^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太平天国革命的规模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不能比拟的，太平天国同许多秘密结社起义发生了联系。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太平天国与天地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来自相同的社会阶级，遭受同样的剥削压迫，共同的斗争目标，是他们合作的基础。太平天国争取联合天地会的政策、更高水平的斗争纲领、严密的组织纪律，在争取联合和改造天地会力量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天地会对太平天国革命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援。但是，他们之间的联合是有限度的。在组织系统上，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等不时表现出来，并由此而发生冲突和分裂。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是这样，与捻军等组织的关系也是这样。太平天国没有力量从根本上改造这些旧式会党，因为它本身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没有先进思想武器武装的农民革命。他们无法克服共有的阶级弱点，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

① 参见《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

② 光绪《玉林州志》卷18。

③ 参见苏凤文：《堂匪总录》卷4；光绪《玉林州志》卷18。

关于洪大全的身份

关于洪大全的身份，是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这里想在前辈特别是罗尔纲同志研究的基础上，对与洪大全身份有关的某些史实，做进一步的考订和补充，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过去，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洪大全是天地会的领袖，也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他是太平天国联合天地会的旗帜，他被捕牺牲后，太平天国就排斥天地会，把洪大全视为决定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分合的关键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少学者尤其是罗尔纲同志根据大量资料研究，证明以上看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罗尔纲同志在这方面的考证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他对洪大全的身份并未做出肯定的结论。1957年彭泽益同志发表了《关于洪大全的历史问题》^①，他根据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二十四日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奏报，以及所找到的湖南宁远县官府办理许香桂（即洪大全妻许月桂之妹）案的直接史料，相互印证和参订，弄清了如下事实：洪大全确有其人，原名焦亮，湖南兴宁县人，廪生出身，因参加天地会而改名洪大全，后来成了湖南地方天地会的一个头目，咸丰二年（1852年）在广西从事起义活动被捕。彭泽益同志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应该说是探讨洪大全身份问题的一个新成果。但是他对洪大全是不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等问题并没有具体论述。

洪大全是不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他是不是天德王？天德称号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史籍记载上搞得很混乱，需要认真辨明。

过去有人论证洪大全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其主要根据，除了洪大全供词之外，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剿平粤匪方略》著录的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十日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奏折和同日咸

^① 载《历史研究》，1957（9）。



丰皇帝的上谕，说洪大全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领袖；另一条是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所载，太平天国后期在天京建有《天堂路通碑》纪念死难功臣，刻有愍王洪大全的名字。

洪大全供词的有关部分，经罗尔纲同志考证是清朝官吏为邀功而作伪渲染。关于《剿平粤匪方略》所录太平天国首领“洪大泉、冯云山为之最”等，经罗尔纲同志与《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大清文宗圣训》、《咸丰朝东华录》、《咸丰朝东华续录》等书的有关记载对勘，发现这些书著录的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初十日周天爵奏和咸丰上谕，所列举的太平天国领袖姓名，都提到“洪秀全”，根本没有“洪大泉”，唯独《剿平粤匪方略》说是“洪大泉”。罗尔纲同志考证鉴定，这是《剿平粤匪方略》编者的作伪。《江南春梦庵笔记》，经罗尔纲同志考证，是一部大伪书，它所载的《天堂路通碑》也是伪造的史料。^① 据此，罗尔纲同志认为，所谓洪大全是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在罗尔纲同志关于洪大全身份的考证中，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那就是对“洪泉”的考证和解释。

1950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发现了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初十日的一篇上谕，其中有“贼首韦政、洪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一洗、曾三秀”等语^②；另外，英国人密迪乐（Meadows）《中国人及其革命》一书，引用了周天爵致湖北巡抚的信，其中论及太平天国的领袖时，也有以“洪泉”为最著名的说法。^③ “洪泉”究竟是谁？是洪大全还是洪秀全？不能确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罗尔纲同志曾以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十三日周天爵给密友周二南的信来旁证。他说，在这封信中，周天爵谈到太平天国的领袖只有洪秀全、冯云山两人，既没有提“洪泉”，也没有提“洪大全”，而且信中还说“洪秀泉系花县人而传习西洋天主教者”。据此，罗尔纲同志认为，周天爵这时已确知洪秀全的姓名、籍贯和历史，他在奏折中和致湖北巡抚书中把洪秀全的名字改为“洪泉”，“乃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对革命者名字删削的习惯的缘故”^④。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将罗尔纲同志的引文，同光

① 上述罗尔纲同志的考证，见其《洪大全考》和《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

② 这篇上谕的全文我没有看到，此处转自罗尔纲《洪大全考》的节录文。

③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105页。

④ 同上书，106页。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刊载的周天爵《致周二南书》的全文做了对勘，发现颇有不同。对照如下：

罗引文之一：“贼大元帅洪秀泉、冯云山皆亲身督战。”

《申报》刊载文为：“而贼大元帅洪泉、冯云山皆亲身督战。”

罗引文之二：“贼匪用兵，全是洋夷之法，以洪秀泉系花县人而传习西洋天主教者，此人为军师，军令死一队长则一队全斩，又欲以药水，其剽忽不及闯、献，而深沉过之。”

《申报》刊载文为：“要之逆匪用兵全是洋人之法，以洪泉系西洋人传天竺教者，此人为军师，军令死一队长则一队全斩，又欲以药水，其剽忽不及闯、献，而深沉过之。”^①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呢？罗尔纲同志在引文的注中说：“周天爵这一封长信，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刊刻的汪鋈《十二砚斋随录》著录有全文。此处引文系据汪鋈著录文。又平步青《霞外麇屑》也据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申报》刊载录有删节文，其所录‘洪秀泉’亦与汪鋈同。”^②根据罗尔纲同志这个注的提示，我们将《申报》刊载的全文与平步青的删节文对勘，发现删节文对原文不仅做了删节，而且许多地方做了重大的修改，并在四处加了较长的按语，特别是将原文的“洪泉”改成了“洪秀泉”。我们又将《申报》刊载的全文同汪鋈书的著录文对勘，发现有数十处不同，特别是以上两段引文有重大出入。从文章的表达、文字的精练等方面看，汪书录文显然是前者的修改稿；从刊载的时间来看，汪书刊于1872年，而《申报》刊登在1879年，似乎汪书著录文为先，因而是矛盾的。最后我们从《申报》刊载此文时所加的“附识”得到了启示，解决了这个疑难。“附识”说：“丹徒吴畅亭从冷摊购得的，系文忠公亲笔。”又说：“来稿间有讹字，未提取原书校正。”^③另外，平步青在节录此文的开头，也有这样一段话：“己卯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载有周文忠公与二南言广西时事书云：‘丹徒吴畅亭得之冷摊，为文忠公亲笔，字迹飞舞，是初抚广西时所做，吴录寄馆中，间有伪字。’”^④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申报》刊载的《致周二南书》，是

① 罗引文见其《太平天国史事考》，106页；《申报》刊载文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5页。

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106页。

③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64页。

④ 平步青：《霞外麇屑》卷2，6页。



吴畅亭根据周天爵的亲笔信过录寄馆的，原件系购自书摊。来龙去脉，很是清楚，可见《申报》刊载的当是最早文字。我们前面对照的两条引文内，《申报》文之“洪泉”，汪书文刊为“洪秀泉”；《申报》文“洪泉系西洋人传天竺教者”，汪书录文却为“洪秀泉系花县人而传习天主教者”。无疑汪书录文是后来的修改。

最近我们又见到了周天爵在一封信中论述太平天国首领的一段英文译文，这封信就是郭廷以所说的致湖北巡抚书。罗尔纲同志论述以上问题时，似乎没有见到这段文字的内容，他只是根据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所引，而郭书并没有转引密迪乐书的引文。又周天爵此函的汉文原件或抄件我们还没有看到，为便于问题的探讨，我把这段英译文回译于下：

至此等贼匪，有逆首五，洪泉为最著，冯云山次之，杨秀清次之，胡以洗（原文为 Hoo Yih Seen，疑胡以洗之误）、曾三秀次之。洪泉非洪姓者，似夷人也。^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天爵的这封信与《致周二南书》关于“洪泉”的提法是一致的。周天爵 1851 年在奏折中以及致湖北巡抚书中提的是“洪泉”，在致好友密函中提的还是“洪泉”，因此，实际情况似乎不像罗尔纲同志所说的：“周天爵上‘急奖有功并陈目前贼情各折片’的时候，是已经确知洪秀全的姓名的，他之所以在奏折中和致湖北巡抚的信中把洪秀全的名字作为‘洪泉’，乃是由于照封建统治者对革命者名字删削的惯例的缘故；但他在给好朋友的密函里却不必守这些惯例而把洪秀全的全名写下来。”如果说“洪泉”是出于对革命者名字删削，为什么一连串革命首领的名字只删削一个？似乎也不好理解。那么，是属夺字（无意脱漏），还是属不甚了解其人？我以为是属后者。周天爵在《致周二南书》中，把“洪泉”视为“西洋人传天竺（主）教者”，在致湖北巡抚书中说“洪泉非洪姓者，似夷人也”，都是由于对“洪泉”其人不甚了解。但是，这两封信都说“洪泉”是传天主教的“西洋人”、“夷人”，很明显，他所说的“洪泉”应该是洪秀全，而绝不是洪大全。因为正是洪秀全借用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创立了拜上帝会，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在起

^① 此段引文原载 T. T.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London, 1856, 157 页，转译自 C. A. Curwen, “Taiping Relations with Secret Societies and with Other Rebels”, in Jean Chesneau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义爆发之初，清朝统治者一时不甚了解洪秀全的情况，以至把洪秀全误传为洪泉，并视为夷人，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为什么清朝统治者当初要把“洪泉”（即洪秀全）视为夷人，密迪乐在引用这段文字时做了注释，指出因为洪氏的基督教“以及他曾与罗孝全先生相处过一些时日，可能引起对他的这种看法”^①。我以为密迪乐的这个注释是符合实际的。他所注释的“洪泉”，显然是洪秀全。因为太平天国领导者只有洪秀全因为学习基督教同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在广州相处过一些时日，密迪乐作为翻译官，1853年随英国驻华公使文翰（Bonham）到太平天国的天京等地访问过，对太平天国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他的这个注释是值得重视的。另外，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在洪大全被捕以前清朝官方文书中任何关于洪大全的记载；同样，据英国学者柯文南说，他在伦敦英国外交部保存的有关档案中，也没有见到这种资料。^②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说明，洪大全并不是太平天国的首领。

至于“天德”称号是什么意思，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结论。据柯文南见到一件广东红巾军的档案内称，系“南京的英雄们”所虚构的一个“空头衔”。^③实际上，“天德”这个称号，并非起于太平天国时期，早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张念一奉朱三太子在浙江起义，就立过“大明天德”年号，后来在天地会内也屡次出现过这种称号，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已有天德的“画像广播于众”^④。看来，这是秘密会社发动农民起义时所假托并进行号召的一个理想权威。洪大全是不是天德王，太平天国是否尊洪大全为天德王，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就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洪大全面目已基本清楚，他既不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也不是天地会的总头目。我赞成罗尔纲同志的说法，按照天地会的制度和斗争历史，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统一全会的大领袖。不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期，即使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像两广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领袖。因此，把洪大全看做决定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关键人物，将洪大全被捕牺牲说成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分合的临界点，是不恰当的。

①② 参见 [英] 柯文南：《太平天国与秘密社会及其他造反者》。

③ 原件编号为 F. O. 682/1968/4，参见 [英] 柯文南：《太平天国与秘密社会及其他造反者》。

④ 《中国叛党起源志》，37页，转引自荣孟源：《天地会领袖洪大全》。

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农民战争，它联合了农民起义的各种组织，汇集了无数支起义队伍的力量，反映了各地区农民斗争的要求，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出现，把旧式的农民起义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以往的研究，人们比较注重考察太平天国与各地会党的关系，尤其是与天地会的关系，但是很少有人考察太平天国与各地教门的关系，特别是与斋教的关系。有不少学术著作，例如罗尔纲同志的一些著作，把湖南的斋教误解为天地会，把太平天国时期湖南的斋教起义说成是天地会的起义。由于这种见解的影响，人们也就把太平天国与这些地方教门的关系，一概视为与天地会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实际上，在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天国与许多地方的教门发生了关系，各地的教门，尤其是斋教，对太平天国革命也做出了贡献。为了全面认识太平天国与当时各地农民起义组织之间的关系，总结这场起义的经验教训，我想在这一章中，就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对湖南一带的斋教起义的史实，做一些考辨。

一、史实的辩证

斋教，是明清两代流行于中国南方的一种教门组织。它崇奉弥勒佛，以“代天行事”、“天国普有”为宗旨，入教者以“普”字为法名，一律吃斋诵经，每逢朔望，必聚会念经。它和白莲教的许多支派一样，本是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但在社会阶级矛盾激化、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和动荡不安时，往往就成为联系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工具。所以封建统治者也将它列为“邪教”，进行镇压。

中国近代
会党史研究

清朝嘉道年间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大批劳动群众破产失业，生活极度不安。他们为了谋求生存之路，纷纷加入秘密社会，或投会党，或奔教门。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前夕，中国南方的秘密社会组织，犹如燎原星火，遍布各地。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势力在迅速发展，教门的势力也在相应扩大。当时，斋教活跃在两个地区：一是以江西的封禁山（旧名铜塘山）为中心，蔓延于闽、浙、粤、赣诸省；一是以湖南的宝、衡、永各郡为渊藪，散布于两湖、川、黔等地。

在群众大批投奔秘密社会的同时，会党和教门之间，也在发生互相渗透和融合。特别是川楚地区的白莲教势力与两广一带的天地会势力在湖南会合，因而湖南就出现了数十种教、会相混的组织名目。其中不少的会党名目，“踵白莲之余习，托免劫以为词”^①，带有教门的色彩；一些教门，又“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②，具有会党特点。湖南的斋教即青莲教，不仅融合了白莲教的成分，而且还包含天地会的因素。咸丰元年（1851年），黄兆麟在一个奏折中说：“现闻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所属地方，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到处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各教中皆分温、良、恭、俭、让五字号，让字总领数百人，至温字则总领数千人。又有斋匪，名曰青教。名目虽分，其教实合，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其传徒皆有度牒，以布为之，上书‘关口度牒牌’五字，盖印‘保和堂’图记。湖南距四川数千里，而教匪声气联络，彼此号令，随时可通，各州各县各村各乡皆有党羽散处。其匪徒持度牒往来，随处皆给银钱饭食。每月则于各乡旷野按三、六、九期赴会。头目乘轿骑马，动辄数百人，俱席地坐醉，饱即扬去。”^③这个奏折，一面说明湖南“教匪充斥”、名目繁多的情况；一面则着重说明，“名目虽分，其教实合”，多属“斋匪”即青莲教系统。它们既奉万云龙为总头目，设立忠义堂名号，又皆持度牒传徒等，这正是湖南教门与会党互相渗透融合的真实写照。这种教、会相混，并大规模地趋向融合的现象，是近代中国秘密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① 《刘中丞奏稿》卷2，《请飭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

② 《大清文宗圣训》卷90。

③ 《录副奏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过去，罗尔纲同志对教、会相混、趋于融合的复杂情况，似乎没有详加考察，仅看到湖南斋教含有天地会的某些因素，便做出如下不符实际的推断：（一）他仅抓住斋教以万云龙为总头目，并有忠义堂名号这两个现象，便断言，这种“被满清统治者称为‘斋匪’的会门，实在乃是天地会，跟那个吃斋念佛的斋教绝不相同”。（二）基于上面这一认识，他又进一步推论说：“咸丰初年在湖南起事的会门，乃是天地会而不是斋教。”他还以宝庆府知府魁联《复周盐道四条》中所谓“南省会匪，遍地皆有”，及曾国藩在《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所谓“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两句话来佐证。^①（三）基于同一认识，他把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湖南青莲教雷再浩、李沅发的起义，也称之为天地会起义。^②

我以为罗尔纲同志以上三点推论意见，都是值得具体商榷的。

第一，我认为罗尔纲同志关于“万云龙乃天地会所崇奉的开宗始祖”、“忠义堂名号则为天地会拜会的处所”的解释虽然是正确的，但他仅以斋教中含有这两点天地会特征，就将湖南大量存在的斋教推断为天地会，却是不当的。这是因为：其一，黄兆麟奏折中所举的一些名目，本来都是教门组织，而且他还特别明确指出是“斋匪名曰青教”，这是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其二，尽管这些组织奉万云龙为总头目、设忠义堂名号（我上面已说明，在教、会融合趋势中，斋教渗透了天地会的成分），但并没有改变斋教的基本性质。许多记载（也包括黄兆麟奏折）说明，当时湖南的斋教都保持着吃斋诵经、持度牒传徒、定期做会，并以消灾避劫的说教招募群众的教门本质。所以，从它的质的规定性来看，我认为这些组织乃属斋教，而不是天地会。

第二，罗尔纲同志说，咸丰初年在湖南起事的会门，乃是天地会而不是斋教。这也违背了历史事实。湖南的方志和有关的文集、笔记都记载，咸丰初年湖南不少地方有斋教举事，查其信仰、做会仪式、组织结构，无可辩驳地证明，是斋教而不是天地会。罗尔纲同志引用魁联和曾国藩的两句话，并不能作为立论的根据，因为魁联所说的“南省会匪，遍地皆有”，并不专指天地会，其中也包括斋教这类“会匪”。而且该文的重点在论述宝庆府的青莲教，他将“雷、李诸逆（即雷再浩、李沅发——引者）”^③均列入“会匪”，就

① 参见罗尔纲：《朱九涛考》，见《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

②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见《太平天国史事考》。

③ 魁联：《复周盐道四条》，见葛士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1。

是证明。这可能是雷再浩以“棒棒会”号召起义、李沅发以“把子会”聚众举事的缘故，魁联不明亦未查其源流，望文生义，误将雷、李称作“会匪”，是不难理解的。但根据我们的考察，雷再浩和李沅发所倡立的组织，尽管以“会”的名目出现，实际上都来源于青莲教，即湖南通称的斋教。至于曾国藩在《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虽然指的是天地会，但他并未由此而否定湖南同时存在着大量的“斋匪”和斋教起义。恰恰相反，在他的奏稿里就多次提到“斋匪”。而且，咸丰三年（1853年）他还带兵驻扎衡州，亲手“拿获衡、清二县斋匪”^①，并镇压了当地的斋教起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样的斋教起义，难道也可称为天地会起义吗？

第三，关于雷再浩、李沅发起义时的棒棒会和把子会，究竟属天地会还是斋教，需要对他们的组织状况、信仰、传徒方法等，做一番具体考察之后，才能做出判断。为此，我们还得从宝庆府武冈州和新宁县的青莲教源流谈起。

青莲教，在湖南通称斋教，是白莲教系统的一个教门。武冈、新宁一带青莲教出现之前，白莲教早已存在。《新宁县志》载：“嘉庆元年，达州贼徐天德传习白莲邪教，造言惑众，谓弥勒佛生，入其教者可免劫难，愚民多信从之。乡约李文献其状，官不敢捕，遂于九月十五日，与其党王学礼等作乱于亭子铺，裹胁约数千人，皆以白布缠头，如黄巾故事。”^②川楚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以后，武冈、新宁教门活动一度沉寂。至道光年间，王又名从四川传来了青莲教，此处的教门又活跃了起来。

《宝庆府志》说：“王又名者，四川成都人。道光十年，以青莲邪教诱愚民；言习其术，可以成仙佛。武冈民程孔固拜以为师。又名令食长斋，事无生老母神，又授以《龙华经》、《忏悔经》及坎卦图章。遇佛诞日，聚其党徒，谓之作龙华会。愚民翕然信之，其党遍武冈、新宁境，士大夫皆目为‘斋匪’。”^③又据程孔固的儿子程恒忠供称：“道光十五年正月，有四川成都人王又名来至伊村，向伊父程孔固言及青莲教是金丹大道，如能学习，可以成仙成佛。程孔固随拜王又名为师，誓食长斋，传授《龙华会经》及《忏悔经》文，并坎卦图章。即于家内设立无生老母牌位，早晚焚香念经，每逢佛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厘正衡清上县保甲片》。

② 《新宁县志》卷5，《兵防志》。

③ 《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亦见《武冈州志》卷1，《大政纪》。



诞日，做龙华会供佛。”^①另据湖南巡抚裕泰奏称：“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有四川成都府人王又名，来至武冈州算命，与程孔固会遇。王又名称有青莲教立功运气，是金丹大道，如能学习，可以祛病获福，成佛成仙，程孔固随拜王又名为师。”^②根据以上材料，大致可以确定，青莲教传入武冈、新宁，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

由于武冈、新宁一带，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所以青莲教一传入，就立即与当地的农民起义结合起来。道光十六年（1836年）二月，瑶民蓝正樽在新宁起义，就是用青莲教发动起来的。^③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武冈曾如炷起义，也是利用了青莲教。^④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虽然改称棒棒会和把子会，实际上还是青莲教。

首先看棒棒会。这个组织，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秋，由湖南新宁瑶民雷再浩和广西全州人李世德共同创立的。他们原是“茹素邀福”^⑤者。有记载说，他们与蓝正樽同是程孔固之徒，蓝正樽起义失败，“孔固死党，多归此二人”^⑥。他们倡会之初，“以白莲教吃斋诵经为名多集党羽”^⑦。后来因考虑到“本地荤食之人不肯允从”，特别为便于吸收邻近州县的天地会势力，就在会内“分青、红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荤”^⑧。招人入会时，一面“先搭高台，以一头目为首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斋钱一百八十文，焚香歃血为誓”^⑨；一面又进行消灾避劫的说教，“捏称近有刀兵之劫，如肯入会，即可过此关”^⑩。入会后，“每人分给小白布一方，上写‘关口度牌牒’五字，盖用‘保和堂’戳记，作为暗号”^⑪。起义时，会众按五营五旗编制。起义失败后，在雷再浩的住处和他的许多部众身边，搜出《大乘经》、木剑等物。^⑫以上情况表

① 《录副奏折》，道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纳尔经额奏。

②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湖南巡抚裕泰奏。

③ 参见《录副奏折》，道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纳尔经额奏；《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

④ 参见《录副奏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⑤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璟奏。

⑥ 《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

⑦ 《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

⑧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璟奏。

⑨ 《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

⑩⑪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璟奏。

⑫ 参见《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湖南巡抚陆费璟奏。

明，雷再浩的棒棒会，在某些方面已不同于蓝正樽起义时的青莲教，也就是说，在它的拜会仪式、会首的称呼等方面，已渗透了天地会的因素。但是，从它的立会基础、所持的教义、组织结构等方面看，基本上还保持着青莲教的面目。因此，就棒棒会的总体来说，从它的基本性质来说，我认为它属青莲教即斋教，而不是天地会。

再来看把子会。把子会是李沅发创立的。李沅发是新宁县水头村人，家无田业，在外游荡。他原是雷再浩的同党，曾充当过雷再浩的“总铁板”。^① 雷再浩起义失败，“余党溃散，复归李沅发”^②，有千余人。^③ 由于新宁一带经过蓝正樽等数次斋教起义，统治阶级慑于斋教威胁，即“立团长、保甲，严禁斋匪”^④，李沅发只得转入秘密活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新宁暴雨成灾，社会动荡，李沅发乃以“劫富济贫”为号召，倡立把子会，发动起义。把子会基本上以棒棒会的模式组成，他的起义军按“五营十行”编制，各营头目“俱称大哥”，李沅发为“总大哥”，并树有“三军司令”大旗。^⑤ 如果从把子会树有“三军司令”大旗等情况看，它比棒棒会有更多的天地会色彩；但从它“五营十行”的基本建制、会内吃斋诵经，以及李沅发在起义过程中还随身“藏有小铜佛像，早晚礼拜”^⑥等情况看，我认为把子会仍属青莲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雷再浩起义时的棒棒会和李沅发起义时的把子会，都源于青莲教，与蓝正樽起义时的青莲教是一脉相承的，都属斋教的性质。尽管它们在演化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受到天地会的影响，但它们在基本教义、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保持了青莲教的原貌，它们的本质还是青莲教。由此，我们就不能把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说成天地会起义。

二、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

辨明了以上的史实之后，我们就可以具体探讨太平天国与斋教

① 参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2辑，137页。

② 苏凤文：《平桂纪略》卷1。

③ 参见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见《江忠烈公遗集》。

④ 参见《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

⑤ 参见《李沅发供单》等，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2辑。

⑥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2辑，139页。



的关系了。太平天国和斋教的关系，在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一些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下面我想按太平天国革命的酝酿、发展、衰败三个时期来说明。

（一）太平天国革命的酝酿时期（1844—1850）

从洪秀全、冯云山进入广西紫荆山地区发动群众、准备起义，到金田起义爆发，这一时期南方天地会起义的浪潮特别高涨。同样，斋教举事也此起彼伏。例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广东有“蓝山县斋匪攻城”^①；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青莲教在江西宜春、湖南湘潭等地传徒聚众，准备举事^②；最突出的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南新宁连续爆发的青莲教雷再浩、李沅发起义。这两次起义不仅发生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前夜，发生在广西、湖南的交界地区，而且起义的规模较大，转战湘、桂、黔三省边界二十余州县，与当时广西的天地会起义紧密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为太平天国的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探讨太平天国在革命酝酿时期与斋教的关系，主要应该说明雷再浩、李沅发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起义的准备发动，主要是在广西紫荆山地区进行的。如果以紫荆山金田一带为中心，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它的四周，当时就有二三十支天地会的部队相继起义。在它的东部，有陈亚贵、罗大纲、苏三娘、张钊、田芳等著名的天地会势力和“艇匪”罗亚丙、任文炳等的起义；在它的西部，有陶八、黄晚、颜品瑶、颜八、李四、潘源、覃上养以及张嘉祥等的起义；在它的南部，有何明科等的起义；在它的北部，有罗三凤、何崧等的起义。而雷再浩、李沅发的起义，正是发生在它的北部湘桂交界地区。这许多起义，对紫荆山金田地区的太平天国起义力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掩护圈。

如果说，1851年前广西天地会的起义，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发动，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那么，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首先，雷再浩和李沅发及其部众，与广西的天地会是“声息相通”的，他们的起义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广西天地会的起义。我们看到，1847年雷再浩起义一爆发，广西平乐

① 《广州府志》卷136，8页。

② 参见《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六日江西巡抚吴文熔奏。

中国近代史研究

府、桂林府的天地会罗三凤、何崧部，就首先起而响应；接着其他各府、厅、县的天地会，也多“乘机窃发”^①。李沅发起义发生后，楚粤交界的天地会，更是“所在响应”^②。其次，雷、李起义在当时来说，规模是最大的。特别是李沅发起义，清政府调集了湘、桂、黔、鄂四省军队，由湖广总督裕泰、湖南提督向荣为指挥，经过半年多疲于奔命的堵击，才平定了这次起义。他们的斗争，大大削弱了清朝统治者的力量，使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暇顾及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活动，更无法集中兵力将太平天国起义扼杀于萌芽。

这一时期，斋教起义对太平天国起义力量的掩护和支援是主要的。至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与斋教组织有何联系，尚无可靠材料说明。有的材料说，李沅发曾接到洪秀全给他的一面“斗”字红旗，暗示他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义云云^③，只是传说，不足为信。

（二）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时期（1851—1856）

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到天京事变发生，这一阶段是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是互为影响、互相支援。斋教支援太平天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开辟道路，增援力量。金田起义爆发后，湖南桂阳县斋教聚众六七百人，准备起事。1852年6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永州，湖南各地的天地会群众，就纷纷赶往太平军营“为之导引”，在他们的帮助下，太平军深入湖南内地，就“毫无疑问歧途，僻径恍若熟游”^④。例如，太平军七月抵衡州，由于斋教群众的帮助，“导贼于十三日破安仁”^⑤。更为重要的是，湘南有大批的“斋教游民”^⑥加入太平军。据江忠源说，当时“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⑦，由于这一带的天地会和斋教群众的踊跃参加，不到三个月，太平军的人数“已逾十万”^⑧。原来太平军从广西出发时不过几千人，在蓑衣渡遭江忠源部伏击，损失很多，经过斋教和天

① 《湖南通志·兵事志》。

②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

③ 参见《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1期。

④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查办各属土匪片》。

⑤⑥ 参见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

⑦ 江忠源：《答刘仙霞书》，见《江忠烈公遗集》，第2册，6页。

⑧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



地会群众的补充，军威又获大振。十月，太平军攻打长沙，宝庆、长沙、辰州、岳州、澧州、永州、衡州、桂阳各府及所属州县的教门会党群众，多起来“结党横行，劫掠乡里”^①，响应和支援太平军。1852年底，太平军进湖北，崇阳、通山、通城、蒲圻、大冶等地的教门和其他群众，“多闻风附和，从乱如归”^②。有的县，旬日之间，啸聚四五百人。^③他们成千上万地投奔太平军，当太平军攻克武昌时，人数已增至“五十万有奇”^④。这样，就使太平军能够顺利地沿江东下，定都南京。

第二，他们在斗争中提出的要求，为太平天国制订政策提供了借鉴。

在太平天国革命准备时期和爆发之初，广西、湖南连续发生严重灾荒，广大贫苦农民迫于饥饿，不断起来反抗，阻米抢米斗争层出不穷。湘桂边界的这种斗争，发展到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可算是个高峰。要粮食、要生存，是这一带农民最普遍最强烈的呼声。雷、李起义最得人心的举动，就是“开仓令穷民取谷散钱”^⑤。这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者们制订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我们看到，金田起义爆发后，太平军“所过粤西邑州，搜括赀粮”^⑥；太平军进入湖南，把富室巨家的粮食衣物散给贫者，湘南各地的会门群众还“沿途张贴伪示，称伪东王札谕，劫掠富户”^⑦。因此，“穷者、强有力者，遂甘心从贼，自去投营，以图温饱”^⑧。我们又看到，太平军过长沙进岳州，特别是进入湖北的武昌府和黄州府一带，由于这一带农民抗粮抗租斗争一直很激烈，如1842年钟人杰的抗粮起义，聚众达数万人，太平天国起义一发生，这一带农民即闻风而动。1851年通城有“抗粮滋事巨案”^⑨发生；1852年又有“抗粮纠众，烧毁衙署”^⑩的事情发生；1853年初，刘立简在崇阳、嘉鱼为首倡乱，“诈称漕粮免征”^⑪，发起抗粮斗争。与此同时，广济县也发生“聚众抗粮，焚署戕官”，

①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查办各属土匪片》。

② 《张大司寇奏稿·两湖稿》，《通崇土匪略定委员接办折》。

③ 参见《张大司寇奏稿·两湖稿》。

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

⑤ 俞昌会：《夫夷寇踪日记》，道光二十九年腊月二十一日。

⑥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

⑦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湖南土匪滋扰剿办情形片》。

⑧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

⑨⑩ 《朱批奏折》，咸丰三年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等奏。

⑪ 《张大司寇奏稿·两湖稿》，《通城首逆就获调兵剿办嘉鱼、崇阳土匪折》。



“有乡民数百人，各执刀矛，闯至县署，声称漕粮应一律普免开征”^①。正是在这个当儿，太平军又宣布“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②。显然是反映了这一带农民的迫切要求。由于太平天国在进军过程中，能因地制宜地制订政策，反映各地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对各地斋教和其他会门起义，主要是声威和道义上的支持。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尤其是定都南京，极大地鼓舞了各地农民斗争的积极性。许多地方的教门和天地会一样，“与金陵之粤匪相通”，打起了太平天国的旗号，进行斗争。如云贵地区的青莲教和苗民起义，虽然远在边陲，但他们也自动打起了“太平王字大旗”^③。湖北穷团起义则以“太平天国殿前都督大元帅”名义为号召。^④有的地方的教门，受太平天国均产制度的影响，搞起了均贫富的条例。如湖北松滋县彭升科的“穷团”一号“忠义团”，“其党邓正雷以邪教助之，诱煽延及澧州，无赖者附和要结誓为死党，于是中家以上，先畴田亩不能自有，府金仓粟指呼索取”^⑤。有的地方，太平军至，教门群众即自动“蓄发，乐为贼用”^⑥；而清军至，则“无土人为向导，无米盐可办”^⑦。更多的是，利用太平天国的声威，传教纠众，竖旗举事。如湖北黄陂的金鼓莲会，“闻粤贼破武昌时，该匪有潜通消息接济之说”，起而“叠逞强暴，抢夺乡里”^⑧。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无锡、丹阳一带的金兰教，声称“现在广西魔王下降，各处扰乱，从伊教者，可免兵难，并可徒获获利”，还打起“大汉国天真元年”旗号。^⑨

（三）太平天国革命的衰败时期（1856—1868）

自1856年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损失惨重，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队伍内部的分散主义、逃跑主义日益严重，革命趋于衰败。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对待斋教和其他教门、会党，已没有

① 《张大司寇奏稿·两湖稿》，《广济匪徒滋事派兵剿办折》。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

③ 《录副奏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二日云贵总督恒春奏。

④ 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241~242页。

⑤ 《松滋县志》卷6，《武备志》。

⑥⑦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报崇通剿匪胜仗折》。

⑧ 《录副奏折》，咸丰三年二月九日胜保片。

⑨ 参见《录副奏折》，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两广总督怡良奏。



统一的政策，也缺乏积极的支持，只是局部地区在联合斗争。但这时许多地方的教门和会党斗争，还在高涨。他们仍主动设法联络太平军，并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号进行斗争。

这一时期，斋教斗争比较活跃的是以下三个地区：一是湖南境内。主要是石达开的部队于1859年入湘以后，各地的斋教、会党和其他农民群众，继续与太平军共同战斗。当时加入石达开部的湖南群众“以十余万计”^①。石达开率部攻打宝庆时，武冈、新宁以及湘南各地的“无业山民，裹胁尤众”^②。石达开入川兵败后，湖南的“斋会各匪”，仍坚持“聚众劫杀，谋逆抗官”^③。二是闽、粤、赣三省边界。主要是响应和配合太平天国余部李世贤和汪海洋等部的斗争。同治五年（1866年），福建永安县属大岗美罗山，“有广东嘉应邪教匪首王德海，包厂传教”，联络太平军准备起事，“其旗帜有‘太平天国大元帅王’字样”^④。同年，福建崇安、建阳两县，“斋匪传徒习教”，树立“天国普有大旗”，二月十五日，有数百人头裹白巾绿巾，戈矛林立，突入县城，杀死知县申其昌等。^⑤同年，福建同安县也有斋教举事，“逆首李大海，随发逆同去”^⑥。广东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由闽入粤后，曾与清军转战于兴宁黄陂墟、罗冈白水寨一带。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当地教、会群众，“纠聚一二万人，四面扑来，沿途助逆”，大败高连升部。^⑦此外，咸丰八年（1858年），广州附近，有黄金笼等设立“天善堂太平会”，散布谣言：“日后水火刀兵三劫尚多，惟有持斋放生，可以消灾免祸”，至同治元年（1862年），纠众已“不下万余人”，“一面写信高州首匪陈金缸、青州首匪李植槐、浔州首匪大口扒、罗华观、平乐首匪张高友，互通消息；并寄信金陵，与发逆暗通消息，商意已定，尚未起事即被拿获”^⑧。三是云贵地区。主要是斋教、白莲教发动的号军起义和苗民起义。号军有红号、白号、黄号，总首领是湖南宝庆人刘义顺，被尊为刘祖祖。^⑨号军起义从咸丰五年（1855年）开始，至

①② 《朱批奏折》，咸丰九年五月十三日湖广总督官文奏。

③ 《大清穆宗圣训》卷137。

④ 《左文襄公奏稿》卷17，《续办上下各府各属土匪情形折》。

⑤ 参见上书，《斋匪突陷崇阳、建阳两城旋即收复见在追剿情形折》。

⑥ 同上书，《续办上下各府各属土匪情形折》。

⑦ 参见《左文襄公奏稿》卷15，《罗冈白水寨一带土匪戕害官军片》。

⑧ 《录副奏折》，同治元年九月初八日两广总督劳崇光奏。

⑨ 参见《历史研究》，1956（8）、（10），46、56页。

同治七年（1868年）失败，历时14年。他们在斗争中赞扬太平天国洪秀全“御弟神武，建业江南，奄有三吴两广之兵，已具六合一统之象”；并效法“发逆自固之法，且耕且战，雄踞其中达十余年”^①。有的号军还树起“太平天国”大旗^②。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各族农民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向往，他们响应和归附太平天国革命，期望求得斗争的出路。但是，太平天国本身也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它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随着它的失败，各地斋教、会门以及其他各种农民起义，也都相继归于失败。

三、太平天国对斋教的政策

革命是群众的事业。太平天国由于动员了千百万被压迫的农民群众，才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猛烈袭击了封建制度和清王朝。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不仅动员和依靠了广西一带最早皈依拜上帝会的农民群众，而且还动员和联合了各地会党、教门和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农民军，以及其他成千成万的农民群众。虽然拜上帝会与传统的会党、教门，在宗教信仰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有联合的基础。来自相同的社会阶级，遭受同样的压迫剥削，要求摆脱现世的苦难，就是联合斗争的根本基础。就信仰方面来说，在广大被压迫农民之间，也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无论信仰上帝，信仰弥勒佛，或是信仰别的神仙，根本目的是想避免和摆脱现世苦难。如果有某种教门，既能宣扬彼岸世界的美好圆满，又能切实解决现世苦难的一些问题，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很自然地就会皈依于它，即使是在教在门的群众，也会抛弃原有组织信仰，前来投奔。由于当时拜上帝会充当了这样的角色，特别它宣扬能解除“病难”和获得粮食等现世利益，而在起义过程中能真实地满足苦难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所以就迅速吸引了千百万群众。当时统治者记载这些群众投奔太平天国是“甘心从逆”、“甘蹈白刃”、“视死如归”，当是真情实况。

太平天国对于前来归附的天地会、斋教，以及其他组织的群众，都采取欢迎的态度，持联合的政策。在宗教信仰方面，则做了统一

^①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转自《贵阳采访册》。

^② 参见上书。



的规定，这就是洪秀全最早在广西为接纳天地会分子提出“舍邪弃旧而皈依真教”的要求。^①这个政策，主要是出于斗争的需要，为了统一思想，统一队伍的纪律。这种政策，开始虽是针对天地会提出的，但是，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对待斋教，也是实行了这种政策。我们看到，太平军在湖南接受会党和教门群众入伍之时，都要实行拜上帝会的洗礼和军事训练教育。当时有这样的记载说：“其训土匪以七日一次，教以用兵之法，谓听讲。土匪之初入也，以铜盆水沃面抹胸，授红巾号衣，念咒廿四句，谓之拜相。拜过相者，其发辫后必有火焰印，以此蛊民，故附者多不畏死。”^②这个记载，与李进富供词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李进富系广西桂平县鹏隘山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他在鹏隘山加入了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入会时，“头子当天用水一盆，拜毕将水浇心胸膈，蓄长头发，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③。可见，太平天国对教门、会党群众联合的同时，还按照它的教义、组织纪律等，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教育改造工作。这对太平天国统一思想、统一纪律和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政策，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看来是认真执行了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的后期，就愈来愈行不通，以至成为泡影。

① 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②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

③ 《李进富供单》。

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

一、关于哥老会起源的几种说法

哥老会是清末流传最广势力最大的秘密结社。关于它的起源、性质及其名称的由来，迄今仍众说纷纭。综合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认为哥老会与天地会同出一源，是清康熙年间郑成功创立的“反清复明”组织。这是史学界长期以来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出于辛亥革命时期以陶成章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①他们为了利用会党发动革命，特意粉饰了这套历史附会。到了民国时期，经过一些帮会“著作”的渲染，这种说法就更增添了神秘色彩。^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有人指出了这种说法的错误，但其至今还有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大量档案文献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愈来愈清楚地证明，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二）认为哥老会“成立于乾隆年间，同治时平定粤匪以后，湘勇撤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各团体，于是哥老会始盛”^③。持这种说法的，是日本人平山周。辛亥革命时期，他作为孙中山的朋友、中国革命的同情者，曾多次入哥老会，调查内幕，写出《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1912年出版。平山氏明确肯定哥老会成立于乾隆年间，是值得重视的，但他没有说明根据。

（三）认为哥老会就是啮噜会，“哥老会即啮噜的音转”^④。持这

① 参见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② 参见刘师亮：《汉留全史》，刘联珂：《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朱琳：《洪门志》等。

③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75页。

④ 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载台湾《食货月刊》，第9卷第9期。此外，有些文章也有类似的说法，如陈湛若：《哥老会起源初探》（载《新史学通讯》，1952（12））；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载《历史学》，1979（4）），其他不一一列举。



种意见的学者，偏重于“咽噜”与“哥老”的语音对证，认为“咽噜”与“哥老”在语音上是相吻合的，从而断定哥老会就是咽噜会。但他们对哥老会与咽噜会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特别对咽噜怎样演变成哥老会，缺乏辩证的历史的分析。

（四）近年来，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哥老会是清末天地会和白莲教两大结社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哥老会与天地会并非出于同源。^①这是一种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但他们对两大结社究竟是怎样融合而产生哥老会的，缺乏具体的论证。

另外，有人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认为哥老会是由江湖会发展而来，而江湖会又来源于仁义会和天地会。“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②。作者比较客观地说，他的这些结论，“仅据故宫明清档案部所藏的一些文件”，“不涉及其他文献”。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档案史料保存并不齐全，所以我以为此提法还值得商榷。

根据以上各种见解的启示，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材料的研究，我们认为，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咽噜会，到嘉道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咽噜党势力相会合，它们之间经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名目。同光年间，随着湘军等军伍的遣撤，和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的急增，哥老会即勃然而兴。哥老会不是咽噜组织的简单重现，或者名称的变异，而是以咽噜为胚型，吸收、融合了天地会、白莲教的某些特点，在中国半殖民地的特定社会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游民组织。下面，我们来做具体的说明。

二、哥老会与咽噜的异同

早在同治年间，由于哥老会势力崛起，连年举事，清朝统治者

^① 参见 [日] 酒井忠夫：《清末的会党与民众》，载历史教育研究会编：《历史教育》，第13卷第12号；[日] 渡边惇：《清末哥老会的成立》，见东京教育大学亚洲史研究会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Jerome Chén, “Rebels Between Rebellions-Secret Societies in the Novel Peng Kung An”,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4, August 1970; Charlton Lewis, “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in Late Ch'ing China”, in Jean Chesneaux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② 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



在“剿办会匪”的同时，就注意追查哥老会的源流。当时，许多地方官奏报，一致认为哥老会起于四川，由来已久。例如，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湖南巡抚刘崑在一个奏折中说：“数月以来，臣详查卷宗，细加考究，哥老会之起，始于四川，流于贵州，渐及湖南，以及于东南各省。”^①李瀚章在奏折中也说，哥老会“起于川黔，由来已久”^②。但是，他们都没有查明哥老会产生的具体年代，和它产生的具体过程。这是我们探索哥老会起源的一个困难。

有人根据清朝乾隆年间档案文书中有关四川咽噜会的记载，将咽噜会与哥老会在语音上做了对证，认为“咽噜”与“哥老”发音相同，便得出结论：咽噜就是哥老会。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这是因为，秘密结社的源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靠语音的对证是难以搞清的。即使有的组织名称相同，但内容未必一样。况且“咽噜”与“哥老”虽然发音相同，但两者的含义并不相同。我们看到，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在追查咽噜的根由时，乾隆帝对“咽噜”的含义做过专门的询查，他在上谕中曾明确指出“咽噜乃骂詈之语”^③。而哥老却是兄弟的意思。清人朱克敬对此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和解释。他说“蜀中弟曰老，哥老，犹言哥弟也”^④。可见，单凭咽噜与哥老的语音相同，即断言咽噜就是哥老会，未必是恰当的。

我认为，要判明哥老会与咽噜会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两者的组织形态和活动特点方面来分析。

就组织形态来说，哥老会与咽噜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1）两者都是异性相约为兄弟、实行结盟拜把的组织，结拜不序年齿。^⑤（2）咽噜有红线、黑线两种，有的地方称红签、黑签；哥老会也有红帮、黑帮之分。^⑥（3）在组织内部，咽噜“头目曰帽顶，总头目曰大帽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⑦；“其为首者曰帽顶，暗

① 《刘中丞奏稿》卷2，《请飭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

② 《录副奏折》，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湖南巡抚李瀚章奏。

③ 《上谕档》，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④ 朱克敬：《瞑斋二识》。

⑤ 参见《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勒保奏；[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⑥ 参见邱仰文：《论咽噜状》、《再论咽噜状》，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75；《录副奏折》，光绪八年十月七日刘海鳌奏，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陕西巡抚叶伯英奏；[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⑦ 刘蓉：《复李制军书》，见葛士澐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3。



言其为主也。其次曰大五小五，暗言大王小王也。又其次曰大老么小老么，言兄弟也。以下曰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娃”^①。哥老会也“称会首为老冒，会末为老么。并有冒壳子大爷、圣贤二爷、当家三爷、红旗五爷之称。其余为八牌上的，有上四牌下四牌之分。并各自带小儿，曰少侄儿”^②。

就活动的特点而论，两者都“十百为群，以焚抢为事”^③。咽喉“始乎赌博，卒乎窃劫”^④；哥老会则以“盗窃为武差事”，“赌博为文差事”^⑤。咽喉平时有“白昼攫物者，杀伤平民者，有将人抢去奸污者，有因而致死者”^⑥；哥老会则“其党每于山隘及江湖港边泊船所在，谋劫客商，多遭惨害”^⑦。

但是咽喉与哥老会也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咽喉一般不设“堂口”；而哥老会的组织系统，多设山堂香水。其次，哥老会内的各级头目名称、开山仪式、会规条例以及暗号隐语等，比咽喉会复杂得多。最后，哥老会在组织和信仰等方面，还吸收了白莲教和天地会的一些特点（详见下文）。

从两者出现的时间来看，咽喉出现在先，哥老会出现在后。显然后者是从前者演变而来的。联系到它们的发源地、蔓延的方向路线，联系到左宗棠曾奏称“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咽喉匪之别名也”^⑧等语，可以确信，哥老会发源于四川的咽喉会，是由咽喉会逐步演变而成的。

三、咽喉产生的时间与社会原因

咽喉起于何时？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

据清代文书记载，乾隆初年，四川咽喉已活动频繁，犯案累累，

① 陈庆镛：《与舒云溪制府书》，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7。

② 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见《辟邪纪实》，同治元年（1862年）刻印，同治辛未（1871年）夏重刻。

③ 梁上国：《论川楚教匪事宜疏》，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9；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

④ 邱仰文：《论咽喉党状》。

⑤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75页。

⑥ 《录副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御史柴潮生奏。

⑦ 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

⑧ 《左文襄公奏稿》卷31，《刘松山剿除绥德州叛卒收复州城折》。

中国近代史研究

“狱讼繁兴，囹圄充积”^①。因此，我们认为咽噜最迟应起于乾隆初年。

咽噜主要是外省入川的流民，和四川本地的破产劳动者、游民结成的互助自卫团体。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咽噜子。”^②乾隆九年（1744年），御史柴潮生也奏称：“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咽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咽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③

康熙年间以来，由于农村人口的迅速增加、政府“地丁”政策的掠夺，以及地主阶级的兼并剥削，造成大量无业流民向地广人稀地区迁移。乾嘉年间，川楚陕交界南山、巴山老林地区，就侨寓着数百万“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④。他们依亲傍友，到此耕种荒地；他们居无定所，伐木架椽，借以栖身；他们种地之外，多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生。尽管身处这些地广人稀的荒僻地区，他们仍不免于地主、厂主、吏胥、差役敲骨吸髓的压榨，成为流荡城乡的“闲打浪”。他们为了谋生自卫，便呼朋招类，十百为群，咽噜乃应运而生。所以，乾隆年间四川的督抚官多奏称：“川省五方杂处，游手最多，往往结党成群，流荡滋事，日久即成咽匪。”^⑤

加入咽噜组织的，除了外省入川的流民，还有四川本地的破产劳动者、贫苦水手、纤夫、盐贩、烟贩和一些散兵游勇。单就水手、纤夫来说，四川就有数十万。他们在长江、嘉陵江以及潼、泸、涪等江上，终岁劳作，却不得温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最后不得不卖光所穿的衣服履物，成为“精膊溜”。这些人，漂流江湖，“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咽匪伙党”^⑥。

盐是四川货值最大的物产，著名产盐者有数十处。每厂盐工苦

① 邱仰文：《李蔚州先生墓志铭》，见《国朝文汇》乙集卷1。

②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03，24页。

③ 《录副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御史柴潮生奏。

④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4，《艺文下》。

⑤ 《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勒保奏。

⑥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5，《水道》。



力多者“以数十万计”，少则“亦以万计”。各处口岸，商贩云集，“利之所在，走险如鹜”^①。咽喉多横行其间，或充私贩，或做保镖。此外，如雅州等处前往云南贩卖鸦片的沿途，“咽喉、刀客也很活跃”^②。

从上述可见，咽喉的基本群众，乃是“不能谋衣食”的“无赖恶少”^③，即破产的劳动者和游民。他们结拜咽喉的目的在于“有事彼此帮助，以免被人欺压”^④。他们内部有严明的约束，“拜把之后，不许擅散”^⑤。他们的基本活动是，强乞强买，逢场绌窃，“昼抢场市，夜窃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⑥。由此，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咽喉不是明末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而是康雍乾以来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不是郑成功派陈近南往四川“开精忠山”的结果，而是四川民间自发组成的秘密结社；不是“反清复明”的组织，而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

四、从咽喉到哥老会的历史演变

从咽喉发展到哥老会，并不是简单的组织重复，也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异，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其间，很明显地经历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期咽喉与白莲教的融合，和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大结社系统的相互融合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咽喉与白莲教的相互融合。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咽喉的势力由四川向外扩展，首先与川陕楚三省交界地区强大的白莲教势力相会，它们便迅速走向合作融合。

由于他们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劳动者和无业流民，他们都要求改变痛苦的生活境遇。所以，两者之间的合作融合有着共同的阶级基础。同时，两种组织又各有长短，需要相互补充。白莲教“多深堂大宅，复轻财好施”，咽喉可“藉教匪家以藏身”^⑦；而且“入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5，《水道》。

②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御史朱坚奏。

③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④ 《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勒保奏。

⑤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⑥ 陈庆镛：《与舒云溪制府书》。

⑦ 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1。

中国近代史研究

彼党伙，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①。因此，就有大批啮嚙分子加入白莲教。而啮嚙内“皆年力精壮之无赖恶少”，操习技艺，劲悍善斗，“教匪因以起事，故麽麽鼠子啸呼而起，战阵技艺有如素习”^②。因此，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时，吸收了大量啮嚙分子加入起义队伍。嘉庆元年（1796年），徐添德在达州起兵，“招乡市游手无赖，遂至万人”，“其中大多是啮嚙子”^③。严如煜说：“自达州倡乱，各匪潜相附从。近闻教匪亦逸至蜀中，则匪中添生力徒卒，而总以教匪名矣。”^④嘉庆五年（1800年），白莲教起义军蓝号冉天元等部入川西时，也吸收了大量战斗力甚强的啮嚙子，队伍从三四千人很快扩大到五万余人。^⑤

平时的合作交融，战时的并肩战斗，不能不对它们的组织形态产生影响。我们看到，嘉庆以后，啮嚙的组织开始设立山堂字号，“自分支派，不相溷淆”，内分红、黄、蓝、白、黑五旗。^⑥这种五旗制的分派，显然是效法白莲教而来的。而有些地方的白莲教（如湖南的青莲教），也开始举行拜台结盟的仪式。^⑦这可能是受了啮嚙结拜仪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后，天地会和白莲教之间的相互融合。嘉道年间，南方天地会势力北移，与白莲教势力相会。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游民就愈来愈多，成为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为了生活，加入秘密社会如水赴壑，随处风靡。或加入会党，或投向教门，或既入会党又入教门，名目繁多，层出不穷。除了传统的名目之外，当时出现了许多亦教（教门）亦会（会党）、非教非会的组织。就湖南一省而论，据当时的地方官奏报，“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⑧；“会匪名目不一，有添弟、串子、红教、黄教、白教、道教、佛教及青龙、白虎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②③ 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1。

④ 严如煜：《平定教匪总论》。

⑤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157。

⑥ 参见刘蓉：《复李制军书》。

⑦ 湖南新宁一带青莲教，系由四川成都的王又名传布而来，“其法入教人出百五十钱，供会饭费，每招徒至三四十人，辄白昼野会累台，洒鸡血酒中，班饮设誓约，谓之拜台。”参见《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湖南巡抚裕泰奏。

⑧ 《大清文宗圣训》卷90；《录副奏折》，咸丰元年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等会”^①；此外还有“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②，不下数十种。

如果考察它们的组织活动，那么就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特点：（1）这一时期，湖南许多会党组织的活动，多带有教门的特色。我们前面提到的添弟、串子、青龙、白虎等会，“类皆踵白莲之余习，托免劫以为词”^③。而教门组织的活动，又带有会党的特点。如湖南的青莲教，“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④。（2）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可以包含教和会两个不同的部分。如湖南新宁雷再浩倡立的棒棒会，就“分青、红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荤”^⑤。（3）一个组织的头目，既有来自会党的，又有来自教门的。如湘鄂边界监利、沔阳交属之洪湖，哥弟会有廖士银等十二头目“半自粤余土匪出身，半由白莲教匪出身”^⑥。（4）有既入白莲教又拜天地会的。如道光年间董言台等先在江西、湖南一带“入金丹教，礼敬无生老母，并邀请多人结拜天地会”^⑦。（5）还有人同时结拜或掌管几个组织的。如湖南浏阳县曾帽才“总理黄、红、白三教十五营”^⑧；宁远县李春笼“结拜红、白、黄三会，伊称黄会头目”^⑨。湘乡县李世溃“食长斋”，“系来龙、四方、金龙、青龙、宝华、天宝等山首领”^⑩。以上情况，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极度动荡不安，广大贫苦人民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纷纷投奔秘密结社的情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教门与会党两大秘密结社系统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错综局面。

不能认为，教门和会党之间的合作交融只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或者只是发生在湖南地区。实际上，在此前后，在湖南的临近省份，多有类似的现象存在。例如，嘉庆七年（1802年），广东惠州永安县，就有白莲教与天地会联合攻城的事。《惠州府志》载：“官粤陇、

① 《刘中丞奏稿》卷2，《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③ 《刘中丞奏稿》卷2，《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

④ 《大清文宗圣训》卷90。

⑤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璟奏。

⑥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30。

⑦ 《大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87。

⑧ 《刘中丞奏稿》卷4，《擒获浏阳等县会匪惩办片》。

⑨ 《录副奏折》，同治五年十二月四日湖南巡抚李瀚章奏。

⑩ 《湘粤剿办哥老会文稿》，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



赖东保倡乱于宽清溪，围攻邑城……官为添弟会首，其众以红巾裹头为号；赖东保为白莲教匪首，其众以白布裹头为号。”^①嘉庆八年至嘉庆十一年（1803—1806），江西省的贵溪、临川，福建省的邵武等县，有人结拜天地会，会内分有“阴盘教、阳盘教名目”，“愿入阳盘教者，传授口诀口号；愿入阴盘教者，抄传经本，吃斋念诵”^②；“善字号尽是吃斋，和字号俱系吃荤”^③。同光年间，楚豫边界地区，有哥老会与灯花教（白莲教的一种）“互相勾煽，根株纠结，蔓延日广”^④。在陕西境内，有“签匪”与“会匪勾结者，亦有既为签匪复为会匪者，彼此效尤，无恶不作。其宰鸡滴血，传授口诀，绰号排行，竟与会匪无二。其公然剽夺，报仇杀人，倡乱谋逆，亦与会匪行径相似”^⑤。

哥老会正是在上述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社会极度动荡、秘密结社飞速发展、会党与教门广泛融合的情况下，以啮嚙的组织形式为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据清朝地方官的大量奏报，咸同年间的哥老会、江湖会和红钱会等组织，不仅都实行宰鸡滴血、焚香拜把的结拜仪式，会内不仅都有老帽、老么、大爷、二爷、三爷、五爷等名称，而且还“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暗号”^⑥，并有“五祖洪门木戳”等印记。^⑦这种三指口诀暗号和五祖洪门印记，就是从天地会那边借用来的。

哥老会的出现，在组织机构和名称方面的具体演变过程，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具体过程是：“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我的看法与这种看法不尽相同。我同意关于哥老会的前身是江湖会的说法。这是因为，不仅哥老会与江湖会的组织机构和活动特点基本相同，也不仅有许多人奏称哥老会是江湖会的变名，而且不少材料证明，江湖会的名

① 《惠州府志》卷18，17页。

② 《录副奏折》，嘉庆八年九月六日江西巡抚秦承恩奏，嘉庆十一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阿林宝奏。

③ 《吴文春供词》，附于嘉庆十一年八月四日署江西巡抚布政使先福折内。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33，《派员专办沿边缉捕事宜折》。

⑤ 《录副奏折》，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一日陕西巡抚叶伯英奏。

⑥ 《录副奏折》，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庆端奏；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

⑦ 参见《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张树声片。



目比哥老会出现得早。要补充说明的是，据我所知，早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福建就破获江湖会组织，并搜到了《江湖公约》。这个公约的具体内容有“端品行；酌己力；泯强形；公利路；慎收徒。佩服斯约，何处难行。如其无辜被人勒索，须报同人，然后行事等语”^①。如果将这个公约的内容与后来流传于哥老会的《江湖海底》相对照，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后者只是在文字条例上更繁杂一些，具体反映了前者到后者的演变情况。

但是，我觉得关于江湖会来源于仁义会和天地会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有关文章所列举的嘉庆年间福建的仁义会，与光绪年间河南等地的仁义会，名称虽然一样，但实际内容是大不相同的。从档案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看，前者源于天地会，或是天地会的变名；而后者的名称虽然也是仁义会，但内容却与前者大不一样。从后者开山立堂、封授职号等内容看，我认为是哥老会的变名。^②所以，我们不能单凭某些组织的名称相同，就断然认为它们是一种组织，或是一个来源的。在清代，秘密结社名称一致而内容相异，并不是个别的现象。重要的是，必须依据它们的组织内容和活动特点来鉴别。我以为哥老会的前身是江湖会，而江湖会又是从咽噜（即钱会）变化而来。这一点，熟悉哥老会由来演变情况的李榕说得很清楚，他说：“窃按蜀中尚有咽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德顺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③这种说法，也见于其他材料。因此，我的初步看法是：由咽噜（钱会、签会）变为江湖会和哥老会，以至长江会、洪江会、昌江会、英雄会等，才是哥老会的源流。

^① 《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福建巡抚魏元烺奏。

^② 天地会开台拜会，没有山堂系统；而哥老会开山结盟，设有山堂香水。天地会封授职号一般有红棍、白扇、草鞋等名目；而哥老会山主（龙头）之下，有坐堂、盟证、陪堂、理堂等名目。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说明哥老会不是源于天地会。

^③ 《十三峰书屋·批牍》卷1，《稟曾中堂、李制军、彭官保、刘中丞》。

五、哥老会出现的年代和背景

关于哥老会组织名目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还不能确知。一般专史和文献记载，多说始于同治初年。但据目前所见清代档案和有关记载的分析研究，我认为哥老会名目出现的时间似乎要更早些。首先，我们看到，咸丰初年曾国藩创办湘军所拟定的湘军营规，已明确规定“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①。这说明哥老会势力在咸丰初年已相当兴盛，而且已传入清朝军营，所以才引起曾国藩的恐惧和深恶痛绝，将结拜哥老会同传习“邪教”一样，列入严厉的禁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哥老会的名目约在咸丰之前就已出现。其次，据左宗棠奏称，咸丰十年（1860年）他在招募楚军时，也将严禁军营结拜哥老会列入“行军五禁”^②。他在一个奏片中又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臣于咸丰十年成军时，严禁各营，不准收用此等游勇，并谕禁勇丁，不许蹈此匪习，犯者立正军法。后经查办数人，无敢犯者。”^③这就再次说明，咸丰年间哥老会已在湘军中盛传，那么它的名目出现应该更早。据四川的同志研究，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四川已出现哥老会的名目，并引起清廷注目和严禁。^④又，不能道人著《救世新论》，也提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川会党内有“江湖烧会”^⑤，实际上就是“烧灰结盟”的哥老会。这种烧灰结盟的仪式，都是来源于四川的嘤嚕。^⑥另外，卫聚贤在《中国的帮会》一书中说：“道光十二年时已有哥老会了。”^⑦如果以上这些说法是确有所据的话，那么即可确认哥老会的组织名称最迟应出现在道光年间。

同光年间，清朝的许多封疆大臣奏称，哥老会“起自军营”，这当然不很确切。但哥老会蔓延发展，却与清朝的军营，特别是湘军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营规》。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2。

③ 《录副奏折》，同治五年五月八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奏。

④ 张力：《嘤嚕试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2）。

⑤ 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

⑥ 参见《黄胜才供》，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45。

⑦ 卫聚贤：《中国的帮会》，5页。



的创立与解散有着密切的关系。湘军成立之初，曾国藩虽严禁军营结盟拜会，但实际上已有大批哥老会分子混迹其中，鲍超的军营就是突出的一例。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①左宗棠也说：“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②经过辗转相传，到同治初年，湘军“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③。以至“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④。

湘军为什么要结拜哥老会？或者说哥老会为什么能盛传于湘军之中呢？按照曾国藩的说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二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⑤我认为这个说法既说明了湘军结拜哥老会的基本目的和真实情况，又反映了哥老会这种江湖团体的基本性质，因而是可信的。

当然，哥老会不光流行于湘军营伍，同时也流行于其他军营，情况亦与湘军相似。刘崑在一个奏折中说：“臣查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击贼，协力同心，乃历久习惯，裁撤后仍复勾结往来。其端肇自川黔，延及湖广。近日用兵省分各勇，亦纷纷效尤，党羽繁多，伏而未发。”^⑥刘坤一在一个文告中也说：“前此各省用兵，营中材武之士，结为兄弟，自成一队，遇有劲敌，辄以陷阵冲锋，带兵员弁，另给旗帜号衣，以作其气，而收其效，此哥老会之所由来也。久之流弊渐生，往往怯于公战，而勇于私斗；随即严加禁止，而其习未能尽除。迨后发、捻以次削平，各营陆续裁撤，此风仍而不改。”^⑦

由上述可见，陶成章把哥老会盛行于湘军说成是李秀成、李世贤等隐遣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复大仇于未来^⑧，有的同志还把它说成是天地会的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部署，看来都是缺乏史实根

① 王闿运：《湘军志》（一），《湖南防守篇第二十五》。

② 《左恪靖伯奏稿》卷25，《附陈鲍提督所部仍请由该员自为主持片》。

③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

④ 《十三峰书屋·批牍》卷1，《湘潭县梅震荣到任批》。

⑤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

⑥ 《刘中丞奏稿》卷2，《扑灭湘乡会匪并击散浏阳斋匪折》。

⑦ 《刘坤一遗集·公牍》卷2，《哥老会匪及早悔改示》。

⑧ 参见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据的臆测。

原来，曾国藩办湘军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剿灭太平军，但由于哥老会盛传于湘军，使他不得不解散湘军；而湘军的解散，又促使哥老会更广泛地蔓延于社会，成为反抗清朝统治的一支巨大力量。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依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刘坤一总结这一过程时曾悲哀地说：“前则为国剿贼，今竟自陷于贼，将来为人所剿，良可痛心。”^①

为什么湘军等营伍的遣散，会促使哥老会更广泛地蔓延，并转化为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巨大力量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坠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政治腐败，国弱民穷，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破产劳动者、游民。湘军和其他营伍的解散，数十百万将士的安置，是个极严重的问题。这些人解甲不得归农，也找不到其他职业，绝大部分不得成为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游民。于是，他们就流浪江湖，与各地原有的游民相勾串，结盟立会，散票取钱，“江湖流荡之辈固趋赴不遑，市镇负贩之徒亦相从而靡”^②。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清朝同光年间哥老会的数百起案件材料，我们看到，各地哥老会的头目，绝大部分是营伍出身，具体说明了这批散兵游勇在社会上传布哥老会的作用。哥老会的广泛蔓延，很快就造成“各路之会匪声气相通，抗官拒捕，势渐不可制”^③的局面。

这个问题，在湖南尤为突出。因为湖南不仅是筹兵筹饷的一个重要地区，而且是湘军的老家，遣散回家的兵勇最多，因而也是哥老会流传最盛的地区之一。同治九年（1870年）湖南巡抚刘崑在一个奏折中说：“溯查湖南二十余年以来，支持东南大局，筹兵筹饷，历久不懈，其时尚值年岁丰稔，官绅殚心筹画，略无旁顾。近年滨湖大水，上游州县各时遇饥旱，民力久经告竭。而自江南大功告成之后，遣散兵勇以数十万计，多系犷悍久战之士，不能敛手归农。从前平定川陕三省教匪，筹办善后，安插数十余年之久，始能敕定。此次军务十倍于川陕善后，安插又不能及嘉庆年间物力之厚，勉强敷衍，苟顾目前。兵勇之情，多未安帖，哥匪名目因之乘之以兴。”^④在这里，刘崑说明了两个重要情况：其一是，清朝政府镇压川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

①② 《刘坤一遗集·公牍》卷2。

③ 《丁文诚公奏稿》卷14，《拿获重庆泸州巨梟片》。

④ 《刘中丞奏稿》卷7，《湖南饷源匮乏恳赐协拨折》。



因而处理战后遣散兵勇的安置问题也就大不一样。如果说嘉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没落，但清朝政府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之后，还能勉强敷衍安置遣散兵勇善后问题的话，那么，到同光年间，中国社会已陷入半殖民地深渊，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就再也无力处理大量遣散兵勇的善后问题了。其二是，由于湖南有数十万遣散兵勇，回乡后不能敛手归农，“兵勇之情，多未安帖”，因此哥老会就特别猖獗。从同治六年（1867年）起，哥老会就在湖南举事作乱，此后连年不断。曾国藩也为之哀叹：“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①

总之，哥老会势力崛起，是清末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探明其源流背景，我们就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看到半殖民地中国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上面的叙述，只是一个很粗浅的看法，希望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① 《曾文正公书札》卷27，《复吴南屏》。

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

一、长江教案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1891年5月至9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反抗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斗争的烽火蔓延到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数十个城镇，凡是有外国教堂的地方，群众多愤然而起，焚毁教堂，驱逐传教士。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长江教案”。

有一种意见认为，教案（也包括长江教案）的发生，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和迫害，是仇视欧洲人和反对西方文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事实上，中国人民并不排斥外来的宗教，更没有迫害外来宗教。众所周知，佛教、摩尼教是外来的宗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督教从唐代起即传入我国，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发生民、教相争的“教案”。为什么到了近代，教案接踵而起，以至酿成1891年长江流域的巨大教案？

原来，从鸦片战争起，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多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和商品进入中国。他们之中，除少数专心于传教事业者外，大多充当着资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先锋和帮凶。他们的活动是服从于当时殖民者“征服整个中国”的总目标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说：“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和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的也是一样，它不单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①因此，他们的侵略行径，就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恨与反抗。早在五口通商时期，

^① 《在华新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纪录》，173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275页。



“教案”便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渐次发生。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由于中法《北京条约》的签订，法国传教士获得了“在各省租买田地建堂自便”的特权。从此，教会势力就像洪水一般汹涌侵入中国腹地。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外国人办的基督教堂及其他教会机构已在全国各地星罗棋布，长江流域更是教堂林立，教士充斥。单江苏一省，就有大小教堂 608 所，分布如表 8。传教士“连镳接轳而来”，通都大邑，繁盛乡镇，以至偏僻山区，“无一处不有教士之踪迹”^①。他们以教堂为据点，以本国的外交、武力为后盾，凭借其享有治外法权的身份，横行无忌，作恶多端。最惹广大下层人民痛恨的是：教会霸占土地房产，包庇教民欺压群众，拐骗和残害儿童。

表 8 1892 年江苏各地教堂数量统计表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江宁府	上元	7	松江府	川沙厅	24
	江宁	7		华亭	40
	六合	1		奉贤	26
扬州府	江都	4		娄县	29
	甘泉	14		金山	21
	高邮	7		上海	49
	兴化	1		南汇	37
淮安府	东台	1		青浦	17
	山阳	2		常州府	武进
	清河	3	阳湖		4
安东	1	无锡	8		
徐州府	萧县	2	金匱		5
	丰县	1	宜兴		3
	碭山	3	江阴		34
	宿迁	5	镇江府	丹徒	8
睢宁	3	丹阳		8	
苏州府	太湖厅	1	通州直隶州	通州	18
	长洲	4		泰兴	1
	元和	13		如皋	8
	吴县	6	太仓直隶州	太仓州	1
	常熟	14		镇洋	1
	昭文	10		嘉定	16
	昆山	6		宝山	26
	新阳	4		崇明	72
海门直隶州		31	合计		608

资料来源：根据光绪十八年（1892 年）八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总理衙门呈报江苏各府县的教堂清册统计制成。见《教务教案档》，第 5 辑第 4 册，843～915 页。

^① 程宗裕：《教案奏议汇编》卷 4，《续保教策》。



首先，教会在各地多霸占着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除部分用于建筑教堂及其附属机构外，大多出租给当地的农民耕种，进行地租剥削。因此，教会往往就“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①。就长江沿线几个地区而论，基督教的耶稣会在富庶的江南就霸占了约 200 万亩土地，仅松江佘山一带即占地 6 000 余亩。^② 湖北省老河口的天主教堂，在光化、谷城占地“在万亩以上”^③。在四川，川西主教杜昂在任 20 多年，霸占了良田 30 万亩，仅彭县白鹿场一地就占有农田 1 万亩。^④ 教堂把占买的土地租给农民，要收取五成至八成的地租。为了镇压农民，教堂还私设刑堂、监狱和水牢。所以农民都斥教堂为“地主堂”。

教会在农村霸占良田的同时，还在城市大量购置房地产，出租剥削。1884 年英国驻镇江领事报告，镇江开埠以后，“每个教派都买了地产，建造了漂亮轩敞的房屋”。同年 3 月 4 日，上海《申报》就揭露，镇江租用教会房产的租户，因生意清淡，要求减租，传教士不肯，因而聚集请愿准备罢市的租户达二三千人之多^⑤，由此可见教会在镇江占有房地产的规模之大。不言而喻，教会用霸占盗买来的土地房产，对中国人民进行再榨取，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抗。

其次，教会在各地庇护教民欺压群众，是激起反抗的另一重要原因。

应当承认，无论天主教会还是耶稣教会，在各地招引的教徒，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穷苦阶级的善良群众。他们“吃教”的目的，主要为逃避封建势力的压榨，同时也想得到教会对他们生活的“赈济”。但也不可否认，确有不少流氓无赖、地痞恶棍流入教会。这些人“一入教中，即成化外”^⑥。教会为利用他们“干预公事，挟侮长官”，还将治外法权扩充于这部分人，“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⑦。在教会的包庇纵容下，这些无赖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种种妄

① Smith Arthur, *China in Convulsion*, vol. 2, New York, 1901, p. 58.

②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3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③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鄂北地区的侵略》，见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3 页，1961。

④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90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⑤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32 页。

⑥ 《清季教案史料》，56 页。

⑦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41，43 页。



为，几难尽述”^①。广大群众在“宛转求生而无可生”^②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起来杀死这些“教民”，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

最后，教会在各地举办的一些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事业”，一方面是吸引群众入教的法宝；但另一方面，他们拿中国贫苦病人当试验品，医疗事故以及拐骗残害儿童的事件，又是最易引起群众反抗教会的导火线。

从教会在各地办的医院看，虽然客观上将西方的医学技术传到了中国，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介绍医学、救死扶伤，而是为收买群众的“灵魂”、“传播基督教福音”。关于这一点，19世纪80年代某传教士在扬州工作的日记《在东方》，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该书记载了教士如何借看病给患者“讲述主可以给她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灵魂，和一个痛苦所不侵入的天堂之家”，然后将她们引诱入教的情景。^③虽然这样的精神麻醉一时不易被群众觉察，但他们拿中国人当试验品等惨无人道的事件，却是掩盖不住的。在扬州，因教会医生“剖胎”，就造成了一次教案。

同样，教会办育婴堂、孤儿院，也是打着“慈善事业”的幌子，向中国的善良教民和欧美人民捐募款子，并利用了中国的大量赔款来养肥他们自己。1891年《北华捷报》就有文章揭露，这“无数万的款项”，主要不是用在救济中国人民穷困的事业上，而是用在传教士自己及其妻室儿女的生活上，“整个在华的传教事业，无非是为着养活一班在欧美失业的人们（即传教士——引者）之救济事业而已”^④。所以，尽管教会在各地收容了大量婴孩，例如，“就江苏一省而论，天主教堂所收养之孤儿约计有八千余人”^⑤，湖北省收养之孤儿5300余人。^⑥但由于教会不愿拿出较多的钱，育婴堂、孤儿院的条件很差，婴儿得不到好的照料，生病死亡率甚高。有的育婴堂“死亡率高达95%”^⑦。加之，有的地方教会勾结拐人犯，将老百姓

① 李东源：《传教论》，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② 《皇朝政典类纂》卷490，9页。

③ 参见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284页。

④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Shanghai, 1892, p. 108.

⑤ 《益闻录》，1891-06-03。

⑥ 据光绪十九年湖北省呈报通省各属筹办育婴堂、收养婴孩的清单统计，见《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2册，152~158页。

⑦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287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

的幼童拐买进教堂，激起群众的疑窦和愤慨，教案随之发生。1891年的长江教案，就是以教会“迷拐幼孩残害婴儿”为导火线而爆发起来的。

从上述可见，教案的发生不是由于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和迫害，而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和教会势力对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侵犯。长江教案就是这个地区广大人民群众长期郁积着的对帝国主义者和教会侵略仇恨的总爆发。

在中国近代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史上，几乎每个阶段、不同的地区、各次教案都有自己的特点。长江教案有哪些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斗争的规模和声势浩大

这次斗争的火焰，首先从安徽芜湖燃起。导火线是5月10日群众指控教会“迷拐幼孩”，将天主堂的两名修女扭送保甲局和县府讯办，由于教堂神父和英国领事馆的干涉，两名修女被释放。次日，芜湖城内某姓又突然失踪一幼孩，群众怀疑教堂“又施狡狴”，愤怒不堪。顿时，万余民众“攘臂直前，势如潮涌，声若山崩”，将教堂、教会学校攻打焚烧成“瓦砾之场”。接着又围困海关和英领事馆。后经安徽巡抚沈秉成带兵船前往镇压，群众始散。^①

芜湖教案一爆发，立即在安徽各地和长江沿线引起连锁反响。5月15日，和州人民愤然而起，指斥当地天主堂教士“迷拐幼孩”，包围教会学塾，“挥臂群呼，非烧即杀”。5月17日，安庆城内遍张揭帖：“约定本日闹事，与天主教为难。”当日上午，群众包围教堂与育婴堂，“摩拳擦掌，众喙争鸣”^②。5月23日，广德州城内聚众五六百人围攻教堂。^③

从6月1日起，反教烽火就迅速蔓延到江苏、江西、湖北等省。6月1日丹阳教案爆发，不到10天时间，“江苏之丹阳、金匱、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被烧”^④。6月5日，反

^① 参见《芜湖闹事实情》，载《益闻录》，1891-05-20；*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 11-23。

^② 《益闻录》，1891-05-27。

^③ 参见《益闻录》，1891-06-06。

^④ 《刘坤一遗集》，698页。



教浪潮席卷至江西湖北交界之武穴，千余群众焚毁了基督教卫斯理循道会的福音堂，英国传教士金姓、武穴海关职员柯某被打死。^① 9月1日，宜昌人民因追究天主教圣母堂拐卖幼孩，遭美国圣公会的枪击，众情激怒，烧毁了圣公会和圣母堂。^② 在此期间，武汉两岸“洋街洋堂，人人自危”；上海也流传着攻击洋教的匿名揭帖。从上述情况可见，在短短几个月内，群众反教会侵略的斗争风暴，已席卷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面对这场汹涌而起的反教大风暴，帝国主义者惊恐万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连续向国务院报告说：“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我们惧怕……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③。各帝国主义列强于是迅速联合起来，对它实行武装威胁和镇压，致使“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④。为此，田贝还呼吁：“在亚洲海面上的美国舰队应该加强。”^⑤ 可以说，长江教案是义和团运动以前规模最大、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打击最沉重的一场教案。

（二）哥老会和下层人民群众充当了斗争主角

从中国近代教案的发展变化情况来看，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各地的反教会斗争大多是由封建官僚、地主士绅发动的。19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的反教会斗争常常是由秘密结社组织发动的。他们和下层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是斗争的主力。在长江流域，发动反教会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哥老会。如1886年至1898年四川大足余栋臣的三次打教两次起义，都是由哥老会发动的，余栋臣就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个头目。长江教案更是由哥老会组织预谋、串联和发动起来的。1891年光绪帝在一个上谕中说：“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半由会匪从中主谋。”^⑥ 田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秘密的会社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

^① 参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0，135页；*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p. 31-3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I*, p. 607.

^② 参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1，98、136页；*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p. 41-45.

^③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900、602页。

^④ 同上书，601页。

^⑤ 同上书，602页。

^⑥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915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

因。该项会社以长江流域为最多，他们都是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官吏所最恐惧的对象。”^① 上海的《字林西报》则明确指出，“哥老会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②。如果说以上材料还只是一般指出哥老会在这场教案中的“主谋”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从后来清政府捕获直接发动这场教案的哥老会骨干曹义祥等人的供词，以及与长江教案密切相关的“美生案件”材料，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哥老会在这场教案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详见下文论述）。

由于这场教案发生在长江沿线的城镇，所以，参加斗争的群众，主要是城市的贫民、码头工人、民船水手、散兵游勇、破产流浪者等下层群众。例如，在宜昌教案中，据张之洞报告，攻击教会最激烈的，是“码头挑夫、上下民船水手、流寓游勇”^③。外国传教士也说，纵火焚烧教堂、修道院和教士住宅的，“是湖南船民和游勇、四川船民、街头流浪者，还有来自江西、贵州省的人”^④。在芜湖教案中，滋闹教堂的，主要是城市贫民。^⑤ 丹阳教堂被焚后，出来抢掠被烧焦的木材和砖石的，有船民、乞丐、吸鸦片者等。^⑥ 这些人 与哥老会有密切的关系。1891年英国的巴富尔在曼彻斯特的一次会上就指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哥老会“联盟大部由士兵、散勇等组成”^⑦。

（三）有强大的反教舆论鼓动

应该说，在以往各次反教会斗争中，都有舆论鼓动。然而，除个别教案中流传过反教小册子外，大多是在反教现场贴出一些告白、揭帖和檄文，它们流传的范围大多不广。但长江教案则不同，其反教宣传品种类之多，流传之广，舆论声势之大，都是空前的。

^① 《美国外交档案》，398页，1891，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900页。

^② *North China Daily News*, May 29, 1891.

^③ 《张文襄公全集》卷139，《电牒十五》，14页。

^④ “Mr. Sowerby to Consul Everard, Ichang, Sept. 7, 1891”, 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I*, pp. 636-637.

^⑤ 参见《益闻录》，1891-05-20。

^⑥ 参见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 29.

^⑦ F. H. Balfour,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in *Journal of The Manchester Geographical Society*, 1891 (7).



这次反教的舆论中心在湖南，主要是以周汉为首的几个湖南士绅，通过编印散发仇教宣传品制造起来的。

周汉，字铁真，湖南宁乡人，1843年生，1860年以诸生投身军旅。自1882年起，在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军中帮办营务。1884年请长假回湖南，寄居长沙。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外国传教士大批进驻湖南，深表痛恨，于是就撰写反教作品，大量刻印散发，进行仇教宣传。从1890年至1898年，他创作了30多种反教宣传品，其中大部分是1892年前刊印出来的。1892年5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在几个月前，我就得到了25种1889年和1891年在湖南出版的反对外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小册子。”^①此外，周汉还刊印了一套《谨遵圣谕辟邪全图》^②。以上反教文件，有的是以名儒后裔的名义发布的，如《周程朱张四裔孙公启》等；有的是假托名将名臣发布的，如《棘手文章》等；有的是以官府公文形式公布的，如《湖南巡抚部院咨复直隶总督部堂稿》等；有的是托名儒释道三教弟子联合发表的，如《儒释道三教弟子公议防驱鬼教歌》等；有的是以各行各业名义发布，如《湖南全省书坊刻刷商民公禀督抚宪稿》、《湖南全省屠行公议》等；有的则以湖南通省名义发布，如《齐心拌命》等；也有公开以周汉的名字发表的，如《谨遵圣谕辟邪》、《大清臣子周孔徒遗嘱》等。^③其中不少是通俗的诗歌和图画。如《鬼教该死》就是一本白话说唱诗歌，当时刊印了80万册，散发全国，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宣传品。

以上反教宣传品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外国教会教士充当帝国主义者的帮凶，谋我江山、窥窃社稷、拐骗儿童、残害人民等罪行。由于这些作品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感情，又通俗易懂，所以能广为传播，造成强大的舆论。张之洞说：“湘鄂两省，赞周（即周汉——引者）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④；“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其事，有触即发”^⑤。

① T.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vol. 2, p. 141.

② 全套计有32幅，原件未见。美国学者柯文在他的《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收录了7幅。见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pp. 140-141.

③ 参见吕实强：《周汉反教案》，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137，《电牒十六》，4页。

⑤ 《张文襄公全集》卷136，《电牒十五》，12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



二、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的主要活动

如前所述，长江教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斗争规模和声势大，各地互相呼应，上下联成一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般多认为，这与哥老会的活动有关。但是，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究竟搞了些什么活动，起了什么作用？过去的许多论著都没有说清楚。根据现有资料的研究，我认为哥老会在这场教案中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一）广泛散发仇教宣传品，大造反教舆论

据外国传教士调查，自 1890 年起，“一种毒害长江流域人民心灵的特殊努力”已在进行，指的就是散发仇教文件，激起民众的仇教情绪。由于湖南长沙是编印仇教文件的中心，所以散发得特别多。据目睹者说：“长沙所有的墙上，都覆着这些漫画（指《谨遵圣谕辟邪全图》——引者）。它们被拿到大街小巷，各处张贴……上自督抚大员，下至街头苦力，人人喻晓。”^①数月之内，这些文件即“广泛散布于长江上下游”^②。

重要的问题是，谁将这些文件散发出去的？据英国伦敦布道会华中地区负责人杨格菲考察，这些文件是由周汉的“使者”——一批湖南人散发出去的。他们发现，长江流域所有骚动与周汉的“使者”在当地出现是同时发生的。这些“使者”每到一地，就散发揭帖，传布流言，点燃起人民心中的怒火。他的结论是：“在人民的背后是湖南使者，而在湖南使者的背后，又站着真正有权力的人。”^③

与此同时，驻江苏省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报告，在长江下游的几个城市，有一批湖南人在活动，他们到一地，教案即随之发生。^④后来，南洋大臣刘坤一、常镇道黄祖络禀报，他们在仪征等地捕获

①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 209.

② *Ibid.*, p. 189.

③ *Ibid.*, pp. 205, 189.

④ 参见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 37; Wehrle, *Britain, 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 1891-1900*, pp. 24-25; Guy Puyraimond, “The Ko-lao Hui and The Anti-Foreign Incidents of 1891”, in Jean Chesneaux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曹义祥、唐玉亭等一批湖南人，申明这些湖南人都是哥老会分子。正是这些人奔走于长江各地，招人入会，散发仇教宣传品，点燃起反教的烽火。^① 他们的结论是：“此次教堂接踵被毁，皆系会匪所为。”^②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周汉的仇教文件，所以能在长江教案中起鼓动作用，固然是由于文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感召力量；但关键还在哥老会分子将它们广为散发，并根据各地群众对教会愤怒的具体情况进行发动。

（二）预谋策划，制订斗争策略

早在 1891 年的五六月间，教案在长江下游开始爆发之际，一些外国观察家就根据种种迹象推断：这场运动是经过预谋的。^③ 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预谋者是哥老会分子^④，但多缺乏确凿的证据。特别是哥老会在斗争中采取的策略，更是不得而知。现在，我依据参与运动谋划的哥老会骨干曹义祥等人的供词，参照教案实况研究，不仅可以确证哥老会是预谋者，而且还得知他们的一些斗争策略。

据曹义祥、唐玉亭等人供称，他们系湖南人，加入哥老会后，即来江苏仪征、扬州等地，散发布飘，纠人入会。光绪十七年（1891 年）三月十四日，哥老会头目蒋桂仿，同苏得财、刘玉到曹义祥家说：“要到各码头毁闹天主教堂，已约允在会的马玉堂、王福章、黄青华、罗廷桂、赵玉兰、吴月初、洪国太、韩凯、谭裕、刘得胜、张玉山、李得胜、朱福盛、熊良诚、张老么、陈仔青、贺源庆、王三仔们同去，只是人少，不敢动手。”经谋划商量，曹义祥便提出一套闹教的办法：第一步是“预备匿名揭帖”；第二步是“遍处张贴”，揭露“教堂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等罪行；第三步是“哄动众人”，攻击教堂；第四步是乘势焚烧教堂后，即脱身而逃。三月二

① 参见《教务教案档》，第 5 辑第 2 册，735~740 页。

② 同上书，735 页。

③ 参见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 37; Wehrle, *Britain, 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 1891-1900*, pp. 24-25; Guy Puyraimond, “The Ko-lao Hui and The Anti-Foreign Incidents of 1891”, in Jean Chesneaux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④ 参见 [日] 矢泽利彦：《长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第 4 辑；[日] 里井彦七郎、小野信尔：《十九世纪中国的仇教运动》，载《世界的历史》，第 11 辑；Wehrle, *Britain, 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 1891-1900*。



十日左右，蒋桂仿等 22 人来到扬州，与唐玉亭等合伙闹教。他们遍张贴，煽动民众纷纷到教堂聚闹。蒋桂仿等见文武官员弹压严紧，“就雇坐划船，于四月初头到芜湖，约同那里在会的人，布散谣言，并遍贴揭帖。适有教妇迷拐小孩的事，众人都抱不平，拥到教堂滋闹，就各乘机进内放火抢物。后来蒋桂仿们回到南京、镇江等处，往来游弋。因见营兵巡防严密，无从下手，就于四月二十九日到丹阳城内，也先造谣揭帖，煽惑众人闯入堂后园内，挖出许多小孩尸骨。蒋桂仿们就在场喊说：‘放火烧毁教堂，就可除害。’那时众怒齐发，就各放起火来。蒋桂仿们因没抢得财物，还到沿江下游一带去闹……金匱、无锡、江阴、阳湖、如皋等县教堂都被烧毁。”^①

从以上供词，我们就可以明确两个重要事实：第一，在长江教案爆发前，哥老会早已决定“要到各码头毁闹天主堂”。第二，蒋桂仿和曹义祥等提出的预备匿名揭帖、到现场张贴、揭露教堂害死小孩、鼓动众人攻击教堂、教堂焚毁后便脱身而逃这一套办法，实际上就是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的斗争策略。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这套策略是否最早出于蒋桂仿、曹玉祥一伙，但它在长江教案期间，是被各处哥老会分子采用的。

（三）奔走长江各地，串联发动

我们从曹义祥等人的供词，还可具体看到，以蒋桂仿等为首的一批哥老会分子从仪征到扬州、芜湖，然后顺江而下，到南京、镇江、丹阳、无锡等地，与当地的哥老会分子相串联，纠众聚闹教堂的情景。这与当时外国传教士和清朝统治者报道的情节，是基本相符的。

实际上，这批哥老会分子的行动，早已引人注目。传教士们在 1891 年的五六月间就不断报告，在长江下游，有一批操扬子江上游口音的陌生人（据他们推测，可能是湖南人）奔走各地。“这些人从镇江沿着大运河到丹阳，然后又沿着同一运河渠道到无锡”。在无锡教案发生的前夕，有“一批操扬子江上游口音的陌生人在该城出现，散布谣言，鼓动人们放火焚烧教堂”。“他们为数不多，但肯定是头目；他们对民众的煽动力，在攻击时刻的果断行动，以及在火把点着以后的突然消失，是值得注意的”。报道者认为，攻击和破坏无锡耶稣

^① 《教务教案档》，第 5 辑第 2 册，735~738 页。



教会的暴乱者，“可能就是本月二日（指1891年6月2日——引者）在丹阳攻打天主教会的同一批人”^①。对照曹义祥等的供词，可以肯定，这批奔走长江下游各城市的操长江上游口音的陌生人，就是蒋桂仿等一伙哥老会分子。

另外，清朝政府还在各地捕获不少串联发动攻击教会的哥老会骨干。如在上海法租界捕获的李得胜，就是蒋桂仿的同伙。他在芜湖闹教后，“乘华利轮船来沪，途次狂述：芜湖烧拆教堂，伊本为首，旋被官兵砍去小指，遂即逃逸”^②。又如在广东潮州被拿获的哥老会会首蔡九城供称：“四月内在芜湖闹教堂，恐被捉拿，又由江西潜回福建打听消息，寻觅会党，另图机会，被人诱至潮州拿获。”^③再如在安庆拿获的刘金筹、黄金标、田老五等人，他们是在芜湖闹教之后去安庆串联闹教的。这批人就是长江哥老会大头目龙松年、匡世明的伙党。^④以上事实说明，哥老会在长江下游各地的教案中，确实起了串联发动的作用。

当然，哥老会的串联发动，决不限于长江下游地区，他们同时也奔走长江的中上游。武穴闹教时，张之洞就奏称：“各匪多由下江来，与本地匪棍勾煽，殆即金陵、芜湖滋事之党羽，布散谣言，希图生事，武汉亦有滋闹之谣。”^⑤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当时哥老会进行串联扩散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沿着大运河，由北而南；一条沿长江一线，从东往西。^⑥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四）指挥攻击教堂，带头冲锋陷阵

在芜湖闹教期间，当群众围困天主堂，情绪愤怒至极时，哥老会分子就高喊：“可以动手啦！”在他们的鼓动下，“众即拾取砖石，向内乱掷，势如雨下”^⑦。据目击现场的外国人报道，在焚烧教堂时，“在乱众之中，就有两三个穿着体面的汉人指挥破坏教堂。他们每人手执小旗。在中国，他们挥舞旗帜如此熟练，表明他们可能是

①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p. 37-39.

② 《益闻录》，1891-06-03。

③ 《录副奏折》，光绪十七年十月八日两广总督李瀚章奏；《朱批奏折》，光绪十七年广东巡抚刘瑞芬奏。

④ 参见《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四月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⑤ 《张文襄公全集》卷135，《电牒十四》，29页。

⑥ 参见 Wehrle, *Britain, 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 1891-1900*, p. 24.

⑦ 《益闻录》，1891-05-20。

属于某个秘密结社的”^①。芜湖天主堂被焚后，哥老会又发出揭帖说：“耶稣教徒与天主教徒，系一丘之貉。尔等既毁天主教徒之产，当万众一心，于本月二十日，尽毁弋矶山上两教布道会之产。”^②在无锡，当群众随知县拥向教堂时，哥老会分子在群众中呼喊：“县官大人要去毁教堂，让我们去帮助！”据报道，“这些话产生了为难官吏和激动群众的预期效果”。在武穴，哥老会分子煽动“他们（指拐人犯——引者）要把孩子送进卫斯理教堂做西药！”于是群情愤怒，立聚千余人，掷石攻击教堂。在宜昌，群众冲进教会庭院后，有人就站出来拍着胸脯呼喊：“弟兄们，跟我来杀洋人，我愿为你们去死。”^③这些哥老会分子，大多是久历戎行的散兵、游勇和江湖流浪汉。他们“骁捷善斗，凶悍异常”，所以在斗争中能起冲锋陷阵的作用。

三、长江哥老会的特点与社会根源

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它在这个地区的势力。但是，哥老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有些什么特点？其社会根源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为了叙述的方便，先从当时的“美生案件”说起。

1891年9月，长江流域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烽火还在蔓延时，清政府在上海、镇江海关破获了一起与长江教案相连的，镇江海关职员英国人美生勾结哥老会，私运军火，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重大案件。案件的重要哥老会头目李洪、陈金龙、匡世明、徐春山、龙松年、高德华等，都被陆续拿获归案，“分别惩办，不下数十百名”^④。

据高德华供称：“长江各口岸会匪头目，通为一气，皆奉已经正法李世忠之子李洪为总头目，称为大元帅。”^⑤光绪十五年（1889年）五月，高德华与李洪在上海会遇，李洪自称哥老会会中大哥，

①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 15. 当时《益闻录》也有报道说：“初五、初六两日，方匪徒焚堂时，西人自趺船窥远镜，明见身穿绸衣，手执红旗，在现场指使。其事先预谋，又是一证。”见《益闻录》，1891-05-20。

② 根据英文回译，英译文见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 38。

③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p. 31-42。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33，《奏议三十三》，11页。

⑤ 《张文襄公全集》卷136，《电牒十五》，26页。



打算邀集各路同会之人，为他的父亲报仇。并称已托洋人在海外购办军火，只要军火到齐，即行约期起事。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初，李洪函告高德华和各处头目说，军器已办就，要高德华等约齐会议起事。七月初一日，他们在安庆蒋云家会集，商定十月十五日各人邀集党羽，分为两支，同时竖旗起事。高德华、蒋云等为长江下游一支，在安庆会齐；李典、李得胜等为上游一支，在沙市会齐。下游一支分为东、西、南、北中五旗。濮云亭统东旗，刘高升统西旗，张庆延统南旗，高德华统北旗，蒋云、许文魁统中旗。各路均奉李洪为大元帅。当时由于长江下游清军水陆各营驻防严密，难以集合发动。七月中旬，他们又到大冶县三夹地方，以做孟兰会为名，再行商议。仍约定十月十五日于沙市竖旗起事，并派各头目在汉口、黄洲、樊口、黄石港、三夹、扬叶洲、武穴、九江、大通、芜湖、金陵、镇江、十二圩各轮船码头，“均行布置，预备船只”^①。

关于托洋人购办军火，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间，万松亭与李洪、蒋云、曾鸣皋等在镇江第一楼吃酒时已商定。因为曾鸣皋与美生的“细崽”徐春庭的哥哥——江苏哥老会的头目徐春山相识，便由曾鸣皋请徐春山转托美生购办军火。在此期间，“徐春山邀美生入会”^②，美生见长江哥老会的势力强大，在各处闹事，“与排外骚动、残杀教士，已混为一体”^③，为了解哥老会的内幕，即“佯入会为办军火”^④。

美生加入哥老会以后，于1891年6月底的一个夜晚，到南京附近长江水面的一条沙船上，参加了哥老会讨论武装起事计划的一次秘密会议。随后，美生即离开镇江。他通过哥老会一个姓马的头目的秘密联系介绍，到达香港，购买了35箱洋武器。^⑤当这批军火运到上海时，即被镇江海关查获。接着，镇江海关又从美生身上搜出5磅炸药，美生即被逮捕归案。^⑥哥老会在长江联合武装起事计划就此破产。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31，《奏议三十一》，4页。

② 《刘坤一遗集》，2554页。

③ 参见 *The Chinese Confessions of Charles Welsh Mason*, London, 1924, p. 33.

④ 光绪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美生亲供：“五月间各处闹事，欲知细底，佯入会为办军火。”见《刘坤一遗集》，2552页。

⑤ 参见 *The Chinese Confessions of C. W. Mason*, pp. 135-137.

⑥ 参见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I, pp. 97-115.

中国近代史研究



如果说，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只是暴露了哥老会活动的种种迹象，那么美生案与长江武装起事计划，就比较充分地显示出哥老会在这一带发展的盛况和特点。这一时期，哥老会在长江地区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发展的趋势看，它的势力已由长江上游的四川、湖广，广泛蔓延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它的活动中心已转到长江运河沿线的交通码头和重要城镇。在长江教案期间，有许多操长江上游口音的哥老会分子，到长江中下游的城市活动。这些人是临时去策动教案的，还是长期在这一带传布哥老会、从事江湖活动的？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有多大的势力？美生案的材料，给我们做了回答。

首先，我们从张之洞《拿获会匪讯明惩办折》中看到，与美生案直接有关的哥老会头目30人中，供明出身地点的共16人，属湖广、川、黔籍的有12人，其中湖北、湖南籍的达10人。他们都是长年在长江中下游开山立堂、结党纠伙、拥有很大势力的“巨魁”。^①正是这些人，把哥老会从长江上游广泛传布于长江中下游。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之洞在一个奏折中说：“近年会匪日炽，沿江沿海尤甚”，“始则长江上下游一带，近则襄河上下游一带，随处皆有，根株盘结”^②，具体说明了哥老会从长江上游向下游以至沿海地区发展的趋势，及其广泛蔓延的状况。

其次，我们从官方的档案材料中看到，这些哥老会头目，在长江沿线各自都拥有强大的势力。如长江起事的主要策划者龙松年，他本名龙大胜，又名庆延、松延、青莲，湖南益阳人，军营出身，裁撤以后，在安庆定居。光绪八年（1882年）即开山立堂，“放飘纠党”^③。他与陈金龙、王金龙结成哥老会著名的“长江三龙”^④，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拥有很大的势力。又如李洪，在长江流域两淮地区拥有的势力就更大。1891年长江武装起事计划中，各路哥老会奉他为总头目。据称，长江各地，“滋闹教案，都是李洪党羽所为”^⑤。

① 参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1，《奏议三十一》，1~10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32，《奏议三十二》，28页。

③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八月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④ “陈金龙即陈殿魁，系红会匪首，为长江三龙之一，在上海吴淞等处开龙华、玉龙等山堂”。见《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王金龙为长江三龙之一。供认为龙华山巡风，又为玉龙山心腹（副），与已获正法之陈金龙结盟不讳”。见《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

⑤ 《刘坤一遗集》，715页。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哥老会这时不仅已广泛蔓延于长江中下游，而且在这里已拥有极为雄厚的基础。

另外，我们还看到，长江哥老会的活动中心多在码头城镇。首先因为他们的头目都集中在这些地方。他们在“长江各处码头，皆有落脚”，不仅设有山堂，而且还备船只，“名曰扒山老虎”^①。其次因为他们的主要实力聚集在这些地方。长江教案时，他们活跃于城镇码头；准备武装起事计划，自汉口到十二圩各码头，他们都能迅速调动队伍和船只，就是很好的证明。

他们所以要将活动中心设在码头城镇，不仅因为这些地方是“商贾辐辏之区”，便于混迹隐匿；而且还因为这些地方聚集着大量的破产劳动者、游民，这是哥老会势力扩大的基础。

(二) 从组织形态上看，长江哥老会也有显著的特点，主要是：第一，立会的规模大，“每会人数，多则数万，少则数千”^②。第二，各会之间，互通声气，并逐渐趋于联合。张之洞说：“此次哥老会匪，勾通洋人，结连长江上下三千里匪党，购运军火，图为不轨，伙党极多，蓄谋至为深险。”又说：“沿江口岸，匪党布满……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一处蠢动，处处响应。”^③ 这是他镇压长江教案和查办美生案以后，对长江哥老会组织状态的实际写照。第三，与长江下游两淮地区的青帮组织，也日趋合作、融合。最明显的是，原来李世忠和李洪的势力主要在青帮盐泉，但到 1891 年时，李洪却成了哥老会长江武装起事的总头目。当时还有不少哥老会的头目来自青帮。例如“长江三龙之一”著名的哥老会头目陈金龙，原来是“安清道友通字辈”^④；美生案中的陈斋公、曾同，原来也是安清帮分子，曾同“排行通字辈”^⑤。这些都具体反映了青、红两帮之间的合作、融合。当然，这种融合是有条件的，并不排斥在另一条件下“两帮争夺码头，时相仇杀”^⑥。

①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四月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 116，《公牍三十一》，40 页。

③ 《张文襄公全集》卷 31，《奏议三十一》，9 页。

④ 《刘坤一遗集》，726 页。青帮有二十四辈，按“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觉悟”二十四字排列。民国以前，长江下游的青帮分子，一般多属大字辈和通字辈。

⑤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

⑥ 《辛亥革命》(三)，404 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



(三) 从它的基本成员看, 长江哥老会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散兵游勇, 水陆运输工人(挑夫、水手、船民), 私贩盐泉等。他们在长江各地的反教会斗争中, 表现得最为活跃。

特别值得强调指出的是, 这一时期, 很多散兵游勇充当了哥老会的头目。这是哥老会发展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哥老会案件材料中, 以及美生案的材料中, 反映得都很明显。美生案中的龙松年、匡世明、李典、濮云亭、陈华魁等最著名的哥老会头目, 都是营伍出身。这些散兵游勇, 大多久历戎行, 桀骜成性, 勇敢善斗, 富有江湖经验, 所以加入哥老会之后, 很快就充当起会中大小头目。

(四) 从它们的反抗活动看, 主要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大量地表现为反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同时, 对清朝封建统治者也有反抗斗争。长江教案期间, 《武昌匿名揭帖》斥“张之洞坐湖北, 糊涂乱干, 为甚么把洋人, 当作祖先”^①, 以及长江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事, 都是明显的事实。

为什么长江哥老会的发展会呈现以上的特点? 我认为, 它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特别与长江流域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 是密切相关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中国沿海侵入内地, 富饶的长江流域是它们掠夺的重点地区。侵略者在长江沿岸开辟上海、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芜湖、宜昌、重庆为商埠, 开辟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为寄行港。他们直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 任意扩大关税协定范围, 降低税率, 享有子口税、半税制等特权。它们的轮船航行于长江内河, 商品大量倾销内地。这样, 就使长江地区的城乡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农村经济迅速遭到破坏, 造成了大量破产劳动者、游民。

最先遭受破坏的是旧式航运业。以上海一地的沙船业为例, 在19世纪40年代, 上海有沙船3000余号。由于外国轮船航运的排挤打击, 到19世纪50年代, 已减为2000余号; 到了19世纪70年代, 仅剩400余号。^② 沙船航业的破产, 致使船户“资本亏折殆尽, 富者复而赤贫, 贫者绝无生理”, “业航者无可谋生, 其在船水手十

^① [日] 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的排外运动(资料篇)》上卷, 141页, 东京, 岩南堂书店, 1968。

^② 参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 29页。



余万人不能生存，必致散而为匪”^①。长江帆船运输业的遭遇，同样如此，单宜昌至重庆这段长江运输线上，据英国驻重庆领事史盘斯1880年估计，有帆船六七千艘，海关报告说有1.2万艘。这些帆船，大型的每艘船工和纤夫25人，中型的要十八九人，小型的要10多人。推算下来，这段航线的船工和纤夫，不下20万人。如果连同他们的家属，直接靠帆船为生的就有100万人之多。^②由于外国轮船进入这段航线，严重地威胁他们的生计，所以19世纪80年代时，宜昌东湖县就贴出告示，对洋轮上驶，“川帮船户人等……欲行聚众堵截”^③。到19世纪90年代，长江上下游及其附近的内河水道上，就多次发生反对外国轮船航行势力的斗争。但因民船无力竞争，生计即“为轮船所夺，其贫苦失业流为盗贼者比比皆是，私梟、会匪充斥，职此之由”^④。

其次是手工业遭受破坏。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对华倾销的商品，数量增长最快、影响最大的是机制棉纱。据统计，从1867年到1891年，25年内增长了36倍。^⑤由于外国机制棉纱价廉物美，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每年像潮水一样，沿长江汹涌而入，流向内地的城镇乡村。到19世纪90年代末，偏于长江内地的江西，“通省皆已流通，价值不下一千万两”^⑥。洋纱倾销的结果，“土棉纱已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⑦。其他手工业的破坏情况，与棉纺业相似。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内地，使中国农村经济渐趋半殖民地化。广大农村日益变成国际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广大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不是在饥饿线上挣扎，就是破产流亡。19世纪70年代，吴汝纶记载安徽桐城农村变化的情景说：“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家之聚，游惰即至数十。”^⑧这种情景，代表了长江内地农村经济遭受破坏以后，农民游离失业的一般状况。

① 《同治筹办夷务始末》卷28，38页。

② 参见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载《历史研究》，1962（5）。

③ 《宜昌东湖县告示》，载《申报》，光绪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④ 《刘坤一遗集》，1039页。

⑤ 参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3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⑥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⑦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⑧ 《桐城吴先生日记·时政》，37页。



农村经济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清政府腐败不堪，水利失修，造成连年灾荒。1880年至1890年间，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每年每省有数十州县遭水旱等灾害，其中江苏一省，平均每年遭灾达61个州县。^① 遭灾之后，灾民就成千上万地涌进城市。上海、南京、汉口等沿江大城市，经常聚集着十万至数十万离乡背井的难民。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谋生之所，就成为街头的乞丐和江湖游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世纪60年代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袭下，长江流域的传统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庞大的破产劳动者、游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些人大多无法找到正常的职业，最终不得不流浪江湖，弱者乞讨为生，强者投入秘密社会。所以张謇说，“贫民者，以沿江五六省之青红帮、私枭为最多”^②。这就是清末长江哥老会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上述特点的主要社会根源。

此外，还有两种社会势力，对长江哥老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当时大量存在的散兵游勇和私贩盐枭。

清朝统治者在镇压太平军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即大量裁撤营伍勇丁。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遣撤湘军数十万，淮军和川勇十余万，绿营五六十万，巡防营和其他军队为数则更多。^③ 这数十数百万勇丁被遣散之后，生活得不到安置，就大量流向秘密社会。当时被遣散的湘勇中，有一部分原属哥老会分子，回到民间仍以传会为谋生之术，纠伙结盟，“散票取钱”^④。另一部分在解散之际，即被哥老会截去。如同治五年（1866年），湘南哥老会大头目曾湘帆，得知江西湘军裁撤消息后，即派陈成茂等到吉安散勇往来道上“邀接”^⑤。同治七年（1868年），湘军霆、峻各营遣散时，湖北哥老会也“纠党分布黄梅、武穴、龙坪各水次阻截散勇”^⑥。还有一部分回到原籍，“其中安分者，固不乏人，而桀骜成性，游手好闲，既不惯力勤耕作，又别无可以营生，遂至流为会匪者，亦复不少”^⑦。湘军

①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720~722页。

②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19。

③ 参见《刘中丞奏稿》卷7；《刘坤一遗集》，2187页。

④ 《刘坤一遗集》，2794页。

⑤ 同上书，1642页。

⑥ 《同治朝东华续录》卷72，16页。

⑦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869页。



遣散的结果如此，其他军营裁撤的结果也是一样。因此，到光绪初年，沿江各省的哥老会，“半系军营遣撤弁勇”^①。

盐泉，长江两淮地区早已有之。清道光年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短绌，诸饷告急。为了增加盐税收入，两淮盐政虽然经过陶澍、陆建瀛的“纲盐改票”，曾国藩的“改定票章，聚散为整”，和李鸿章的“循环转运法”等一系列改革，但因课厘、捐输、加价繁重，盐价昂贵，致使私盐充斥，私贩猖獗，盐泉队伍空前庞大。仅道光二十年（1840年）淮南纲盐改票，就造成数十万人失业。“泉徒无赖，乱是用长”^②。

清末长江两淮盐泉，主要来自停漕之运丁、遣散之勇丁和各处失业之贫民。原来，“漕河全盛时，粮船水手，河岸之纤手，集镇之穷黎，借此为衣食者，不啻数十百万人”^③。太平军攻克南京，清政府即将漕运改从海道北上。1872年，全部改用海轮运漕，使漕河运丁“悉成游手”^④。他们为了谋生，便结党成群，转而贩运私盐。当初活跃在漕河运丁中的青帮组织，也就随之转入盐泉之中。

与此同时，长江地区的遣散勇丁和现役官兵，也投入贩运活动。据清末《中外日报》报道，江浙一带遣撤的淮勇，“虽遣不归，盘踞于浙湖郡县，而以贩盐为生”^⑤。《盐法通志》也记载：“兵燹之后，盐船船户多系湘楚各军营官哨，大则提镇，小则参游。所用水手，皆属百战之余，犷悍强暴，最难驾驭。”^⑥这些人，在盐泉中势力最强。他们不仅“与青红帮会票各匪连成一气”，而且还得到营汛兵役的庇护，因而“如虎傅翼，莫敢谁何”^⑦。各地“土著无赖”，小帮私泉，也多依附于他们。

盐泉中的青红帮势力，如果以地域来划分，青帮主要在两淮、江南、浙西、皖南一带，红帮哥老会主要活跃在长江沿线。他们的贩私线路，一般“自淮南买盐而来，红帮西湖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⑧。这指的是长江下游太湖一带的私运路线。此

① 《刘坤一遗集》，381页。

② 张石樵：《石樵先生遗集·张君行状》。

③ 丁显：《请复河运刍言》，见葛士澹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1。

④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848页。

⑤ 《论江浙泉匪》，载《东方杂志》，1906（1）。

⑥ 周庆云：《盐法通志》卷86，《辑私二》。

⑦ 《论江浙泉匪》，载《东方杂志》，1906（1）。

⑧ 《张文襄公全集》卷58，《奏议五十八》，9~10页。

外还有很多走私路线。可以说，长江两淮，无处不有。例如，长江上游的川盐私贩路线，川私从宜昌、沙市顺江直流而下，入两湖各府属。这条走私路线上的盐枭，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一直很活跃。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称：“川东一带，私枭最夥，近年以来，勾结日众，到处横行。”^① 川枭的活动，与哥老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上是对长江哥老会发展的特点及其社会根源的轮廓考察。这些特点和社会根源，不仅对 1891 年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对后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长江流域的民众运动，也是有重大影响的。

四、对长江教案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考察，就不难看出，1891 年长江教案的爆发，不仅由于外国教会势力的侵略，而且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那就是帝国主义者多方面的侵略，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特别是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使长江流域人民受害最深。他们大批破产失业无法生存，因而不得不奋起反抗。他们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势力，首先指向教会势力，同时还指向外国领事馆，以及帝国主义者控制的海关和洋行等。^② 关于这一点，长江教案一爆发，西方的评论家就指出：“外国鸦片销售，耗竭中国白银；机制品进口，破坏土著工业；汽船引进，使无数漕粮运丁失业；茶和丝贸易日益失败，使人民普遍失望；法、英、俄、日抢去安南、缅甸和其他领土，使中国官民惧怕整个国土将沦丧。所有这些事，都促使中国人决意不惜一切去反对外国人。”^③ 1893 年 2 月 10 日《北华捷报》也发表文章说：“由于外国棉织品的输入，许多贫苦的男女都被迫放弃了纺织，而洋扣、洋伞、煤油、大呢和洋船影响了其他行业，轮船运输使成千上万的船夫和岸上的伙伴失了业，沿长江的许多旧式帆船码头都不需要了，还有大多数从前承运政府漕粮的船户

^① 《丁文诚公奏稿》卷 14。

^② 例如芜湖教案、宜昌教案中，群众除攻击教会外，同时还攻领事馆、海关、洋行。在芜湖城内医院的墙上有揭帖说：“十天之内一起收，外头之人不要忧，洋行的人不要喜。”（*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 24）当时群众把这些机构都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是可以理解的。

^③ *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p. 2.



也发觉他们的生计被轮船夺去，为少数人发财致富了。如不能很快地求得谋生之道，这真是一个大灾难。由于经营料货贸易或在轮船上工作，许多以前贫穷的人确实发了财或者获得生计。但这一点远不能减轻那些从前过着安乐生活至少不挨饿，而现在却被新的环境弄得贫困无依的人们所受的痛苦。这一切痛苦、残忍以及在无知者看来是无可补救的事实，必然要招致不满与骚乱。抹煞 1891 年长江流域各次暴动与上述事实的联系是无益的。”^① 据此，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1891 年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民族生存权利、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正义斗争，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是当时人民群众对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一种重要斗争方式。那种把中国人民反教会侵略说成“迫害基督教”、“仇视欧洲人”、“反对西方文明”的论调，是早已被列宁批判过的西方殖民者的陈词滥调。早在 100 多年以前，列宁就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 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②

当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应当指出，这场运动，确实存在不少盲目排外的行为和落后保守的思想，给斗争带来了很大的局限。但对此也必须做历史的分析。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正处在低级的、表面的、感性的阶段，还辨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分不清帝国主义统治者与他们的人民、宗教侵略与一般传教活动等种种界限。所以，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盲目排外和落后保守的思想行为，是难于避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长期的反帝过程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斗争和失败的痛苦之后，才弃掉它们，夺取了斗争的胜利。

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在这场运动中，哥老会虽然起了组织发动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个落后团体。它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不能

^① 转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329～1330 页。

^② 《列宁选集》，3 版，第 1 卷，27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克服自身的严重弱点和地主阶级对运动的恶劣影响，把群众斗争提升到较高的水平；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效地结合起来。克服这些局限和弱点，把反封建的活动引向胜利，乃是中国近代先进阶级的历史任务。



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

史学界对余栋臣起义的有关问题已经有过一些讨论。其中，有的问题讨论得比较深入，如“顺清灭洋”口号等问题；但有的问题尚未充分展开讨论，如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是长期有争议的。下面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余栋臣起义时的身份问题

讨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首先必须搞清：余栋臣在发动武装起义时，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究竟是不是哥老会的一个头目？关于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在余栋臣的家乡——四川大足县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汇集了有关方志和文献，搜集了一些口碑材料，并发表了数篇资料辑录、学术报告和论文。然而，这些资料、报告和论文，虽然同是取材于实地调查，但却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就不能不给其他研究者带来一些疑难。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进一步发掘可靠的材料；同时，对已公布的有关口碑材料做认真的辨析。

最近，我检阅了已公布的调查材料，查考了许多文献，觉得文献记载的材料即可证实余栋臣 1890 年第一次发动武装起义时，已是哥老会的首领。现在，将有关的文献记载分成四类，列举说明如下：

（一）四川地方志材料。最重要的是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中的一篇《仇教记》。它比较具体地记载了外国教会势力侵入大足和大足人民反抗斗争的过程。其中，关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余栋臣第一次起义，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十六年，教民王槐之以赔偿未遂所欲，于六月十九日纠集百余人，声言缉捕捣毁教堂徒党置之重典，登时杀伤拒捕蒋兴顺一名。旧俗会期以十余人肩灵祖游行街衢，乡

民备鼓乐以为前导。时有乐队一，内蒋姓者数人，闻讯驰往救护，遂与教民械斗，为教民夺获大锣一面，上书‘蒋赞臣’三字，即指名控县，诬为仇教祸首。而赞臣于捣毁教堂及救护兴顺诸事都无所知，锣为所有，乡邻借之以迎神者也。捕牒出，人咸以为冤。余栋臣……哥老会魁杰也，于是投袂而起，以灭教相号召。赞臣既含冤莫白，乃共歃血为盟，推栋臣为首，攘臂一呼，聚者数千，又立将教堂焚毁，并杀毙教民数人。”^① 这里分明是说，光绪十六年（1890年）余栋臣等已是哥老会头目，并充当了这次起义的首领，蒋赞臣因含冤而参加了这次起义，他与余栋臣等“歃血为盟”，显然是加入哥老会、准备起事而举行的仪式。另外，在大足邻近一些地方的县志中，也可看到称余栋臣为“会匪”、“匪首”的记载^②；《江津县志》明确记有，余栋臣“人呼余蛮子，哥老会称余大爷”^③。这些记载，都说明余栋臣是哥老会的头目。

（二）外国传教士和记者的回忆报道。最重要的是法国传教士华芳济的《被掳记》。华芳济曾被余栋臣起义军俘虏200天，《被掳记》是他对被俘期间所见所闻的回忆。他在叙述余栋臣1890年前某次率众打毁龙水镇天主教堂时说：“余栋臣，大足龙水镇人……彼处多哥老会，余隶籍其间，俨然翘楚，为同党所推尊。镇中向有天主堂一座，适在二庙之间，规模颇广，峙立于鲁灵光。哥老会党见之为嫉忌，甚欲焚毁之而甘心，即推余栋臣倡首，乘六月赛会之期，余振臂一呼，众人响应，将教堂付之一炬。”^④ 这一记载说明，在1890年前，余栋臣早已是哥老会的首领。另外，1898年上海《北华捷报》刊登的一篇外国记者的报道中，也有类似记载。

（三）清朝地方官的奏报材料。据四川地方官奏报，从光绪十二年至光绪十六年（1886—1890）这五年内，大足龙水镇的天主教堂连续三次被群众捣毁。其中除1886年的那次，余栋臣有否参加，尚未见明确记载外，1888年和1890年的两次，余栋臣都充当了主角和领导者。^⑤ 在这些奏报材料之中，最能说明余栋臣与哥老会关系的，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初二日成都将军的报告。他禀报：二

①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② 参见《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卷6，19~20页；《新修南充县志》卷6，16页；《新修武胜县志》卷7，7页。

③ 《江津县志》卷3。

④ 《华司铎被掳记》（以下简称《被掳记》）。

⑤ 参见《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



月二十四日夜，在荣昌县拿获哥老会的著名“帽顶”朱矮子。就是这个朱矮子，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十九日龙水镇灵官会时节，纠煽余栋臣，里应外合，打毁了龙水教堂。据朱矮子供称：“汉州人，年四十五岁……屡次烧会升至帽顶。光绪十四年六月间，到大足县属龙水镇地方赶会……煽惑匪徒余蛮子等率领多人前来打教，小的里应外合，乘势烧掳各逃，纠集党羽抗拒官军。”^①按哥老会的隐语，“会首谓之帽顶，纠集处谓之码头”^②，朱矮子既是“帽顶”，又“交通各处码头”，可见他必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个大头目。而余栋臣“率领多人”与朱矮子里应外合攻打教堂，说明他也是个头领人物。

（四）起义军的文告材料。最明显的是《蒋赞臣告白》中说“伏望各处码头，相助仁粟义浆”^③。这里所说的“码头”，当然不是水陆交通码头，而是哥老会组织。分明是余栋臣起义军号召各地的哥老会资助钱粮。如果起义军与哥老会无关，如果蒋赞臣、余栋臣不是哥老会的头目，怎能发布文告号召哥老会资助钱粮？

以上四方面的文献材料，足可证明：余栋臣在两次起义时，都是哥老会的首领。有的同志说，余栋臣在1898年起义时还没有加入哥老会，“他们直到1898年起义以后才加入哥老会”。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难以站住脚的。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忽视了文献记载，偏信某些口碑材料。其实，他们所公布的某些口碑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他们用以否认余栋臣是哥老会成员的两条口碑材料说：（一）“余栋臣在光绪十六年起事时不是哥老。他和蒋赞臣都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占据龙水镇后才参加哥老会的”；（二）“哥老会在光绪二十四年那些时候，是秘密的组织，没有公开的，那个时候没有听说啥舵把子、管事这些名称”^④。这两条材料出于余樵青口述，虽然余樵青是余栋臣的同族晚辈，但据材料的调查者注明，1955年余樵青还只是50岁的人，也就是说，余栋臣1890、1898年发动起义时他尚未出世，怎么能证明余栋臣“不是哥老”？他又凭什么能说出“那个时候没有听说啥舵把子、管事”这样一些话来？如果要谈论这个问题的口碑材料，我们认为，璧山刘子林先生的回忆倒是比较可信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他是余栋臣起义时的当事人；另一方面，

①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

② 《锡良遗稿》，第1册。

③④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

他的说法是与有关文献的记载基本相符的。

至于余栋臣加入哥老会的具体年代，尚待进一步查考，目前没有确据。但从哥老会大头目朱矮子供称，他 1888 年与余栋臣里应外合攻击教堂的情况；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调查到，1886 年余栋臣即与唐翠坪等“歃血为盟”、捣毁龙水镇教堂的情况^①，可以推断，余栋臣加入哥老会的时间当不晚于 1886 年。

二、余栋臣起义的特点与哥老会的作用

搞清了余栋臣在两次起义时的哥老会首领身份之后，我们就可以具体探讨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了。这里，首先应该明确，余栋臣以哥老会首领的身份来领导大足人民两次起义，绝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史现象。它一方面反映出，哥老会在这个地区具有强大的势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民群众反教会斗争的组织形态和领导力量的变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即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的时候，大足龙水一带还不存在哥老会，“龙水镇哥老会盛行是在宣统年间”。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四川是哥老会的发源地。哥老会的前身咽喉，清初时已活跃于四川各地。到嘉道年间，即演化为哥老会。咸同年间，以哥老为主体的“会匪”势力迅速蔓延，川省“无虑数十百股”^②，在李永和、蓝朝鼎的起义军中和清军的营勇中，就有大量的哥老会分子。到了光绪年间，由于清政府大量裁撤营伍勇丁，又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长江内地，四川也出现了庞大的破产劳动者、游民，哥老会的势力就得以飞速发展，以致形成“会匪咽喉，所在皆有”，“江湖豪杰，并州联业，聚众开山，远近景从……公口码头，不可胜数”^③的局面。特别是川东地区，由于这一带为水陆冲繁之地，哥老会的势力也就更为强大。他们之中的许多帮派，与烟贩、私枭的活动相联系。如江大烟杆、谭二疯王等，就是当时重庆以下走私线上的“著名会匪”。他们“出没于巴、江、涪、合、夔、万一带，动辄号召一二千或数百人，均

① 参见胡汉生：《余栋臣起义军与哥老会》，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3）。

②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

③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江津县志》。



置有枪炮器械炮船，拒敌官兵”^①。在大足及其周围各县的城镇乡村，也是“袍哥充斥，盗贼公行”^②。由此可见，到清末，哥老会已遍布四川全省，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

从19世纪60年代起，帝国主义的教会势力侵入中国内地，对四川的侵略尤其严重。因此，四川人民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也就特别频繁。特别是川东地区，李鸿章说：“川东教堂林立，频年教案，层见叠出，几甲于他省。”^③ 1886年的“重庆教案”一发生，打教浪潮就在大足、铜梁、南川、綦江等地掀起。其中大足龙水镇一地，1886年至1890年，“五年之间，教堂三次被毁”^④。随着群众反教浪潮的高涨，1890年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余栋臣起义。从大足龙水镇群众三次打教两次武装起义的情况看，哥老会已充当了斗争的主角。史学界一般多认为，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反教会斗争，往往由地主士绅充当运动的鼓动者和领导者，19世纪80年代以后就由民间的秘密结社来担当斗争的主角。如果说19世纪80年代是这个变化的转折点，那么，1886年以来大足龙水镇反教的情况，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以后，哥老会就一直充当着长江流域反教会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斗争的骨干力量。

由于形势的变化，特别由于大足哥老会势力的强大，就使余栋臣起义具有与以往许多地方反教会斗争不同的特点。下面，我们想通过阐述余栋臣起义的特点，来说明哥老会在起义中所起的具体作用。

（一）有一个比较稳固而坚强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就是由余栋臣为首的一批哥老会“魁杰”所组成。1890年以前，主要是以余栋臣、唐翠坪几个挑煤苦力工为核心。^⑤ 1890年以后，又陆续增加了杨玉成、蒋赞臣、张桂山、余绍文等，有数十人。在这些人中，余栋臣最讲义气，“有胆略，喜为人雪不平”，所以被哥老会“党徒推之为长”^⑥。

由于余栋臣“随身结有死党数十人”，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集

① 《丁文诚公奏稿》卷14。

② 《南川县志》卷13，《前事》。

③④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

⑤ 据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调查，这几个人中，除李尚儒是龙水镇至荣昌间水道上的船工外，其余5人都是大足西山的挑煤工，参见《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3），62页。

⑥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江津县志》。



团，所以能长期在大足率领群众进行反教会斗争，每次打教，“一倡百和”^①；起义高潮时，能统帅上万人的队伍。又由于这个集团与当地各界有着微妙的联系，包括在当地的衙门和清军防营中，也有他们的哥老会徒众，所以每次打教之后，能得到暗中保护。“胥吏通牒，每欲捕余，先令知风匿迹。故首尾八载，余常法外逍遥，绝无顾忌。”^②

应当指出的是，1890年以后，由于蒋赞臣等一批开明士绅和爱国知识分子进入了这个领导集团，就使他们的斗争更具新的特色。这些知识分子，在帮助余栋臣制定起义纲领、斗争策略和发布文告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人，是在民族危机严重、国难当头的时刻，参加到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行列中来的，他们的行动是符合运动发展需要和民族利益的。这个趋势，到后来就愈益明显。这些人虽然本身软弱无力，但投入起义行列之后，就能给农民起义军“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③。以往的论著，把这些爱国士绅加入斗争行列，说成是导致余栋臣起义失败的一个原因。这是不够恰当的。

（二）有一块能攻能守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就是距龙水镇三十里之遥的西山。此处箐深林密，物产丰富，便于起义军开炉造械，筹集粮草，准备大举。山中“炭厂煤洞甚多，炭丁人等大率皆四方无赖之徒，匿迹谋生”^④。余栋臣原是这里的炭丁，与他们素有交往，许多人是他的袍哥弟兄，所以他每次打教，多以这些人为骨干。逢龙水镇灵官会时节，他们便“借进香之众，面涂红黑，结队成群，造谣生事”^⑤。一旦形势不利，即潜回西山隐蔽，使官府难以捉拿。当时外国记者也评论：“因为他（指余栋臣——引者）实际上是个煤矿主，只要发现来自外部的危险迹象，他就能离开地面而躲入地壳下。”^⑥ 特别是西山的玉口垭，居于山巅，形势十分险要，起义军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余栋臣在“彼处建敌垒，筑炮台”^⑦，炮台上“安放几尊大炮”^⑧。1898年11月，起义临失败时，王之春率大部

①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1486页，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刘秉璋奏。

② 《被擄记》。

③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1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④⑤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

⑥ 《北华捷报》，1898-10-03。

⑦ 《被擄记》。

⑧ 《北华捷报》，1898-10-03。



围剿，重炮轰击多日，才攻下这个山寨。可见，余栋臣从 1886 年开始打教，到 1898 年武装起义，能在大足坚持斗争 14 年之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这样一块便于攻守的根据地。

（三）有一支数千人的武装队伍。这支武装队伍的骨干是由哥老会分子组成的。华芳济在《被掳记》中说，余栋臣“目无法纪，颁出伪示，以驱洋人、灭教堂为宗旨。文饰铺张，聋瞽黎庶附之者，日益众多，而以哥老会人为最。方予在余、蒋家，每有始入会者来取票布”。这是他被囚于起义军营中时所目睹之情景。在 1898 年起义的高潮时，余栋臣队伍曾发展到万余人。其中常驻营的五六千人，另外还有一部分不驻营的群众。整个起义军都归余栋臣统率。为此，华方济发出了这样的惊叹：“一时负炭夫，顿作大元帅！”

这支起义队伍实行了营哨军事编制。每营设中哨、左哨、右哨。每哨有 150 至 200 人，各级官佐称营长、哨长、什长等。当时，余栋臣带一营，驻龙水镇东王庙，设公案，为全军司令部。其余蒋赞臣、唐翠坪等各带一营或一哨分驻龙水镇上八大庙。铜梁易昏也和余栋臣有联系，带两营驻铜梁。^①有的同志说，余栋臣起义军的建制，是采用了清朝的新军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据考查，余栋臣起义军的这种建制，在 1890 年起义时已基本形成（那时清朝尚未建立新军），主要是仿照湘军的营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两者的营制设施看，是大体相同的^②；另一方面，余栋臣起义军的骨干大多来自哥老会，其中有不少是从湘军裁撤下来的营勇（包括四川本地人和湖南人）。《被掳记》就提到：“党人中有自湖南来者。”这些人熟悉营伍生活，了解湘军编制。因此，余栋臣起义军的建制，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些人的主张。起义军的粮饷来源，主要靠没收教堂教民的财产和向大户借粮。借粮大多通过哥老会的组织进行；先向当地哥老会“出言语”，由哥老会执事代募凑齐携去。起义军的武器，主要是刀枪、长矛、抬枪、猫儿炮、牛儿炮等明火枪。但据重庆海关代理税务司华特森报告：“他的徒众（指余栋臣起义军——引者）采用了军装，并且，得着一些来复枪。”^③《北华捷报》也说，“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拥有连发来复枪。”^④这显然是从清军那

① 参见《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 4 期。

② 参见《曾文正公杂著·营制》。

③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

④ 《北华捷报》，1898-08-08。

中国近代史研究

里得来的战利品。

这支起义军的纪律也是比较严明的，在起义过程中，很少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恭寿在一封密电中说，起义军从荣昌夺回余栋臣，“往来百十里，不掠一物，不害一人。其平日团结人心，非同盗贼，即可概见”^①。贵州巡抚王毓藻也说，余栋臣传檄起义，“二十余日，不攻城，不扰民，尚非极恶”。他们打教堂，只杀那些欺压群众、作恶多端的教民，对贫穷教民，只须声明退教，即可安然无事。在起义高潮中，曾有人打着余栋臣的名号抢劫群众，余栋臣为严肃军纪，按哥老会的法规，处死了40余人，并将其义子罗平贵示众。因此，起义军驻扎龙水镇期间，商贾照常营业，买卖公平，秋毫无犯。

（四）提出了以“顺清灭洋”为宗旨的起义口号，创造了以传教士为人质的斗争策略。“顺清灭洋”的口号，明确表达了起义军斗争的根本目标，是要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它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了各界人民的普遍要求，因此，在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量。《余栋臣传》载，起义檄文发布后，“人心感动，附从者日众”。首先是劳苦群众踊跃投奔起义军，同时，还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被掳记》说：“居民闻语，慷慨解囊，献刀械者有之，纳钱粮者有之，集腋成裘，黄金累累。”远近的许多地主士绅也多起来支援起义军，“捐银助饷，有捐百两者，有捐二百两者，有捐至千两者”。

起义军公开宣布“顺清”，“非叛国家”，“专打洋人”，“不打中国人”，这具有策略上的意义。最明显的表现是：首先争得了大足县令丁昌燕的同情支持。当起义军将余栋臣从荣昌牢狱救出，在回龙水镇途中，与丁昌燕相遇，他“不擒执，反让道而行”。川东道下札饬查，他“仍以安谧非常禀报”。因此，有人怀疑他“曾密谕余蛮闹教”^②。其次，取得清朝驻军的同情。特别在当地的驻军中，混有大量的哥老会分子，他们不但不愿与起义军开战，而且还与其暗通消息。连当时的《北华捷报》也指出：“他们（指清朝驻军——引者）是否会以同团体的兄弟身份开始战斗，这是非常可疑的。”^③另外，在短时间内，也麻痹了清廷。张之洞和慈禧太后曾认为，余栋臣因

^①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署四川总督恭寿电。

^② 《汇报》，第175号。

^③ 《北华捷报》，1898-08-08。



“仇教而起，与土匪有别”^①；“余蛮子原非叛逆”^②。当然，这种麻痹作用只能是相对的、短暂的。同时，“顺清”口号对起义军本身来说，也起过麻痹作用，使他们放松了对清政府叛卖和进攻的警惕。但总的来说，起义军的“顺清”是有条件的，即清政府必须允许人民反帝“灭洋”；如果它屈从帝国主义，出来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起义军就要举戈反击。起义军五月传檄以后，清朝当局调兵前往镇压时，余栋臣即分兵五路出击，就是明证。

在起义过程中，余栋臣活捉法国传教士华方济，坚持以华方济为人质的斗争策略，这在反教会斗争史上可称是个创举。它大长了人民的威风，鼓舞了起义军和群众的斗志。五月十五日夜半，起义军活捉华方济以后，人心为之大振。华方济回忆，起义军“整队回龙水镇，鸣枪示喜”。乡民闻声麇集，络绎追踪，“或云食予肉，或云饮予血，或言当火烧，或言当刀割”，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和对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切齿痛恨的心情。同时，它又使侵略者和清政府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起义军始终将华方济押在军营，凡遇清军对阵，即让他在阵前喊话：“我是华司铎，打不得呀！我在这里很好。”清军投鼠忌器，奈何不得。清政府既要保华方济之命，又要平息群众反教怒潮，只得剿抚兼施，进退两难。

总之，从余栋臣起义所显示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哥老会不仅是起义的组织者发动者，而且起义的基本骨干是哥老会徒众。从招兵买马、筹粮集款，到冲锋陷阵、攻城夺地，无一不由哥老会的骨干来承担。因此，我们可以说，余栋臣起义是一次以哥老会为主体的农民反帝斗争。

三、余栋臣起义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余栋臣起义的结局，虽同以往各次群众反教会斗争的结局一样，不免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史上，在会党的发展史上，都是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首先，它在反教会侵略的斗争史上，是以一种新的战斗姿态出现的。在斗争方式上，它已不像以往的群众一涌而起的打教骚动，而是有组织、有纲领、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156。

② 《大清历朝实录》卷425。

有策略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在斗争目标上，它也不像以往各次反教斗争，仅以焚毁教堂、赶走教士了事，而是把反教会侵略和反对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领导方面，已由会党取代了地主士绅成为运动的组织发动者。而且，起义的队伍已按军队的编制严密组织起来，各层领导也多由哥老会骨干所掌握。因此，余栋臣起义已把中国人民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反教会斗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次，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统治者。在起义风暴袭击下，侵略分子惶恐不安，纷纷逃往重庆等地避难。据《北华捷报》报道，当时有个法国传教士，在逃往重庆的路上，“用一大群士兵拥送”^①。“重庆城门也由特殊军队把守……其中一些人早已准备好离开重庆前往宜昌，另一些人也在准备随后渡河”^②。清朝统治者也狼狈不堪。朝廷的上谕像雪片似的飞向四川，据我们粗略统计，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围绕此事下达的谕旨、电文有40余件。总其意是：“交还华铎为最重要关键”，“即剿即抚，不可偏废”。慈禧在给川督奎俊的电文中说：“不特目前兵力过单，防剿不易，更恐开衅洋人，事势愈棘手”^③，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惶恐心情。

这次起义还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邻省会党群众的反教会斗争。据张之洞奏报：“湖北宜昌、施南两府，与川省毗连，自川匪余蛮子闹教以来，讹言四起，该两府哥老会匪素多，一名江湖会，群皆效其所为，与各处教堂为难，广播余蛮伪示，煽惑民心。……施南府属利川县，川楚交界地方……宜昌府属长乐县……长阳、巴东等县……到处焚掠教堂，惨杀教民。……张贴伪示，招聚匪党，闻风响应，长乐县属渔阳关另起李清臣会匪一股，与为声援，旬日之间，众至二三千人，旗上大书灭洋字样，率众四出，分扰三县……焚掠教堂。……各该县会党滋蔓日广，匪焰大炽，声言余蛮子分股……”^④接着，襄阳等地的会党“伪造余蛮子揭帖”，“声称焚毁教堂”^⑤。随后，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会党，也接踵而起，聚众闹教。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方的哥老会闹教之后，即率众向川东

①② 《北华捷报》，1898-10-13。

③ 《大清历朝实录》卷428、433。

④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⑤ 《张文襄公全集》卷158。



靠拢，欲与余栋臣部联合。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傅镇（宜昌属）额守报告：“探闻阳罗过来湖南匪徒四五百人，已烧教堂”；十一月，“匪众二三千人，内多川匪、湘匪，将直扑宜昌，并与施南匪联合”；十二月，“巴东、长阳、长乐三处匪徒闹教……欲东趋川境，与余蛮合伙”^①。这说明，余栋臣起义对他们具有何等的吸引力。

这次起义，对义和团运动也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余栋臣起义的“顺清灭洋”口号，对北方义和团“助清灭洋”、“扶清灭洋”等口号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北方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等口号直接来源于余栋臣起义的“顺清灭洋”，但从北方义和团的揭帖多次提到“四川起狼烟”^②（指的是余栋臣起义——引者）的情况，可以推断，余栋臣起义的这一口号，不能不对他们有所影响。其次是，余栋臣起义失败后，他的余部又立即投入了四川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接受了余栋臣起义和北方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教训，及时地提出了“灭清、剿洋、兴汉”的战斗口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清王朝的任务联系起来。这是通过实践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与此同时，余栋臣旧部的另一支刘子龙，率众辗转东下汉口，与唐才常的自立军富有票党联系，在长江中下游进行斗争。^③

更为重要的是，余栋臣起义的高昂的斗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长期地鼓舞着四川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在余栋臣起义刚失败时，《北华捷报》的评论就指出：“余栋臣的爱国主义不是软弱的、短暂的，而是强烈的、永久的。”^④事实正是这样。大足人民在余栋臣起义失败后，不仅参加了义和团运动，而且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又拿起了武器，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157。

②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

③ 参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④ 《北华捷报》，1898-10-10。

青帮的源流、组织结构与帮规密约

一、青帮的源流

过去人们写青帮历史，大多根据青帮人物自己编写、在帮内流传的“通草”^①一类的秘籍。这些“通草”无一例外地记载青帮是由翁岩、钱坚、潘清三人创立，时间在清康熙或雍正或乾隆几朝（各种“通草”记载时间有所不同）。创立青帮的来由，是因为清政府兴办漕运，张榜招贤，翁、钱、潘的师傅陆逵令三人揭榜，替清政府造船兴运。清帝钦准翁、钱、潘三人各自按八仙、二十八宿、三十六天罡之数招徒72名，创立青帮（即安庆帮、庆帮、安庆道友会），“领匡漕运”。三人创立青帮后，以达摩为始祖，金碧峰为第一代祖师，罗清为第二代祖师，陆逵为第三代祖师，以示其源远流长，并以此标榜其为佛门正统。“通草”中的这些记载，与史实大有出入，但它为研究青帮史提供了两条线索，即青帮与漕运和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罗教又称罗道、罗祖教，是明清两代流传较广的民间秘密宗教，它出现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由罗祖所创。罗祖即青帮所供奉的第二代师祖罗清，俗名罗梦鸿，罗清是他的道号。在一些史籍中，他被讹传为罗怀、罗孟洪、罗梦浩、罗英等名。罗祖是山东即墨人，祖辈当兵，隶北京密云古北口军籍，出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自幼丧父母，早年出家，修行13年而得果，死于嘉靖六年（1527年）。罗祖在正德年间（1506—1521）做五部经卷，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分上下二册）、《正信除疑自在卷》，及《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卷》，这五部六册经卷，是罗教创成的标志。

^① “通草”是帮内秘籍，又称“通漕”、“统抄”等，版本极多。内容记载青帮源流、粮船制度、帮规、开堂仪式、切口等，很多是牵强附会而成的。



罗教糅合释道两家思想，提出独具特色的“真空”、“无生”境界，以此号召徒众。“真空”是宇宙的根本，是绝对的，永劫不坏的。它的变化，创造出人类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生”即是永生无死。具体地说，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生，是受苦无尽的过程，但只要受到“无生父母”的召唤和拯救，被他们带回“真空家乡”，便可以永无生死。罗教的这一思想对明中期以后产生的民间宗教有着巨大影响，这些民间宗教大多引入了“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宗教概念。

罗教的宗教信仰被统治者和正统神权视为异端，在它创立之初，即被明政府禁止。但罗教在压制下仍然秘密蔓延，传布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各地，成为明清两代最有影响的民间秘密宗教之一。在传教过程中，罗教形成了许多支派，主要有无为教、大乘教和老官斋教等。其中无为教和大乘教在江浙一带漕运水手中拥有大量信徒。

罗教与漕运水手发生联系的具体时间已不得而知，有的史料说罗清本人就是运粮军人。^①在青帮的直接发源地浙江一带，漕运水手传习罗教，则确实始于翁、钱、潘三人。据史料载：“杭州府北新关外拱宸桥地方，向为粮船停泊之所。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名。”^②

漕运是封建社会的田赋转运制度。统治阶级把从各地征集的粮食（即田赋）运往京畿地区，以供享用。清代漕运沿袭明制，设漕运总督，负责从江苏、安徽、浙江、湖广、河南、江西和山东各省征集粮食，通过运河运往北京。在总督之下，各省按地区设有卫所联帮等漕运机构。每个卫所有守备，每个帮有千总，每条粮船有旗丁，运粮时由旗丁雇募水手。清代每年运往北京的粮食多达400余万石，漕运粮船经常保持在1.2万多艘，水手有10万户，二三十万人。由于明清两代漕运百弊丛生，各层官僚贪污作弊，从中中饱，沿途地方又对水手层层盘剥，因此充当水手实出无奈，大多是赤贫穷汉，仅仅靠此糊口而已。尤其在江浙一带富足地区，当地人民向来不愿从事水手职业，而山东、直隶等贫瘠地区，从土地上分离出大量破产农民，流落他乡，在江浙一带的，多以漕运谋生，造

① 参见密藏《藏逸经卷·五部六册》条，“正德间，山东即墨有运粮军人，姓罗名静。”

②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崔应阶奏。



成这里“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①的现象。

漕运是季节性职业，每年回空时间在半年以上。在回空这段时间内，水手无处安生，自然而然地与修筑在河边的罗教庵堂发生了联系。于是翁、钱、潘三人所建的三庵“为粮船水手回空居住之所，因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人民，回空之时无所住歇，疾病生死亦无处掩埋”，所以以罗教庵堂为依托，“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在庵者俱习罗教，嗣因水手众多，续又分有七十余庵”^②。“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事，此水手皈教之由来也。”^③

这一语道破了漕运水手皈依罗教的真相，乃是因为对庵堂的经济依靠。“每年粮船回空，水手人等内有无处雇趁者，即赴各庵寓歇，守庵之人垫给饭食，待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藉沾微利。”^④这种经济关系，是水手中所传罗教组织向行帮转化的关键。在经济关系笼罩下，宗教色彩日益淡漠，“平时仅止一二人管庵，并无辗转煽惑教诱聚众之事。皈教之人有吃素念经者，并不吃素不念经者”^⑤。“至现在住庵之人，皆供系年老有病不能为水手，遂住庵看守，并不晓得掌教。”^⑥有的庵堂甚至“并未收藏经卷”。可见，这种经济关系，为罗教组织向行帮组织演化，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条件。

这种演变在雍正年间就露出端倪。雍正五年（1727年），江南江淮七帮水手严会生被浙江金衢所帮水手赵玉割去左耳，此案立即由刑部和漕督严究。据案犯赵玉供：“我系江南庐州府人，在金衢所帮当水手；刘把式是我师叔，为我已故师父同罗祖教的。刘把式因他干儿子严会生在孟有德船上持斧砍人，又诓了工价银逃走，刘把式告诉我说：‘你与他们的船相近，我求你管着严会生，他若再来吵闹，你就打断他的腿，不然割了耳朵，羞辱他。’后来我看见严会生同孟有德吵闹，我将严会生唤去骂他时，他与我打架，我拿刀子将他左耳割下是实。”^⑦

在同一份文件里，还引用了坐粮厅的呈文：“各帮粮船舵工水手

①②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觉罗永德奏。

③④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崔应阶奏。

⑤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觉罗永德奏。

⑥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崔应阶奏。

⑦ 《朱批奏折》卷451，《抄录刑部咨文》。



各立教门，多收门徒，结为死党，一切任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①可见，水手中的罗教组织的活动范围已不局限于各处庵堂，在漕运粮帮中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不仅如此，后来青帮按师徒排辈的组织形式及“家法”处置的惩罚措施，在这时已具雏形。可以说，这时水手中的罗教组织已经与传统的罗教组织大相径庭，成为由秘密宗教向秘密帮会转化的中介体。

由罗教组织向水手帮会演变的转折点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这一年，清政府因为各地水手多次械斗而平毁了苏杭两地33座罗教庵堂，企图割断水手与罗教的关系。但这时水手帮会的形成已经具备了条件，清政府的措施客观上促使水手组织摆脱宗教外壳，转变为带有严重迷信色彩的行帮会社。这个过程延续到道光初年。

由于罗教庵堂被拆毁，水手组织的活动中心被迫从庵堂转移到粮船上，出现了老堂船，“每帮有老堂船一支，悬挂罗姓图像。分派一人去管香火并通帮水手用钱帐目，为当家”^②。“帮内之巢穴即老官师傅盘踞之船，名为老堂船，藏有经卷神像，传结敛钱，挟制旗丁，与游帮匪徒表里为奸，实为帮中之害。”^③松散的水手宗教组织在水上得到了强化，并改变了性质，它以老堂船为核心，以当家、老官师傅为首领，形成一套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建立了绝对的权威，老官师傅对水手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治，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④。这标志着“帮规”、“家法”的形成。不但如此，水手帮会通过层层师徒关系，“霸占帮联，视同己业”^⑤。“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为师，论列辈分，彼此照应”^⑥。据估计，道光初年帮会控制的水手不下四五万人，占江浙水手总数的绝大部分。

这一时期的水手帮会基本上是以清代官方漕运各帮为控制范围，并没有形成日后青帮以“潘安”为主体的那样一个大系统。翁、钱、潘三人后来虽被青帮供为“三祖”，但此时却是三个不同的帮派首

① 《朱批奏折》卷451，《抄录刑部咨文》。

②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奏。

③ 《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漕运总督恩特亨额奏。

④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江苏巡抚陶澍奏。

⑤ 《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两江总督陶澍奏。

⑥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奏。

领，“翁安呼为大房，钱安呼为二房，藩安呼为三房”^①。三房之下，又分为为数众多的帮派，每一帮派都有自己的老堂船和首领，自成系统。各帮派之间为了抢夺饭碗、把持漕运而互相争夺，经常发生械斗事件，最后形成大房、二房（又称老安）与潘安（又称新安）之间的对峙局面。可见，在嘉道年间，水手组织已经从宗教组织转变为行帮会社，罗教的宗教职能已经化为历史的痕迹，变成带有迷信色彩的祖师崇拜。

到了道咸年间，清政府开始兴办海运，“江苏海运始于道光六年，浙江海运始于咸丰三年，初因运河淤阻，迨江淮烽燧，遂无岁不海运”^②。海运的结果，造成江浙水手再一次失业。数以万计的水手、纤夫，或投奔太平天国，或加入清军阵营，但更多的则以“安清道友”为名，聚集在两淮盐场，以贩盐、抢劫为业。

“安清道友”即是青帮，又称潘门、潘家，青帮是由它的别称庆帮谐音转化而来。它以潘安失业水手为骨干，融合活动在苏北一带的贩私集团“青皮”而组成。至于“安清道友”的来由，同治元年卞宝弟片中说得明白，“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朋，号称师徒”^③。安东、清河是苏北淮河流域的两个地方，说明“安清道友”是以这两个活动地点命名的，并不具备其他政治含义。

青帮之所以在淮北得到发展，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江浙地区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重要战场，青帮在此无从插足；二是淮北盐场是贩私集聚之地，立足于此，自然有许多油水；同时盐泉集团“青皮”是水手帮会的天然盟友。“青皮”是“粮路积惯匪徒”，早在浙江海运未兴之前，即与漕运水手相勾结，有的“随帮上下为水手售私渔利”，有的“盘踞村镇码头窥伺粮船到境勾结为匪”；甚至冒充水手，隐匿在粮船上。^④当水手帮会从漕运行业转移出来的时候，很快与“青皮”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的贩私、抢劫集团。

青帮在两淮站稳脚跟后，数十年间迅速向苏南、浙江一带发展，成为安徽、江苏、浙江最主要的帮会之一；从事的行当，也不仅局

① 道光八年九月六日漕运总督纳尔经额奏。

② 《浙江海运全集》。

③ 《录副奏折》，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卞宝弟片。

④ 参见《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十月十日安徽巡抚色卜星额奏。



限于贩私和抢劫，而成为一股从事贩盐、贩毒、劫掠、包赌、包娼、贩卖人口的社会恶势力。它的活动重点也由农村逐渐转向上海、镇江等大中城市，青帮头目也大都依附于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投机，向社会上层发展，成为旧中国的一大祸害。

二、组织结构和开香堂仪式

与红帮不同，青帮是一个“家长制”的纵向组织。所谓“纵向”，就是按班辈分前辈后辈，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辈分。前辈与后辈之间的师徒关系是青帮成员之间最重要的关系，青帮就是靠师徒关系一环套一环地传衍下来，这种师徒关系非常严格，所谓“拜师如父，收徒若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同时，青帮也强调同辈之间的义气互助，同参兄弟（即同拜一个师父的门徒）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总之，青帮是靠“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这两层关系组织起来的，而体现这两层关系的，就是青帮的字辈——每一个青帮成员，都占有帮中拟定的字辈中的一个“字”——辈分前二十四字和后二十四字。前二十四字相传由罗祖拟订，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觉（或无学）”二十四字。其实按字辈流传，并非青帮首创，在清代档案文献里，有罗教按字辈流传的记载：“以清净道德，稳诚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无学二十四字作为支派。凡拜师习教，各按字辈流传。”^①可见，这种传徒方式的历史源远流长，并说明青帮与罗教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依据青帮“通草”的记载，青帮奉“前三祖”金碧峰、罗清、陆逵为前三代，分占“清净道”三字。金祖号清源，罗祖号净清，陆祖号道元。第四辈则是“后三祖”，即“德”字辈，翁岩号德慧，钱坚号德正，潘清号德林。第五代“文”字辈，有宿瑛（号文久）、王小爷（号文功）等几位。一般地说，“通草”只排列这五代，并不能继续举出以下数代的姓名，因为它依据的是帮内的传说。在清代档案中，记载着道光初年嘉白帮七老会会内的水手，大都是明、兴两辈人物，这虽然说明按二十四字辈流传的方式由来已久，但不能

^① 《录副奏折》，道光六年四月十一日两江总督琦善奏。

证明青帮的历史就是从二十四字辈拟定之时开始，青帮仅仅是继承了罗教的衣钵，当字辈与师父强有力的权威结合之后，才成为维系帮会成员的纽带。

到抗日战争前后，青帮已经传到“大通悟觉”这几个字辈。大字辈著名人物不多，最出名的大概要算张仁奎（字锦湖）了。张仁奎在北洋时期做过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3万多人，是较早进入社会上层的青帮人物。旧上海的“青帮三大亨”中黄金荣、张啸林是通字辈，杜月笙是悟字辈。通、悟两辈适逢青帮发展的鼎盛时期，涌现出许多著名角色，除了“三大亨”外，像韦作民、顾竹轩、徐逸民、杨虎、唐季珊等人在社会上也颇有势力。“觉”字辈出道较迟，像南京的余得水、黄春庭等，与上海滩的大亨们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后二十四字是“万象依归，戒律传宝，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光照乾坤，代发修行”，据传为同治年间续派。^①新中国成立前，已传到后二十四辈，但多为无名小辈。

有的“通草”还列出续二十四字：“绪结昆计，山芮克勤，宣华转忱，庆兆报魁，宜执应存，挽香同流。”^②

前后二十四字各联系起来看，似乎与罗教思想有所联系。后人牵强附会，试图对每个字都做解释，大多无中生有，不妨抄录一则：

清心秉正，静坐常思，道德修真，德配天地，文昌化解，成其正果，佛心皈一，法渡无边，仁义永远，伦常在怀，智勇双全，慧思普渡，本枝茂盛，来历清白，自心悟悔，信用为根，元初自始，明心见性，兴家立业，礼门义路，大发慈悲，通行中华，悟道诚心，学正渡成。

万教归一，象注先天，依归佛门，皈敬三宝，戒谨受规，律始黄钟，传道自西，宝象佛法。化及众生，渡有善缘，心存正直，回头是岸，普渡众生，门路正大，开发善缘，放生为善，广大无边，照及万方，乾元为首，坤德载物，代代传留，发击大道，修身为本，行孝当先。^③

加入青帮，需由引进师介绍，传教师指导，上香行礼，循其宗派，依序流传。第一道手续，是投门生帖，请介绍人代投到将拜的

① 参见曾可立：《清门通史》，无锡，恬养斋，1935。

②③ 李雪樵：《青帮通漕汇海》，北京，正礼堂，1944。



师父（即本命师）座前，听候察访。门生帖格式如下：

某老夫子上某下某惠存	正	受业某某某年 岁 年 省 月 日 县 时 建 生	现生职业 永久住址	曾祖 祖父 祖父 父	某老夫子 座前 受业某某某谨拜	年 月 日
------------	---	--------------------------------------	--------------	---------------	--------------------	-------------

当然，这是一个标准格式，实际运用时有出入。崔锡麟在《我所知道的青红帮》一文中，回忆他拜张锦湖为师的门生帖是这样写的：

门生崔叔仙（是我在军中用名），三十二岁，江苏省高邮县人，承杜凤举军长、戴介屏师长介绍，自愿拜在张老太爷锦公麾下为徒，终身聆训，听候驱策。

三代：曾祖崔福、祖崔阳春、父崔瑞亭。

门生崔叔仙叩呈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日。^①

格式虽有出入，要表达的意思却相同。

倘若师父认为投帖人条件合格，那么就择期开“小香堂”（开香堂又叫“孝祖”）行拜师大礼。小香堂有临时小香堂与正式小香堂两种。“临时小香堂可以随时随地举行，只要用香烛一份，上供三家祖师牌位一座行礼如仪就行”^②，非常简单。前举崔文所述参加小香堂，被张锦湖收为门生的经过非常具体典型，特录于下：

我（崔叔仙）来到张府前，已先有张门老门徒罗鑫泉（上海牙医生）在客厅内等我们了。我们到后，罗到楼上通报张老，张老才入客厅。杜军长与我二人就地向张老行了一跪三叩首见面礼（这是杜军长事前同我言明的礼节）。张老便问我大致经

^①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② 姜豪：《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见《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历，军中情况，家庭情况。罗鑫泉已在佛堂前燃烛焚香，入客堂，请我们入佛堂上香。罗司仪口称崔老弟向祖师爷行大礼，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首。又称：崔老弟向张师父行拜师大礼（张师父立香案左首并未坐下），我仍向佛前三跪九叩首。又称：向师兄杜大哥行大礼，我面向佛前一跪三叩首。接着杜凤举说向罗师兄（指罗鑫泉）行大礼，我即向佛前一跪三叩首，入门礼仪完毕。^①

这种临时小香堂仪式虽简单，但是每个动作与正式香堂一样，都有严格要求，介绍人事先要对新进道者说明并进行演习。比如“一跪三叩首”，就要求新进道者先迈左脚（身子不能动），左腿屈膝（此时身子不能斜），然后将左手压住右手放在左膝上，左膝落地，右腿也顺势跪下，两手垂下，抬头望祖，这是“一跪”。接着要弯腰将左手压住右手落地，叩头，抬头望祖，如是三次，这是“三叩首”。起身的时候要将刚才的动作反过来做一遍。如果是“三跪九叩首”，就要按这个程式做三遍，参加一个大香堂，要跪许多遍，叩许多遍，对新入门的门生来说，是一项非常艰苦的事。

正式小香堂的仪式要复杂一些，堂中摆设，各种“通草”记载亦不尽相同。这里仅举两例：一种是堂中上悬天地君亲师之位，中悬三祖之位，挂有对联一副，一般是上联“未入会孝天伦名扬寸步”，下联“已进道遵师训誉满五湖”，横批“安清护我”之类。堂中陈放一案，上供果六碟，分两层，上下各三碟，清茶一碗，顺摆三炉香；两旁立红烛一对。案下放一个子孙炉，三祖上香三炷。门外设“小爷”位，桌上供果三碟，一对红烛，一碗清茶。^②另一种简单些，翁、钱、潘祖师之三牌位，平列供奉在堂上，用烛台三对，八字排开，中间放香炉三只，一字排列，地下放蒲团，门外右边供奉“小祖”牌位，用烛台二对，香炉一只，蒲团一个。^③这里所供的“小爷”或“小祖”，传说是青帮第五代人物，曾为青帮中兴尽过力，因此在开香堂时也给他一份香火，以示纪念。

正式小香堂须有引进师、传道师在场。本命、传道、引进三师应该是不同帮的（传说中青帮创建时有一百二十八帮半），如果本命

①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青红帮》，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② 参见李雪樵：《青帮通漕汇海》。

③ 参见曾可立：《清门通史》。



师是兴武六帮的，那么引进师、传道师就是江淮泗、嘉海卫或其他不同帮别的。因为翁、钱、潘三祖原来各领一帮组织，收徒时，其中一人为本命师，其他两人就分任引进师、传道师，这样一人收徒，即等于其他两人收徒，帮内叫做“一师皆师，一徒皆徒”。

参加香堂的人，在进香堂之前，要净面、涮船。所谓“涮船”，就是漱口饮水，喝的时候左手握住右手四个手指，放在后腰背下，低头喝碗中水，第一碗水是净口水，不能咽下；第二碗是净心水，又叫义气水，须咽下。净面去尘，净口刷污，净心明性，这是青帮的“净三业”。净过三业后，早先已入帮的人先进香堂，新进道的人，在门外小祖位前，行跪拜礼后，才由引进师引入。

进香堂后，先由长辈率领请天地君亲师、翁钱潘三祖、小祖，然后由传道师率领上烛、点香、开坛。接着就是参祖礼，先由本命师九步到蒲团行三跪九叩礼，在小祖面前行一跪三叩礼，引进师、传道师依次如是行礼，其余人紧接着也按字辈依次行礼。香堂的每个程式进行时，都由传道师背诵诗赞。如请三祖时，诗赞：“双膝跪尘地，焚香请祖莅，五台渡北海，临坛道学遗。”上烛时，诗赞：“一对喜烛放新霞，安清分帮不分家，三老四少百年好，黄氏庵（指潘庵——引者）中是一家。”参祖时，诗赞：“三位祖师供在中央，三老四少顶礼下参，三跪九叩不许轻狂，奉请师父来朝祖堂。”

参过祖之后，本命师向新进弟子训话。师父问：“你们自愿进清门的，还是朋友劝你们进清门的？”同声回答：“我们自愿进清门求道的。”诸如此类的问答，都是事先训练过的。接着，本命师把新进弟子介绍给在场的前辈和同参兄弟，投师者必须一一叩拜，长辈还恭，同辈鞠躬还礼（弯腰屈左膝）。最后一道仪式就是送祖，全堂三老四少一起跪下，新进弟子两人捧烛，传道师念赞诗：“恭送祖师回仙山，香堂家礼已办完，有劳祖驾来降坛，望空谢祖跪平川；三位祖师头前走，护法小爷在后边，祖师拨云往下看，看见儿孙笑连天。”

开过小香堂，就可成为师父的门生，还不能算做正式徒弟，帮内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师父要对门生考察几年之后，才能传给他“三帮九代”、“十大帮规”等帮中密约，这一阶段，叫“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直到上了大香堂，才算完成了拜师的第二步，成为青帮的正式门徒。

大香堂是帮中大典，非常隆重。师父门下的徒弟和将要“转正”的门生都应尽力赶到，并向师交奉送一份贺仪，贺仪不论多寡，各

人量力而行。此外，还有许多“赶香堂”的各辈人物。

开大香堂的地点可选择在圆门（即和尚庙）、方门（道士庵）、舱门（粮船上）、正门（祠堂内）、财门（店铺内）、宅门（居室内）。事先应安排各种执事，共十二种：一、置堂师（布置香堂者），二、请祖师（恭请祖师者），三、陪堂师（香堂上烛者），四、上香师（香堂上香者），五、左护法师（传示历代祖师者），六、右护法师（宣告青帮规则者），七、文巡堂师（查问赶香堂者），八、武巡堂师（纠察犯规者），九、值堂师（行礼司仪者），十、引进师（传授本门三代者），十一、传道师，十二、本命师（收徒者）。香堂的布置，各帮略有不同，但大同小异，在此仅举一例。大香堂中间放置一张长台，中间供天地君亲师、四海龙王神位，前放一只香炉，两旁放双烛台。两边上首供历代六佛祖（即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祖师）牌位，下首供金、罗、陆三祖师牌位，各置香炉和烛台。长台前放一张拼桌，桌上供翁、钱、潘三祖牌位各一座，一字排开；桌的两边各放三个烛台，八字排开，每个牌位前各置一座香炉。拼桌前再放一张八仙桌，供青帮第五代（文字辈）人物香炉三座，一字排开，中间再放大小香炉各一，边上放两只烛台。香堂门外左边放桌一张，供小祖牌位，置香炉一只，烛台一对。有时各个桌上还要供一些果类和清茶。香堂中挂有对联，横幅是“义气千秋”，上联“三皈五戒渡化三千贤弟子”，下联“千年万代传流百般好师徒”。上下联也有用“安清不分远和近”与“三祖传留到如今”之类的对联。

大香堂的程序，与小香堂大致一样，只是更复杂更隆重些。先是请祖，接着由陪堂师上烛；上香师上香；左护法师宣讲历代祖师的简历；右护法师宣读青帮十大帮规；文巡堂师站立香堂门口，查问赶香堂者，如赶香堂者对答如流，就被允许进香堂参祖行三跪九叩礼；武巡堂师则手执家法板，站立香堂门口，维持秩序。然后，值堂师主持参祖，全体分九人为一排，向祖师行三跪九叩礼，在小祖位前行一跪三叩礼，并指导新进门徒向引进师、传道师、本命师各行大礼，再向在堂全体前辈行礼，礼毕，起身肃立堂前，静听前辈训话。这时，先由引进师传授本帮的三代、船只、旗号、用锁、码头、吃什么水、烧何处柴、用何种兑粮票等“海底”。接着是传道师说话，内容与引进师大致相同。最后，本命师向新门徒训话，这是一种套话，内容大致是：前人开香堂，后人上钱粮。不来不怪，来就要戒。粮船跳板三丈三，进门容易出门难。进门求的五个字，



敬学求吃怕，敬的是天地君亲师，学的是仁义礼智信，求的是四季平安福，吃的是金木水火土，怕的是生老病死苦。奉行的八德，就是礼义廉耻，孝悌忠信。铁树不开花，安清不分家；铁树一开花，分帮不分家。三分安帮，七分交情，前人领进门，交情在各人……接着交代本帮三代等“海底”和江湖交接问答方式。到此，大香堂接近尾声。要说明的是，十二个香堂执事每一个行事之前都须向列祖牌位行三跪九叩礼，并口颂赞诗。最后，由值堂师口诵送祖歌，全体行礼，大香堂完毕。

在青帮中，上述的大香堂只能算是极普通的，如果开香堂者名声大，财力足，门徒多，可以组织规模更为宏大的，多供几位祖师（每人一个牌位），多烧几炉香，多点几台烛，多用几位执事，极尽铺张之能事。不过，民国以后，许多青帮人物已不完全清楚开香堂的标准仪式了，所以他们开香堂时，也不尽依据“通草”中所载的规矩，或损或益，全由他们自己定夺。

上面所述的香堂，说的都是收徒的香堂。其实，香堂也不一定要在收徒时才开，帮中遇到其他一些情况时，有时也开香堂来解决。开收徒香堂，在帮中叫喜事香堂，只是香堂中的一种。如果召集三老四少开香堂讨论解决同道的纠纷、帮丧助婚、集金、摊分等等事宜，就叫做评事香堂。如果开香堂审问帮中犯规的人，公议处分的方法，叫刑事香堂。如果为师者因年高或其他原因，要收大法永不收徒，须开大香堂宣告闭山门，叫法停渡大香堂。凡此种种，使得开香堂不仅是青帮的祭祖仪式，更成为解决帮内事务和联络青帮成员的重要方式。

三、帮规与密约

青帮作为一个秘密结社，仅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躲避封建统治阶级的追剿，必须有严密的帮规来约束成员的行动，也需要通过确定各种密约来作为各码头和成员间的联络手段，只有这样青帮才能秘密地生存下去。

青帮的帮规，内容十分完备，主要有十大帮规、十禁、十戒等等。

“十大帮规”是青帮最主要的纪律。

第一，不准欺师灭祖。不拜师不能入帮，无父母不能成人子。父母之恩，师父之德，难以报尽。如果忤逆父母，辱待师父，即是



不孝，这是犯了大忌。其实这条帮规无非是确立师父的权威。

第二，不准藐视前人。因为“安清不分远和近，一祖流传到如今”，所以“一师皆是师，一徒皆是徒”，藐视前人，便是藐视本命师父。

第三，不准扒灰捣扰。所谓“扒灰捣扰”（又叫“扒灰倒笼”），即是损人利己，扬灰扒人（乱伦），捣争扰财，图目前个人爽快，而不顾他人受害。

第四，不准奸盗邪淫。所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奸盗邪淫必然会破坏组织的团结和发展。

第五，不准江湖乱道。在帮的人，在外面走江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须言谈谨慎，不能“乱道说法”，以免被外人窃听；引入入帮，不能引错了人，不清不白，对帮中“名誉”大有关系。

第六，不准引法代跳。凡是本帮的人，不能作本帮门徒的引进师、传道师，否则就不存在“三帮九代”。

第七，不准扰乱帮规。犯帮规者，就在香堂口动家法，责打不贷。

第八，不准以卑为尊。不能因为字辈小自觉低微而擅自充大，乱了宗派规矩。

第九，不准开闸放水。漕运粮船途中要经过许多水闸，如果私自开闸放水，就有翻船性命之忧。

第十，不准欺软凌弱。帮中之人，都标榜英雄大丈夫气概，如果以强压弱，以多欺少，以帮吓人，岂不坏掉了青帮的“声价”。

青帮的“十禁”，主要是投师收徒方面的准绳。

第一，禁止父子同拜一师。如果父子进帮，同拜一师，那么就处于平辈，成为同参兄弟，即使不同拜一师，也不能父子同一字辈。这样才能“俗家清父子，香堂谓师徒”。

第二，禁止师过方徒又投师。如果上了小香，未及上大香，师父过方（即故亡），不准另投他师，所谓“佛门容易进，万金难买出”。如同一个人不能有再生父母。

第三，禁止一徒连拜二师。所谓“师徒大礼重如山，朝秦暮楚非奇男，忠臣烈妇不二主，自古未见两层天”。

第四，攀止关山门再收弟子。如果帮中前辈已经“功高果满”，应将山门关闭享清福，此时应通知同道开香堂作贺。嗣后不能重开山门收徒，因为许多徒弟可以接续祖师香烟。如果再开山门，便是自卑自下，失却尊严，前功尽弃。



第五，禁止徒不收之人师收。为弟子者，在上大香之后，就有收徒的职责，一旦收错了门徒，或已记名未收，唯恐累及“帮誉”、“师誉”，声明取消不收；如果为师者，故意再收为徒，就是一脉乱传，既犯帮规，又犯众怒。

第六，禁止兄为师弟为徒。犯此条者，为乱伦毁纲，欺师灭祖。

第七，禁止本帮引进本帮。本命、引进、传道三帮以及三帮师父、师爷、师太（即九代），这“三帮九代”是在江湖上证明自己是青帮人物的最主要证据。如果本帮引进本帮，则变成单帮，在江湖上寸步难行。所以说“家规本是三祖留，三帮九代传千秋”。

第八，禁止进道后辱骂同道。

第九，禁止师过方徒代收人。如果师父逝世，其徒弟不能代师收人，更不能拉师弟拜其为师。

第十，禁止香头自高。青帮有“字大人不大，字小人不小”之说，意即不能因为香头高（即辈分大——引者）而自高，也不能因为香头矮而自弃。如果胆大篡改香头，私充长辈，将受严惩。

此外，青帮还有“十戒”：“一戒万恶淫乱，二戒断路行凶，三戒偷盗财物，四戒邪言咒语，五戒讼棍害人，六戒毒药害生，七戒假正欺人，八戒倚众欺寡，九戒倚大欺小，十戒贪酒吸烟。”“十要”：“一要孝顺父母，二要热心做事，三要尊敬长上，四要兄宽弟忍，五要和睦乡邻，六要夫妇和顺，七要交友有信，八要正心修身，九要时行方便，十要福慧双修。”“九不得十不可”：“一不得不顾名思义，二不得不防挑唆是非，三不得不成全人间骨肉，四不得不按本份生存，五不得不注重大道，六不得不求四季平安，七不得误良近恶，八不得损人利己，九不得依帮欺人；一不可自骄自傲目中无人，二不可浪漫轻佻失去道路，三不可开花叫暴恶口恶舌，四不可抛亲弃养忘恩负义，五不可忌贤妒能闭塞道路，六不可假充道学自误误人，七不可违犯帮规乱行仪注，八不可独霸安清单帮行运，九不可挡水垒坝窃跳偷渡，十不可口是心非失却信用。”诸如此类的，还有“安清三十六善”、“安清传道十条”、“早码头十大帮规”等等，多是十大帮规、十禁的补充和重复。

犯了帮规，要受家法处治。青帮另订有“家法十条”，对犯规者动以家法。十条家法是：

第一，初犯帮规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犯规”二字，并加斥革。如犯叛逆罪，捆在铁锚上

烧死。

第二，初次忤逆双亲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胸前烧“不孝”二字，并加斥革。如犯逆伦罪，捆在铁锚上烧死。

第三，初次不遵师训，妄言妄行者，轻者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顽民”二字，斥革。

第四，初次不敬长上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不敬”二字，斥革。

第五，初次以长上资格侵占帮中老少所有财产物件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强夺”二字，斥革。

第六，初次殴打帮中老少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强暴”二字，斥革。

第七，初次违国法所禁不道德之事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重大罪时，用定香在臂上烧“莠民”二字，斥革。

第八，初次诽谤仙、佛、菩萨以及一切宗教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妄为”二字，斥革。

第九，初次不务正业，专事敲诈、逞凶斗殴，不受规劝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无义”二字，斥革。

第十，初次犯奸盗邪淫，而伪造虚构、诬栽，殃及帮中老少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无耻”二字，斥革。^①

读完青帮帮规和家法十条，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青帮是一个安分守己、尊重道德的组织。其实不然，青帮之所以成为一个庞大组织，自然有其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是来自封建的纲常礼教，而是来自依靠这个紧密团结的组织向外界索取物质利益。青帮是由从漕运行业析出来的失业水手与贩私组织“青皮”等融合起来的秘密结社，它最初的生存基础是在封建政府的眼皮底下进行贩私和劫掠活动，为了保证这种活动的顺利进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纪是不行的。但是，青帮的帮规是“内向型”的，谁若胆敢破坏组织、违忤师父、影响行动，必将严惩不贷，如果对帮外人

^① 引自姜豪：《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



物（青帮称之为“空子”）干出“欺软凌弱”、“奸盗邪淫”之事来，就不一定受帮规处治。在清代史籍中，有关青帮骚扰居民、抢劫财物的记载不在少数。在青帮发展到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之后，更是堕落为一个黑社会组织，触犯帮规者大有人在，像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及其门徒，作奸犯科，从未被家法处罚过。

青帮和红帮等秘密社会一样，为避免暴露身份，用暗语（即“海底”）和暗号作为成员之间联络的手段，为此青帮定下了许多密约，只要掌握关键的密约，那么走遍任何码头，都会受到同帮的款待。

青帮最重要的密约是三帮九代。每一个上过大香堂的门徒，都有引进师、传道师和本命师，这三师所在的帮，即是三帮。三帮的师父、师祖、师太合计九人，即是九代。一般地说，能够记住自己的三帮九代，就能证明你是帮内同道，跑码头时，码头大哥便会以礼相待，招待食宿三天（有时更长），临行还送给到下一站码头的盘缠。因此，三帮九代被视为青帮门徒的“终身饭碗”。

此外，青帮门徒还应懂得一些“江湖参交问答”，这样才能与各码头的同道相联络。例如，一个青帮成员，到外码头寻师访友，初到一地，不知谁是这个码头的老大（即负责人），为取得联系，便应到青帮联络站（一般设在茶馆酒店）挂牌。挂牌的规矩是，帮中人物入座后，招呼堂倌泡盖碗茶，如果堂倌亦系帮中同道，应注意来客的举动，看是否自己人。盖碗茶送到后，客人立即将盖取下，放在茶碗左首，盖顶朝上，盖底朝下。这时堂倌送来一双筷子，竖放在茶碗右首，客人应立即把筷子横放在茶碗前面。如果是在酒店，则应把筷子横放在酒杯前面。

招牌挂出后，堂倌便会过来打招呼盘底，一问一答，尽是“海底”（问答时客人应起身恭立）。

问：“请问老大（帮中除已知长辈外，概称老大），你在门檻么（即是否帮中人）？”

答：“兄弟占祖师灵光，在清门。”

问：“贵前人是哪一位？”

答：“在家子不敢言父，在外徒不敢言师。敝家师父姓某上某下某（若是张仁奎则姓张上仁下奎）。”

问：“请问老大领哪一个字？”

答：“藉祖师灵光，头顶二十一字，身站二十二字，手挽二

十三字（即通字辈）。”

问：“请问老大三帮九代？”

客人将三帮九代报出。至此，堂馆便知来客是自己人，一般不再问下去。这时应招待来客用茶用餐，客人则应问堂馆的姓名、师父姓名，堂馆简要做答。这样，只要来者与当地码头青帮联系上，无论公事私事，码头老大都会尽力招待。

但是，如果来客自报家门后，堂馆发现与客人所在码头或师父本有过隙，那么很可能继续问答下去，故意刁难，问倒对方，拆对方的台。这时候，堂馆要问来客所在帮有多少船，在什么码头兑粮，在什么码头卸粮，装什么粮，用什么旗、什么锁，吃什么水，烧什么柴，用什么票，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是什么，祖师草鞋一双有多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帮中极少有人能对答如流，如果来客答不上来且态度强硬，则免不了一场恶斗。但客人也不是没有商榷转圜的余地。当客人答不上来的时候，可以回：“兄弟初到贵地，一切全靠诸位老大包容。兄弟或有脱节（即得罪）之处，请老大诉知敝家师。朝廷有法，江湖有礼，光棍不作亏心事，天下藏不了十尺身。该责便责，该打便打，你我都是自家人，请老大息怒。”言至此，堂馆或许不便发怒，过节或许就此化解。不过，上述这种挟仇盘问是极少见的。

青帮的密约一直是沟通各码头及成员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起着一座秘密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之后，青帮由秘密结社走向半公开和公开，密约的形式逐渐简化，功能也逐渐缩小。



青红帮的合流及其罪恶活动

一、青帮与红帮的合流过程

青红帮是旧中国势力最大的帮会，是个无恶不作的黑社会组织。青红帮是青帮与红帮晚清以来逐步合流以后人们对它的统称，原先青帮与红帮都是相对独立的秘密社会系统的组织。

青帮的形成与漕运和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罗教又称罗道、罗祖教，是明清两代流传较广的民间秘密宗教，它出现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由罗祖所创。罗祖即青帮所供奉的第二代祖师罗清，俗名罗梦鸿，罗清是他的道号。罗教糅合释道两家思想，提出独具特色的“真空”、“无生”境界，以此号召徒众。“真空”是宇宙的根本，是绝对的，永劫不坏的。它的变化，创造出人类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生”即是永生无死。具体地说，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生，是受苦无尽的过程，但只要受到“无生父母”的召唤和拯救，被他们带回“真空家乡”，便可以永无生死。罗教的宗教信仰被统治者和正统神权视为异端，虽被明政府禁止，但仍秘密蔓延，传布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各地，成为明清两代最有影响的民间秘密宗教之一。在传教过程中，罗教形成了许多支派，主要有无为教、大乘教和老官斋教等。其中无为教和大乘教在江浙一带漕运水手中拥有大量信徒。

漕运是封建社会的田赋转运制度。清代漕运沿袭明制，设漕运总督，负责从江苏、安徽、浙江、湖广、河南、江西和山东各省征集粮食，通过运河运往北京。清代每年运往北京的粮食 400 余万石，漕运粮船 1.2 万多艘，水手 10 万户，二三十万人。由于明清两代漕运百弊丛生，因此，水手仅能糊口，江浙一带富足地区人民向来不愿从事水手职业，而山东、直隶等贫瘠地区，从土地上分离出大量破产农民，流落他乡，在江浙一带的，多以漕运谋生，造成这

里“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①的现象。

罗教与漕运水手发生联系的具体时间已不得而知，但原因却非常明显。漕运是季节性职业，每年回空时间在半年以上。在回空这段时间内，水手无处安生，于是那些修筑在河边的罗教庵堂便成了水手们的临时住所。“因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人民，回空之时无所住歇，疾病生死亦无处掩埋”，所以以罗教庵堂为依托，“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在庵者俱习罗教”^②。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为各地水手多次械斗，清政府平毁了苏杭两地33座罗教庵堂，企图割断水手与罗教的关系。由于罗教庵堂被拆毁，水手组织的活动中心被迫从庵堂转移到粮船上，出现了老堂船，“每帮有老堂船一支，悬挂罗姓图像。分派一人去管香火并通帮水手用钱帐目，为当家”^③。“帮内之巢穴即老官师傅盘踞之船，名为老堂船，藏有经卷神像，传结敛钱，挟制旗丁，与游帮匪徒表里为奸，实为帮中之害”^④。松散的水手宗教组织在水上得到了强化，并改变了性质，它以老堂船为核心，以当家、老官师傅为首领，形成一套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建立了绝对的权威，老官师傅对水手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治，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⑤。这标志着“帮规”、“家法”的形成。不但如此，水手帮会通过层层师徒关系，“霸占帮联，视同己业”^⑥。“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为师，论列辈分，彼此照应”^⑦。这表明，青帮已由初期的罗教组织转变为带有严重迷信色彩的行帮会社。据估计，道光初年帮会控制的水手不下四五万人，占江浙水手总数的绝大部分。

到了道咸年间，清政府开始兴办海运，“江苏海运始于道光六年，浙江海运始于咸丰三年，初因运河淤阻，迨江淮烽燧，遂无岁不海运”^⑧。海运的结果，造成江浙水手再一次失业。数以万计的水手、纤夫，或投奔太平天国，或加入清军阵营，但更多的则以“安清道友”为名，聚集在两淮盐场，以贩盐、抢劫为业。

青帮之所以在淮北得到发展，一是因为江浙地区成为太平军与

①②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觉罗永德奏。

③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奏。

④ 《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漕运总督恩特亨额奏。

⑤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江苏巡抚陶澍奏。

⑥ 《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两江总督陶澍奏。

⑦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奏。

⑧ 《浙江海运全集》。



清军作战的重要战场，青帮在此无从插足；二是淮北盐场是贩私集聚之地，立足于此，自然有许多油水；同时盐枭集团“青皮”是水手帮会的天然盟友。“青皮”是“粮路积惯匪徒”，早在浙江海运未兴之前，即与漕运水手相勾结，有的“随帮上下为水手售私渔利”，有的“盘踞村镇码头窥伺粮船到境勾结为匪”；甚至冒充水手，隐匿在粮船上。^①当水手帮会从漕运行业转移出来的时候，很快与“青皮”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的贩私、抢劫集团。

青帮在两淮站稳脚跟后，数十年间迅速向苏南、浙江一带发展，成为安徽、江苏、浙江最主要的帮会之一；从事的行当，也不仅局限于贩私和抢劫，而成为一股从事贩盐、贩毒、劫掠、包赌、包娼、贩卖人口的社会恶势力。它的活动重点也由农村逐渐转向上海、镇江等大中城市，青帮头目也大都依附于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投机，向社会上层发展，成为旧中国的一大祸害。

“红帮”的名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到民国年间才流行，人们用它来泛称哥老会。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嘯嚕，到嘉道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嘯嚕势力相结合。它们之间经过互相渗透、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名目。哥老会势力的大规模飞速地发展，是在晚清的同光年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

关于红帮创立的情况，说法也不一致。比较可靠的是光绪年间江苏北部东海县盛春山主持创办的“春保山红帮”。盛春山死后，“春保山”即由徐宝山接任山主，成为红帮首领。此后春保山分出东梁山、西保山、细紫金山、伏虎山等数十山堂。这些红帮组织不仅有山堂香水，其内部也设内八堂外八堂之职，它的十大帮规内容与哥老会的会规完全相同。^②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发动，哥老会（红帮）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民国成立以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迅速占了上风。这是因为，民国成立后哥老会（红帮）的一大批头目都接受了政府和军队中的重要职位，做了官，忽视了红帮组织内部的事务，使一些地方的红帮组织无形涣散，形成了江湖流派，以致“大哥吃兄弟，兄弟耍大哥”；另一方面，由于红帮先后遭到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政府镇压，许多组织被取缔解散之后，除少数上层分子

① 参见《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十月十日安徽巡抚色卜星额奏。

② 参见〔日〕末光高义：《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



转入国民党政府升官发财外，大部分群众则流为盗匪，或重拉山头进行活动，或与青帮势力同流合污。

过去江湖上提到青帮、红帮，总有“青红不分家”之说，一些帮会史著作也说：“只有金盆栽花，没有青红分家。”其实，“不分家”只是在清朝末年才见诸史籍。红帮最初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特别是四川、湖广等省，而青帮则活动于两淮及江南、浙西、皖南一带，两帮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多见，只是因当时贩私活动的进一步扩张，青红两帮的势力才有所汇合。青帮在两淮所经营的私盐，一般都装船运往湖广腹地或在皖、浙、苏南的一些地区出售。在湖广地区，青帮势力与当地红帮力量相接触（在长江中上游，红帮更多被称为“袍哥”，乃哥老会组织的代名词）。同样，红帮从内地走私鸦片等毒品销往沿海各地“码头”，也需要有青帮的保护和协助。虽然也有两帮争夺码头，互相仇杀之事，但青红帮之间的合作是一大趋势。而红帮所贩的川土、方土，沿江而下，沿途不仅有青帮保护，在运抵沿海各大码头后，还有青帮接洽，帮助在各地销售，如此合作，很是默契，这必然要以有组织的融合作为基础。具体地说，就是需要有身在青红两帮的头目，才能实现两帮的合流。这种双重身份的人物，在1891年长江教案发生期间，出现了一批。^①

这年9月，清政府在上海、镇江海关破获了一起与长江教案相关联的、镇江海关职员英国人美生勾结哥老会私运军火、准备武装起义的案件。通过审理美生案的清政府文件，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事实。首先，与美生案直接关联的哥老会头目30人，大都是流窜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山立堂、结党纠伙、拥有很大势力的“巨魁”，正是他们把哥老会从长江上游广泛传布于长江中下游，这个蔓延的过程是跟哥老会与青帮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同时进行的。其次，随着哥老会势力的扩张，组织成分也日益复杂，出现了一些来自青帮的头目。号称“长江三龙”（龙松年、王金龙、陈金龙）之一的陈金龙，供为安清道友通字辈。同案的陈斋公、曾同，原来也是青帮头目，曾同先入青帮，排行通字辈。再者，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的势力，很大一部分来自青帮。李洪的主要力量本来是青帮盐枭，但在哥老会长江联合起事中，他却摇身变为起义的总头目。

^① 参见拙文《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



另一方面，青帮在光宣年间向苏南、浙江一带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也主动地采纳一些哥老会的仪式和组织形式。最典型的，是安徽沿江一带的青帮组织，仿效哥老会立会堂，散放飘布。

进入 20 世纪之后，在清朝官方文件中，已经很少单独提青帮或红帮了，而是统称为青红帮。这时，像徐宝山这样既是青帮又是红帮头目的人物，在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原来属青帮，1899 年又在七壕口开春宝堂，是称霸扬州乃至苏州一带的青红帮巨头，主要以贩盐为业。他的人马从两淮将盐贩至江南各地，贩私船多达 700 余艘，在千里长江上穿梭往来，连清政府都怕他三分。1900 年，徐宝山接受清政府招安，利用帮会的关系为清政府服务，官至江南巡抚营统领。辛亥革命中徐摇身一变，率领部下光复镇江、扬州等地，后来又追随袁世凯，被革命党人暗杀。徐宝山可算是利用青红帮起家，获得高官厚禄的典型人物。进入民国后，青帮的头面人物同时也是红帮的“龙头大爷”（即使不在红帮，也必定与红帮头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因为青帮“准充不准赖”，红帮“不准充”，青帮的身份较为公开，而红帮的身份则较为隐秘，所以许多具有青红帮双重身份的头目在世人面前，大都以青帮的身份出现。像镇江青帮大字辈向春亭这样一个远近皆知的青帮“站山头”的人物，在 1924 年成为红帮的大爷，但他极少和人谈及红帮的事，极少有人知道他也在红帮。^① 以上就是青红帮合流的大致过程。

二、青红帮的主要罪恶活动

既然是“青红不分家”，那么他们的活动也就很难划分开来了。青红帮的罪恶活动，实在难以历数。下面仅就几个方面略加说明。

（一）欺行霸市

自清光绪年间起，青红帮势力逐渐侵入上海、镇江、南京这样一些华洋杂处的通商要口。到民国以后，这些城市已经成为青红帮的主要活动舞台。在旧上海，有码头霸、粪霸、渔市霸、菜场霸、人力车霸等各种恶霸。^②

^① 参见《向春亭谈青红帮》，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

^② 参见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 年第 3 辑。



自上海开埠以来，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码头，大多由外商经营。外商为经营方便起见，通过包工头来招揽码头装卸小工。这些包工头都是青红帮的大小头目，也就是码头霸。在旧上海，最大的码头霸有三个：一是沈吴生，绰号“大刀关圣”，杜月笙的同参兄弟；一是李茂龄，拜顾竹轩为师；三是张春宝，绰号“码头春宝”，是苏州河内河码头的霸主。这三个人都收徒数千人。具体到下面各个码头，还有青红帮的头目在霸占。据调查，公和祥码头由大包头宋玉书霸占，他拜提篮桥的包打听为老头子，成为公和祥的青红帮头目，手下拥有十三股党和二十八股党；十六铺招商局码头（即金利源码头），清光绪年间就有陈鸿林的老三十六股党，民国初年有大流氓杭州阿法的八股党独掌全权，到1947年成立了以陈阿明为首的新三十六股党；大达码头，由青帮通字辈秦树明（绰号麻皮阿根）独霸；鱼行码头，有在水云为首十八股党；华顺码头，由青红帮头子乔菜独霸；太古码头由该码头的买办兼总包陈善余与马金定、杨禹延等红帮头目霸占。^①

新中国成立以前，要想在这些码头上做小工混口饭吃，非得经包工头的点头允准不可。码头小工每搬运一件货物，工钱法币1角到2角5分不等，但其中百分之六十要被包工头抽走。不仅如此，每逢过年过节或包工头及其亲属的婚丧喜庆，工人都要摊份送礼，包工头利用这种方式来搜刮敛财，叫“打秋风”。凡遇红白喜事，就向手下工人发帖子，谁敢违忤这些工头，就会立刻砸饭碗。各个码头霸之间互通声息，一旦被解雇，就很难在其他码头立足。

粪霸也用同样的手段来抽取利润。旧时上海居民使用便桶，每日由清粪工人清倒，每桶按月付倒桶费。收集的粪便卖给农民作肥料。收集粪便的唯一资本是清粪用的粪车，粪霸把粪车租给清粪工，按月收工钱。旧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各由粪霸承包，公共租界是王永康；法租界是马鸿根，他是黄金荣的姘妇桂生姐的儿子。马鸿根拥有粪车400辆，每年向租界当局上缴承包费8000元，另外付给工人每人每月工资8元，以及法捕房、卫生处有关人员6000元小费，扣除这些费用，每月可净赚1万元以上。

除上海外，只要有青红帮存在的地方，就有把持某些行业的恶霸。在南京，青红帮头目把持了艚业、旅馆业、缎业、南北货等行

^① 参见邱勉：《浅谈解放前上海码头工会、地方帮口与帮会及其相互关系》，南京大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硕士论文，1993。



业。青帮大字辈的荣华庭、卜和尚，是缎业的大把头。荣华庭手下有三五千门徒，大都是“机包子”（包机织缎者），他很有势力，号称“威震大江南北”。

（二）经营鸦片和赌博

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上最流行的毒品是鸦片。鸦片因产地不同而分成四等：大土（印度产）、云土（云南产）、川土（四川产）和蒙疆土（内蒙古产）。

经营鸦片的利润很高，因此成为青红帮争夺的肥肉之一。在旧上海，规模大的土行、燕子窝大都是由广东大埔帮、潮州帮土商经营的，集中在法租界。而控制这些土商的，则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等大亨。

要控制鸦片经营，首先必须控制鸦片的提运。鸦片提运是一项冒险活动，但是利润特别丰厚，各帮之间争夺十分激烈，没有强有力的后台人物，难以从事这个行当。杜月笙等人为了能安全提运，聚集同党，组成一支实力很强的流氓队伍，其中所谓“小八股党”是主要骨干。“小八股党”是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杨启棠等人，都是些亡命之徒。每次提运鸦片，由黄金荣负责与租界方面安排联系，张啸林在军阀中活动，杜月笙则负责指挥“小八股党”及其党羽冲锋陷阵，把鸦片从水陆码头的交接点和“华”、“租”交界等关口地带安全运到土商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兼并、打击和拉拢，黄、杜伙同张啸林终于在鸦片提运上确立了垄断地位，逐渐控制了大的土商。特别是当他们需要钱临时调度时，只要一拍胸脯，土商们便会立刻凑齐，丝毫不敢造次。

五卅运动后，法租界当局表面上禁烟，暗地里实行鸦片专卖，派租界公董局华董、美记华珍行老板李应生与杜月笙商洽，由杜出面联合潮、埔帮土商数十家，组成鸦片专卖公司，即“三鑫”公司（暗指黄、杜、张三人，社会上称“黑老公司”），先后由金廷荪、顾嘉棠担任经理。各土行销售的烟土，都由三鑫公司贴上印花，统一配给，如需自行外购，则需在到货前向公司汇报，缴纳印花税及提货费后，才能销售。法租界的每个土行，平均每月要向“黑老公司”（三鑫公司）缴付3000元至1万元的酬金，而“黑老公司”平均每月要缴18万元给法租界当局。

1926年，法租界当局在“国民拒毒会”的再三请求下，在租界

内进行查毒，引起零售商的恐慌。杜月笙利用在租界内的关系，为烟贩们提供情报，从中收取“保护费”。报纸报道说：“各土贩设有二种公司，一为保运公司，以运动当局、保护烟土往来不遇任何危险为专责。一为保险公司，以运动允准暗中贩卖烟土为专责，以杜某为之长，收入甚丰。闻各土贩等神通广大，设当局下午将往某土行搜土，而该土行已早于上午接得报告，先事筹备，届时搜获者，不过零星数两或数磅之土而已。反之若保险之土行事前未得报告，而突遭搜查者，则所受之损失由杜某立即赔偿之，各土贩等暗中有此等保护，遂有恃无恐。”^①

燕子窝同样也有保险，每支烟枪收费大洋3角，按日征收。如遇被抓获判罪，由三鑫公司代付罚款。这样一来，本来设在公共租界的土行，如郑洽记、李伟记等，也纷纷进入法租界，寻求杜月笙等人保护。杜、黄、张三人俨然成为上海滩鸦片贩卖的总后台，他们平均每月从燕子窝烟贩得到的收入达10万银元。

青红帮包运包销鸦片毒品，不仅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庇护，而且与军阀、国民党政府也有密切的关系，即使在军阀之间互讷、人民群众反帝斗争之际，上海青红帮的鸦片销售也丝毫不受影响，反而由日销50箱增至70箱。蒋介石到南京执政之后，把征收鸦片特税作为重要财政来源之一，名义上禁烟，但上海市华界的鸦片市场比之租界毫不逊色。其他地区的情况亦相似。1932年11月9日，蒋介石废除了禁止吸鸦片和关闭鸦片馆的命令，汉口于是就有100多家鸦片馆立刻重新开张，“杜月笙在上海公开进行出售鸦片，并以每月交付中央财政部长三百万美元为条件”。1933年末，杜月笙甚至被允许从50万盎司鸦片中提炼吗啡和海洛因，并将提炼的吗啡和海洛因运销海外。《中国的鸦片运输》一书的作者指出：“青红帮（其头目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而蒋介石是卓越的成员）在吗啡和海洛因的交易中是有重大的利益关系的，正如绑架、勒索、谋杀一样。黄金荣和杜月笙在中国的政治幕后活动中是两个最有势力的人，他们占有南京政府高等顾问的地位。……因为杜月笙的权力和他的团体广泛，他们的活动就不会受到国内官员们的干涉。”^②

杜月笙等人在悉心经营鸦片买卖的同时，也致力于对赌博的控制。杜主持了法租界五大赌台，即富生、荣生、义生、利生、利源

^① 《时报》，1926-04-08。

^② *The Opium Traffic in China*, pp. 51, 81-83.



五大公司。这几个公司的主持人、抱台脚的打手，都是杜月笙的心腹死党。富生的主持人，外场是顾嘉棠、钱福宝，内场是江肇铭，总账房是金廷荪。义生的外场是芮庆荣、李鹏飞，主持人是马祥生。荣生的主持人是顾掌生、谢葆生。其他如华商俱乐部、人和栈赌台所安置的人马，无一不是杜月笙的人马。整个法租界的赌博都在杜的控制之下，而每个赌台每天要向杜月笙交付贿赂钱 2 500 银元，直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五大赌台才被迫停业。

（三）破坏革命

青红帮虽然也曾对辛亥革命有所贡献，但由于帮会的性质所限，它逐渐走向反对革命，作为国民党的帮凶，在屠杀共产党方面，表现得十分活跃。

1927 年春，蒋介石在发动“清党”之外，派杨虎、陈群、王柏龄具体负责与“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联络，共同策划行动步骤。杜月笙等人立刻召集上海青红帮头子樊瑾成、刘春圃、袁寒云等人为帮手，打出“中华共进会”的招牌，声称是辛亥革命时期“共进会”的继续，邀集“旧日同志”，“投袂奋起……甘作前驱，共扫凶残之孽”^①。招牌打出后，果然有许多旧会员应召而来，所谓“旧会员者，盖合清门、玄门两大团，结合为一者也”；“仅就上海一方计之，此二大帮人数，已不下数十万”^②。不多久，在“中华共进会”的幌子下，集中了各路帮会头目、大亨、把头以及他们手下的地痞流氓、市井无赖，人数不下万人。4 月 11 日上午，杜月笙派门徒万墨林送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到驻在湖州会馆的上海总工会，并随带一张请帖给汪寿华，请他当晚到杜公馆赴约。晚上汪一进杜公馆门，就被绑架，由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等人押到龙华活埋。12 日凌晨，“中华共进会”党徒分别由杜、黄、张的爪牙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商鑫宝、马祥生、杨顺铨、顾竹轩等率领，分别从租界向南市、闸北、沪西纠察队和工会驻地电车公司等处出击，二十六军周凤岐部 4 个团，紧随冒充工人的流氓分子，伪装援助工人，借口调解纠纷，维持秩序，骗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在冲突中，工人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死者数百人。杜月笙等人的爪牙，还“掳去工会及纠察队驻所一切

① 《申报》，1927-04-08。

② 《申报》，1927-05-03。



物品，虽一衣一履，囊括无遗。缴械之后，呼哨入租界而去”^①。数以万计的青红帮匪徒像一批发疯的恶狗，他们以10块银元一个人头为赏价，到处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紧接着，黄、杜、张等投入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他们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重要活动场所设在租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不能直接进入租界去搜，而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在法租界充任公董局要职，租界警务处的华探头目，从巡捕、包探到探目，大多是他们的门徒，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要员就是被他们抓到以后送到蒋政权的监狱和刑场杀害的。1927年夏天，就有20多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租界被捕，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此后，1928年陈兆年（陈独秀的另一个儿子）、1929年彭湃、1931年向忠发等都在此被捕。他们有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全国农民协会的领导人，有的是江苏省委领导人。1934年至1935年，蒋政权在全国逮捕了4505位共产党员，其中720人是在上海被捕的。关在宁沪监狱中的有87人是中共中央委员、340人是省委委员，其中有65个中央委员、95个省委委员是在上海租界被抓的。^②

青红帮活动范围遍及沿江各省，罪恶活动五花八门，像抢劫、绑票、偷窃、包娼、贩卖人口、走私、迷信诈财、行骗等，都是青红帮的“常规”活动。以上仅从几个大的方面进行了披露。

青红帮从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到民国初年的流氓团体，直到演变成为一股反动政治势力，就帮会本身而言，是一个堕落的过程；而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是旧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

① 《新闻报》，1927-04-13。

② 参见“Gang Rule in Shanghai”，in *The China Forum*，May 1932，pp.17-18；Y. G. Wang，“Tu Yueh-sheng (1888-1951)：A Tentative Political Biography”，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ay 1967，vol. 26，no. 3。

论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

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革命与改良的转折点，而且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内地联合会党进行反清起义的开端。对于这次起义，史学界研究得还不够深入。特别是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问题，迄今还没有进行专题研究。本文对这个问题做初步的考察。

一、自立军起义与保皇运动的区别

过去有许多著作，常常笼统地把戊戌变法以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与康有为发动的保皇运动等同起来；把唐才常在两湖长江一带举行的反清起义，与康有为、梁启超准备在两广进行的“勤王”举事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从形式上看，自立军起义与康有为的保皇运动发生在同一时期，名义上也属康有为领导，并打起了“勤王”旗号；但实际上，它与康有为的保皇运动，与康、梁准备在两广发动的“勤王”举事，是大不相同的。为了正确认识自立军起义的性质，阐明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我们首先得辨明自立军起义与康有为保皇运动之间的区别。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重大区别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集团的派别和政治倾向不同。康有为原属维新派的稳健派，即中派，在戊戌维新时期，充当了变法运动的主角。戊戌政变后，他流亡国外，自称奉有皇帝的“密诏”，鼓吹“惟我皇上圣

中国近代史研究

明，乃能救中国”^①，组织保皇会，发动“勤王”运动。围绕着康有为的保皇会领导骨干，主要是康氏的一批门徒如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和海外华侨的一些上层分子如叶惠伯、李福基、邱菽园等。他们坚持改良，抵制革命，演化为顽固的保皇党、革命的绊脚石。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领导骨干，原属维新派的左翼。他们是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不少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急进人物，如唐才常兄弟、林圭、秦力山、李炳寰、田邦璜、蔡忠浩等。虽然他们曾追随康、梁，参加了变法运动，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即背离改良，转向革命，自立军起义就是他们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自立军起义，许多人又进一步与改良派划清界限，转化为革命派的中坚。

(二) 斗争的目标不同。保皇会的宗旨是“专以救皇上”^②，因此，康、梁等无论奔走呼号海外，还是准备起兵两广，目的都在“救皇上复位”。他们反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也是为建立一个“帝党新政府”^③。这就表明，他们无意推翻清朝封建政权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唐才常的自立会则不同，他们是“以推翻清室为职志”^④。在自立军起义的一系列文告中，他们一再宣布：“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要“保全中国自主之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人民”；要“变旧中国为新中国”^⑤，表明他们斗争的根本目标，是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的新国家。

(三) 对待革命派的态度不同。康有为在亡命日本时是坚决反对跟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合作的，说什么“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⑥，并处心积虑地与革命派争夺地盘。1899年底，康有为命梁启超到檀香山，把许多兴中会员拉进保皇会，致使那里“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⑦，兴中会的策源

① 康有为：《在乌威士晚士打演说》，见《清议报》，第17、18册。乌威士晚士打（New Westminster）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的新威斯敏斯特，系华侨聚居地之一。

② 《保救大清皇帝序例》，转引自汤志钧：《论康有为和保皇会》，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 《勤王布告》，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④ 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记》，见《自立会史料集》，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⑤ 参见《自立会史料集》。

⑥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⑦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124页，台北，世界书局，1972。



之地，竟成了保皇派的阵地。1900年春，革命党人正在广东策划惠州起义时，梁启超即致函康有为说：“且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①于是，康有为即令其门徒在广东加紧争夺势力，准备起兵勤王。唐才常一伙则不同。他们与革命派在思想上早已有一定的联系。东渡日本以后，他们通过毕永年的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对他“倾倒备至”^②。他们曾多次力促孙、康两党合作，联合反清。但由于康有为的反对和梁启超后来的动摇，没有取得成效。但唐才常等并未因此动摇，他们仍积极靠拢革命派，“与孙中山订殊途同归之约，共策革命”^③。因此，他们发动自立军起义，就得到孙中山和兴中会多方面的帮助。首先，他们将起兵计划与孙中山做了“甚为周详”^④的商讨。其次，除兴中会的一些骨干随唐才常回国参与谋划起义外，孙中山还将兴中会在汉口的重要关系容星桥介绍给林圭，使“汉口自立军之活动大得其力”^⑤。另外，自立军起义将爆发之际，孙中山还命郑士良，“在广东惠州同时起义，以相策应”^⑥。所以，自立军起义时，“遥戴中山先生，称之为‘极峰’”^⑦。

（四）立足点和依靠力量不同。保皇会勤王活动的立足点在海外，所以他们的领导骨干多在海外各地活动。具体分工是：康有为在新加坡负责总指挥，梁启超在檀香山负责筹款联络，何穗田、王镜如、欧榭甲、韩文举等在澳门活动，叶湘南、麦孟华等在日本活动，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田运动于美洲，国内方面只有梁炳光、张学璟活动于两广。^⑧他们武装勤王的力量，主要想依靠各地清军防勇“反正”^⑨。他们的计划是：先“从闽粤发难”，然后“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⑩。由于他们在国内的活动没有基础，限于纸上谈兵，所以计划终成泡影。而唐才常自立会的活动基地在国内，他们以上海为政治活动的中心，以汉口为军事活动的中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163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81页。

③ 唐才质：《关于自立军起义的几个问题》，转引自邓潭洲：《关于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的几个问题》，载《史学月刊》，1964（11）。

④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见《自立会史料集》，68页。

⑤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40页。

⑥ 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见《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

⑦ 吴良愧：《自立军追忆记》，见《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2期。

⑧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101页。

⑨ 康有为：《致办事诸子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16~119页。

⑩ 参见《康有为与保皇会》，93、45页。

心。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争得了国内资产阶级和社会名流的支持；通过开堂放票，招募了两湖和长江一带大量的会党群众，建立了一支拥有数万人的自立军武装，自立军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会党群众。虽然这次起义归于失败，但它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综合上述的不同点，我们就不难看出，康有为发动的保皇运动（包括他直接筹划的两广起兵勤王），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名副其实的勤王；后者则“虽托名勤王，而志在革命”^①，是一次企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自立之国的革命尝试”^②。

二、唐才常等联合会党的原因

如上文所述，依靠会党力量进行武装反清，是自立军起义的一个重大特点。为什么唐才常等要依靠会党？他们又何以能联合会党力量呢？我认为，这是多方面原因决定的。

首先是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或者说是受客观形势所迫。原来，唐才常一伙在戊戌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也想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实行救亡图强。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睹朝局之颠倒，痛国事之危殆”，使他们醒悟到，“变之自上”的路已走不通，必须走“变之自下”的道路。唐才常表示“对于满清已有十分之绝望，恨不即时扰乱满清之全局，组织新政府以代之”^③；决心“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④，并“以革命家自任”，“以颠覆满清”^⑤。林圭也表示“今日救国，非要进行大改革不可……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⑥。沈荇则持“唯一之破坏主义”，“决意与才常呼起风云与汉水”^⑦。总之，他们都想用革命的手段来

① 章炳麟：《稽勋意见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6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② 关于自立军起义的性质，请参见拙文《略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载《光明日报》，1984-01-04。

③ 黄中黄：《沈荇》，见《辛亥革命》（一），289页。

④ 《唐才常集》，1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⑤ 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记》，见《自立会史料集》，7页。

⑥ 《自立会史料集》，101页。

⑦ 黄中黄：《沈荇》。



推翻清王朝，组织新政府。但是，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在当时，单靠他们少数几个激进的知识分子是根本不行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还非常弱小。唯一可靠的巨大力量，乃是下层人民群众，特别是当时活跃在长江流域反帝反封建斗争前线的会党群众。可见，唐才常等联合会党力量，乃是他们进行武装反清的最终抉择。时人评论说，“自立会意在改换中国政府以图自强，只因兵力过单，不得不借会匪之力”^①，这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会党发展的规模及其在斗争中显示的力量，也吸引着唐才常等决意去联合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的会党势力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哥老会在长江流域猛然勃兴。它的势力已从长江上游的川黔山区，蔓延到长江下游的江浙沿海。从城市到乡村，从交通码头到驻军兵营，到处都有它的山堂。每个山堂的人数，“多则数万，少则数千”^②。据清朝地方官的报告和外国侦探的调查，19世纪末，长江流域的会党势力已明显地向商业城镇集中。不仅沿江之汉口、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等城市已成为会党活动的中心，就连湖南之常德，湖北之沙市、樊城、老河口，也都充塞着秘密会党。^③甚至像安徽大通附近长江水道上的小小和悦洲（俗呼荷叶洲）地方，亦会党成群，“溷迹其间”^④。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由于中国的“商业革命”^⑤，而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对长江流域的掠夺，造成千百万城乡劳动者破产失业的结果。因此，这一时期长江会党斗争的锋芒，也就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反对外国轮船航行长江内河、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等群众性的斗争，在这一带连续不断地发生。1891年长江流域反教会侵略的斗争风暴，席卷了沿江五省数十个城镇；1899年，湖北一省就发生了10次群众反抗起义。^⑥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统治者。

① 《鄂中诛乱记》七，见《觉迷要录》卷4，50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116，《公牒三十一》，40页。

③ 清方奏报，参见《刘坤一遗集·奏疏》卷2、28；日本侦探吉福奥四郎的调查，参见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25、3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④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92页。

⑤ 有的西方学者把中国近代城市流氓无产者失业群的大量出现，归结于中国的“商业革命”，我以为是不恰当的。

⑥ 《北华捷报》，1899-01-30、03-13、03-27、04-03、04-10、05-01、07-07、08-07、09-17、10-09，1900-01-05。



长江会党势力的迅猛发展，及其在斗争中所显示的力量，引起了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力量的关注。1899年春，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就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日本友人平山周，赴湖南、湖北调查和联络哥老会。毕永年化装成和尚，先到汉口邀请了唐才常的同伙林圭，三人一起入湘，遍游长沙、浏阳、衡州各地，所到之处，多劝说哥老会领袖与兴中会合作。^① 根据这次实地调查，平山周回到日本，即向东京的《东亚时论报》发表了长篇观感。同年三月二十一日（1899年4月30日），澳门的《知新报》也以《湖南现状》为标题加以转载。平山周在这篇观感中，着重叙述了哥老会的状况。其要点是：（1）“湖南夙为哥老会之巢窟，其会员约十二万，会员中多有兵士，又间有高等武官，以阴成其大势力。据闻支那十八省中，殆无地不有其会员，合之约有二百万云。彼等一意以扑朝廷为宗旨，惟彼中之人，其通达世界之大势者极少，然亦非无备高等知识者。其动为毁教堂杀洋人等暴举，毕竟以苦其地方官，因以苦其朝廷耳，决非可与一派之顽固守旧党同视。其组织之整然，实有可惊者。”（2）“各地蜂起之暴徒，大抵不堪穷苦，思至大乱。然以予所观，暴徒无人才无兵器，官兵虽弱，犹足败其无规律无兵器乌合之众，故彼等不久必归镇静。然一时镇静而已，决非全可平定者，盖其秘密会党，星罗棋布。……目下才保平和之体面者，尚无大变可乘，故会党不奋起耳。然湖南之哥老会，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力也。”（3）“湖南为革命派有哥老会，为革新派有南学会，比诸各省，其足以自力，不至受欧人之践踏而有余。”^② 平山周对湖南哥老会的评论，基本上也反映了毕永年和林圭的看法。毕永年和林圭返回日本以后，还分别向孙中山和唐才常做了汇报。他们报告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从毕永年向孙中山报告后，平山说“所见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永年所报告金符事实”^③ 这段话，即可推测，他们是积极主张利用哥老会力量发动反清起义的。孙中山根据他们的报告，就决定在湘、鄂、粤同时大举。^④ 唐才常根据林圭的报告，便与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

^① 林圭在《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中说：“安兄（毕永年）会中峰（孙中山）于东而议定，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即就此而言。见《自立会史料集》，322页。

^② 《湖南现状》，载《知新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此件由中山大学历史系谭棣华同志代抄自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谨此表示感谢。

^{③④} 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



义”^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孙中山和唐才常两派间的“殊途同归”之约。

此外，他们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也是促使他们有效联络会党的重要因素。唐才常一伙多出身于较低级的绅士家庭，“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②，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过资产阶级启蒙教育，接触过激进的思想理论。因此，他们与封建官场较为疏远，与下层人民较为接近。特别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情况下，他们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和斗争，也比较关心和同情。其中不少人早已与会党在思想上或组织上有密切联系。如唐才常自1895年起，就写信给他二弟次丞，反复强调“宜多与各田户、乡民来往”，“物色豪杰之士，而与之交”，“盖兵乱将起，先得得若辈之心，则仓卒中或犹有为之援者”^③。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农民为国家根本，当年投身会党，亦以农民为最踊跃，军事应以农民为骨干”^④。可见他后来以会党群众为骨干建成自立军，绝不是偶然的。毕永年在维新运动时期，即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埜等联系，并“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⑤。他是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他见变法没有成功的希望，即东渡日本，加入了兴中会。后来他对自立会与长江会党的联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林圭则“久与下等社会为伍，深知其性质，又善于抚慰，人多乐为所用”^⑥。1899年他随唐才常从日本回国后，自立会联合会党多赖其力。其他如秦力山、沈荃等，也多“赋性豪侠，好与会党中人游”^⑦。由于这些人原先与会党就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所以能在联络发动起义方面很快取得成效。

三、唐才常等联合会党的经验

唐才常、林圭等招纳会党、建立自立军的活动，从1899年底开

① 《自立会史料集》，8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③ 《唐才常集》，244页。

④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见《唐才常集》，277页。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

⑥ 民表：《林锡圭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32页。

⑦ 冯自由：《秦力山事略》，见《自立会史料集》，241页。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始，到1900年8月自立军起义爆发，“不数月，北至河南，南至湘桂，西至巴蜀，东至九江，凡数百万枭雄，咸乐隶于其指撝，听命唯谨”^①。为什么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他们在会党的联合工作中，究竟有些什么独创经验？

我认为，唐才常等人联合会党方面最重要的经验有两条：一是结合会党的特点开展工作。二是将会党联合工作与建立自立军革命武装紧密结合。

关于结合会党特点开展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会党流浪江湖的特点，他们在长江一带的城市码头开办会馆，设立机关，招待会党，如在上海开设了大同客馆和集贤宾客栈^②，在汉口开设了宾贤公馆，在襄阳开设了庆贤公馆，在沙市开设了致贤公馆，在荆州开设了集贤公馆，在岳州开设了益贤公馆，在长沙开设了招贤公馆^③，在新堤开设了广贤公馆^④。“其余各地机关，都次第组织成立”^⑤。这些馆栈，多由自立会领导人直接开设经营，如上海的大同客馆，由唐才常开设；汉口的宾贤公馆，由林圭主持。这些馆栈表面上是经营旅社服务，实际上是为招待会党徒众，“以为会同商议之聚点”^⑥。到后来，这些馆栈就成为自立军新募成员的集中点。此外，他们还在一些中心城市设立了工作机关，如林圭在汉口宝顺里和英租界李顺德堂所设的机关，不仅是多处会党分子来汉联系工作的场所，而且还附设有接纳新会员的香堂。据自立会骨干吴良愧回忆，“每次开堂，室内灯烛辉煌，会党分子来往极多……当时差不多天天开堂，而每次开堂必砍鸡脑壳，所以我们在那里天天有鸡肉吃”^⑦。唐才常等通过这些馆栈和机关，广泛联络江湖人士，指导各地的会党工作。

第二，按照会党结拜的传统，开堂放票，招纳会众。唐才常等为了迅速将大批会党群众招募进自立会，他们就仿照哥老会开堂放票的办法，开立了富有山堂，并印刷“富有票”，作为入会凭证，广为散发。凡领得富有票者，即可入富有山堂，成为自立会会员。

① 张篁溪：《记林圭》，见《辛亥革命》（一），280页。

② 参见《自立会史料集》，191页。

③ 参见上书，34页。

④ 参见上书，187页。

⑤ 同上书，35页。

⑥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69页。

⑦ 《自立会史料集》，105页。



据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这种票布“系上海洋纸石印，写刻篆印，皆极精工。上横书‘富有’二字，直书凭票发足典钱一串。文前有编号，后有年月，背有暗号图章二颗”^①。如果得到这种票布，一可向头目领钱一千文，二可免费乘坐来往长江的太古、怡和轮船，三可保护身家。因此，当时领票入会者“趋之若鹜”。

自立会究竟发放了多少富有票，招纳了多少会众？说法很不一致。有的说“数百万”，有的说“百万”，有的说“三十万”，有的说“十余万”，还有的说“二万多”。我认为，“百万”或“数百万”之说显然是夸张，“十余万”之说指的是自立军人数，“二万人”的说法也不可靠，比较符合实际的是张之洞奏报的数字。据张之洞报告，自立会印刷的富有票约31万张。他的根据是：（1）富有票系用《千字文》编号，就他亲自查获目睹者，最前有地字号，最后有职字号，职字已有794号之票。而职字系《千字文》的第310字，按每字刻印1000张计算，合计有31万张。（2）据湖南拿获唐才常之弟唐才质供称，“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多万”，这个数字正与在湖北查获的票号数相符。这31万张富有票，除查获上缴1万张，自行销毁及未经散发的数万张外，实际散发出去的在20万以上，也就是说，自立会实际招募了20余万会众。因此张之洞说，“丑类实繁，深为可虑”^②。

应该指出，张之洞所说的主要是富有票在两湖长江地区散发的数目。实际上，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各地奏报材料看到，富有票的散发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例如，据岑春煊奏称，长江哥老会大头目李金彪曾“到上海、香港、澳门等处，散放富有票，与各逆匪商谋起事，复送信往镇江勾结徐老虎”^③。德寿奏报，湖南哥老会头目朱香楚，从李金彪处接受了一批富有票，到广东散发，“广东多会匪，推为头目，伪号正龙头”^④。升允奏报，“在长安县拿获会匪萧青山，有保国堂票布、令旗、暗号底本”^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巡抚锡良奏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初七日，在山西省太原城剪子巷元斋刻字铺“缉获邵春轩、甘瑞成二名，

①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七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②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九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③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广东巡抚岑春煊奏。

④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两广总督德寿奏。

⑤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日陕西巡抚升允奏。

并起获身带富有票二张，及新刻未用之富有票板一块。……据供均系湖南湘阴人，向充勇丁，被革后转徙四方，并无定址。本年六月间，行至直隶栾城县不知村名地方，撞遇素识之湖北人李大，给伊等富有票各一张，钱各一千文，嘱令前来山西，自刻富有票，开堂立会，广招党羽，俟入会人众，即可起事”^①。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富有票除由自立会在上海统一刊印外，传会之人，也可自刻印发。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在内，那么，富有票散发的数字，当大于张之洞奏报之数。

第三，适应破产劳动者的生活要求，发放钱银，维系会众。会党群众，大多是破产劳动者，他们漂流江湖，生活无定。如果单靠一般的宣传动员和散放富有票就能把数十万人招进自立会，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暂时招纳入会，要他们维系在会中，也是不可能的。怎样才能将大批会党群众招募进来，并且稳定在自立会组织之中呢？特别是自立军建成之后，又如何驱使他们去进行反清武装斗争呢？他们首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些人的生活来源。从有关记载，我们看到自立会基本上是采取“广散银钱”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谓“广散银钱”，大体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入会时即领得银钱。也就是在散放富有票的同时，发放银钱；或凭富有票领取银钱，从而使所有入会群众都得到一些好处。张之洞在一个奏折中说，唐才常“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粮台，往来沿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诱会匪……安排二十万元用之长江所散放之富有票”^②，即就此而言。这里需要辨明的一个问题是，富有票究竟有无经济价值？有的记载说，富有票是没有经济价值的。^③我认为，富有票虽不能代替钱币，但凭此票是能领取钱币的。我们从富有票上载明“凭票发典钱一千文”及有关文献记载“得此者（指富有票——引者）可径直领取洋银”^④，以及李大供称，在栾城县得票一张，同时得钱一千文等材料，即可证实。由此也可说明，“欲入会者，以钱千文购此票一张”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广散银钱”的第二个层次是，在自立军内，给会党头目按等级

①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山西巡抚锡良奏。

②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七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③ 例如，唐才质说：“该票虽为票币形式……若云可以代替钱币，经费缺乏之时亦可以销售票布，补充军饷，绝非事实。”（见《自立会史料集》，75页）。田野桔次说：“欲入会者，以钱千文购此票一张。”（见《朝野新谈》，44页）

④ 《觉迷要录》卷4，49页。



发放月薪。“头目分五等，二、三等月给洋银百元或五十元，最下一等亦有六元之数”^①。这种发放银钱的办法，虽在一定时期起到了稳定和维系会众的作用，但却给自立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当时自立会的财源有限，除靠康有为从海外接济、会内同志捐助及洋行银号贷款外，别无他途。而这些哥老会头目，多是“非金钱不用命”的，由于自立会“储金不丰，时支绌，要挟齟齬，往往而有”^②。为了克服财源的困难，唐才常不得不命各地裁减自立军的编制。关于这一点，陈说在给唐才常的一封信中反映得很清楚：“前奉来示，嘱店事宜缩小云云。弟再四筹商，目下根基已立，各分店（指自立军各分部——引者）业已大开市面。突然收敛，似乎不易，只宜实事求是，不必另立分店。若遽裁撤，祸机立见。公老于营务，詎不知招兵容易散兵难？杰（林圭——引者）病之日增，此也。略计店款，每月经弟与渔兄（沈荃——引者）裁汰后，尚须五百元有奇。本月初旬，杰已托弟在某洋委借得三百元，准约望前归楚。缘汇兑走至，弟已失言，渔亦同觉失色。二十日各司事又要关饷，刻公诚信号之款仍未见到，弟与渔亦将病矣。计本月须给六百元，急到方资开销。嗣后每月望前，退给五百元接济，庶汉店不至前功尽弃。”^③ 由此可见自立军经费拮据的程度。

第四，针对会党的分散特点，以富有山堂统一长江会党的山堂和宗旨。

为什么唐才常等要以“富有”二字命名他们的山堂和票布？按照湖南巡抚俞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说法，“盖取《周易·系辞》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二语，以为暗号”，“暗寓富有四海之意”^④，以表示他们的宏图意愿。但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统一长江一带会党的名号和宗旨。因为当时长江地区的会党，虽然势力很大，但山堂林立，不相统属，这对自立会发动武装反清起义是很不利的。唐才常等通过开立富有山堂，将长江地区会党的各主要帮派势力招纳进来，基本上就统一了长江会党的山堂名号。统一之后的富有山堂，就其性质来说，与哥老会洪门组织基本无异；但它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要比一般哥老会庞杂得多。我们从光绪二十

① 《觉迷要录》卷4，49页。

② 《自立会史料集》，41页。

③ 《觉迷要录》卷4，44页。

④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六年（1900年）八月一日岳州镇呈报搜获的富有山堂名单中看到，它的最高领导层设有正龙头 13 人，副龙头 13 人；下设内八堂——总堂、座堂、倚堂、盟堂、礼堂、管堂、值堂、刑堂、盟证、香长；外八堂——新副、圣贤、当家、管事、光口、巡风、大满、么满等，计 90 余人。^① 在 13 个正龙头中，除康有为、邱菽园外，其余 11 个全是长江会党的大头目。如杨子严，即杨鸿钧，湖南人，系金龙山堂的龙头；李金彪，即李云彪，湖北人，系腾龙山堂的龙头。他们的山堂，是当时在长江地区最著名势力最大的山堂。往下如总堂辜人杰，即辜鸿恩，原系张之洞军中的会党首领。^② 盟堂萧子云，系安徽大通之镇山正龙头，“党徒甚众，大通水师皆其部属”^③。再往下如香长邓福田、江守旦（姜守旦），系湖南浏阳、醴陵一带的洪江会头目。唐才常等把长江各地会党的重要头目拉进了富有山堂，实际上也就把他们各自统领的山堂势力归并于富有山堂。因此，我们可以说，富有山堂乃是长江地区会党的统一联合体。

值得注意的是，像康有为、梁启超、邱菽园、唐才常等人，本来不是会党中人，竟被列为富有山堂的正副龙头。这是什么原因？据吴良愧说，因为康有为等“当时的社会地位，经会党分子同意，故列名”^④。这种说法比较含糊。如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我认为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富有山堂指望康有为、邱菽园等从海外来的经济支助；其二是唐才常等为了便于利用和指挥会党力量。应该说，他们虽充当了正副龙头之职，但基本上还是挂名领导。

至于统一会党的宗旨，则比统一山堂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长江会党的宗旨混乱不一。据狄楚青说，仅哥老会一种，不下数十万众，“会名不一，山名不一，每会有一票，票上有□□山，正龙头□□，副龙头□□，下方其宗旨下，或八字，或四字，或两字，语句多不通”^⑤。另一方面长江会党“大半皆以排外为宗旨”^⑥，而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会领导，出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会党的反帝“排外”活动。他们认为，如果自

① 参见《自立会史料集》，128~129页。有关外八堂的名称，与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中所载，略有不同。见《自立会史料集》，104页。

② 参见《自立会史料集》，105页。

③ 《自立会史料集》，95页。

④ 同上书，104页。

⑤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132页。

⑥ 同上书，133页。



立会以会党原有的“灭洋”宗旨为号，“则无异于拳匪，东南之局，亦将不保”^①。因此，如何改变会党的“灭洋”宗旨，并使它们统一于自立会的宗旨之下，的确是个大难题。经过反复谋商，唐才常等决定，采取改换票布的办法来统一会党宗旨，规定凡参加自立会富有山堂的各会党，将各自原有票布一律改易富有票，用自立会富有票“救民保国”（一说“救国保种”）的宗旨，来取代会党“扫清灭洋”的宗旨。关于这一点，狄楚青在《平等阁笔记》一书中做了比较具体的记载：“友人多诘庚子事，谓何必用‘富有票’名义，以至援人口实？盖其中曲折外人知者甚少。当时实不能不利用各会党中人，因该党中，多以一票为凭信。票中要义，即为‘扫清灭洋’四字。佛尘（即唐才常——引者）筹思多日，谓此‘灭洋’二字，足亡中国而有余。一旦国中有乱，会党蜂起，则全国均为义和团矣。如是不但国亡，种亦且灭。于是创自立会富有票名义，乃得将旧有之票一概收而毁之，其‘扫清灭洋’四字，改为‘救民保国’，且布告各处，谆谆告诫第一要义，即为不可伤害洋人。此佛尘之煞费苦心也。其人虽死，其事未成，而其效乃大著。何以见之？当时北方义和团蜂拥而起杀他国之领使参赞，全国响应矣。而长江上下游会党中人不计其数，所以安守不发而又不伤一外人者，皆佛尘一人之力焉。盖因各会党之宗旨既已改易，一切听自立会之指挥故也。”^②

应该怎样看待唐才常改易会党宗旨？有的同志认为，唐才常改易会党灭洋宗旨只起了遏止会党反帝斗争的反动作用，这未免过于偏颇。

我认为，首先应该看到，唐才常改易会党灭洋宗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阻遏会党的反帝斗争，而是为统一会党步伐，集中目标进行武装反清起义。这在当时主要起了进步的作用。其实，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改易会党灭洋宗旨，不光是唐才常的自立会；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地区的革命团体，如浙江的光复会、湖北的共进会，也多通过改易会党宗旨，把他们从“仇洋主义”统一到“排满目标”上来。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133页。

^② 狄楚青：《平等阁笔记》卷4，19页。狄楚青的说法显然夸张其词，实际上当时长江地区会党的“灭洋”斗争仍屡屡发生，如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日张之洞在《致长沙俞抚台》电文中说：“顷据英领事照会，衡属衡阳、清泉、衡山、常宁、耒阳、安仁六县，城乡各处大小教堂三十余所，无不被毁，教民无不被抢。”（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69，《电牍四十八》）另外，上海的《北华捷报》也有类似的报道（参见 The Scare Hankow, 载《北华捷报》，1900-12-12）。

如果说，唐才常等改易会党宗旨是起了反动作用，那么，辛亥革命时期陶成章等人改易会党宗旨的进步作用又从何谈起？

其次还应看到，唐才常等改易会党灭洋宗旨，并不是一概排斥反帝。他们反对的只是南方会党和北方义和团的焚烧外国教堂等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即下层群众“野蛮之排外”。他们主张的是“文明排外”，即通过资产阶级振商务、参国权，以“抵御外洋”^①。虽然自立会的纲领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内容，富有票布上也没有反帝口号，但他们认为，推翻清朝慈禧卖国政权，建立“自立之国”，即可“救国保种”，摆脱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局面。这实际上也包含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内容。我们在自立会秘密的“龙头文书”中还看到，他们痛斥清王朝向帝国主义者“割地赔款”的罪行，以及表示“誓共生死”、“兴中复外”^②的誓言，也明显反映出他们的反帝爱国思想。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自立会在统一会党宗旨方面表现出一些弱点，而一概否认它的积极作用。

关于联合会党与建立自立军武装相结合方面，自立会领导人也有一些创造。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们把联合会党作为建立自立军武装的基础，在招募到大量会众之后，立即建立起武装组织。第二，他们很注重利用会党关系，策动各地驻军将士参加自立军。他们认为，会党群众虽多，但多“无兵器乌合之众”，为了筹建一支有力的武装，他们就设法在清军防营中寻找可以利用的力量。由于会党在长江地区的清军防营中有相当大的势力，因此，他们就通过会党关系，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进行策动。所谓打进去，就是派会党分子混入清军，并在军内散放富有票，发展力量。如张之洞奏称：“近有富有票匪散票勾煽，各种会匪往往领票入会，混入各营兵勇及长江水师者甚多”，“湖南岳州文武衙署水陆兵勇各营，多有富有票匪混迹其间……该参将所请练兵百名，其中即多系领富有票者”^③，就属于这种情况。所谓拉出来，就是将驻军官佐拉进自立会，然后利用他们统带的兵力。如张之洞的威字营统领黄忠浩，就是经沈荃再三劝说而参加了自立会，然后充当了自立军前军统领。^④安徽抚署部队管带孙道毅就是因秦力山

① 《唐才常集》，188～192页。

② 《自立会史料集》，128页。

③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④ 参见《自立会史料集》，95、106页。



的拉拢而支持自立军的。第三，他们紧紧掌握了自立军武装的领导权。唐才常等在招纳数十万会党群众的基础上，建成了一支拥有数万人的自立军武装。其基本成员是会党骨干和清军防营的中下级官佐和兵勇。自立军分七军四十营，即总会亲军十营，左、右、前、后、中五军各五营，先锋军五营。他们分别驻扎在长江流域的大通、安庆、汉口、常德、新堤等交通和军事要镇。自立军的各军统领都由唐才常的同伙和兴中会的骨干分任。唐才常任全军总指挥；秦力山和吴禄贞任前军统领，驻大通；田邦璜任后军统领，驻安庆；林圭和傅慈祥任中军统领，驻汉口；陈犹龙任左军统领，驻常德；沈荃任右军统领，驻新堤。其他如唐才质、唐才中、李炳寰、蔡忠浩、沈翔云、戢翼翬、赵必振、何来保等人，也多分别担任了自立军的帮统、粮台、文案等领导职务。从这里可以看出，唐才常一伙对自立军武装的领导，与他们对富有山堂的领导相比，已有显著的不同。如果说，唐才常一伙对富有山堂只是挂名领导不操实权的话，那么，他们对自立军则已基本上掌握了军事和财政等指挥大权。

总之，唐才常等为了武装反清，他们在联合会党、建立自立军武装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他们在民族危机深重、困难当头的时刻，实现了爱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下层会党群众两股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初步联合。按照唐才质、吴良愧等人的说法，就是自立会文事组和武事组的结合。文事组就是以唐才常为首的一批近代激进知识分子，武事组就是会党力量。

四、自立军起义及其失败原因

1900年夏，正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唐才常等即乘机发动自立军起义。他们原商定8月9日（农历七月十五日）长江各路兵马同时大举，但因康、梁的汇款未到，被迫延期。这一消息未能及时通达前军统领秦力山，秦力山仍按原计划于8月9日在大通宣布起义。

从大通局部地区来说，起义是有相当准备的。秦力山到大通以后，即与安徽哥老会首领杨云龙、符焕章等在大通、芜湖、太平、裕溪、和悦州等处散放富有票布，大量招人入会，“大通及附近居民



附和者充塞于途”^①，同时，他还利用安徽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的关系，获得了大批军械，长江水师营弁亦多受其约束。据上海《中外日报》报道，自立军为准备起义所需，大通各商店短衫短裤几至抢购一空。^②所以，8月9日清晨起义一爆发，自立军即斗志昂扬，大队前进，猛攻清军。清军长江水师船外委洪益全受重伤，炮艇被击沉八艘，兵勇溺死无数，自立军迅速占领了大通。接着，又分兵向青阳、芜湖、南陵一带进攻。义军所到之处，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会党“均有蠢蠢欲动之势”^③。8月11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调水陆营兵，大队进剿。秦力山因无后援，又以大通孤悬江心，非鏖战之地，即移师江东，且战且退，屡战失利。8月13日，退至九龙山，全军崩溃。秦力山仅以身免，辗转逃往日本。

大通发难以后，唐才常、林圭在汉口亦急欲发动，但因为康有为的汇款迟迟不到，举事一再稽延。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5日，慈禧、光绪西逃以后，形势非常紧张。唐才常和林圭决定于8月23日起兵，计划先占领汉口，夺取汉阳枪炮厂，然后渡江攻击武昌，拘禁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及清军统领张彪、吴元煊等。从8月18日起，汉口会党云集，并连日发生大火。这时，因有人告密，张之洞尽悉自立军汉口起兵计划，“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④。他得到了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签发的逮捕证后，于23日清晨，包围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总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璿、瞿河清、向联升、王天曙、傅慈祥、黎科、黄自福、郑葆晟、蔡承煜、李虎生等20余人，先后加以杀害。接着，又大兴党狱，残杀自立军骨干100余人。

汉口失事后，右军统领沈荃即率部发难于湖北新堤。一时湖北蒲圻之羊楼峒，荆州之沙市，湖南临湘之滩头，以及湖北嘉鱼、麻城等地会党，接踵而起，“聚众点名，打造刀械，造制号衣，储备粮食”^⑤。据《中外日报》报道，仅蒲圻境内，即有自立军数千人，欲围攻县城。^⑥但这些部队，都因中军主力已失，人心涣散，稍一接

① 《自立会史料集》，14页。

② 参见《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七日。

③ 参见《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④⑤ 《自立会史料集》，19页。

⑥ 参见《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七日。



触，即行溃散。湖南方面的自立军，原计划与唐才常、林圭同时发动，因湖南巡抚俞廉三事先得知张之洞电告消息，亦先发制人，大兴党狱，捕杀蔡忠浩、唐才中、何来保、姚小琴等百余人。自立军起义，至此全归失败。

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它的会党工作存在严重弱点。首先表现在自立会缺乏一个有效动员和牢固联合会党群众的纲领口号。虽然他们屡次发布的文告表明，要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自立之国”。但这个“自立之国”究竟将是个什么样子？能给广大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带来什么好处？连自立军的领导人也不清楚。从一系列的文告内容看，他们所憧憬的“自立之国”，只是一个在光绪帝统治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权，全然没有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尤其是自立军打起的“勤王”旗号，与会党传统的“反清复明”口号，以及他们起义时的实际要求，都是背道而驰的。^①更有甚者，自立军的领导人一面声称要建立“自立之国”，一面又做出许多保护帝国主义侵略特权的规定，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与会党的“灭洋”斗争大相径庭。由于自立军的纲领没有反映广大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要求，就不可能对会党群众产生号召力量。因此，在自立军起义的过程中，就出现这样的现象：一面是自立军领导号召“勤王”，而会党群众却是攻打官府，开狱释囚；一面是自立军领导严禁杀洋人烧教堂，而会党群众“抢洋关、烧教堂”的事件却屡有发生。

自立会的纲领口号不能有效地动员会党群众，他们的工作主要依靠少数会党头目。即使对这些头目，也主要靠“报名领款”^②的办法把他们拉进自立会，又通过这些人去散发票布，招募会众。这些会党头目，见自立会“富而多资”，纷纷参加；一旦自立会经费支绌，不能满足欲望，他们即离队叛变。果然，后来自立会因康有为的接济落空，“杨鸿钧、李云彪率先离异，辜鸿恩则发‘贵有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③，起义还未开始，内部已四分

① 自立军起义期间，从岳州红教会头目蒋国才身上搜出的《龙头文书》中有“除贼救民、兴中覆外”口号，并有“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的诗句（《自立会史料集》，129页）；大通哥老会头目吴德胜供称，他们的口号是“采灭胡儿，变理阴阳”，并有“人来桃源天下行，采灭胡儿复大明，梁山根本传万代，洪主威名振乾坤”诗一首（《苏报》，1900-08-24）。可见会党反清的宗旨是十分明显的。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5页。

③ 《自立会史料集》，228页。

五裂。

在组织机构方面，自立会虽以富有山堂的名义把长江会党统一了起来，但实际上，各地会党组织仍自成系统。在自立军内，唐才常等虽然掌握了总部和各路军的领导大权，但在起义过程中，具有实际号召力和指挥力的仍是会党头目。特别是自立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仍由会党头目所操纵。从大通自立军统领中还保存四王爷陈英士、八王爷李梅生、七千岁周德芳、三千岁石玉生等名号^①这一情况，就可看出自立会对会党的原有组织并没有认真改造。

会党骨干分子，大多染有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以这种人组织起来的军队，如果不经严格的教育改造，其组织纪律之差，是不言而喻的。自立军起义的过程中，会党纪律败坏的最突出表现是：走漏消息，不听指挥，放纵恣肆，扰害良民。如大通起义即将爆发之际，桐城地界的会党“啸聚数百人，宰牲祭旗”^②，就暴露了目标；起事发动后，会党“劫掠之案层见叠出，良民颇怀隐忧”^③。汉口发难前，唐才常、林圭曾严格规定，部众不得惊动市面，劫杀平民。^④但会党分子却在汉口连续纵火，并泄露欲抢劫汉阳枪炮厂的消息。红教会徒邓某入自立军后，因与泉隆巷某理发匠争吵，被告发捉拿，张之洞从中尽悉自立军起兵计划^⑤，汉口起义遂告流产。同样，常德自立军的密谋，则毁于一个多嘴饶舌的会党头目石竹亭。他“在外张扬特甚，大有逢人遍告之势”^⑥，因而走漏了消息。在起义中，会党分子虽具勇敢斗争的精神，但他们常常“劫财掠夺，噍噍然唯以骚扰为事”^⑦，“劫夺良民者甚多”^⑧，很快就失去群众的支持。从以

① 参见《刘坤一遗集》，1239页。

②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等奏。

③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④ 参见《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五日。

⑤ 关于这件事，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九日《中外日报》记载说：“会匪中有邓姓者，既入新党后，即到处欺凌平民以及其邻人等。有剃发匠某，素与邓善，邓招之入会，匠却之。八月一号，邓至该处剃发，而不照例，竟以小钱作值，匠与之争，遂至决裂。邓告匠云：‘汝之首级已将不保，尚何哓哓为？’匠闻言，遂立将其所有情事告之该处地方官，而邓就获矣。县官以甘言诱之曰：‘尔等守法良民，特为人所愚耳！此吾所深知也，尔可将会党情事详细告我，富贵不难致也。’邓乃一一和盘托出，并将该党羽住处陈明。县官立即遣差侦察，果与邓所言无异，遂立将邓正法以为儆戒。”

⑥ 《觉迷要录》卷4，41页。

⑦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23页，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⑧ 《朝野新谈》（丁），50页。



上情况即可看出，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五、自立军起义在会党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自立军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和影响却是很大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起义，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就迅速让位于革命的民主主义，许多人从这次起义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坚决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关于这一点，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已做过论述，不必赘述。

这里，我想着重从会党史的角度，来说明这次起义的地位和影响。

首先，我认为，自立军起义在中国近代会党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中国内地大规模联合会党进行反清革命的开端。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最早联络会党从事活动的是孙中山和他创立的兴中会。但是，他们所联络的会党仅局限于广东沿海和海外华侨之中，内地的会党基本没有触及。虽然当时孙中山力图向内地发展，曾通过毕永年等人的联系，1899年底召集了广东三合会和长江哥老会的头目10多人到香港开会，实行三方联合，组成了兴汉会，但这个组织很快就烟消云散，没有发挥作用。因此，真正在内地大规模联络会党，应该说是从自立军起义开始的。当然，自立会联络会党的工作，也得到了兴中会的多方帮助。自立军起义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看到了革命的依靠力量；而会党和广大下层群众也由此得到先进阶级力量的领导，开始摆脱自发起义的状态。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连清朝统治者也感到“事变之奇，从来未有”^①。这种局面下的会党斗争，“声势汹涌，迥非开堂立会散放飘布可比”^②。

其次，自立军起义，乃是我国第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群，首次与下层会党群众在反清目标下的初步联合。这种联合，虽然是极不成熟的，但它却是个开创性的举动，当时就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密切注意。俞廉三在一个奏折中说：“大抵此项匪徒中有二等：一系文人，

^①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一日湖南巡抚俞廉三奏。

^② 《刘坤一遗集》，1273页。



皆在各地学堂肄业，及曾经出洋学生，与康有为等交往素密。一系痞匪，即内地旧有之会匪痞徒。”^① 这里所说的文人，就是我国第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群，他们接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自立军的领导骨干，“大半肄业于日本”，接触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进理论。他们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构造邪说，创为自立民权种种妄语”，颇具号召力量。所以“一时儂薄少年，佻达士子，罔弗被其摇惑……沿江各省莠民痞匪，靡然从风”^②。为了“改换中国政府以图自强”，他们决意联络会党。开始不免带有单纯利用会党力量的思想，但经过自立军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的实战，就使他们真正看到了会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从此，他们就开始赞美农民起义，歌颂“义和团有功于中国”，力倡中国革命“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为“革命事业之中坚”。他们所说的下等社会，首先指的是秘密社会，其次就是劳动社会和军人社会。他们认识到，要发动革命，首先必须把这个中坚力量发动起来，而其关键则在社会教育。而对下等社会的教育，首先又必须“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③。也就是说，要通过对秘密社会进行革命的教育和改造，将他们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批近代革命知识分子对会党下层群众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自立军起义的一些幸存者，就普遍面向会党，在各地大规模开展会党工作。而且，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充当了各地会党的领袖。我们以浙江和四川的情况为例：浙江的龙华会领袖濮振声、王锡桐、沈荣卿、张恭、吕熊祥，平阳党（平洋党）的领袖竺绍康、王金发等，都是“学界中人”，有的还是留日学生。^④ 四川共进会会长张百祥、共进会坐堂大爷吴永楫（吴玉章的哥哥），泸州哥老会首领余俊英，井研县哥老会头目王右瑜，江津县哥老会掌旗大爷王稚峨等，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此外，如犍为哥老会舵把子宁子周，灌县哥老会仁字号龙头大爷张捷先等，也都是知识分子。^⑤ 如果考察一下自立军起义以前的会党情况，特别是长江地

①②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俞廉三奏。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408~409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④ 参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见《辛亥革命》（三）。

⑤ 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



区哥老会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各地会党的头目，几乎多由散兵游勇和职业的江湖汉所充当，但是自立军起义之后，知识分子充当会党首领的情况就猛然增多，这是会党发展史上又一重大变化。它与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大批面向会党，寻找革命的依靠力量和同盟军，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自立会在联络会党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也直接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开展会党工作提供了借鉴。如黄兴，“与毕（永年）素投契……而秦力山、唐才常均倚重兴，恒资擘画，及庚子汉口事后，兴以计得全”^①。应该说他与自立军起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自立会联系会党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同盟会成立以前，他在湖南创立了华兴会，大力开展会党工作，采取组织“同仇会”的名义，吸收会党分子。孙武，原为自立军“岳州司令”^②，辛亥革命时期他在湖北以“共进会”的名义联络会党。我以为，他们基本上是仿效自立会以“富有山堂”联络会党的组织形式。又如光复会在浙江开设“会馆”，作为“革命党及会党交通之中枢”^③，也是效法了自立会开设会馆招待会党的办法。再如辛亥革命时期各地革命党人通过会党关系打入新军，策动清军反正等，也是自立会的一条重要经验。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特别是同盟会组织，从自立会联络会党工作的许多缺陷和失败方面吸取了教训，例如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他们联络会党比较注重加强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等等。这样，就使他们更有成效地联合会党群众，并以会党为纽带，沟通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以迎接一场大革命风暴的来临。

以往人们研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只注意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各地革命团体联络会党的活动，很少探讨唐才常等人在自立军起义时期联络会党的活动。其实，自立军起义正是充当了辛亥革命的前驱，它在联络会党、寻找革命同盟军等方面，为后来的革命党人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是很值得加以重视和研究的。那种把自立会联络会党说成是保皇党控制会党、反对革命的意见，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上面的叙述，只是个人的粗浅看法，希望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编，15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②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189页。

③ 《辛亥革命》（一），503页。

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解放，民主共和思想由此深入人心；它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这场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的领导者是年轻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而革命的主力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此，资产阶级能否联合农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通过会党发动农民，使革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革命派囿于联络会党，未直接广泛地发动农民，后来又抛开会党和农民，导致了革命胜利的果实被篡夺。这是辛亥革命不同于别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大特点。所以，研究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对于了解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离合变化，总结这场革命的经验教训，是至关重要的。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不少成果，但许多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例如，革命派为什么要特别重视联络会党？联合会党是否意味着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两者联合的基础以及促成联合的具体条件是什么？革命派与会党达成了什么样的联合？革命派何以不能领导改造会党？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结局如何？本文想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向大家请教。

一、革命派为何重视联络会党

以往的研究，强调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重视联络会党的事



实，但对革命派何以要特别重视联合会党，尚未深入探讨。实际上，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不仅一开始就重视联络会党，而且同盟会还将联络会党列为一项重要政策。^①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受当时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对会党的性质和作用，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发展的状况，做一些考察。同时，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情况，也做一些说明。

会党，是中国秘密社会的一大系统，是封建社会濒于崩溃时期的产物。^②会党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它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和游民。他们结拜这种团体，平时主要为生活互助，但到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时，会党就起着联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作用。会党成员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在斗争中，“骁捷善斗，凶悍异常”^③，起冲锋陷阵的作用。又由于他们与广大农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会党发动的反抗斗争，往往是与农民的要求和推动分不开的。在中国近代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从局部地区的抗租抗粮斗争，到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会党总是联络农民进行斗争的一支活跃力量。

在近代，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日益扩大，会党势力也就相应地飞速发展。三合、哥老诸会，到处开山立堂，“痞滥游民，归之如壑”^④，乡愚“趋之若鹜”^⑤。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党组织已遍布全国：湖南，会匪充斥，“伏莽遍地”^⑥；湖北，“会匪开立山堂，散放飘布，纠结夥党，多者竟至数万，少者亦过数百”^⑦；江西，“凡乡愚无知游手好闲之辈，无不勾引入会”^⑧；安徽，“会匪啸聚成群，纠党滋扰”^⑨；江苏，“泉会

① 参见《中国同盟会总章》第五条。

② 会党并非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在欧洲，有些国家封建农业社会解体时，也出现过会党这类组织。参见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Bandits*, Published by Penguin Books, 1972.

③ 《张文襄公全集》卷32，《奏议三十二》，17页。

④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巡抚德馨奏。

⑤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江西巡抚吴重熹奏。

⑥ 《湖南起义清方档案》，见《辛亥革命》（六），168页。

⑦ 《张文襄公全集》卷98，《公牍十三》，8页。

⑧ 《朱批奏折》，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德馨奏。

⑨ 《朱批奏折》，光绪十六年九月七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声势浩大，党羽众多”^①；浙江，“会党蠢动”^②，“梟匪蔓延，势甚猖獗”^③；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梟会各匪，遍地充斥”^④。华南的两广地区，“无地不匪，大者千余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⑤。西南的云贵地区，处处有哥老会“纠夥结合，歃血放片”^⑥；四川则“蔓延殆遍”，“聚党数十人或数百人，便图起事”^⑦。北方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会党也很活跃^⑧，义和团余众纷纷“投入江湖等会”^⑨。甚至清王朝的心脏地区直隶，“拳匪、土匪、票匪，以及海盗、游勇、马贼啸聚成群，所在皆有”^⑩。据文献记载，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 200 多种，会党名目占半数以上。其中哥老会传布最广，势力最大。“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⑪。“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一处蠢动，处处响应”^⑫。有人估计，当时流入秘密社会者，“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⑬。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近代农民斗争组织形态的发展变化。广大农民愈来愈多的聚集到会党组织之中，进行反抗斗争。所以张之洞说，哥老会在两湖农村，“飘布所到之处，人人起而随之”^⑭。而且地区组织之间渐趋联合，有的地区斗争已连成一片。1891 年长江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面对以上客观事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毋庸置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反对他们，那就谈不

① 《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江苏巡抚陈夔龙奏。

②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五日浙江巡抚张曾敷奏。

③ 《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部右侍郎沈家本奏。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 31，《奏议三十一》。

⑤ 《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

⑥ 《朱批奏折》，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云贵总督王文韶奏。

⑦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四川总督岑春煊奏。

⑧ 参见光绪三十、三十二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光绪三十二年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等呈，光绪二十、二十一、二十六年河南巡抚裕宽、刘树堂、裕长奏，光绪二十六、二十八年陕西巡抚岑春煊、升允奏。

⑨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张曾敷奏。

⑩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

⑪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227 页。

⑫ 《张文襄公全集》卷 31，《奏议三十一》。

⑬ 汤成烈：《治赋篇》，见葛士澹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34。

⑭ 转引自邵循正：《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见《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0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上革命；如果回避他们、抛弃他们，那也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联合他们，依靠他们，并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他们。

列宁说：“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①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很年轻、力量非常单薄的阶级。自它一诞生，严重的民族危机就把它推上了革命的舞台。它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它所面临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封建势力结合而成的强大反革命同盟。为了推翻这种反革命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它更需要联合广大农民，以结成革命的同盟。但是，由于它力量单薄，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中心又在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农村直接发动农民。他们发现，既然会党在以往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既然会党当时的反抗斗争还如火如荼，并联系着广大农民群众，于是他们就把会党视为可以利用和凭借的现成组织，很快把力量集中到联络会党方面来。

由上述可见，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联合会党，既顺乎客观历史的潮流，又出于它自身的要求。

二、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特殊联盟

在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怎样发动农民，与农民结成革命的联盟，这就要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也就是说，首先要取决于该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弱和它革命的坚决程度；同时，还取决于广大农民的影响和推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没有直接去发动农民，但他们联合会党，依靠会党去发动农民。这应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联盟。

史学界曾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他们不能充当革命派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媒介，因而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并不体现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另一种意见认

^① 《列宁选集》，2版，第1卷，6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为，辛亥革命时期保皇党也联合过会党，但不能说保皇党与农民之间存在联盟，由此也就不能说革命派联合会党意味着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①我不同意这两种看法。我认为，如果说会党内存在着大量游民，那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认会党联系农民的作用。一般地说，当时会党中的游民，其前身大多是农民，他们离开农民队伍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之中很多人“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②，他们与广大农民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一旦阶级矛盾尖锐，革命风暴掀起时，他们就会把广大农民群众卷入斗争的行列。近代历史上的会党起义，例如太平天国时期，各地会党起义的队伍动辄数万以至数十万人，其中主要是贫苦农民。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四川袍哥数十万人参加保路运动，“多数是乡下的农民”^③。可见，虽然会党内存在大量游民，虽然会党不是农民组织，但它在联系发动广大农民方面，却起着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各地都是以会党为纽带联系农民的，所以问题不在会党能否充当革命派联系农民的媒介，因为会党实际上已充当着这种媒介；问题在于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能否可以被看做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我认为，如果承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存在过联盟的话，那么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就是这种联盟的体现，此外是谈不上有什么联盟的。

至于保皇党与会党的“联合”，与革命派联合会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然不能说保皇党与农民之间存在什么联盟。这是因为：首先，保皇党“联合”会党，目的在于抵制革命，反对革命（对自立军起义中一些首领人物的思想状况应该做具体分析，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其次，我们说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或者说与会党的联合，当然不是两者任意的简单凑合。它们之间不仅要有联合的政治基础，而且还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不仅要有明确的纲领和政策，而且还要与广大农民首先是会党有密切联系，对他们的实际斗争进行帮助和指导，包括对他们进行革命的组织、宣传教育、武装等方面的工作。当时，除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保皇党是不可能做到的。

① 参见《辛亥革命时期会党问题的讨论》，载《文汇报》，1961-11-1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395页。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274页。



三、资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基础

资产阶级与农民，就阶级属性来说，是根本不同的。但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过程中，前者与后者结成同盟却是常见的事实，因为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具有联合的政治基础。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政治基础，就是共同要求推翻法国封建君主专制、贵族和教会的统治。那么，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实行联合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呢？很明显，这个政治基础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会党）共同要求反帝反封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双方在斗争实践中都已感到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从农民一方来说，他们深受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巨大的反抗力量。但是，长期以来，他们处于自发反抗的状态，无论是由传统的教门、会党组织来发动，还是由太平天国时期的拜上帝会来领导，因为它们都不代表先进的阶级，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所以斗争的结局总不免于失败，因而迫切需要先进的阶级力量来领导他们帮助他们，以改变斗争的状态。如果资产阶级革命派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愿意并主动去联系会党和农民，无疑是备受欢迎的。这一点，是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的。早在1895年，会党头目郑士良就向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① 1899年底，兴中会邀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的联合会议上，会党要求与革命派合作的态度表达得更清楚。会上议定三会结成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会长，宫崎寅藏对这次联合会的重要情节做了这样的记载：“既入（指会党头目进入会场——引者），风貌有古色，实与读书辩论之士异趣。曰：‘世运大开，国情异昔，岂吾党独守故态耶？吾徒之来，正所以乞诸君之教也。’语次，略漏将三合、兴中、哥老会，合而为一，即举孙君为统领之意。且曰‘当今之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吾徒之中，能通外情，仍深属望于孙君，愿待毕君之来共议之’。”^② 我们从

^① 《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原见《宫崎寅藏全集》，第4卷，译文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② 黄中黄译：《孙逸仙》，见《辛亥革命》（一），110页。



会党头目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在社会危机日深、民族危亡在即的急剧变化形势下，旧式会党也感到不能“独守故态”了。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接受先进人物的领导，已成为他们内在的要求。至于广大农民群众，在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之后，许多地方的农民举事就相继打出孙中山的旗号（详见下文），表明他们对革命派的拥护。从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方面说，首先是他们的队伍在迅速扩大。单是留学日本的学生，19世纪末年不过一二百人，到1905年，已达1万人以上。他们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面前，纷纷由爱国走向革命。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来，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连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暴，造成持续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和推动了他们对农民认识态度的转变，不少人开始改变以往敌视农民起义和轻视农民力量的看法。同时，革命派之中有些人，或出身于中下层社会，或因社会动荡自身经济地位下降，对农民群众的生活斗争比较了解和同情。因此，20世纪初年，他们就开始歌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以至主张利用农民的力量进行革命。他们说“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①。他们所说的下等社会，主要是秘密社会、劳动农民。他们开始将农民问题归为“革命的原因”^②，敏锐地觉察到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以至把土地问题列入了革命的纲领。这些都表明，革命派愿意与农民在革命中达成一定的合作和联盟。

但是，怎样将愿望变为现实，革命派将如何着手去联合农民呢？他们看到会党是流行于民众之中的现存组织，且“久已蔓延固结”，具有很大的反抗性，犹如一触即发的火药库，“只待吾辈引火而后燃”^③；同时他们又看到，会党标榜的“反清复明”口号，与革命派的“革命排满”目标是相吻合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会党“与吾党主义无殊”^④，具有“同一排满宗旨”^⑤，仿佛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找到了与农民联合的捷径和桥梁。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许多头面人物和各地的团体，开始都从联络会党入手去联合农民。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408~409页。

② 邹容：《革命军》第二章。

③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277页。

④ 《辛亥革命》（二），541页。

⑤ 《辛亥革命》（四），277页。



四、革命派联络发动会党的过程

应该肯定，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在联络会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革命派与会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联合。

但是，由于各地区革命派力量的不平衡和会党势力的不同状况，由于革命派内部对会党认识的差异，又由于形势发展变化和各地革命派从事会党工作时间先后长短不一，联络会党的成效也就各不相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就革命派联络会党的过程来说，大体可以分为兴中会时期（1894—1904）、同盟会成立前后（1905—1908）、武昌起义爆发前后（1909—1912）三个阶段。革命派对会党主要进行了宣传发动组织联合的工作，目的是想把会党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下面就按三个不同阶段来考察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成效和教训，着重说明革命派何以不能真正领导和改造会党。

（一）兴中会时期（1894—1904）

最早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是孙中山和他创立的兴中会。

兴中会从1894年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组成，十年之内对会党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大量吸收会党分子加入兴中会；二、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三、与广东三合会、长江哥老会搞联合。

兴中会究竟吸收了多少会党分子？目前已不能确知。但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的记载^①，会党成员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兴中会大量吸收会党成员，目的在利用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兴中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就依靠会党头目郑士良等，联络广东沿海的三合会、绿林、营勇，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即1895年的广州之役和1901年的惠州之役。

这两次起义的失败，集中暴露了革命派这一阶段联络会党的严重弱点：第一，没有赋予会党新的觉悟和明确的民主革命目标。起

^① 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25~26页。

义的口号、旗帜和联络暗号，依然是旧式会党的一套，目标也只是建立一个地方性的政府。第二，内部组织很不统一。最明显的是，广州起义时杨衢云争夺领导权；惠州起义时归善县会党竟单独在香港《孖刺西报》发表文告。^① 第三，联络的范围，只限于广东沿海边缘地带。

但是，尽管如此，兴中会率先联合会党，并举行武装起义，还是有很大的意义和影响的。首先，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愿意联合下层群众，决意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同时，也标志近代会党和农民的斗争，开始向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从此，不少地方的农民起义打起孙中山的旗号，佯称“系孙文接济”^②，“附和孙逆，有意煽惑”^③。清朝统治者也感到，此时的会党，已“非寻常会匪可比”^④，惊呼“乱党会匪时相勾结，在在均属可虑”^⑤。而革命派从这一阶段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重要启示，使孙中山认识到，在革命的艰苦年代，坚决响应革命的，“只有会党中人耳”^⑥，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联络会党的决心。还使他认识到，联络会党不能局限于沿海边缘地区，必须向内地发展。1899年兴中会与广东三合会、长江哥老会在香港开会设盟，结成兴汉会^⑦，就是孙中山将工作向内地发展，与南方会党大联合的一个尝试。这些启示，对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大规模开展会党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同盟会成立前后（1905—1908）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各地大规模开展会党工作，是在同盟会成立前后。

① 参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一月三十日广东巡抚德寿奏。

②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广西巡抚黄槐森奏。

③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周馥奏。

④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湖南巡抚岑春煊奏。

⑤ 《宫中电报档》，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新授云贵总督岑春煊请代奏电；并见《辛亥革命》（一），136页。

⑥ 胡汉明编：《总理全集》，第1集，6页，上海，民智书局，1930。

⑦ 关于联合组织的名称说法不一，孙中山说三会“合并于兴中会”（《总理全集》，第1集，924页）；宫崎寅藏说“组成了一个名为忠和党的秘密结社”（《宫崎滔天谈孙中山》）；而平山周说“组织兴汉会”〔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我们认为平山周的说法比较确切。



这一时期，国内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人民急速倾向革命，以会党为核心的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特别是同盟会成立，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提出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为全面开展会党工作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长江地区的会党工作成绩最为显著。因为革命派的力量在这个地区比较集中，会党在这一带势力也最为强大。同盟会成立前夕，光复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在这一带联络会党有较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各地联络会党的步骤大体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调查。主要调查当地秘密会党的系统、分布及其内部状况。这步工作，浙江光复会进行得最为深入。浙江地区的会党系统极为复杂，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有20多个名目不同的组织，山堂林立，不相隶属。为了将它们联成一气，从1904年起，陶成章、魏兰等就开始调查会党情况。他们走遍浙江金华、衢州、严州、处州、温州、台州六府。陶成章“蓬头垢面，芒鞋日行八九十里”^①。经过跋涉奔波，“六府秘密会党之情形尽为成章等所探知”^②，“于是各府会党纠合为一矣”^③。

第二步是宣传教育。主要靠“多运革命书籍，传布内地”^④。当时最流行的宣传品有《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还有《国民报》、《浙江潮》、《新湖南》、《四川》等刊物。各地还刊印一些本地革命派的著作，如浙江刊印了熊嘉熬的《新山歌》，湖北刊印了吴保春的《孔孟心肝》。经过革命派的散发传布，“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社会矣”^⑤。革命派宣传的中心思想是“革命排满”。陶成章说，他们所到之处，“皆登台演说人种之分，民族之说”^⑥。同盟会员余俊英，在四川“日持书于城乡间讲演，听者如堵”^⑦。他们宣传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将会党从“仇洋主义”统一到“排满”目标之下，即“易其排外之心，尽化为

① 许寿裳：《章炳麟》，39页。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

③ 张篁溪：《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见《辛亥革命》（一），522页。

④ 陶成章：《浙案纪略》。

⑤ 同上书，35页。

⑥ 同上书，23页。

⑦ 《泸县志·人物传·余俊英传》。

排满”^①。

第三步是组织联合，就是要把分散的会党纳入一个统一组织，并置于革命党的领导之下。这是最困难的一步工作。革命派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了多次尝试。光复会在浙江，最初开办“会馆”，作为革命党与会党的联系中心。后来又开办大通学校，招收会党头目入校练习兵操。规定入校学生都是光复会的会员，毕业后受光复会统辖和节制。后来秋瑾“改约束，颁号令”，将光复会职员分十六级，由徐锡麟、秋瑾等任首领、协领，分统以下全由洪门首领担任；又将会党编为八军，并制定了光复军军制。总之，他们仅将会党原有组织略加变通，就吸收入光复会，以迅速扩大其势力。华兴会在湖南，则采取组织“同仇会”的名义，吸收会党加入。他们“仿日本将佐尉军制”^②编制，由黄兴任大将兼同仇会会长；刘揆一任中将，掌握军事事务；由洪江会头子马福益任少将，专掌会党事务（实际操纵会党指挥权）。浏阳等地哥老会加入同仇会者达10万之众。^③革命派通过这些组织形式，虽然与会党达成联合，但实际并不能有效地领导会党。每到紧要关头，就组织涣散，指挥失灵。1904年长沙起义计划失败，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1907年光复会在浙皖起义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陶成章说，他们“与诸会党结合”，不过是“助其焰而扬其波”^④而已。

这种局面，在共进会联络会党的过程中也没有改变。共进会联络会党的最大成绩，是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各大会党的山堂香水做了统一，使它们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但是，共进会对它们并不能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各派会党仍按原来的系统和自己的堂口进行活动”^⑤，组织散漫，号令不一。突出事例之一是，1908年湖北共进会吸收会党，编成五镇军队，因“各镇会党兄弟意气用事，不从命令”^⑥，结果起义相继失败。

① 《辛亥革命》（三），25页。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中也说，经革命派宣传，会党“仇洋主义转以消灭”。这些说法似有夸大之处，实际上，1904年以后浙江等地还屡有会党反教会侵略的“教案”发生。参见《北华捷报》，1905-03-07、04-07，1905-08-04；Mary B.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p. 131。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53页。

③ 参见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86页。

④ 陶成章：《浙案纪略》。

⑤ 吴玉章：《辛亥革命》，95页。

⑥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506页。



革命派联合会党，经过多次的努力而不得要领，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有人就主张“改弦更张，别图良法”^①。1908年之后，不少地方的革命派就将工作的主要目标移注于新军。

（三）武昌起义爆发前后（1909—1912）

以往有一种看法，认为1908年以后，革命派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新军，会党工作就此沉寂下来，似乎会党的地位也就降低，以至不再起重要作用了。这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我认为，1908年以后的二三年中，不少地方的革命派工作重点移注新军，但是会党工作并没有因此沉寂下来，会党也没有因此失去它的重要作用。实际上，1908年以后，革命派在更多的方面、更大的范围开展会党工作，构成这一时期革命派联合会党的一个新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革命派联络新军仍然离不开会党。因为新军许多是穿上军装的会党分子。正如共进会头目邓文翬所述：“清末凡常备军巡防营以及警察、新军各色人等，若属于各党各派分子方好立脚，如两广军队内的三点、三合会；长江上下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孝义会，山东、陕西的八卦、大刀会，河南、河北的红枪、天地会等，军队兵士均是此类分子居多。”^② 会党分子在军营的比例，据记载江西“军营官兵数逾七成”^③，四川“从队长到伙夫，十之七八都是袍哥”^④，由此可见一斑。因此，革命派联络新军也多以会党为纽带。湖北共进会联络新军是以联络其中的会党分子为主，采用换帖拜把方式灌输革命思想；陕西同盟会与新军中哥老会头目是通过歃血订盟达成联合的；广东则由会党同时“混入军营，暗中勾结”^⑤；至于四川的保路同志军和各地的民军，革命党人更是以会党为纽带进行联络和领导的。这样就增加了革命派会党工作的方式。

其次，1908年以后，由于全国各地农民群众反抗斗争次数迅速

①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

② 邓文翬：《共进会的起源及其若干制度》，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17页。

③ 《宫中电报档》，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江西巡抚吴重熹致军机处电，见《辛亥革命》（二），502页。

④ 李劫人：《大波》，第一部，124页。

⑤ 《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四》。



增加，范围日益扩大，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革命派在全国各地更深入更广泛联络会党，扩大革命势力。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四川、湖南、陕西、贵州等省，与会党达成了全国范围的联合，其中以四川最为突出。同盟会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以会党为纽带，以保路同志军为组织形式，与农民建立了反清革命联盟。在大多数地区，革命派一般与一州一府或一县的会党取得了联系。在革命派的联络和影响之下，北方的在园会、干草会、刀会、理门等组织，以至青海的黄会、新疆的哥老会也都被动发动起来了。可见，这一时期革命派联络会党的地区和范围，比以前要广泛深入得多。

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的全过程，可以看到，革命派通过大量工作，与各地会党达成了不同程度的联合。旧式会党在与革命派联合的情况下，在斗争目标、思想认识、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有所进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只是初步的松懈的联合。革命派始终没有能真正领导和改造会党。

为什么革命派不能真正领导和改造会党？问题的关键何在？我以为关键就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由于它的软弱，就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就不可能领导会党和农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做坚决的斗争。由于它的软弱，就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也就不可能对会党这种落后组织进行革命的改造。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① 我们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联络会党过程中，既不能领导会党与农民向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做坚决的斗争，又不能给予会党和农民实际的物质利益。他们的宣传只是突出反满，固然这种宣传当时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但是，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归结为反满，确实过于简单化了。这样，既没有指明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人民的头号凶恶敌人，以提高会党和农民群众的民族觉悟；也没有指明整个封建势力（包括汉族地主阶级）是人民另一个凶恶的敌人，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为了反满，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派从会党的“反清复明”口号去找共同语言。其实，“反清复明”在会党斗争史上只是一句空洞口号。会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斗争中，总是有反映实际要求的具体战斗口号的。例如，在近代，随着外国侵略者侵入中国，中国人民开始了反侵略斗争，会党是反侵略斗争的突出力量。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害怕刺激帝国主义列强而引起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他们不但不敢在自己的政纲中明确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而且对会党的“仇洋”、“仇教”反侵略斗争极力限制。又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虽然革命派将土地问题列入了他们的政纲，但只是含糊的不切实际的口号。而当会党和农民群众围绕着土地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实际要求时（如在四川保路斗争中“要求从此不纳粮税”^①），革命派不但不加支持，反而惊慌失措，力图加以制止。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和斗争的坚决性方面，与会党、农民群众有很大的差别。由于革命派不能彻底反帝反封建，他们就不能对会党和农民的斗争实行领导，所以他们与会党的联合始终貌合神离，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另外，从会党本身来说，它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组织。但是，它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到清末，它已成了广大破产劳动者、游民赖以生存的团体。它在全国各地形成了网状组织，城市和乡村、水陆交通码头，都设立组织，山堂香水，自成系统。在清朝常备军巡防营以至新军各部，会党也有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以联系掌握他们的兄弟”^②。这种组织既有很大的反抗性，又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革命派是不能原封不动地依靠这种组织的，而只有在革命过程中积极引导，并在组织上进行革命的改造，才能使它成为积极力量。但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出于革命的急性病和单纯利用会党的动机，同时由于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组织，所以对会党始终没有进行革命的组织改造。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与会党联合，他们都迁就保留了会党的组织系统。例如，光复会在浙江联合会党，工作做得相当深入，但会党却不愿无条件地脱离原来的组织系统去加入光复会。后来陶成章等“反复商量了几次，规定会党成员入光复会者，所有会党口号、暗号，各家名教一切仍其旧，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这样，会党

① 《录副奏折》，宣统三年七年二十七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奏。

② 《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五），107页。



顾虑消失，毅然参加”^①。结果，革命派除了联络会党的少数头目，或者在联合组织中空挂几个首领名目之外，实际上并不能领导和控制会党。《浙案纪略》载，“凡会中兄弟一闻猛伍哥命，市者无不即弃筐筥，耕者无不即弃耒耜”^②，这指的是浙江龙华会首领徐顺达在会中的号召力。对会党的这种号召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无论是光复会的首领还是同盟会的领袖，都是不具备的。

当然，真正要改造会党组织，解决会党问题，是不容易的。只有在革命的农民运动兴起，民食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到那时，“‘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③。这一点，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办不到的，但又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五、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马克思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④。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领导和改造会党，但并不排斥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组织群众，不断发动斗争，为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创造条件。从1901年到1910年，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发生了近1000次。据有人统计，这些斗争很多是由会党这类秘密社会发动的。^⑤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派就加紧联络会党和酝酿起义，又推动革命潮流迅速走向高峰。所以，归根结底地说，如果没有会党不断组织群众斗争，辛亥革命要迅速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积极参加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

① 沈懋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135页。此项规定，在陶成章拟订的《龙华会章程》会规第四条，也有同样的记载，参见[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125~126页。

② 《辛亥革命》（三），65页。

③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⑤ 参见C. K. Yang, “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的发展。从1895年孙中山发动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几乎每次武装起义都离不开会党力量。此外，孙中山还多次派人从海外运入武器，以会党为内应，但大多被破获而“未遂其谋”^①。

(三) 在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最后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往对会党和新军在武昌起义辛亥光复时期谁是主力的问题有过争论，我以为这是很难截然区分的。因为各地的情况很不一致。有的省新军起了主要作用（如湖北），但也离不开会党；有的省主要靠会党力量（如湖南、陕西），但又离不开新军。总的来说，会党和新军是辛亥革命的两支基本队伍，在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会党的作用来说，是很明显的。在武昌起义前夕，四川哥老会在保路运动中，“众兄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②，保路同志军起义的胜利，为武昌起义作了前导。武昌起义一爆发，鄂北襄樊一带江湖会立即起义响应；湖南首告独立，“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焦达峰任都督之后，湖南成了“洪家天下”^③；陕西独立后，“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上”，“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④，陕西变成一个“会党世界”^⑤。其他各省也都发生了规模大小不等的会党和农民起义，直接推动了当地的光复独立。

(四) 海外洪门会党（其成员与国内会党成员已有很大不同）在募捐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变产赴义^⑥），为支援革命做出了贡献。

当然，对会党的消极作用是不应该忽视的。由于革命派不能改造会党，会党的一些固有弱点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也充分暴露了出来。最突出的是分散主义和盲目破坏性，给革命造成了损失。但是如果两者相比较，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

但是，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只满足于推翻清王朝。清帝退位以后，他们认为天下大定，就不再依靠会党和农民群众去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反而去跟旧势力妥协，掉转头来反对和镇压会党与农

① 《陆军部档》，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七日端方奏折所附《段澧供词》。

② 寇梁卿：《蜀路风潮记》上册，33页。

③ 子虚子：《湘事记》，见《辛亥革命》（六），155页。

④ 张奚石：《回忆辛亥革命》，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154页。

⑤ 郭希仁：《从戎纪略》，见《辛亥革命》（六），78页。

⑥ 参见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台北，自由出版社，1967。

民群众。原来他们靠会党的支持，在各地掌握了部分政权，现在他们却一脚踢开了会党。武昌起义后两年内，他们在四川、陕西、贵州、江西、两湖、两广、江浙等地镇压会党和农民起义，杀害了李绍伊、李秀昂等许多会党领袖。原来他们高喊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是当农民起来抗租，劫富济贫，把矛头指向“殷实富户”时，他们就立即镇压。共进会头子刘公镇压湖北江湖会起义^①，同盟会要员无锡都督秦毓鎔镇压千人会起义^②，就是典型例子。这样，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就完全破裂，会党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全没有得到好处，这是辛亥革命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之一。



① 参见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

② 参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

论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 会党关系的破裂

翻开民国初年的报纸，不管是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喉舌，还是激进派革命党人的机关报，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声疾呼剿办“会匪”的论调比比皆是。对于前者，人们还易于理解，因为他们从来就是仇视会党和下层人民群众的；对于后者，则不免感到有些突然，因为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一直将会党视为革命的一支有生力量，并以多种方式联络发动会党起来革命，而会党也积极响应、乐而从之。在革命党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中，可以说没有一次不与会党有关，而且多以会党为主力。谁知，清王朝覆灭、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对会党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由联合会党迅速地转为取缔乃至镇压会党，他们眼中的会党就由革命的同盟者变成了“不肖分子”^①。为什么民国一成立，革命党对待会党就一反常态？他们在取缔镇压会党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方式？民国初年会党的表现和作用如何？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关系的破裂说明了什么？下面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革命党对会党态度的急剧转变

武昌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史上是一个根本转折点，它不仅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和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诞生，而且也孕育着革命党与会党关系破裂的危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统治结束的钟声，各地会党、绿林大为活跃。湖南的会党率先起来响应革命，“衡岳以南，伏莽遍地，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10月22日，湖南

^① 《时报》，1912-03-05。



宣布独立，洪江会头目焦达峰出任都督，湘省就成了“洪家天下”^①。江西“平江红匪闹湘省恢复，怦怦欲动，倡言杀官焚署，烧劫官钱局银钱，知县钟君及土膏督销、巡警各局人员，均闻风逃溃”^②。与湘省同一日独立的陕西，会党充当了主力，哥老会群众，“一经号召，蜂起尤多……一时泉涌风发，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关中四十余县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举”^③。其他如两广、福建、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一些会党、绿林也多纷起响应，协助革命党推翻各地的清政权，迅速促成各地的光复独立。在革命高潮时期，由于革命党仓促应战，力量不足，一时无法控制会党和工农群众的行动，他们对会党便普遍采取笼络、利用的态度。对于革命进程中出现的某些棘手问题，有时还不得不依靠会党的力量来解决。例如四川，“当时政治权力及军事组织既一时无法树立，只有赖哥老会听命于军政府，发挥其潜力，利用其帮规”，因此，“正副都督尹昌衡、罗伦不仅倡导于省城内外遍设公口，而且还亲自参加”^④，并设宴招待哥老会首领，请其协助稳定局面。

但是，等到各省宣布独立，革命党掌握了几乎全国政权后，他们就立即决定取缔会党、镇压会党了。据我们所知，1911年12月中旬，江西军政府首先发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布告》^⑤，紧接着，在1911年12月30日，即十七省代表会议公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江西都督又发出一个取缔会党的文告，声称：“现在汉族光复，响应者已十有八省，凡属民军皆我同族”，“嗣后……所有前项各会应刻日一律解散，并将票布自行销毁，不得稍有私藏，否则甘为匪人，决不宽大”^⑥。此后，这类告示日有所出，各地军政府还辅以遣散、改编、镇压的实际行动。

如何理解革命党这种“晴转阴”的态度？这就要从革命党与会党联合的基础，以及他们的革命要求、对革命的认识等方面谈起。

① 子虚子：《湘事记》。

② 《民立报》，1911-12-05。

③ 《西北革命史征稿》（上），39页，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④ 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见隗瀛涛等编：《四川辛亥革命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⑤ 载《申报》，1911-12-15。

⑥ 《民立报》，1911-12-30。



辛亥革命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所面临的敌人是相当强大的，而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中下层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却特别弱小。因此，从革命一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想从下层群众中寻找依靠力量。但软弱的革命党人又不敢直接去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他们想通过流行于民众之中的会党去联合工农群众。他们看到，会党在下层群众中有深厚的根基，且“久已蔓延固结”^①，同时又看到会党经常标榜“反清复明”，这就使他们感到“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吾党主义无殊”，“应联络以厚势”^②。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党与会党的联合，只是建立在狭隘的“反清”、“排满”基础上。

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的认识和要求来看，应该说，他们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的要求，但又缺乏决心和勇气。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头脑中只有“排满”二字，认为阻止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是腐朽的卖国的清王朝，只要推翻了清政府，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③武昌起义的胜利和民国的迅速建立，对他们来说，有点出乎意料，格外感到心满意足。在这样的胜利面前，许多人不再想依靠会党和工农群众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而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而想急于结束这场革命。因此，他们就把原来在革命中充当主力的会党和工农群众一脚踢开，转而跟旧势力握手言欢，来共同“维护秩序”。我们看到，湖北军政府刚一成立，就做出规定、发布电文，对各府县“旧治官吏”，“颁给民国新印，即留原任”^④。并要各府县“以警政、民团为第一要着”，着即兴办团练以“维持秩序，清查奸宄，惩治痞匪，保卫闾里”^⑤。这个兴办团练、维持秩序的规定，是针对当时湖北各地会党和农民群众起来响应革命，进行抗租抗粮斗争而做出的，可见他们所要维护的“秩序”，实际上就是封建的旧秩序，就是要让地主豪绅继续统治、压迫人民的秩序。我们又看到，就在民国成立的第三天，资产阶级的喉舌《申报》就发表评论说：“今日者总统莅任，大局初定，从此绥定安集，地方秩序之恢

① 《辛亥革命》（四），277页。

② 《辛亥革命》（二），541页。

③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6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

④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76页。

⑤ 《谕湖北各府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见《辛亥革命》（五），139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

复不难立恃，惟尚有一事为近今眉睫之大患而足以扰乱社会秩序者，则乡民纷纷抗租是也。……其阻碍政治之进行关系匪浅，有民政之责者，当其防范而消弭之。”他们把各地农民纷起抗租，视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眉睫大患，要各地的民政官加以防范和消弭。可见，这时他们的斗争矛头所向，已不是封建势力，而是农民群众了。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时，发生在湖北襄阳一带的江湖会起义，发生在江苏无锡、常熟、江阴三县交界由千人会领导的农民抗租起义，和上海附近青浦、南汇、昆山一带的“闹租风潮”，发生在江浙的“素食抗租”运动，发生在山西长治、高平、沁县一带农民发动的干草会运动等等，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党宁愿与地主阶级站在一起“维护秩序”、“保护财产”，也不愿满足“自军兴以来皆有均摊贫富思想”^①之贫苦农民的一点要求。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看来，既然反满目的已经达到，既然目前任务是维持社会秩序，那么原先由于反满需要而联合过的会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们就在各种报刊上大造舆论，准备向会党开刀。1912年2月6日，《神州日报》载文说：“今东南各省大局已定，孙大总统即位……民等积恨已消，祖宗之奇仇已报，普天之下莫非汉土，率土之滨莫非汉民”，因此“不得再存会党名目”。“倘有会内无知之徒不明大义，复称洪江名目，设立山堂，私卖票布，则严加惩处，以绝根株”。同年4月12日，该报又发表文章说：“今日足以为中国前途之隐忧者，军队问题外则会党是也。自各省军兴以来，共和党人欲收速效，于运动军队外则以运动会党为目的，其策略虽获售，然向日赖以成事者，今则亦因之而败事。如赣、如蜀、如黔皆成会党势力范围。……长此不治，则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会党世界，而黄巢、李闯王之祸行复现于今。”因此，他们大声疾呼：“今日各都督对于此辈唯有萃集重点，群聚不逞之徒，分别首从而以严刑峻法治之，并明布文告，凡今以往再有以会党之名开堂放票、敛钱惑众者杀无赦。”他们认为这样“庶几或有挽回之日，如其不然，长此以往，养痍貽患，则吾恐不待他人之我分，而吾周围先已不可救矣”。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害怕广大工农群众起来后将无法控制，中国就将成为会党世界，黄巢、李自成式的农民起义将重新出现。因此，他们就要联络旧势力来对付会党，以

^① 《神州日报》，1912-03-08。



“严刑峻法”来镇压会党。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评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时指出：“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①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对会党态度的急剧变化，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个阶级的劣根性。

二、取缔镇压会党的几种方式

武昌起义和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党对会党，总的来说是采取取缔镇压态度的。但是，由于各地会党力量的强弱不一和表现的不同，由于革命党人各自的认识、所处的地位以及与会党关系的不同，各地军政府对会党的处理方式也就各异。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断然进行武装镇压。这主要发生在武昌起义后会党继续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粮起义的地区。革命党人以“维护秩序”、“保护财产”的名义，出动武装进行镇压。如无锡都督秦毓鎰镇压无锡、常熟、江阴的千人会起义，湖北军政府北伐招讨使、总指挥季雨霖、刘公镇压襄阳江湖会起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通过遣散、改编和武力镇压相结合的方式取缔会党。这主要用于对付在光复中建立起来的公口、临时招募的民军、民团，如广东、江西等省。广东原是会党势力最强大的省份之一，以胡汉民、陈炯明为首的军政府，在武昌起义后，主要依靠十几万民军（其中大多数是会党分子）的力量，在光复过程中稳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在1911年11月9日广东独立后不久，胡、陈即着手排斥打击会党。先是以“整编”、“节饷”为名，压抑民军，接着是分批遣散民军，当时《民立报》曾报道，陈炯明“无日不以裁制遣散民军为念”^②；最后就武力镇压。1912年3月，他们先向王和顺的惠军发起进攻，同时打击“仁”字、“协”字两军，这支盛极一时的广东民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陈炯明等镇压在血泊之中。^③ 江西的情况与广东相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74页。

^② 《民立报》，1912-03-16。

^③ 参见《神州日报》，1912-03-29。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似，江西宣布独立后，军政府“以民团为保安，不过暂时而已，现大功告成，即可取消”，但考虑到“民团均系一班会党中人，光复时与有力焉，倘一时遣散，恐难以贴服，于是议改归标部，以免滋事，妨碍地方”^①。但改编解决不了难以服帖的会党，江西境内仍是“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②。因此，李烈钧下车伊始，就提出“欲治赣，必先清匪”^③的口号，并“严率所部，诛其枭杰，汰其残余，抚其老弱”^④，才把江西的会党、民团势力压平，“地方秩序渐次恢复”^⑤。

（三）先利用会党的组织形式稳定政局，然后对会党进行取缔镇压。这主要发生在会党势力强大并在光复中掌握了军政大权的省份，如陕西、四川等地。陕西光复以后，在军政府中，除大总领外，其余要位如“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⑥。革命党人只能隐忍等待时机，他们先请湖北方面派军队入陕驱除哥老会，未遂，旋即诱胁张云山“限制码头”，继而又“改码头为民团”，再进一步就“裁撤码头”，最后，“遂由六都督令衔出示取消……又设法调赴前敌助战，其罪大恶极者陆续严法惩治数人，而码头之根乃拔除”^⑦。在四川，哥老会的势力十分强大，军政府成立后，“尹（昌衡）被推为都督，罗伦副之，周骏任军政部长，杨维任巡警监。尹、罗等以同志军难以控制，特设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罗、周、杨皆为大汉公掌旗大爷。城内各街、各警署也都打出公口招牌。同时，还在各路哥老会头目中，选出资格较老、仁字排行的五哥若干人任大汉公五哥，专门联络各路哥弟。”^⑧后来，尹昌衡见局势稍定，即通过整编军队，将各路同志军改编为川军第二师，并拉拢一些哥老会头目，鼓吹“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将川西数十万同志军遣归乡里”^⑨，同时将成都 200 多公口的招牌一律取消，对一些不肯放下武器的哥老会会众，则用武力镇压。

（四）革命党人执政后，对会党迁就接应，立宪党人遂借口发动

①② 《民立报》，1912-03-09。

③ 《李烈钧自传》，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355页。

④⑤ 《民立报》，1913-02-09。

⑥ 张奚石：《回忆辛亥革命》。

⑦ 郭希仁：《从戎纪略》。

⑧ 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三），109页。

⑨ 王蕴滋：《同盟会与四川哥老会》，见《辛亥革命》（三），222页。



政变，同时屠杀革命党人和会党。这主要发生在湖南、贵州。长沙光复后，焦达峰、陈作新担任了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他们主要依靠会党和新军的支持，焦达峰在洪江会中充任“龙头大哥”，有很大的实力，据说只要他向湖南各地洪江会的“龙头”发个通知，“便能得到十多万人的声援”^①。据目击者回忆，焦达峰当政以后，会党群众众多“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②，都督忙于接应，几至无暇办事。立宪派便乘机制造焦“蓄意黜退旧伍，代以会匪”^③，即裁撤新军、重新建立洪江会军队等谣言，借机杀害了焦达峰和陈作新，随即向会党开刀。贵州方面，辛亥革命成功后，以张百麟为首的自治学社成了执政的主要力量，他们想方设法酬答哥老会的勋绩，“改善哥老会众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④。立宪党人便勾结滇军刺杀了自治学社的钟祚昌和巡防营总统黄泽霖，并谋害张百麟等，贵州自治学社和哥老会组织很快就被消灭。^⑤

（五）通过将会党改组成近代政党，以融化和消灭会党。这主要以1912年的中华民国共进会和社团改进会为代表。中华民国共进会是由洪帮、青帮和公口三家帮会联合，于1912年7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应夔丞担任会长。按照哥老会头目张尧卿的说法，三家合而为一，原想“协同共济，振足精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⑥。但是，此会成立以后，因江浙的会党纷纷打起它的旗号，扰乱社会秩序，很快就被查禁。^⑦后来青红帮头目张军吾等致电袁世凯，要求“另立民国共和会，改章取缔成完全民党”^⑧，但因二次革命的爆发，此事也就烟消云散了。

社团改进会是1912年由谭人凤、陈犹龙、徐宝山发起的。按照《社团改进会草案》规定，该会的宗旨是“改良旧有秘密会党，维持

① 阎幼甫：《关于焦达峰二三事》，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三），212页。

② 《文史资料》，第34辑，134页。

③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

④ 胡青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三），478页。

⑤ 参见萧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三），464～465页。

⑥ 《神州日报》，1912-07-04。

⑦ 参见朱瑞：《解散共进会示》，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⑧ 《神州日报》，1913-05-16。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地方永久治安”。它主要吸收旧会党分子入会，“凡属洪家兄弟姐妹”，“凡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凡仿行洪家宗旨……之团体或个人”，均得为会员。在组织机构方面，废除旧会党的体制，采用近代政党的制度，设总理、副总理，以及干事、评议等部。^①从这些公开规定的条文来看，谭人凤等发起社团改进会的目的，似乎想通过组织近代政党的途径来“改良”会党。但实际上是要取缔和消灭会党。这在他们致内务部警政司的呈文中说得很清楚。呈文一开头就说：“吾国社会夙称复杂，而纠结盘踞足以为国家和平之障碍者，尤莫如会党”，接着指出：“今共和成立，五族一家，种姓之观念已消，而秘密之机关尚在，徒党既众，良莠难齐，目的一差，祸机将烈，禁之则法令难于遍及，听之则不戢，必致自焚，载舟覆舟，可为深惧。”继而表明：“人凤等奔走国事十有余年，深知此辈性质，刀锯所不能威吓者，可动之感情；法律所不能防维者，可化之以道德。诚使纳之正轨，导以生计，以联络为同化之具，寓解散于归并之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不特可祛隐患于将来，且可慰遗民于地下。用是不自揣量，发起一会，定名曰社团改进会，拟暂就上海地方设立事务所，并次第于各省设立分会，专为化除固有秘密会党。”^②这个呈文，道出了谭人凤等人的心里话，表露了他们想通过社团改进会来归并会党、解散会党的本意。可见，“化除固有秘密会党”，“寓解散于归并之中”，这才是谭人凤等发起组织社团改进会的真实目的。

社团改进会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党打击排斥会党，与工农关系恶化，以及拼凑组织政党，热衷于争夺权位，政治上迅速倒退的总趋势；同时也反映出像谭人凤等与会党关系密切，依靠会党起家的人，在民国初年追求个人官职和利禄的斗争中，继续利用会党的个人企图。他们在《社团改进会发起意见书》中，大谈洪门的光荣历史与洪家兄弟在建立共和斗争中的功绩^③，正是为了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捞取政治资本。

以上一系列取缔镇压会党的事件和手段，是在武昌起义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发生的，其中有的是革命党单独干的，有的是革命

① 参见《社团改进会草案》，载《历史档案》，1982（5），38~41页。

② 《谭人凤等致内务部警政司呈》，载《历史档案》，1982（1），36页。

③ 参见《历史档案》，1982（1），36~37页。



党与立宪派、旧官僚合伙干的。这些事件的发生，就导致了革命党与会党联盟的全面破裂，表明资产阶级与工农关系的迅速恶化。

三、民国初年会党的表现和作用

上面我们只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阶级局限性分析了革命党与会党关系破裂的原因和经过，人们还会问：这种关系的破裂，会党有没有责任？民国初年会党的表现和作用如何？这些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做出回答的。

会党本是以破产劳动者为主体的民间秘密结社，它平时主要为实行生活互助，但在阶级斗争激烈时，它就起着联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作用。但是，会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团体，历史证明，依靠它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的，只有接受了当时的先进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斗争才有明确的目标，并发挥积极作用。在辛亥革命时期，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积极联络和宣传教育，虽有不少会党首领（如广东的王和顺等，后来加入了同盟会）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对民主共和有比较完整的认识，但就大多数的会党群众来说，他们对民主共和之真义是不了解的。他们在武昌起义后，也错误地认为，起义成功，就万事大吉，可以随心所欲了。于是飞扬跋扈、破坏社会秩序之事时有发生。如湖南是受革命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那里的会党在“反正以后……金谓共和时代开会结社，人民可以自由，遂明目张胆，遍布乡间，拉人入会，掳掠村庄”^①。这对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来说，是很不利的。因此，对民国初年会党的表现和作用，必须做一番具体分析。

从民国初年的报纸和当时革命党人的著述与回忆录来看，会党在民国初年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继续在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抗租抗粮抗暴等斗争。如浙江省钱塘县“各田主因政事部准收半租，分派门客四出严追，致起反抗，帮匪地棍从中煽惑，聚众至四千余人，为首之赛宋

^① 《民立报》，1913-03-26。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江，辄取造旗运械，意在大举”，“近又组织保护会，钤令各村自集壮丁编练成队伍，统辖于某党首，无事各保疆界，有警群听指挥”^①。山西浮山的洪汉军，于1912年8月攻入县城，烧掉县衙门的钱粮簿，将县衙的钱粮分给贫苦人民。^②类似情况，全国各地多有发生。

（二）居功自傲，与革命党争权；扩张势力，危及乡里。会党在光复中颇有功劳，也正因为如此，它有了要挟的资本。最突出的现象在陕西。“会党中一般人即以为纯系会党之功……气焰嚣张，一日千丈”，“除了大统领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上，军队所发布之命令，都必须盖上会党的印戳方才有效”。革命党想通过整编新军来掌握军队，但会党拒不从命，军政府只好按会党原有系统来编，但主要由会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来指挥。他们还广设码头，“除北山外，其它各州县十之七八皆有码头，不能悉计”，他们“办支应，理词讼，直代县官行政，甚至公然以地方主人自居，鱼肉良懦，苛派钱款，乡民畏惧，直似满人入关时驻防，同志见此情形，莫不扼腕叹息，不意闹成会党世界”^③，“大家都认为革命失败了”^④。这对新生的革命政权、对人民生活的安定无疑是一种威胁。

（三）帮会成为不法势力之护符。此类情况屡见不鲜。如福建建宁，“凡有不法行为，均藉会匪为护符，地方官多不敢问”^⑤。安徽霍邱刘竹夫与青红帮大爷田老七“同恶相济，公设香堂，无论何人，一入门坎，便有势力，桀骜者借以收徒以取财，无赖者作护符而肆暴，数月间入帮者四千余人。……日则沿街设赌，夜间不问可知……乡间抢劫频闻”^⑥。

（四）或毗省联络，或渗入军队图谋大举，但无政治目标。武昌起义前，各地会党间的联络大多通过革命党；民国以后，会党自发地联络举事的现象颇多，尤其在川黔滇、闽赣、湘鄂等会党势力活跃的地区。如云南会党头子秦吉五“暗谋大举，又恐势不敌，遣人前往联络匪徒，又派人前往川黔勾结两省匪徒来滇作乱，定于×月

① 《申报》，1912-01-05。

② 参见民国二十四年《浮山县志·兵氛》。

③ 郭希仁：《从戎纪略》。

④ 《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⑤ 《民立报》，1913-08-10。

⑥ 《民立报》，1913-01-05。



×日举事”^①。湖南永城府南乡顺德村地方“有巨匪李琪、李金彪，无恶不作，抢劫掠夺，近更招集黔省会匪希图大举”^②。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可能因为光复后会党公开过一阵，各地会党彼此间的了解有所增进；另一方面因为革命党的“严加剿办”，使他们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

武昌起义以后，会党成员被各地军政府大量招入军队，他们在军队中有的仍按会党系统活动；有的甚至发展组织，图谋暴动。当时会党渗入军队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如江苏之九龙山，“在江北素有势力……而现今驻江北之军队最高长官即为此种社会之领袖，并有云张勋亦联络此会者”。“且现经记者调查，于某种军队中，自连长至排长皆其党羽，而炮兵之营部亦有匪存乎其间，其约定起事军队，行走口令为一二一，指一月二十一日举事也。”^③

(五) 仍打着旧式旗号，如“皇帝”、“扶清”之类，图谋推翻民国政府。在民国以前，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率领人民反洋教而闻名的余栋臣，在民国以后，“啸聚党徒数千，自称‘忠勇将军’，倡扫除新政、恢复大清言论，禁剪发，免厘税，跨州连乡，煽动连合……且勒派军资，搜括军火数县，骚动纷纷”^④。安徽的大把子香会，“实系洪帮改组，其宗旨全为图谋不轨，反对共和”；“该党头子刻有伪印，上书‘黑龙山大皇帝’等字样”；“寿县各地军人入者已多，正阳某军队有全体加入之说，即从前青帮亦并入该党”^⑤。

(六) 会党在民国以后最大的表现是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黔省遍开公口，匪党横行，掳掠奸淫，全省靡烂……盖匪势益张，民生且蹙，商不得归市，农将失时，学堂尽变山堂，军府都成盗藪，方且日夕密谋，大举劫掠，洗富室以饱囊囊，焚贫户以牵救护。”^⑥广东增城三会合“乘革命军兴，地方政权废弛之际，大肆抢劫，附近居民被惨杀者甚多，商民相率退避他处，匪党强迫人民入会，惨杀掠夺，日有所闻，民居被焚者数百户”^⑦。至于像浙江湖州地方的匪棍，则更是公然叫嚣：“现在天下无王法，新政府未执政权，故余

① 《民立报》，1912-05-09。

② 《民立报》，1912-06-04。

③ 《民立报》，1913-02-18。

④ 《神州日报》，1912-08-02。

⑤ 《神州日报》，1913-03-15。

⑥ 《贵州辛亥革命资料》，5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⑦ 《神州日报》，1912-04-02。

济放胆为之也。”^①

从民国初年会党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又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其积极作用主要是在农村进行抗租抗粮抗暴等斗争。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革命党反封建不彻底。武昌起义后，他们没有依靠会党和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进行反封建斗争，而是陶醉于各省“独立”，各府州县宣布“光复”。实际上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大多数的州县，“革”掉的只是旧政权的外壳，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不但没有被摧毁，甚至连大的触动都没有。据李侃同志对江苏、湖北两省38个县州光复情况的分析统计，在州县政权中，充当主要行政、军事职务的共57人，其中属士绅和旧官僚的有44人，占总人数的77%以上。^②在这些封建士绅、旧官僚控制管辖的州县，广大贫苦农民最基本的经济政治要求一点也得不到满足，群众依然生活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清朝改民国，换汤不换药；百姓地狱苦，官绅天堂乐。”^③《神州日报》也发表文章指出：“观之中国，哀鸿遍野，嗷嗷待哺，饥寒所迫，青年子弟流为暴徒。”^④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党和农民群众继续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是无可非议的。革命党人指责他们“扰乱社会秩序”，并动用武力镇压，是完全错误的。当时，有人在《民立报》上讥评民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是蹈清政府之覆辙：“当满清柄政时代，政府之弥天大罪，自命为英雄者未始不叹息痛恨，谓苟得扑灭此虏而大变其所为，庶几快于吾心。乃今则满清覆灭矣，而民国政府之措施亦渐有所蹈满清恶习者……昔指天自矢之谓，何尝亦有几希愧悔之日乎？噫！”^⑤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⑥革命党人镇压会党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就是这个历史悲剧的重要一幕。

^① 《民立报》，1912-01-22。

^② 参见李侃：《从江苏、湖北两省若干州县的光复看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4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 转引自乔志强：《辛亥革命前后山西群众的斗争》，见《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588页。

^④ 《神州日报》，1912-02-02。

^⑤ 《神州日报》，1912-03-30。

^⑥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6页。



民国初年会党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盲目性、组织上的分散主义和行动上的破坏主义。我们前面列举的一些地区的会党，打起皇帝招牌和伪立前清旗号，妄图推翻民国，恢复帝制，正是他们政治上盲目性的极端表现。他们违抗军政府命令，各拉山头，与革命党争权，甚至叫嚷“现在天下无王法，新政府未执政权”，肆意烧杀抢劫，横行无忌。这种严重的分散主义和破坏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也是导致会党与革命党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上看，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的破裂，会党是有一定责任的。

四、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的破裂说明了什么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工农群众建立了松散的联盟，这种松散的联盟，主要是通过会党的纽带作用实现的。革命党通过会党发动工农群众，推翻了清王朝，使革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革命党仅以清室的倾覆为满足，不愿也不敢依靠会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与旧势力妥协合作，掉转头来反对和镇压会党及工农群众。在民国成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到处取缔和镇压会党，结果导致与会党关系的破裂，与工农关系的恶化，辛亥革命也就迅速归于失败。虽然后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还想通过“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来挽救革命，但由于失去了工农群众的支持，都一一失败了。这说明，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充当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了。从此，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就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联络会党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他们联络会党主要是为了利用会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会党进行有成效的教育和改造，他们不能防止和克服会党游民群众对革命的危害。会党的固有弱点在民国初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出来时，他们就一脚踢开了之。因此，在民主革命中圆满地解决如何引导会党游民群众发挥其积极性而防止和克服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性这个困难的问题，也就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面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问题概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会党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历史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前，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一个困难的问题。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联合过会党，但是，由于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问题上不能满足会党和工农群众的要求，特别是民国一成立，他们便踢开了会党和工农群众，革命因而就迅速归于失败，中国进一步陷入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民国以后，不仅会党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而且它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大。在它们的组织里，不仅拥有大量的游民和贫苦工农群众，而且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有的地方，会党控制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势力，都想利用会党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会党，采取什么政策，也就是如何引导会党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防止和克服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性，将成为一个关乎能否顺利领导工农革命，以及争取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达到革命胜利的重大策略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进行研究，专著几乎完全阙如，有关的论文也寥若晨星。不能不说，这是中国近代史和会党史研究中存在的许多薄弱环节之一。这里试对这个问题做粗略的考察。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斗争特点不同，因此，对会党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同时，由于地区（如苏区和白区、城市与农村）的不同，工作的方式也各异。下面，我们就按照四个时期，分别进行叙述。由于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公布甚少而且很零散，可以汲取的成果有限，加上情况复杂，作者水平所限，文中错误、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的时期。党一成立，便决定集中力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一）将中国工人组织起来，包括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二）开展经济斗争，包括增加工资、减少工作及工人的福利问题；（三）开展政治斗争，包括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问题。接着，在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成立，并着手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工作，领导工人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但是，在开展组织工会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重大障碍，就是工人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帮口和帮会秘密结社等组织。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工人中，并不存在像欧洲工人的工会组织，这种近代式的工会，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人中开展劳动运动以后才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封建地域同乡性质的帮口和家长制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中国工会运动开始之际，在产业工人中还保存着很大的势力。因此，如何将中国工人从旧式的行会、帮口、帮会转而组织到现代的工会中去，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罢工斗争，确是个极大的难题。

当时，帝国主义者、军阀、豪绅、资产阶级非常注重利用帮口、帮会及其头目，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要在铁路、煤矿、海港等近代企业中开展工人运动，就必需冲破三大难关：

第一，要冲破帝国主义洋大人、暗探、把头的监督控制，尤其是上海的各种企业，多半属于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经营或间接投资，这种企业监督控制特别严密，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

第二，要冲破工人中的地方性帮口障碍，消除地方帮派主义的恶劣影响。当时在上海、武汉等工人最多的城市，以及铁路、水陆交通码头上，到处帮口林立。原来，许多工人都是从农村破产流亡出来的，他们来到上海等地谋生，为了不受别人欺负，很需要一个组织来保护自己。于是，他们就参加帮口，像上海就有江北帮、安徽帮、广东帮、山东帮、宁波帮等，京汉铁路上就有湖北帮、江南



帮、福建帮等。这种组织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会性质的地方主义组织。其头目大多是商人、小官吏以及把头。各个帮口之间，因为利害冲突，常常发生矛盾，甚至械斗。这种帮口常被官僚、买办、军阀所利用。例如，虞洽卿、蒋介石利用上海的宁波帮，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中国共产党人初次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常常遇到的难题是：接近了这个帮口的工人，就难以接近那个帮口的工人。

第三，要冲破帮会组织的障碍。民国年间，青帮、红帮、哥老会、三点会等组织在城市工矿、码头有很大势力，其中以上海的青红帮势力最大。据1938年上海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印刷、机器等22个产业以及各业职工基本状况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织系统，“男工十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拜有老头子”^①。其他各行各业，从车站码头到商场企业，从里弄摊贩到澡堂妓院，从娱乐场所到粪便管理所，都被青红帮控制。^②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如果不注意到青帮关系，必将动辄得咎，一事无成。

以上三大难关，第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略去不谈。第二、三个难关虽有区别，但实质是一回事，因为帮口中一般多有帮会存在，而帮会中也存在着各种地方派别，因此，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封建恶势力在工人中的流毒和影响。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是坚决排除障碍，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在1921年8月发布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明确提出：铲除帮口，按产业组织工会。《宣言》说：“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能把一个产业的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③

^①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史资料丛刊本，1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参见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

^③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1册，2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



但是，怎样才能排除帮口、帮会的障碍，将工人按产业组织到工会里来呢？对工人中的帮口、帮会，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多认为，对于这种组织，“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他们决定，对帮口采取的对策是：“先找出各工厂的各帮口的领袖人物，同他们交朋友、讲义气，先调和帮口与帮口的冲突，再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对于帮会的办法是：设法通过关系，派共产党员打入帮会，“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头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①。

为了使工人运动在各大城市和产业集中的地区得到平衡发展，除了将上海作为工运工作的重点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决定在它的下面设立三个分部，南方分部设在广州，北方分部设在北京，长江分部设在武汉。这三个分部于1921年10月前后成立。当时各地开展工运工作的步骤一般是：先从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入手，与工人联络感情，结交朋友；然后进行阶级教育，发展党组织，组织工会和领导罢工斗争。解决帮口矛盾和排除帮会障碍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

解决工人的帮口矛盾，以京汉铁路江岸段的工作最为突出。京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干线，全路有3万多工人，江岸（即刘家庙）、郑州、长辛店是三个总段，为全路的枢纽。在江岸这个镇上，就聚居着3000多铁路工人，他们之中有福建人、湖北人、江浙一带的人。为避免受人欺负，他们分别组成福建帮、湖北帮、江南帮，各个帮口之间常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积怨。1921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包惠僧任武汉分部主任，到京汉铁路组织工人。他先在郑州认识了一个名叫凌楚蕃的铁路工人，通过凌的介绍，来到江岸与凌的把兄弟、湖北帮首领翻砂匠杨德甫取得联系。又通过杨德甫串联，准备把工人组织起来。但障碍就在各帮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帮口矛盾和及早组织工人俱乐部，192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邀请京汉铁路江岸总段各帮口首领来武昌黄土坡16号开会。武汉分部方面参加的有：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组织委员陈潭秋，以及刚从上海来汉口任职的李汉俊等。江岸方

^① 栖梧老人：《“二七”回忆录》，32～33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包惠僧回忆录》，66～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面参加的有：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江南帮首领黄桂荣，福建帮首领林祥谦等。

包惠僧首先向各帮口首领讲解开展工人运动的意义、理论和方法，最后说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方针。李汉俊讲了一些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简况。陈潭秋等分别讲了关于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意义。

接着，杨德甫、黄桂荣、林祥谦等分别报告了江岸总段各厂各处的工人分布情况，及福建、江南、湖北各帮口一向不和睦的历史情况。针对各帮口不和睦的问题，包惠僧等又发表了很多意见，反复说明必须消除帮口隔阂，迅速按产业将工人组织起来。在这几个帮口首领中，杨德甫年纪最大，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在工人中有威信。几个帮口首领经过商量，决定由杨德甫代表各帮口首领表态。最后，杨德甫说：“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按产业组织起来，帮口不和睦是个事实，我们今天到场的人都要负责向我们的兄弟解释，我想不是什么大不得了的事。”^① 这次会议决定：到会各帮口的首领，就作为发起人，筹备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

经过各帮口首领的串联发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报名参加工人俱乐部的已有1000多人，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宣告正式成立。林祥谦等参加工人俱乐部的工作以后，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指导，思想突飞猛进。他们冲破了帮口的界限，对福建帮、湖北帮等帮口的工人，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他们学会了用阶级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林祥谦对工人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还分福建人、湖北人哩。资本家、工头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从来不分什么福建人、湖北人啊。大家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拳头，我们工人才有力量。”^② 在他们的启发带动下，工人们很快就团结起来。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风暴的掀起，与党组织引导工人迅速消除帮口隔阂、共同团结斗争是密切相关的。

排除帮会障碍，是个更复杂的问题。以上海为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即任李启汉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在上海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由于青红帮的势力几乎散布于上海的各工厂企业，李启汉同志开始工作时，到处有暗探监视。他每到一个工厂，很快

^① 《包惠僧回忆录》，89页。

^②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1辑，116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3。



就引起那里的青帮的注意，无法与工人取得广泛深入的联系。后来，他在工人补习学校里认识了一个纺织工人，她是一个在帮的人，同李启汉相处得很好，由她引荐，李启汉就拜了她的师父，加入了青帮，李启汉同志加入青帮以后，就通过青帮系统的关系，到工人中去交朋友，搞串联。他由小沙渡纺织工厂辗转发展联系到杨树浦的各纺织厂，以至浦东的烟草工厂，于是党在上海的工运工作，才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基。^①

再以江西的安源煤矿为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1月即派李立三同志到安源来做工运工作。这一带哥老会红帮的势力一向很强大，1906年著名的萍浏醴起义主要就是从洪江会组织发动起来的。参加起义的除浏阳、醴陵的农民外，安源煤矿的工人则是其中的主力。从那时起，矿上有1万余工人，大多参加红帮。各矿区的把头势力很大，都由红帮控制，工人进矿、处罚、解雇都由红帮把头操纵；安源街上的赌场、酒店、鸦片馆、妓院都被帮会控制。因此，李立三来安源时，上级指示他要“很注意作红帮的工作”。1958年至1959年，笔者曾两次到安源煤矿做过调查，访问了当年与李立三同志有过交往并参加1922年安源大罢工的老工人袁品高、张竹林、李庆馥、贺梅生等10余位同志，他们回忆了自身通过红帮进矿，以及在党的启发教育下参加工人俱乐部、入党、参加罢工斗争的经历。1959年11月，我又访问了李立三同志，他告诉我说，安源的工作，有个不大被人所知的事，就是我们做了红帮的工作。他说，我那时刚从法国回来，毛主席就派我到安源去工作。我去安源时，毛主席曾指示：到那里去搞工人运动，一是要取得合法地位，办平民教育；二是要注意做红帮工作。李立三同志说，当时矿上的红帮势力很大，“工人中间加入红帮的很多，红帮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经过我们的争取、教育，不仅在帮的很多工人参加了工人俱乐部，而且还有一二个红帮小头目入了党”。到1922年9月，罢工条件已基本成熟。“罢工前，毛主席给我一封信，指示在斗争中要取得社会同情，以‘哀民必胜’做比喻；又指示，提出的口号一定要‘哀而动人’。”“我们最担心的是红帮破坏罢工斗争，所以刘少奇同志指示

^① 《包惠僧回忆录》，67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

我，找两个受我们影响的红帮小头目带我去见红帮头子，我买了一点礼物就去了。红帮头子见我去很高兴，称我李主任（俱乐部主任），喝完鸡血酒后（我带去一只鸡），我说我们要罢工，又讲一些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等道理，提出要他讲义气，多帮忙，他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忙”。我立即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一）鸦片馆关门；（二）街上的赌摊收起来；（三）不发生抢劫案。他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也包了；第三点我也包了。”并将一、二两点写在布告上。罢工时，果真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事。这件事情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说明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①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本着高度的阶级自觉性，集中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在各地开展工人运动时，都把扫除工人中的帮口和帮会障碍，作为一个重要的斗争策略来对待。由于及时排除了这些障碍，工人们很快就组织起来。经过香港海员罢工（1922年1月13日至3月8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1922年8月24日至26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2年9月9日至25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2年9月14日至18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1922年10月6日至25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2年10月23日至11月16日）等几次重大斗争，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虽然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使这个高潮暂时走向低落，但是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到在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

^① 李立三同志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时，对安源煤矿的红帮做了不少争取教育和分化的工作。1957年，他接见安源工人领袖朱少莲烈士的后代朱子金同志时，曾谈过这个问题；1959年，他接见我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许师谦、王兴等同志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1962年6月，他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谈话时再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党在开展工人运动时，排除帮会的障碍，确实是个重要的策略。李立三同志这三次谈话的内容基本一致，此处引文见《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见《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唐纯良著《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32页也有同样的内容。



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继续注意做好工人中的帮口和帮会的工作，排除运动的障碍，1925年5月30日以上海反帝运动为起点，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这说明，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同时也证明，党在工运工作中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其中注意解决帮口矛盾、排除帮会障碍，就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有不少回忆材料做了很具体生动的说明。例如，张维桢同志在回忆“五卅运动”前后他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的情况时就提到，当时党组织是很重视帮会工作的。他举例说到，当时“上海流氓势力大，新闸路新闸桥附近，有一澡堂老板是一个大流氓，他非要李立三给他当徒弟，最后党同意李立三拜他为老头子，好进行活动”。另外，他还谈到，当时上海有不少“小流氓”，混进工会与党的积极分子捣乱，“我们几乎没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准我和王克全等十人和马良惠（流氓）磕头拜了把兄弟，这样工作才好做了，流氓不再捣乱”^①。这就是党在工运工作中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具体结合。

同样，党在这一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农村中的帮会等组织问题，并对他们采取了相应的政策。

农村的秘密结社，名目繁多，情况复杂。在南方主要有三点会、哥老会等，北方主要是红枪会、大刀会等。它们有的处于秘密状态，有的处于半公开状态，有的则已成为完全公开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性质，有的是属农村破产劳动者、游民实行生活互助的团体，如三点会、哥老会等；有的纯为抵抗兵匪、反对苛捐杂税的农民自卫组织，如山东、河南等地的红枪会等；有的则被军阀和地主豪绅所操纵利用。

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时，对这些帮会、秘密结社的总方针，就是要领导这个力量。正如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所说：“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②但是，由于这些组织的性质和具体状况不同，因此，党在各地对他们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和实行一些不同的策略。例如在红枪会最活跃的河南、山东、河北数省，那里的红枪会已成为完全公开的民间组织，农民运

^①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见《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

^② 原载《六大以前》，614~616页，转引自《河南史志资料》，第6辑，9页。



动与红枪会运动很不容易划清楚。因此，在这些地方开展农运工作，“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①。对于各地农民的秘密团体，如帮、会、理门等组织，则采取以下的方针：“（甲）竭力与他们的首领发生关系，利用这种关系，去和他们的群众接近而进行工作，以冀夺取他们的群众，帮助农会的发展；（乙）暂不反对他们团体中的迷信教条，但需设法改变其信条的内容，使之成为革命助力。”^②对那些由地主豪绅为对抗革命而办起的“民团”（其中容纳了许多帮会分子和土匪），党组织对他们也做出具体分析，认为“无论其为土豪劣绅所组织者，或为地主阶级抽捐所办者，其分子多数为现今之农民或失业之农友”，因此，对他们的方针是：“一，宣传、扩充农会会员，训练农民自卫军及扩大其组织。如此则充当团丁之农民，以自己农会及武装之保障，必脱离土豪及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二，反抗地主阶级抽捐办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地主阶级如不能抽捐，他的民团就办不成，他自己的钱决不肯拿来招土匪游民保护自己，因土豪之祸，不独使农民受害，即地主自身亦难保。”^③

农民运动的兴起，必然要对封建制度产生猛烈地冲击，因此自然就要遭到地主豪绅军阀的反抗，他们反抗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帮会组成反革命武装，并挑起农村的帮派斗争。例如刘镇华利用河南的红枪会去残害陕西的红枪会，吴新田更利用陕西的这一部分红枪会杀戮陕西的另一部分红枪会。^④河南荥阳贾谷区农协执委张虎臣一家10余口被杀，即是匪化的红枪会受劣绅指使所为。^⑤又如湖南“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即匪化的帮会——引者）杀农民二百余，差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十件中有九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类，饮雄鸡血酒，指天发誓‘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的消息”^⑥。在湖北，土豪劣绅利用光蛋会、大刀会、拳头队、暗杀队等向农民进攻。^⑦

① 原载《六大以前》，614~616页，转引自《河南史志资料》，第6辑，9页。

② 《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案（1926年12月1日）》，见江苏省档案馆藏：《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12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

③ 《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本，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④ 参见《李大钊选集》，568页。

⑤ 参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本，423页。

⑥ 同上书，318页。

⑦ 参见上书，397页。



对于这些屠杀革命者的罪大恶极分子，共产党则坚决予以打击镇压。对于那些在斗争中处于动摇不定状态的帮会头目，则及时进行争取。例如，1923年海丰农运时期，三点会的首领黄星南在斗争中动摇不定。他在当地农民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当时陈炯明的部下林海生、翁桂清等极力拉拢他，想利用黄星南在农民中的威信为他们招兵买马。彭湃同志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去黄星南家，与他彻夜长谈，对他进行耐心启发，动员他投身于为农民谋利益的革命斗争。在彭湃的争取帮助下，黄星南终于拒绝了军阀的收买，投身于农民运动，并成为高潭地区农运的主要骨干。^①

在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农民中存在的村落主义、宗族帮派观念，这往往是造成农民运动分裂的重要因素，而军阀、地主豪绅则从中挑拨利用，以致农民自相残害。因此，党组织必须及时进行教育，预防和消灭农民之间的冲突。例如，彭湃同志在海丰从事农运时，就注意到自清代咸丰年间起，地主阶级在海丰农民中故意制造乌旗帮和红旗帮，将农村划为乌旗村和红旗村，从中制造矛盾，挑起械斗，使农民互相残杀，造成深仇积怨的情况，因而经常对农民和农会干部进行团结教育和阶级教育，消除帮派矛盾。在海丰总农会成立时，彭湃还特意将会旗设计为乌红对缀四联合，以号召农民消除乌、红帮对立，团结在农会的旗帜下，共同对敌。^②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排除了帮会、帮派等障碍，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到1927年初，全国有组织的农民已在1000万左右，粤、湘、鄂、赣四省成立了农民协会，皖、川、闽、浙、苏、直、鲁、豫等10余省也成立了省农协筹备处。农民运动高潮的兴起，在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同时在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通过减租减息和反对高利贷等斗争，使农村的民食问题不像从前那样严重了。这件事本身对秘密会党的成员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以宣传教育，很快就把会党的一般成员吸引以至改造过来。特别是农会的力量壮大以后，会党分子多纷纷加入农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他们“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③。随着农运高潮的兴

① 参见《彭湃传》，8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② 参见上书，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9页。



起，农会势力的强大，一些原来反对农会的土匪民团组织，也来要求加入农会，如广东省高要县的“神打”，原来反对农会，“表示不愿向农民进攻，受外县‘神打’压迫所致，愿意赎罪，并请准其成立农会，我们因此提出穷鬼联合的口号，向‘神打’宣传，拉拢他们，使他们不再帮助田主和绅士”^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方面，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叛变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加之陈独秀顽固地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工农革命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蒋介石的反革命屠刀下，迅速付之东流。蒋介石在屠杀工农和革命分子时，特意收买纠合了各地的青红帮流氓作打手，首先向赤色工会和共产党人开刀。1927年3月6日，他从赣州杀起，一路杀向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上海青红帮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召集其他青红帮各派头目，成立了“中华共进会”，组织流氓，打起“工会”的招牌，向上海总工会进攻，收缴革命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全面实行大屠杀。杜月笙在这次大屠杀中，利用诱骗手段，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四·一二”反革命叛乱，使革命人民血流成河。紧接着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合流，在武汉、长沙等地进行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此破裂。在各地镇压工农运动的过程中，军阀、地主豪绅多收买利用帮会头目，如武汉的红帮头目杨庆山、刘贵堂等，都是以屠杀革命起家的。杜月笙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就青云直上，成为蒋介石的少将参议和总司令顾问，帝国主义列强对他刮目相待，先后任命他为上海法租界总联合会主席、公董局顾问、公董局华董等要职。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秘密会党的工作是分苏区和白区两方面进行的。

苏区，就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各地武装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

^① 《高要农民运动的经过》，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55页。



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年底，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100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各地武装起义特别是秋收起义中，同样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会党包括一些土匪武装采取什么态度。是继续联合他们并在斗争中改造他们呢？还是抛弃他们？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一些决定、指示和各级地方党委的有关报告、决议，以及实际工作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党对会党仍然采取了联合的政策。这一点，在秋收起义中反映得很清楚。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明文规定：起义的战略，“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①。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也指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②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中指示，秋收暴动军事上应“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③。1927年9月12日《中央通讯》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规定：“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对于反唐（指唐生智——引者）的杂军队（许克祥除外），如能对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后，对于此种部队斟量以解散或改编。但这绝不是说要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④1927年10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发

① 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② 同上书，9页。

③ 同上书，22页。

④ 同上书，106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

出的《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对会党土匪的政策是：“对土匪及会党——我们应密切的与会党合作。我们所活动之处均须与会党接头，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所没收土劣之财产可分给他们。农协可准他们办，但不可使他们破坏我们的目的。对土匪我们亦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可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们可准他们入党组织特支，不与其他支部发生关系，我们可用专只是收买他们的形式。”1927年9月，《中央政治通讯》登载的《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对江苏各地的会党土匪运动做了具体分析，特别指出江北地区“土匪集中，会党林立”，那里的“农民暴动应与土匪运动相呼应”^①。由于对会党和土匪部队有比较明确的方针政策，所以各地的武装起义和秋收起义，较有效地联合了乐意参加革命起义的会党群众和绿林部队，如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就吸收了那里洪门会的农民群众。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起义也联合了会党群众，并“有两三股土匪自动的要求和工农军合作”^②，扩大了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1928年至1930年），建立起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中央区、鄂豫皖区、湘鄂西区、洪湖区、广西左右江区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等区，它遍及江西全省和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等省的一部分地区。

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在各个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中，都涉及帮会土匪流氓的问题。这时，中央苏区以及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根据新的形势和以往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对会党以及所在地区的土匪绿林部队做了阶级分析，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些组织的基本群众，多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他们在帝国主义列强、封建势力残酷剥削下，因谋生无路而结帮、充当土匪。他们脱离生产，具有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们敢于反抗，但破坏力极大；其头目往往被地主豪绅利用，或本身是剥削者，有的部队成员基本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③中央苏区及各地党组织还总结了对会党土匪流氓工作的经验教训，有的地方明确指出，过去对

^① 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31~43页。

^② 《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107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38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③ 有关这一时期对会党土匪流氓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布了不少文件，如红四军总部《告绿林兄弟书》，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关于《流氓问题》决议案等。可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鄂赣苏区史稿》等。



土匪有两个极端的倾向：“一个是完全排斥土匪，提出打倒土匪口号，迫使他完全走向豪绅营垒；一个是无条件拉拢土匪，收编土匪，结果上当。”^①有的指出：“过去少数地方党部联合刀会土匪的领袖，以及幻想整个刀会土匪的组织转变到革命方面来，都是机会主义的策略。”^②

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各地开展会党土匪工作的经验，我党确立了“夺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破坏其组织”的策略方针。^③经过艰苦的工作，许多地区的洪会、三点会、刀会等会党群众，多被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些绿林土匪武装也得到改编和改造，为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扫除了障碍。

当然，这一时期各根据地对会党群众、土匪绿林部队的争取改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改造工作不仅遭到地主豪绅、会党土匪头目的破坏反抗，而且还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下面就按根据地开辟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等几个方面，分别具体说明：

（一）根据地开辟和政权建设。我们以江西兴国县为例。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兴国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两大暗礁：第一是当地的封建宗族关系十分严重，人们多聚族而居，各乡村的族长、头人控制家族，经常挑起械斗，扰乱社会秩序。第二是当地的三点会组织势力很大，大多被地主豪绅所操纵，最有名的是惯匪段起凤，不仅控制了三点会，而且还拥有武装。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一些村庄建立起来的支部，有的被某个家族操纵，有的被帮会把持。后来，党组织就派一些有社会地位的共产党员到各宗族和三点会中去，利用封建势力进行反封建的斗争。有许多共产党员不顾生命危险，出入洪门，在敌对机关内部开展艰苦的工作，为党收集一切必要的情报。有许多共产党员的家庭成为掩护党的活动的场所，有的作为党的县委机关或交通联络站。由于实行了这种“红心白皮”的政策，即共产党员进入三点会内部，对这个组织的下层和某些上层分子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三点会的内部情况终于有了很大的变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304页。

^② 《农民运动决议案》，见《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264页。

^③ 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党对刀会土匪的总策略是：“夺取他们的群众，反对他们的领袖，根本消灭他们的组织。”（参见《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264页）其他各地提出的口号，也大体一致。

化，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向党靠拢，自己主动提出“三点无共不成洪”，并接受了党的领导。接着，党就把全部武装（包括段起凤）都争取过来。把这些人争取过来以后，党便逐步对他们进行改造工作，并清理了他们内部一些最坏的分子，处决了管开炳、丘老七等人。这个为封建势力所操纵的社会组织，便最后瓦解了，而其中的大部分成员，经过改造之后，加入了革命的队伍。这部分成员被争取改造过来，对发动群众，建立当地的工农民主政权，有着直接的作用。因为群众原来所顾虑的，就是被这些组织的头头迫害，现在见他们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顾虑就打消了，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①

在恢复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在争取分化瓦解会党方面，摸索和创造了不少经验，如湘鄂赣苏区，就创造了对洪会组织采取“夺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破坏其组织”的浏阳、万载等县的经验。^②当然，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如有些基层苏维埃政权，没有注意对帮会土匪流氓进行分化改造工作，致使一些流氓混入和掌握政权，他们在 AB 团领导下进行破坏苏维埃活动，颠覆苏维埃政权。^③

（二）在党的建设方面。这一时期，党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特别是进入农村根据地以后，党组织发展的成员大多数是农民，因此开始时曾出现过一些偏差。例如，在发展组织工作时，有的地方受会道门的影响，采用会道门入会的办法：“就是摆上香案，把香点燃，由入党人持香宣誓：‘如果我叛党，照香行事。’一刀把香斩成两段。”这种办法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会道门“红家”（即所谓“圈子”）的办法，湘赣边区龙门地方就这样搞过。^④还有一些地方，在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时，必须喝鸡血酒宣誓。^⑤这种采用帮会“摆香案”、“喝鸡血酒”的方法吸收党员，使一些地方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兴风作浪。此外，有的地

^① 参见陈奇涵：《兴国的初期革命斗争》，见《星火燎原》，第1辑上册，407～417页；Philip C. Huang, *Intellectuals, Lumpenproletariats,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13, Aug. 1978.

^② 参见《湘鄂赣苏区史稿》，56、67页。

^③ 参见《江西的中央苏区（特约通讯）》，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392～401页。

^④ 参见钟期光：《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见《中共党史资料》，第8辑，188页。

^⑤ 参见《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89页。



方发展党员通过亲串亲、邻串邻的方法，亲族观念、地方观念很浓，家长制的作风等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多反映到党内。

针对以上情况，各根据地的党组织都进行了整顿。首先在组织上进行了初步的整顿。有的地方对党员重新予以审查登记，如湘赣边区的平江、修水、铜鼓三县，据当时统计，平江原有党员2万多人，登记以后只留下一万几千人；修水原有党员几千人，只留下几百人；铜鼓原有党员数千人，只留下600多人。^①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经认真查明情况后，陆续进行了清理。其次是在思想上进行整顿。这主要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对党员加强马列的思想教育。各地党组织根据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来自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特点，通过学习训练等措施，用马列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来武装党员，克服农民、小资产阶级固有的弱点。有的根据地党组织（如赣东北党组织），为了通俗地、具体地对党员，特别是工农群众中的新党员进行教育，还以“二十二条”为中心内容，以“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为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二十二条”的内容包括：“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牺牲个人；勇敢参加战斗；对党忠诚；要随时随地去宣传群众；要随时随地去组织群众；努力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按时到会；缴纳党费；勤学革命理论；打破家庭观念；打破迷信观念；不得贪污；要明了政治；接受批评；永不叛党。”^②其中打破家庭观念、打破地方观念、打破亲族观念等，特别有针对性。这些教育对根据地党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在根据地的军队建设方面，涉及会党土匪问题，最主要的是整编改造土匪绿林部队，和肃清红军中由于游民成分增大而产生的流寇思想。有关整编改造土匪绿林部队，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根据地改造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最为突出。袁文才、王佐出身贫寒，早年投身绿林，成为杀富济贫、与豪绅地主对抗的“草莽英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袁文才和宁冈县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配合，夺取了宁冈县政权，自任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与遂川县农民协会发生了联系，将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退守井冈山山区。1927年10月初，毛泽东率

^① 参见《湘鄂赣苏区史稿》，4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② 方志纯：《赣东北革命斗争的回忆》，见《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91~92页。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山区时，得到袁、王的积极协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袁、王及其部队实行团结、改造方针，使他们的觉悟有所提高。但是，这支武装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纯粹是靠着封建的红帮关系巩固他们的内部组织，完全是闯江湖的一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28年年初，毛泽东同志派何长工同志去王佐部队做改造工作。何长工先与王佐及其左右手刁林飞、李克昌等谈心交朋友，启发他们。不久，王佐由何长工介绍，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部被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同年5月改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成为井冈山红军的主力团之一。此后，他们多次参加重要战斗（如龙源口战斗、黄洋界保卫战等），为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① 其他根据地在改造土匪绿林武装方面，也创造了不少经验，如陕甘边区刘志丹同志改造郭宝珊的部队^②，以及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特委在改造从旧日“神团”改变过来的游击队方面，都创造了比较成功的经验。^③

这一时期，根据地军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红军的思想建设，红军中的中国共产党与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所写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总结。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成功地实现了革命中心由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变，在开辟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会党土匪游民的问题，也就是既调动这部分人的革命积极性，又防止和克服他们的破坏性，扫除了各地实际存在的一大社会障碍，不仅使革命摆脱了困境，而且迅速获得恢复和发展。

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这方面的工作也曾不断遭受挫折。早在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对待土匪问题就有这样一段话：“与土匪或类似

① 参见何长工：《改造王佐部队》，见《难忘的岁月》，5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4辑，240~251页；《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史》，19~20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② 参见《革命史资料》，第5辑，96~99页。

③ 参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32~3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首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或政府机关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些话显然是错误的，对愿意或已经参加革命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群众（如人们所说的土匪），一律采取“镇压”、“歼除”、“驱逐”的做法，这样做只能孤立自己，有利于敌人。所以，到1930年就出现王佐、袁文才被杀事件。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以后，肃反严重扩大化，许多革命同志在“AB团”、“大刀会”、“兄弟会”、“铲共会”等莫须有的罪名下惨遭杀害，给根据地党、军队、人民群众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失。

关于这一时期党在白区对帮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革命根据地派出武装力量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一是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城市交通枢纽，通过打进帮会、利用帮会头目的关系，进行掩护革命的秘密工作。

红军在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时，经常遇到帮会的障碍，这时，必须采取不同于根据地的政策。如闽东根据地建立后，工农红军进入闽北白区打游击时，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村村有大刀会，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同大刀会打仗。因此，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首先必须解决大刀会的问题。经过打击和争取两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争取了在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拥有1万会众的大刀会头子林熙明，才妥善地处置了大刀会的问题。林熙明，福建寿宁人，贫苦出身，早年曾在旧军队当过兵，不久退伍回家，就组织大刀会。他在当地农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与国民党有矛盾。红军初建瓯时，曾与他交战数次，他深知红军的厉害。后来红军对他积极争取，并在国民党向其进攻时给了他必要的援助，于是他就逐渐向红军靠拢，最后与红军负责人黄立贵同志等吃了鸡血酒称兄弟起来，红军即通过林熙明争取了绝大多数的大刀会，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①

^① 参见《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149~150页。

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上海等大城市以及各交通要道，党经常通过打进帮会，利用帮会头目的掩护，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革命的工作。例如，杨度这一时期在上海，就是以杜月笙挂名秘书的公开身份，出入龙潭虎穴，把搜集到的敌情贡献给党。据夏衍同志回忆，他“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①。又如武志平以杨虎城将军秘书的身份，利用巴山红帮龙头陈贵升的关系，把川陕苏区的军需民用物资、西北敌军情报、风土习俗，源源不断地送往红四方面军总部。^②除此以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成绩。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另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通过清党运动等白色恐怖政策，在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许多帮会的头目充当帝国主义列强和蒋政权军阀势力屠杀革命的帮凶。特别是上海的青红帮，在“四·一二”政变后他们继续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当时，党的中央机关重要活动场所设在租界，由于军阀、蒋介石的军队不能直接去搜捕，因此杜月笙及其青帮就起着特殊作用。他继黄金荣之后，在法租界充任公董局要职。在租界警务处工作的华探头目，从巡捕、包探到探目，大多是帮会分子杜月笙的门徒，党的许多要员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抓住以后，送到蒋政权的监狱和刑场被杀害的。有统计材料说明，1927年夏天，就有20多位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租界被捕，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此后，1928年陈兆年（陈独秀的另一儿子）、1929年彭湃、1931年向忠发等都在此被捕，他们有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全国农民协会的领导人，有的是江苏省委领导人。1934年至1935年，蒋政权在全国逮捕了4505个共产党员，其中720人是在上海逮捕的。关在宁沪监狱中的有87人是中共中央委员，340人是省委委员；其中有65个中央委员、95个省委委员是在上海租界被抓到的。^③如果不是杜月笙及其青帮的作用，国民党是无法在上海抓到这么多共产党重要领导人

① 夏衍：《杨度同志二三事》，转引自田遨：《杨度外传》，40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参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244~245页。

③ 参见“Gang Rule in Shanghai”，in *The China Forum*, May 1932, pp. 17-18; Y. G. Wang, “Tu Yueh-sheng (1888-1951): A Tentative Political Biography”,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 1967, vol. 26, no. 3.



的。可见上海青红帮在这一时期所起的反革命帮凶作用是不寻常的。

三、抗日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内地主阶段、资产阶级、各党派和各种地方势力，除了极少数卖国投降充当汉奸外，大多愿意起来抗日，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因此，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方针是：动员一切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族的抗战。

为了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抗日，中国共产党对哥老会、红枪会、大刀会、青红帮等秘密会社，以及与这些团体有关的一切地方民众武装，广泛开展争取工作。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同志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哥老会的宣言，号召包括哥老会会众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吞并中国的野蛮强盗行为是愈来愈凶狠了，他们不但强占了我们的东北四省，并且进而实际统治着整个的华北。不独利用走私，破坏我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增加破产失业的种种痛苦，并且采用对台湾、朝鲜殖民地的制度，向华北增兵五万之多。这些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设施，在在都是把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把华北变成进攻全中国的根据地。而且正向着中国的西北、华中、华南进行强暴的侵略，要吞并全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要变四万万同胞成为它的奴隶牛马。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燃到我们的眉睫了，我们是处在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除了少数卖国贼汉奸之外，稍有血气的中国人，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莫不怒发冲冠，气愤填胸，要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一拼死活的抗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肯定了哥老会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以及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所起的积极作用，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压迫待遇的大同小异，指明了彼此间观点主张的差别，以及所面临的敌人和出路完全相同，最后号召哥老会：“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



共赴国难。”并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①。

为了统一党内思想，切实做好对哥老会的争取工作，1936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对哥老会的性质、作用和党对哥老会的策略方针，都做了具体的说明。《指示》首先说明，哥老会是中国许多秘密结社（如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之一，是下层群众的组织，其成员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哥老会在代表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常常起着革命的作用。但是，过去由于得不到无产阶级领导，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和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指示》明确向全党指出：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这一政策的决定，主要出发点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哥老会是有群众基础的，是可以参加抗日斗争的一种群众力量。《指示》对争取哥老会的具体方针也做了规定，这就是：（一）推动与吸收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二）在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逐渐消除哥老会中保存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分，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三）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指示》最后还强调：“西北地区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在创造西北大联合中，党必须特别严重地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党必须教育自己的同志，清楚地了解我们对于哥老会的这一策略，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之。”^②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精神，1936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哥老会招待处，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8月19日该筹备处向全国哥老会发出召开代表会议的通函，同年10月15日在陕西省志丹县境内的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也就是“马头山开山堂”^③。为了使这次会议达到预期目的，周恩来同志在10月6日给陕西省委的信

①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原载《斗争》，第105期，1936年7月。

② 《六大以来》（上），768~7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中，针对马头山开山堂的问题，就党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方针，又做了重要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要在党内进行教育，使一般党员都了解我党争取哥老会的基本方针是什么。现在最急的是要将这次参加马头山开山堂的党内干部，统统加以训练，务使这批干部能够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参加开山堂，去传达党所给他们的工作方针，树立起党在哥老会中的领导作用，而不致随波逐流，为一般龙头大爷所左右，成为凑数的角色。第二，在这次开山堂中，必须确定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发展对象。最主要的斗争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兴中反日”应是哥老会最中心的口号。发展对象主要是白区、白军，而不是苏区、红军。第三，在组织上，山堂开过以后，要利用各路龙头大爷，回到共区边境，去建立几个方面的哥老会招待处或办事处，招纳四方豪杰、江湖好汉，来商量到白区、白军中发展哥老会和进行斗争的具体计划，从一般的斗争口号、会规，到组织直接秘密的交通联络。^① 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会议订立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其主要内容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援助红军抗日等。

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全面的展开对哥老会和其他会道门的争取工作，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七七事变之后。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形成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党派各界各族人民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战争和持久战的方针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斗争。在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的党组织，都把团结和争取一切已有的地方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哥老会、大刀会、红枪会等共同抗敌；团结和争取大刀会、红枪会等会门武装，使它们积极抗日协同作战；争取土匪武装参加抗日，逐渐使其变质，建立其纪律，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来抓。^② 由于有了明确的方针政策，通过各级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大多数的地方武

^① 参见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24~30页。

^② 参见邓子恢：《新四军怎样做政治工作》，原载《新四军言论集》，集纳出版社，1939，转引自《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2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装和帮会力量都被争取过来，共同抗日。

这一时期，各地在争取帮会势力和地方武装的过程中，经历了多种曲折复杂的斗争：

第一，要与党内的新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例如，新四军组成后，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奔赴华中敌后战场，大多数干部都能在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勇猛地打击敌人，积极地发展武装。江南部队在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同志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江北部队也有不少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东南局书记项英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多方限制部队的发展，限制群众运动，甚至在江南有股土匪部队主动要求新四军二支队收编，双方已接洽好的情况下，项英同志却怕“破坏统一战线”，不予批准。^①他在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影响下，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种下了新四军和华中工作在以后发展中遭受挫折的根苗。

但是，由于广大干部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抵制和斗争，新四军的力量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1938年年初到1941年新四军军部成立，前后不到3年，部队由不及3万人发展到9万多人，建立了7个解放区，有2000多万人口。在斗争中，以刘少奇等同志为代表坚决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正确路线。刘少奇同志到皖东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时，针对项英等人批评新四军“招兵买马”的错误言论，说：“有马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成功吗？从马列主义观点来看，这完全是不科学的！”为了鼓励干部放手工作，刘少奇同志还说：“在历史发展得很快的时候，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在革命中已经成熟了的任务，这样才能走在时代前面，领导革命前进。”这样，皖东新四军四、五支队，原来总数仅5000余人，经过3个月时间，就发展到1万多人。^②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在江南抵制了项英执行的新的王明路线，江南各部队也不断扩大。

第二，要排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主要是对争取会道门和地方武装参加抗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认为会道门落后，有“迷信仪式”，不愿对他们做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各根据

^① 参见邓子恢：《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斗争》，见《星火燎原》，第6辑，383页。

^② 参见上书，384~385页。



地的党组织普遍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彭真同志在《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一文中指出：红枪会、天门会、大刀会等秘密会社，在冀南豫北一带，“不但包括着最大多的农民，而且拥有极大数量的新式武装（估计会门枪支在20万以上）。这是一支极雄大的群众抗日武装力量。但如果不善于去团结他们，就会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他以冀鲁豫地区负责进行会门工作的郝西成部，因采取错误的政策而被红枪会消灭这一血的教训，来教育大家说：“在这个区域，我们能否顺利解决日寇，广大会门群众之向背，将成为决定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对会门问题，必须耐心的审慎的研究处理，并进行艰苦的工作。”他批判了对红枪会企图采取镇压政策和不愿艰苦耐心地去对会门群众进行民族教育的两种错误倾向，阐明了党对会门工作的具体方针。关于如何对待会门的迷信仪式和习惯问题，彭真同志也做了说明，他指出：“一切在会门中工作的同志，对于他们迷信的仪式和习惯，必须严格审慎的遵守。须知今天我们在会门中工作的中心问题，是红枪会能否抗日和能否争取他们进入抗日统一战线。应把迷信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还要了解，我们固然不提倡迷信，但如果违反他们的习俗，是会惹起他们反对，而被日寇和汉奸利用来反对我们。”^①与此同时，彭雪枫同志在《新华日报》也发表了《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强调争取绿林武装和会门武装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河南占潜势力最大的人数众多的是‘绿林武装’和‘会门武装’两种。政府如对该两种性质不同的武装，稍一处理不慎，立刻就会发生乱子”，“对于‘绿林武装’（土匪——即架杆子的）基本上是由‘政府的力量’争取他们走到抗日战线上来，在政治上对之宣传教育，在斗争中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对于‘会门武装（红枪会、黄枪会、妙道会等），对他们应有正确的基本认识：（一）他们是比较原始的反贪污反土匪的民间自卫武力，（二）他们的潜势力在民间——尤其在河南——广而且深，（三）战斗精神及战斗经验都相当丰富。倘若对他们诱导有方，在军事政治方面武装了他们的头脑和武装了他们的手脚，我们相信在从前反抗军阀压迫的时候，他们能够大量消灭军阀的数万大兵，我们更相信在今天他们也能够严重打击日寇的进攻。”^②此外，《新华日

^① 原载《群众》，第1卷第22期，377~378页，转引自《河南史志资料》，第6辑，14~16页。

^② 《新华日报》，1938-06-14。

中国近代史研究

报》还发表了《保卫河南》的社论和《怎样处理地方武装》的文章，强调河南有着数十万的民间武装，“为着保卫河南，必须有计划的去加强和领导民众的自卫武装……普遍地发动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田园庐舍家庭妻儿而与敌人战斗”^①。

在江南，大刀会、青帮、土匪处处多有，新四军将军陈毅在《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一文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动员群众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我们去到农村的目的，是组织农民投入反抗敌人的斗争；而不是指示他们去平分土地。”因此，对民间的大刀会、青帮等这类团体，必须加以支持鼓励，并把他们改造成为能够反抗日本、实现自卫的游击队。^②在华北，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也发表文章和谈话，号召八路军干部对敌占区的土匪必须争取，通过耐心细致的组织工作，把土匪武装改造成为正规的游击队。只有对那些受敌人控制的土匪，才必须予以消灭。这样就把对会道门和土匪武装的争取工作，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了。

第三，在争取会道门和地方武装过程中，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人民群众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家庭妻子儿女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民间自卫武装组织，如江南沦陷后各地组织自卫团防匪抗敌，则加以积极支持和引导，发展成党领导的游击队。江南丹阳游击队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③

（二）对于根据地的会道门，例如红枪会等，中国共产党派干部深入其内部，去进行争取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领导他们对日抗战，建立政府与军民一致的抗日统一战线。对于政府、军队与会门的关系，则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立场上，善于调处赞助，减少摩擦冲突，做到精诚团结。

（三）对于敌占区日寇企图利用的会道门，必须尽力争取。例如新四军挺进江南以后，在溧水、江宁一带，敌人企图利用当地普遍发展的大刀会，派汉奸向大刀会的首领表示：“只要不帮助新四军，拥护‘皇军’，你们维持地方治安，‘皇军’不仅不打你们，而且还可以供给金钱和枪支。”还说：“你们相信菩萨，

① 《新华日报》，1938-01-16。

② 参见陈毅：《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上海，1937。

③ 参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438~440、480页。



‘皇军’也相信菩萨，我们都是家人。”并有个别的敌人故意与大刀会头目结拜兄弟。针对这种情况，新四军派人做大刀会的工作，采取了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大刀会的迷信采取不干涉的办法，着重从政治上团结争取他们，要求他们多多训练，保卫家乡，一起联合抗日，结果大刀会也渐渐走上抗战的道路。^① 又如在和县、江浦、全椒三县交界的江全地方，日寇见新四军在群众中扎下根来以后，就在大刀会中造谣，引起大刀会头目的怀疑，有的甚至公开与新四军作对。针对这种情况，经过调查，得知大刀会总坛主王世喜因其叔父被日寇所杀，与日寇有矛盾，新四军派人深夜到王家做争取工作，经谈判达成协议，要王世喜遵守：一是共同抗日救国；二是实行减租减息；三是同不抗日还为非作歹的军队断绝关系；四是灭匪保民；五是不准走漏新四军的消息，并经常向新四军报告敌情。新四军则保证他们生命财产安全。王世喜同意了这些条件，并叫会众捉来一只鸡，当场杀鸡盟誓，立下文凭，各执一纸。从此江全一带的大刀会就被争取到抗日的旗帜下。^②

（四）对于汉奸土匪武装，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如江南的汉奸朱永祥，他拥兵割据一方，不游不击，专门抽收捐税，欺压民众，有“小日本”之称。后来他派参谋秘密到南京与日寇接洽投敌。1938年7月新四军出兵将朱永祥部一举击溃。^③ 又如苏鲁交界的著名土匪刘黑七（即刘桂堂），他曾利用各派系军阀的矛盾，扩大势力，转战几省。日本侵略者入侵鲁南后，他一面充当着日本侵略者的皇协军司令，一面又做着国民党苏鲁战区的官。他对根据地说他是中央军，对敌战区说他是日本人。他在本地区屠杀了许多共产党的干部而取得敌人的犒赏，最后刘黑七被八路军包围活活打死。^④

第四，要及时调整帮会之间以及军民之间的关系，极力避免摩擦。例如，新四军挺进江南以后，与各地的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青帮和地方土匪武装都建立了关系。一些顽固分子见革命势力逐渐发展，就故意挑剔，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新四军

① 参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424页。

② 参见马长炎：《暗斗明争进江全》，见《星火燎原》，第6辑，449～451页。

③ 参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389页。

④ 参见陈沂：《奔袭刘黑七》，见《红旗飘飘》，第6辑，215～225页。

在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江南抗战的总原则下，努力开展工作，调解各派之间的复杂矛盾，极力避免摩擦的发生，获得了较好的成效。^①又如东北军进入清水河一带的回民聚居区以后，由于东北军的军纪比较涣散，严重地侵犯了回民的利益。为了及时解决这个矛盾，党组织考虑到哥老会在西北地区的影响较大，就通过当地的哥老会出面斡旋。党派红一军团民运部部长刘炎、梁必业和潘振武三人参加哥老会，与哥老会头目拜了把子，并分封了头衔，刘炎为“大爷”，梁必业为“么满”，潘振武为“当家”，然后参观清真寺，以哥老会的身份向阿訇解释东北军初到此地，冒犯之处，多求宽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②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把各地的一切地方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等）和各种民间秘密社会团体（如红枪会、大刀会、哥老会、青红帮等），统统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掀起了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的轰轰烈烈的全民族团结的抗日运动。

在东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山林队，各式各样的抗日旗帜都打了出来。如“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金矿工人祁明山，通过结盟起义拉起的“东北山林义勇军”，在七七事变后，就发展成威震三江地区松花江下游的一支抗日武装——抗日联军第十一军。^③被称为“雪原飞兵”的饶河游击队，到了1937年，便发展成为“十大联军”中的第七军。^④整个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发展起30万抗日义勇军，到后来多改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先后改编成11个军^⑤，在东三省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大量的部队，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在华北，红枪会武装数十数百万地建立起来，单河南信阳一地的红枪会，就“拥有七八万人之众”^⑥。他们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奋勇杀敌，创造了许多奇迹。例如在鲁西，红枪会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在枪林弹雨中，只用一支“红枪”而夺获敌

① 参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208页。

② 参见潘振武：《忆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工作的片断》，见《星火燎原》，第4辑。

③ 参见冯仲云：《祁老虎》，见《星火燎原》，第4辑，401~410页。

④ 参见张福才：《雪原飞兵》，见《星火燎原》，第4辑，416~419页。

⑤ 参见《东北抗联的业绩永世长存》，载《光明日报》，1985-09-03。

⑥ 《新华日报》，1939-01-06。



人的机关枪。在凤阳，红枪会曾于黑夜间使用刀枪冲杀数十敌人。在定远的一个小集镇上，红枪会会员曾以锈刀冲入敌阵，每人带回一个血淋淋的敌头。在皖北，红枪会会员于山隘处用短刀截杀了20多名日寇。^①

在华中、江南和中原地区，各种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例如，武汉失守以后，湖北的应城2个月内就出现了3000多名游击队员，其他如天门、汉川、安陆、京山等地也同样盛极一时。这些游击队的成员，“十分之八九是汉流（即哥老会员——引者）与乡村中的无产者，而领导人也就是这些草莽英雄式的他们原来的头子”。其中有一位顶顶有名的汉流大哥，在当时武汉撤退的混乱状态中，他把手下的哥老会徒众一两千发动起来，捡起败兵丢下的枪支，建立一支游击队，后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成一支纪律严明、打仗勇敢的队伍：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在这些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②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很有预见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个新鲜事物，假如敌人对于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缺乏估计，“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③，历史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后来日本侵略军的大部分兵力陷入了中国人民汪洋大海似的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收买利用各地帮会和会道门的事实。最明显的是：他们在华北收买利用一贯道，在日寇特务头子头山满的“万教归一”的招牌下，一贯道头子张光璧与日寇汉奸勾结在一起，大搞什么“中日亲善”，在日寇的庇护下，一贯道在沦陷区得到迅速的蔓延。^④在江南，他们收买利用青红帮，日本帝国主义特务机关曾派专人到上海调查和拉拢青红帮；在芜湖，青红帮的势力有二三万人左右，日寇也派人从中收买汉奸走狗。^⑤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① 参见《新华日报》，1938-06-14。

② 参见方涛：《敌后的中原抗战》，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476~4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05页。

④ 参见野樵：《一贯道的黑幕》，8~1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63。

⑤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密函》第2869号，《民众训练部奉派芜湖密查情况报告》；第2584号，《安徽省党部特派员郭穉云、刘镜蓉等人调查芜湖青红帮组织及日寇利用汉奸活动的报告》。

四、解放战争和三年恢复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斗争主要是通过紧张的武装斗争进行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时期为配合解放战争，党利用帮会关系，在建立地下交通线向解放区输送物资和干部方面，在防止国民党破坏人民运动方面，以及在一些重要城市迎接解放、防止敌人破坏等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

(一) 1946年以后，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国民党对苏北、山东解放区实行水陆封锁，那里迫切需要电讯器材和药品等物资。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中共中央上海局就选派了很多干部，利用上海等地社会上可以利用的各种人，特别是青红帮的流氓、亡命之徒，建立了水陆地下交通线，为华中、山东等解放区输送了大批物资和大批干部。有的地下航线（主要是水道航线），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止，从未中断过。

(二) 1947年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迅速高涨。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为了利用帮会来破坏当时的工运、学运和革命群众的反内战、要和平、反饥饿运动，约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向海潜、范绍曾等人共同组织“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为阻止敌特利用帮会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就选择红帮头目向海潜作为突破口，因为向海潜早年曾以红帮身份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倒袁、护法等运动，失意后就长住上海，成为长江一带的红帮头领——五圣山的山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与共产党时断时续地发生过接触。抗战结束后，他又到上海从事帮会活动。经过上海局的同意，张执一同志去找向海潜谈话，要他从旁协助共产党工作。向一一表示同意。后来通过向海潜以及其他大小帮会人物的关系，进行对帮会的争取瓦解，使帮会力量不为敌特所用。这项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①

(三)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从保卫大上

^① 参见张执一：《在敌人的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见《革命史资料》，第5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海、保卫上海人民出发，陈毅同志在丹阳时便向上海的地下党发出指示：要把黄金荣稳住。经过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黄金荣终于没有出走，并向人民解放军贡献了三项“见面礼”：“一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逃离上海前的大屠杀中，掩护了一些地下党，并进而支持地下党接管；二是把国民党的一些财产造了报表，交给地下党；三是交出了四百多名红帮头目的名单，以致在上海解放时，红帮方面没有乱。”^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分别向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进军，到1949年9月，先后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城市和地区，消灭了国民党800万军队，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就着手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帮会、会道门和土匪就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旧中国究竟遗留下多少帮会、会道门和土匪分子，已无法得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有的人说，在20世纪30年代，“青帮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四十以上，计达一万万六千万人之多”^②，这显然是夸张，并不可信。但是，我们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遗留下来的一些调查统计材料中，还可以找到少数地区帮会情况的调查统计数据。这里我们以湖南省和四川的什邡县为例：据20世纪40年代初的调查，湖南省的帮会有45个山堂，其中21个没有人数统计，其余24个山堂计有36.7万余人^③；四川什邡县的哥老会，在全县14个乡镇设立公口40个，计有8400人^④，由此可见全国的一斑。

早在1926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⑤而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是怎样来处置和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呢？归结起来，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最大量的是通过解决民食问题的途径。因为帮会土匪的

① 丁凤麟：《黄金荣其人》，载《人物》，1982（4），186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2，案卷号832，1937年1月15日《朱琳等呈请组织中华清正会》。

③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目录号3，案卷号463，《湖南省各县市帮会负责人调查名册》。

④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3，案卷号173，《什邡县哥老会组织与活动情形》。

⑤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

群众，主要来自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机会的工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新解放区的城市里，花大力解决失业工人和闲散人口的就业问题。工厂企业还通过组织工会，进行民主反霸斗争。这样就基本解决了城市和工人中的帮会问题。在农村则通过组织农会，特别是通过土地改革，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的帮会游民问题也就随之解决。

第二，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利用帮会和会道门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分别判处徒刑和劳动改造。在镇压运动中，各级政府贯彻了“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对于那些新中国成立前利用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与人民为敌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罪大恶极分子，则坚决予以镇压。例如，在抗美援朝时期，有的反动会道门头目利用美国散布细菌的机会，兴风作浪，制造“神公”、“圣水”等谣言，欺骗和恐吓群众、破坏生产，对这些则予以镇压。^① 对于历史上犯有罪恶，新中国成立后弃恶从善、愿意改悔的分子，则予以宽大处理。即使像黄金荣这样的人，历史上虽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在上海解放时，他做了几件好事；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他发表了《自白书》，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决心重做新人”^②，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作用，并且后来确有“重新做人”的表现，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

第三，对武装土匪，坚决予以清剿。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初，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国民党的统治虽然已被推翻了，人民民主的政权也已建立，但在不少地区，特别是在西南、华南最后解放的地区，蒋介石在撤退大陆时留下了大量残余武装土匪，他们与各地方上的土匪相勾结，到处进行反抗人民政府的罪恶活动。例如湖南的湘西地区，就是匪患最突出的一个地区。在这里盘踞着 10 余万的土匪武装，他们多是国民党败退时有计划留下的所谓“大陆游击队”。在台湾蒋介石的指使下，他们企图建立湘西“敌后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准备策应蒋帮“反攻大陆”，卷土重来。由于此处地形复杂，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历来是土匪出没的场所，近百年来湘西的政治势力基本上为土匪所掌握，许多土匪头子既是地主恶霸，又是帮

^① 参见罗瑞卿：《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载《人民日报》，1952-09-29。

^② 《黄金荣自白书》，载《文汇报》，1951-05-20。



会头目，他们与国民党残匪部队勾结之后，更是横行乡里，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于1950年年初进入湘西，经过一年多的英勇顽强战斗，全歼了10余万土匪武装，解放了湘西22个县，创造了湘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①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949年至1952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以及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使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的帮会游民土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旧中国的百年匪患也随之消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① 参见晏福生：《战斗的历程，光荣的业绩》，见《峥嵘岁月》，第4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

——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间，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禁区。其中，对工人运动与帮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人们更是讳莫如深。

这种现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出现了转机。此后，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开始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土匪、帮会关系的一些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经常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最近，由刘明逵、唐玉良两位同志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面世，因为书中有些地方谈到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同样遇到了某些人的质疑。

我们认为，质疑者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问题的，也许他们认为，揭示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有损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在此，我们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有关部分做一些评论。

一、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

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作为“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帮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所有革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政治问题。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与帮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避而不谈，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的嘲讽。

^{*} 本文与刘平合作，原载《学术研究》，2000（3）。



我们先从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谈起。在此，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行帮、帮口、帮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长期地存在是客观事实；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做好帮会工作，才能有效地打开局面。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帮会势力浸润于工人阶级队伍之前，手工工场、厂矿企业中业已普遍存在着行会、帮口。明清时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人会馆、行业公所渐兴，它们是业主用祀神、义举、订立行规等手段团结成员的组织。随着雇佣劳动队伍的扩大，在雇工中也出现了行会组织，一般称为“行帮”。行帮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雇工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同雇主发生矛盾、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外的雇工以及“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冲突。^① 尽管行帮组织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物，但它与雇主的矛盾、斗争作用，使之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情况下向工会转化。

帮口是晚清以降城镇工人中的一种地域性组织。拿全国工业中心上海来说，工人大都以地缘祖籍来划分，如安徽帮、宁波帮、广东帮、湖北帮、苏北帮之类。即使是同一行业，也是帮口林立，如20世纪20年代初的汉口铁路工人中，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这种组织，按照邓中夏的说法，“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②

由于生存土壤适宜，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上述封建行帮、帮口都未衰减灭绝。相应地，他们与帮会复杂交织，在近现代工人运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主题与篇幅所限，我们在此主要论述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

中国帮会最初主要活跃于广大农村地区。迨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南的三合会、三点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中下游地区以“红帮”闻名），运河沿线的青帮，在广大城乡地区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这种状况与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进程是一致的：一方面，由于外国侵略、兵燹、苛政、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济凋敝，农民大量离村；另一方面，在沿海及华中等地区，一批近代化

^①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②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城市兴起。在城市无产阶级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各种帮会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及其他地区的工矿业、运输业中伸展触角，发展势力。

由于中国近代城市的半殖民地性，以及城市行业多种多样，竞争剧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力量较强等因素，决定了城市帮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帮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分布范围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汉等地的青红帮，上至官府，下至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到澡堂妓院，无处不有他们的势力。（2）分帮分行，各分地段。这种情况与原有的行会、帮口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3）组织严密，帮规复杂。（4）具有更强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就城市帮会的社会功能来说，除一些基本点与农村帮会相同外，它在为帮中失业者介绍工作，以及在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也还有某些特殊的作用。^①

民国年间，城市帮会势力之强大，我们可从以下一些数据得到印证。据1930年国民党方面的调查，人口并不多的芜湖市，青红帮分子的总数有二三万人，大多散布在水陆运输线和码头苦力工人之中。青红帮势力最大的上海市，据《时报》1914年的报道，仅红帮已达数万人之多。青帮的人数更多，1920年，上海的青帮人数在10万以上。据1930年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机器等22个产业及各业职工基本状况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以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都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系统，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②中国工人队伍中存在大量的帮会分子，帮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工人队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工人运动一直是它关注的重点。1921—1927年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重大困难——与欧美工人运动情况不同，中国工人阶级中基本上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有的只是行帮、帮口和帮会这类固有团体。这些封建地域性质的帮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依然拥有极大的势力。因此，如何排除工人中的帮口矛盾和帮会障碍，重新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成了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①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2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② 参见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3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与此同时，中外反动势力非常注意利用帮口、帮会组织尤其是它们的头目，以达到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的目的。大革命时期上海青红帮组织的“中华共进会”，解放战争时期杜月笙、向海潜、范绍曾等人组织的“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就是统治者利用帮会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凶恶工具。

那么，如何排除帮会障碍呢？从现代工人运动的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对于帮会及其头目的策略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总的来说，其主要方法不外乎两种：（1）派共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头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如李启汉在上海开展工运。^①（2）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如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中，李立三动员红帮首领与罢工配合行动；在“二七大罢工”时期，包惠僧、陈潭秋积极争取汉口铁路工人中的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江南帮首领黄桂荣等，使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罢工风暴迅速掀起。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开展工人运动，如果忽视中国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工人运动，往往会遭到失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成功与否、进步与否，往往与帮会、帮口障碍排除得如何有着直接关系。如果说，以往的工运史研究，人们忽视和回避这一点，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那么今天，我们就完全有必要正视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

二、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可行性

既然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与帮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应该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条件。

第一，文献资料不断结集出版，研究力量渐趋成熟。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的各种文献资料不断公布，有关回忆录、文史资料、厂矿企业历史资料的出版也令人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各级档案馆有关档案的开放，为我

^① 参见《包惠僧回忆录》，66~67页。

们了解当时政府、警察机关的态度和行动步骤提供了窗口；当时的报刊如《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向导》等相继影印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各级工会组织、有关科研院所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完全有可能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这类曾经为人忌讳的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国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学术界将工人运动史仅作为政治史和革命史来研究的时候，欧美及日本的一些学者即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了，如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所著《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一书，主要是从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等方面对工人运动进行深入研究的。^① 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于1993年出版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该书共分地域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三大部分。作者在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和政党等问题的同时，还运用“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的观点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结果“作者得以成功地探索社会反抗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②。其视角、方法、论证的新颖独特，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声誉。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马丁（Brain G. Martin）则从青帮大亨杜月笙入手，对青帮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做了精彩的个案研究。他认为，1932—1937年间，尤其是1934年后，杜月笙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调整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产阶级，以及劳工组织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③ 他们的某些观点尽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仍然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借鉴。

第三，可以将帮会史研究的成果引入工运史研究。在中国帮会史研究领域，近20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方面，蔡少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问题概述》^④不失为一篇拓荒之作。

^① 参见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该书原版为法语，1962年出版。

^②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参见 [澳] 布赖恩·G·马丁：《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载《历史研究》，1992（5）。

^④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330～370页。



其后，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刘才赋的《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等，也都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是从“帮会史”角度开展研究的，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帮会与工运关系的成果，可以充分借鉴利用。

第四，我们已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思想的禁锢，人为的禁区，只能将学术研究带入死胡同。不可否认，在研究中，人们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但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研究出来的东西能够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教训，那么，任何疑团都不难化解。

三、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评价

如果将日本人长野朗于1925年所著《支那劳动者及劳动运动》（北京燕尘社）视为最早的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专著的话，70余年来，对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研究，尽管艰难曲折，仍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等人不但亲自领导工人运动，还撰写了不少足以指导当时、遗教后来的工运史论著。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遇到了很多干扰，工运史研究依然独树一帜，成果喜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得以出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该书都引起了出版界、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工人运动史》凡六卷，洋洋250余万言。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这套书包含内容之丰富，是屈指可数的。同时，它大量运用第一手资料，充分吸收国内已有的工运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对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对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做了清晰的、历史的叙述。它给人们的基本感觉有两点，一是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突破了旧的框框，勇闯禁区，对许多有争议的人与事做了客观公正的论述。应该说，这套书将工运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对这套书做出全面具体的评价不是本文的旨趣，我们相信，有关专家和读者会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里，只想就该书对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论述谈些看法。



列宁曾经指出，“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 and 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①。既然在历史上中国工人与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就不能回避它。本来，这个问题在领导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论著中并不避讳。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开篇就是讲“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行会、帮口、秘密结社诸问题。国民党工运史专家马超俊所著《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也用了相当篇幅叙述帮会对于工运的影响。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人出于政治压力，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使之进而成了研究的禁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在，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敢于突破禁区，对这个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这是值得称道的。书中对中国共产党排除困难，将工人运动与帮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有关论述，不但无损于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而且从深层次说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概括了中国工运不同于外国工运的特点，从新的角度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这正体现了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然，从书中叙述的有关内容来看，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该书第一卷第五章第二节“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用了43页（495~537页）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主要致力于“帮会”源流的叙述，而在帮会与工运的结合点上，却着墨不多；即使在有限的探讨帮会与工运关系的篇幅中，作者实际上引用的大多是后来的史料，与“早期”有冲突。据我们所知，“早期工人运动”一般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或五四运动以前，如何协调这种前后关系，值得注意。再比如，作者在上述第一卷有关章节中提出该问题，就有必要在其余各卷中适当穿插，而实际上却显得很薄弱。此外，当时的其他政治派别，尤其是国民党，也十分注重利用帮会，帮会势力成了它们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一个得力工具。这一点，在书中似乎也未有很好的反映。

所以，我们认为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论述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够不够、深不深的问题。

顺便还应指出，从政治史研究角度而言，该书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来说，该书还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勃兴，其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远

^①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的影响，但在工运史研究领域，这种“影响”似乎既缓且微。如果继续用旧的眼光、旧的框架去研究工人运动史，就难以取得更多的突破。诚如刘大年所说：“现在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原有的正确道理，就显得缺少了什么，不教人贻足。”^① 如何“整体”地再现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历史面貌，将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已成为工人运动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诚然，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若干时间以来国内外同类题目中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刘大年语），在许多领域有所突破，但我们认为，作者们还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如工人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等。该书卷帙浩繁，但相当的篇幅在于描述政治背景，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决议等内容，在谈到工人运动本身时，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由“苦难—反抗”构成的。上引谢诺的著作，就专辟“社会与文化生活”一节，他说：“有些工人家庭尽管很穷，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宗教习俗，观音像或其他杂糅不同教派教义的神像，被悬挂在主屋或仅有一间屋子的墙上。他们还非常热衷于在节日期间演京戏，舞狮子，耍龙灯。”^② 同样，上引裴宜理著作也辟有“民间文化”一节，对上海工人中的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烧香拜佛等行为做了研究。她提到，上海“许多丝厂女工都爱唱越剧”。对于工人中的结拜习俗，作者认为：“兄弟结拜、姊妹结拜与秘密结社有助于为这些如同无根浮萍的工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认同感。”^③ 确实，如果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他们的心态、价值取向、他们本身在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正反作用，等等，从而使工人运动史研究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一句话，工人运动史研究完全应该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开展研究。

总体来说，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一部成功之作，衷心希望她的作者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①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刘大年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②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 107.

③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pp. 187-188.

论十九世纪的南洋华人秘密会党

自 19 世纪以来，有 2 000 多万华人迁徙到世界各地，人们称之为“海外的中国，外部的中国，一个隐蔽甚至神秘的中国，一个守旧而又时髦的中国，一个繁荣的、不问政治然而忠诚大陆的中国”^①。

这 2 000 多万海外华人，绝大部分侨居南洋即东南亚各国，占华侨总数的 90% 以上。从 19 世纪华人大批向南洋迁徙的路线看，主要是前往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南洋华人迁徙活动的中心，不少华人就是由新、马迁往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的。而南洋华人的秘密会党，也以新、马地区的势力为最大。这里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中心，对 19 世纪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有关问题，做一初步探索。

一、华人迁移南洋与华人社会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从汉代以来，史书里就有中国人到东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来中国进贡的记载。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关系。明代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就记载，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境内，当时已有很多华人。^②《明史》卷 323《吕宋传》记载：“吕宋（今菲律宾——引者）……闽人以其地近，且富饶，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这一时期，到南洋来的华人大部分是商人。

① [法] 弗朗索瓦·德勒雷著、赵喜鹏译：《海外华人》，1 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② 参见《瀛涯胜览》：“爪哇国……杜板……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泉人……杜板投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国有三等入：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窜居此也；一等土人……旧港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到了17世纪，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出现了几次移民南洋的浪潮。其中有出于政治的原因，也有出于经济的原因。政治大动乱方面，最明显的是17世纪中叶清征服华南各省时，大量效忠明室而拒向清朝低头的人即逃亡海外。1683年，台湾郑成功反清政权的覆没，使更多数量的反清仁人志士流散海外。据一位侨居印度尼西亚的老人告诉早期革命党福州人黄乃裳说：“一群数达三千多人的反满志士，携同眷属，即于台湾沦陷清手之后，分搭九船前赴东南亚各地，其中三船开抵吕宋（今菲律宾——引者），一船到了暹罗（今泰国——引者），三船到了爪哇，另两船则到马六甲。”^①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清朝中期中国人口激增，使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加之自然灾害严重，造成大批破产农民的流迁。当时福建、广东沿海就有很多农民迁到南洋谋生。清代谢清高在《海录》一书中记载，吉兰丹（在今马来西亚境内——引者）“闽人多居埔头，粤人居山顶。山顶则淘取金沙，埔头则贩卖货物”。关于泰国的情况，谢氏说：“商贾多中国人，其酿酒、贩鸦片烟、开场聚赌三者，榷税甚重。”^②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研究，当时迁移到泰国的华侨，主要来自广东省的台山、顺德、南海、香山、潮州和福建省的同安、泉州、漳州等地。此外，还有一部分海南、梅县、兴宁的客家人。^③

就在中国人大批向南洋移民的这一时期，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相继来到东南亚。他们抢夺势力范围，建立起殖民地。例如，英国殖民者1786年迫使吉打的苏丹（Sultan）割让槟榔屿，1800年，又迫使割让了威士利；新加坡开基于1819年；马六甲原为马六甲王国，在16世纪时为葡萄牙人所占领，后又相继隶属于荷兰、英国，尔后又为荷兰夺去，最后于1824年变为英国殖民地。至此，英国海峡殖民地形成。

征服者在这些地区，首先发展商业，进行城市和港口的建设。在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殖民者需要劳动力、水手、商人和经纪人。本地居民稀少，又抱着敌视态度，很少有人愿意抛弃他们的村庄而受雇于外国人。当时中国人的大量外流，正适应了这种需要。他们克服了对陌生世界的反感心理，被这些热带

①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16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② 谢清高、杨炳南撰：《海录》，2~5页，清咸丰元年（1851年）刻本。

③ 参见 Skinner. G. W.,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1962, p. 35.

的黄金国吸引而去。1795年，英国第一次夺据马六甲时，华侨人数已达到2161人。^① 莱特船长（Francis Light）——槟榔屿的统治者，在1786年10月1日的信上说：“我们的居民（主要指华民——引者）增加得非常快，他们已在为抢地盘而争执，每个人都尽力来建屋。”^② 新加坡的开埠者莱佛士（Raffles）在1819年6月10日致索美赛德公爵夫人（Duchess of Somerset）信中云：“我的新殖民地繁荣得太快了，我们开埠不到四个月，即已容受了新增的人口超过五千人——主要是华人，而且他们的人数有增无减。”^③ 事实的确如此，而且越来越多。大量的华籍移民不断地从中国东南地区涌向东南亚，华人在这些地区的人数急剧增加，成为引人注目的民族。^④ 在马来亚近代历史上，华侨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属马来联邦总督瑞天咸说过，如果没有华工，就不可能有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半岛的兴旺发达和繁荣昌盛。曾任马来亚殖民官、著名的东南亚史研究者布赛尔（Victor Purcell）写道：“如果没有中国人（指华工——引者），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如果没有现代马来亚的贡献（指橡胶——引者），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永远不会有这样巨大的发展。”^⑤

然而，中国人口更大规模的向南洋迁移，特别是华工的大量出国，却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这一时期，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腐败，战事频仍，灾荒不断，社会极度动荡，加之人口继续恶性膨胀，游民的急剧增加，就促使东南沿海的人民成群地向外寻求谋生之路。恰好此时，西方殖民者在东

① 参见[英]布赛尔著、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433页，台北，正中书局，1967。

② 同上书，437页。

③ [英]布赛尔著：《东南亚之华侨》，445页。

④ 根据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 1900* (Singapore, 1959)一书第36、45、50页采用的一份英国官方人口统计表，19世纪南洋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总人口数量与华人数量变动情况如下：

槟榔屿			马六甲			新加坡		
年代	总人数	华民	年代	总人数	华民	年代	总人数	华民
1812	26 107	7 558	1750	9 635	2 161	1821	4 727	1 159
1833	86 275	11 010	1827	33 162	5 006	1836	29 984	13 749
1851	107 914	24 188	1852	62 514	10 608	1850	52 891	27 988
1881	188 245	67 354	1881	93 579	19 701	1860	81 734	50 043
1901	244 094	97 471	1901	95 487	19 468	1881	139 208	86 766
						1901	228 804	164 681

⑤ 转引自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载《近代史研究》，1984（6）。



南亚急需招募大量劳动力。因为 19 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向海外寻求原料基地和销售市场，因而殖民地的作用越来越大。欧洲殖民者开始在东南亚加强农业和采矿工业的发展，为此，劳动力来源成为急迫的现实问题。由于南洋本地人少，欧洲人又离得那么遥远，于是殖民者的目光就转向中国的移民。这时，原先的自由移民已远远满足不了生产和开矿的需要，于是，产生了一种通过契约招募劳动力的做法，即买“猪仔”。

“猪仔”是指人为畜的贬词，指的是押身抵债到南洋谋生的华工，在当地又称“新客”。1827 年刊行的《粤游小志》讲道：“东省有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谓‘卖猪仔’。”这可能是最早提到“猪仔”的中国文献。^①起初，“客头”——人贩子通过诓诱、欺诈等手段，在华南一带招收华民，转卖殖民地。后来，由于“猪仔”的需要量愈来愈大，供不应求，贩卖“猪仔”就发展为有组织的经营。如槟城、新加坡开设的“猪仔”馆，与厦门、汕头、澳门、香港以及海南岛海口的“猪仔”馆，结成联号或分号，从事买卖活动。被贬为“猪仔”的华工大多由他人代出旅费，寻觅职业之后，预支工值偿还贷款，故又称为“赊单新客”。

所谓“赊单新客”，温雄飞在《南洋华侨通史》中有具体叙述：“赊单新客，亦有二类，其一则由航业者以船载之来，留其猪仔于船中，寻觅雇主，俟有雇主为之垫还船费，益使船主略有溢利，然后雇主带此猪仔而去，此类贩卖方法，业经停止。其他一类，则由经纪人由香港募之而来，屯聚小客栈中，然后寻觅雇主。然亦有雇主欲雇若干劳工，先示其意于经纪者，然后募之来。故此类猪仔于抵岸之后，一二日内将契约订妥，即驱之入山场操作矣。”^②

投机商和人贩子将招募掳掠到的中国苦力，装载在狭小、昏暗的船舱，经多日海浪颠簸，运到南洋各地，作为物品卖与他人，从中牟取暴利。“1800 年间，在槟榔屿出卖之猪仔，一年期之契约者，卖价 30 元，一年之内，不能清偿债务，再延一年。以自由劳工被雇一年之工值 60 元，雇主尚有 6 元余剩可得，猪仔一年之工价不过 30 元，是雇主所得之余剩为 36 元矣。”^③苦力贩子的利润，因时因地而

① 参见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② 转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 5 辑，3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 5 辑，41 页。



不同，但一般的利润率总在 100% 至 150% 以上。^①

19 世纪贩运到南洋的契约华工人数究竟有多少，已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根据一些中外专著提出的零星数字，估计从 1800 年到 1876 年，华人到南洋的人数累计约 180 万。从 1877 年到 1914 年，根据海峡殖民地政府劳工委员会历年年度报告的统计，这 37 年入境华人累计约 614 万，估计其中“猪仔”至少占 80%，约合 490 万人。^② 他们是以闽粤两省的破产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队伍。1871 年，一个在潮州目睹“猪仔”贩运活动的英国人记载说，从潮州去南洋的“新客”，大部分是“流浪者、无业者和贫困者”^③。道光十九年（1839 年）林则徐在一份奏折中也说：“夷船回国，间有无业贫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带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活。”^④

华人大批迁居到南洋后，就逐渐由华侨村形成华侨社会。随之出现不同类型的组织，一为同宗同族的血缘组织；二为操不同方言的方言群，在马来亚主要有五种，即福建话（Hokkien，实际为闽南方言）、广东话（Puntai，即广府语，亦称 Macao）、客家话（Kheh）、潮州话（Teochew，Techew）与海南话（Hailam）。^⑤ 各方言群内风俗习惯、性格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都有差异，而势力最大，几乎控制华侨社会的则是华人秘密会党组织。

二、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出现

西方人弥勒斯（L. A. Mills）说：“华侨不论到什么地方，秘密会党便在哪儿出现。”^⑥ 这话至少反映了 19 世纪华人迁移海外的客观事实。

南洋华人秘密会党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学术界说法不一。有

① 参见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 1 辑；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② 参见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③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p. 54.

④ 《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 4 册下，1127~1128 页。

⑤ 参见颜清煌：《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25 页。马来亚联合邦户口普查将华人分为福建、客家、广东、潮州、海南、广西、福州、兴化、福清和其他十帮，即依方言语系为准。参见 1961 年《马来亚联合邦年鉴》。

⑥ L. A. Mills, “British Malaya, 1824-1867”, in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 32.



的著作说，1770年，广东梅县石堡人天地会成员罗芳伯，因在国内犯罪，率领天地会会众出国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西部山口羊（Sinkawang）地方，以洪门名义，自称大哥，建立起兰芳公司（1777—1884），这个政治实体和经济组织存在100余年，对当地的开发起了很大作用，最后被荷兰殖民者消灭。^①另据可靠史料记载，清嘉庆四年（1799年），即槟榔屿开埠以后的数年，秘密会党发生反殖民政府暴乱，首次引起当局的关注。温雄飞在《南洋华侨通史》中说：“18世纪之末一年，即1799年，清嘉庆四年，英属槟榔屿政府，已有天地会中人举事之报告。此为南洋群岛最早发现天地会之纪录也。”^②纽波特（T. J. Newbold）和威尔逊（F. W. Wilson）在1840年合著的《华人秘密会党天地会》一书中说：1799年，在槟榔屿殖民地发现有华人秘密组织，“他们以等边三角形为会标，有严格的誓言约束会员，团结互助，企图动摇不列颠统治，建立华人自治团体，但为英当局的强力所压服”。时任威士利省监督的罗伊少校（Major Low）在一份报告中陈述：华人常常暴动，“一个区域的居民闻到处角声，便集体出来抵抗想要执行逮捕或履行某种任务的警察”，这是屡见不鲜的事。会内成员互相帮助，若“一位华人因犯罪而受到指控，不管他的罪行多么残暴，会员都将齐心协力，为他免罪”^③。如用金钱贿赂见证人，或用死来威胁凭良心说话的见证人，或帮助罪犯逃跑，从而开脱罪行，这成为会员应尽的义务。在缅甸，也发现嘉庆初年三点会活动的踪迹。吴玉成在《四邑人出国初探》一文中说，他“曾在下缅甸苜基埠（与榕城隔邻）见四邑人所建义兴馆（三点会）有嘉庆四年（1799年）的匾额”^④。

在新加坡，1824年发生了一次大暴乱。新加坡开埠者莱佛士的马来文教师阿布都拉（Munshi Abdullah）在这次暴乱发生的前一天，正好去新加坡内地丛林，探访这一暴乱会党，在他的自传中，对此有详细记述：

阿布都拉有一位华人朋友，是秘密会党成员，经他介绍，阿布都

① 参见陈达：《浪迹十年》，46～51页；Wolfgang Morse, *Chinese Regionalism in West-Malaysia and Singapore*, Humburg, 1979, p. 189.

② 《槟榔屿史料》，载《印度群岛公报》，1851年，转引自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111页。

③ T. J. Newbold and F. W. Wilson, *The Chinese Secret Triad Society of the Tien-ti-huih*;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37-38.

④ 吴玉成：《四邑人出国初探》，载香港《地平线》，总第21期，23页。

拉去了一次丛林会党驻地，正赶上举行新成员入会仪式，是在深夜1点开始的，2时结束。成员解散以后，阿布都拉从那位朋友口里得知，已有200余人前往新加坡活动，便急忙赶回报告，待他回到新加坡，事件早已发生。秘密会员用木炭涂脸，拿着松枝火炬，进攻富人住宅，洗劫一空。待当局得知报告时，出动警察干涉，仅抓到一个涂着黑炭的华人，很快，又有二三百弟兄来援助，警察们都吓得各自逃命。^①

根据威尔逊和纽波特书中提供的一份1826年的资料，马六甲地区的天地会除在市内活动之外，也自附近内陆的种植区与锡矿场内集结4000会员^②，说明今马来诸邦锡矿区当时也已存在秘密会社。至1840年，据说在整个海峡殖民地已有会党成员7000人之多。^③布赛尔在《东南亚之华侨》中估计，1841年新加坡已有1万名天地会成员，到1850年发展到2万人，而当时新加坡的华侨只有2.7万人，几乎80%的华侨参加了秘密会党。

为什么南洋华侨有那么多的人参加秘密会党呢？这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正确解释的问题。当时在任的一些殖民地官员，像罗伊少校、阿布都拉书记官等人，站在殖民者立场，把秘密会党的活动看做盗匪抢劫，严重影响殖民地统治秩序。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研究秘密结会问题时，也认为他们是一群扰乱社会治安、颠覆殖民地政府统治的叛乱分子，是一伙打砸抢暴徒、匪帮、无赖，无事生非，害人害己，他们对华人秘密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华人秘密会党在南洋出现并迅速广泛蔓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这里，我们从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产生的社会背景来分析。众所周知，华民是开发马来半岛的先驱，他们来到此地，大多被安置到孤岛或地域辽阔、人迹罕到之处，伐木垦荒，还有工头严密监督。每天在炎炎烈日下工作，不许懈怠，否则遭到监工鞭打，加之当“南洋开发之初，荒山密林，幽翳涤密，类皆猛兽毒蛇栖身之处，此辈开荒辟林之猪仔，不死于残酷刑罚者，或多为猛兽裹腹之物”^④。名曰契约劳工，实际上许多华侨老死于此，由于工资极低，仅够维

^① 参见 Munshi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Hikayat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 (The Story of Abdullah)*;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53-57.

^{②③} 参见 T. J. Newbold and F. W. Wilson, *The Chinese Secret Triad Society of the Tien-ti-huih*, p. 131; 颜清澹:《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 34页。

^④ 《华侨年鉴》(1939年新加坡华侨商报社版)第五编《南洋与华侨》第四章《华工》, 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 第5辑, 43~44页。



持生活费用，若华工沾染上烟、酒，势必借债，“是以契约告终之日，为债务关系，多被迫续订契约而继续其牛马生活，或终至困顿老死于异乡山林之中”^①。

种植园的华工如此艰难度日，矿区华工生活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力开矿，技术相当落后，工作尤为辛苦。华工每日“从破晓到清晨七时，清除夜间矿坑中所积聚的水，七至八时进用早餐，八至十一时作工，十一时至下午一时用午餐，下午一时至五时作工”^②，夜晚还要冶炼当天开发的锡矿石，直至完工才休息。从这张简单的工作时间安排表上可以看出，当时工作时间、劳动强度，都属于超强度的剥削。连西方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契约华工是世界上劳动效率最高，工价最低廉，最为理想的劳动力。^③

拿律（Larut）是霹雳州的著名矿区，1873年，矿区的一位头人说：“由中国直接移民到拿律来的苦力，每年约有二千至三千，在开拓森林时，约有百分之十至二十死于热病，当矿山开采之时，已有百分之五十死去了。”^④

华人历经海途险境，来到他乡异邦，举目无亲，孤苦无助，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事开拓性工作，备尝艰辛，尤为气愤的是，还要受到殖民者、庄园主和矿主的残酷剥削，以及人身污辱歧视，他们哭诉无门，得不到祖国的保护。

当时，清朝政府沿袭明朝所行禁海政策，严禁海外移民，更谈不上设立国外保护机构。虽然到1877年始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但在达致保侨目的时所遭遇到的许多困难，实均在清政府所能解决的能力限度之外”^⑤，实际控制华民的仍是英国在1877年设立的华民护卫司（The Chinese Protectorate）。华民，特别是那些苦力劳动者，为了自卫反抗，为了实行生活的互助，就纷纷结拜和投奔秘密会党，于是，华人秘密会党就在南洋各地出现并迅速蔓延。

当然，南洋各地出现的秘密会党，从组织系统来看，属于乾隆

^①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5辑，43~44页。“猪仔”最后正式合同，大约为每月工资5元，期限三年，工资共180元，此180元之身价，“猪仔”自己直接所得不过10元、20元而已，其余大部分则为数个段落叠积之资本，层层抽剥，扣去净尽。见陈翰笙前引书，36页。

^②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463页。

^③ 参见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④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6辑，190页。

^⑤ 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7页。

年间在闽南诞生并迅速在中国南部流传的天地会的海外分支。天地会传入南洋，最早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随华籍移民入南洋”^①；一是清政府每次镇压天地会起事后，有许多成员被迫逃亡南洋。如1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就有很多天地会分子潜逃南洋。^②这些人来到南洋后，继续传会，把天地会的组织和传会方式带到了南洋。南洋华人的秘密会党，就是在这种组织机构和结拜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继承了天地会的反抗斗争传统。

三、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帮派斗争

南洋的华侨，主要来自福建、广东两省，其次是广西，再次是包罗其他各省的所谓“三江帮”，他们都依方言划分集团帮派。因此，南洋的华人秘密会党，也不能不受方言群的影响，分为许多帮派，关系错综复杂。由于帮派的分化对垒，就经常发生流血的械斗。以马来亚为例，在19世纪，马来亚的华侨社区有五种主要的方言群，那里的秘密会党就有义兴会（Ghee Hin）、海山会（Hai San）、和生会（Ho Seng）、华生会（Wah Sang）和大伯公会（Toh Peh Kong）等名目。^③这些会党都是天地会的支裔，前三者的主要成员是广东人，后二者的成员以福建人为主。这些方言群之间，在风俗习惯与性格方面存在着差异，所操的职业也不同。这种情况，布赛尔曾做过详细的分析：福建人习惯于城市生活，在经商和开店方面富于天才。他们和这方面的关系很深，这即说明他们何以在新加坡、

① “Wherever the Chinese emigrated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ir secret fraternities went with them. Lodges were established in Indo-China, Hawaii, Thailand, Malaya, Indonesia, India, Australia……”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 32)

② 参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110页。

③ “During its chequered history in Malaya, the Triad Society has used many names, which has made the……As far as can be trace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s main branches were know as: (i) Ghee Hin Society; (ii) Hai San Society; (iii) Ho Seng Society; (iv) Wah Sang Society; (v) Toh Peh Kong Society.”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35-36) 会党组织又称公司。“在南洋之天地会，不名为天地会，而名为公司。所谓公司者，以英荷两属之操政治权者，为东印度公司，公司实不啻政府之变相。天地会中人，本亦怀有政治思想者，故亦自拟于公司，自称为义兴公司焉。”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111页。



槟榔屿及马六甲占优势。广东人是比较多才多艺的，他们很多人从事农业，在城镇的人也不少，但假使他们有所偏爱的话，他们的兴趣是在于采矿，在矿山方面他们被雇佣的人很多——如霹雳的近打流域（Kinda Valley）。客家人在各帮中也许是最倾向于乡村生活的，他们和广东人成为锡矿方面人力的主干，他们也普遍地从事于农业生活，在非矿区的乡间，他们的人数相当可观。潮州人像其他广东人一样，在兴趣方面是广泛的，但除了吉打省情形特殊之外，似乎一般都很少喜爱城市的职业。在吉打省，由于早期的一次偶然遇合，便令他们成为人数最多的一帮。在市镇和乡村的海南人，主要是被雇来经营店铺和照料家务，但他们也广泛地分布于乡区，尤其是出产橡胶的地区。^①

根深蒂固的不同方言集团的社会隔离现象，自然会引引起彼此间的误解、猜疑、敌视与冲突，这种冲突在马来亚时常发生。在历次冲突械斗中，秘密会党都充当着主角。根据各家的记载，在新、马地区发生的较严重的秘密会党帮派冲突，见表9的统计。

表9 19世纪新、马地区华人秘密会党帮派冲突主要案例表

冲突时间	冲突地点	对垒双方		备注
1841	新加坡	义兴（潮州帮）	义福（福建帮）	
1846	新加坡	义兴（潮州帮）	义福（福建帮）	
1854	新加坡	义兴（潮州帮）	义福（福建帮）	
1854	槟榔屿	义兴（四邑帮）； 和成（其后并入 义兴）	海山（客帮）；大 伯公（福建帮）	拿律战争后 海山并入大 伯公
1862—1873	拿律	义兴（四邑帮， 以新宁县为主）	海山（客帮，以增 城县为主）	最初
		潮州帮（由许武 安领导，加入义 兴）	大伯公（福建帮， 由邱天德领导，协 助海山）	后来
1867	槟榔屿	义兴	大伯公 （海山加入）	
1876	吉打	义兴	大伯公	

资料来源：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

这些冲突，有的往往因某种细小事件而引起。如1846年在新加坡发生的冲突，就是由两派因为送葬问题，为维护各自荣誉而引起

^① 参见 [英] 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397~398页。



的。何有国 (Ho Yem Ko) 是一位面包商人, 曾担任新加坡义兴公司的头领, 有一定的声望。他逝世后, 义兴公司决定搞一次较隆重的送葬仪式, 以符合他的身份, 同时扩大本公司的影响。由 6 000 至 7 000 人组成的送葬队伍, 打算绕城一圈, 向众人表示他们对长者的尊敬。队伍自然也要经过义福公司住地, 这对义福公司来说, 是他们的耻辱, 为此准备用武力阻止。当送葬队伍到达义福公司住地时, 双方发生冲突, 伤亡数人。^①

17 年之后, 新加坡又发生一起因送葬引起的暴乱事件, 这次起源于两派不同的风俗习惯。

一位名叫伊生淑 (Gee Seng Soo) 的妇女病故, 他有二子, 却分别属于海山和福生两派会社。按常规送葬仪式, 是由年长一方的会党先护送一程, 然后由其他社团护送, 而海山公司这次打破惯例, 要求一直护送到墓地, 为此两派发生冲突, 兄弟刀戈相见。^② 以上事实, 正如西人云汉氏 (J. D. Vaughan) 所说: “属于同一地域, 同一宗亲和同一县份, 甚至同一家族的华人, 由于事不凑巧, 为效忠他们的秘密会党的关系, 在生死的战斗中, 便可能发现他们彼此敌目相视, 自相残杀。”^③ 这反映出南洋华人对秘密会党的忠诚胜于血肉之情。

当然, 还有一些械斗出于其他的原因, 或因一次赌博输赢, 或为某妇女而引起的争风吃醋, 在矿区还有为水的供应等等, 诸如此类的原因, 都可能成为两派斗争的导火线, 像 1862—1873 年的拿律战争 (The Larut Wars), 1867 年的槟榔屿暴乱, 都起源于两派华人之间的这类纠纷。而这些械斗常常被殖民者所利用。他们以调解人的面目出现, 从中挑拨, 扩大战事, 待两派俱伤, 再用武力干预, 从而控制秘密会党, 巩固殖民统治, 进而扩大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英当局主要采取这一手段, 使马来诸邦逐渐成为英国保护地区。对此, 我们将在本文的第六部分, 以拿律锡矿为例, 做具体说明。

华人秘密会党的帮派冲突, 引起多次暴乱, 一方面削弱了会党本身的力量, 另一方面对南洋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这些公开的冲突, 华人秘密会党已不再成为秘密, 被众人所知, 并且当地马

①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69-70.

② Ibid., p. 100.

③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 Settlement”, 转见 [英] 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 466 页。



来人、印度人等土著居民也参加华人秘密会党，借助其力量展开土人之间的派别斗争。

四、华人秘密会党与南洋土著居民的关系

新加坡于 1851 年至 1854 年之间，断断续续发生多起暴乱，殖民地当局为此派专人调查事因，以便掌握秘密会党动向。在调查过程中，官员们惊异地发现：当地马来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也有参加华人秘密会党的现象。当局甚为惶恐，禁止向外泄露这一“奇怪”的现象。而 1867 年槟榔屿暴乱，仍起因于土人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他们各自拥立的两派华人之间的大冲突，土人直接参与事件，与华人秘密会党的关系昭然于众。

1867 年槟榔屿暴乱是第一次拿律战争的第二阶段，在这次冲突中，出现了土人组织白旗会和红旗会^①，他们联络各自亲近的华侨组织，巩固自己的势力。

白旗社建于 1856 年，红旗社 1860 年成立，起初都是土人组织的宗教团体，信奉伊斯兰教，土人的婚、丧、喜事等均由社团出面举办，对社会、公众没有妨害。后期社团性质有了改变，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各自加强势力，双方发生冲突，成为两个对立的土人组织。在斗争过程中，双方都向华人的秘密会党求助，作为自己的同盟军，白旗社与义兴会结盟，红旗社则找到了大伯公会。

事件发生在穆哈兰姆节（Muhurram Festival，穆斯林宗教节日）不久，一位马来亚金刚石富商、白旗社成员遭到谋杀，据调查凶手是红旗社成员。白旗社欲以报复，双方发生冲突，并很快向各自的华人同盟军求助，于是，华人两派也介入这次冲突，形成华人、土人交错，一起抗衡的大混乱局面。暴乱持续 10 天，调查结果，竟有大约 3 万华人与 4 000 马来人（此项人数均占当时全槟榔屿与对岸威士利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卷入流血火拼之中，损失重大，估计达 6

^① 此两会乃专为收纳马来人及吉宁人各色土人而设，红旗为义兴之分支，白旗则义福之分支也。其拜盟仪式，略有更改，因土人崇奉伊斯兰教故，闻发誓时，以《古兰经》置于其首，使之宣誓，此为伊斯兰教人最严重之宣誓仪式，但此会亦不尽全属各色土人，中国人亦多有在中，主持各事，此会势力蔓延于政府各机关下级之奉公职者。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139 页。



万银元。^①

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占马来亚人口绝大多数，是马来亚社会主要成员。冲突、暴乱几乎牵涉全体居民，自然引起殖民者的特别注意，他们惊恐不安，出动警察甚至军队加以干预，为此，秘密会党与警察、殖民当局之间的矛盾斗争就不可避免地突起。

五、秘密会党反抗殖民者的斗争

华人秘密会党与警察、军队的冲突与交战，反映了华籍移民与殖民当局之间对立的矛盾关系，这是 19 世纪马来亚殖民地斗争的焦点。发生冲突的原因并不是像一些西方学者说得那么简单：华人派系冲突，影响社会和平、治安，破坏居民财产，为此警察出面干预，华人反过来对付警察，显然警察每次成为无辜的替罪羊。事实上，华人反对殖民当局的斗争，与当时中国国内反英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有紧密联系。

1840 年鸦片战争，英军大炮轰开中华古国大门，侵略者铁蹄践踏祖国河山，尤其南部沿海诸城，直接遭到英国骚扰。他们破坏田园，侵夺财产，屠杀华人，引起举国上下强烈愤恨。下层人民自发组织反英斗争，像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成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人统治，拿起武器，英勇反抗的光辉典型，而永载史册。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危机，迫使许多破产劳动者成群结队地涌向海外，谋求新的生活出路。可以这么说，是英国侵略势力把他们赶出了家园。

但是，谁能料到，他们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南洋的马来亚等地也是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天下。殖民者通过武力占领、欺骗土人等多种方式，逐渐地侵吞这块富饶土地，成为马来亚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强迫华民开发锡矿，种植甘蔗园，残酷剥削、压榨华侨，其统治方式无异于北美殖民者对待非洲黑奴，这怎能不引起华籍移民的强烈愤恨呢？！

那个时期的马来亚政界人士手稿、政府报告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华人秘密会党与英官员、警察之间的冲突事件：1854 年 5 月，新加

^① 参见颜清煌：《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36 页。又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Chapter Eight: The Penang Riots, 1867。



坡秘密会党袭击当地乔奇街上的警察所，抓走了几位警察；1856年，警察破坏华人一所娱乐中心，华人群起反对，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接着，1857年，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起事。1856年11月，新加坡市政当局通过一项新的警察维护秩序的法令，意在加强对华人活动的干涉、控制，这在华人团体中引起强烈不满。12月，在秘密会党主持下，华人在乡村召开公众会议，讨论抵抗方案。新年之初，新加坡华人商店全部关闭，庄园苦力、手工业者、船员举行罢工，新加坡成为一座死城，市场萧条冷落，街头冷冷清清。末了，当局不得不做出让步，重新解释法令条文，委任华侨团体中有威望的人士出面，奉劝华人恢复生产、开店经商，华侨罢工斗争取得很大成效。^①

在这同时，华人秘密会党的斗争目标也指向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魁首——天主教士。

西方殖民者历来在武力侵略的同时，实行文化侵略，即企图利用传教手段麻痹殖民地人民的意志，以征服全球。他们在占领海外殖民地的同时，就纷纷将传教士派往各地。诚然历史上不乏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的教士，像明末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光荣使者，而史书记载更多的却是披着黑衣、道貌岸然的恶魔，他们借传教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他们在各地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恨与反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各地就连续发生反对洋教士的斗争，这些斗争，不能不影响到海外华人的反洋教斗争。

1851年新加坡暴乱，斗争矛头就直接指向天主教传教士及改信天主教的华民。新加坡传教士大部分是法国人，他们在华人中传教，吸收信徒，使岛上许多华侨（有些是上层富商）皈依罗马天主教，大大削弱了秘密会党在华侨团体中的作用。于是，1851年，秘密会党就在新加坡乡区各地向信奉天主教的华侨发动一次普遍进攻，并袭击教士住宅，狠狠打击了天主教气焰。艾塞莱（Issaly）是武吉知马（Bukit Timah）地区的法国传教士，热心于在华人中传教。有一天，他前往巽盖比欧（Sungei Benoi）探望一位生病的教徒，路上听说会党分子准备绑架他，吓得不敢回家，逃进丛林，在那儿待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跑到新加坡城避难。会党未抓到他本人，进攻他的庄园，抢走庄园所有财产。有一位华人教徒名叫唐阿和（Tan Ah

^① 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88, 96-98, 99.

Choon), 听说会党要进攻他的庄园, 赶忙带着 8 000 美元钱财向新加坡城逃亡, 路上被华人抓获, 带入丛林, 抢走他的钱财, 其庄园也被洗劫一空, 待警察局长杜马先生 (Mr. Dunman) 带卫队来搜查, 会党分子已安然转移。^① 斗争持续一周始告平息, 当局曾派印度罪犯追踪会党分子, 制止会党扰乱, 但没有成功, 末了出动军队才将其镇压下去。估计这次起事, 秘密会党破坏了 27 座香料园, 杀死 500 多名华人教徒, 有一些是家道殷富的改奉天主教的教徒, 他们已经成为种植园主了。^②

秘密会党这次斗争未免扩大了对立面, 500 余名华人中大多是无辜的, 由于一时气愤, 他们把天主教徒都作为斗争的对象。但这次起事, 他们团结了更多的会外华人。首先义兴会和义福会联合起来, 抛弃过去成见, 一致对外; 同时他们依靠众多的反对洋教的华人, 在华人团体中形成了反抗罗马天主教的“统一战线”, 这是他们取得这次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六、殖民者挑动南洋土人与华人的纷争

19 世纪的南洋, 无疑存在三种主要势力: 当地的土人、英殖民者和华人, 他们在这段历史上各自扮演何种角色? 相互之间关系又如何? 我们准备以马来诸邦为例, 做一说明。从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出, 英国殖民者是如何利用马来人纷争、华人冲突, 来挑拨离间, 浑水摸鱼, 从而获得殖民地统治权的全过程。

马来亚半岛内地, 蕴藏着丰富的锡矿, 著名的有拿律、雪兰峨等。1850 年以前, 拿律地方几乎没有人烟, 第一位涉足那儿的可能是马来商人耶法 (Che'Long Jo'afar)^③, 他受霹雳苏丹的委托, 去威士利省南部各地收租, 途经这里, 不知怎么发现了这块矿藏丰富的土地, 于是定居立业。1850 年, 由霹雳苏丹处取得拿律地方的产权状, 作为自己的私产。

据说耶法决定在吉利包 (Klian Pauh) 定居时, 那儿只有三位华人。不久, 檳榔屿的华侨矿工即涌入拿律, 并很快形成秘密会党的

^① 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79, 81.

^② 参见 [英] 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 448 页。

^③ 参见上书, 465 页。



拿律分会，即“四县”和“五县”，“四县”属于义兴会的会员，“五县”属于海山会及大伯公会的帮会组织。

华人两派集中一个地区，纠纷、摩擦难以避免。1862年，吉利包的海山会成员和距离数里之遥的甘文珍（Kamunting）矿区的义兴会成员之间发生了纠纷，事件的肇因是两派会员之间的一次赌博争执，互不相让，于是冲突扩大。海山会占优势，14名义兴成员成为阶下囚，第二天13人遭到杀害，海山会用他们的血染红海山会会旗，放走1人回去报告这个消息。为了洗耻报仇，义兴会决定开战，于是第一次拿律战争爆发。^①

双方都向当地马来头人请求援助。耶法已于1857年去世，由其子伊卜兰岑（Che Nga Ibrahim）继承，并由苏丹承认他继承其父而为拿律的统治者。这位头人办事狡猾，见风使舵，当他看出海山会方面势力较大，便靠拢他们那一边。在拿律战争中，他多次扮演这种角色。海山会联合马来人，势力更大，结果杀死义兴会首领苏亚昌（So Ah Chiang），并将他的党羽逐出拿律，被驱逐的矿工只好向殖民地当局求援。

英殖民者一直苦于没有办法插手马来亚内地事务，这次做好人的机会到了。总督卡文纳夫上校（Colonel Cavenagh）派专人去拿律调查事件的前因后果，然后下令封锁海岸线，逼迫伊卜兰岑拿出17447美元作为损失赔偿费，被逐的义兴会成员又回到了甘文珍矿区，恢复旧业，何吉寿（Ho Ghi Siu）继任义兴会头领。显然义兴会对殖民地当局的做法是感激的，第一次拿律战争在英方调解下结束了。

10年之后爆发的，规模大、影响深远的第二次拿律战争，同样起因于两派纠纷。

拿律的义兴会另一首领李亚勤（Lee Ah Kun），被指控与海山阵营的一个女人私通，据说这女人是槟榔屿海山会首领邓景贵（Cheng Keng Kui）的亲戚。海山会人便将李亚勤和那个女人捉住，装在猪笼里游街示众，最后把他们丢进铁池中淹死。义兴会被激怒了，迅速采取报复行动。1872年2月12日，双方开战，一向占优势的海山会这次失利，被赶出吉利包。伊卜兰岑见势不妙，赶忙向战胜的义兴会人乞和。

在这期间，霹雳州发生王位争端，于是华人会党斗争与霹雳王位继承问题搅在一起，矛盾变得更加复杂。1871年，霹雳王亚力苏

^① 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102-103.

丹 (Sultan Ali) 逝世, 伊斯麦尔 (Raja Ismail) 和阿布杜拉 (Raja Muda Abdullah) 都有理由成为合法继承人, 两个敌对候补人为此争执不休, 都寻求华人会党的支持, 伊斯麦尔联络海山会, 阿布杜拉找到义兴会。这无疑扩大了两派原先的纷争, 斗争达到了顶点: 谁取得胜利, 意味着谁将得到苏丹开国功臣般的优待。

1872年10月16日, 海山会突然反击, 打回拿律, 取得很大成功。在一个月內, 有2000名义兴会的难民设法逃到檳榔嶼, 有100多人受伤, 所有义兴会的妇女都落在敌人手中, 而这下子伊卜兰岑又毫不犹豫地倒向海山会一边。^①

拿律的严重局势再次引起英殖民地当局关注, 并积极采取干涉行动。1873年11月, 新任总督克拉克爵士 (Sir Andrew Clarke) 抵达新加坡, 负责“对马来诸邦的事件加以有限的干涉, 以保护和平与安全, 镇压海盗, 并向各邦派一驻扎官或政治代表, 从而发展道路、学校与警察等项任务”^②。这是英殖民者向马来内地扩大势力的信号。在国务大臣致新任总督的一封公文中, 更露骨地表明了此野心: “女王陛下政府认为, 运用他们的势力, 与当地王公在可能范围内, 拯救这些富饶肥沃的国土, 以免遭受毁灭, 为义不容辞之责, 因有的骚扰如仍不加以制止, 则此种毁灭盖不可免。”^③话说得相当漂亮, 拯救毁灭、苦难, 殖民者就是惯于打着这一旗号, 侵占他国, 结果给殖民地带来更加深重的苦难, 甚至完全毁灭。

克拉克总督一上任, 就着手办理此事, 他派毕其麟 (Mr. Pickering) 去霹靂与两派会党头领谈判, 之后, 邀请他们和霹靂所有主要马来头人一起到邦谷岛与总督会谈, 结果签订了两个条约。一个是英国和出席会谈的霹靂首领之间用巫文所写的邦谷条约 (The Treaty of Pangkor), 委任阿布杜拉王储为霹靂苏丹; 另一个是英国和在檳榔嶼及拿律的义兴会与海山会首脑人物之间用中文所写的条约, 要求双方停止争战, 交出5万美元作为和平基金。^④苏丹王位问题如此顺利解决, 其中自有奥妙。

阿布杜拉有一位好友谭开成 (Tan Kim Cheng), 是新加坡著名

^① 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Chapter Eleven: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 Larut Wars, 1872-1874。

^{②③} [英] 布赛尔: 《东南亚之华侨》, 469页。

^④ 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Chapter Twelve: The Unseen Hand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Treaty of Pangkor。



华商，任警官、泰国驻殖民地总领事等职，与许多有影响的欧洲人来往甚密。阿布杜拉通过他私自与总督取得联系，总督愿意支持他为王，但必须答应两个条件：其一，殖民地政府派一英国驻扎官，除有关马来宗教及习俗等事项外，所有问题均须征询他的建议并据以实施；其二，拿律矿区向英当局交税。阿布杜拉当王心切，立时答复这一屈辱要求，实际上他成为英殖民者的傀儡。

华侨及当地其他马来头领很快看清条约的实质，联合起来反对。伊卜兰岑支持伊斯麦尔，拒不放弃王位。后来阿布杜拉也看清了形势，倒向伊斯麦尔一边，同意他的做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放弃王印，否则霹雳将为英国吞并”。1874年10月17日，毕其区（J. W. W. Birch）被指派为霹雳第一任英国驻扎官，他着手控制霹雳各矿区税收之权，华人和马来人联合反对，将他秘密处死。英殖民者于是大打出手，派出军队干涉，1875年12月17日，所有组织的抵抗都告终止，接着劳先生（Mr. Hugh Low）被派为继任驻扎官。

1884年初，沿袭新加坡于1877年设立华民护卫司的成例，霹雳也委派了一个主管华侨事务的政务司，舒尔茨（Mr. Schultz）受命担任这个职务。这样，霹雳名为英国保护区，实质上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①

雪兰峨、森美兰、吉打等州的情形也差不多。1874年，雪兰峨归属于英国的保护之下，1874年以降，后来成为森美兰的各邦亦归属于英国的保护之下；1888年彭亨，及1914年柔佛，亦均受英国的保护；依据1909年曼谷条约，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及玻璃市的宗主权由暹罗移交给英国，英国并与各该地的统治者签订了保护条约。^②至20世纪初，马来诸邦均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地。

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英殖民者帮助落后国家，调解土人之间的矛盾，都是侵略的幌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的，他们从不规避用最卑鄙的手段和方法，为了自己的复兴，在东方统治者的朝廷中广泛使用阴谋诡计，经常行贿、欺骗、讹诈和挑拨离间，不惜组织阴谋和暗杀，以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这正是英殖民者的本质。

^① 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Chapter Thirteen: The Sequel to the Treaty of Pangkor; 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

^② 参见 [英] 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420~421页。



英国殖民者在东方采取“以亚洲人反对亚洲人”的政策，千方百计破坏华侨与当地民族的友好关系，但华侨和当地人民都是受剥削、受压迫者，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最终还是团结一致，起来反对英国殖民者。

七、殖民者对会党的放任、登记、镇压政策

秘密会党的地位和势力在南洋华人中的迅速提高和增强，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特别是它领导华侨从事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和进行反庄园主剥削、矿主压榨的罢工示威，对英国殖民当局是个严重威胁。因此，“殖民地政府之人员，其视天地会，殆如毒蛇猛兽，扑灭唯恐不速者”^①，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心机注意这一团体的动向，研究其性质与作用，以便采取对策。一些西方学者对英国 19 世纪在马来亚实行的政策、措施做过深入研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于秘密会党活动所造成的社会不安，海峡殖民地当局所采取的对策，缓慢而审慎。“自 1799 年至 1890 年，经过九十多年的时间，英当局才逐渐从完全放任的政策转变为压制禁止政策。”康柏（L. Comber）在他的著作中，将英国殖民者在这 90 多年时间内所实行的政策，划分为四个时期：（一）1799 年至 1868 年的放任、容忍时期；（二）1869 年所谓的镇压危险会党；（三）1870 年至 1881 年的非限制登记时期；（四）1882 年至 1888 年，限制登记和部分镇压时期。^②

在殖民地早期，华侨事务大部分由秘密会党处理，他们按风俗习惯、传统道德调解华侨之间的纠纷、矛盾，殖民地当局也依照“一般自然的公正”行事。1797 年，一位裁判官考恩特（George Counter）在判决一名华人男子和一名华人女子的时候，处理的办法即把他们的头发剃光，并从下午 4 时到 6 时带着枷站两次，当众予以侮辱，然后将那名男子监禁后再驱出该岛。^③

1808 年，劳制定了第一部约法（Charter of Law），把英国法律制度搬到马来亚，用以加强殖民地统治，但具体仍采用“间接统治

①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140 页。

② 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 261.

③ 参见 [英] 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441 页。



制度”，由华人头目甲必丹^①为中间联系人，政府通过他们控制华侨，“将华民大体上放在他们自己的首领管理之下，为这些首领建立起作为中央的和发布命令的地位，并给予他们范围较大的权限，俾使他们充分有效地发挥警察的功能”^②。而当时任命的华人甲必丹，几乎都是秘密会党的头目，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华侨的领袖，那么你就必须是一个秘密会党的头领。

雪兰峨州华侨甲必丹、客家人叶亚来（Yap Ah Loy），这位吉隆坡的奠基者，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曾担任过海山会的头领，1864—1884年“间接统治”期间，他掌握吉隆坡大权，一直靠海山会作为后盾。

叶亚来曾是卖猪商人，他的一位芙蓉朋友是秘密会党成员，通过这位朋友，叶亚来加入会党，由于精明能干，很快当选为双溪乌戎海山分会头领，这是1860年的事。4年以后，他辞职去吉隆坡，招收了一批拿律战败逃出霹雳的华民，开发吉隆坡，将这个建在沙滩上的小村庄发展为城镇，很快成为雪兰峨的州府，20世纪成为马来西亚首都。随之他在华民与马来人中威信提高。1879年，英国通过惯用的帮助手段，获取了保护雪兰峨州的权利，在吉隆坡派驻扎官，不过仍旧重用叶亚来，认为他是“雪兰峨华侨公认的首领，他在这一次，正如在所有其他事件中一样，均与警方诚意合作，以维持邦内的秩序”。殖民者否认他是秘密会党成员，而事实上一直是秘密会党在起作用。^③

英人在这一时期之所以采取放任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一）警察和军队力量薄弱，其一表现在人数少。刚刚建立的警察所只有几位欧洲警官，一帮印度卫兵；1867年槟榔屿暴乱时，只有500名战士，40位皇家炮兵，350名警察，而对手是3万多名武装华人。^④其二表现在他们的文化、业务水平低，几乎没有一位警官会说汉语，更谈不上了解华民的风俗了。（二）英国政府未制定法律措施。

^① 清朝初年，迁居南洋马六甲的华人已有自治制度，其头目称为“甲必丹”（Captain，来自葡萄牙语）。马六甲华人第一任甲必丹是郑芳扬。至清朝中期，南洋其他地方华人也实行甲必丹制。谢清高在《海录》中记载吉兰丹的情况说：“呷必丹者，华人头目。”（《海录》，8页）

^②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446页。

^③ 参见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Chapter Fourteen: Capitan Yap Ah Loy of the Hai San Society.

^④ 参见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 114.



英人政策的改变，起自 1867 年，英国殖民部取代英属印度政府直接管辖海峡殖民地，表明英政府对殖民地加强管理。乔治·奥德（George Ord）就任总督，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调查委员会，对 1867 年槟榔屿暴乱做调查研究，以便政府采取管制措施。1869 年，政府颁布了登记危险社团法令，实施一种注册制度，规定所有组织（除共济会、商业性团体外）均需向政府注册，注明其组织的详细资料：名称、住地、头领、会员等等。英当局在了解了各会党的实力与组织情况后，则采取一种控制其首领的策略，委任华人头领为特别警官，结果并不理想。19 世纪中叶，秘密会党活动特别活跃，几乎每一个男子都成为会员。^① 这期间，殖民当局还设立了专门机构华民护卫司，具体负责华侨事务，毕其麟（W. A. Pickering）为第一位护卫官。随着殖民统治政权稳固，经济、军事势力加强，英政府终于采取强硬措施，1889 年新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史密斯爵士（Sir Cecile Smith）颁布镇压会党法令，规定各种会党的存在为非法，所有会党的秘密标志、符号与神主必须公开销毁，并对主持非法会党的人科以极重的罚款。^② 1890 年，法令正式生效。

当时发行的《叻报》对新加坡会党依照英当局长法令，焚毁各会神主的情形，有极详尽的报道。文中说：“1890 年 2 月 15 日，所有六大会党——义兴、义福、福兴、广福、松柏馆、广惠肇党的会头与执事人员，齐集于小坡梧槽路（Rochore Road）的义兴党总部，在正、副华民政务司与警察总监的见证下，在举行了一项庄严的仪式之后，销毁了所有会内的神主标志。事后，英官员均趋前道贺，祝贺他们解散会众，重新为良好的当地公民。”^③

然而，烧毁的只是公文、标志，华民反抗英殖民统治的思想是烧不掉的。这种强制政策只能驱使会党活动更加神秘，加强其组织的秘密成分，使他们转入地下活动，因而行动更为有效。

据 1890 年 11 月官方最后一次统计：新加坡存在 10 个秘密会党，68 316 名成员；槟榔屿有 5 个秘密会党，113 300 名会员；马六

^① 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 94.

^② 罚款条令为：（一）任何人计划或帮助组织非法社团，坐牢 3 年；（二）任何人只要他是非法社团成员或参加过一次非法会党活动，罚款 500 美元或坐牢 6 个月；（三）任何人若为非法社团集会提供场所，罚款 500 美元或者坐牢 6 个月。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 265.

^③ 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38 页注 81。



甲及马来诸邦具体情形不清楚。^① 放任、登记、镇压，英殖民者施行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诚然，今天东南亚地区仍然存在华人秘密会党，在欧洲、美洲也有华人或当地人组织的秘密团体，政府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引导他们，尽量避免矛盾激化导致严重后果，至今仍是未予解决的社会问题。

八、华人秘密会党的性质和作用

西方殖民者在镇压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过程中，在各地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或小型特别委员会等临时性组织，调查秘密会党抗暴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写出了许多调查报告。他们还组织专人研究华人的风俗习惯，有的甚至打入秘密会党内部，进行调查，对秘密会党的源流和会内的秘密文书做了研究，写出了专著。像英属马来亚的首任华人护卫司毕其麟、荷属东印度政府的翻译官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等，他们都写出了专著，成为华人秘密会党问题的专家。殖民地政府的调查报告、殖民地官员的回忆录和著作，今天已经成为研究华人秘密会党的第一手资料。

从这些资料，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南洋华人秘密会党，都保留着天地会原来的反清标志、箴言、誓词和手势，新会员在入会时同样要参加一项非常繁杂的入会仪式。“如在准备参加入会仪式之前，入会者必须剪掉辫子的一部分，把头发梳成明朝发式的发髻于头顶，并穿上明朝流行的白色长袍，然后，会中‘先锋’朗诵多篇仪式诗句，新入会者必须记住，重诵不辍，如‘臣服明土’、‘反清复明顺天行道’、‘助吾王复皇位，大明日子即复回’等”，新入会者在会中“先生”主持的仪式中，也被告以过去天地会成立时“五祖”反清的故事，必须严肃的誓言“必竭尽全力反清复明”，还要喝混有兄弟血的鸡血酒。^②

^① 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 265。解散时各会之名称派别：（一）新加坡方面：1. 福建义兴；2. 广惠肇义兴；3. 潮郡义兴；4. 海南义兴；5. 客属义兴（又名松柏馆）；6. 义福；7. 义仪；8. 福兴；9. 广福义兴。（二）檳榔屿方面：1. 义兴；2. 大伯公；3. 义福；4. 福胜；5. 海山；6. 福德社；7. 联义社。（三）马六甲方面：1. 义兴；2. 福明；3. 福胜；4. 义保；5. 海山。（四）土人方面：1. 红旗会；2. 白旗会。参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137~138页。

^② 参见颜清煌：《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44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



事实上，天地会传到海外华人社会，原有的“反清复明”思想、口号已没有现实意义。因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清朝政府和地主官僚阶级的统治，而是西方殖民政府的控制和镇压。因此，南洋华人的秘密会党就谈不上具有“反清复明”的性质，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倒更加清楚地恢复了它反抗强暴、实行互助的本来面目。大批华侨来到南洋异国，举目无亲，孤苦无助，他们结拜和加入会党，目的就是为了实行互助，维护华人的生存权利和共同的利益，反抗殖民者的压迫。在某些华人秘密会党势力强大的地区，会党在反抗殖民政府暴政，维护华人利益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民间领事馆”的作用。

清王朝建立以来，连续颁布海禁令，禁止人民出海，把私自出海的人民视为罪不容诛的罪犯，“一经拿获，即行正法”^①，因而对海外华侨事务不闻不问。殖民者屠杀华侨时，清政府则表示“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待华民出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从过去的严禁变为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后来才为华侨设置了名义上的保护领事。

1876年，清政府派郭嵩焘为驻英公使，途经新加坡，华侨纷纷提出设置领事的请求，郭在调查华侨受虐情况后，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说：“南洋日国（今西班牙——引者）所辖之吕宋、荷兰所辖之婆罗洲、噶罗巴（今雅加达——引者）、苏门答腊，本无定立章程，其政又近于苛虐，商民间有屈抑，常苦无所控诉，是以各处民间闻有遣派公使之言，延首跂望，深盼得一领事，与为维持。”^③经与英政府多次交涉，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了第一处领事馆，首任领事为新加坡侨领胡璇泽，1890年，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首任总领事为黄遵宪。^④

虽然设立了保护华侨的领事机关，几任领事也做了比较大的努力，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华侨的权益实行保护，但在实行保侨措施遭遇到困难时，清政府就束手无策。原因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不能独立自主。在处理南洋华侨事务方面，虽经多次与英方商谈交涉，在新加坡挂上了“大清国领事府”的招牌，但英当局却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和

① 薛福成：《庸盦全集·出使奏疏》卷下，5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66，7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1，14页。

④ 参见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266页，台北，正中书局，1979。



剥夺中国领事的权利。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于 1878 年初才正式开办，而英国殖民当局于 1877 年 5 月就设立了华民护卫司，专门管理华侨事务，领事的权利“皆为护卫司侵夺”。

左秉隆于 1881 年至 1891 年连续三任驻新加坡领事^①，他在任期间，目睹贩卖“猪仔”的惨状，先向英国殖民当局交涉，要求加以禁止，却遭到拒绝，再函请广东的地方官员出示查禁，又遭英国驻广州领事的阻挠，结果不但不能禁止，反而使奸徒的气焰更加嚣张，贩卖“猪仔”之风更盛，华侨仍然遭受着残酷的掠夺和迫害，连清政府也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领事目击招工各馆作奸欺瞒，无以禁止。”^②

清政府在马来亚的领事馆的实际作用，除了给来往的中国人船只登记、发牌、收税，补充领事馆的经费开支外，只是劝说、动员华侨出钱兴办一些华文教育，组织一些华侨的文化团体和商业团体，如此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华人秘密会党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从帮助邻里调解纠纷到组织反庄园主、矿主、甚至反对英殖民统治的斗争，从安排无助的华民生活到计划袭击庄园、富商住宅，抢劫财物，无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断给华侨支持与帮助，保护了华人在南洋的生存权益。这样，秘密会党在南洋就更具有生命力，很快就成为公开的互助互济的华侨团体，并与海外华人的其他团体发生交插和渗透。张德彝在记述槟榔屿的华商与秘密会党的关系时说，“迎来自处华商，公立一党……彼此保护”^③。可见会党在华商中也具有互助的作用。

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下层苦力劳动者，它在组织华工进行抗暴斗争、实行生活互助方面的作用也更为明显。我们在上文已列举了马来亚、新加坡秘密会党组织华人反抗殖民者、庄园主和矿主的许多事例。其实，这种斗争南洋各地皆有。如泰国 1824 年、1842 年、1845 年的华人起义，都是秘密会党组织的。1892 年至 1910 年泰国的铁路工人大多数是秘密会党成员，他们以罢工斗争的方式，控制了泰国的交通。^④ 又如 1900 年邦加（今印度尼西亚

① 参见林远辉：《清代在世界各地设置领事问题初探》，见《华侨史论文集》，第 3 辑。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 74，23~24 页。

③ 张德彝：《四述奇》。

④ 参见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p. 143.

境内)发生的“刘义战争”,也是秘密会党发动的。起义的领导者郑十五和郑十六都是邦加的华工、三点会的成员。他们以刘永福的别名“刘义”为旗号,把当地的华工“猪仔”聚集起来,以红色的束发带和腰带为标志,发起暴动。他们破坏东盛锡公司,杀死矿主和公司的办事人员多名,并在另外一些地方烧毁矿场。这场起义最后被荷兰殖民政府镇压,起义领导人在雅加达被绞死。蔡鸿生认为“‘猪仔’华工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具有本身的特点。首先,这些斗争大都是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与秘密会党发生联系”^①。从以上一系列的事例,可以明显地看出秘密会党在南洋华工反抗剥削、压迫斗争中的组织作用。

当然,南洋华人秘密会党也与中国本土的秘密会党一样,它并不是静态的现象,它也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19世纪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的领导权逐渐被商人所控制。许多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商人,充当了各地会党的领导人。这可从1881年至1889年新加坡、檳城两地的秘密会党领袖的名单中,得到统计证明。据温尼(M. L. Wynne)在其所著《天地会与东方忌讳》(*Triad and Tabut*)一书中列举的几张华人秘密会党头目的名单所载,新加坡21名秘密会党的头目中有9名是商人,檳城40名秘密会党头目中有24名是商人,各占两地会党头目的近43%和60%。^②像吉隆坡的叶亚来、吡叻州的郑景贤、檳城的陈亚炎,均以商界大亨而担任会党头目。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南洋秘密会党与中国本土秘密会党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秘密会党在南洋已成为华侨社会的一种社会控制方法,秘密会党的头目往往也就是华人社区的领袖。而在华人社区中,商人一般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他们也就逐步控制了秘密会党领导层的权力。其次是,南洋华商的经济活动,一般多在秘密会党的支持下进行,他们在履行合约、获取原料供应、寻求市场、控制劳动力以及与同行的竞争等方面,都需要利用会党。所以人们说,在南洋,“华侨团体中的领导人物,没有秘密会党的支持就站不住脚”。南洋的大小华侨团体,都得靠着一个秘密会党的分支组织的支持而经营一种手工业、商业或工业部门,反过来,秘密会

^① 蔡鸿生:《十九世纪后期东南亚的“猪仔”华工》,载《中山大学学报》,1959(4)。

^② 转引自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42~43页。



党的活动，也得靠华商提供金钱的资助。

陶成章说：“会党之弊，结联团体，大者流而为铁算，小者流而为鼠窃，或且为流丐，要以皆狗盗而已……且各山堂分峙，不相统一，故又常有械斗之举。”^①海外华人的秘密会党，同样存在着这些弊端和弱点，最突出的弊病是，卷入各地华侨因种姓、地域、方言集团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械斗。这种械斗，在美洲就是华侨的“堂斗”，在南洋就是地方帮派之间残杀。参加械斗的人数很多，例如1867年槟榔屿三点会为争夺锡矿，就有3万华人卷入斗争。这些械斗，一方面严重削弱和摧残了海外华人本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容易被殖民者所利用。

此外，南洋华人秘密会党也参与贩卖“猪仔”华工的活动，开设赌馆、烟馆、妓院，经营不正当的行业。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指出，19世纪英属马来亚之契约华工贩卖，“客馆之主人，多为三合会之领袖，当时槟榔屿以陈德（Tan Tek）、新加坡以梁亚保（Leong Ah Paw）最有势力，包办一切苦力贸易”^②。同样，在南洋，有不少地方卖鸦片和卖酒的专利权被秘密会党头目所控制。例如，19世纪80年代泰国清迈城有个潮州人名叫屠匡生（Tu Kuan Sheng），就控制了当地的卖酒专利权，他也是当地的三合会头领。^③他们表面上是为当地的青年华工提供“娱乐”活动，实际上是变相榨取华工血汗，麻醉华工的斗争意识，削弱他们的反抗精神，而赌博输赢、争夺妇女，往往又酿成华人帮派之间的冲突。

综观19世纪中国秘密会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在南洋海外，天地会在民众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向人们表明了“民间力量不可估量，民间力量不可忽视”；同时，也暴露了天地会这类民间秘密会党的落后性。如何发扬人民群众的光荣斗争传统，不断克服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弱点，正是我们研究秘密会党史的重大意义所在。

①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②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124页。

③ 参见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p. 142。

论美洲的华人秘密会党

一、遍布北美洲的华人社区

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 1 000 年，即 5 世纪，已有华人僧侣慧深横渡北太平洋，取道阿拉斯加沿加拿大卑诗省（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部海岸，南下而至墨西哥。法国汉学家德经（Deguignes）的东晋僧人发现“卑诗说”，来源于中国古籍《梁书·东夷传》。此书曾有记载：僧人慧深于 499 年，抵达一个叫做“扶桑”的国家，那似乎就是现在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南边的美洲西岸。他们一行人，从加利福尼亚海岸旅行到墨西哥。陆陆续续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便是华人踏上美洲的最早足迹。

华人移民浪潮的出现约在 17 世纪。当时，中国华南地区人口众多，耕地不足，经济情况窘迫，加之政治不良，天灾人祸连年发生，人民普遍蒙受苦难，不满现状，许多生活无着而身强力壮敢于冒险的人，就去海外碰运气。19 世纪中期，美洲金矿的发现，黄金诱惑、知识开通、交通方便，华人为上述所吸引，背井离乡，去异域寻求新的生活。

政治大动乱，是大批移民外出的根由之一。最明显的是 17 世纪中叶清朝征服华南各省时，大量效忠明室而拒向清朝低头的人逃亡海外。1683 年，台湾郑成功反清政权的覆没，使更多数量的反清仁人志士流散海外。太平天国运动之际，各地会党活动兴盛，协助太平军的反清大业。当其失败之后，清廷逮捕甚严，不少人逃亡海外，力图匡复，故移民中会党同人增多。

出现移民浪潮的原因之一，是清朝中期中国人口激增，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加之自然灾害产重，造成大批民众流迁。中国



人口太多，尤以广东为甚，珠江三角洲 13 个县面积共 2 万余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 1/10，而人口竟达 1 800 余万，约占全省的 1/2。四邑、中山一带人口尤为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达 1 500~1 600 人，实为世界人口最稠密地区之一。因人口稠密，耕地太少，粮食不足，故四邑人、中山人向外移民居多。

寻找黄金和知识，也是激起中国人对美洲产生浓厚兴趣的因素。1848 年，在加利福尼亚美利加河畔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广东后，去美人数激增，从 1850 年到 1859 年，平均每年有 6 680 人到达加利福尼亚。而在这之前，据美国官方移民记录，从 1820 年到 1840 年间，来自中国的移民一共只有 11 人。从 1850 年到 1882 年美国制订排华法前的这一段时期经历了三次中国人移民美国的高潮：19 世纪 50 年代的加州淘金热，60 年代投入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70 年代投身发展加州农业。

当美国加州于 1848 年发现金矿之后，大批华人来美，其中已有若干华人随探险家由加州北上，沿哥伦比亚河深入加拿大南部之卑诗一带从事探矿工作，并于菲利莎河发现金矿。这一消息传播于加州及广东后，华人又纷纷涌至加拿大。

虽然黄金可以用来解除饥饿，但也有人认为，在美国寻求知识更为重要。而从长远来看，知识亦较永恒和有力量。1847 年，第一位华人学生的代表人物，抵达了美国东岸纽约，他就是容闳。这之后，形成了两次留学浪潮。

在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浪潮中，移民的种类也有区别。一般来说，早期华人迁徙海外，属自由移民，他们搭乘帆船来到南洋、美洲。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大量华人作为华工出国，这些移民多被称做“猪仔”、“苦力”。这一时期大批去美淘金、筑路的华工，就被称为“苦力”。就拿修筑铁路来说，这是最苦最累最艰辛的活计。由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建的西段地区，多为险峻山区和沙漠高原，原雇爱尔兰籍工人干了两年，只铺轨 50 英里，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不告而别。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公司四巨头之一的克罗克建议雇用华工，于是公司派人到广州招募工人，华工人数一下占西段工人总数的 4/5，最高时达 1 万人。

自 16 世纪以来，有 2 000 多万华人迁徙到世界各地。大多数华籍移民，来自中国南部广东省的 10 多个县或地区，此外是福建、广西两省。同乡和同姓的移民，往往聚居在某些地方，从事某些职业。

于是他们成立了同乡会和宗亲会。这些组织很早就在三藩市（即旧金山）和广东农村之间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它们对移民海外和保持移民与移民家属之间的接触，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华人移民之间团结密切的因素众多，其中之一是方言纽带。中国方言之间的差异很大。有时候，一个广东人不能理解一个福建人在说什么。因此，中国移民喜欢去讲同样方言的地方居住和从业。在同宗同族的血缘组织和操不同语言的方言群外，后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组织即会馆。会馆是富有中国传统的组织，它是在陌生城市建立的一种同乡互助社团。1849年12月，第一个会馆在杰克逊街的广州饭店成立，那时旧金山约有800名华人移民。到了1854年，宗亲会和同乡会组成了一个“联合会”，后来，这个联合会逐渐演变成“六大会馆”，即“中华会馆”。

抵达新大陆的华人移民，很快就发现他们处在一向所熟悉的家庭、家族、同乡、方言、同行和会馆等各种关系中，这就是同宗会馆组织的互助作用。而在华人社区，活动隐秘、作用颇大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组织，即华人秘密会党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堂”。

二、活跃在华人社区的地下王国

西人弥勒斯（L. A. Mills）说过：“华侨不论到什么地方，秘密会党便在那儿出现。”^①在中国近现代盛行的洪门天地会秘密组织，随着华籍移民入南洋、美洲，更主要的是在清廷一次又一次镇压会党之后，大批天地会成员逃亡海外，秘密社会也随之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生根、滋长，并成为华人社区中极具权力的地下王国。

洪门究竟何时传入美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种比较确切的说法是，早在1852年，加州北部淘金矿区，三点会已开山立堂，其势较盛。由此内华达、爱达荷、俄勒冈、蒙大拿等州的大小市镇，山堂亦次第林立。1869年横贯北美大陆铁路通车以后，中国人开始向东迁移，洪门组织亦跟随而去，始向城市发展。当时美国划分为九区，即九个大埠，三合会号称埠埠有堂，其在三藩市的堂号最多，总堂也最大。据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所载，计有致公堂、

^① 参见 L. A. Mills, *British Malaya, 1824-1867*;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 32.



秉公堂、瑞端堂、协英堂、协胜堂、合胜堂、萃胜堂、萃英堂、保良堂、保安堂、秉安堂、群贤堂、昭义堂、保善社、西安社、松石山房、华亭山房、竹林山房、聚良堂、安益堂、俊英堂、仪英堂、协善堂、敦睦堂、安平公所、洋文政务司 26 个。据司徒美堂说：除致公堂和安良堂外，三藩市计有秉公堂、萃胜堂、协胜堂、安益堂、合胜堂、瑞端堂、聚良堂、竹林山房、协英堂、华亭山房等 12 个；还有属于南海、番禺、三邑（顺德）的秉安堂、松石堂、西安堂等 4 个；属于香山籍的俊英堂 1 个；合计为 19 个，比以前减少。但总堂之外，分堂则均有增加。如秉公堂有 26 个分支机构，协胜堂有 10 个分支机构，合英堂和英端堂各有八九个分支机构。

最初在三藩市成立的三点会叫义兴堂，总部设在艮臣街一座楼宇的二楼。1854 年 1 月的一天，会员在此聚会，遭警察奇袭，其会员被拘，会章、旗帜和誓词、规章被查获。艮臣街搜捕之后，义兴堂会员将会址迁往沙加缅度街，改称致公堂。其第一任首领相传为林迎，其后为余松运，到 1897 年，由黄三德为盟长，又称为美洲致公堂大佬。此时致公堂力量大盛，并与国内辛亥革命有所关联。

除三藩市总堂外，在美势力较大的有费城和纽约的洪顺堂。

费城的义兴会堂址在费城赛马街华埠一座建筑物的二楼上，共有 2 间房子，洪顺堂的匾额挂在楼外。1888 年 7 月 7 日在费城注册，名称为罗斯伦公益会。该两房布置精美，陈设与三藩市总堂的内容相同。堂友进香油者姓名张贴在该房之一边，内房承祀关公，神像面向南，神龛占该房的大部分。在神龛的前面有祭坛，设有烛台、花瓶、香炉及通常崇拜之神像。右边有用红布包起的东西，左边插有红绸制的“令”字小旗，中间并插有木制的小型剑。在祭坛上，又有签筒杯琮，与题有“武帝殿”、常用做香炉的一个白色瓷器钵，神龛左边一小室，有一个小神龛，承祀“土地之神”，在神前点着长明灯。对面有一间相同的小堂，里面有几幅名人肖像，也许为该堂创办人或赞助者。

费城该堂首次会议于 1882 年 9 月中旬举行。开会时，首领与书记坐在桌后，沿桌而坐者为其助理人员及该会的成员。新丁入会仪式极为隆重。入会者穿一件新长袍，以代替西服。根据规定的礼法，是要答复一连串的问题。例如盘问者询问：“你有兄弟吗？”入会者必答：“只有我的爱国者兄弟。”在祭坛前，必须宣誓断绝各种社会关系，保证对堂会永远忠实。宣誓时，焚香按剑，若违背誓言，死



在万刀之下。新丁领受一本书，包含一些秘密语汇，他借此隐语能保持为外人完全无法了解的谈话。不论吃饭、饮茶、吸烟或穿衣的方式都应值得注意，这作为义兴手足的暗号之用。以一大拇指及两小指举起杯，或当饮时在碗上摇动杯三次，暗示为会内同人。踏一足入住宅门限之内，留另一足在外，与放一把伞在门槛，是犯法逃亡者求助的暗号。秘密语言有“耕沙子”（吃饭）、“毛瓜”（猪肉）、“玉子”（酒）、“洪顺”（油）、“大片子”（大刀）、“篙子”（筷子）、“莲花子”（碗）、“瓜子”（银圆）、“穿心”（钱）等。这本书不能给外人看。入会费根据本人的财力而定，多寡不同，但要负担入会仪式完后例定之聚餐费用。在费城，入会费通常为20元。除入会费外，会员会费通常为20元至100元。会社筹集大批资金，以为会员犯法的解救或对冒犯该会之外人控诉之用，亦有捐款为支付衰老兄弟的葬费。一年中该会在中国餐馆举行4次或特别的公宴，每一会员要缴2元至5元。义兴会之仪式与典礼，大多有几分宗教的性质。他们的节日，通常为举行关帝、观音、五祖纪念及阿弥陀佛等神诞。

纽约的义兴会另称为联义堂，堂址初在勿街十八号，其后迁至披露街。堂所比费城洪顺堂为大，陈设更优美。其格局及会规等与费城大体相仿。

洪门传入加拿大，由美国加州矿区沿落基山西面山麓之犹他州、蒙大拿州省的北部而入卑诗省，又经海道由三藩市传至域多利（即维多利亚）或二埠（即新威斯敏斯特），所以加拿大洪门势力发展路线，先由内陆而后至沿海一带。

加拿大洪门亦属洪顺堂的一派，各地礼堂现仍祀有洪顺堂历代义士灵牌。

据洪门人士说，当时在美国加州淘金者中有位华人叫黄深贵，辗转来加，流寓于百加委路继续以淘金为业。于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一日联合同志创立洪门机构于此，起初名为洪顺堂，堂所甚小，及1868年百加委路全埠毁于一炬，乃改建规模较大堂所。现该所依然屹立于此城，为卑诗省境内最古老楼宇之一。该楼分二层，二楼前面书有“门外九连山秀茂，寺内三圣佛庄严”对联一副。所谓“九连”者，乃指福建莆田县之九连山。所谓“三圣”者，乃指儒、释、道。

自洪门机构创立于百加委路后，各矿区纷纷成立分会。待光绪六、七年间（1880—1881），大批华人来加之后，势力发展至二埠及域多利。其时域多利为洪门协胜堂势力范围，后来协胜堂势力衰退，



加拿大洪门会党之名称始统一为洪门致公堂。1876年，加拿大洪门致公堂之名创立于茂士，而百加委路洪顺堂直到1882年才改名为洪门致公堂。

自太平洋铁路完成后，洪门致公堂的势力相继发展于温哥华及加中、加东各埠。洪门致公堂势力最盛时，拥有堂所40余处，会员近2万之众，占加拿大华侨十分之七八，其势力之雄厚，可想而知。

三、美洲洪门的堂斗与暴乱

在中国，同宗同乡及方言群是强有力的凝聚纽带。中国的家庭，在传统上是很亲近的。而19世纪时的家族或远亲，几乎和今天的小家庭一样关系密切；中国的村社，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每一个村的大多数居民属同姓，或是彼此有关系的人。这种凝聚因素在海外华人中起了更大作用，同乡、同姓及同方言群的移民，往往聚居在某些地方和从事某些职业，有时一乡的民众外出，就是由同乡人鼓动、携带的。更有甚者，由于时间久远，各乡会、方言群之间风俗习惯与性格方面存在差异，隔阂越来越深。由于他们之间时常误解、猜疑与敌视，以至发生冲突、流血械斗。在历次冲突械斗中，秘密会党都充当着主角，故通常又称为“堂斗”。

美洲华侨中的堂斗十分盛行。据记载，自1875年以来，美国华侨的大小堂斗，就不下六七十次，其规模大的，杀伤七八十人，费钱100万余，时间延续1年以上。大多数堂斗的起因是“鸡虫得失”一类的小事。如1875年2月的某一天，在晨光曦微中，旧金山唐人街内，突然出现一张红纸的长条，上面写着：“出长红人瑞胜堂，要广德堂斧头仔出来驳炮！”不一会，消息传播，闹得满城风雨。唐人街的华侨原来大多上午不肯起床的。但在那一天，太阳还未升起，他们已都从被窝中跳出来，人心惶惶，一筹莫展。他们都了解那“长红”的严重意义，因为那就是瑞胜堂要和广德堂开战的宣言。广德堂自然不肯示弱，到第二天早晨，也照例贴出一条“长红”，上面写道：“回长红人广德堂，实行接状！”这就是美国华侨第一次正式的公开堂斗。这次堂斗的起因是由于瑞胜堂的成员刘兴和广德堂的成员吴某同玩一妓女，因吃醋而起冲突，刘兴被吴某打伤，瑞胜堂向广德堂提出条件，广德堂不理睬，于是双方诉诸武力。这次堂斗



的结果，广德堂被杀3人，受伤7人；瑞胜堂死1人，伤3人。瑞胜堂占了优势，于是由中立商人捐集了一笔钱，作为刘兴的医药费，并劝广德堂书面向瑞胜堂道歉，一场风波暂告平息。

1890年，秉公堂在罗安琪（即洛杉矶）设立分堂，合胜堂认为侵犯该堂的地盘，引起堂斗。

同年，纽约协胜堂战胜了明德堂后，在唐人街内设立机关，向各赌场征收保护费，致公堂因其影响收入，因此决裂。

旧金山龙冈亲义公所刘喜同，以3000元买了自香港贩来的女子宝金为妾，因未领得市政府结婚证，由旧金山风俗改良会将宝金送交礼拜堂寄养择配。后来宝金嫁与纽约安良堂的甄某，龙冈亲义公所要求甄某付还原价3000元不遂，遣人刺杀宝金，双方因此开火。

1913年，广东海军将领程璧光乘海圻舰赴美国访问，轰动一时。其外甥邓少云为留美学生，娶了美国太太，学得一口英语，为移民局服务。这时，邓少云就“马屎凭官威”，为非作歹，敲诈华侨，不料一天被斧头劈死，暴尸唐人街。邓少云是一个堂口的人，该堂认为同堂兄弟被杀，不体面，于是向对手发出“挑战书”，对方不示弱，亦加强布置，回敬了一个“应战书”，于是开始了一场残酷的堂斗。

1917年，西雅图协胜堂有少数成员脱离堂籍，改入瑞胜堂，因欠费未清，协胜堂派人追索，瑞胜堂加以保护，于是发生堂斗。

1924年，芝加哥安良堂会长陈泽霖在堂内联络心腹分子组织了“护法派”，把持党务；反对陈泽霖的一些人则另组“卫纲团”，运动倒陈。1月间，安良堂在匹茨堡开全体恳亲大会，将陈泽霖开除出堂。陈泽霖等投入协胜堂，堂斗以是而起。

两堂之间的械斗，起初用的武器是斧头，所以参加堂斗的打手也被称为“斧头仔”，以后发展为用手枪和手榴弹。

堂斗是秘密会党的一大致命弱点，反映出它的宗派性、保守性和落后性。这一弱点最容易被外人所利用。在国内，清朝封建统治者镇压各地会党起义，有时就利用会党的派别斗争，收买一方，挑起双方争斗，以便一网打尽。在美洲，美国政府也千方百计利用堂口的这种弱点，进行挑拨离间，制造猜疑，鼓动风潮，甚至收买内奸，混入堂中，掌握大权，转而以堂口之力压迫华侨，实行“以华制华”、“以华乱华”。堂斗之前，常常有美国流氓来兜售枪弹武器；堂斗期间，美国警察放哨，密探来往监视，打死了人他们不管，因为死的是中国人，美国当局坐收渔翁之利；堂斗之后，他们就各个



分化，把堂逐步削弱或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样，在美华侨起初立堂结社的“义气团结”，渐渐为纷乱迷惘的宗派斗争所代替。

天地会传到海外华人社会，尽管保留着天地会原来的反清标志、箴言、誓词、手势及入会仪式，然而原有的“反清复明”思想已没有现实意义。他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清朝政府和地主官僚阶级的统治，而是当地政府的控制和镇压。因此，华人的秘密会党谈不上具有“反清复明”的性质，而是以反抗强暴、实行互助为目的。大批华侨来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苦无助，他们结拜和加入会党，就是为了实行互助，维护华人的生存权利和共同利益，反对当地政府的压迫。应该看到，由于洪门天地会的堂斗，他们这些积极作用，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洲华人秘密会党还积极帮助及参与国内革命，在秘密会党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四、美洲洪门与辛亥革命

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当首推美洲洪门致公堂。这是孙中山在海外发动华侨参加革命的成功之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二十五日，大埠（即旧金山）致公堂盟长黄三德，听说孙中山先生隐居于檀香山（即火奴鲁鲁），便写信给檀香山之洪门义兴会会长李泮，请他劝说孙中山去美，并附上黄三德给孙中山的手书，请他去美提倡革命。李泮将函转去后，十一月，总堂接到孙中山的复函，说很愿意应召去美，等到办妥护照即启程。黄三德接到此信后，随即直接给孙中山发去一信，劝其先在檀香岛加入洪门然后去美，这样来美宣传革命才有效果。孙中山接受了劝告，在会员杨文纳的介绍下，于檀香山加入洪门，并得受封为洪棍（洪门荣衔之一），这是孙中山与洪门发生关系的开始。

次年三月，孙中山由檀香山乘船抵大埠，致公堂总堂接到檀香山义兴会电告，已经筹备欢迎会。当时在美国各埠的保皇会势力也很猖獗，听说孙中山要来美，于是串通移民局。当孙中山一上岸，就为移民局发现，羁闭于码头木屋内，被多次审问，最后被判决发回原籍。

致公堂总堂得此消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委派黄三德与唐琼

昌负责，聘请律师诺理办理此案，最终同意用 5 000 美元为保释金。孙中山在木屋内被困 17 日之久，最后无罪释放，并争得留美之权。那日在总堂召开盛大欢迎会，参加的人数很多，孙中山在会上做了演说，宣传民族革命主张，之后致公堂做出决定：（1）修订新章八十条，发表宣言；（2）改组《大同日报》，由孙中山推荐冯自由任主编；（3）派黄三德随同孙中山，遍游全美百余埠，鼓动会员注册，每名收美金 2 元，所收之款交与孙中山，作为革命活动费用；（4）由黄三德晋封孙中山为洪门大佬（即盟长）。

孙中山先生加入洪门，帮助改组洪门致公堂会章，使秘密会党组织倾向于革命，美洲致公堂从此与革命党合作，参加辛亥革命。从致公堂新订会章的要文中，可见其从朴素的“反清复明”到革命反清的一大进步：

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联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社会因之日盛，早已遍布于十八省以及五洲各国，凡华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国为隆盛。盖居于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主之邦，结会联盟，皆无所禁，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惟是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众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固之团体，诚为憾事。近且有背盟负义，趋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则更为痛恨也。若不亟图振作，发奋自为，则洪门大义必将沦隳矣。有心人忧之，于是谋议改良，力图进步，重订新章，选举贤能，以整顿党务，而维系人心。夫力分则弱，力合则强，众志成城，此合群团体之可贵也。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以此之故，为外人所轻蔑所欺凌者，所在多有。此改良章程维持党务所宜急也。且同人之旅居是邦，或工或商，各执其业，本可相安无事，但常以异乡作客，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风俗不同，入国不知其禁，无心而偶干法纪者有之矣。又或天灾横祸，疾病颠连，无朋友亲属之可依，而流离失所者，亦有之矣。其余种种意外危虞，笔难尽述。语有之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若无同志来相维护，以相周恤，一旦遇事，孤掌难鸣，束手无策，此时此境，情何以堪！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捍御祸患，周恤同人，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



一也。本堂人数既为美洲华人社会之冠，则本堂之功业，亦当驾于群众，方足副本堂之名誉也。乃向皆泄泄沓沓，无大可为，此又何也？以徒有可为之资，而未有可为之法，故虽欲振作而无由也。

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固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立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况当今为争竞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吞，今所属者，仅东亚之日本与清国耳。而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国势积弱，疆宇日蹙。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我汉族四万万，岂甘长受满人之羁轭乎？今之时代，不竞争则无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灭也。惟竞争始能独立，此日本、美国之所以兴也。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

近来各省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则天意人心之所向，吾党以顺天行道为念，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二也。

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族，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矿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隐，不肯附和，遂大触彼党之忌。今值本堂举行联络之初，彼便百端诬谤，含血喷人。盖恐本堂联络一成，则彼党自然瓦解，而其所奉为君父之满贼，亦必然覆灭，则彼汉奸满奴之职，无主可供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凡吾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寝其皮，何以伸此公愤，而挫兹败类也。本堂虽疲弩，亦必当仁不让，不使此谬种流传，遗害于汉族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三也。

今特联络团体，举行新章，必当先行注册，统计本堂人数多少，以便公举人员，接理堂务。必注册者然后有公举之权，有应享之利。此乃本堂苦心为大众谋公益起见，法至良，意至美。凡我同人，幸勿为谣言所惑，迟疑观望，自失其权利可也。今特将重订新章先行刊布，俾各埠周知，参酌妥善，待至注册告竣之日，然后随各埠公举议员，择期在本大埠会议，决夺施行。望各埠堂友同心协力，踊跃向前，以成此举，同人幸甚，汉人幸甚！^①

重订新章条款如下：

(1) 本堂名曰致公总堂，设在金山大埠，支堂分设各埠，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

(2) 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3) 本堂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

(4) 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当认作益友，互相提携；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

(5) 凡各埠堂友，须一律注册报告于大埠总堂，方能享受总堂一切之权利。

(6) 凡新进堂友，须遵守洪门香主陈近南遗训，行礼入闹。^②

这是秘密会党的新生。洪门致公堂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捐款支持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在这方面，加拿大洪门表现最为突出。

孙中山于1911年1月到加拿大维多利亚筹款，致公堂开会讨论，当时就有人提议将该堂之楼宇向西人抵押，将该款汇港为接济革命军起义之用。众议竭力支持，于是就将总堂楼宇向卑诗地产公司抵押，取款港币3万元，以应香港统筹部之急需。当时该楼所仅值加金8000元，不足之数乃由域埠殷商林礼斌、黄祝求、李勉辰三人分担，义务捐加金1600元，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加金900元，共合港币3万，电汇香港统筹部交黄兴。

^{①②} 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236～239页。



自维多利亚洪门致公堂变产参加革命的消息传播后，侨社人心振奋，洪门人士与侨民投袂奋起，自动捐助革命军饷者络绎不绝。温哥华、维多利亚两埠洪门并派李丙辰、谢锄秋两同志陪同孙先生周游天寅咪、乃磨（即纳奈英）、山磨仑、兰拿、锦碌（即坎卢普斯）、卡枝利、宛尼辟、多朗度（即多伦多）、满地可（即蒙特利尔）各埠，宣传革命方略及筹募革命军饷，合计加金 10 余万元。据曾驻温哥华领事张康仁调查，加属致公堂宣统二年（1910 年）时，所捐革命军饷数目如下：（1）温哥华致公堂自捐及集捐约 2 万余元；（2）商人利和号岑琛个人倡捐 2 000 元；（3）维多利亚致公堂破产捐及集捐约计 4 万元有奇；（4）纽威士缅打、兰拿、埃士哥夫、坎禄士各致公堂，自捐及集捐 1 万余元；（5）加拿大东部满地可、多朗度、柯度和中部致公堂，自捐及集捐约 4 万元。

加拿大洪门致公堂于辛亥年（1911 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一役，热心捐助军饷，实为当时各地之最多者。黄兴、赵声、胡汉民等都曾致信致公堂，对会党积极支持革命表示感谢：“尊处同志闻系先变产业以急应军需，热度之高，洵为海外所未有，同人等不胜感服。”^①

孙中山曾评价华侨为革命之母。在辛亥革命前的历次起义，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华侨的支持，他们筹募军饷，购置武器。而在召集、发动华侨捐款活动中，洪门致公堂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出财出力，热诚支持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参加辛亥革命，这是有口皆碑的。驻温哥华领事张康仁曾于 1913 年致书稽勋局局长冯自由，据实报告加属致公堂的功绩，请求给予表彰，指出洪门致公堂作为秘密会党，在革命中的表现“实为中国历史空前所未有，且为世界历史所未有”^②。

五、美洲华人秘密会党现状

19 世纪，不论是南洋地区，还是美洲，华侨秘密会党活动相当活跃，成为各地相当有影响的地下组织。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秘密社会组织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东南亚地区，多次遭到政府镇压后，组织力量越来越薄弱，性质也发生惊人的变化，已完全

^① 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248 页。

^② 同上书，244～245 页。



失去早期互助、侨民中心的作用，沦为造成社会不安定的黑帮组织，迷途青年的避难所。美洲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黑帮组织，他们与19世纪的秘密社会形同而质异，属于一种现代工业社会的犯罪组织。极少数华侨中的败类行为，严重影响华人在所在国的地位与尊严，为海外华人及所有中国人所不容。

据20世纪80年代华人杂志报道材料，我们以美国为例，略述秘密组织的现状。

美洲洪门致公堂现仍存在的有秉公堂、合胜堂、萃胜堂、协胜堂、英端堂等。秉公堂的一半势力已为合胜堂夺走，协胜堂则已被华青帮垄断。其他堂会势力也日渐衰微，逐渐被新起的黑社会帮派所取代。

目前，在美国华埠，由亡命之徒组成的黑帮，多不胜数。几个大的组织有：白鹰帮、华青帮、鬼影帮、飞龙帮、白虎帮、广祖帮、竹联帮。

1984年10月15日，美国华人作家江南在寓所被人开枪击毙。后来查明凶手是在美国的竹联帮分子。竹联帮原是台湾一个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曾加入该帮的人在4万以上。目前旅居美国、中国香港、东南亚、南美洲等处的徒众人数逾万，而散布在台湾各地的则有三四万人。竹联帮分子在美国与华青帮结盟，自“江南命案”发生后，美国警方查明凶手属竹联帮分子，顺藤摸瓜，惊奇地发现此案竟牵涉到台湾的情报部门。黑社会组织介入政治纠葛，一时举世轰动。

随着涌入美国的华人移民增加，华埠日渐扩大。新移民多数忙于谋生，对子女管教不严。而这些新移民的子弟因功课差，又受到别裔青少年的欺压，加上美国社会治安措施反复、人伦道德堕落等等，使年轻人纵情任性，一被阴谋家诱入帮派之后，便随之为非作歹。而华埠的扩大，也给黑帮的活动提供了勒索、抢劫的地盘和对象。

美国各地黑社会组织一向活动猖獗，除华裔黑帮外，还有黑手党等老牌黑社会组织，他们的势力更是庞大。美国黑社会组织雇用5万人以上从事各种非法活动，如贩毒、走私、开妓院与赌馆等，每年收入多达1500亿美元以上。

华人秘密会党组织发展到今天，已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像由洪门演化而来的致公党、民治党等，现在已成为在海外保护华人合法

权益、实行互助互济、团结爱国的公开合法组织，这些组织中的许多爱国人士，发起并组织了各种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后援会和促进祖国统一的促进会。他们正在为祖国的“四化”和统一大业而努力。而另一些人，则加入了黑帮组织，充当一名很不光彩的角色，背叛了海外洪门的宗旨。而今天黑帮的诸多非法活动、暴行血案，则是全体华人的一种耻辱。黑帮组织必将为现代文明社会所取缔，而华人秘密会党已成为历史。



论澳洲的华人秘密社会

19世纪以来，约有5000万华人迁徙海外，他们大多以苦力身份，在东南亚、北美、澳洲等地，从事开矿、淘金、筑路和农牧垦殖劳动。西方学者弥勒斯（L. A. Mills）说：“华侨到什么地方，秘密会党便会在哪儿出现。”^①这句话反映了19世纪华人迁移海外的实际情况。

对于东南亚、北美地区华人秘密社会，学术界已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相比起来，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薄弱。到目前为止，除了杨进发（C. F. Yong）的《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年》（*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和张秋生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有一个章节谈到华人秘密社会外，还没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论文和著作。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研究薄弱的原因主要是资料缺乏。因此，要全面深入了解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历史，必须从努力发掘可靠的资料入手。

一、本迪戈洪门会簿发现的意义

1992年澳大利亚本迪戈华人协会（Bendigo Chinese Association）发现了一本洪门会簿。我认为这本洪门会簿的发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可以作为研究澳洲华人秘密社会史的一个突破口。我们知道，东南亚、北美地区华人秘密社会的研究，首先是从各地发现洪门天地会的文书入手的。最早写出天地会研究专著的，是荷兰

^① 参见 L. A. Mills, *British Malaya, 1824-1867*;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 32.



人施列格，他曾任荷属东印度政府的汉文翻译官。1863年，荷兰殖民政府从苏门答腊的巴东（Padang）一个华侨家中搜出一批天地会文书，其中包括天地会的章程、誓词、创会故事、旗帜说明、诗歌、秘密符号等。施列格根据这些文书材料，写出了《天地会研究》一书，1866年出版。后来，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马来亚搜到大量华人秘密会党的文书，由活特（J. S. M. Ward）和斯特林（W. S. Stirling）合作写出《洪门》（*The Hung Society*），共3卷，1925年出版。此后，温尼、柯比（L. Comber）、布莱斯（W. L. Blythe）相继出版的几本马来亚华人秘密社会著作，大多根据警察部门得来的资料。同样，北美地区华人秘密社会的研究，也是从洪门文书资料入手的。因此，我认为，本迪戈洪门会簿的发现，将会使澳洲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有一个新的突破。

其次，本迪戈洪门会簿本身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它能说明许多重大问题。第一，按照洪门天地会内的传统，凡天地会成员，只要抄得会内的歌本、会簿，即可辗转传会。也就是说，这种洪门会簿是传布天地会的重要凭证。我们从清代的档案资料中发现，有许多天地会成员供称，凡持有天地会内相沿抄录的会簿，即可邀人入会。^① 乾隆末年广东高要人林闰才说：“有会簿之人始算得真传。”此后，凡是藏有会簿、借抄会书、祖遗会簿、买获会簿的人都可传会为师。^② 这个成规，在洪门天地会内一直相传下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本迪戈的手抄洪门会簿，无疑是洪门在澳洲传会的凭证。第二，本迪戈洪门会簿的发现，可以说明本迪戈是华人秘密社会盛传之地。从我们已知的情况可以判明，凡发现洪门会簿的地方，都是洪门天地会盛传的地方。在中国本土广东的大埔、广州、香港，广西的贵县、东兰州、田林先后发现了几本天地会会簿，这些地方都是清代以来天地会势力最活跃的地方。在海外，上面我们提到的苏门答腊、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的维多利亚，相继发现了许多天地会的文书，这些地方都是海外洪门天地会势力最强大的地方。另外，据我所知，巴黎图书馆现收藏了一本天地会会簿，这是在越南谅山被发现的。谅山与中国的云南边境相邻，是清末以来天地会活跃的地方。在中法战争时期，中国的刘永福曾率部在谅山与法军鏖战，刘永福的士兵大多是天地会成员。在英国伦

①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148~149页。

② 参见胡珠生：《清代洪门史》，31页。



敦图书馆还有一本在泰国发现的天地会抄本。大家知道，泰国也是华人秘密社会盛行的地区。因此，我们认为本迪戈洪门会簿的发现，进一步证实本迪戈是华人秘密社会盛传之地。第三，从本迪戈洪门会簿的内容看，至少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与苏门答腊以及新加坡发现的本子不同，本迪戈会簿中将天地会最初的结拜取名“骛黠劣”（即天地会名称的变相写法）。最早将天地会改为“骛黠劣”进行活动的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建同安人陈老苏和苏叶，他们因清政府严查天地会，即“改造骛黠名色，以暗合天地”^①。这样的名称和写法，在清嘉庆朝以来中国大陆各地发现的洪门会簿中颇为流行，如广西贵县、东兰州、田林先后发现的本子中都有这种写法。本迪戈洪门会簿与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以肯定本迪戈的洪门会簿是由中国大陆流传去的。而在苏门答腊和新加坡发现的会簿中，都将天地会称为“义兴公司”，这是天地会传过去以后，仿照东印度公司而取的名称。^②在澳洲，华人秘密社会大多亦称义兴，这显然是从东南亚地区流传去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洪门传入澳洲大概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中国大陆传入；另一条是从东南亚地区传入。另外一个特点是，在早期的洪门会簿中，提到结拜创立天地会的只有长房吴天成、二房洪太岁、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达、五房林永招这五祖，在嘉庆年间广西东兰州的会簿和道光年间广西田林的会簿中都做了这样的记载。但是在道光朝以后的洪门会簿中，如1863年苏门答腊发现的本子，除了以上五祖外，又出现了后五祖的名目。本迪戈会簿中也载有前五房始祖和后五房始祖的名称。由此可以认为，本迪戈的会簿应是清道光朝以后的抄本，同时也可以推断洪门天地会传入澳洲时间，必定在道光朝以后。

二、洪门天地会在澳洲的传布

洪门天地会传入澳洲的确切年月已难于搞清，因为其传布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随着大批华人赴澳洲淘金而传入该地的。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

^② 参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111页。



19世纪50年代澳洲发现金矿，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于是就有成千上万的华人淘金者来到澳洲的“新金山”矿区，他们绝大多数是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和破产劳动者。具体地说，他们就是从香港出海的广州周围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人和从厦门出海的闽南人。由于人口的激增，自清朝中期以来，这个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其13个县的面积共2万余平方公里，约占广东全省面积1/10，而人口竟达1800余万，约占全省人口的1/2，四邑、中山一带的人口尤为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达1500~1600人^①，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人多地少的矛盾，造成大量的无地少地的农民背井离乡，流落他省和海外。他们流落异乡后，生活极不稳定，常常遇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和外来的欺压。出于互助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结拜团体，实行“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天地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根据我们研究，天地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首先在福建漳州地区创立^②，以后很快就在闽粤华南地区广泛传布，到19世纪50年代，已在广东“蔓延通省，及于广西”，并“祸及吴楚”^③。广大贫苦农民和破产劳动者，为了谋求生活互助，大多加入天地会。这时的天地会更是迎合移民社会的需要，对海外苦力华工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伴随着大批华工去澳洲淘金，洪门天地会也就进入澳洲矿区，并在澳洲华人中广泛传布。

特别要指出的是，19世纪50年代，在中国南方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天地会“红巾军”起义。随着起义的失败，清政府对太平军和天地会实行残酷的镇压，不少太平军和红巾军的骨干也随着淘金热逃往澳洲。据记载，太平军平南王黄德滋（广东新会人）起义失败后，于1864年率余部“乘帆船数十，漂流海外，渡南中国海，最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时值新金山开埠，遂往该地，成为淘金工人”^④。另据老华侨杨汤城回忆，他的曾祖父杨胜龙兄弟6人，其中有2人在广东番禺参加了甘先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失败后被清军杀害，为了避免株连，另一兄弟浮海到新西兰淘金。之后，杨汤城

① 参见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358页。

② 参见蔡少卿：《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③ 曾望彦：《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

④ 林金枝：《华人移居澳大利亚史略》，载香港《华人周刊》，1986（6）。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的祖父杨雄大兄弟 3 人也逃往海外，老大到澳大利亚淘金，老二、老三分别去新西兰和美国作苦力。^①这些天地会的骨干，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据说黄德滋到澳洲新金山即创立了洪门“义兴公司”，今本迪戈现存义兴公司的会所（旧关帝庙）就是黄德滋手创。^②

洪门在澳洲华人中传布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851—1875 年，这是由淘金热引发的华工赴澳高潮时期，也是洪门在澳洲华工中广泛蔓延的时期。这一时期，抵澳华工共有 5.5 万人左右^③，大多聚集在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和维多利亚州（Victoria）的金矿区。当时维多利亚州的巴拉腊特（Ballarat）、本迪戈等地都因盛产黄金，成为华工集中之地。据有关资料统计，巴拉腊特 1853 年有华工 2 000 人，3 年后即增至 2.5 万人，华人占该地人口的 1/4。至 1859 年，维多利亚州华人已达 4.2 万人。新南威尔士州，1861 年有华人 2.1 万人，占全州人口的 1/6。^④大批华工在那儿成群结队，翻山越岭，寻找金矿，一旦发现金矿，便就地搭棚架屋，群聚而居。他们不仅要受风雨雷电和猛兽之灾，还要遭到土著人的袭击和殖民者白种人的欺凌杀害。这时，他们除了依靠同乡同宗实行互助外，活动隐秘、凝聚力颇强的互助团体——洪门，就更受欢迎，因而其得到广泛的发展。这一时期洪门在澳洲华人中发展会员的具体数字目前已无法知道，但从东南亚、北美地区洪门发展的情况和澳洲洪门后期发展的数字，可以窥测其大概。据布赛尔研究，1850 年新加坡的华侨有 2.7 万人，其中有 2 万人是天地会成员，几乎 80% 的华侨参加了秘密会党。^⑤李东海在《加拿大华侨史》中写道：“洪门致公堂势力最盛时，拥有四十余处，会员几及二万之众，除绝少数侨胞非籍隶于该堂外，约占加拿大全侨十分之七八。”^⑥统计资料表明，1911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华人 8 223 人，维多利亚州华人 4 707 人；而 1913 年新威尔士州的华人共济会全部会员则在 2 000 人至 3 000 人之间，维多利亚州

① 参见《华人沧桑录》，50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参见赵昱：《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75 页。

③ 参见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华工契约制》，载《历史研究》，1963（1）。

④ 参见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72~74 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⑤ 参见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p. 157.

⑥ 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234 页。



的“义兴”在1911年声称有会员3 000名。^①可见澳洲洪门会员至少占华人的一半以上。

第二时期，1875—1900年，这是澳洲排华运动不断升级、华工急剧减少的时期，也是澳洲洪门活动十分沉寂和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入澳华工约有8 000人。^②随着澳洲浅层金矿大部被淘采净尽，很多华工开始舍弃淘金而转向其他职业，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流入城市，从事工商业，悉尼和墨尔本成为华人集中的重要中心。1881年，墨尔本有华人1 057人，悉尼有1 321人。到1891年，墨尔本的华人达2 143人，悉尼有3 499人，10年之间增加了1倍多。华人的会馆堂所在唐人街不断建立，洪门义兴会址也进入了唐人街。这一时期澳洲许多洪门领导人多由一些老练会员和工商人士担任，如墨尔本的李元三，新南威尔士州的梅东星、黄柱稳等。^③

第三时期，1901—1921年，这是澳洲洪门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提高，社会政治活动高涨时期。

这一时期，首先是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联邦政府即通过《入境移民限制法案》，使“白澳”政策系统化、法律化。此后澳大利亚举国上下弥漫着种族主义情绪，排华和反对有色人种的事件经常发生，这不能不激起在澳华人和洪门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次，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推翻封建清王朝的革命运动，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宣传活动，澳洲洪门会员普遍呈现出反清思想。他们开始意识到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并自觉参与了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1）反对“白澳”政策和呼吁建立澳大利亚中国领事馆。（2）拥护孙中山推翻清王朝与建立民国的革命纲领，并与共和派合作成立少年中国会，为革命派积极筹款。1911年募集了1 300镑汇给孙中山本人；武昌革命后，继续为革命军发起募捐运动，在义兴会与少年中国会积极合作下，墨尔本募集4 700镑，悉尼募集4 758镑，西澳华人募捐1 900镑。从1912年6月到1913年，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的华人共募集到2.6万镑给南京革命政府，表示了他们对共和国的爱国支持。^④（3）积

^① 参见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 - 1921*, pp. 163, 275.

^② 参见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华工契约制》。

^{③④} 参见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 - 1921*, pp. 218-220.

极参加讨袁活动和支持广东军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国内发生“二次革命”，澳洲洪门领导人黄柱稳、梅东星等除了通过创办《民国报》声讨袁世凯外，还积极为华南的反袁活动筹款。1916年，悉尼华人共济会组织了“洪门筹饷局”，黄柱稳和梅东星环游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争取义兴会成员支持，募捐2900镑，汇给孙中山，以支持华南革命军。1918年，为支持广东军政府讨伐地方军阀，悉尼的华人共济会又募集到2300镑。^①（4）随着形势的发展，澳洲洪门从组织结构到名称都相应地做了变革。首先是义兴从华人社会的各阶层中广泛接受会员，从富裕的商人到地位低下的菜农、细木工和小贩等，都能入会，总的来说，来自劳动阶级的人更多些，但义兴的领导权都受华商控制。1912年新南威尔士州的义兴成立总部，后来也成为联邦的义兴总部，并以“The Chinese Masonic Society”（即“华人共济会”）作为英文名称。1914年，墨尔本的义兴也进行改组，并采用“The Chinese Masonic Society”作为英文名称。随着1916年华人共济会宣布公开活动，在1916—1918年间，华人共济会各支部也就在澳洲各地露面，华文报纸并公布了他们的活动与名单，所有华人共济会的支部均受悉尼总部的指导。1918—1921年间，悉尼总部还召开了4次华人共济会的州际会议，并于1921年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公报》，对重要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充分显示了该会力量的日益增长。至此，澳洲洪门完全摆脱了秘密状态，它在澳洲作为秘密结社的历史就告终结。

三、澳洲洪门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1851年以来，伴随着大批华工赴澳淘金，洪门天地会也就进入了澳洲，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天地会原来虽有“反清复明”的口号，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破产劳动者实行互助互济的团体。自从传到海外以后，因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清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封建统治，而是西方殖民政府的排斥和欺压。因此，澳洲洪门就谈不上什么“反清复明”，倒是更加清楚地显

^① 参见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 - 1921*, pp. 218-220.



示出它抵御强暴、实行互助的本来面目。大批华工来到异国，举目无亲，孤苦无援，他们结拜加入洪门，目的就是为了实行互助，维护华人的生存权利和共同的利益，反对殖民政府欧洲白人的种族歧视及欺凌压迫。在平时，帮助成员安排工作、调解纠纷、解救生老病死之难。据记载：“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地的义兴，早期都为他们的会员做过一些好事。它鼓吹兄弟情谊和帮助会员就业，以维护会员利益。”^① 在发生排华暴乱时，他们通过请愿和争取社会同情，寻求合法保护。如 1857 年 7 月维多利亚州的巴克兰金矿场爆发大规模排华暴动后，殖民政府开始征收华人居住税，每人每月付税 1 英镑，淘金华工通过请愿，陈述华人困境，1859 年 2 月，该州议会决定将居住税减为 3 月征收 1 英镑。^② 1861 年新南威尔士州兰明低地发生排华暴动后，有 600 名华人要求与华语翻译官亨利（James Henley）同往殖民政府争取合法保护，基于正义感，亨利还呈文澳洲当局，要求对华工加以法律保护。^③ 1861 年 8 月 2 日的《悉尼先驱晨报》的社论，也对华工的遭遇表示同情，指出：“在任何程度上，他们都是优等的；没有人看见他们喝醉了在街上滚；没有人看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没有哭穷以求得大众的怜悯；他们有广泛的组织相互保护和救济，他们自己挣得很少的钱，还把一部分寄回家接济家庭。”^④ 我认为，澳洲洪门在抵御殖民政府的暴政、维护华人利益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民间领事馆”的作用。

澳洲洪门在 150 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区的海外洪门相比，有着两个明显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基本上没有发生类似东南亚地区和美洲的秘密会社那种严重干扰当地社会和华人社区安定和秩序的帮派械斗和堂斗。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地区的华侨来自中国的许多省份和地区，除了福建、广东两个主要省份外，还有广西以及其他各省。他们都依方言划分集团帮派，因此，他们中的洪门秘密会社也受方言群的影响分成许多帮派。以马来亚为例，在 19 世纪，马来亚的华侨社区有 5 种

^①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 pp. 218-220.

^② 参见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126 页。

^③ 参见刘渭平：《澳洲华侨史》，112~116 页，香港，星岛出版社，1989。

^④ 转引自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史》，127 页。

主要的方言群，那里的洪门秘密会党就有义兴会、海山会、和生会、华生会和大伯公会等名目。^① 他们之间因方言、风俗习惯、性格以及职业的不同，时常误解、猜疑与敌视，以至发生冲突和流血械斗。在历次冲突械斗中，秘密会党都充当着主角。这种华人帮派斗争，在马来亚史上发展成著名的 1862—1873 年两次拿律战争。而澳大利亚的华侨，尤其是淘金时期的华工，主要来自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部分来自福建南部，他们大多按原县籍同乡聚居。关于闽粤早期赴澳华人的精确人数，已无详细的记录，但我们从巴拉腊特现存的华人墓碑，可以看出移民来源的梗概。在现存的华人墓碑中，明确记载死者县籍的共 480 块，其中来自宁邑（今新宁县）的有 250 块，占总数的 52% 以上；来自会邑冈州（今新会县）的有 123 块，约占总数的 26%；其余 107 块分别属增城、香山、开平、番禺、东莞、顺德、鹤山等县，没有一块是外省人的。^②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这些人聚居在一个地区，他们都讲同一种方言广州话，具有相似的体形、思想和性格，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要少得多。所以在澳洲洪门史上，除了 1904 年义兴与保良社因鸦片赌博的利益而引起冲突，在墨尔本小伯克街发生猛烈的械斗外，几乎没有什么由华人秘密社会引起的暴乱和流血事件。而且保良社在 1904 年与义兴冲突之后名誉扫地，终于在 1912 年解散。^③

特点之二是，它比较早的走向统一，并以“The Chinese Masonic Society”这一英文名称来命名联邦的义兴总部，让澳大利亚公众了解义兴，促使义兴与澳人社会相融合。众所周知，在海外华人社会中，许多地区的华人秘密社会，帮派林立，门户之见甚深，经常发生派战堂斗，很难走向团结统一。直至今日，一些地区的华人秘密社会仍处于这种状态。然而，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情况却不一样。除了淘金时期因金矿分散而华人的洪门组织也比较分散外，随着后来华人流向城市，洪门也逐渐向城市集中。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和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两个义兴总部。新南威尔士州的义兴会员首先于 1908 年在悉尼的布莱克本街

① 参见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35-36.

② 参见 *Ballarat's Chinese Gravestones and Associated Records, 1854-1955*, Melbourne University History Research Series, No. 2.

③ 参见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 pp. 159-160.



(Blackburn Street) 设立义兴总部，后来又改设在玛丽街 (Mary Street)。维多利亚州的义兴总部则设在墨尔本的小伯克街 (Little Bourke Street)。他们之间互相协作，联系比较密切。当新南威尔士州义兴在布莱克本街总部举行开幕典礼时，墨尔本和本迪戈的义兴头领都到悉尼参加庆典仪式。1912 年悉尼义兴总部以 “The Chinese Masonic Society” (华人共济会) 作为其英文名称后，1914 年墨尔本的义兴也采用 “华人共济会” 的英文名称。在今存的本迪戈洪门会簿的封面上，还写着 “Masonic Society” (共济会) 的字样。1916 年在新南威尔士州成立了联邦共济会总部，同年联邦共济会呼吁澳大利亚的所有义兴作为悉尼总部的附属支部。1918 年至 1921 年间，悉尼总部通过召开 4 次州际华人共济会巩固会议，使澳洲洪门基本实现了统一。^① 澳洲洪门由义兴命名为 “华人共济会”，不仅获得了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支持，而且容易被澳大利亚公众理解，因为共济会 (Freemason) 在西方国家是比较流行的，虽然华人共济会并没有使用澳大利亚共济会的任何仪式，但是他们至少在培养兄弟情谊方面是极为相似的，这就更有利于华人共济会与澳大利亚社会的融合。

澳洲洪门能较早地走向统一，除了澳洲华人大多数来自广东，矛盾较少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澳洲洪门拥有李元三、梅东星、黄柱稳、李元信等这样一批组织能力很强，在澳洲洪门和华人中有极高威信，甚至在澳人社会中也颇有信誉的领导人。我们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曾提到的李元三，1831 年出生于中国，1862 年到澳大利亚，先在巴拉腊特和本迪戈当金矿工，然后至墨尔本经商。他遍游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长期与维多利亚州义兴有联系，20 世纪初即担任墨尔本义兴的领导人，至 1911 年，他领导的义兴会员已有 3 000 人。他是维多利亚州华人中一位杰出的和受欢迎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反清斗争和澳洲洪门实行联合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梅东星，1831 年生，广东四邑人，1852 年移居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他领导新南威尔士州义兴达 55 年之久，吸收了约 3 000 名会员，1919 年在悉尼逝世。黄柱稳，广东四邑人，1878 年至澳洲，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朱尼定居，经营小麦田产和羊毛出口代理，是梅东星的忠实追随者。由于他好交际、谦虚、诚实、慷慨大方，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

^① 参见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 - 1921*, pp. 159-160.



亚州华人中颇受欢迎的人。他结交的许多朋友中，有华人，也有澳大利亚人，1913—1919年任新南威尔士州总理的 W. A. 霍尔曼，就是他的亲密朋友。20 世纪的前 30 年，他一直是新南威尔士州和联邦华人共济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新南威尔士州华人共济会团结一致，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该州华人社会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①，对促进澳联邦华人共济会的联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 19 世纪中叶大批华工移居澳洲以来，至今已有 150 余年。在这 150 余年里，华人从事过淘金、蔬菜种植、家具制造、工商、城市建设等各种行业的工作，尽管遭受到排华运动和“白澳”政策的苛待与歧视，但他们不屈不挠，顽强奋斗，为澳洲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们又带来了中华文化，为澳洲的多元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而澳洲洪门在这一过程中，在团结华人，实行互助以及推进与澳人社会融合等方面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① 参见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 - 1921*, pp. 159-160.

附录一

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

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黑社会势力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势力，这股社会势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已作为反动会道门被予以取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已销声匿迹。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黑社会势力又在中国大陆沉渣泛起，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已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这种黑社会势力何以能死灰复燃，它们具有哪些特点，怎样根除这一社会毒瘤？本文拟做一初步的考察和分析。

一、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特点

（一）在全国范围相继出现，名目繁多

当代中国黑社会势力的抬头，目前已不是个别城市个别地区的现象，而是全国范围众多地区的现象。就中国大陆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相继出现了一些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在城市里，特别是在上海、南京、北京、重庆、西安、沈阳、济南、贵阳等大中城市，黑社会的活动相当频繁；而在广州、深圳、海南等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黑社会的势力更为猖獗。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一次分析全国治安形势的报告中就指出：“重大盗窃和抢劫犯罪分子，往往结伙共同犯罪，有的明显带有黑社会的性质。”^① 公安部长陶驷驹在 1991 年 11 月召开的第 18 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也指出，“当前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一些地方犯罪团伙、黑社会、流氓

^{*} 本文与彭邦富合作，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2（3）。

^① 引自《魑魅魍魉》，载《蓝盾》，1990（1），21 页。



势力相当猖獗”，强调公安机关“要特别注意打击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绝不能让他们形成气候”^①。1989年深圳市在开展打击黑社会组织的斗争中，抓获带黑社会性质的帮派组织成员359人^②；四川省安岳县的帮会组织不下50个，遍及全县各乡镇^③；湖南益阳地区自1985年以来先后出现了“龙虎帮”、“梅花帮”等25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团伙，参加成员达3120人^④。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对七个县市的调查，共发现这类组织121个，涉及2142人。^⑤另据报载，1989年5月全国有300余名青少年去青岛崂山求道习武，据被抓获的“十星帮”头目“黑虎星”交代，这批青少年大部分是各地帮会组织派去的代表。他还交代说：全国已有500多个类似“十星帮”的黑社会组织，有的帮拥有400多名成员，其中以东北的“真龙帮”、上海的“震中帮”、山东的“海泉帮”、江西的“卧虎帮”、河北的“改日会”势力最强，各地帮会都在加紧操练，四处寻求高手、名人指点，以求在即将举行的比武竞选“全国联帮协会主席”的大会上，争得宝座，扩大己方势力。^⑥目前，中国新出现的黑社会成员究竟有多少，尚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有关部门的统计材料表明：1989年全国破获犯罪团伙9.1万个，成员34万人，比1988年分别上升59.1%和61%；1990年仍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仅湖南一省比1989年上升27.2%和21.3%，云南省比上年上升25.6%和13.3%。1990年5月至9月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查获犯罪团伙7.97万多个，成员33.7万多人^⑦，其中黑社会帮派组织占有很大的比重。

当代中国的帮会不仅分布面广，而且组织名目繁多。据已揭露的材料，在上海就有“生死帮”、“天龙帮”、“神鹰会”、“九重天”、“九人帮”、“十兄弟”、“八兄弟”、“卫守党”等十几个帮会组织，影响遍及大半个上海市市区及郊县。^⑧深圳市有“三毛帮”、“高州

① 《法制日报》，1991-11-12。

② 参见《南方日报》，1989-10-15。

③ 参见《法律与生活》，1990（5）。

④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5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载《社会》，1990（12）。

⑤ 参见《青少年犯罪问题》，1990（3）。

⑥ 参见刘德亮：《现代帮会》，载《中国青年》，1990（5）。

⑦ 参见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载《法律与生活》，1991（5）。

⑧ 参见《上海滩新帮会》，载《青春丛刊》，1989（3）。



帮”、“十三太保”、“暴风一族”、“忍帮”、“响马帮”、“北京帮”、“赤军帮”、“IQ帮”等十几种名目。湖南益阳地区有“龙虎帮”“梅花帮”、“鹰帮”、“青龙帮”、“十三雕”、“九龙”、“八虎”、“鬼头帮”、“天龙帮”、“黑虎帮”、“丐帮”、“十三太保”、“十三妹”、“忍帮”、“八大金刚”、“煞十兄弟”、“铁血会”、“圣旨帮”、“五毒帮”等名目。河南商丘地区也有几十种不同名目的帮会。

这些帮会的取名，有的以地方命名，如“高州帮”；有的以动植物名命名，如“龙虎帮”、“鹰帮”、“紫竹帮”；有的以兄弟姐妹结义命名；有的以电视剧或历史武侠小说的人物命名，如“暴风一族”、“十三太保”、“八大金刚”；有的以某种武器命名，如“菜刀队”、“斧头帮”。

综观全国各地帮会分布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帮会滋生和活跃的地区，大多是历史上帮会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如长江流域、运河一带过去是哥老会、青红帮活动的主要地区，现在也是新帮会最活跃之地；四川、湖南等省是历史上哥老会势力最大的地区，如今新帮会的势力也十分令人注目；过去运河、湖泊地区是青帮的巢穴，现在船民帮会又大量出现。据记载，1990年7月，长江全线查获“芜湖帮”、“池州帮”、“新洲帮”等犯罪团伙30个，成员119名；1990年5月，上海市在全市400公里的水道运输线上抓获成帮结伙的“水老鼠”346名，捣毁船民帮会窝点11个；浙江省湖州市水上公安局摧毁了水上帮会团伙51个，成员452人；湖北省公安机关在6天时间里摧毁水上犯罪团伙157个；此外，在苏北运河线上有不少“水上游击队”，苏州河上有“嘉兴帮”，吴江县有“太湖帮”，巢湖上有“飞虎队”，江西赣江上有“赣州帮”，洞庭湖上有“注滋帮”，鄱阳湖上有“瑞昌帮”、“星子帮”，洪湖上有“乔氏帮”，珠江口有“洲头帮”，种种名目，不一而足。所以，现在有人惊呼：“从东部到西部，从南方到北方，祖国的血脉正遭受日趋严重的威胁。一个个癫狂的新生的船民帮会，一桩桩发生在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蓝色河道上的血案，使漂浮的方舟倾斜了……”^①

（二）从组织形态上看，这些帮会团伙大多属于初露头角的暴力型，活动大多带有社区性的特点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些帮会组织大的拥有数百人，小的只有几人，而一般的多在十几人、几十人的规模。其存在的时间多则

^① 李诗学：《倾斜的漂浮世界》，载《人与法》，1991（1）。

数年，少则几个月，即被破获。由于它属于初露头角，发展尚未成熟，因而不能和欧美的黑手党及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组织相提并论。

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大陆上的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有个明显的不同点，即中国大陆黑社会组织大多是自发产生，后面没有或很少有政治势力的支持。中国政府是不允许这种黑社会在我国生根立足的，只要一发现就立即铲除。而资本主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则不同，它们后面有政治势力的支持，并被利用来调节社会力量。因此，这些黑社会就以职业为纽带组合起来，或按地区划分，以一定的地区为基础向外扩张，发展成具有庞大系统、跨越地区、跨越国家的集团，像欧美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旧中国的青红帮，目前港澳台的“14K”、竹联帮就是如此。

由于中国大陆的新生帮会团伙不能合法存在，一般得不到政治力量的支持，因此它们多呈现社区性特点，它们多在所生活的社区出入活动，犯罪活动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但另一方面，由于在本社区活动，其组织就有更强的凝聚力，发展也比较快。这些帮会往往从一成立，就投入犯罪活动，而且作案频率高。如湖南益阳县张塘乡的“平义会”，从成立到被查获，仅一个月时间就作案36起。^①不同的帮会在同一社区活动，势必会产生利害冲突，开片打斗是它们解决争端的最常用方式。据深圳市调查，已发现的十几个帮派几乎都划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相互间冲突时起，仅罗湖区、上埭区（今称福田区）两年来就发生帮会团伙打架斗殴事件127起。

（三）犯罪形式多种多样，从经济上的攫财直至政治上的反动；犯罪工具日趋现代化、技术化

现代帮会的建立，大多是为谋财取利。船民帮会中流行的几句顺口溜道破了这个天机，“水上是天堂，沿岸是银行，两手空空来，回去造楼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偷盗抢劫、绑架勒索、拐卖人口、贩毒走私，无恶不作。无论是水上陆地，还是各交通口岸运输线上，拦路抢劫案每年都不时发生。据调查统计，浙江湖州市17个帮会团伙成立1年左右作案484起，共抢劫财物27万余元；在摧毁长江沿线帮会时，共查获劫盗赃物价值8206万余元；上海水域摧

^①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5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毁 11 个帮会窝点，缴获财物 12 万元；苏北“水上游击队”在运河上拦劫客货轮，一次就抢劫现金 1 100 元，另一次劫去江苏航运公司 584 号船队 20 吨生活用煤。^① 湖南沅江“五人会”一年偷盗 15 次，折款 5 400 元^②；最触目惊心的是 1989 年 10 月发生在衡阳至南宁间 405、406 次列车的抢劫案，众目睽睽下歹徒竟公然洗劫列车。^③

绑架勒索，也时有发生。1991 年盐城市的“青龙帮”绑架了盐城中学一名 16 岁的学生，向其家长索要 6 万元，勒索未遂，即撕票杀人，将这名学生放入麻袋，沉河而死。安阳市的“血海帮”，经常在安阳火车站下黑帖、绑票，敲诈勒索。^④

拐卖妇女，到处都有。大多由犯罪分子结成团伙，进行诱骗绑架拐卖活动。例如四川成都市有个由 18 人组成的拐卖团伙，各有手段，且分工明确。从 1988 年 8 月至 1989 年 4 月，通过跳舞结识女青年和少女，以去五台山、北京旅游和到外地做生意为由，先后将 55 名少女和女青年拐卖到太原、浑源、应县等地，获赃款 113 万余元。^⑤ 更有甚者，有的拐卖集团还和港澳台黑社会勾结，将大陆女子卖到香港、台湾等地为妓。

贩毒走私，目前也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的贩毒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是从“金三角”地区即东南亚的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的毒品生产地区，由黑社会经云南、广西边境地区贩入，有的经广州到香港，有的贩入内地，所贩毒品主要是海洛因；第二条路线从土耳其经新疆进入西北地区；第三条路线是沿海地区、长江沿线，每年都有贩毒案件破获。走私活动也多属内外勾结，走私物品包括香烟、淫秽物品、枪支、大陆珍贵文物和珍稀动物等。

在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的同时，黑社会势力还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湖南邵阳、常德等地公安机关破获的“中国黑手党”、“群龙帮”、“梅花帮”等组织都起草了反动政治纲领，提出“要为争取寸土而生存，为争取领导权奋斗终生”。“梅花帮”还利用部分群众对计划生育政策不满的情绪，煽动群众推翻共产党。益阳地区也出现

① 参见李诗学：《倾斜的漂浮世界》。

②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 250 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③④ 参见《法制日报》，1989-10-31。

⑤ 参见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了“流浪者学会”、“有志者同盟”、“青年促进会”、“中国大陆民主党”、“中国游龙会”等政治性非法党派组织，大肆进行违法的政治活动。^①帮会组织还不择手段瓦解基层政权，妄图取而代之。有的经常蒙蔽一些群众，给基层政权施加压力，使之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有的帮会插手地方矛盾，煽风点火，扩大纠纷，给基层政权出难题。有的还在政治上投资，某村一个帮会组织公开向群众许愿：如让他们掌权，就可减免公粮和统筹粮。^②哈尔滨市的一个黑社会流氓团伙头子甚至想用钱“买个政协委员当当”^③。

另有一种帮会团伙是专为寻衅闹事逞威风搞起来的。他们打架斗殴，侮辱妇女，寻欢作乐，或称霸乡里，欺压群众，以满足其变态的心理要求。豫皖两省交界的地方有号称“一百单八将”的帮会组织，经常三五成群，在两省交界处滋扰，殴打群众，报复干部，扬言“脚踏黄河两岸，拳打豫皖两省”；夏邑县发生过30多起帮会组织操纵下的聚众械斗事件。^④

不管是哪种帮会，它们都以暴力手段作案。作案的工具有的比较原始落后，如棍棒、匕首、刀斧，也有自制的火药枪支及现代枪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枪支愈来愈多。这些枪支有的是从海上走私入境的，如1989年10月，厦门就破获一起台湾通缉要犯走私枪支大案，缴获600支手枪和1.05万发子弹，捕获涉案的台湾不法分子16人，香港不法分子1人，大陆不法分子13人，轰动一时^⑤；有的是从武器库抢劫、偷盗而来。在境外黑社会势力的指导和帮助下，国内一些黑社会组织和犯罪团伙作案时，通讯和交通工具也日趋现代化。他们有些安装了高功率电台，不少犯罪分子配备了步话机、微型传呼机；有些拥有汽车和摩托车，一些走私船上还装备有先进的雷达导航设备、监视公安缉私部门的扫描电台等。这样，犯罪分子不仅作案效率高，而且便于逃避公安部门的侦查和打击。

①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5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② 参见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③ 《惊心动魄的除恶之战——哈尔滨五个黑社会组织覆灭记》，载《人与法》，1991（10）。

④ 参见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⑤ 参见褚言义、蔡硅村：《越海犯罪大扫描》，载《南风窗》，1991（7）。



（四）受到港澳台黑社会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出现了内外勾结的趋势

香港、澳门、台湾的黑社会势力一向比较猖獗。香港地区目前规模较大的黑社会组织有“14K”等近十个派别，200多个分支，成员达10多万人；澳门黑社会组织有“和安乐”等20多个，2万多人；台湾有“竹联帮”等600多个黑社会组织，估计成员在10万人以上。近几年来，澳港台黑社会势力通过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投资办厂、贸易经商等合法途径和其他非法途径渗入内地，尤以台湾黑势力为甚。一方面，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至今已有近200万人次的台湾客到过大陆，这为台湾黑社会的渗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近年来台湾加紧开展“整肃治安”和“扫黑行动”，逼得岛内相当一部分黑道人物不得不离台避风；另有一部分黑社会组织有意采取“被动避风，主动犯罪”的以退为进策略而“移师大陆”，以扩充地盘，壮大“堂口”。据台湾警方称，近年来已有200多名被通缉的黑社会成员和重案逃犯潜入大陆。据厦门警方透露，1989年，全市就发现入境台湾黑社会分子近60人，比1988年上升近3倍。近几年来，福建仅在沿海一带就已查获境外黑社会组织越海犯罪案近50起，抓获境外不法分子100多人。从侦破的案件看，主要有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澎湖帮”、“鹰桥帮”，以及港澳地区的“14K”、“新义安”等，其中以台湾黑社会堂口的人马为最多。^①

在深圳、珠海等特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水房”、“14K”、“和胜和”等港澳黑社会组织势力渗入，从事走私、贩卖、偷渡、抢劫等罪恶活动，气焰甚为嚣张。1983年7月10日深圳发生轰动一时的蒙面抢劫友谊商场的案件，6名罪犯中就有5名是黑社会组织成员；1982年珠海市破获一起偷渡案，系澳门黑社会组织与内地一偷渡集团勾结所为，1—4月间，他们里应外合，先后偷带了30多人出境。^②

云南等地也发现有境外黑社会势力的活动，1987年以来，香港的黑社会组织曾多次假道云南贩运毒品。

境外黑社会势力进入内地后，千方百计建立活动据点，扩展自己的组织，并和内地黑帮势力勾结共同从事犯罪活动。据载，台湾一个黑社会组织的“大佬”郭××、何××等人曾多次入境某市，

^① 参见褚言义、蔡硅村：《越海犯罪大扫描》。

^② 参见厉东明：《从社会学角度看深圳、珠海特区的犯罪问题》，载《社会》，1985（4）。

利用一些结拜兄弟关系，纠集了社会上 24 名青少年，以教练拳术为名，秘密成立了一个“24K”黑社会组织，成员每人都配有凶器，还有自制的手榴弹等。他们称霸一方，无恶不作，几年中先后打砸 17 起，砸毁 6 户人家、3 个店铺，打伤 16 人。^①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86 年以来港澳黑社会势力通过渗透活动，仅在广东省的珠海、深圳、佛山、广州、韶关 5 地就发展组织 50 个，有成员 460 多名。

（五）组织成分复杂，以青少年为主，文化水平较低

现代帮会组织的成分非常复杂，参加的成员有农民、企业职工、无业人员、劳改劳教释放分子等，有的组织以无业青年为主，有的以青少年学生为主，有的以农民为主，有的以企业职工为主。

从各地破获的帮会组织情况看，其成员大多是青少年，而且有不少是在校中学生。四川安岳石羊 11 个帮会成员的年龄，最大的 30 多岁，最小的只有 12 岁，95% 以上的成员是 20 岁以下的青少年。^②河南商丘地区破获的帮会组织中，青少年占 90%，在校学生占 11%。^③上海的 10 多个帮会，“成员大部分是中学生，年龄多为十七八岁，小的乃至十一二岁”^④。深圳市对前不久抓获的 312 名黑社会成员进行调查，25 岁以下的 286 人，占总数的 92%。^⑤

加入帮会团伙的多为男性青少年，但也存在女性，虽然为数很少。据载，一个名叫“六姐妹”的帮会组织就是由 6 个女青年组成的，她们按年龄排座次，由“大姐”做首领，歃血盟誓，订立帮规，声言“要让所有的人见了我们都发抖！”她们除了搞淫乱活动外，还盗窃、诈骗、抢劫、赌博、斗殴^⑥；《新乡晚报》载，卫辉市也曾查获一个叫“珍珠帮”的女性流氓帮派组织，长期从事淫乱活动。^⑦此外，还有“姊妹帮”、“十三妹”等名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帮会的成员中，有相当数量的是犯有前科的劳改劳教释放分子。他们被释放后，不改劣迹，继续作恶，在帮会中起着特别恶劣的作用，他们大多是帮会组织中的骨干分子，有

① 参见褚言义、蔡硅村：《越海犯罪大扫描》。

② 参见《中国帮会在大陆重新抬头》，载《法制文摘》，1990（5）。

③ 参见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④ 《上海滩新帮会》。

⑤⑥ 参见冯从岳：《震惊：黑社会帮会毒液在渗透》，载《海上文坛》，1991（1）。

⑦ 参见《晚报文萃》，1991（7）。



一套作案和逃避打击的经验。湖南益阳地区的 250 个帮会组织的成员中，“两劳”回归人员和其他品质恶劣青少年占 95%，多为中坚分子^①；商丘地区帮会组织的骨干成员也“大都是被判刑劳教或拘留过的人”^②。这种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一旦与年幼无知的中学生结成帮会，就向他们传授犯罪经验和技巧，起着教唆犯的作用。如上海的“神鹰会”，刚成立时，帮主阿平因毫无指挥团伙的经验，常常无从下手，一筹莫展。正在此时，遇到刚从“山上”下来的（即刚被劳改释放出来的）“奶油”（犯罪分子绰号），于是就聘请他做二头目，从此以后，“神鹰会”就如虎添翼，在“奶油”的教唆和带动下，一伙中学生过上了夜里偷窃、白天吃喝嫖赌的犯罪生活。^③

从总的情况看，目前大陆帮会组织大多以一两个心黑手狠的成员为核心，吸引一些想寻找靠山、逞强好胜的其他成员，公然结伙，进行流氓械斗、伺机抢劫、伤害无辜的罪恶活动。这些青少年行凶、伤害犯罪，属于以残暴手段侵害他人、危害社会，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以致触犯刑律的暴力犯罪。

从全国范围看，这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其成员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是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文化水平低下，大多在初中以下；他们思想空虚，没有抱负，爱寻刺激；缺乏教养，有的父母离异，有的受家庭虐待，有的被过于溺爱，心理上发生变态，易怒易爆，失去自控能力，因而胆大妄为，无恶不作。

（六）现代帮会基本上继承了传统帮会的衣钵，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帮规条例、隐语暗号

从组织建制上看，各帮会多有“帮主”或“老大”作为首领，下设有军师、金刚、护法、堂主等角色，他们在帮会中起组织、协调、监督、决策等作用，他们的行动往往决定帮会团伙违法犯罪的性质、内容、情节及违法犯罪的能量发挥和危害程度。帮会内部仍然是封建家长式领导，“帮主”对帮会成员实行统治和控制，具有无上权威。有些帮会内部还设有堂口，实行分层、分片、分级负责制，并层层节制。如上海的“天龙帮”，按金、木、水、火、土五星座设

①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 250 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② 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③ 参见《上海滩新帮会》。

五堂，每堂成员按年龄大小排队，并选出正副堂主，正副堂主要听从“帮主”的命令。^①江西“赣州帮”则将成员分为五级：“帮主”（或称“爷老大”），“若头”（第二把手），小头目，一般帮会成员，“徒生”（或称“小差”），并将帮主的船作为“总部”。^②

礼教的规范和法家的严刑历来被秘密社会奉为维系组织存在的“法宝”。新生帮会大都定有严明的帮规，规定帮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并规定对犯规者的惩罚。如“赣州帮”规定，所有成员都得严守四大诫命：不得染指帮内兄弟之妻（因为帮内兄弟均长期漂流在外，留有妻子孤单在家）；不得泄露帮内机密给官方；绝对遵守主从关系；绝对遵守父子关系。^③益阳“五毒帮”的帮规是“帮主走前站中间，四大法王左右护卫，帮会成员后面紧跟，按期交纳帮会会费；叛逆出卖者，在身上剜眼两个，放尽血为止；以下欺上者，以硬棒打，出血为止；盗物不报、不交者，以条子抽；见盗物不报者，肉膝跪地，罚跪一天；一经暴露，必须逃离大陆，潜往香港”；并要求其成员“每人每天孝奉帮主白沙香烟一包”^④。河南“黑龙帮”帮规规定：没有胆量者不能进入本帮；每个成员做事不经批准者杀；组长不经批准做事者杀；被公安机关抓走说出者杀；加入本帮必须文身；家有妻子父母者每月发给奖金。^⑤有些帮会以首领的命令代替帮规。如“十星帮”帮主向其成员宣布：“今后以我这令牌（一块刻有十颗小星的竹片子）行事，见令牌如见帮主，见令牌不动者，走露风声者，轻则开除帮籍，割去舌头，砍去右手；重的，斩草除根！”^⑥对违反帮规者的惩罚很严厉，主要形式有体罚、殴打、砍杀、开除等，有些帮内设有“护法”、“打手”，专门执行帮规会律。

现代帮会的入会仪式与传统帮会相似，大都要对天盟誓、喝鸡血酒、排座次、发标记等等。如“十星帮”成立之时，先是帮员对坐在“帮主”席位的“黑虎星”单腿跪地，合掌低首，高呼“参见帮主”，然后是“帮主”率众人双膝跪地，合掌仰首，对天盟誓：“五湖四海，入帮为兄弟。”“帮主”说一句，帮员们重复一句。“不

① 参见《上海滩新帮会》。

②③ 参见李诗学：《倾斜的漂浮世界》。

④ 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5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⑤ 参见《行为科学》，1991（5）。

⑥ 刘德亮：《现代帮会》，载《中国青年》，1990（5）。



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弟兄不怕刀枪剑戟，不怕妻离子散，不怕坐牢杀头……”^①四川安岳县的“友谊帮”，在成立时，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誓词，宣誓后，即饮鸡血酒，并将各人的名字写在白布上，然后按上血印，排了座次。^②

各帮会一般都有自己的标记，或文身（一般刺花纹、文字、鸟兽图案，最常见的有双剑、飞鹰、蜻蜓、老虎、手枪等图案），或统一发式（长发、平头、光头，或在光头中留一撮毛等），或统一服饰（或统一颜色，或统一式样，或统一徽章，或统一在衣服某部位拴上或画上什么标记），还有其他标志。如深圳的“响马帮”以印有海马的文化衫为标志；上海的“神鹰会”以绘有雄鹰图案的瓷盘为标志；“生死帮”以烟头在各人手臂上烙下印记，表示“生死与共”；淮安的“寿字帮”，每人手背上刺有“寿”字；“黑龙帮”还将文身写进帮规。

现代帮会也都有自己的隐语暗号。如称头目为“帮主”、“龙头”，打架称“开片”，白吃白拿为“打单”，车上扒窃为“押车”，入室盗窃为“查户口”，等等。

二、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的原因

黑社会势力的沉渣泛起、蔓延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原因。它出现在各种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和其他犯罪活动有着共同的诱因。同时，作为团伙犯罪的特殊形式、古已有之的犯罪方式，它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成因。它还和青少年犯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成因，必须从社会、历史、社会心理、青少年犯罪诸角度做综合考察。

（一）社会转型期的综合症

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迅速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是生机和活力的迸发；另一方面，又势必伴随着新旧体制、新旧观念的剧烈冲突，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和防

^① 刘德亮：《现代帮会》。

^② 参见《中国帮会在大陆重新抬头》，载《法制文摘》，1990（5）。



范机制尚未建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待业人口剧增、对外开放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及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失范”……这种转型期综合症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首先是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帮会团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几年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向是由农村流向大中城市，从内地流向沿海，从贫困地区流向富庶地区。据统计，1987年底，全国23个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中，流动人口数量已近1000万。^①1989年初春，出现百万农民流动大潮；1990年初春，数十万民工涌入广东。^②目前，全国城乡日平均流动人口在5000万人以上。^③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构成城市管理的一大困扰。以上海为例，20世纪50年代上海每天的流动人口只有10万，而到1988年每天的流动人口已达209万，差不多增加了20倍。而上海的城市设施、管理方法等并没有相应改善，结果外来人员的犯罪率已占上海市发案率的1/3。1988年上海破获的外来人员犯罪案比1987年增加了102%，从1984年至1989年6年中上海外来犯罪分子增加了7倍。^④目前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中已形成一支庞大的游民乞丐群，据统计，1986年全国乞丐已达100万人。这些乞丐不同于旧中国因贫苦所致的乞丐，他们是一群新的寄生型的群落。这些人是作案犯罪结帮结派的重要来源。据《社会》杂志载，目前上海市“一些外来人口以同乡、亲族等关系，组成团伙，结帮犯罪，危害甚大。目前，经常结伙活动的有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以马路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柳州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安徽帮’，以抢劫为主的‘东北帮’，还有以倒卖船票和诈骗为主的‘温州帮’等等”。这些帮伙“依仗人多势众，作案往往无所顾忌，一旦被群众发现就行凶伤人，对市民安全威胁很大”^⑤。

其次，就业体制不尽完善，无业、待业人员大量存在，成为犯罪和重新犯罪的“潜在源”。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人口急剧膨胀，加之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的不尽合理，还不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充分就业，待业乃至无业人员的大量存在是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89-03-04。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90-02-19。

③ 参见《中国人口科学》，1990（6）。

④ 参见柴俊勇：《流动人口——城市管理的一大困扰》，载《社会》，1990（10）。

⑤ 柴俊勇：《流动人口——城市管理的一大困扰》。



必然现象。据估计，从目前到2000年平均每年新增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在2000万人以上，而平均每年因超过劳动年龄而离退休的人口却不足900万人，每年净增达到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累计将增加达到劳动年龄人口1.54亿人，近几年每年安排就业的人数平均只有730万人。在农村，富余和潜在富余劳动力的状况也日趋严重。^①据1988年的统计，截止1988年末，全国城镇待业青年数达296.2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达1亿多人。^②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较长时间的待业生活，能造成待业者的心理压抑，使他们产生自卑、自悲的不良心理，还会使他们失去渴望生活的激情，以至产生反社会情绪。尤其是青少年，由于离开了学校，失去了接受正面教育的机会，处于无组织的涣散状态，在无所事事、精神空虚时很容易走上贪图物质享受和精神刺激的道路。而当他们的欲望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满足时，便会出现反社会的犯罪举动。拉帮结伙犯罪无疑也是宣泄方式的一种。益阳地区250个帮会的成员中就有60%以上是游手好闲的无业青年。

再犯罪现象已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据统计，1987年再犯罪作案者占劳改劳教人员的30%。^③另据天津市统计，该市1985—1989年5年间判处死刑的罪犯中就有15.3%为再犯罪，该市目前的再犯罪率在5%左右。^④前已述及，这些人往往是帮会团伙的骨干分子，他们之所以重坠深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来自就业问题。据浙江、天津的调查，因无业而导致再犯罪的人数，占再犯罪总人数的69.67%，比有职业而再犯罪的高4.36倍。^⑤据统计，仅有约22.1%的刑释人员能够有幸到国营、集体企业就职^⑥，其余的人都要闲散在社会上。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偏见和歧视，再加上恶习难改，于是便旧业重操，在帮伙中寻找温暖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三，在社会大变革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受到冲击，而新的观念、规范、方式没有完全建立，在这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失去了应有的

① 参见李抒望：《人类自身增长的危机》，载《青年思想家》，1990（3）。

②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123页。

③ 参见马结：《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67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④ 参见张晓智：《重坠深渊——重新犯罪现象透视》，载《人与法》，1991（9）。

⑤ 参见马结：《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67页。

⑥ 参见张晓智：《重坠深渊——重新犯罪现象透视》。



约束力，一些人的心态失去平衡乃至失控。比如，有人不再将“大公无私”、“重义轻利”奉为信条，更有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这种心态的失衡、规范的软化若再和其他诱因如高消费的刺激、对贫富不均的不满等结合起来，便很容易滋生黑社会的各种犯罪活动。

越轨行为的研究者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社会变迁的代价。为解释自杀等越轨行为，他曾提出“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范”两大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就其最重要的内容而言是一系列道德规范，道德意义愈是在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规范对人们的制约作用就愈大。社会解组就是缺乏这种交流和影响；社会失范是指一个社会缺乏其社会成员为寻求指导而依据的规范，或指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至不能向社会成员提供指导。在社会变迁时，容易出现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范，从而导致越轨行为的增多。这种理论虽不乏其局限性和片面性，但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这些年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了社会成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忽视了对青少年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和引导，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社会失范”现象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第四，对外开放中未能建立起一套防范机制，境外不法分子尤其是港澳台黑社会势力利用改革造成的暂时混乱状态乘虚而入，多方渗透，发展组织，并给内地黑社会以援助和指导，使内地黑社会犯罪有恃无恐，这无疑也是黑社会泛滥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二）社会规范软化，传播媒介净化不力

社会规范软化是指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包括政治规范软化（表现为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等现象的滋生）、经济规范软化（外化为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行贿受贿等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和道德规范软化（致使一些人信念空虚、内控力下降、责任心丧失）。社会“旁观心理”、“保护伞”现象、基层组织软弱正是这种软化的衍生物，而正是这些因素和不洁的传播媒介一道，在客观上助长了黑社会分子犯罪的气焰。

第一，“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旁观心理”，使反黑斗争得不到有力的配合。由于社会责任心的下降，一些人对



黑社会分子犯罪忍气吞声、听之任之，而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者又有后顾之忧，这种现象使公安机关在反黑斗争中往往是孤军作战。造成这种旁观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这不仅包括法制的保障，也包括物质利益和社会舆论的保障。没有这些保障，人们便会患得患失。有人对湖南怀化地区 702 名近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中见义勇为人员的情况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部分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的作用、功绩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着一些明显的反差”。首先是“伸张正义反遭非议”。702 人中有 127 人遭到各种非议，不被理解和支持；其次是医药费负担难解决。被调查的 157 名负伤的见义勇为人员，在医药费负担方面，公费 31 219 元，自费 16 849 元，人均自费负担 107.31 元。特别是有的见义勇为人员自身遇难后，搞得人财两空。第三，一些见义勇为人员遭到违法犯罪人员亲属打击报复，处境艰难。^① 因此，要改变这种旁观现象，首先必须健全社会保障系统。

第二，“保护伞”的存在更使一些黑社会分子犯罪肆无忌惮。“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一些犯罪团伙腐蚀政府和公安政法机关官员，或扯起保护伞，或相互勾结官匪一家、警匪一家……”^② 例如，哈尔滨市有 5 个黑社会组织在该市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却能长期安然无恙，就是因为“他们用金钱开道，在我党政执法机关编织了一个结实的保护网”，他们以赞助、支援的名义，向党政机关提供金钱、物品，有的送去办公桌椅，有的给买通讯设备，不断的“资助”，赢得了专政机关的好感；他们还大肆向公安干警行贿，以网罗为其出力的人员。^③ 受惠者姑息养奸，作恶者便可明火执仗。保护网的存在还会给侦破、打击犯罪带来重重困难。仍以哈尔滨市 5 个黑社会组织的破获为例，在该案侦破过程中，恐吓、泄密接踵而至，一些被腐蚀的公安干警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看押犯罪分子的看守人员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以至于不得不把他们也看守起来；一些领导者干预，“某领导要了解案情，去汇报后即被泄露出去；某领导干部打来电话，说不要搞得太过分了，适可而止；有的领导则指责公安机关搞逼供信”。案破后，查出和此案有涉的党政及有关部门干部达 97 人。^④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91-06-07。

② 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③④ 参见《惊心动魄的除恶之战——哈尔滨五个黑社会组织覆灭记》。

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三，基层组织软弱，使黑社会组织未能消灭于萌芽状态，客观上为黑社会分子犯罪开了绿灯。

从全国各地的调查情况可以看到，在一些地区，街道居委会、村委会一级的领导班子相当涣散软弱。以湖南邵阳县为例，1989年县委组织部对全县660个村党支部进行考察，基本瘫痪的70个，约占11%；虽未瘫痪，但不合要求的202个，约占32%。^①他们对本辖区青少年的思想言行很少过问，更谈不上进行教育；对一些非法组织的组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1989年上半年，湖南南县城乡共成立各种非法帮会组织5个，有成员73名，其筹建活动均是在基层组织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均无人制止，也无人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这一情况。^②更为严重的典型事例是重庆远郊潼南、铜梁两县交界处以陈建恒为头目的38人流氓团伙，从1988年至1990年11月横行乡里2年多时间，私设公堂，欺压群众，无恶不作，并以青龙酒家为“政府”，和乡政府分庭抗礼，一些问题乡政府解决了不算数，必须经过他们的“政府”“搁平”才能了结，而区乡政府对此竟无可奈何，听之任之。这种情况还会使一些人丧失对基层政权的信任，为捍卫自身利益，他们便组帮结伙“以邪治邪”。《现代帮会》一文中提到的“七侠帮”还因“见义勇为”被当地8个10万元的个体专业户、一家镇办公司聘为长年保镖。^③

第四，社会传播媒介净化不力，文化市场黄水泛滥，客观上起到了诲淫诲盗并诲犯罪技术的教唆犯罪作用，毒害了许多青少年。

国外心理学家对大众传播工具（如电视、广播）和青少年暴力行为间的关系做过研究，结果表明：“大众传播工具对日益增多的青少年暴力行为是有关系的。看过大明星演暴力‘英雄’角色的人，特别是男性青少年，可能认为暴力行为是维护大丈夫气派和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④另有研究表明，经常观看暴力影视片，会使观众对寻衅事态习惯于做出攻击性的反应，还会使观众对受暴力伤

① 参见刘晓江：《农村宗族势力的复起及对青少年的影响》，载《中国青年研究》，1991（4）。

②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5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③ 参见刘德亮：《现代帮会》。

④ [美] 马丁·哈斯克爾等著，耿佐林等译：《青少年犯罪》，22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害的对象不再抱有同情，原因是新闻媒介根本不反映遭受犯罪活动受害者的伤害和痛苦。^①

青少年主观约束力即分辨是非善恶、抵制外界消极影响、避免冲动冒险的能力很差，而又善于模仿。近几年来，由于管理混乱，出现了大量宣扬偷盗、抢劫、打斗、凶杀及境外黑社会犯罪手段的影视书刊，对青少年起到了“直观示范效应”，成为青少年帮伙犯罪及其他犯罪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对益阳地区帮会组织的调查表明，250多个帮会组织中有30%以上是在不健康的影视作品影响下成立的，一些帮会名称诸如“鹰帮”、“十三太保”、“草上飞”、“八大金刚”、“冷面杀手”等都是从一些武打录像、淫秽书刊中同名沿用或改造引申出来的。^②淮安“寿字帮”的18名成员大都受武侠小说影响，发起人朱定情是个年仅19岁的在校高中生，“武侠小说看了很多，谈起‘小龙帮’、‘黑龙帮’等头头是道，对结帮拜把子也颇有研究”^③。

（三）教育的偏差是青少年帮伙犯罪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青少年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家庭和学校。但近年来，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出现了很多偏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家长往往是孩子的启蒙教师。因此，家庭裂变、家长不端或家教不严、家教不当，往往是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寿字帮”的审查显示，其18个成员中有7人在家排行最小，他们大多家庭管束不严，档案中几乎都有偷窃、赌博、斗殴的记载，“有的家长与儿子同桌赌博，有的明知孩子偷窃却佯作不知；更有甚者，儿子偷鸡老子吃了不解馋，竟带儿子再去偷。”^④

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环节，对青少年发展起着定向的作用。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升学率，一些地区偏重于抓学生文化知识的教育，尤其大抓少数“尖子生”、“重点生”的专业知识教育，而忽视了学生政治观点、思想品德的教育和培养，这就容易

^① 参见[德]汉斯·约阿姆斯·施奈德著，吴鑫涛等译：《犯罪学》，790~792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②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25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③④} 楚齐、渝建：《“寿字帮”覆灭记》，载《人与法》，1991（2）。

导致两种现象的出现：一是所谓“高材生”一旦进不了理想的学校深造，往往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一是后进学生由于在学校受到冷遇，往往产生自卑感，甚至破罐破摔。这两类青少年离校后极易走上犯罪道路。另外，学校教育的单轨制（包括教育结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诸方面的单一化）及两次“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是造成中学生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而帮会团伙中这类失学青少年就占有不小的比重。

（四）帮派意识根深蒂固，使团伙犯罪独具“魅力”

在分析现代帮会的成因时，我们也应看到长期滞留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帮派意识的作用，及帮会本身对有犯罪动机者的诱惑力。

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和封建的宗法思想统治，培植了人们狭隘的区域观念；加之，旧中国的帮会猖獗，帮派活动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因而也铸就了人们浓厚的帮派意识，其危害经久不衰。这可以从十年“文化大革命”事件中得到确证。有的专家在分析青少年团伙犯罪成因时强调：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造反派组织”，各单位、各部门、各系统、各地区的群众都可自行结伙成帮，起来“造反”、“夺权”。整个社会形成的这种强烈的结伙拉帮风气，并未因“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消失，“在十年动乱之后，社会上大量出现的团伙犯罪模式，就是动乱社会内的‘基本模式’的延续。”^①此分析自然也可用于对今日帮会成因的解释。

帮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犯罪团伙，是团伙犯罪的最高形式。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团伙犯罪对有犯罪动机者具有独特的“魅力”，原因在于：第一，它能满足犯罪者寻找靠山、增加安全感的需求，罪犯单独作案常感势单力孤，易受打击；而结成团伙，人多势众，则会感到安全，特别是那些无正当职业或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而被推向社会的人，这种需求更迫切；第二，它能使犯罪者产生“罪责扩散”心理，即认为自己不会承担犯罪的全部责任，因而更能胆大妄为；第三，能出现“相乘效应”，即由于犯罪团伙中他人的存在，犯罪者就能干出一个人不能干的行为；同时成员之间还能互教

^① 邵道生：《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思考》，12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互学，共同提高犯罪技能。正由于此，团伙犯罪就成为当前主要的犯罪形式。

三、关于对策的思考

从上文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当前中国的黑社会组织虽然还处于萌生阶段，大多属于初露头角，其成员的数量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不及及时加以铲除和根治，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且，这种社会问题的形成，其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因此，根治工作也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除严厉打击外，还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治本着手，进行综合治理。

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尤其要严厉打击黑社会帮派团伙犯罪活动。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狠抓经济建设，提倡社会成员依靠合法手段致富，提倡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逐步消灭黑社会产生的经济根源；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共产主义道德情操、集体主义精神风貌取代人们的帮派意识，以铲除滋生帮派团伙的思想土壤；要惩腐倡廉，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强化基层政权，强化社会成员的主人翁意识，以消除黑社会泛滥的政治诱因。

在综合治理过程中，应贯彻治标与治本结合，严打与预防、救治结合，速决战与持久战结合，公安机关治理与群防群治结合的原则。同时应做好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1) 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特别要在青少年中加强反黑教育，调动社会各部门的力量，大张旗鼓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同帮派团伙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表彰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树立尊重他人、互谅互让、助人为乐、“维护治安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真正做到“社会治安社会抓，综合治理综合管”。

(2) 制订专门的反击黑社会帮派团伙犯罪的法规。目前反黑斗争中所依据的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量刑往往偏轻，各地也不尽统一，这





显然已不能适应当前的严峻形势。因此，制订专门法规，以便充分发挥法律效力，稳、准、狠地打击黑社会团伙犯罪，已成为当务之急。

(3) 健全就业体制，广开就业门路，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待业人员、刑释人员及其他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安置工作。对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应尽量做到就地消化，提倡自力更生，发展副业，广建乡镇企业，政府应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帮助，提倡农民集资创建城镇，以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步伐，有人认为这是改变二元社会结构、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外流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并论证了它的可行性。^① 我们赞同这种构想。在城镇，做好与街道、企业的协调，同时适当地创办一些劳动服务公司，尽量地解决待业、无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使他们收入有来源，生活有保障；对刑释人员也要消除偏见，妥善安置，以杜绝他们再犯罪。

(4) 组织城市社会力量，加强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应建立主管部门管理与共同管理相结合的网络管理体制；实行控制与服务相结合，发挥他们在建设城市、繁荣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分类管理。自然，这项工作还应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安置工作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

(5) 加强对青少年犯罪的防范和治理。首先，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的教育作用，大力加强对青少年政治思想、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及法制教育；其次，完善管理制度，健全青少年法规，把对青少年犯罪的惩治与犯前防治、犯后治愈结合起来；第三，做好分化、瓦解青少年团伙的工作，不仅在组织上，更要在心理上做到解帮拆伙，特别要改变他们的“认识水平”，调整他们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改变他们的交往结构，清洗他们结帮成伙的犯罪意识；第四，做好传播媒介的净化工作，消除犯罪诱因。

(6) 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建设，建立和健全治安机构，充实基层派出所的力量，并切实加强对基层治安人员的教育训练，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7) 健全防范机制，杜绝境外黑势力入境，发现迹象要严厉打击；建立和港澳台当局的司法协作，以便共同打击犯罪。随着对港澳地区主权的恢复行使，海峡两岸统一步伐的加快，这项工作越来越

^① 晓为：《盲流·二元结构·农村城市化——访青年学者刘纯彬》，载《现代人报》，1989-04-25。

越显得重要。

总之，要将黑社会帮派团伙连同其生存的土壤一同铲除，必须各方面配合，群策群力，齐抓共管，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是我们的期盼，也是本文写作的主旨所在。



附录二

扫黑必先反腐*

——2000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访谈录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扫黑”捷报频频。我们注意到，中国各省市警方新闻发言人提及黑帮时，几乎无一例外地称之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到底什么是黑社会？警方这一称谓与黑社会组织有何区别和联系？

蔡少卿：黑社会就是地下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它具有政治保护和资本支持，进行职业犯罪活动。根据中国黑社会的情况，其一般有五个特征：通过结拜把兄弟等方式结伙；内部有严密的分工和纪律；有内部的隐语暗号；活动处于隐秘状态；有政治保护伞，即官匪勾结，警匪勾结。

中国目前的犯罪团伙，不单单是流氓恶势力，大多数是黑帮，具有黑社会组织的雏形，组织发展得还不够成熟，所以中国警方称之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中国“黑”得不轻

《中国新闻周刊》：那您认为，中国目前有无黑社会？

蔡少卿：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定论。我认为有。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中国警方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直呼“黑社会”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中国黑社会黑到什么程度？

* 章敬平采访整理，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0（20）。



蔡少卿：这难以像数理统计那样明确地量化出来。但直观地看，“黑”得不轻。目前中国黑社会犯罪比较猖獗，已经到了不打不足以维持稳定的程度。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在城市，沈阳、广州、上海、天津等黑社会势力更加猖獗。在农村，许多地区出现带有封建帮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如四川的安岳县就有 50 个，湖南益阳地区有 250 个 3 120 人，河南商丘地区 121 个 2 142 人。虽然经过几次严厉打击，但仍然在不断出现，并有上升趋势。

我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 100 万人左右。

黑道新动向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黑社会犯罪活动有哪些新的趋向？

蔡少卿：我想，多数是老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呈趋势发展的犯罪活动集中在 3 个方面：

贩毒越来越猖獗。80 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原先的古丝绸之路，目前已是“贩毒之路”。

盗窃文物越来越多。这几年三峡工程开工，具有 3000 多年历史的三峡成了黑社会盗卖文物的热点。德国媒体披露说：“现在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也大量涌进。”

拐卖人口愈演愈烈。黑社会组织已经由拐卖妇女儿童发展为专门组织偷渡，向海外非法移民而牟取暴利的犯罪组织：蛇会。这种黑社会集团由境内外不法分子组成。盘踞在美国纽约的华裔“福青帮”是最大的境外黑帮组织，每年有 10 万左右的福建人被他们安排到美国。

《中国新闻周刊》：与境外、国外黑社会组织比较，中国大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存在哪些特点？

蔡少卿：中国大陆黑社会组织，大多属于初生的暴力型犯罪集团，活动带有社区性的特点。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大陆地区还没有出现像欧美的黑手党、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活动多年、规模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也没有像旧上海的青红帮，拥有10多万成员，势力渗透到各地各部门的组织。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黑社会大的拥有数百人，小的只有几人。他们大多在所生活的社区，或者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活动。

但我注意到今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苗头：几个团伙跨地区多帮派联合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据称，这种联合不仅局限在大陆，近年来中国大陆黑社会已开始内外勾结，根据您的研究，此说是否属实？

蔡少卿：完全属实。主要是港澳台地区黑社会势力的渗透和影响所致。香港的“14K”有10万人的规模。澳门的“和东安”有2万人。台湾的“竹联帮”和“四海帮”都有10万人。近年来，他们利用旅游探亲、商贸合作、投资办厂等途径，进入大陆发展组织。最猖獗的是“四海帮”，6个骨干4个到了上海，计划将总部迁到上海滩。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和境外黑社会集团勾结的企图何在？

蔡少卿：主要是经济目的，牟取钱财。有些黑社会组织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还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例如，上海、湖南、广西等地的“中国黑手党”、“梅花帮”、“群龙帮”等黑帮组织。目的是：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制造影响国际的政治事件。

扫黑必须反腐

《中国新闻周刊》：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黑社会组织何以在灭绝几十年后再度猖獗起来？

蔡少卿：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转型中，一方面是生机和活力的迸发，另一方面又势必伴随着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之间的剧烈冲突，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中国封建帮会的影响和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也为中国黑社



会犯罪提供了样板。

影视作品中对黑社会的渲染，也有不恰当之处。我记得80年代末，《上海滩》把黑社会头子许文强塑造得像个英雄。今天的一些黑帮成员，曾经深受其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中国黑社会犯罪未来趋势怎样？

蔡少卿：如果打击不力，如果经济形势不能好转，黑社会犯罪将继续呈上升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警方扫黑力度不可谓不大，何以遏止不住黑社会犯罪？

蔡少卿：客观上看，流动人口的激增，是黑社会帮会团伙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几年，全国城乡流动人口5000万到8000万人，盲流入城市。5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10万，1988年209万，增加了20余倍。1998年近300万，增加近30倍。外来人员犯罪率占上海发案率的1/3。他们找不到工作，就结帮作案，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以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以抢劫为主的“东北帮”，以盗卖车船为主的“温州帮”应运而生。

失业下岗的城镇就业形式，也是黑社会犯罪组织形成的关键原因。

这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说，腐败官员、腐败干警，是扫黑的主要障碍。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扫黑的良策是什么？

蔡少卿：从技术层面看，“严打”不懈，加强《刑法》的力度，都很重要。但就当前的现实而言，扫黑必须和反腐败结合起来。目前的黑社会，非常注重和官方的关系。在中国的党政机关和司法系统，贿赂国家党政干部，培植黑帮势力，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已是公开的秘密。

真要“除恶务尽”，首先要除掉黑帮的“保护伞”。我们应该汲取俄罗斯的教训，他们和我们的情形非常相似：苏联解体前后，才出现黑社会组织。由于官方对“官匪勾结”打击不力，扫黑一直效果不佳，以至于今天的俄罗斯黑社会犯罪异常猖獗，难以根治。

附录三

天地会盟书誓词^{*}

后土尊神为证，香主等处备金银、香烛、清茶、荐盞（盒）、高钱等色，奉献祝告于等。今因广东省凤花亭、高溪庵、马溪庙明主传宗，今夜插（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今将同盟姓名开列于左（按：原件下面空缺）。本原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汝视同一家。今夜传教汝手路密约，上不传父母，如有漏泄根机，含血喷天，同（全）家灭亡。自今既盟之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泻于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枫（相）济，犯（患）〔难〕相扶。我等兄弟须当循规守法，不可借势冒为，恃强欺弱，横凶作歹，故违誓约。自作自当，不得累众人。若不忠义（按：下残）

^{*} 这是清政府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过程中，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二月十三日从起义军将领林水身上搜获的。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入《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第2660卷。

附录四

天地会首领卢盛海等结拜盟誓单^{*}

照抄《刘梅占红布》：自古称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溯其桃园结义以来，兄弟不啻同胞，患难相顾，疾病相扶，芳名耿耿，至今不弃。似等仰尊帝忠义，窃劳名聚会。天地神明五谷帝主韩朋、日朋〔月？〕星光财帛星君韩福、玉皇上帝司命五帝郑田、观音佛母五雷神将李昌国四位大将军，上天圣母二剑神将玄天上帝福德龙神关天成、李色弟、方大洪、张元通、林永招五房大哥，迦兰菩萨三十六名天罡将，五显大帝七十二名地煞星，岳王爷七盐米二将军，本坊福德土地万提喜大哥，后五房大哥，暨历代大哥，传铁鼻大哥，传黄清大哥，传卢盛海，传曾昌汉大哥，传邱琮沅大哥，传周达滨大哥，传兄弟刘梅占。何周德即夜在于△处招集聚会，众姓兄弟花名于左。今据滨等非敢以邪愿为心，忘〔妄〕生异志，愿同心同力，凡持身处世，不敢有负神恩，忘背恩义。自盟之后，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吉凶则彼此相应，贵贱则甘苦同情，是非则神灵默佑，愈久愈昌，不敢口吐诗句，自言不敢以大压小，以强欺弱，不敢谋骗兄弟财产、奸淫义嫂，不敢临身退缩，借公挟私。不照状书施行，诸神共诛。如依此盟，天神共降，富贵绵绵，福寿禄全，子孙昌盛，奕世书香，伏望神祇鉴察。顺天 年 月 日。

^{*} 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件未注明地点和时间，呈报文件的时间是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录五

颜亚贵所藏《桃园歌》*

天地否，奉六合，复明去清。伏以天地开张，万事吉昌。是夜本月在于处村社下居住香主弟子，携带众信弟子天地结拜。请到明朝先锋，请到刘、关、张三位在桃园结义。和合而顺天，结为忠义，永无更改，齐心协力，夺回真主江山。今有本处来宾县南里村众信弟子，诚心办齐五色果酒，三牲礼物，在于灵神案下焚香祷告。敬请皇天后土，山川社稷，过往天神，日月三光，风云雷雨，众位天神，值日功曹，敬请刘、关、张三位大将军，周仓、关平二位大将军，请到甘肃省太平府太平县瑞溪社如来佛祖，白面金身；又请鬼谷先生、千里眼、顺风耳；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长眉观世音，救苦救难、斩红观世音，变化无穷；请到桥头土地、福德正神；请到广东惠州府石城县丁山脚下上房始祖洪启胜，长房蔡德忠，二房祖方大洪，三房祖吴天成，四房祖吴德帝，五房祖李色开；请到本处山神土地，地脉龙神，外至兄弟万万千千百百，十三省俱是一体。当天结拜，即是同胞骨肉，永无更改，一父所生，一母所养。父不得传子，子不得传父，兄不传弟，弟不传兄，夫妻面前不可说，不可路（露）出根机。如有路（露）出根机者，刀下死，剑下亡，死男绝女永不昌，或雷打火烧七孔流血。不得自心肥己，不得吞骗兄弟，不过注赌。兄弟父母，即是自己父母；兄弟妻子，如我嫂子相称。结拜之后，须要寄得妻、托得子，且不分你我，手捉（足）相持（待），前时仇不得记会在心。兄弟有难，须要拔刀相救，不得临阵退缩。不可得罪兄弟父母，若有得罪兄弟父母者，重责四十板。不得以大押（压）小，不得以力为强。神灵鉴察，兄弟须要忠心义气，有福同享，有官同做，子孙世享荣华，福有攸归。

* 这是清政府从广西来宾县天地会分子颜亚贵家搜获的，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据颜亚贵供，《桃园歌》系广东南海人颜超传授。呈报文件的时间是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录六

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所藏会簿^{*}

起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只可自己看，不可外传人。别人看里，误了自己终身。



青气为天，
黑气为地，
山乃为合（会）。
青为天号。
青黑山 黑为地号。
山为会号。

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造反被夺江山后，走出西宫娘娘李神妃，起至伏华山，怀胎后走至云南高溪庙，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开封府天水冲出有刘伯温碑记。

康熙年间，有西鲁番作乱。康熙主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甘肃省有一位（座）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印是铁铸的，重二斤十三两。印写国山二字为记。少林寺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少林寺人等打得胜鼓回朝。康熙主赏，寺内不受官职，仍归少林寺诵经、说法、修道。后来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一十八人，走越四年，走至海石连天，长沙汉口。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清”四字。众人就取一百（白）锭香炉，当天盟誓。正（止）剩师徒六人，师尊万提起，法号土曰云龙，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

^{*} 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系清政府从广西东兰州天地会分子姚大羔家搜获，由广西巡抚成林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咨送军机处。



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聚集，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插（歃）血拜盟，结为洪家。众兄弟拜万师传（傅）为大哥。至九月初九日，云龙择日与清兵交战。云龙阵上死去，少（小）军报知五位兄弟，保驾小主。兄弟得知，即日出军，与清对垒交战。清兵败走，后来兄弟将万大哥尸首收回，向东烧化。万大哥云（魂）上九霄而去，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向。五位兄弟回来，不见小主，不知下落，身无依靠。

诗曰：门上洪英无人知，不知去向问兄弟。

万大哥死后，有一位胎侄，是圣僧，一名道芳勿此，现守广东。一名道芳流，现守湖广。小主后来流落福建，后来生伍子，即日分为五大房，立为五标头：

洪 汨 淇 洌 漆
 洪 淇 滢 添 江
 德 汝 汇 汎 漆
 鸿 洪 沛 泊 绿
 吴 洪 李 桃 林

芳勿此现手（守）广东。崇祯君有一位西宫娘娘，怀胎逃走，名为李神妃。藏在伏华山，生下男儿，蒙万祖恩养，又蒙上天庇佑相继，后生一子，甚是精神。英雄豪杰之才，亦来会盟。众兄弟拱扶此子。

长房吴天成，在浙江，旗号鸿江；二房洪大岁，在福建，旗号洪洪；三房李色地，在广东，旗号沛汨；四房桃必达，在云南、四川，旗号泊淇；五房林永招，在湖广，旗号绿漆。此十八人众兄弟在红花内，乃是赵文良为长，吴成贵在山东为大（太）守，名为五虎大将。

彪 彪 彪 彪 彪 五房合同

五祖联

天下知世清该绝，万里合同明在兴。

真主联

日光月明天主现，君王房在四川边。

项羽拥衾，千载说仁义之风。

关公秉烛，万古表精忠之名。

观音对

摇摇头〔摆〕影无宗（踪），万物争观日已红。

关圣对

英雄豪杰定乾坤，万里江山共一轮。
争天夺国一点红，路（露）出根机剑下亡。

伯公对

门朝大海三河合，地振高岗一派香。

高溪庙神

结门望见先君面，入室由知古佛身。

头门对

黄河自有绝清日，复明岂无得运时。

二门对

地振高岗千古在，三合河水万年流。

水先成

长房吴天成，是九月初九日水东先诗曰：

春枝吉叶红花秀，夏日晚来水又流。

万年洪〔□〕流四海，万姓公门入明台。

二房洪大岁，七月廿五〔日〕水东先诗曰：

吉水洪流盈四海，万姓与来落九州。

一别淙公达三河，入室有知万世裘。

三房李色地，八月十五日水东先诗曰：

望游洪门流四海，打开洪门等君来。

接入明王登保（宝）殿，三河结拜等祖来。

四房桃必达，五月十二日水东先诗曰：

三河一别各西东，明王登殿转朝东。

上有君臣结紫殿，出手开声不离洪。

五房林永招，六月十二日水东先诗曰：

结起先君望月时，结门万开旗千里。

开旗自招我兄弟，心中带洪人不知。





一七诗

高落我情本姓洪，招集兄弟义和同。

三八廿一诗

三月桃花正开时，八仙过海定日期。
廿日出军与清战，一字古今人便知。

长林诗

九五团圆招满天，三江四海八洞仙。

五标诗

安乐如神仙，礼义如配天。
仁和天赐福，德泰子孙贤。

观音诗

五龙结万心田坚，饮水知源义为天。
顺天行道神共鉴，结（洁）白其身公主现。

反诗

不是外泄事根机，若是无义剑下亡。
刘师料算天下知，洪公招集保明王。

白殿一诗

白定一身为根机，公得天下无人知。
此事传来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誓状诗

有忠有义公侯位，反心反意雷打亡。
立字世上有忠奸，奸者来于剑下亡。
当天誓愿（愿）〔共〕姓洪，剑下来里别半途。
古今传来天下知，各各离别桃洞山。

十底诗

一枝白扇数万年，二九和同自天缘（缘）。



三八廿一洪在前，四七得合谋事言。
五虎大将赵其贤，六字玉结地有缘。
七子团圆李桃田，八仙过海果老贤。
九底为尊百万年，十分忠义江山平。

一九底

结万和同清日连，心家和兴洪顺天。

二九底

结万和同李桃洪，顺天洪水横流汎（泛）溢于天下。

三六底

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兴明合和同。
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心讨江山。

四七底

日月春风百（白）马侯，三姓结万李桃洪。
盟心结骨为兄弟，万姓与来共一宗。

二五底

九千十百是万山，山山兄弟似黄班。
顺天行道是旗号，连烧三炮打江山。

问天兴地旺月阴日阳诗

月中丹桂一枝香，日底金鸡照明君。
今看众星朝北斗，后来变化开万兵。

有人问本，答曰：风云神就是人，此乃高溪约五本字。五本怎么？答曰：天、地、人、神、祖就是五本。

天本

天本团圆，人在其中。
三才并立，万里俱同。

地本

地本威风，万水朝东。



身头露脚，一心尽忠。

人本

人本风龙神，义马带招人。
谁人识得我，变出白衣身。

神本

本是义龙神，魏马带我身。
谁人识得我，显出白衣身。

身本

身本义明臣，义马带我身。
个个无粮兵，等他一个人。

祖本

祖本大明臣，遇此傍边人。
谁人知得我，招集天下人。

洪本

洪本团圆，地本威风。
三才品立，万里皆同。

口本诗曰：口本夫妻以不同，梧桐叶落再相逢。若有兄弟问本，答曰：本是有四本，自身一本是五本，洪本凑成七本。同兄弟答礼，用出祖本、洪本。

靛

山坐山乃此三字乃是总字。
青气乃分明 | 月变清，

黓

满山树木朱中兴，廿八出横字。
黑道通气人君在 | 此黑 | 五泊。
日月合成共太极 | 字泳

靛

五色旗号五个片字，斗
成五个字出哑字。



吉凶书信字号图记：其吉凶紧慢，即是分辨一个洪字。其吉事书信，用洪写三点。若小凶事书信，用〔洪〕写一点，即写两劈（撇）。若大凶事书信用洪，其点写三劈是也。



盘问兄弟说话

问：兄弟，你高姓？答曰：是△姓。怕尔不是？答曰：本是△姓。又问：怕尔有义姓。答曰：义姓是姓洪。又问：尔然何一人两姓？答曰：父母生我命头金，贵拜天地安名契在洪家。吟诗数句：本是洪门姓，谁母带香人，若然尔不信，显出白衣身。个个无粮兵，总定我一人。三才品立，一心尽忠，转手朝东，义气忠心。问：兄弟尔曾读书么（没）有？答曰：颇读。尔所读是何书？答曰：是读耳清目顺之书。尔读有己（几）本？答曰：读有五本。尔读了己（几）年？答曰：七岁读至九岁。又问：尔好才学？答曰：三才品立。又说尔〔好〕礼义？答曰：礼义如配天。尔好安乐？答曰：安乐如神仙。尔好仁和？答曰：仁和天赐福。

盘问兄弟

问：兄弟，尔今早在那里来？答曰：是东边来。尔早晨就来？答曰：日出红就来。又问：尔不是东边来？即吟诗二句：金鸡飞出湖霜角，透出明珠万里洪。又问：兄弟，尔舡来路来？答曰：打路来。又问：有舡然何不搭舡来？答曰：有舡无桨。问：尔舡来有己（几）多滩？答曰：大水茫茫不见滩。问：尔路来有己（几）多湾？答曰：本是三湾。又问：尔不止三湾？答曰：大湾七十二，小湾三十六。问：尔兄弟路来，有一位女人骑马，尔逢得么（没）有？答曰：有公主骑马路上过。又问：有一位白须老子，尔逢得么（没）有？答曰：有。是芳大洪，去三河聚集。又问：还有甚么东西？答曰：有两板桥。不止两板？答曰：本是有三板，失落一板在水。如今那一板桥往那里去了？答曰：洪武主大战泡洋湖（鄱阳湖）捞去架江东桥去了。又问：桥是何人所造？答曰：是朱洪、朱夸二人所造。又问：兄弟尔桥上过桥下过？答曰：桥下过。然何桥上又不过？答曰：有三人把守。是何人把守？答曰：桥头有关圣帝君，桥中有观音娘娘，桥尾有土地伯公。又问：桥下有簾，尔那样得过？答曰：脚穿铁板鞋。又问：桥下水深，尔那里得过？答曰：左手拿三个石头，三八廿一，凑成八字脚，跳过来。尔在桥下过水，尔食里水么（没）有？答曰：食里。尔食了己（几）棒？答曰：食了三棒。尔过桥头有人卖东西么（没）有？答曰：有人在土地伯公卖果子。尔看他卖几多钱？答曰：卖廿一钱一斤。尔买来食么（没）有？答曰：买来食里。尔开钱么（没）有？答曰：么（没）有。尔食人果子，然何不拿钱？答曰：万兄帮我开钱，由我过路。又问：尔看桥上有甚么为记？答曰：有三条对子为记。尔看三条甚么对？答曰：争天夺国一点洪，露出根机剑下忘（亡），摇摇摆摆影无宗（踪），万物清官一里洪。门朝大海三河合，地振高岗一派香。又问：尔过里乔（桥）还有甚么？答曰：有一座木杨城。尔进去不曾？答曰：进去。尔进去见有甚么为记？答曰：有三个字。三个甚么字？答曰：是骛、岿为记。明王紫金城，尔进去不曾？答曰：不曾。有城然何不进？答曰：城门有四人把手（守）。是何人把手（守）？答曰：韩朋、韩福、郑田、李昌国四大将把手（守）。当门大对是甚么？答曰：顺天行道、川大车日。尔看木杨城内甚么为记？答曰：五色旗号、五道长钱、双飞宝剑、剪刀秤尺、红绒丝线、卅六面铜牌、左边桃、





右边李、枯木两边、白扇一把。尔看木杨城甚么为大？洪火为大，金花为令，号子为光，明登（灯）为主。尔过了城看见有甚么人？答曰：有五人去做风水。尔可登穴看过么（没）有？答曰：登穴看过。尔看取龙好，取沙好，取穴好，取水好？答曰：龙沙穴我不取，单取水好。水何为算好？答曰：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又问：兄弟墓在那（哪）里？答曰：葬在福建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午向，坟堂八角。尔看碑石有己（几）高大？答曰：高有三尺六寸，阔有一尺二寸。兄弟有甚么为记？答曰：有十六字为记。问：十六字甚么字？答曰：

洧 澱 漲 淋 滂
汰 淙 沁 濞 洵 滂 四十八点为记
滾 山 涕 澧 滋

问：舡上兄弟是么舡？答曰：是洪木舡。五色底载甚么货？答曰：小仓有廿一，大仓有五仓。头仓装有苏木，二仓装有西瓜，三仓装有洪巾，四仓装有桃李，五仓装有石头。三河载有己（几）多人？答曰：载有三八廿一人。来舡用篙来用桨来？答曰：右（又）用篙右（又）用桨。问：是何人？答曰：是韩朋、韩福、郑田、李昌国。把杆人是何人所置？答曰：结兄所置。里篙何人所置？答曰：万兄所置。舡缆有己（几）长？答曰：有三丈六尺在水，有七十二在上。扯缆何人？答曰：是马朝志。尔缆出在何方？答曰：出在泡洋湖（鄱阳湖）。又问：泡洋湖（鄱阳湖）何得有缆？答曰：是明朝洪武主采石矶失落在水，捞使所用。兄弟尔舡头起来？答曰：舡头有三个石头起不得。尔舡在那（哪）里来？答曰：是长沙汉口起程。尔的舡何能这样快？答曰：子午时起程，丑时就到广东十三行。这样好风？答曰：佛祖皇天助我一阵风。尔的货是何人？答曰：是义兄合店，弟〔第〕三间洪盛店。买卖有己（几）多银？答曰：一百零八两。

路上盘问

遇路上有人画一个圈仔在路上，圈内放有草一根，即将他一根草折断三节，三节又断九节，排成一个洪字，踏在圈内过。他说：尔然何踏破我的圈仔？答曰：我本是圈内人，就要圈内过。不然将诗二句念出：天本在其中，出头心尽忠。又有人在路上画一个圈仔，有一条毛巾，或横或直。若放直者，将他手巾扯断两节，放在圈内。若放横者，亦将他手巾扯断三节，放在圈内，俱要圈内过。他



〔说〕：尔何必踏破我的圈仔？答曰：不是恶蛇不兰（拦）路。又有人路上画一个圈仔，放一张刀在内，说亦要踏在他圈内过。可说单刀我不怕，双刀我就行。他就丢放两张刀来。答曰：斩尽天邪尽服明。

盘问袍袱

兄弟尔袍（包）袱有甚么？答曰：有钹印洪巾桃李。钹印有己（几）多？答曰：洪巾三条。桃李有己（几）多？答曰：桃有三十六，李有七十二，共成一百零八。兄弟尔袍（包）袱我要。答曰：兄弟慢慢，万兄与我的。尔怕刀不怕？答曰：三河聚集，两张刀不怕。尔袍（包）袱有己（几）重？答曰：重在一千斤，轻则三两，实在二斤十三两。尔袍（包）袱实在有甚么？答曰：有银。银有己（几）多？答曰：光板有卅（三）十六，花银有七十二，共成一百零八。尔自己行路不怕老虎？答曰：三人行路何怕老虎。为何而自己？答曰：万兄在先，结兄在后，洪兄去路。去有己（几）远？答曰：远，远在天边；近，近在眼前。打断尔脚骨？答曰：左脚铜，右脚铁，任打不断。问白袍（包）袱说：青天白日然何白蛇拦路？答曰：黄昏时候白鹤单飞。问蓝袍（包）袱：青天白日然何乌狗出洞？答曰：黄昏时候猛虎下山。问花袍（包）袱：青天白日然何山鹿出洞？答曰：黄昏时候豺狼过岗。鹧鸪好肥？答曰：山鸡腴。拿油煎软来食。答曰：身上有三条铁骨，怕尔食不得。我铜喉咙，铁牙齿，连皮带骨食下去。答曰：铁圈不食铁骨。有人问：尔头上有水？答曰：脚下有火。问：尔头发湿？答曰：出世出得迟。问：尔耳还长？答曰：两耳垂根。问：尔口还大？答曰：口食四方财。问：尔鼻水出来？答曰：双龙吐珠。问：尔鼻还高？答曰：一笔通天堂。问：尔头还大？答曰：头戴洪王天冠。问：尔头发绉。答曰：火烧少林寺，救火被火烧。问：尔头发长？答曰：避水盖。问：尔面昂？答曰：五岳朝天。问：尔眼有大小？答曰：如同日月。问：尔眉毛一片多？答曰：左有三十六，右有七十二。问：尔手长？答曰：双手过膝。问：尔面红？答曰：是本色。又问：红又带青？答曰：西瓜形，皮青肚里红。问：尔手上白的是么？答曰：手带素明珠。问：然何一边多？答曰：左卅（三）十六，右有七十二。问：尔头鞭（辮）乱？答曰：是桃子树下出世。问：己（几）时出世？答曰：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问：尔脚然何一边长短？答曰：三八廿一不不（衍字）



成人。问：尔脚下红的是甚么东西？答曰：脚踏东莲花。问：花己（几）朵？答曰：本是九朵。结有己（几）蕊？答曰：结有三八廿一蕊。问：尔衫己（几）多皮？答曰：五皮。齐问：何人所裁？答曰：洪兄〔裁〕结兄缝。问：衫有己（几）长？答曰：三尺六寸。问：缝了己（几）条线？答曰：一条线。问：尔这样大衣何能一条线缝得起？答曰：长沙线任尔做不尽。问：布出在那（哪）里？答曰：出在丁山脚万字庵下。布在那（哪）里买来？答曰：在广东十三行义合店第三间洪盛店买来。问：有己（几）多钱？答曰：是廿一钱。问：衫尾坐有鸡屎？答曰：是槟榔水。问：衫火烧一个眼？答曰：不止，有三个。问：尔衫有油？答曰：来明去清，游行天下。问：尔衫袖然何有大小？答曰：左边穿袍，右边穿钾（甲）。尔穿甲去那（哪）里？答曰：将去与清兵交战。问：因何事情？答曰：因为江山之事。问：尔胜败如何？答曰：头三阵清兵败走，后三阵失落小主，特来访主到兄家。问：尔鞋破了？答曰：有里在。尔鞋有己（几）多块皮毯？答曰：皮三块，毯有十八重。问：尔的裤脚然何一片干一片湿？答曰：那一片有三个石头，帖起跳过来。问：尔手指一片多一只？答曰：先招一百零七人，后添小主一百零八。问问（衍字）：尔手少一只手指？答曰：失落小主。问：尔带有长衫汗褂来么（没）有？答曰：有。问：长衫褂子么（没）有带来，手本带来？答曰：带有。问：兄弟，手本借看一看。我即将自己手掌出他看。他拿手掌写一洪字，他将手交回说道：乾坤交转洪家手。倘他看了不将手掌合好送回，即将自己手掌打他一巴掌，只说有借无还。问：兄弟，今晚天实在清？答曰：天下月明一般同。问：今晚月亮为何一片？答曰：复明自有团圆时。

盘问房屋

兄弟，尔屋是何做的？答曰：斗世世（衍字）师傅做的。问：尔己（几）多堂下？答曰：上堂三间，下堂两间，共五间。问：尔横屋己（几）多？答曰：一片九间，一片十间。尔多少天井？答曰：九厅十八井。问：别人屋左右一样，然何尔一边多少？答曰：那一间是公主绣房。问：尔门楼有己（几）高阔？答曰：高是八尺，阔是七尺二寸。问：尔门板是何人做？答曰：是三江口看洪水流的。问：三江口何得有门板？答曰：是明朝陈玉龙之女放下之宝扇，流出高溪庙做门的，我收转家中来用。有甚么中用？答曰：左边关门金鸡叫，右边关门凤凰啼。尔门头滄多？答曰：门朝大海。尔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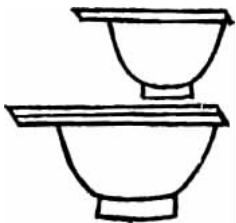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史研究

有个敦？答曰：地振高岗。尔门口有两条甚么树？答曰：左边桃右边李，桃李开花复明时。

盘问烟铜

或黄或赤白乌？答曰：本色。问：多少节？答曰：三八廿一节。问：头尾有甚么？答曰：头尾忠义，中间有一个万字。尔烟铜出在何方？答曰：出在苦竹家，姓许名列柴。问：烟铜有己（几）莛？答曰：本是五莛。问：尔第己（几）条？答曰：第三条。尔有己（几）多人食烟，然何斩不完？答曰：紧斩紧盛。尔在那（哪）里买来？答曰：广东十三行义合店第三间洪盛店买来。尔己（几）多钱买？答曰：三八廿一钱买。尔有己（几）重？答曰：本是二斤十三两。尔烟铜何能这样重？答曰：有油。尔油有何用？答曰：游行天下。

兄弟拿烟铜来，弄将烟铜嘴放在平手掌中，名叫五虎大将。他说：兄弟食烟？答曰：五子俱全。然何枪刀不发？望五虎大将显起龙头。他将烟铜抛起己（几）寸长？答曰：天高地矮，无路藏身。他右（又）将烟铜插在地下。答曰：千斤秤，万里洪，众兄弟扶明王。他又将烟铜放在地下。答曰：放下就扶起，亦将双手扶起，刘玄德三位兄弟，关羽在在（衍字）前，拿来可食。扛烟铜来食，将烟铜头扛来。扛烟铜者，将三指一当即说：去清复明方可食。扛烟铜嘴向来名叫炮子烟，即将五指山一当，吟诗四句：忠臣不怕烂杆镜，五指山上逞英雄，炮子那来打州府，忠义兄弟变成洪。问：兄弟那边山火烟然何这样大？答曰：火烧少林寺。问己（几）时烧？答曰：是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烧。问：高溪庙有己（几）座？答曰：本是有三座，被天火烧来一座，今还剩两座。问：高溪庙头门甚么对？答曰：黄河自有绝清日，复明自有得运时。



要拿上面根，即此不是根，乃是唐朝尉（尉）迟公之鞭。将一根拿在手中，又有一空杯，即池塘无水岸上飞。他将酒斟起来，接杯者即说：单鞭救主登基。就酒杯下了，仍根二条。即说不是根，乃是秦叔保金铜，三鞭换两铜，就将二根下了，连三根拿在手中。仍有碗菜在上盖好，即将三根在盘中打一团圆转，即说五虎大将寻真主，打破万里长城。他众人拿根指盘中。他说木杨城内救主，拿三根者答曰：此不是根，乃是恒（常）山赵子龙，百万军

中救阿斗。一个番花枪，他要开碗去，又不开碗，将碗挑在地下打破亦可。

喝城诗

木杨城内米满仓，宝剑双飞内中藏。
双凤朝阳兄弟到，金鸡望龙立刚（纲）常。

五色旗

五色旗号分五省，省省兄弟结拜盟。
若是明王登宝殿，一统江山就团圆。

长钱

五套长钱廿（二）十一，留下桥头买果食。
木杨城内相聚会，万姓与来共一宗。

剪刀

云露濛濛不相同，金刀剪开万里洪。
剪开云雾观日月，青天早早降真龙。

秤诗

结兄把秤三尺长，秤过粮米廿三两。
木杨城内招兄弟，万姓进朝保明王。

尺诗

天有几阔？地有己（几）长？鲁班玉尺好度量。
量开天地分无少，一统江山万古传。

镜诗

女娲炼石补青天，留存宝镜照人容。
明如金清与同结，大破火轮万万年。

桃诗

三月桃花一点红，三河聚集转朝东。
真心结骨为兄弟，三拜宗公转姓洪。





枯木

枯木逢春正生牙（芽），八仙过海插金花。
公主奇（骑）马路上过，松柏林中是我家。

线诗

一条系（丝）线东边起，留下兄弟做明衣。
红线传来众兄弟，复明自有团圆时。

剑诗

双飞宝剑挂城呈，斩尽天（妖）邪尽服明。
兄弟若有结果日，一统江山尽大（太）平。

扇诗

一枝白扇数万年，二九和同照满天。
谁人识得我枝扇，兄弟与来拜东天。

蜈公旗

洪水滔滔好汉尽招。
水面天子来扶明朝。

洪门

远望洪门八字开，中心结起紫云台。
同心结骨为兄弟，万姓归洪剑下来。

茶诗

一点为尊本是洪，四方八达认为宗。
忠心义气食天禄，三呼万岁谢明王。

酒诗

一点本色在酒盅，结拜兄弟饮四盅。
同心协力公侯位，奸巧饶心天不容。

槟榔

海南本是我祖宗，五湖四海任走通。

谁人失（识）得我本色，青白入门便是洪。

食酒

兄弟有酒不成宴，万公四海一枝扇。
日下招林天下晓，江色喜□真主现。

忠臣

木杨城内米满仓，宝剑双飞米内藏。
有忠有义刀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

奸臣

不分南北与东西，万物清观一里洪。
表出真心同日月，何愁世上不相逢。

相打

远望花枝一点洪，因尔本色问春风。
但看日月天重改，讲得真情必合同。

本色

远望中心第一红，因尔本色问春风。
金炉结义从天愿，眼看真情合一宗。

借钱

言问君王出尧台，身出他乡不得回。
寸步难行千里月，谢恩出朝饮三杯。

无钱

韩朋一家在山东，韩福一家靠何人？
郑田不能相救济，昌国在家泪汪汪。

写信

特字托难慢慢游，正在相逢七月秋。
何等此日为不去，有时相遇便相求。
山遥水远共洪天，笔砚相同总一言。





回信

有日人来书信到，开书有事对兄言。
万姓聚集三河上，万兄带兵顿长江。
赵云良封为虎将，未曾带兵保明王。

有难

兄弟有难要帮手，莫作闲人街上游。
起手不离三品指，如同骨肉便相求。

年庚

兄弟出世在何辰，本岁年庚是甲寅。
月是孟秋女廿五，时逢丑未添庚寅。

洗面

清水一盆照明间，弟兄扛来不可嫌。
当天立誓不可奸，无忠无义不见面，
有忠有义在眼前。

五祖诗

五祖分别一首诗，路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来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分江

结拜为盟共祖宗，海水相连国分东。
忠心义气公侯位，万古流传义气忠。

五祖

开国起义一枝香，五祖分开世世传。
有忠有义公侯位，泄漏天机剑下亡。

五祖灯

一盏明灯在佛前，五祖开旗拜祖先。
祖灯点来不可食，留转（传）高溪奉祖先。



水火

天上有水水为先，地下有火火相连。
插（歃）血为盟天地众，时辰变化万万年。

令诗

令旗发出去打清，宗公招集天下知。
招集万家洪兄弟，协力同心就伐清。

降诗

明王留下忠臣鞭，单打洪家一姓人。
此令不从临阵速（缩），重打万降不容情。

江山

万姓与来共一宗，挟明真主登金殿。
转取江山连天国，出白其身复转明。

五湖四海

不分南北与东西，三河结拜转朝东。
五湖四海皆兄弟，何愁世上不相逢。

五标

五人同行父母生，五祖招集各兴兵。
明臣义气食天禄，三呼万岁谢皇恩。

和同

四杯美酒共三宗，八字乔（桥）下不相逢。
三河拜祖分别去，后来相认合和同。

借屋

日光月明一片光，七星八算九分明。
洪字写来无加减，是我兄弟不绝情。

总诗

起手行藏皆有号，未知变化合和同。

千里和同来见洪，百般兄弟共一宗。

平诗

天地平如海，洪门等日开。
家庙朝天子，官从五门来。

大乱门对

黩黩氤氲氤氲，
霏霏霖霖霖霖霏霏。

大乱灯隆字

委委委委
暄暄律律

高溪庙佛祖，头戴万登笠，身穿青蓝衣，脚穿铁草鞋，手拿素明珠。观音娘系高一尺二寸，头戴大平帽，身穿白衣袍，脚穿铁板鞋，手拿素明珠一百零八个。

连环诗乃是小主题的

尽忠失落远游山，寻我不见心耐繁（烦）。
门上现起洪英字，当天结拜打江山。
难主难寻无所靠，无人所靠把江山。
乾坤一统归何处，万水朝东各向流。
当天结盟忠臣剑，自愿忠心入洪兰。
今看众星朝北斗，去清复明总无奸。
白石香炉身显起，插落金香万开基。
五祖天庭监结盟，一统真心起洪旗。

翳鼓诗

传流道情一样同，店东、店东，万水朝东。好店东，身居他乡未得从。哑字出来也难分，三共宗公游四海。难了难来路逢穷。是我兄弟听吾语，说出谢恩饮三盅。尔也洪来我也洪，三井八堂合一宗。天子同过三关上，明王登殿接转宫。五人同父共一母，今年李白桃正红。花开结子遭夜雨，一十八岁转朝东。我是日月二十一，兄弟相认合和同。二人土上隔壁喊，立字左边人来逢。忠心义气李昌国，当年苦楚是韩朋。

郑田不能相救弟，韩福哭汨泪向东。三皇五帝下阳州，韩信功劳不到头。
是非只因多开口，凡是皆因强出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我在城里当快手，片片左右两边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门外川大车日，门内洪英。

过渡

行舡过渡三河水，莫挂心头色莫抛。



此为领教茶，
敢教兄弟可食。



此为忠心，吟诗二句可食。
五虎大将平天下，
一点忠心保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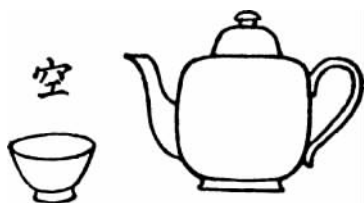


此为五祖茶，不为可食，
吟诗四句，可接转桌上放。
一杯香茶本为先，二世明
王拜祖先，兄弟扛来把手
接，扛转高溪奉祖先。



此为香炉茶，此不是茶盅，
乃是长沙汉口白石香炉。本
是有五十二斤，炉底下有兴
明绝清，中心有介（个）洪
字。他扛茶来说：天本团
圆。去接茶说：地本威风。





此茶壶放有（在）桌上不斟茶。吟诗四句：一点本心为兄弟，谁知出手空心意。烧心虚言天责罚，后来相结尽忠义。



此扇子盖茶，来接者吟诗二句：青云载一仙，兄弟万万年。



五虎大将平天下，
一点忠心保国家。



只见手来不见火，
后来兄弟有结果。



此手咱（攥）烟在内，要食者说：开东西南北门，开中门，大开。他自然打开，可食。



此烟在手指尾上扛，爱食者吟诗四句：入门未见先君面，本是高溪佛祖烟。兄弟扛来把手接，留转高溪奉祖先。



此双龙吐珠烟，即说：双龙吐珠红岗上，亭处三河就团圆。



此指遮满天^{可食}
兄弟万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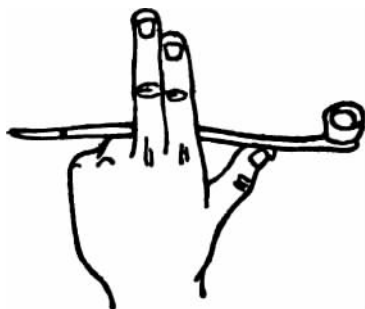


此茶图样：洪杯盖洪茶，洪兄传结兄，打开满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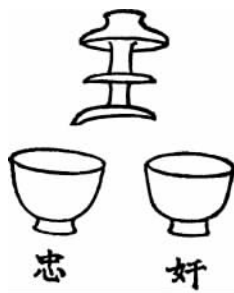




此为五祖灯，食烟者合手掌，遮灯者即说：望义兄借开一线之路。食烟者即说：难为父母修得好。遮丁（灯）手自然放开，可食。



只白一言，望兄弟开关。



此二杯是忠奸茶，左杯为忠，右杯为奸。奸不好来忠不忠，将奸杯放在马龙山。又将奸杯放转本位，忠杯可饮。



此三杯将中杯移上，吟诗二句：桃园结义三兄弟，刘备关张共条心。

有空有
○ ○ ○

此三杯茶中间杯可食。即说：黑龙过渡收了己（几）万人。将头尾两杯倒在中杯，可饮。

○
○ ○

此三杯茶将上杯移下平坐。将移杯先食，亦是桃园之茶。

○ ○
○ ○

此四杯茶可饮。有四句云：韩朋出阵在山东，韩福寻主各西东，郑国（田）带兵山西去，昌国泪亡哭向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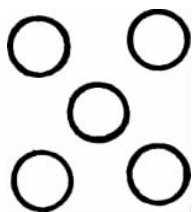
○
○ ○

此三杯乃是徐州失散之茶酒，要食者将三杯合之可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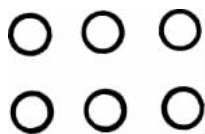
○ ○ ○
○ ○

此五杯乃是古城相会之茶酒，将下杯移开一杯，方位下二杯切不可饮，乃是大嫂之茶酒，上杯可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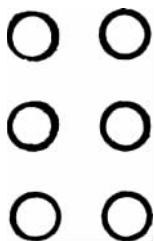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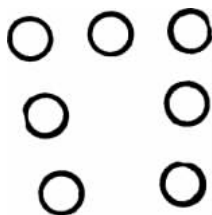
此五杯茶酒，中杯空的，要饮之时，将杯□倒在其中杯，可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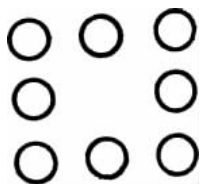
此六杯茶酒，将中二杯一杯移上，一杯移下，相成中可饮。



此六杯茶酒，将脚下两杯移发脚相成天字，可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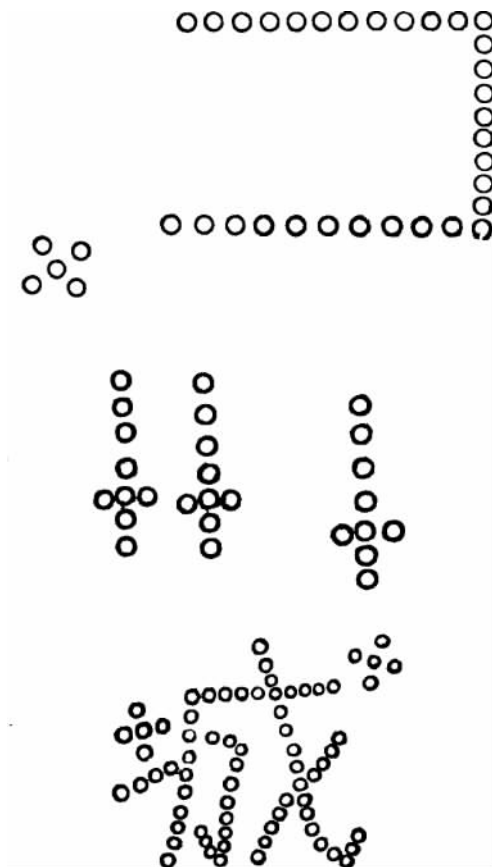


此七杯茶酒，吟诗二句可饮：天星朗朗，乾坤一统。



此为八仙之茶酒。木到春来尽生牙（芽），八仙美女插金花。公主奇（骑）马路上过，松柏林中是我家。

有人问你盘钱（缠）？答曰：七宝红钱游天下，八座金鸾是我家。九指含珠洪是宝，十分义气待功劳。



附录六 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所藏会簿

附录七

新刻江湖切要*

江湖切分类目录

卷上

天文第一 地理第二
时令第三 官职第四
亲戚第五 人物第六
店铺第七 工匠第八
经纪第九 医药第十
星卜十一 娼优十二
乞丐十三 盗贼十四
释道十五 身体十六
宫室十七 器用十八
文具十九

卷下

武备二十 乐律廿一
舟器廿二 章服廿三
饮饌廿四 珍宝廿五
数记廿六 草木廿七
五谷廿八 百果廿九

鸟兽三十 虫鱼卅一
疾病卅二 死生卅三
人事卅四

天文类

天：乾公（广）、一大、轻清、无外、云表、兼容、并包、司覆公、高明君。

日：太阳（广）、暘鸟、常圆、长明、恒满、出扶桑、西坠。

月：太阳（广）、阴宗、东升、兔窟、蟾、冰轮、离毕、秋倍明。

星：光芒（广）、点辰、列棋、好风、好雨、拱牝、在东。

风：丢子（广）、入微、透骨、和熏、骤吼、狂呼、疑虎、从虎、狂且、偃草、吹枯生、扫云、折朽子。又，广起风为摆丢。

云：天表（广）、想裳、懋

* 此书系光绪十年（1884年）刊本，全书34卷，由八闽卓子亭收录了当时流传于南方秘密会党的江湖切口行话，经过校订出版。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学者引用过这本材料。原书有序言和附录，因二者没有实际价值，此处省略。正文中标明“广”者，系出自《卓亭新语广类编》。



天、隔苍、蔽日、从龙、掩太阳、油然子、出岫君。

雷（补）：震公、布鼓、天鼓、闻变、落箸、天威、破不平。

雨：津（广）、沛生、子望、润公、湿杏、天线、灵零、甘露子、苦霪生。落雨为摆津（广）、洒润。

雾：迷津（广）、天隔面、杏花雨、如烟、疑霖、迷离。（广）起雾为披迷，又曰排烟帐。

露（补）：甘霖、秋白、未晞、为霜、湛斯、在丰。

霜：露销（广）、葛履、冰端。

雪：飞六（广）、出六、疑絮、天盐。雪珠为集先，落雪为摆飞，又为排六。

晴：爽气（广）、空青。

火：丙丁、少阳、焰老（广）、燎原、分炎。

地理类

地：坤老（广）、重浊、任重、配天、司载公、博厚君。

山：土高、地高（广）、触土、地出头、巫峰、老峙、登东、良公、如砺、禹随、一拳石。

河：长流（广）、清平、黄九。

江（补）：襟三、子长、藁水、无底公。

海（补）：纳细、阔老、圣出、扬波、无边子、鱼乐国。

城：太拔（广）、子金、列齿、筑土。

井：地窟（广）、水窖、中公、列九、凿饮。又曰区九。

桥：撑江（广）、水带、续断、接引生。

土：戊转（广）、万生、水壬癸、龙转（广）、东归、朝宗、石土骨、坚垒（广）、分磊、伏虎、踞豹、子践。

北京（补）：水都。

山西：金地（广）、夕阳。

山东：木地（广）、朝阳。

陕西：召分（广）。

云南：火七（广）、滇离。

四川（广）：达地。

贵州（补）：寸金地。

辽东（广）：阔海。

满洲（补）：盈地。

江南（补）：长火。

浙江：浙七（广）、之水。

江西：月七。

福建：闽七（广）、垂门，又曰乌都。

广东：粤木。

广西（补）：粤金。后附府分不全。

苏州：吴七。

杭州：天堂、上天。

湖州：兴地。

绍兴：越地。

宁波：近阔。

徽州：韦七。

东：仰孟。



西：上缺。
南：中虚。
北：斗满。
左：青。
右：白。
前：朱。
后：玄。
上：溜（广）、逆流、君达。
下：落（广）、顺流。
高：上天（广）、干霄、拂云、仰攀。
低：入地（广）、俯就。
近：明。
远：暗。
大路：洒苏（广）、爰遵、九达、周行。
小路：羊肠（广）、不由、径捷、微行。

时令类

春：木季天、甲通。
夏：火季天、丙通。
秋：金季天、庚通。
冬：水季天、壬通。
今年：本太岁、正太岁。
去年：旧太阳。
前年：前太岁、过令太阳。
朝晨：拔本。
晚上：兜昏、扯线。
半夜：太和（广）、孩交。
岁旦：聚众、元晨。
立春（补）：回阳、木头。

雨水：天泉。
惊蛰：发蒙、惊惯。
春分：解木。
清明：雨朝、良牧、会朝。
谷雨：济贫。
立夏：火头。
小满：中康。
芒种：勾甲、力田。
夏至：改火。
小暑：避雷。
大暑：乘阴。
立秋：迎金肃风节。
处暑：絺居。
白露：阳晞。
秋分：剖金。
寒露：蛰浆。
霜降：木落。
立冬：水头。
小雪：露白。
大雪：重裘。
冬至：水中。
小寒：挟纩。
大寒：拥炉。
后附一年定节：
元霄：初木。
端午：正中（广）、日中、将晨。
七夕：鹊中。
中秋：赏中（广）、分金。
重九：金末，又瓜期节谓二九也。
正：寅月。
二：卯月。
三：辰月。



四：巳月。

五：午月。

六：未月。

七：申月。

八：酉月。

九：戌月。

十：亥月。

十一：子月。

十二：丑月。

寅月等称太显，今改称太阴，如正月称寅太阴，余仿此。

一岁曰一尺，十岁曰丈，十几岁曰丈几尺，几十几岁曰几丈几尺。

官职类

皇帝：巍巍太岁（广）、则天、配天。

皇后（补）：巍才。

太子（补）：巍欠、将代巍。

附马（补）：攀龙驹。

宫女（补）：长门客。

太监：寸判通、念二、廿奄（广）、阴阳生、无聊。

阁老：天孤、孤一（广）、白头姑。

尚书：太水通（广）、典谟、叠负。

都察院：者孤。

督院：巡孤（广）、叔孤。

抚院：巡孤（广）、恤孤（古二）。

布政：左孤、阳孤、古三（广）、承宣孤。

按察：右孤、阴孤。

察院：代巍巍、古四、女孤。

军门：井头孤。

太守：井一孤、混一、寸一（广）、黄老。

同知：井二孤、混二、寸二（广）、雷鸣。

通判：井三孤、混三、寸三（广）、谏才。

推官：井四孤、混四、寸四（广）、通试。

经历：井五孤、混五（广）、熟地。

照磨：井六孤、混六（广）、夜捱。

知县：宇一。

县丞：宇二。

主簿：宇三。

典史：宇四。

巡检：古九。

教授（谕）：之孤。

训导：斋孤。

吏员：丙七。

书办：丙八。

状元：首唱、斗元（广）、福星、恩与。

榜眼（增）：无状、致曲。

探花：蜂蝶友、寻春使者。

传胪：献捷、折馘。

会元：会首（广）、天下才、甲乙君。

进士：斗士、奎牙、斗孤、



斗角、加孤（广）、散甲生。

解元：羊首。

举人：斗身。

贡生：器占。

纳贡：米器。

廩生：饩占、米通。

秀才：占通、乃通，买者曰扳占。

黜生：退占。

监生：皿占、皿入通。

富秀：火占。

贫秀：水占。

优秀：虎占。

劣秀：水七占，今改实占，谓不通也。

打落秀：狼占，今改狼占，又北占。

荤饭秀：食木占，今改油占。

纳粟秀：米占。

童生：子占。

香烟秀：习占，今改篆通。

篆，香烟也。

赞礼生：唱占，今改相通。相，赞礼者。

凡文官曰士孤。乡宦曰孤通。武官曰马孤。将官曰寒孤，今改戎孤。

指挥：金孤，今改臂使。

千户：逢孤。

百户：白孤。

武进士：寒孤，又寒士。

武举人：寒斗。

武秀才：寒通，又冷占。

上司：太识孤大夫。

官员：孤员。

异路：乙通（广）、径通。

亲戚类

父：日宫。

母：月宫。

祖父：重日、乾宫、东日。

祖母：坤宫、东月、重月，似母之母矣，今改老明。明者日之月。

伯父：左日、日上部、甲老。

伯母：左月、月上部（该称日上才）、甲才。

叔父：右日、日下部、椒老。

婶母：右月、月下部（称日下才）、椒才。

兄：上部。

嫂：上部才。

弟：下部。

弟妇：下部才。

夫：官星、官通、盖老。

妻：才老、乐老、底老。

妾：偏才。

通房：半才。

姊：上水、水上部、斗上。

妹：下水、水下部、斗下。

姊夫：斗上官。

妹丈：斗下官。又，姐妹通称比官。比，水方也。

子：欠官、金星。

女：斗欠、斗宫。

幼子曰尖欠，幼女曰笋牙。



姑母：父姐曰水日上，父妹曰水日下。

侄儿：至子、人至。

女婿曰斗官。

媳妇：欠才。

孙：子户，今改重欠。

未嫁女：半儿，今改桃蕊。

赘婿：合才、入吉才，今改为独占鳌头。

连襟称曰亚，今改弥仲，又曰共服。

丈人：才日、外日、插老。

丈母：才月、外月（补）、插老。

大舅：才上。小舅：才下。总称舅曰曹国。

大舅妻：月上，今改才上才。

小舅妻：月下，今改才下才。

大姨：才水上。

大姨母：缺，今可增为月水上。

小姨：才水下。

小姨母：缺，今可改为月水下。

阿公：太阳，今改官日。

阿婆：太阴，改官月。

外甥：斗欠。

外公：从日，今改月日，又曰泰山。

外婆：从月，今改重月。月，月母之母也。又曰泰水。

总称外公、婆曰东白，又称外太阳、外太阴。

母大舅：月上官。

母小舅：月下官。

亲翁：姻官，又罗星。

亲母：姻才，又计星。

继父：奖日，今改莫顾，取《诗》谓他人父之意。

继母：奖月，今改莫有，谓他人母也。

继兄：奖上，今改上莫闻。

继弟：奖下，今改下莫闻，总取谓他人昆也。

继子：奖欠、失欠，今改赢负，谓螟蛉子也。

后妻：迟才，今改接辮，取续发之意。

晚子：油欠、瓶欠。

晚女：油斗。凡晚醮挈子女者，余名之倒藤瓜，谓连子去也。

官人：通节，今改加民，谓官乎人也。

娘子：占子，今改亲手足，谓娘之子也。

做阿婆曰奖挨出，疑为将挨出，今改为代太阴。

义媳曰了角，今姑改奖欠才。

义孙曰食木欠，今姑改为奖重欠。

先生：师日。

师母：师月。

亲眷曰戚六。

朋友曰义生。

孝子曰日略，今改为二十四，此孝顺之孝也。又曰允违、取庶、见素。冠章义，此带孝



之孝也。

无妻曰念才（广）、底落。

无夫曰念官（广）、盖穿。

人物类

教书生：巾老、子曰通（广）、传册，又传醢。

读书人：灵儿（广）、酿醢。

学生：剪披、丁七（广）、忧养子。

幕宾：立门头（广）、生晞、密骗、忽扳、趋笑。

管公事人：牵生。

写状人：梅花党、抄孤子。

写字人：捌黑生。

送字人：飘叶子。

画家：捌管生、捌彩、能事人、龙生。

光棍：油滑生（广）、井梧摇落。

大光棍：顺子、柳生（广）、杆面杖。

下流光棍：谷山（广）、倒影枯杨。

闲汉：甲七通（广）、高搁班吏。

帮闲：丘八（广）、携手观天、偕消白昼。

赌客：跳生（广）、浑是胆、珠履三千。

兵丁：塞通汗八。

衙役：近孤通。

书手：札八。

门子：双扇。

皂隶：友竹、反竹、结脚。

皂快：白七通，贴孤通。

民快：立地。

捕快：钩子手、钩子身。

公差：紧脚，谓健步也。

禁子：禁脚生。

总甲：方坑。

坐坊：狗卒。

斋夫：齐天大圣。

走报：飞信通（广）、风行使者。

百姓：比儿。

蠢人：古生（广）、闻雷启蛰，取春虫也。

呆人：羊盘（广）、土偶木俑、食粟曹交。

乡人：千长通（广）、我犹未免、沉速为身。

村人：木寸通（广）、高于岑楼。

死胚：终八生（广）、未知生、揭白留真。

歹人：不将义（广）、汉忌韩彭，取似反也。

好人：将义、念将通（广）、使女缝裳。

乖人：拐七（广）、躅足陈平、闻雷堕筋。

赖皮：毛油生（广）、伯牛有疾、出水虾蟆。

客人：盖各、容同（广）、鸡黍相延、天涯逆旅。



上江人：丁老（广）、顺留入海。

别处人：强头生（广）、介葛来朝、集桑黄鸟。

本处人：原头生（广）、蒂固根深。

市人：井通。

店员：朝阳通。

山中入：真八（广）、从赤松游。

种田人：棋盘身（广）、村庄儿女。

成家子：会做的（广）、肯构肯堂、克荷析薪。

后生人：半子（广）、曰俊俏儿郎、岁月方长、子见犹惊。

贩子：不将人。

匠工：衍身（广）、斤丘。

走乡者：衍党。

走街者：响党。

富户：火通（广）、润屋生。

贫人：水七通。

闯将：献生（广）、牛金星，谓闯之将也，疋马横行。

老汉：苍通。

小子：尖通、尖生。

奶奶：受孤通，改受孤才。

小姐：闺琴，改双五百，谓千金也。

家主：受点。

主母：掌随。

家人：挨通，改旦称，谓奴家也。又曰令公儿，以子仪、骂子奴才也。

使女：挨才，改挨斗（补），仆妇为挨才。

乳母：显山通，改保赤。

雇工：廿一矢力八、帮挨（广）、贾勇。

老妇：花细。

半老妇：苍细、苍马。

妇人：马客、细公。

良妇：广宫。

小娃：剪角，改蚬子、蚌胎。

卖婆：力才。

媒婆：潘细，改撮合山。

寡妇：官川、寡马。

鞞子：柳叶儿、柳州通（增）、古月通、犬羊生。

鞞婆：营细。

鞞女：柳女、稍昌。

大阿哥：卵上部。

小兄弟：卵下部。

店铺类

凡店谓之朝阳。

典铺：兴朝阳。

盐店：信朝阳。

衣店：皮子朝阳。

布店：稀朝阳、乔公帐生。

药店：熯火朝阳。

医店：计钹，改苦口朝阳。

南货店：回生朝阳。

杂货店：推恩朝阳。今改为垄断朝阳，又为乱朝阳。

烛店：红耀朝阳。



染坊店（增）：今为浸润朝阳，又为悲丝朝阳。

鞋店：踢土朝阳，做鞋为踢土生。

袜店：签筒朝阳。

靴铺（增）：鱼皮朝阳，取传奇孙子膑足，因靴鱼而为靴。

饭店：爨章朝阳，又爨朝阳。

酒店：山朝阳。

肉店：流官朝阳，又曰仙帐、线钹。

面店：千条朝阳。

烟店：熏通朝阳。

香店：簋朝阳（增）、清远朝阳、闻朝阳、韩偷朝阳。

米店：碾朝阳、木公帐，改生爨朝阳。

伞店：隔津朝阳。

腐店：水判朝阳。

书店：册子朝阳。

扇店：半月朝阳，改为清来朝阳。

纸店：方皮朝阳，改为代策朝阳。

帽店：顶公朝阳。

线店（增）：缝朝阳、引针朝阳。

木行（增）：为森朝阳。

砖瓦店（增）：火工朝阳。

木履店（增）：衬足朝阳，又为辟水朝阳。

粉店（增）为傅朝阳。

点心店（增）为充爨朝阳。

篮店：提朝阳。

秤店：把朝阳。

绸缎店（增）：光亮朝阳。

皮箱店（增）：革囊朝阳。

笔店（增）为毛锥朝阳，又颖朝阳、中书朝阳。

墨店（增）：玄壤朝阳，黑土也。

砚店：受黑朝阳。

带店（增）：束朝阳。

歇店：琴头（广）、息足朝阳。

行商：乍山。今增水客为萍儿，山客为鹿儿。

开行：立山，今改六头君。取谚语走前头、立后头、坐横头、吃骨头、趁戥头、得零头之说也。

混堂：卷窑（增）、裸阳朝阳，又为温泉朝阳。

打劫店：采盘子。

工匠类

倾银匠：七九通、火琴丘、逼皂。

打银匠：刊琴丘、流琴丘、艮丘通、火身。

打金泊匠（增）为扁庚通。

铸铜匠：威勇。

打铜匠：响黄丘、金线通。

打铁匠：离丘生，（增）乌金玉。

锡匠：蜡丘、易丘。



石匠：研石通，改琢璞通。
木匠：甲乙生、森丘。
鲜匠：分水通，今增羊角通，又分森丘。
漆匠：挞黑通。
机匠：查线通。
挽花匠：连环通，（增）扳线丘。
染匠：查青丘、赚趾。
成衣：单线通、甲札。
缝皮匠：双线通。
做帽人：水线通。
琢玉匠：采石通，（增）雕琢丘。
刻字匠：梓生、断轮。
泥水匠：土伦，（增）壬戌通。又，朽丘。
淘沙军：思切。
箍桶匠：斗落踢瓜。
烧盐军：丙王（增）、煮海丘。

经纪类

挑扁担：天平生。
抬轿：兜力、押生。
修缸补锅：丙日子，改五霸手，谓补塞其罅漏也。
脚夫：摩肩。
打线索人：吊工。
摩镜人：托亮、到光、照子。余更为还光生，又曰明明。
放马者：边杖。

屠户：留通。
换碗：插把。
渔户：水流通。
卖古董：抵件头。
厨人：百味通、充火通。
船户：瓢游生。
穿珠者：贯通。
摇船：摆瓢。撑船曰棚水。
做针者：义老。
扯牵：扯线，改横笏通。
做伞者：撑通。
做花人：百瓣生。
打草鞋：栏杆生。
扛材人：保重。
做酒人：山通。
切面人：骑黄驃马。
卖饼人：着大棋。
卖糕人：百辰，余更之为踟蹰。
卖油人：滑底，余更之为润生。

医药类

医生：济崩公、扶本（增）、苦劝人。
名医：燠火通。
富医：汗火。
时医：丹青、竹彩。
眼科：皮恳。
针灸：钗烟弯。
诊脉：弹弦子。
撮药：配燠。



末药：暗老，改为暗爨。

膏药：圆纸，又改涂圆。

煎爨者：煎药之称。

掺药：飞屑。

锭子药：爨火，改爨琴。

走卖药：跳皮，改行爨。

小卖药：丢小包。

卖春方：派爨。

取鳖：挂狼。

追虫去积：七节通，又曰

七节吊。

下针：义卖、义党。

丸药：丸爨、粒粒。

牛黄：爆工。

换药珠：鼓釜工。

吐虫：泼卵水。

挑担卖药：天平党。

卖丸药：跳粒粒。

虎撑：寸铃。

卖疮药：跳十字爨。

烧香朝山卖药：拱党、观音党。

打弹卖药：弯子。

卖方子：提空。

汤膏药：炊涂儿。

京人卖药：念七皮通。

僧卖药：三皮跳。

道人卖药：火头生、全真党。

取牙虫：柴受。

妇人卖药：拖青、扳柴。

空中取药：采粒。

骑驴卖药：拖鬼儿。

撑伞卖药：昌皮。

戏法卖药：丁义党。

排摊卖药：跂踏党。

打坐卖药：丢墩子。

告示卖药：设僻。

卖假药：跳将爨。

学医：锁皮。

星相类

相面：斩盘。又，审囚。

不语相：嘿斩。又，哑党。

算命：梳牙。

抄命：剪牙。

雀算命：梟梳，疑为鸟梳之误。今更曰禽推。

弹琴算命：柳牙。

推流年：挤丙子。

瞎算命：念梳。

龟算命：袱包子，今改为蔡梳、灼龟、烧青烟。

量手指：骨梳。

看三世图：番梳。

起数：晕老。

丢铜皮：元片。

各色起数：牵丝。

起课：烹玄。

打君知曰闯友。

打筘：丢笋、抛孤、撇查、落跌。

堪輿人：斩葫芦（增）、穿山甲，甲脚同音。

九流三教：通称江湖友。

初出江湖曰卯喜（增）。

隆中应聘谓才出茅庐也。
惯走江湖曰相府（增）、周
流列国。

关肚仙，亦称剪牙（增）。
鬼凭儿（原名），又曰关
川生。
献师：烧黄七。

娼优类

戏子：吼生。
小戏：跳身、帝奚。
戏师：习吴老（增）、传
吼生。
生：牛一。
旦：正母（增）、平明。
小旦：贴母（增）、昧爽。
净：争工。
丑：破田。
外：未吴老。
末：一木。
乐人：丁八。
鼓手：竭老，疑羯老之误。
小唱：细鸣。
杨花：响咏。
唱侬调：马上诉。
妓女：青马、青细、客细、
众才。私窠子，亦称客细。
老鸨（增）：青妈。
龟子：中八生、刮丢（增）、
六缩。
忘八：客盖，改青盖。
不正女：盼青，改歪细。

乞丐类

讨饭：挂爨、碎山。
瘫叫化：披街。
装斯文落难求乞：搽相，
改沐猴。
书情节求乞：磨街党。
带妇人求乞，亦称观音党。
手本讨钱：古相。
带孝求乞：丧门党。
作揖求乞：丢圈党。
哭诉求乞：诉冤党。
托神求乞：童子党。
弄蛇：扯溜，改降龙。
弄猴：耍老子，改伏虎。

盗贼类

盗首：掌盘。
大盗：千七。
窃贼：钻通。
挖洞：穿窬。
断路：勇打（增）、留客住。
偷鸡：挑菜，又曰残黄欠。
剪绺：裁皮、抓丝瓜。
白闯：闯辕门。
毛贼：小老鼠。

僧道类

和尚：廿三、失一。





道人：廿一。
 道士：廿四、得一。
 师姑：水廿三。
 道姑：水廿四。
 尼姑：斗廿三。
 仙人：称为书香，今增为云游子。

玄门：养真。
 阴阳生：水火通。
 炼丹：提火罐。
 香火道士：熏修。
 化缘：焦行。
 送符：出火头。
 书符：描黄。
 唱道情：倒杠子。
 说因果：嚼果。
 僧道拜门：扳牙。
 蘸星：法水。
 经事：黄庭。
 求签：抽条子。
 徒弟：候指。

身体类

头：顶元、魁儿。
 面：元老、盘老。
 眼：照子。
 耳：招风、采官。
 鼻：土星、闻官、汲香。
 口：风门、水星、海门。
 齿：磨子。
 舌：信心、心柔（增）、心苗。
 眉：探老（增）、及第、分八。

发：皂线、飘光、云线。
 须：草绿、龙图子（增）、表丈夫。
 喉：素儿（增）、司谏。
 身曰四大。
 肚：西方（增）、容老。
 手：上元、脱瓜。
 足：下元、踢土。大脚曰太式。
 拳：托起。
 乳：缠手。妇乳曰尖山、吞子。
 骨：枯枝。
 阳：金星（增）、缩头生。
 阴：盼公、北风。
 男风：卯生。
 淫阴曰拿蚌。
 嫖曰吐青，又曰慕容。
 龟头眼曰马口。
 大便曰撇闷、脱急。
 小便曰撇柳、闷干。
 撒屁曰撇条。
 饥曰枵。
 困曰昏斗、并足。
 瘦：柴、青条。
 肥：花草（增）、濯濯。
 标致：坚立。
 丑：古寒（增）、配西。
 盲：念照，又双念照。
 眇：单念照。
 麻：刊通（增）、雨沙，又曰礼冠。
 哑：念讷（增）、曰默、忘言。
 聋：老采（增）、目听、等辰。



驼：但结（增）、入公门。
 跷（补）：地不平。
 矮：胜身（增）、如射。
 折足：定半。
 胡子：老图。
 白：草飘。
 黑：草鬼。
 黄：金草。
 壮大：干叱。
 怯懦：肥妖。

宫室类

屋：窑子、龛公。
 厅：巨方、坚窑。
 楼：登高。
 房：底里。
 店，一名受廛。
 栅：戴毛。
 所在：碾地、乐林、落地。
 歇家：搅客（增）、埋轮、
 停驂、投辖。
 出路曰出水。
 寺院：兜子。又，横高井、
 公邑。余又增寺院为兜率、梵
 王宫。
 庙宇：神窑、释窑，改为
 释巢。
 教场：遍碾。
 监牢：禁圈、土砖城，改
 曰人世阿鼻。
 戏台曰朝天，又，高阳子。
 造屋曰盖顶，又曰搭棋盘。

入屋曰钻仓。
 出门谓之离窑。
 开门曰挂扇，又曰拔掩。
 关门曰吊扇。
 到家曰钻窑。
 墙垣：避火，又遮风，又
 牖窗。
 门外壁：宋山、扇子、窗
 楞扇。
 梯月儿（增）：踏望儿、云
 老会、步步高、灶丙堆。

器用类

桌：朝天、方面。
 凳：曲身。又，四脚子。
 椅子：东登。
 厨：弄申。
 床：卧尺、昏老、昏乔。
 箱：皮抗。
 盒子：肩壮。
 茶盘：荷叶。
 招牌：或头、躲儿。或字
 疑式字之误。
 天平：担针桥，今更名无
 偏子，又曰针挑担。
 算盘：拨公。
 夹剪：分良，又，夹青。今
 更名口快儿。
 戥子：星琴、衡子。
 秤：横挑、平老。
 银包：答心，今更名琴囊。
 尺：寸头。



升：科老。
斗：圆老，应名科老。
斛：方老。
扁担：负龙、量肩。
轿子：壮风生。
摇红：灯笼之谓，凡灯仿此。
雨伞：撑老、遍天遮。又，

隔津。

官伞：掩太阳。
大伞：大式。
钉靴：响筌筒。
木屐：响踢土。
磨子：走雪。
枷：嵌老。
告示：躲子，今更名先声，

又名招摇。

砖：丙骨、丁块。
瓦：丙片。
灶：离宫，行灶曰浮丙。
铜杓：角兜。
锡注子：汤儿。
抢锅刀：扁乌子。
壶瓶：省器、探水。
抹布：油方、拓郎。
火石：丙批。
火石：丙块。
碗：罄子、荷花。
碟子：罄口。
杯：响盏。
筋：条蒿。
木棒：迂杖、条达。
梳子：杷头、杷老。
篦（增）：比栉。
抿子：金刃。

剪刀：绞儿（增）、裂帛。
又，断机子。

锁：将军、红尹。
锁匙：镗木（增）、开关。
枕刻天：土量，今更名扶头。
席：卷友、卷血铺。
纸马：效劳。
烛：摇红子、亮子、笑椽。
炭：乌新、山灰。
帐：亦名撑老，改撑幔。
灯：天花，（增）代日月。
棺材：焦斗。

文具类

书：万卷册、册儿。
画：的表老、图良。
纸：蔡伦，红绿纸割曰
皂瓢。
字：睹儿。
墨：赤土、青烟。又，黑卿。
笔：判老、尖头、提老。
砚：石田、受黑（增）、受
磨涅。
棋斗：精手斗、争锋、短
兵。余谓总不若名之曰谈兵。
双陆：抛（增）、金钗十二。
香：烟头。线香则名之曰
烟条。
香袋：申老。
数珠：转老。
拐杖：引落，改曰持危。
扇子：招风、摇老，增曰

手帆。

手巾：松鬼，改曰公拭。

拜匣：方行。

镜子：照儿、的圆、照子光。

刷牙：括舌，通名洁口。

烟筒：熏葱。

骰子：撒掷。

古董：染肯。

书信：喜子，改曰报君知。

兵备类

盔：元老。

甲：宿皮（增）、推锋。

枪：条子（增）、刺坚、义牛头。

刀：苗叶、千金（增）、利口生。

棍：要千（增）、挺老。

弓：弯老、先张。又，扁弯子。

箭：快快、茅针。

挂刀：披子。

爆竹：响子、流星、落弓。

缰绳：缠午老。

鞍辔：稳子。

乐器类

钟：金鸣（增）、子声。

磬：克明（增）、子振。

鼓：空心、思雷。

喇叭：摆开。

铙钹：双筛。

锣：筛子、金喝。

琴瑟：双王。

箫：坚龙、火通，增曰引凤。

笙：一把揸。

管：四纳。

笛：横闷、叫龙。

板：腔师。

箏：板答。

琵琶：柳老。

鼓板：拨凳。

拍板：捺色。

满洲鼓曰凯曲。

舟具类

舟：瓢儿、瓢子。

橹：平六。

柁：瓢后灵。

橦：顶天快。

篷：卷风。

篙：挺。

平艤：平瓢。

替舱：同六。

棹桨：司老。

铁锚：当家。

芦席：顶公。

龙舟曰神瓢。

衣服类

巾帽：顶天、顶元、顶公。





网巾曰拍首。

衣服：皮子。好衣服曰皮子坚洁。

海青：长皮、彩林、皮林。

布服：硬皮、稀皮子。

绸缎衣曰软皮，又曰琉璃皮子。

布衫：决林。

裤：叉老、双井、叉儿裙栏杆、八幅。

鞋：立地、踢尖、踢土。

袜：登桶、笔管、踢管、筌筒。

靴：登老。

绸娟：板细公。

布：稀公、细梭。

绫缎：撒帐。

绵绸：细纸。

丝绵：领毛。

带：飘叶、条子。

包袱：赠贴。

被：滚服、暮林、文滚。又曰战干。

帐：网儿、幔天。又，撑老。

孝服：顶雪皮子，又曰风雨飘、西方皮子。

孝巾：顶雪。

方巾：侧脑。又，顶侧。

饮饌类

茶：青老、清喉、木鬼、碧水、牙净、枝叶、木癸、扰櫛子。

酒：山。又，山香；又，

酝绿、山老、喧老。

白酒曰水山，好酒曰金山，烧酒曰火山。

粥曰稀汉、平顶馍、流稀。

饭：馍章、食老。

面：千条、豁鼻。

饼：稀片、匾食。

干面：白茫、飞尘。

挂面：绵盘、线老。

糕：稀块。

粽子：稀尖。

汤圆：稀圆、水泡。

糖：塞牙、甜公。

馒头：气楼、花垒。

馄饨：斜包。

汤：滚沦。

茶果：得占。

素菓：花头，菓字疑菜字之误。

豆腐：水板、水判、水林。

面巾：踏麦儿。

粉皮：汤食。

麻腐：樵食。

素粉：水千条、帝角。

油：丙浆。

素油：哥麻郎。

盐：信老、沙力、赞郎、五味。

酱：沙油、中军、汁老、研哥。

醋：盆山、醯老。

烟熏子：冲风烧老。

猪肉：留官。

猪头：沙帽、人面流官帽。

火腿：挂判。

杂肠：吕公条。



牛肉：春流。

羊肉：细毛流、臊老、山官流。

凡肉皆称流。

鸡蛋：王七欠。

鸭蛋：洪欠。

凡蛋总名又曰圆光。

鲞：底板。

又，蛋称曰昆仑子。

醢肉曰信流。

珍宝类

金：黄琴。

银：硬底、琴头，又曰皂头。

好银曰坚琴，低银曰古琴，铜银曰将琴。

铜曰红曲、角红。

铁曰乌金。

铅称为玄锡。

锡曰白描、钱圆、把响、青把儿、穿风、青儿。

暴发曰初火。

数目类

一为刘，又流寅。

二为月，又月卯。

三为汪，又汪辰。

四为则，又执巳。

五为中，又中马。

六为人，又人未。

七为心，又辛申。

八为张，又朔酉。

九为爱，又受戌。

十为足，又流执。

一分：流去。

一钱：流宝。

一两：流西。

十两：流千。

百两：流千宝。

千两：流丈。

多曰彭彭太式。

草木百果五谷类

树木总名曰独脚鬼汉。

木又名甲乙生。

柴：樵杖。

柴板：云骨、樵条、堆老、乌杖、条官。

草曰木焦。

根曰焦枝。

花：元稀。

叶：盖露。

果：青垒、苗群、希令。

桔：红光。光乃圆字之误。

菱：角儿。

菜：苗稀、破屑。又曰地青、叶苗。

小菜曰苗戏。

萝卜：大苗稀、埋头、假参。

笋：少竹、竹欠。

山药：蒙枝。

茭白：指节。



芋艿：滑麻。
 茄：垂老、垂子。
 姜：甲老。
 葱：管布、管苗。
 韭：毛头青、月割。
 蒜：地拳、条苗。
 西瓜：水球。
 瓜之总名曰球。
 豆：粒儿、圆粟、沙子、

为兵。

晚豆曰结老。
 蚕豆：球老。
 寒豆：人垒。
 绿豆：和垒。
 苗：芸青。
 稻：青焦。
 赤豆：花垒。
 □：轮黄、回花、梭立。
 大麦：粗花。
 垒麦：人花。
 小麦：细花、地花。
 乔麦：和花。
 谷：连壳希。
 米：希老、软珠、擦老、碾希。
 糙米：研希。
 船米：花希。
 白米：雪希。
 糯米：粉希。
 粳：小希。
 糠：希壳。

鸟兽虫鱼类

龙：万丈、万化、辰老。

凤：鸣王。
 虎：喊老、猛子、寅老、
 班虫。
 狼：凶风菜。
 狮：门神。
 象：双门。
 鹤：顶冠。
 鹿：顶竹。
 牛：丑官、吞青、土官、
 春官。

犬：州官、戌老、巡攘。
 羊：未流、白衣、圈判、
 粘老、解草、山官。
 马：午流、午老、风官、
 嘶午、午生。
 猪：亥官、黑官、线留官。
 鸡：王七、西官、鸣老、
 得晓、斗子、响各。
 鸭：王八、鸳五、纸判。
 鹅：王九、雀官、判头、
 道士。

猴：申官。
 兔：卯官。
 蛇：溜子、缠老、炼子。
 鼠：夜游子、老念牙。
 骡：古老。
 猫：将寅、穿梁、夜明。
 驴（增）：蹇老、钝才。
 鹰：赏物、白飘雪（增）、
 子扬。

鹤：苍鸣（增）、鸣垓。
 鹤（增）：天闻、鸣皋、
 在阴。

鸦：追思、追山（增）、



反哺。

鹊：报君知（增）、灵儿。

鸽：鹁子。

雀：失喜（增）、饲花、
衔环。

鸟总名苍飞。

小鸡：火鸣菜（增）、德乌。

腌蛋：信圆。

鸡蛋：王七欠。鹅鸭依此
推之。

虫总名受儿。

蚂蚁：昆虫（增）、垤居、
知泉。

田鸡：抱头、水斗、奇鸣。

蟑螂：熏虫。

蚊（增）：虻老、箕鼓生，
本名碎老。

虱：受子（增）、扞谈。又，
游裤；又，半风君。

蚤：受黑。

鱼：水先生、水梭、河公、
河戏、水气、希班、柴河、德
判、水瓢（增）、化龙子。

腌鱼曰信梭。

鳖：匾戏、神守公、思交子。

龟：冲八，清闲。

虾：长枪手、弯虫。

蟹：钳公、羊虫。

鳝：象缠。

鲚鱼：元水。

鳗：线香。

鲤鱼：逼水。

鲫鱼：时水。

苍条：条戏。

螺蛳：波罗（增）、曲房。

田螺：海波罗。

蚌：水戏（增）、纯阴。

疾病类

病通称曰延年、眠眠、元
念、暗年。

疯子：巽方大岁、摊延年。

瞎子：念照，目疾日照牛。

驼子：脊牛。

痲病：火延年、赤太岁、
焦根限。

隔症：闭塞延年。

臃胀：胖延年、山风延年、
结珠延年。

疰疾：水火延年。

痢疾：玻璃延年。

手疾：托牛。

足疾：折牛、踢牛。

缺嘴：兔唇。

生疮：闲杨杨、哥太岁。

带疾：有牛。

杨梅疮：因哥延年，该名
果子延年。

暴疾：急延年。

老病：常年。

疥疮：十字延年。

眼病：照子延年。

臃疮：裙风延年。

耳疾：井牛。

烂耳曰井延年。

烂足曰踢土延年。

生死类

生子：脱欠。
生女：脱斗。
坐喜：含欠。
生孙：巴欠。
无子：念欠。
子多：兼欠。
遗腹子：飞肉。
双生：双欠，该名对欠。
凡死皆称曰川。
病死：大限川。又，年川。
水死：龙川、冷川、玄武川。
井死：穴川、窟川。
火热死：丙丁川。
打死：匾川。
杀死：侵川，增曰金川。
牢死：闷川，增曰禁川。
勒死：抵川。
吊死：线川、挂川。
卤死：信川。
虎死：寅川。
犬死：戌川。
蛇死：巳川。
产死：红川。
痲病死：火川。
雷击死：乾川（增）、震川。
夫死：官川。
妻死：才川。
公死：东川。
婆死：西川。

人事类

好：坚、响坚、坚通。
不好曰古、古坚、念坚。
又，神古。
他曰渠。
你曰伊。
我曰令儿悉。
立：侍平、潘儿树。
走：游墩。又，量。
打匾郎：匾持叩。
骂郎：千发、千咽、柳江浪。
笑：巧倩、完凯、今交子。
哭：拭照、流珠、撒娇、撒汗。
借曰昔。
讨曰探。
有曰献。
无曰念。
气曰闷东。
恼曰古贵。
腹饥曰馁。又，西方亮。
饱曰盈腹。
在曰是。
看曰扳识、斜手、班色。
骗人曰将康。
吃曰班，又曰赏。
做曰钻。
分曰披。
渴曰咬七。
要曰同工。
复要走曰蛋趄。





相打曰闹匾。
叫曰显啊。
坐曰打墩子。
说合曰抹铁。
挑：孤担、天平。
吃饭曰扰爨。又，赏爨。
吃酒曰扰山、领山、班山。
醉曰山透。
吹打曰捏眼。
献菩萨曰泼水。
酌献曰摊红。又，卷荒。
有眼力人曰宪照。
不知事曰暗人。又，不端亮。
讲事曰咬黄。
假：王龙。
去曰凉。
来曰热。
多又曰满太式。
少曰希、古莫。又，宛宛。
快曰马前。
慢曰马后。
大亦曰太式。
小曰尖。
高曰崔峻，又曰上。
低曰浅，又曰狭。
买曰扳、扳耀、蒲拔。
卖曰嫁耀货、倘削。
着曰响。又，端。
不着曰不响、不端。
说好曰隆。
说歹曰签。又，告古啊，
又曰针啊。
拿曰肘，又曰温文。

套曰扳。
输：伤手。
赢曰上手。
进门曰入啊。
来了曰入步。
识得曰观亮。
虚说曰王六。
聪明才智曰慧老。
巧人曰占生。
梦秋曰压生，疑魔字之误。
没有曰梦。
趁钱曰浪肘。
盛曰大响。
取钱曰奎把。
分银曰劈琴。
讨钱曰挂琴。又，讨银钱
曰呕风。
多要曰不将好。
是非曰咬手。
放对曰查头，又曰犯查头。
说出来曰吐啊。
油嘴曰太咒。
说本事：将气签。
打官司曰匾孤舟。
告状曰控讼、耗孤、顶孤、
滚丙。
人命曰人牙。
凡命为牙，故算命曰梳牙。
官事曰孤非。
犯徒罪曰奎五。
犯充军曰奎六。
得财曰有皂。
破财曰失皂。
好嫖曰花皂。



好赌曰者皂，又曰拏把。

寻闹曰犯捺。

相骂曰目西。

贪吃曰吹毛。

欠债曰抵金。

有钞曰热子。

无产曰流通。

刁而蛮者曰鄙貌。

拐子称为马扁。

假钞曰将肯。

跪曰拂土、丢千。

拜曰剪拂。

拜揖曰丢圈子。

请坐曰登壁。又，盘俟。

唤茶曰青儿。又，水汉。

说话曰吐调。

会说曰调皮。

买卖曰倘扳。

做戏法曰扬虚。

逃走曰暗量、兆量，又曰滚线。

八字曰入黑。

合婚曰合寸。

配妻曰巳才。

讨妻曰挂才。

做亲曰披红。

年纪曰丈头。

起身曰结坐。

讨丫头曰挨手。

讨小使曰挨子。

靠人家曰挨通。

说人成亲为炉老好。

谈往事为日料。

好村方曰良棋盘。

卖田曰削盘。

买田曰拔盘。

种田曰钻盘。

离祖曰辨黑。

学生意曰太摩。

有生意曰得措。

没生意曰念捌。

能生意曰柳党。

合做生意曰捺才。

合伙曰八米柴。

生意好曰响帐。

做生意还家曰倘板转。

生意名为赞曲。

收摊子曰卷帘。

对门为对枪。

隔壁为隔枪。

邻舍为邻通。

做生意处为碾地所，好场子亦为碾地。

卖东西曰挑思息。

不识物人曰羊生。

知我行事曰徒染，又曰元梁。

各色好曰双足。

急曰弓皮。

缓曰倦千。

结交朋友曰嵌角。

奉承曰除公。

善逢迎曰买火种。

极好曰本六。

有人知道曰正八。

不识取笑曰破赌。

坐又曰度堂。

火烧曰献红。

下船为踏瓢。

到人门为钻窑。
不言语为念咀。
趴灰曰灼炭。
拐龙阳为拿卯。
嫖曰马牵。
养婆娘为养马。
骂人毳曰溜海，又曰采线。
自卖为挨身。
卖女为挨斗。
不晓切曰羊盘。
晓不会曰半亮。
不在行人曰衍生。
洗浴为潮龙。又，诳沦。
洗面曰逛盘。
剃头曰扫青。又，削青。
剃头人曰飘生。
做痒曰按摩。
取耳为扳井。

敲背为拣尸。此语可恶。
剔脚为裁皮，又曰瓜皮，又
为修踢土。
凡卖物又谓之曰跳。
卖糖则曰跳甜公。
卖香为跳烟头。
卖帽为跳顶公。
卖假货为跳符愚。
真货为实赞。
和尚道士化油曰吊漫水。
分票儿曰飘叶子。
圆光曰请空。
请仙曰空老儿，又曰钻黑鬼。
道士书符又名错大字、错虎头。
唱道情人曰边江子，又曰
杠子身。
宋殿道士送符曰漂火头。



江湖切语三十四卷终。

附录八

作者论著目录

一、著作

1. 到劳动人民中去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合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
2. 严复诗文选注（合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
3. 中国近代史（合编）。南京：南京大学，1978
4. 太平天国史论丛（合编）。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太平天国研究室，1979
5. 严复集（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8. 秘密社会与工农运动（英文版）。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1988
9. 中国秘密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0. 民国时期的土匪（合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1. 中国秘密社会概观（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2. 中韩历史文化交流论文集（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 中国秘密社会 7 卷本（副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4. 薛福成日记（点校、注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15. 中国社会史丛书 20 种（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996
16. 中国秘密社会丛书 9 种（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2000

二、论文

1. 毛主席开辟安源工人运动. 北大青年, 1958 (1)
2.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 北大青年, 1958 (2)
3. 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生活. 光明日报, 1958-12-08
4.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 1964 (1)
5. 论秋收起义. 新北大, 1968 (3)
6. 井冈山斗争道路. 新北大, 1968 (4)
7. 洪秀全的反孔斗争精神. 南京大学学报, 1973 (1)
8.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反孔斗争. 新华日报, 1974-06-23
9. 民族奋发图强的警钟——读严复的译述《天演论》. 南京大学学报, 1975 (4)
10. 关于评价杨秀清的几个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 1977 (4)
11. 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 历史研究, 1978 (6)
12. “天京事变”的一个见证. 百科知识, 1979 (4)
13. 发扬五四革命精神, 解放思想搞好四化. 群众, 1979 (5)
14. 关于洪大全的身份. 历史研究, 1979 (6)
15. 李秀成与太平天国在江浙地区的土地政策. 见: 太平天国史论丛. 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太平天国研究室, 1979; 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6. 从《柳兆薰日记》看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和历史作用. 南京大学学报, 1980 (3)
17. 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 群众论丛, 1981 (5)
18. 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 1982 (1); 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 1984 (10)
19. 哥老会与 1891 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 社会科学研究, 1982 (5)
20. 关于金田起义的时间. 见: 太平天国史新探.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21. 关于金田起义时间的一份奏稿介绍. 见: 太平天国史新探.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22. 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 南京大学学报, 1983 (1)



23. 关于太平天国后期土地政策几个问题的考察. 见: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北京: 三联书店, 1983
24. 略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 光明日报, 1984-01-04
25. 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 南京大学学报, 1984 (2)
26. 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 社会科学研究, 1984 (3)
27. 论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 近代史研究, 1984 (5)
28. 镇江与南京. 见: 太平天国译丛 (第2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9. 关于雷再浩与李源发起的几个问题. 见: 太平天国学刊 (第2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0. 赵金陵、蓝正樽等起义资料. 见: 太平天国学刊 (第2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1. 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 见: 太平天国学刊 (第3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2. 介绍石达开入湘后的几件档案史料. 见: 太平天国史论考.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33. 秘密社会与中共早期的工人运动 (英文). 第32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 1986
34. 秘密社会与近代中国的农民战争 (英文). 美国亚洲研究年会论文, 1986
35. 要重视社会史的研究. 南京大学学报, 1988 (1)
36. 论近代中国会党的社会根源、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 南京大学学报, 1988 (1)
37. 略述晚清时期中国的秘密社会. 清史研究通讯, 1988 (1); 第33届欧洲汉学家会议论文集, 1988
38. 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匪 (与杜景珍合作). 南京大学学报, 1989 (2)
39. 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与孙江合作). 历史研究, 1989 (4)
40. 论青红帮的历史演变与罪恶活动. 南京大学学报, 1990 (3); 见: 社会问题的历史探讨. 成都: 成都出版社, 1992
41. 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威胁社会安定. 新华社内部参考, 1990 (90)
42. 秘密社会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关系 (英文). 澳大利亚亚



洲研究年会论文，1990

43. 当代中国的黑社会问题（俄文）. 远东问题（苏联），1991（3）
44. 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英文）. 远东事务（*Far Eastern Affairs*），1991（4）
45. 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与彭邦富合作）. 南京大学学报，1992（3）
46. 扩大视野，注重理论方法. 历史研究，1993（3）
47. 中国大陆的黑社会. 江苏工人报，1993-08-07
48. 关于苏州市民社会的几个问题（与屠雪华合作）. 民国档案，1995（2）
49. 论苏州市民公社的性质（与屠雪华合作）. 江海学刊，1995（3）
50. 试论当代邪教的几个特点（与孔祥涛合作）. 江苏社会科学，1997（6）
51. 当代中国黑社会研究. “吴相湘教授学术讲座”演讲论文，芝加哥，1997
52. 严复与戊戌维新（与皮后锋合作）. 江苏社会科学，1998（6）；见：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3. 50 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与李良玉合作）. 近代史研究，1999（5）
54. 金泽荣在华的韩国文化拯救活动述评（与王庆德合作）. 见：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55.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与刘平合作）. 学术研究，2000（3）
56. 论澳洲的华人秘密社会. 江海学刊，2001（1）
57. 黑社会：地球村的恶性肿瘤（与吴东升合作）. 警方，2001（3）
58. 中国帮会及有组织犯罪团伙（英文稿）. 第4届国际帮会研究专家会议上的讲演，芝加哥，2001
59. 太平天国起义与千年王国. 学术研究，2002（8）
60. 中国人供神的缘由. 百科知识，2004（5）
61. 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62. 《薛福成日记》序言.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63. 澳洲鸟修威雪梨中华商会研究 (1902—1943). 江苏社会科学, 2005 (4)
64. 近代中国的土匪. 百科知识, 2005 (6)
65. 我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三、书评、序跋

1. 社会史研究应对历史“完整的表象”的研究. 见: 中国社会史丛书.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1996
2.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见: 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3. 评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 社会科学辑刊, 1989 (6)
4. 评郭孝义主编《中国近代史》. 镇江师专学报, 1993 (1)
5. 首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南京史志, 1993 (5)
6. 《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序. 银川: 宁夏出版社, 1993
7. 评秦宝琦的新著《中国地下社会》. 清史研究通讯, 1994 (3)
8. 《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序.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9. 《中国近代经世派与经世思潮研究》序.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10. 《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序.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1. 《中国秘密社会丛书》序.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12. 《改变东亚的历史巨人》序. 台北, 2000
13. 《湖南近代会党研究》序.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14. 读姜涛《人口与历史》(与李良玉合作).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1 (3)
15. 《生命哲学在中国》序.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16. 《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序.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17. 《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序.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18. 《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研究》序.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19. 《晚清哥老会研究》序.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20. 《严复大传》序.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21. 《严复年谱》序.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22. 《梁启超与胡适: 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序.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23. 《近代广东会党: 关于其在近代广东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序.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4. 《苏北现代化进程基本问题研究》序.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
社, 2004
25. 挖掘下层社会的历史——评《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 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2)
26. 《邪教的秘密: 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序. 北京: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7. 梁家贵著《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出版. 徐
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28. 《中山陵: 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序. 北京: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四、访谈

1. 反黑, 当今社会面临的课题(专家访谈). 警方, 1994(5);
新华日报, 1995-03-08
2. 扫黑必先反腐(专家访谈). 中国新闻周刊, 2000(20)
3. 反黑: 势在必行(专家访谈). 警方, 2001(3)
4. 打黑首先要打掉保护伞(专家访谈). 新周刊, 2001(4)
5. 论当前打黑的形势(专家访谈). 瞭望, 2001(4)
6. 关于扫黑反腐的几个问题(专家访谈). 香港凤凰卫视, 2001

后 记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对秘密社会与农民战争关系问题的讨论，引起我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兴趣。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邵循正教授的助教和在职研究生，经邵先生的联系介绍，我到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即现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了该部已整理的秘密结社全部档案。原计划在三五年内写出一部专著，但当我刚写完《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和《天地会与台湾林爽文起义》两篇论文，“文化大革命”即开始。“十年浩劫”期间，不但无法继续研究，所积累的资料也受到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史学才走上繁荣的道路。1979 年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同志对我说，会党史是我国史学研究中的一大薄弱环节，并要我写本会党史专著。在他的鼓励下，我利用教学业余时间，经过 6 年的努力，终于系统地写出了 10 多篇论文，汇集成这本《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本书共收入 15 篇文章，加上附录，计约 35 万字（其中约有 10 万字的文章曾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按中国会党发展的历史顺序安排，基本上每个时期都有一篇或几篇论文，以期反映中国会党发展的历史梗概。由于这方面可参考的研究成果不多，加以本人学识浅陋，写出的东西极不成熟，错误和缺点一定不少，诚恳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国外一些图书馆的资料和图书。英国伦敦大学柯文南博士给我复印了不少档案和参考文献，并将拙文《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译成英文，在美国《近代中国》杂志上发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裴宜理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小岛晋治教授，以及其他许多外国朋友，给我提供了国外研究的成果和

信息。承戴逸同志为本书写了序言，中华书局的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蔡少卿

1985年9月于南京大学



后
记

增订版后记

本书 1987 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后，我又发表了 30 余篇论述近代会党史和当代中国黑社会的文章。此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本书作为“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之一再版，我将论述雷再浩与李沅发起义、青帮、青红帮合流、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美洲及澳洲华人秘密会党以及当代中国黑社会等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增加进去，以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全面完整，特此说明。

本书再版过程中，有关文章的搜集、录入、校对等，李恭忠、李里峰、皮后锋博士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出版社的谭徐锋、吕鹏军编辑多方指导，谨此表示感谢。

蔡少卿

2008 年 5 月于南京大学